

官僚主义的 弊害

〔法〕阿兰·佩雷菲特 著

商务印书馆

Alain Peyrefitt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E MAL FRANÇAIS
PLON PARIS

根据巴黎普隆书店 1976 年版本译出

官僚主义的弊害

[法] 阿兰·佩雷菲特 著

孟鞠如 李直 吕彤邻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⁵/₈。印张 510 千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统一书号: 3017·278 定价: 2.6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是法国著名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学者，当过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省议员、市长；先后多次出任司法、新闻、教育等部部长，现政府蝉联司法部长；1977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73年曾出版过一本《中国觉醒之时》，畅销全欧，使他享有国际盛誉。1979年10月华国锋总理访法结束时，他曾到机场送行。

本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主要是抨击法国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制和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全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追踪隐疾”，叙述作者发现“法兰西病”的经过；第二部分论述“法兰西病”历史形成的过程；第三、四部分列举大量事例剖析法国社会种种畸形现象；第五部分分析“法兰西病”的思想根源；第六部分回顾法国三百年来种种改革尝试，分析其失败原因。最后提出几条治疗方案。

作者自己说，本书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的是没有答案的。

由于作者知识渊博，又熟谙法国政情，对许多问题揭露、剖析颇深。本书1976年出版时，曾引起法国以至整个西欧的很大重视，被誉为“战后关于法国最重要的一本书”，透露了法国“最触目惊心的内幕”。作者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但书中提供的大量情况，对于了解法国，并借鉴我们自己，都是有价值的。

阿兰·佩雷菲特
法兰西学士院
院 士

法 兰 西 病

法兰西呀，说真的，你的病根在哪里？
你难道不知道你为什么伤感？
我要告诉你，为了尽尽我的心，
听听我罢，你会明智一些……
可不是叫你灰心丧气。

查理·德·奥尔良^①

题赠鹿特丹市人伊拉兹马斯

探索第三条道路永远不懈，

“吉布林当他盖尔夫，盖尔夫当他吉布林”^①，五百年来
他纹风未动，古代的大师，未来的师表。

我是法兰西人，这是我的包袱。

弗朗索瓦·维隆^①(1460 前后)

我知道我国的病症。

亨利四世^② 1599

以人物自居在法国并不稀奇。

在那儿以了不起的人自居……

这就是法兰西的病症。

无聊的虚荣心是我们的特性。

西班牙人也爱虚荣，不过表现各异。

让·德·拉方丹^③

法兰西病在于夸夸其谈，爱把一切化为高谈阔论。学院维持这种作风，顽固地只讲究文彩和才情。

欧内斯特·勒南^④(1859)

我揭露一个病症，它腐蚀我们全身……无法无天，猖狂反动，二而实一。因为病在国脉，无力自治，尽管一百年来，历次试图更改政府的形式。

乔治·克里蒙梭^⑤(1913)

七颠八倒，不离老调，法国健康，十分良好，这对国家，实在不妙。唉！千百万人，听了喜报，不值一笑，反而心里，一味

发毛。

乔治·伯纳诺斯^⑥(1936)

法兰西病乃是政治病……法国人差不多失掉了自己的政治职能。公民没有了,怎能还有国家呢?体制里要来一次革命,根本在于群众思想起个突变。

亨利,巴黎伯爵,“法兰西病”^⑦(1954)

法国人患有沉疴。他们不肯理解,时代要求他们作绝大的努力,来适应时代……他们离不开国家,又痛恨国家,除非国难当头……他们的行为,不像成年人。

戴高乐^⑧(1966)

目 录

序：我们的私生子 11

思想习惯的包袱。——经济和民主的奇怪故障。——布雷区。
——管窥症。——不自觉地回到洪水时期。——“我们讲的是过去”。——爵士乐手。——耳闻目睹。——探索隐疾的经历。
——事情的经过仿佛是这样。——思想交锋。

第一部 追踪隐疾

第 一 章 法兰西谜 26

“法国人靠不住”。——“他们有自己的定见”。——“拉丁人喜欢理论”。——信用问题。——原型是成功的，但成批生产呢？
——接受挑战。——“法国人最好”。——奇特的连贯性。

第 二 章 病人膏肓 38

法国意志消沉。——分裂的法国。——法国下跪。——离奇的败仗。——非战之罪。——造反分子和爱国分子。——打靶游戏。——辟邪。

第 三 章 寻找病毒 50

早餐不忘公民道德。——“零钱嘛，等你方便时再说罢”。——一个同病毒一样简单的媒介。——大师们的画像。——科学是一所修道院。——按箭猪方式结成宗族。——自我殖民化。——僵化的天主教。——在寺院里的黑袍教士。

第 四 章 两半球 62

一个民族，两种社会。——把不幸当跳板。——我们争吵的场面。——铁幕将要颠倒过来。——计划：是奇迹还是一塌糊涂。——杰拉尔德·菲利普大吃一惊。——解冻和再冻。——全世界的笛卡尔派……

第 五 章 从头烂起·····	75
集体自我解脱。——逃之夭夭。——互相抵消。——欧洲，办不到的药方。——海外领病了。——既成事实政策。——病态外交。——没有权威，因为没有持续性。——患厌恶历史病的人民。——“戴高乐再也不会回来了”。	
第 六 章 不能全愈的痊愈·····	88
5月13日还是6月1日？——“他的寿命不会比其他人长。——带电的气氛。——班上的坏学生。——“你说我要决裂了”。——有事实为证，看得见的病已经治好。——“两年！”——从迷信雅各宾·····到南斯拉夫的诱惑力。——在德·格拉斯巡洋舰甲板上。	
第 七 章 隐患露头·····	103
在等候电话小姐的时候。——隐疾在明疾下面显露出来。——力量被抵消了的政府。——“太荒唐了”。——民族的基本个性。——对国家的反作用。——巨大的真空。——一个人—国家，冤家一对。	
第 八 章 “政权，就是无能”·····	111
1. 官办新闻。——饭厅里的国家。——五个月后。 2. 归国人员，或显影剂。 3. “法兰西病”的缩影。——改革消磨殆尽。——章程。——法国之声。——火星人入侵。	
第 九 章 国家大脑·····	124
1. 官办研究。——协调协调人。——“到1968年，我要有氢弹”。——隔墙赏花。——科斯山的牧人。 2. 治下一千三百万人，“你要在那里呆五年”。——教育不过是两个字：多少？——争取时间做自己的盟友。——大学在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关头。——南特尔样板，南特尔坟墓。	
第 十 章 误会·····	138
封闭的社会。——“虚假的印象”。——“他解放了社会”。——“只有个人和法国”。——“有把国家和民族炸掉的危险”。——“人们把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理想化”。——“圣杰曼·德普雷	

的语言”。——“我要稳定局势。”

第二部 罗马病

第十一章 “伟大的世纪”——没落前的全盛…………… 151

路易十四，两只鹤鹑和夏尔·戴高乐。——林中空地周围的黑暗森林。——布蒙着眼睛。——巨大的优势一点一点地失去。——科尔伯特的典型失败。——起瘫痪作用的干预。——不信任的社会。——怎样衡量衰落——从自我陶醉到自虐狂。——法国并没有真正的起色。——失而复得的阿尔萨斯的冲击。

第十二章 人口江河日下…………… 164

1. 人口衰落，令人吃惊。——法—英竞赛。——从队头到队尾。
2. 解释的尝试。——新法兰西人丁兴旺。——人口密度的四十大关。——旧社会可怕的生物学平衡。——养不活人的衣食经济。——僵化的社会。——灭顶之灾。——从不自觉的马尔萨斯主义到自觉的马尔萨斯主义。——人丁兴旺，百业发达。
3. 令人担心的远景。——日益萎缩的民族。——障碍来自精神方面。

第十三章 拉丁国家的没落…………… 180

世界围着纳瓦尼广场转。——葡萄牙：从过分发达到不发达。——美国星际航行及空间管理局的方法。——令人惊奇的西班牙。——“我们所有人都是绅士”。——农业的、等级制度的、古老的拉丁美洲。——意大利：从充满活力到衰弱。——艺术——被摘下的花朵。——奥地利的能动性遭到打击。——马比书多。——卷扬梯。

第十四章 宗教改革后社会的飞跃…………… 192

“上帝创造大地，荷兰人创造荷兰”。——小店东的国家。——瑞士奇迹。——“自己创造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或北极圈下的繁荣。——文明的完整形象。——在人类漫长的行列中。

第十五章 两种速度…………… 202

天主教德国和新教德国。——现代化的爱尔兰和落后的爱尔兰。——法国，或活跃的少数。——废除南特上谕在加拿大的余波。——多数派低人一等。	
第十六章 例外证实了规律：英国的昏迷	212
退休的国家。——降压事故。——工会权力过度膨胀。——衰竭还是退隐。	
第十七章 需要排除的解释	218
腐朽的住宅。——宗教因素。——马克思的错误。——一个杰出的不知名的人。——原因不只一个，结果也不只一个。——经济，决不仅仅是经济。	
第十八章 为什么西方分道扬镳	227
生命力和繁荣。——文化革命：宗教改革。——给普罗米修斯平反。——文化反革命：反改革。——从哥白尼到伽利略。——拉丁国家仿效罗马教会。——英才外流。——发展的突击队。——第一个信任社会。——多中心道路和单一中心道路。	
第十九章 教会的长女，凯撒的孙女	241
法国在汇合点上。——神圣的国王。——从罗马到巴黎的长征。——凯撒的孙女。——行政王朝。——“大臣，就是我”。——三个等级的对位法。——愈来愈僵化。——革命的循环。——拿破仑的铁靴。——伟大的僵局。	
第二十章 解释历史的尝试	254
成功的欲望。——“在你身上有更多的欲望。”——活跃的少数。——挑战。——非物质的第三种因素。——等级制度带来事务主义。——钥匙圈或赞美疯癫。——土豆的不幸。——条例应全部更换。——通过负责的自治实行革新。——诺贝尔指标。——先锋精神。	
第二十一章 发展的激素	268
1. 发展的连锁反应。——托马斯·库克和唐·吉诃德。——金钱——自主的手段。——投资精神。——竞争——脆弱的胜利。——自由的庞大机器。——日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挑战。	
2. 经济桎梏。——资产阶级对经济的背叛。——反对消费社	

会。——官僚经济。——发动机出故障。——正当的收益和不正当的收益。——游泳动作。

第二十二章 玛特和玛丽…………… 284

1. 玛丽的优点。——更活跃的精神生活。——强大组织的耐力。——离奇的相互关系。
2. 玛特的优点。——革新和贸易的社会。——民主社会。
3. 玛丽的萎靡不振。——教条主义的社会。——翻版的社会。——痉挛的社会。
4. 新情况和后遗症。——余磁力作用。

第三部 没有凯撒的凯撒主义

第二十三章 技术专家越俎代庖…………… 298

只需让赛纳和马尔尼省投票。——法国的缩影。——快速民意测验法。——“徬徨的人”。——不平等成风。——空空的“大居民区”。——“疯人院”。——头顶金矿。——技术专家贾纳斯的两副脸。——“法国不需要高速公路”。——马奇诺防线。——自封为王的国家。

第二十四章 煤灰子…………… 313

在矿下。——恶运当头。——从面对面到肩并肩。——没有个人出路。——保密恶习。——总理无能为力。——“避免动感情”。——官僚机构和共产党一样：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戴高乐什么也办得到”。——只有闹个乱子才行。——扣留人质。——“我从政治道义上谴责……”——共产党等级制重新掌握了事态。——行政等级制也一样。——矿工最好就此罢休。——一段悲哀的故事。

第二十五章 地下水里起风波…………… 331

既成事实。——大封君。——风波起。——规避讨论，确是高招。——无声的苦恼。——这水或那水，巴黎龙头水。——净水不净。——一百升水里掺一升泉水。——二百五十升用水里饮水才占半升。——设计事故。——定案的威信。——拉维莱德屠宰场。——贪污的幽灵。——行政当局寸步不让。——申

诉无路的民主。——皇帝的本事。——比鲁士式的胜利。	
第二十六章 两头厚皮大象……………	353
帝国的光荣。——过犹不及。	

第四部 社会结构的病症: 极端不负责任的社会

第二十七章 不负责任……………	357
远距离操纵。——小头头。——非人格化的权力。——猜忌的天下。——念诵书面发言稿。——“教堂是美术局的”。——隐隐约约的恐怖。——又是对手, 又是同谋。	
第二十八章 偷梁换柱……………	372
他们本该如此。——只管签字, 其余都归我们办。——领导谁就得追随谁。——知情人不知情。——自行车存车规律。——三个在催眠状态中采取的决定。——(1)原子武器。——(2)皮埃尔拉特和热核计划。——(3)南特尔的场地。——部长走马灯。——新的共生体, 专家政府。——明于取舍。	
第二十九章 泛滥……………	389
国家大计变成了国家谬计。——十公尺。——瘫痪了的万能。——滋生蕃殖。——财务机关专政。——国家成为众矢之的。——中央政权, 唯一的彩头。——国家发生危机。	
第三十章 混乱……………	399
“哲学家”的错误。——自取挫折的道路。——政权延续靠行政。——以混乱为借口。——当选人兼职, 则权力尽归消蚀。——分别层次。	
第三十一章 划地为牢……………	408
“他们都是处长”。——部落和山头的万花筒。——右手不认得左手。——支离破碎的市政设计。——国立行政学院, 或团结梦。——香勃努瓦的火车。——门户之见, 壁垒森严。——僧侣社会。——分等食堂。——自我延年。——新旧“平民肥皂”。——拔尖制。——勋章事件。——钻牛角尖。——二十世纪的贾法吕斯。——孤岛语言。	
第三十二章 充血……………	426

城市拥挤。——巴黎主义。——国家的弱点。——外省的贫血症。——巴黎的肚子。——民族岌岌可危。

第三十三章 解体..... 437

1. 没有对等的力量，只有反权力。——国家与人民为敌。——全面反对的权力。——两个等级既是平行的，又是反向的。——工会垄断。——新的罗马党。——政府当保险丝。
2. 国家反对国家。——拒绝握手。——国家职员造反。——“不负责任的”官吏。——国家部门的反国家主义。——脚踏两头船。——中央集权如江河日下。——出路在专政呢，还是在自由化？

第三十四章 平衡失调..... 452

第六共和国。——总统制的诱惑力。——总统的使命是当霞飞。——从两极化到两个法国。——保留区。——不知节力，自贻伊戚。——积极的裁判员。——宪法二读。——配偶问题。——必要而又难搞的轮换制。——让议会的职能起作用。——从基层搞平衡。——挂在屋顶上的房子。

第五部 论精神结构的病症：故步自封的痉挛症

第三十五章 明镜廊..... 468

疑忌的遗传线。——克利特人的新怪论。——开头是家庭。——妇女不像男子那么平等。——教会的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的耶稣会教士。——神化抽象知识。——在伊顿中学的运动场上。——掌管钥匙的人。——家长式的企业。——“主人翁思想”。——凯撒和乌龟。

第三十六章 革新的阻力..... 482

1. 故步自封。——过去的压力。——故步自封的诱惑力。
2. 抽风。——动乱的魅力。——法国人的慄悍劲。——无益的痉挛。
3. 不买账的保守派。——不对劲。——虚伪的恐新病。——一盘胶。

第三十七章 权力神圣..... 494

日常生活里的神道。——桥师神皇。——正统观念。——教会的僧侣和国家的僧侣。——神圣权力的属性。

第三十八章 服从…………… 502
 宣扬服从,笼络人心。——思想警察。——锁链瘾。——受扶养的
 的人民。——法国人是历史的对象。——越提防,越难提防。

第三十九章 闹独立性…………… 510
 物极必反。——不听你那一套。——薄弱环节。——反对僧
 侣,崩断链子。——边缘世界。——联合反对。

第四十章 赖皮叫化…………… 515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参加吗?——各人自管自,国家管大家。
 ——从国家那儿真的再没油水可捞了吗?——越扶越瘫。——
 结社的弱点。——脆弱的灵魂。

第四十一章 废弃不同…………… 523
 齐整划一的威望。——从迷恋统一到迷恋平等。——统一主义
 害统一,平等主义害平等。——对于不平等的传统看法。——
 机会均等。——绝望的学校。

第四十二章 崇尚空谈…………… 532
 成就是次要的。——不现实的现实效果。——词句和事物。
 ——对地理历史的无知。——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缺乏持续性。——心理的传染病。

第四十三章 我们的宗教战争…………… 540
 全白全黑。——好战的人民打内战。——日常的咄咄逼人。
 ——以斗争为对话。——工人隔离区。——社会吵闹。——两
 个法国。——德法战争。——牢不可破的二重性,靠不住的第
 三路线。

第六部 挫折的教训

第四十四章 不虞作用…………… 554
 车子打滑,失去控制。——极少领导人能摆脱不虞作用。——
 意外的来客。

第四十五章 三百年没有改变的尝试…………… 561

佛邦适得其反的改革。——布尔高尼公爵的宾客。——路易十六和改革的失败。——长矛尖上的首级。——拿破仑阴魂不散。——拿破仑第三发明“分权制”。——流产的委员会。

第四十六章 戴高乐惨遭灭顶…………… 568
 动完了手术进行再教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支离破碎的决定。

第四十七章 一曲未终…………… 573
 真话听起来好像不真。——改造法兰西。——自杀性的公民表决。——病根。——拔苗助长。——最高的遗志。

第四十八章 “我的第二个七年任期”…………… 583
 如果法国人要专区……—过犹不及。——反复的可能性。——地方权力方案。——省政府。——公职人员听代议人员支配。——下一任总统七年任期的建树。

结论 治疗药方

第四十九章 论方式…………… 597

1. 认识病源。——不要梦想。
2. 新的良机。——落后的王牌。——持久的王牌。——友谊的王牌。——历史上接踵而来的冲击。——一致努力的草图。
3. 阿基米德杠杆。——必须有一个目标。——成为楷模。——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全面计划。——安排好过渡时期。——蒙提索里的雨伞。——革新的经验。

第五十章 某些线索…………… 613

1. 分担公共责任。——从权力分工到层次分工。——维护团结的总统。——政府职能应限于最主要的任务。——国民议会应起监督作用。——我们就是行政管理。——正确认识现实。——“非官僚化”而不是“非行政管理化”。——应付危机的权力。——“温和的体制”既能放开手脚，又不至于肢解车裂。
2. 被接受的经济制度。——共同参加企业管理，使企业变得可以接受。——保护竞争。——工业规模要合情理。

3. 人人负责的社会。——日常生活的管理权。——后一代与共同的信心。——教育切合实际。——“人人负责的计划”。
4. 心理革命。——限制工会唱高调,比赛加码。——社会公正,进步之本。——结合现实。——魔笛师。

附录.....	640
资料和参考注解.....	649
书目提要.....	675

序

我们的私生子

沒有一国家肯把自己的祸患当作亲生子女。

保罗·瓦勒里*^①

这就是法国：它在法国儿女的心目中，有时候显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能为世界创造前途；有时候却显得衰老、消沉，往日风流无踪无影，抚今思昔，自暴自弃。如果果真壮志成灰，再无凌云之志，有何必要这样伤感悲切呢？

他们是法国人：据说比任何一国的人民都难以治理。他们是造反的冠军，推翻政权的老手，打内战、制造集体祸患的纪录创造者。人还是这些人，而现在却唯官是从，唯权是爱，尽管政权老让他们失望。他们目无国家，但是没有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监护人，他们又没法自己活下去。

还是这个法国：在前一个世纪初，还是天下第一强国，今天却远远地落后了。最近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要一面实现现代化，一面不至于失掉平衡，要就此赶上比它更富生气的国家，毕竟感到有些吃力。

思想习惯的包袱

经过多少次仔细审察，我们的困难，到底根子在哪儿呢？我自

* 有助于理解的注释，均放本页底；引用的文献和典故，则编号附于书后。

问,难道不在心理和社会学方面吗?换句话说,难道不在思想习惯方面吗?法国人面临的“问题”似乎不是由外界来的,而是法国人本身固有的,周围的现实,只不过反映了这些问题而已。

为什么英国的工业化来得比较早呢?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里的答案是:“因为英国有煤。”为什么法国远不如人呢?“因为法国的煤矿比较贫乏。”可是,日本的工业化为什么那么快呢?还是那些、或者另外一些史地教科书却倒过来作出解释:日本人因为没有煤,只好输出制成品,用制成品来偿付进口的煤^②……

经济和民主的奇怪故障

我们今天观察世界,还用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唯物论。我们是否心满意足呢?瞧瞧加尔各答和孟买的街道吧。人们在神牛身旁乖乖地饿死,能望印度兴旺起来吗?回教徒斋戒的时候,能讲究生产效率吗?非洲一些领导人心想:当地的工人买到一把伞,一辆自行车,就满足了欲望,马上就不去上工^③,那么经济怎么能发展呢?在根深蒂固的士族和门阀社会里,西方式的代议民主制,又怎能顺利实行呢?千百年的积习,显然成了沉重的包袱。

但是,为什么单单所谓古老的社会才背有这种包袱呢?一个社会里最虚的东西,如宗教,成见,迷信,禁忌,行为的动机,对于权力的态度,历史的作用,个人和集体的道德,受教育和教人的准则,为什么不影响一国人民的作风,不影响一种文化的发展,不影响到最基本的各个领域,如投资,生产,贸易,经济增长率等方面呢?经济是不是只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如原料、资本、劳力、或生产关系的问题呢?是不是首先要有利于经济的思想习惯呢?民主制度是不是只是一个制度问题?需不需要确实能够使制度起作用的公众的思想呢?在法国,文化因素,是不是导致了我们的经济的落后,导致了我们的社会的困难和我们的政治危机呢?当然,这不过是原

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原因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呢？

因果关系，难解难分。要想找出一根线头就清理出一框线来，那将是徒劳的。历史不是一根线。别想用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说明一切。看来有必要在发展过程的多种因素中，强调指出某种因素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却正是我们那种天真的唯物论者所忽视的。这就是人的思想的重要性。认为归根结蒂还是思想最要紧，能算是错误吗？再加，我们自己最能作主的到底是什么？

布 雷 区

在安德烈·西格弗里德那儿，我在二十五年以前，便诚惶诚恐地想把我的几种设想，向他阐明一下。这些设想，读者们将在后面看到。当时，他老先生慢腾腾地对我说道：

“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我这个浅薄的门徒听进耳朵，多么高兴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其所以运转不灵，最终的原因，还该到我们自己身上去找。不过，你得要提防，你在走进一个布雷区。群众心理的名声可不怎么样。思想习惯的研究，恰恰受到思想习惯的限制。因为这种研究不免有点种族主义的臭味。德国的群众心理学，给人留下了不良的印象。搞这门东西，会触犯一些禁忌。人人权利平等这个概念，被人引伸为人在事实上不相上下。谁要发现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就怕为不平等作张本。也许这仅仅是一种谨慎的作风，不好意思在思想习惯有问题的人面前谈这个问题。”

在黑框眼镜片后面，他的眼光凝聚起来，接下去说：

“承认我们的挫折来自我们自身最深处，岂不叫人丧气和惭愧？对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要得到些安慰，就该这样去想：自己之所以贫穷落后，那是地质问题，风向问题，要不然便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其实，最先进的国家也觉得，假装相信这种说法，也是挺舒

服的。”

我们法国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的虚伪，在于有时候悲天悯人，有时候自私自利。反正还是虚伪。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卫的本能吧？

他又说：“如果你到远地方去找例子也就罢了，如巴西呀，伊朗呀，等等。可是要在法国找，那你就毁了！法国人有自己的经验。他们认为自己的经验是谁也推翻不了的。他们有自己的解释，谁也没法叫他们松嘴。他们很多心。你对待法国，对待严了，他们说你是被虐狂；宽了，就说你是沙文主义。你一身兼任法官和犯人。你去对法国人谈话，他们也是这样，又是法官，又是犯人，跟你彼此彼此。一位大夫，不管他多么高明，总不肯替亲生母亲诊断。”

从此以后，我多次体会到他的警告是多么英明！一位旅客，来自远方，在公众的心目中他具有一种威望，不亚于从月球归来的太空游客。他可以侃侃而谈他的所见所闻。他谈的东西，触犯不了任何人。因为只有专家才能拿出看法。人数自然多不了。可是，法国有五千万人，便对法国有五千万种想法，不单是想法，而且是定见。对法国人不好谈法国，就象一位善嫉的丈夫，不好谈他的夫人。政治人物的话，更没人听。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偏向。哪怕穿上学士袍，披上波斯套，那也藏不住他的派性。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得有道理。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我依然顽固地去探索法兰西的秘密，好象从北坡去攀登一个高峰，因为从小就是我的梦想。

然而，我还是要请读者原谅我的大胆狂言，居然要在我们本身，要在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里，要在我们心灵深处寻找我们的真正病源。我意识得到自己的狂妄，想和法国人一道去周游一个有待发现的国家——法国人自己的国家。是呀，最熟悉的东西，老是最不认识的东西……

管 窺 症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那么一种倾向,把自己当做世界的肚脐眼。但是,这种人类中心论,又有两种相反的形式。

有时候,可惜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并且认为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并尊重这种差别。就这样,英国人往往悲天悯人地叹息,上帝为什么没有从加莱城开始加恩于人们,生下来便当英国人?这些人各有各的风俗,各有各的癖好,那就让他们去罢。

有时候,人类中心论者,会成为同化论者。比方说,库尔特·恩克尔是一位人类学家。他过一阵子就到巴西印第安人的部落里去住一个时期。每一次久别归来,老哭得热泪滚滚,伤心他别后的痛苦。因为,这个部落是他唯一值得生活的地方^④。还有那些拉丁国家:别人吗,当然啰,没福气分享我们的文化,但是希望关系不要断绝。只要他们学我们的文化,不也就成了文明人了吗?在拉丁人看起来,别国人民的特征是不足挂齿的,而自己的特征就不用谈了。因为人是万物的主体和度量衡。劳伦斯^⑤曾写道:“法国人从这样一种学说出发(这是一种教条,而不是什么固有的本能),即人类中十全十美的只有法国人。他们觉得,外国人当然永远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只要能接近一点这个水平,就不错了。”

既然这样,那末法国人怎么能承认自己的错失,即自己失败的原因呢?我们之所以无视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就因为我们不肯正视自己。这种情况,越不自觉,越起作用。有一种眼疾,眼科专家称之为“管窺症”。病人的视野极小,像从一根管子里看出去。瞧着走路还可以,要大地山河一望收可就不行了。弗洛伊德曾经证明,人的思想也会害“管窺症”。人在无意识中拒绝意识那些自己不肯看到的自己身上和自己周围的东西。自己对自己的明

察力下禁令。

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知之明更加困难。自己觉察不出自己的口音,意识不到自己的口头禅;闻不出自己的气味。因为法国人的弱点深深地存在于法国人的身上,所以自己没法觉察出来。

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爱知道那些让自己失面子的真情实况,宁可推说什么浮云遮月呀,事不凑巧呀。但是,偶然久了,就变成规律。一消沉就是三百年,尽管也有几次雷电般的壮举,难道不正是这种壮举意味着衰微没落吗?法国的生命力,在十七世纪的全盛时代便开始衰落下来,而别国却正在觉醒。这样的现象,我们是不肯考虑的。要看出萎靡不振的原因何在,那我们就更加犯“管窥症”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根本不想知道自由社会的内部机件是怎样运转的。这种自由社会,在跟我们竞争的国家里,早已发扬光大,而我们呢,我们自以为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甚至还自以为起着带头作用。其实,我们并没有一直真正地在这种社会里生活。

不自觉地回到洪水时期

今天,人们往往爱说:“前几个世纪发生的事情跟咱们有什么相干?咱们马上就到2000年啦。别去回顾洪水时期吧!”讨厌的是,恰恰相反,我们的理性老憧憬着自由,而我们的感性却不自觉地“回到洪水时期”。人民也罢,个人也罢,都受童年的影响。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政治斗争,无不反映思想习惯,改造思想习惯。思想习惯的演进比什么都迟缓。

人的作风,往往在本源消失以后很久仍然继续盛行。塞古·杜尔在几内亚跟法国断交以后,继续向邻国首都订购高卢牌法国纸烟。西德人抽惯保加利亚烟,尽管两国之间隔着一重铁幕,依然没法戒掉。日本的车辆顺着左手行驶,为什么学英国,不学美国呢?日本武士在狭路上顺左手走,为了遭到攻击时便于右手拔刀。

为什么我们吃鱼用特殊的餐具？本来，鱼腥碰到刀叉会生怪味，所以在十八世纪发明了银制刀叉。可是，不锈钢虽早已解决了问题，但银制刀叉依旧风行，甚至早已过时的银制鱼刀鱼叉还在流行。工艺是流动的，习俗却是凝固的。

“我们讲的是过去”

法国人的“记忆力差”吗？记忆力差不光是法国人；即使对法国人来说，也不全对。

任何民族有意识的记忆力，都越来越差。时事新闻渐渐让位给了最后消息。最后消息又让号外撵跑。新闻的寿命，甚至流行思想的寿命，都越来越短。现代的公民，莫不遭受新闻消息的轰炸。新闻之多，弄得他们没法辨别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人们既感消息太多，又感消息不够。看见了近的，忽略了远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多了，人的官能便麻木了。

多数党拥护第五共和国，深信六十年代的一切困难都出自第四共和国。而在第四共和国执过政的人都起誓发咒说是第五共和国的罪孽。谁也不肯承认法国的病根可能时间久远。法国决不是在1958年诞生的*。法国的优点扎深根于古远，这是可喜的；但法国的弱点，也同样扎深根于古远，而且变成了第二天性。这是可悲的。

与有意识的记忆力相反，一个民族无意识的记忆力却好得很。历史的创伤在个人心灵深处作用十分悠久：出身好坏，农奴制，不服父权等等。克伦威尔的“圆脑袋”派，越来越影响爱尔兰；美国依然带着南北战争、征服边远的西方这个神话以及奴隶制的烙印。

即使再过一百年，西班牙人还会觉得自己头上笼罩着盖尼卡·

* 1958年，戴高乐上台，建立第五共和国。——译者

阿尔卡萨·德托勒德的内战阴影。在阴影后面，还隐隐约约出现宗教裁判所的幽灵。内战的残酷，产生于过去，而且还大大影响未来。1976年，萨尔瓦多·德·马达利亚加重到“马德里5月起义皇家学院”^{*}讲学。这是他在国外流放四十年后回到西班牙。他叫道：“我们讲的是过去……”在他看来，佛朗哥的统治不过是一个插曲。他用的话乃是路易·德·莱翁的名言。莱翁被宗教裁判所逐出教育界，过了很多年重新讲学。这句话是他向学生们讲学时讲的。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两个西班牙人传下了这句话。真正的插曲是没有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自己的历史一刀两断。

爵士乐手

法国在心灵深处从未忘记：宗教战争和对新教徒的迫害，封诰状纸给人的神奇权力，大革命，恐怖时期，朱安党人，贵族出亡，雾月18和12月2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国家一贯正确，号令和禁令，一概由它发布。

有人说，爵士乐的吹鼓手，老是尖音，把耳朵听疲了，所以越提越高，越变越强，声音尖得怕人。这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要，因果倒置。社会生活里充满了千百个这样的“恶性循环”。要试图改革，每每是原地踏步。其所以如此，无非因为碰到一种物理上的所谓体系。就是说，各种成分相互作用的体系。体系一旦形成，稳固下来了，几乎谁也没法稍加改变。就这样，历史自己维持自己。

比方说，当选人或者工作太忙，或者经验不够，需要内行的官员用他们的名义作出决定。但官吏们爱掌实权，当选人员名声在外，他们只在表面上掌权^⑥。这两种人都利于保持这个制度。保持越久，越发不可侵犯。暗中勾结比什么都保守。思想习惯，制度，相

* 纪念1808年5月2日，马德里居民起义反对法军。

互依存的作用，终于形成一种有机的平衡。只有偶尔发生的重大事变，才会触动这种平衡。青少年和革命者，深信今天的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他们前辈的教训，对他们毫无用处。历史的迅速发展，势必冲击传统。“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只有完全不懂历史的人才抱有这种错觉。但是也有陷入另外一个相反的错觉的，说一切都一成不变，认为人们不能不承认社会是它自己过去的产物，即使它想跟自己的过去决裂，然后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但是真正的前后割断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亲身经历过自己的进化和革命。1789年7月14日的革命，完全是法国的东西。1917年10月革命完全是俄国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中国的东西。同一类型的文化，通过各种经历，肯定自己的一贯性。我们应当善于衡量我们自己背的传统包袱，不然，就没法发现当前起着的变化。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心灵，都已经受到变化的影响。

人类服从自然的规律，才能控制自然。要摆脱历史的束缚，只有正视历史，也就是以另一种方式正视自己。越是硬要不理睬自己的历史，那就会当历史的俘虏。过去的世纪是会报怨的。不深入认识历史，便不能够深入认识现代。

耳 闻 目 睹

法国在蜕变。可是在蜕变中仍然有着一成不变的东西。我想在这个法国周游一番，把现在和过去混在一起。这里面既没有回忆录，也没有历史研究，既没有社会学研究，也没有集体心理研究，更不是什么政治宣言，我仅仅试图不落陈套。

回忆录只有一个题目：谈作者自己。目的在于说明自己，为自己辩解。而我这本书也只有一个题目：法国到底害了痼疾没有？如果病了，到底症状如何？原因何在？是否正在痊愈康复？否则，

到底该根据哪些原则提出治疗方案？

我这个题目不牵涉个人。我不打算象写一本论著似的来讨论制定一门理论，证明一个论点等等。我顶多只提出一些设想，根据的无非是些切身的体会。

如果书里提到我本人，那是因为我曾经有过机会亲自观察我那念念不忘的一些症状。不管哪一位市长，哪一位省议员，哪一位国会议员，哪一位部长，都能讲那么多，或者讲得比我更多。这些“细节颇有典型性”。泰恩曾经想用作写历史的材料。我报道的一些“案子”，大部分不值得写进传记。传记是个人生平的总结。这些细节之所以值得列入本书，只不过因为是“法兰西病”的一些症候。我追叙一些谈话，用意也在于此。比方说，我跟戴高乐将军的谈话*，我并没有在书里报道他谈他自己的话。尽管这些话非常有意思。我记下的不过是些最切题的话。

我之所以描绘我试图治疗这个病症的各种尝试，那是为了说明什么样的药方往往徒劳无功。我深信局部的疗方是无济于事的，万应仙方也没用处。而在各党各派的纲领文件里，都开有这种仙方。只有人的觉悟能实现真正的进步。本书的宗旨就在启发人的觉悟。

政治宣言难免流于简单化。哪些想法能在一场竞选会上赢得人们拥护呢？只有一些深入人心的想法。听众喝彩的段落，正是符合自己信念的段落。高明的政治人物，善于以清晰的条理，表达公民似明似暗的想法。法国人太习惯于依赖这种安神药了。我写这部书的意愿不在别处，只在扰乱人们的心绪，使他们自己去照照镜子。本书根据“耳闻目睹”的东西，希望大家进一步加以审察。

* 谈话的词句是我事后补记的。很潦草。我当然没法保证字字都对。只能保证我所理解的意思，以及我所记得住的警句。此外，还得顾到文字游戏和挑衅。在正式发言里就不见了。

探索隐疾的经历

本书第一部分，叙述发现隐疾的过程，因为我总觉得国家有病。当我在童年战争即将来临的时候，就开始担心。我在科西嘉岛研究农村公社时，就想弄清楚我到底担的什么心。后来偶然当了外交官，又经常访问外国，我就把各种类型的社会作一些比较。同时，我为之服务的国家，陷于风雨飘摇，我不安的心情便越发加深了。我继续深入研究，一天又一天地观察我的选区普罗文—蒙德罗。这是国家的缩影。我并没有能够平息我的不安，尽管在戴高乐和蓬皮杜的政府里担任过一些职位。恰恰相反，我的担心越发普遍化了。

本书第二部分，根据前面作出的论证以及提出的问题，命名为“罗马病”，试图探索出疾病的根源，研究研究患者的病历以及足以说明现状的一些情况。我们发现，在十七世纪，僵化和断裂已经开始。我们这种特殊的病症纳入了基督教西方世界离奇的历史。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影响下，基督教的西方世界分道扬镳了。有的国家走上了发展的道路，有的国家则捆绑在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社会里。

第三部分“没有凯撒的凯撒主义”，提供一些当代的事例，说明法国属一种教条式的中央集权制。有两个实例是全国性的，对这两个实例的研究在全国普遍进行。一是专家治国论者阻挠常识要求的措施；另一个则是专家治国论者强迫搞一件常识所否定的事情。

事情的经过仿佛是这样

第四部分：“社会结构的病症”，剖析社会现象及结构，以及社会的畸形和后天的变态，社会的分隔，僵化，堵塞，失平，尤其是法

国社会的模式,即社会行政。

第五部分,“精神结构的病症”,旨在深入考察集体的不自觉状态。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徘徊歧途。后来称之为命运的东西,很象一些预感。这些东西酝酿在心灵深处,非思想所能触及,往往使我们作出一些行动,连我们对它的解释也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曾说,一个三岁的男孩,贪恋母亲,痛恨父亲。他又补充说,这是真的,又不是真的。孩子并没有有意地订出犯罪的计划,不过在心里爆出一幕悲剧,因为,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的爸妈双宿双飞。事情的经过,仿佛孩子竟想把母亲当做猎获物,而把父亲当做牺牲品。当我谈到法国人的时候,谈到自我检查,自我克制,自我禁忌,都不过是些类似的东西,决不可以字字当真。可是,不去探讨我们思想习惯里幽微的深处,我们就不免规避躲闪开了法国现实的一个深度。正好比,单单看见孩子的外表,就会规避孩子的深蕴。

第六部分“失败的教训”,旨在探讨这样一个谜:三个世纪以来,好些有识之士曾经试图使法国实行中央分权,把责任分给全体法国人,并把主动权还给他们。这些尝试全都失败了。甚至往往转化为目的的反面。原因何在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根据这些观察,我们试图在结论部分草拟一幅蓝图,指出一些办法,一些途径,供治疗借鉴。

思想交锋

当然,这种做法必然是提问多而答案少。由于这些问题的性质,本来就不会有可靠的答案。为了行文方便,我只好肯定口气,而不用怀疑的口气,用直陈式而不用条件式。希望读者把“如果”、“也许”,只当做通用词。如果读者不免感到恼火,该不该觉得

遗憾呢？每逢开始觉悟的时候，总会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再那么心安理得了。不能不正面来考察考察自己了……

在思想习惯的领域里，要肯定什么，总是很不容易的。不管怎么样，但愿我的一些设想能够引起批评和反对；伊拉兹马曾经说过：“在思想交锋时，宁学毋教。”

第一部

追踪隐疾

有一种日益普遍的印象是，一种特别的灾难降临法国……就像我们历史上的其他困难时期，出现这种想法，认为有一种“法兰西病”，一种慢性的、难以捉摸的、特别的病……其实并没有什么法兰西病。

让-雅克·塞文·施赖伯^①(1976)

——你认为没有什么法兰西病吗？

——当然有的，确有一种法兰西病。

雅克·德洛^②(1976)

第一章 法兰西谜

在奥古埃河红色的水上，平底船滑过漂浮着的树皮：那是树干呢，还是鳄鱼呢？到了红树绿荫下的一个码头，船就靠岸了。施韦策博士站在码头的木板上等候着，他蓄着高卢式的长胡须，身穿长裤、衬衫，头戴白色盔帽。

“欢迎您！但愿您多留些时间。这儿也来过少数几个法国人，他们只呆上几个钟头就走了，如果您也同他们一样，那么，您对我的创举，就会一点也理解不了。”

那是1959年的8月，我在兰巴雷纳呆了四天，几乎老是同施韦策在一起，在这个被人叫做医院的非洲村子里，共同生活在一起。尽管是在法属赤道非洲的腹地，工作人员——大夫，管理员，护士——和几个过路的客人，都是从西方好几个国家*来的；除了施韦策本人和他的女管家是阿尔萨斯人外，没有一个法国人。在这里讲的是德语或英语，只有同非洲人才讲法语，而且芳人讲的“班图”语或“斯瓦希里”语要更受欢迎一些。

“法国人靠不住”

最后一天，我禁不住向施韦策坦率地表示，我对这种歧视感到惊讶。他把老是戴在脑袋上的盔帽向上掀了掀，用他那深沉的、阿尔萨斯口音很重的语调说：“这不是偶然的。每逢我请法国人来，总是自找麻烦。只要他们在一块，他们就要耍阴谋诡计。他

* 联邦德国，英国，瑞士，斯堪的纳维亚，荷兰，美国，加拿大。

们……你们法国人说的……靠不住*。”

他考虑用什么字眼回答，他的头脑是很清醒的：

“尽管我看见他们刚到的时候情绪很高，可是，我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萎靡不振。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种简陋的生活，反感得转身就走。有些人呆的时间长一些，于是他们就胡思乱想，要把我这个村子夷为平地，改成一个欧洲式的医院。离这儿三公里远的镇上，建了个医院，您看见了没有？这恰恰就是他们希望我干的。可是，那是在巴黎设计的，他们从来不屑来这里，不懂得非洲人的心理，要讲医院，确实很漂亮，但钱花了几十个亿，却几乎无人问津。”

的确，我可以看见兰巴雷纳现代化医院倒不如这些老旧的草房吃得开。但是，无论在非洲也好，在印度支那也好，我所钦佩的殖民地大夫为数不少，不能不使我认为施韦策博士的话纯属偏见。

他接着说：“黑奴们**在粉刷得雪白的病房里同敌对部落的病人住在一起，心慌意乱，饭也吃不下，越来越弱。我嘛，给他们盖了这个医院，他们觉得就应该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宁愿到这儿来，常常从很远地方来，每天都有人步行到这里，穿过森林，从乌木吉查里，从乍得，比属刚果，坦噶尼喀来。他们在这里见到的草房就同他们家里的一样。”

施韦策让我走进当中的一间，他对我说，在铺板上放上稻草，比在床上放个褥子要强，因为稻草杀虫，褥子却招惹虫。

“他们有自己的定见”

他继续讲下去：“我的病人是按部族编在一起的。他们带着老婆，照顾他们，给孩子做饭，养羊，养猪，养鸡鸭。他们觉得像在家

* 原文为 vertrauenswürdig，即靠不住的意思。

** 施韦策用的就是这个词，伏尔泰也用这个词。

里一样自在,对治好自已的病也就有了信心。可是那些法国人,不管怎样,还是坚持说自己是正确的,他们有自己的定见。经验一点也打不动他们的心,却碍他们事。于是有些人就想把这种经验一笔勾销。他们企图挑动黑奴们,对他们讲我是种族主义、家长主义,是殖民主义分子。还有一些人去利伯维尔找总督、议员和工会,要求把我撵走。有什么办法呢?法国人似乎没有一个生活的准则,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别人,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按照集体生活的要求办事的习惯和贯彻始终的工作态度。请原谅,同您的同胞共事,从来不得安生。”

施韦策作为一个德国公民,1914年8月曾被关了起来,有可能因此有怨气。他不能心平气和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我却按捺不住烦躁的情绪,我说:

“我的同胞,我们的同胞也在变!您所描绘的是昨天的法国人,而且只是个别的!”

“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都在内。我不相信他们变了。个别人在变,一个民族不会那样容易就变。我不是说,单个来讲,法国人没有才能,他们常常是有才能的。但总的说来,就像用坏桶来酿酒:即使葡萄是好的,最后也要变酸。”

他的看法是无法更改的。他对法国人感到恼火是因为有成见,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但是,我还是说下去:“如果说,您的试验没有成功,难道不是因为您不走运,或者不够耐心吗?所有人都是可以改好的,包括您的同事在内。”

“当然,当然……”他敷衍我说,“要是我让他们呆上足够时间就好了。可是,我的医院等不及。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改造法国人,而是给当地人治病。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成千上百的麻疯病人,血吸虫病人和瞌睡病人等着我,我冒不起风险。”

“拉丁人喜欢理论”

我们登上一块高地，举目望去，成百的草房，十分热闹。再过去是森林的树梢，巨咀鸟在叫唤；下面是奥古埃河混浊的流水。

“这就是我半世纪以来的王国。我是十分固执的。法国人没有帮我多大的忙。我同别的国家的大夫和护士一起，从来没有发生过麻烦。只要有可能，我就请一些严谨的基督教徒。他们所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我还发现，他们能比较好地适应不同的情况。他们懂得，在为一个当地人治病时，必须热爱他，他才不计较你是个欧洲人。”

根据施韦策的说法，拉丁殖民主义的坏倾向是过分地偏重于同化——但对人抱有信心。而基督殖民主义的好倾向是能注意区别对待——从肤色鸿沟到种族隔离。

他接着说：“他们面对现实，这就是克服现实的首要条件。至于拉丁人，他们更喜欢的是理论。他们不是通过自己得出一个看法的。喏，即使吉尔伯特·塞斯布朗也一样，他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我很喜欢他，他有文才。但是，你以为他写书以前来兰巴雷纳看过一下吗？不，他大概只看过几篇报纸文章。开头第一行就写道：我的护士对我说：“夜半了，施韦策博士，该去睡觉了。”而我回答说：“在阿尔萨斯，这正是旭日初升，早祷钟响的时候。”如果塞斯布朗来这里走一趟，他就会发现，他根本用不着惊动他的表。阿尔萨斯和加蓬都在同一个时间刻度里。在兰巴雷纳是夜半，在根斯巴哈也是夜半。”

“只要看看世界地图就知道了。”

“请看，您自己就是多么地道的法国人呀！处处离不开理论！”

* 《夜半了，施韦策博士》，一部动人的剧本（1950年）。

人家在写剧本的时候，是不会去着世界地图的，现实是不能替代的。”那位长者在发出以上抨击的时候，并没有发火，仿佛是生活教会了他，事情应该如此。

信用问题

每逢对国家民族失望时，我就会想起施韦策博士的看法，这种时候很多，太多了。例如，1964年10月的一天，德国的新闻国务秘书冈瑟·冯·哈兹向我解释，他不能考虑我一年以来一直向他提出的一个建议：

我曾经一再向他说：“为什么德国的‘帕尔’*彩色电视法同法国的‘塞坎姆’**法就不能合作，把整个欧洲联合起来？而我们之间的竞争，却使欧洲分裂。我们这两种方法都已证明比美国的方法高明。法、德方法很容易就可以占优势。我们的榜样将证明，要是联合我们的力量，就可以保证欧洲在技术上和工业上能够独立。”

这一天，冈瑟·冯·哈兹租了一艘游艇招待我们，在艇上举行了每季度一次的会议。我们从宾金到波恩，再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为了同我谈知心话，他把我拉到甲板上，身边只有他唯一的助手。他说：“您知道，联邦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禁止政府干涉私营企业的业务，我们只能征求有关工业家的意见。因此他们对同法国工业合作的前景并不热心，‘塞坎姆’法肯定很好，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不同意。但是……决定事情的是数字。”

我们在笼罩在迷雾中的洛勒累山岩下经过。可是，这不是谈浪漫主义的时刻。人家告诉我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对于德国人来说，法德合作生产，对半平分利润，这只有在德国人担心用纯粹的德国方法得不到市场的一半的时候，才发生兴趣。可是，他们现在打算

* “帕尔”PAL(Phase Alternative Line)交流相线。

** “塞坎姆”SECAM(Sequential Couleurs A Memovre)图像彩色电视。

独占整个市场：

“我们的工业家已经走遍西方世界各国，在未来十年或十二年内，这些国家都会安装彩色装置。他们也知道，同他们竞争的法国人并没有这种能力。他们有把握认为，德国的生产方法会取得胜利。当然，就原型而论，两种方法可以互相比美，你们的甚至更好。但是，到成批生产时，差不多谁都会打赌，成功的将是德国工业。”

我说：“你们的电子工业更为强大。但是，戴维常常压倒戈利亚斯，而占了上风。”

近年来，冈瑟·冯·哈兹已成了我的朋友。他体贴地把致命的一击留给他的助手：

“这不是规模大小的问题，而是信用问题。如果“塞坎姆”法是荷兰、瑞典或瑞士的生产方法，无疑地，反应就会不同。每一个人都赞赏法国科学家的才能，欣赏他们高超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以后能否实际应用这些发明创造，就没有多大信心了。”

原型是成功的，但成批生产呢？

这位助手恐怕我不懂，便进一步明确他的意思：

“要经营一种生产方法，必须保证许多方面的因素互相配合：合理的组织，灵活的贸易系统，克服技术难关的毅力，企业的稳定和有利可图，劳动纪律，老板和职工之间的和谐关系，资金保证，各有关企业之间的互相支援……”

许多表面现象证实了这种批评*；可是，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无线电通讯、定位、汽车、航空等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表明我

* 还有一个论据是对德国有利的。德国所采用的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改进了的美国国家电视系统委员会方法。目前来说，美国好像同欧洲的两种生产方法竞争。但是，当国家电视系统委员会方法由于效果不佳而被撇开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宝完全押在德国方法上，以便获取高额的专利费，他们还会想尽办法，排斥法国的生产方法，使他们的技术优势不再受到冲击。

们的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的。

这位助手又说：“还要估计到滚雪球的作用。由于没有足够多的主顾，你就无法减低价格和改进生产方法，而我们的工业，装备及时，足以应付大量订货，因此能够降低成本和很快地就有办法使生产方法进一步完善……您会看到，事情就会像你们的 819 线*一样，只有你们使用这种办法。你们也许能够把以前的几个殖民地拉过去，它们会让你们出钱在它们那里安装彩色电视。但是工业国世界却整个倒向德国一边，因为没有一个人怀疑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我对我的对话人有足够的认识，知道他们思想深处想的什么，他们想：“戴高乐将军使劲把法国捧在前面；在他后面，法国人却没有变化。他自己也是一个成功的原型；但成批产品在哪里呢？一旦他不在了，一切幻想也就破灭了。法国人有非常好的主意，但是就停留在这一点上。只要发生一次恶性罢工，或者因为美国人拒绝供应某种部件同他们吵了架，或者巴黎的官僚主义搞一个什么新名堂，发生一点什么混乱，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塞坎姆’了。总之，法国的方法靠不住，因为法国的工业和社会靠不住。

这种预言刺痛了我，就在法国，无论工业家、外交官、报界人士、甚至部长们，从他们嘴里，难道我听得还不够吗？常常有人用开心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您一定要给电视披上三色旗呢？”**

接受挑战

应该不应该接受这种风行的怀疑论调呢？如果对于法国，政

* 原来法国的投射比德国的投射(625 线)更为逼真，也比英国的(450 线)逼真。但是，法国的榜样未能推广，所以只好随大流，把所有频道改为 625 线。

** 有一句流行话，“塞坎姆” Secam 就是 Systeme Elégant Contre les AMéricains，意译为“反美华丽体系”，每个词头一个字母正好是 Secam 即“塞坎姆”。

府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法国人又怎能对法国抱有信心呢?“塞坎姆”比“塞坎姆”本身重要得多;就像核力量和“协和”式飞机*那样,是表明有能力接受挑战的一个证明。无论蒙特里奥或者德黑兰的地下铁道,新加坡的家用电器工厂,中国的机车头或者豪斯顿的洗衣机,所有这些战斗都在进行。必须有几个显赫的榜样,才能克服工业不肯向前的现象,才能使法国人不再把官僚看得比工程师还重,才能使大学生不再迷恋于高谈阔论,厌恶技术、国际贸易、企业等的艰巨的学科,他们把这些看做“资本主义”,跟着别人去憎恨它们。

冈瑟·冯·哈兹站在那里,莱茵河上迎面吹来的风把他的雨衣的下摆吹得拍拍作响。看到我失望的神气,他真心地感到难过。然而,事情就是这样,是民族个性问题,是 *Volksgeist* 问题。我们的快艇在一列又一列的驳船间驶过,这时,我在想:做一个法国人不总是那么容易……我已经在盘算到莫斯科去的计划了。

我向戴高乐将军概括地汇报了这次谈话的经过。他很清楚决定我们命运的这一切。有时候,他想就这样算了,更多的时候,他作出迅速的反应,鼓励我暗中准备出访一次,以便设法在对德国感到失望以后,从俄国方面找到补偿。

他对我说:“让我们把联盟颠倒过来,不管怎样,在彩色电视方面,就这样干。”

几个月以前,他曾经有过这种念头。当时,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十分神秘地通知我们,它决定放弃制造“协和”式飞机,美国人要求英国政府采取这一决定来换取它向美国人请求的紧急贷款。俄国人已准备好取代英国人的位置。但是,戴高乐将军最后接受了认为这种冒险太鲁莽的意见。另一方面,关于“塞坎姆”生产方法,法

* 但是,代价要小一些:“塞坎姆”花费了国家预算二千万法郎左右,而“协和”式飞机花费了一百亿法郎。

苏协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风险很小。*

法国不善于把新发明转变为新产品,已经是一种传统。戴高乐将军决心用另一种传统去克服它,那就是反面联盟的传统,例如弗朗索瓦一世同土耳其大帝的联盟,黎塞留红衣主教同基督教王子的联盟……这一点是做到了。**

“法国人最好”

在相距几年的时间里,施韦策博士和冈瑟·冯·哈兹先后使我感到伤心。即使他们的批评意见不是很中肯而且有偏见,但我确实知道,外面就是这样评价我们的。比较新近的一次对话证实了上两次谈到的问题,但同时,由于引起了新变化的希望,缓和了一下上两次谈话的刺激。

在北海的挪威内海湾和苏格兰的咸水湖之间,最大的石油公司***正在进行速度竞赛,每家公司所占的海域大小等于法国的两个省。只要它们有本事在这里找到石油和天然气,它们可以自由勘探,钻井和开采,每逢遇到最困难的条件,它们就集中最先进的技术去对付:声学,水文地质,海洋地理,电子学,电子计算机等等。在不停翻腾的多雾的海上,漂荡着平底船,装载着钻掘机器,采集器材,成千条电缆从那里伸到海底;那里集中着所有情报,一收到

*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施展全部压力来阻止法苏达成协议。即使对这种完全是“民用”的技术,他们也设置了种种障碍。在试验时,他们禁止我们使用一部美国制造的电子拍摄机;他们禁止向苏联出让特许证,以制造和装配索维雷尔·圣戈宾在法国用科宁玻璃公司特许证生产的玻璃零件,这些零件用以制造法国设计的一种彩色真空管;如此等等。

** 正像德国人所预见的那样,“帕尔”生产方法在西欧取得胜利,但“塞坎姆”法在东欧,北非,黑非洲,中东,中国等地得分。“帕尔”法在专利费收入方面占优势;“塞坎姆”法在实际观众方面领先。

*** 两家法国公司参加开采这里的石油:埃尔夫·埃拉普·阿基亭公司开采大陆架的挪威部分;法兰西石油公司开采苏格兰部分。

后就立即转变为曲线和数字,然后马上加以说明。

1975年8月,带我参观设备的那个法国工程师表示相信他的公司会成功,他说:

“不过几年以前,我们还根本不可能同美国公司或其他多国公司较量。我们的技术远不如他们的好。我们勉勉强强懂得分别一个一个地完成每一道必要的工序,如勘探,开采,敷设管道等。但是要掌握全过程,我们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必须不停地向美国人请教,要求他们援助,直到教给我们管理技术。我们还不会从头到尾完成一道复杂的工序。1967—68年,出现了一个转折:我们迎头赶了上来。从此以后,我们同其他人做得一样好,甚至做得更好。”

但是,在一家法国企业的浮台上,我遇到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对于这些作业班来说,生活是艰苦的。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潜水员、直升飞机驾驶员,每班要工作十五天,要随时准备应付事故,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然后换班歇十五天,到岸上休息。

开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全是法国人。结果不行。当时,竞争使我们不得不受到一些限制,他们却不愿意,想入非非,不干活。于是,我们把他们安插在美国人、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中间。马上,自尊心起了想不到的作用。比一比的思想使他们振奋起来。工会不再横加干涉了。这一下行了。根据我们几年来观察各种人表现的结果,你猜猜看,谁最好呢?法国人最好!他们最耐劳,最有办法。困难的时刻最坚强。每个月轮到他们歇十五天班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干些什么吗?他们要求把他们送回法国去同家里人团聚,而且差不多所有人都搞副业:做生意,务农。他们不在的时候就由他们的老婆去管理。他们最勤劳!

这个工程师认为外国人远远比不上他们：

“英国人吗？他们吊儿郎当。他们受不了连续十五天的劳累。他们需要他们的周末，毫无办法。他们每天要吃四次茶点。他们没有志气。”

然后，他如数家珍地列举其他民族的缺点。但是又必须有他们在那里才能使法国人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

奇特的连贯性

从奥古埃河红色的河水，到莱茵河的霞雾，到北海的铁灰色的波涛，多么奇特的连贯性啊！站在兰巴雷纳、洛勒累，或者从谢兰岛向外眺望，使人觉得，法国人好像从高卢时代以来就没有变动过，他们仍旧同凯撒所描写的那样：可以壮志凌云，但不受拘束；热情奔放，但是放荡不羁；更多地是气壮河山的英雄豪杰，而不是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之辈；更多地是锋芒毕露之士，而不是群策群力之众；他们常常突然兴起，震撼人心，但又轻浮冒失，半途而废，而失众望；一会儿一鸣惊人，一会儿轻举妄动；一会儿顶天立地，一会儿一蹶不振；永远为共事相处而困扰；时而好高骛远雄图大略，发奋图强，时而垂头丧气，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他们更多地得到外人的赞赏而不是信任，要不然就是厌烦。

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压抑着法国人呢？为什么这个产生过十字军、大革命、帕斯克尔、伏尔泰的民族，这个易冲动的、慷慨而又有才华的民族，那么经常地表现出分裂不和、无所作为呢？为什么在西方先进国家中，他们拥有最负盛名的工程师学派——而工业又那样长期地落在后面、技术那样经久地处于劣势？为什么他们拥有最优秀的无线电通讯工程师，而电话网又那样地坏？为什么他们拥有最优秀的航运工程师，而运河却那样差劲？为什么他们拥有最优秀的桥梁公路工程师，而高速公路却那么少？为什么他们

拥有那样好的研究人员而发明革新却那么少？为什么他们拥有那么多的大学教授，而大学却那样平庸？为什么他们拥有最顽强的农民、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农学家，而农业却那样长期地停滞落后？为什么他们拥有最勇敢的士兵，最杰出的军官，而却吃那么多败仗？为什么他们拥有最精选的行政机构，最善于对一切事务进行干预，而对它们理应领导的各个方面，例如公共事业管理、城市规划、教育、体育，工作时间和假期的分散安排，工业、就业、住房等问题的全面解决等等，却遭到那么多失败？为什么同样热爱自由，而对保证自由、分散权力、非殖民化等方面，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却同样笨拙呢？

当每个人都在设法明确自己的地位，当教士们举行集会、讨论神职；军人集会，讨论军队；音乐家、建筑师、医生、作家中断他们的工作或表演，以便明确其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时候，法国人对法国提出疑问，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

第二章 病人膏肓

每逢失策，在战争时期，便大叫出卖。应该说，这是天生无能和缺陷。这种人缺乏志气，为了逃避责任，把少惹麻烦奉为金科玉律。他们死的时候，奖赏、勋章满身，正是这种人对我们危害最大。因为，在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安宁之上的时候，他们却串通起来，默不作声。

乔治·克里蒙梭^①(1913)

法国一向命途多舛，这一点，我早就深信不疑。人家教给我们的历史，给我提供了可悲的证据。人家教我们去钦佩的英雄，没有一个不是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至少是失败的下场。从维辛杰托里克斯到贞·德，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从罗伯斯庇尔到拿破仑，从甘贝大到克里蒙梭，无一例外。

今天的现实情况加剧了这种担心。从我记得起的时候起，在我心目中，法国就像一个重病人。不是“政府倒台”就是“财政丑闻”，再不然就是“斯塔维斯基自杀”。早上，我奶奶打开我房间的窗户，常常是当我上学前作准备的时候，她坐在我的床上，扼要地给我讲述她从“无线电”听来的新闻：“协和广场上枪战”，“达拉第下台”，“航空邮政垮台”，“阿尔伯特·莱伯朗失声痛哭”。或者是，她把报纸的大标题念给我听：“反政府骚动”，“制裁意大利失败”，“法国外交破产”。我奶奶有时候摇着头加上一句：“糟透了！”

法国意志消沉

有时候，晚上全家人紧挨着收音机旁边。共和国的某个巨头在大声疾呼：“我们决不容许斯特拉斯堡处在德国的大炮火力下。”第二天，大家等着看他采取什么行动。什么也没有。我们不容许的事，希特勒自己容许。

从1949年到1952年，我在莱茵河彼岸度过这些岁月，不止一次，我听到德国人责怪我们，因为1936年3月7日那一天，当希特勒派国防军越过莱茵河时，我们没有作出反应。政治家、记者、历史学家断定，这一天是决定性的，本来，这场最可怕的战争可以掐死在胚胎里，可是不可弥补的事却发生了。

凡尔赛条约规定，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中立化。1925年的洛加诺公约中，魏玛共和国自愿地再度接受这一条款。克里蒙梭和福熙把这一条款视为和平的关键。法国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是否有效，有赖于此。因为德意志帝国一旦进攻这些国家，法国可以在鲁尔的德国工业心脏地区给以打击。当时，没有一个德国将领不警告希特勒不要打这张丧失理智的牌，即重新派军队进驻莱茵河左岸。就在头一天希特勒主持的内阁会议上，戈林，纽勒，布洛姆伯格都提出反对意见。在柏林，这种反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的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给巴黎发了明确无误的电报，但未能使那些现行制度把他们搞得意志消沉的人振作起来。

1950年的一天，厄恩斯特-罗伯特·柯蒂沃斯在我面前论述德意志帝国所犯下的集体罪行。这位德国青年的老教师*十分熟悉法国，论述法国论述得那么好。他为全民族作了自我检讨。他

* 作家及文艺评论家，吉德和马丁·杜·加尔的朋友，曾发表一篇出色的文章“论法国”，当时他在波恩任教。

猛然把烟头扔到烟灰缸里，他那宽敞的书房里到处都是盛满水的烟灰缸。他说：

“你怎能要我们阻止战争和战争暴行呢？希特勒上了台，我们没法把他赶下来。当他最早露出发疯的苗头时，能挡住他路的是你们法国人。1936年3月的时候，只要你们稍稍强硬一些，那个暴君就要倒台！当时，连他自己都惶惶不安，他只派了三个营的军队，在轰鸣的军乐后面，没有半辆战车，可是巴黎一动也不动！一个头炮没打响的独裁者是长不了的。这一天，正是法国的软弱，才造出个希特勒来。”

“伦敦反对我们动。”

“看我说得对吧。你们总是要有个人保佑你们，昨天是英国，今天是美国。你们甚么时候才决心自己靠自己活下去呢？”

分裂的法国

1936年6月，在蒙佩利埃大街上，我被夹在示威者和反示威者之间，一队工人跟在一面红旗后面，举着拳头一个字一个字地高喊：“全—国—实—行—苏—维—埃。”对面是戴巴斯克贝雷帽的退伍军人和穿白衬衫的保皇派，他们扬着胳膊回敬说：“公—社—社—员—杀—人—犯！”然后他们唱起《马赛曲》。但是，工人队伍的带头人中，有一个压倒喧嚣的声音高呼：“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法国人！”接着他也唱了起来，但不是唱《国际歌》而是唱《马赛曲》的副歌。他的同志们一下愣住了，让他一个人唱了一阵，然后也跟着唱起来。两个对立集团充满仇恨，你指我、我指你，唱道：“这些残暴的军队一直闯进我们的怀抱。”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都说法国是他的，并指对方是“反法国”的。请看人们如何费尽力气把国歌变做内战战歌。

这种噩梦毫不留情地一再出现。难道还有谁没有听说过两个

敌对的团体，你冲着我，我冲着你，对唱《马赛曲》吗？对于一部分人来说，《马赛曲》意味着一切革命失败的痛苦——因为这些革命粉碎在金钱、出身和事物本性这堵铜墙铁壁上。同时也意味着革命的希望正在发展。对于另外一些人，《马赛曲》表示光荣的时刻，表示祖国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但从不幸中汲取重新兴起的力量。他们在信条上势不两立，在激情上彼此一致。

1936年7月，我在鲁埃格度假，发现一个村子分做两半：一半红，一半黑。一方面是村长，世俗教师，和仅有的几个工人，邮递员；另一方面是神甫，修女，私立教会学校，附近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店老板。前者歌颂人民阵线，西班牙共和战士和工人斗争。后者希望弗朗哥得胜，嘲笑“四十小时工作制”、“娱乐部”、“好逸恶劳”、“法国犹太化”、“回到德赖弗斯时代”。我对自己说：“法国人并不相亲相爱。”他们策动某种革命，以便给工人们十二天假期。在其他地方，社会福利是逐渐建立起来的，为什么要去抢呢？《无线电》杂志说：在纪尧姆二世和爱德华七世的时代，几十年来，英国、荷兰、德国的工人，不用暴力，也得到同样的福利。面对着这种无谓的斗争，我这十岁大的孩子觉得惶恐不安，就好像家庭不和睦的孩子一般。

法 国 下 跪

四年以后，难民成群成群涌到蒙佩利埃。他们的破车装着被褥，鸡笼和锅子。他们好象只是因为遇到了海，不能再往前走了，才停了下来。一切都乱成一团。没有人住的屋子遭到抢劫。士兵不再敬礼了。我看见其中的一个在一位军官走过的时候，向地上吐唾沫。年终上最后一课时，我们的文学老师对我们说：“做一个法国人，我觉得羞耻。”他哭了。

当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人们开始想法去解释这种状况。从伦

敦，一个叫做戴高乐的人责备我们的武器太差。他说：“是德国的坦克、飞机迫使我们后退”。^② 相反地，维希方面则谴责大家的恶习，谴责各种规章制度，说全民族都有错。

这个戴高乐的话引起了希望。但是，许多人觉得，维希方面的说法更能使人信服。伦敦之声想要我们恢复信心，所以说应该把失败算到客观条件的账上。因为今天的条件，到明天就可能完全颠倒过来：“我们遭到机械力量的突然打击，我们将来可以凭借更强大的机械力量去取胜^③……换句话说来说就是：“我们并不缺乏勇气，只缺少坦克。不久以后，我们就会有坦克。让我们重新鼓起勇气吧。这是着眼于眼前行动的语言，而不是准确的历史语言，也不是长远分析的语言。因为，当时我们有的是坦克。

戴高乐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造成这场灾难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只不过他想避免加重我们的自卑感。今天，人们有权，并且我相信，也有责任告诉法国人，他们大部分人仍然不知道，“溃败完全不是因为德国坦克和飞机数量上的‘压倒’优势，而主要是其质量”。

许多军事专家*指出了事情的真相，我们的自尊心却使我们拒绝接受。事实是：在英国的帮助下，法国拥有同德国一样多的坦克，和差不多同样多的飞机。毛病出在组织上，是思想错了。坦克不是集中为强大的装甲师，而是分散在全军内，交给步兵使用，而步兵又漠不关心。飞机不是驻扎在前线，而是分散在后方的许多基地，远至北非。有时候，有飞机，但没有飞行员，有时候，有飞行员，却没有飞机。例如，斯特林将军谈到他在图路斯怎样同他那

* 例如凯塞林元帅^⑤，利德尔·哈特^⑥，军备总工程师让·特鲁埃尔^⑦；还有其他许多人^⑧。《军队史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杂志》，《伊卡尔杂志》，《法国空军杂志》所发表的论文，列有数量可观的证据。德莱西坦兰将军说：“我们有三千辆坦克，同德国一样多；但是，他们把坦克编为三批，每批一千辆，而我们把坦克编为一千批，每批三辆。

个组的飞行员一起,于1940年6月9日发现几百架崭新的德沃伊廷飞机,无人使用:“请自便,任意挑选。”^④另外,这些飞机是由坚决和平主义的政府定造的,所以是按防御需要设计的:用作侦察十全十美(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到,陆军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用于进攻时,就比不上飞行员受过俯冲轰炸训练的斯图克斯飞机。军备是有的,只要有决心,有能力,会使用……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是多么荒谬的历程!那么惨重的败仗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居然没能避免,这是历史上少有的。

怎能不比较一下呢?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后,面对人数和武器数倍于自己的优势敌人,德国军队还寸土必争地打了将近两年。在色当和敦刻尔克之战后,法国军队进行一场神出鬼没的战斗。在各处,一个上校,一个上尉或中尉纠集自己的部下,守住一座桥或一个车站,那时,他的部下像雄狮一般地战斗。这种挣扎无补于事。战绩赫然,大难一场。这不是一支军队的败北,而主要是一个社会的腐败。

离奇的败仗

从那时起,我常常试图去理解这种无法解释的创伤。我听取目击者的意见,查阅文件*。

如果这离奇的败仗的原因不在于德国军队和武器数量上的优势,那末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文官政权无法控制的盲目的军事官僚主义;在于造成帮派争吵和错误的互相隔离;在于照抄

*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比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研究得更深入了。他留下许多即时记下的笔记^⑤。被枪决以前,他设法把笔记保存了下来。保罗·雷诺的亲密合作者保罗·德·维勒卢姆^⑥从1939年8月到1940年6月之间,逐日潦草地写下来的日记证实了这些笔记。阿利阿斯上校是无人能代替的见证人。我感谢他给我提供许多详细情况。比利时历史学家让·范韦尔肯休森收集了有关1940年5月10日突然袭击的大量惊人的材料,证明法国的颠预无能。^⑦

1914年大战的那种僵化思想；在于根深蒂固的成见；在于从片面材料出发的刚愎自用的思想方法；在于过度的中央集权，逃避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的责任；在于一个什么也想管而又荏弱无力的政府；在于过时落后的经济；在于民族不和，以及同实际不相适应的精神状态。

有一件事，虽不受注意，却概括了这出悲剧。德国的进攻是5月10日发动的。法国军队按照计划，大规模地向北移动，以援救被入侵的比利时。5月11日晚，一架小“波泰”侦察机入夜时从拉翁附近的蒙梭·勒·瓦斯特基地起飞，在比利时的阿尔登纳山区上空沿着穆斯河向迪南飞去。在那儿，他看见了什么呢？装甲车灯的光束划破夜空，在这个理论上的铜墙铁壁地区，装甲纵队如入无人之境。按惯例前来执行任务的侦察员安德烈瓦上尉马上明白，在他的机翼下，历史正在演变。

机员们一重新踏上蒙梭的土地，机组指挥官亨利·阿利阿斯便给空军师打电话。他碰了钉子，人们有礼貌地表示怀疑。众所周知，这个树林穿插的山区形成一条天然的马奇诺防线。除此以外，从色当到纳穆，穆斯河构成一条不可逾越的反坦克壕。所以，情报就没有上报。12日清晨，为了把情况落实，阿利阿斯向同一个方向派出另一个机组，其中的侦察员彻里是个坦克中尉：起码，他的见证的权威性是不能否认的。“波泰”侦察机贴着地面飞行，发现了在行进中的纵队。彻里中尉数着摩托车，机械化步兵卡车，轻装甲车，轻型坦克。他再也不能怀疑了：至少有一个装甲师，也许两个。

他回到基地，同指挥官阿利阿斯一起扑向电话机。他直接呼叫第九军参谋部的值班军官。就是这个军到5月15日和16日两天，在德军坦克的意外打击下全军覆没。这样的意外，以后有的是。参谋部科班出身的赫少校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能相信侦察员的

话。他一再说：“不可能”：他的理论——即军事官僚主义的理论——胜于事实。彻里坚持自己的意见，提高了嗓门，提出保证，举出数字。值班军官冷嘲热讽，问这位坦克中尉是否认得坦克，接着便挂上电话。任何情报，只要不合教条，就无足轻重。阿尔卑斯山是可以逾越的，因为军事学校的课程描绘过汉尼巴尔和拿破仑怎样越过它。但是阿尔登纳山是不可逾越的，因为还是这些课程指出，入侵的军队怎样绕道而过。

是不走运呢，还是命里注定呢？为了阻止古德里安通过，也许只需三天的时间集中防御的力量就够了。有的专家甚至说，肯定够了。的确，当时有三个机械化师团，装备有重型坦克，就驻扎在赖姆—修帕—夏朗三角地带，它们本来可以堵上缺口的^⑫。但是，不要去听这些专家的话。因为，5月11日和12日的侦察这段插曲之所以能说明问题，正是因为它不是孤立的。当一块布腐朽了的时候，光是那里破了一个洞就把它补上是不够的，它到处都开裂。

打赢的原因不在于德国坦克的装甲好，而在于组织好，胆子大。打输的原因不在于装备不足，而在于思想武装差。除此以外，还要加上我们没完没了的内部争吵——我们二部合唱的“马赛曲”的影响。有些将军打这场法—德战争缺乏热情，不能像1914年那样，成功地冲破同样沉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所想的主要是法—法战争：宁可要希特勒也不要多列士！首先捍卫秩序，然后才是国家民族！

非战之罪

自从阿累西亚*战败以来，这远远不是我们仅有的一次败仗。例如1870年，国家在四十二天的功夫便垮台了。这同装备好坏一

* 高卢人的据点，公元前52年，凯撒在那里包围和俘虏了高卢人的领袖维辛杰托里克斯。——译注

点关系也没有：护腿套上一个钮扣也不缺，快枪打得好极了。个人勇敢也不差：像赖克霍芬法国的铁骑兵的冲锋*。那样显赫的战绩何止千百，都可以证明。但是，整体正在瓦解。当普鲁士人打到头上时，费伊将军还在吃汤。米歇尔将军打电报给陆军部长说，他丢了他那个旅，福楼拜骂法国人是蠢驴；戈比诺说，农民把三色旗挂起来，但一见到普鲁士龙骑兵的旗号，便赶紧把三色旗收了起来；还在1870年9月，巴赞在梅茨已经那么想：宁要敌人，也不要赤党。

1870年，1940年，相似得出奇。一个强政权一点也不比一个弱政权作得好一些，甚至更坏一些。两个政权都在同一个地方，在相同的情况下，遭到致命打击。既不是武器差，也不是人数少，也不是统治者没有本领，甚至也不是政治制度上有什么问题。在相距七十年的时间，法国好像患上一种奇怪的社会病，一种集体的思想病症而倒下来了。

造反分子和爱国分子

然而，整个1940年不能概括在一个国家的垮台上面。虽然，在国外大声疾呼的只有戴高乐一个人，但是，抗敌精神，即使不表现出来，也已出现在许多法国人心里。

抗战使我觉得法国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一向听话的法国人在抗战中不听话了。他们一旦溃散，几乎马上就转为游击队。

会不会有人说：溃散的是多数人，而游击队只纠合个别的人？光从数目上去比较是片面的。四十万个志愿抗战分子**这个数字，

* 1870年法普战争，8月6日麦克马洪败于普鲁士人。——译注

** 这个严格的定义只包括那些对敌人采取个人志愿抵抗态度的人（越狱者，参加“自由法国力量”和“法国国内力量”以及法国其他战斗组织的人，抗拒征用和劳役的人等等）。它排除非志愿的受害者，他们往往受到更多的折磨（人质，大搜捕的受害者，被流放的非抗战分子，被征召参加劳役的人等）。

算起来，一百个法国人当中才有一个。但是，这支力量要能生存下去，有地方躲藏，能来回转移——为了袭击敌人——他们需要大部分人的支持合作。在被占领的情况下，抗战是不能采取揭竿而起的方式的。在被占领的任何一个国家中——也许除了南斯拉夫、波兰和俄国以外——抗战的规模都不是很大，也不是很活跃的。

1940年的这种对比完全反映了整个法国：一方面是，精神上突然放松以及对自己失去信心，使整个国家民族陷入灾难之中；另一方面，反抗本能重新抬头。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这种本能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卡塔尔教徒、沃多瓦教徒、卡米萨教徒*，造反的神甫，朱安党人，抗拒拿破仑征召的逃兵，以及只有当地的历史才记得的各省的许多抵抗分子，例如所谓“姑娘们”，这些乔装牧女的牧人，从复辟到第二帝国的五十年当中，一直同保安骑兵和省府进行战斗，以便在比利牛斯高山峡谷，保卫他们在收割后未围的土地上放牧和收集枯木的权利。

不寻常的是，民族灾难似乎使我们自古有之的抵抗本能得到发扬：反抗分子，游击队的“不”字，都不再是针对政府，而是针对“占领者”。所以，1940年，复兴的头一颗火花无疑就是从这个事实迸发出来的。

但是，环境造成的反叛分子和爱国分子的结合持续不了多久。即使戴高乐也未能动员“不买帐精神”去重建法国。抗战所产生的希望破灭了。我们的历史这条锁链重又捆住了我们。

打靶游戏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所有政权，没有一个善于避免灾难的。绝

* 卡塔尔教徒是中世纪中的一种异教，沃多瓦教徒是天主教中的一种异派，凡《圣经》上没有明确记载的，它一律不承认；卡米萨教徒是反抗路易十四的一部分新教徒。——译注

对君权的情况怎样呢？覆灭在最血腥的革命中；第一共和国呢？覆灭在无政府主义和政变中；第一帝国呢？敌军两次入侵，皇帝两次逊位；复辟时期呢？七月王朝呢？几天的街垒战就垮了；第二共和国呢？亡于凯撒主义；第二帝国呢？亡于色当之战；第三共和国呢？也亡于色当；维希政权在西格马林根*完了；第四共和国以阿尔及尔事变而告终。

这种打靶游戏难道不表现出一种暴力迷吗？我们是什么样的孩子呢？不打倒父母就长不大似的。法国是天主教的长女，但只有在打破这种父女关系之后才能成年。她也是她的四十个国王的女儿，但只有把她的君主制度干掉才长入新时代。最后，她又是大革命的女儿，但从1789年以来，她被两部分人撕做两半，一部分人认为当时她开始活下来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她从那时起，就已不存在了。她不知道怎样建设她的共和国，长期以来，在没有权柄、没有威望、也没有根基的各种政体中迷失路途。

但是，为什么在建立新的法制上那么长时期表现得无能为力呢？

辟 邪

有一天，乔治·蓬皮杜对我说：“在我的一生中见到法国人所经历的考验，没有一次不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而接着又身受其害的。他们从来没有比他们自己更凶恶的敌人了。”

我们的公共生活好像受到某种命运的特别折磨。自从十七世纪君主制度赋与自己以无限的权力以来，这种制度就似乎一筹莫展，无能克服一个僵化社会的静止不动状态。君主制度崩溃了，但是从1789年到1958年先后取代它的十六个政体**并未取得更好

* 德国城市，1944—45年，贝当政府的部长们躲在那里。——译注

** 列举这些政体，就可以看到它们多么短命：从1789年到1958年，平均是十年

的成就。它们要不就是缺少权力，要不就是权力过大，像无休止的钟摆运动那样，两边摇晃。

我们是否就注定那么荒唐呢？普卢塔克说，各个民族的命运是运气和才能的结合。但是，倒楣老倒不完，那就不是出于偶然了。从长远来说，一个民族难道就没有他应有的运气吗？查里·英拉斯为“法兰西恶运”^⑩写了一本书。他对这一点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但是，话是说得多么恰当啊！“不走运的小伙计就是我们……”不走运的小伙计^⑪是一个民族典型，整个民族都想学他的样子。多少个机会失掉了，多少张王牌糟蹋了！

松开铁钳，消除那种打击主动精神、传播消极情绪的束缚，法国还来得及吗？然而，要是这样做的话，又能否不致于放纵离心倾向，让封建制卷土重来，让个人利益汹涌澎湃，让国家民族四分五裂呢？为了实行民主和组织合理化，法国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在别的社会里，是否同样存在呢？

人们设法回答这些问题，就像打开窗户，看见意想不到的远景。

零五个月，继真命天子的君主专制后，有君主立宪(1791年9月3日宪法)；第一共和国(1793年6月24日宪法议案)；督政府(1795年8月22日宪法)；执政府(1799年12月15日宪法)；终身执政府(1802年8月20日参议协商法)；帝国(1804年5月18日参议院法令)；复辟(1814年4月6日参议宪法，1814年6月4日宪章)；百日政变(1815年4月23日帝国宪法补充法案)；二次复辟(1815年6月28日坎布莱宣言)；七月王朝(1830年8月7日宪章)；第二共和国(1848年11月4日宪法)；第二帝国(1852年1月14日宪法)；第三共和国(1870年9月4日，然后是1875年宪法)；法兰西国家(1940年7月宪法案)；临时政府(1944年6月3日)；第四共和国(1946年10月27日宪法)。而谁能肯定第五共和国(1958年10月4日宪法，1962年10月修订)所实现的政制能持久下去呢？

第三章 寻找病毒

战后不久，我在英国学习，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看到他们一家的生活，好象找到了答案的线索。

早餐不忘公民道德

每天早上，当我们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房东举止异常。九点差十分的时候，他变得焦躁起来，老看他的表，九时正，人就不见了。当他回来时，好像松了一口气。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每天从九时到中午，从两点到五点，是“劝阻”使用电和暖气的时问。我的房东急着去关上电闸。

英国人不得不接受，或者说得确切一些，自觉地接受一些严厉的限制。当时没有实行全部停电，也没有人检查；号召人们加强公民道德，其效果似乎超过了行政措施和手续复杂的特许，政府当局对人们表示信任。在这个时期，法国的规定雷厉风行，而每个人却想尽办法去钻空子……

我的房东对我说：“我们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要是邻居看见我家门下透出灯光，那么……——他就要告发你吗？——不，但是他会觉得反感的。”

公共道德的威力多大啊！在千百万的英国家庭里，孩子们就是这样从他们的父母态度中学到了从任何公民教育课程都学不到的东西。与此同时，千百万好心的法国家长却教给他们的孩子永远有用的滑头办法。*

* 但是可能有人反驳说，让我们比较一下今天这两代人变成怎样呢？这些小英

在伦敦，即使街道上没有车辆，也要等到亮绿灯时才过马路。群众觉悟防止了犯规。无论在公立学校的课室还是在牛津的研究班，采用的教学法都是同整个社会协调一致的。人们摒弃宗派主义，学生还很年轻时，就鼓励他们发表各自矛盾的想法，尊重对方的观点。人们有信心，通过交换意见能够找到真理。

在海德公园，公众最想听的不是演讲人的议论，而是听众的反问。没有什么想法不能讲的。有一天，一个即席演说家站在一把椅子上喊道：“我们的皇上是个结巴，他应该下台了。”有一个观众对这种话表示愤慨。在旁观看的警察不动声色，拍拍他的肩膀说：“Keep quiet”（安静点）。一个公民在陛下的警察的保护下攻击陛下，而警察只干涉那个不保持安静的人。警察认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从这里，难道看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说明多年以前，就是这个民族怎样在炸弹的轰击下，由于有坚定的信心和冷静的头脑，成功地拯救了欧洲的自由，同时也拯救了本国的自由吗？与此同时，法国人却被各种消息，甚至被官方的命令吓得惊慌失措，一齐拥到公路上，好象为了更好地妨碍自己的部队撤退似的。法国人习惯于混乱，英国人习惯于纪律，这种倾向无疑地是政府没有能力改变的，但它却改变了一切。

“零钱嘛，等你方便时再说罢”

在阿特兰塔机场，有一天，在两班飞机之间，我想给华盛顿打个电话。女报务员告诉我应该放多少硬币到墙上电话机的入口，这时，我看见我那架飞机的乘客正在登机。我没有必须的零钱，又没有时间去换。于是，我告诉报务员说：我不打电话了。她请我放

国人是从多么严格的教育中出来的，但今天每到吃茶点的时间就下班的人不正就是他们吗？我们将在十六章里再谈这个问题。

心,说:“我马上给您把电话接通。您到另一个电话间去付钱,等您有零钱的时候再付,比如,到了纽约的时候。”她连想都没想过人家会溜掉。总之,她表示信任。

能不能说,这种“北方”的风气不能适应拉丁国家,就象驯鹿不能适应普罗文的松树林,或者橄榄树不能适应寒极圈的气候一样?但这怎么是一个气候问题呢?而信任公约又怎么能加进染色体中去呢?它难道不就是在培育人的社会训练中形成的吗?

有一个在蒙特里奥定居的法国商人,有一次把一个硬币投进魁北克高速公路的交费口时,向我解释说:最初在这里生活时,他使用法国打电话用的筹码,这些筹码同所需的硬币一样重,但要便宜一半……每一次回到法国去,他就大量购买电话筹码来作弊,还自鸣得意。但是久而久之,他觉得很不自在。也许,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同僚眼里流露出大不以为然的神色。没有同谋,牛皮就吹不起来。

一个同病毒一样简单的媒介

人是可以改造的动物。在社会关系建立在信任上的一些国家,我所碰到的同胞,无论学生,教师,还是商人,都十分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

但是,个人虽然很快就可以适应,集体却适应得很慢。英国人认为,“要修一块好的草坪,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我自己问自己,要建立这种容忍的社会道德风尚,是不是也这样:这朵娇弱的花似乎只能在长期积累下来的腐土层上才能生长。

在我们的性格中,不稳定好象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原则分离出来,把它变成像病毒一样简单的因素呢?在一些社会上存在,而在另一些社会上却是陌生的“信任”二字,也许能揭露出社会组织的秘密——就象社会体质的内在结构那样。

我好像觉得,如果我对这个谜进行充分研究的话,也许会知道为什么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一些国家赶到另一些国家的前面去,而为什么法国却经历那么多的挫折。至于这种信任公约,法国人显然从未在他们中间缔结过。没有这种信任公约,是不是我们的病根呢?顽固的猜疑,是不是我们分裂的永不枯竭的泉源呢?是不是有两个互相敌对的法国,它们的教条是对立的,它们都是一样的教条主义,两个都陷在时代的覆辙中呢?

我对自己有这种直觉而兴高彩烈,于是,我想像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想社会。

一方面是一种信任的社会:一个人得到社会的信任,对自己也有信心。所有个人和团体可以自由创业,结合和订约。个人自主,只是部分地、暂时地和在自我监督下把权力委托给领导人。权力来自个人,通过自由制定、到期续订的合约加以规定。每个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用任何借口逃避责任。个人自发地适应环境,全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发挥主动精神,把革新的思想,变为崭新的现实。

对立面是一个好像为不信任所统治的社会。人在他一生行为中,都由各不同的等级所支配。等级指挥他,审查他,指定他该做什么事。因为,等级看到他的幸福,比他自己还看得清楚。权力的行使由上而下,领袖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在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人,无论能力、知识或生活,总是比底层的人强。因此,团体也好,个人也好,都心灰意懒,不愿采取主动。公民觉得禁网森严,于是缩了回来,只好得过且过。如果他想到要解放自己,就靠批评,靠攻击,有时还靠造反来进行。

大师们的画像

当然,从来也没有一个民族同这两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完全

相同。在这一边，并非一切都是信任，而在另一边，也并非一切都是不信任。只不过是这一种或那一种占支配地位而已……从这些假设出发，我向我的大师们说出心里话。每一个人用他喜爱的想法去解释我的论点。

我在一垛垛书中间穿过。书靠墙堆着，直奔屋顶。这是加斯东·巴歇拉尔在莫伯特广场的小小住宅的走廊。他在那里等候我，他的眉毛、头发和胡须乱成一团，在这堆白色的毛丛中，一双眼睛光芒闪闪。他说：“被人猜忌的人要枯萎，就像正要剪灯花的烛光一样；受到信任的人能鼓起信心，每一天他都要发现新的境界，他拒绝对任何事物关门，他的眼界积极远大。世界就是他的想像，也是他的挑战。”

加布里埃·马塞尔兴奋地说：“您为‘创造性的信任心’写一本现象学，这将会同我的创造性忠诚相对称。忠诚，也就是说值得信任；忠诚是可信的同源词。信任和忠诚是表、里两面。”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要我提防我的事业*的危险性，但是，他十分赞成我的想法。他说：

“要把经济活动和公共生活的心理动力机件拆卸开来。要描写社会环境。要明确动机，而这些动机往往是不合理的，但却促使某些人在某些社会，而不是在另一些社会不停地创造，拒绝走迄今所走的老路，而宁愿开辟新的途径。”

他犹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

“可是，您是天主教徒，是吗？那更好！在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¹国家，有些事情是一个天主教徒可以谈的，一个基督教徒就不得不有所保留了。虽然我们不再是在圣·巴特勒米**时代，但伤疤还在作痛……”

* 见序言“我们的私生子”。

** 查理九世屠杀基督教徒事件，发生于1572年8月24日夜里。——译注

科学是一所修道院

雷尼·勒·赛纳的态度就比较生硬。他用他低沉的声调说：

“我本来很想学您那个样。但是这等于给您帮倒忙。您的直觉也许只是一种狂想。只要您还未证明它不是的话，那么您就说是罢。如果您只满足于想入非非，您会觉得悠然自得，但是，您将会发现，您面前只是一片幻觉。”

我好象还看见他怎样摘下他那厚厚的玳瑁眼镜，用手揉他的眼睛和他那光秃秃的脑门，好象想驱散某种狂想似的。他重新把眼镜架在他那鹰钩鼻子上，火力更加猛烈了：

“首先，您得提防迄今就您的论点所写的东西。人类学的研究，绝大多数时候是东拼西凑的，要找到一个创造性的思想，这种事是多么少见啊。人人互相抄袭。要逃脱这种陈词滥调，我只知道一种办法，那就是紧紧抓住具体的东西。首先要从收集成千上万的观察材料做起。您先到一个地方去生活一年，选它做您的‘信任社会’的原型，例如美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流派，或者选它做您的‘不信任社会’的原型，例如，科西嘉或撒丁岛的一个家长制集团。您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耐心地询问每一个成员，听他们讲，记笔记，翻档案。总是脚踏实地，以免胡思乱想。另外，这个课题要求跨学科的研究。它迫使您掌握人种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总之是人类学家的技术。要打破禁脔里人为的壁垒。您要么接触到整个人类，要么就只接触到一阵清风。”

在送我到住宅的楼道时，他继续给我……大泼冷水：

“如果您不脱离尘世，躲避它的干扰，默默无闻地工作，您就不能推动知识向前发展。”

我已经到下面一层楼了，他还追着我到楼梯口，半身趴在栏杆

上,向我喊道:

“不要忘记克罗德·伯尔纳那句话:分析一生,综合一时。要收集材料,长时间不要发表什么东西。也不要忘记利贝尼兹所说的‘科学是一所修道院’。”

我一边下楼梯一边自言自语说:“三十年后再见吧。”我禁不住一股愤慨的情绪涌上心头。但是,刚走到街上,我就从内心里觉得,他大概也有点道理。三十年快过去了。他已不在人世。亲爱的雷尼·勒·赛纳,我多么感激您啊。在您的不信任中,也有某种信任。

按箫猪方式结成宗族

总之,我开始一字不差地按照他的劝告办。我在巴兰的科巴拉过了一年。这个悬在圣·安吉山坡上俯瞰着大海的村庄,从中世纪以来,就好象没有多大改变似的。透过这个村子,科西嘉使我想起科学家从实验室分离出来的一些纯化学物体,通常大自然是把它们混在其他物质中溶化、冲淡了的。

科西嘉是一个不信任社会,甚至超过我的预料。个人被紧紧缠在网中*,网眼紧密,只有纯属日常事务的活动能够透露出来。男人是女人的主宰;父亲是他的孩子的主宰;族长是整个宗族的君主;村长是村子的主宰;省议会议员是全区的主宰;国会议员们则是全岛的主宰**。所有这些人都是由最强大的宗族选出来的。从顶峰到基层,权威是不容讨论的,也不容替代,有雷霆万钧之力。

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侷促而紧张。它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家长,

* 当然,这里说的是1948年的科西嘉。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它的变化要比过去的三个世纪还要大。但是,这个变化既是太慢,同时又是太快了。说它太慢,是因为科西嘉并没有从落后的状态完全赶上来;说它太快,是因为思想还跟不上。

** 另一方面,由选举产生的人员要付所征收的一切税款和完成所摊派的一切公差。

它的纠纷，有要恢复的荣誉，有需要看管的妇女和需要保护的羊群，以及需要管理的财产等等。晚上守夜时，人们“谈家事”，象过去的战争社会，宗族集团就象箭猪：它蜷缩起来，向其他人竖起箭头。由于不信任别人而组织起来的宗族集团，自己也引起别人的不信任。由冲突而维持的宗族集团，使冲突持续下去。

我询问过一些人，有羊倌，在圣·安吉山上木樨树之间看守长毛羊群；有邮递员，骑着毛驴，刚送完信回来；有妇女，身穿黑衣服，头顶水罐到泉眼那儿打水；有渔民，正在把他们的船拖上阿尔加佐拉海滩；也有族长，高高坐在桌子的首位，由他决定让不让子侄们发言，那怕子侄们已五十来岁；至于妇女，她们都站着，伺候男人。

由于是海岛，科西嘉的村社集体把大陆上久已消失的制度一直保留到今天。宗族集团提供了一个等级社会完美的典型，在这种社会里，集体埋没了个人，同时又把个人理想化；集体给个人以安全，尊严，甚至荣誉，但个人得牺牲某些自由。这个典型同罗马军团多么相近。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法兰西国家便学这个榜样，但是学得越来越坏。要把一个几十人的集体维持在一个这样强制性的制度内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是一个数千万人口的民族，那就比较困难了。

自我殖民化

有的岛民认为，科西嘉是大陆把它殖民化的。我觉得，科西嘉是自己把自己殖民化的。它把自己交给了宗族集团。头人是权力的唯一来源。政治社会是按照同一个样板组成的。选民要想继续得到他的退休金，或者想得到家庭补助金，首先就得投“他的”村长的票。村长如果想得到省议会的补助金，就得效忠“他的”省议员。

出了宗族集团，科西嘉人就很难建立各种社团或集体机构，尽

管这是民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朝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很快就被接了过去。你要在巴兰组织一个牧人工会吗？马上，当地的一个宗族集团就把它拿过去，并操纵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个副省长提出建立村与村之间的联合会来处理引水和灌溉问题，这些联合会很快就证明无能解决水的问题，但却非常善于吸引选票和灌溉津贴。

民主选举是这种政权所不能容忍的。不止一个老市长把市议员召集到他家里，他让他们在一个汤锅里投票；当他把选票取出来时，就可以看到一致通过。隔离写票室是很少用的：到幕后走过一下，那就是想逃避。权威、服从、效忠应该是公开的。人们从放在房间入口处的一堆堆选票中拿出一张来，引人注目地把选票放进封包里。

对立的宗族集团，每一个都同一个全国性或者省一级的政党组织发生关系。但这种关系完全是形式上的：人们可以经常发现，共产党员是教堂的台柱。最重要的是使宗族集团保持团结。在同样是等级分明和集权的国家面前，宗族集团从事一种既同谋又反抗的微妙的游戏：当它能够得到好处的时候就同谋，当它觉得本身特权受到威胁时就反抗；它总是想办法用诡计或者用武力去取胜，不论对行政管理部门也好，对中央政权也好，甚至对法律也一样。

不论当地某些居民是怎样想的，科西嘉难道不是我们省份中最法兰西的吗？我们的游击队是从科西嘉岛来的，这不是偶然的；反抗当权的政府这种典型的法兰西行为在这里是最纯粹的；但是亘古以来的习惯又是服从权威。这说明了为什么个人既绝对服从他的宗族集团，同时又不承认旁的集团——尤其是行政衙门，它是外来的宗族集团。

僵化的天主教

宗教使这种秩序神圣化。另一种等级制度对教徒的灵魂确立了它的无上权威：那就是，本村教区神甫、长老院总神甫阿雅西奥主教。一年到头，大家把他们的虔诚全部表现在崇拜圣母、圣徒和圣像上。

元月份，整个科尔巴拉的居民都聚集在教堂里过圣安东尼节。我问教区老神甫，这个圣安东尼是那个沙漠的隐士呢，还是哪个帕都的安东尼呢？他回答我说，都不是，是科尔巴拉的安东尼。他说的多么对啊。无疑地，科西嘉岛在村子护法神的背后，还有古代的本地神灵。信奉天主教并没有磨灭以前牧人和农民的信仰。天主教是嫁接在上面的。同样地，罗马的组织是嫁接在地中海沿岸扎了根的那种家庭和社会关系上。天主教通过宗教的戏剧化形式和永恒不变的秩序，巩固了这个由来已久的遗产。它象一股强有力的社会结晶力发挥作用。

在这个天地里，差不多任何真正新的东西都从来行不通。当然，这并不妨碍某些新事物到来：路的两旁装上电灯，几辆汽车把灰尘扬了起来，在饭厅里高高供着一个无线电收音机等等；尤其是靠美国人的力量，消灭了疟疾；在解放了这个岛以后，他们还想消灭蚊子。但是，任何新事物只能来自外部，它们长期地受到猜疑，就好象外国人受到猜疑那样。至于未来，当人们想象它不会完全同过去一样，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对于年轻人来说，只有逃到“大陆”去才有出路。在科西嘉，所有的门都对他们关上了。

当然，1948年的科西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我好像就已发现“法兰西病”在孤岛上表现得特别集中。但是，在这里也显示出它的根源：正是在科尔巴拉，我感到“法兰西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罗马病”的一种形式。

在寺院里的黑袍教士

几个黑袍教士在这方面帮助了我。他们在村子两公里以外的一个十四世纪的前圣芳济会的修道院里过着集体生活。他们拖着他们的白袍跑遍全岛去传道。有时，巴黎的神甫来同他们呆上一个时候。这些修道士中，有几个人在神学方面有着同我近似的想法。他们虽然放低声音，但不厌其烦、顽强地埋怨罗马等级制度僵硬的教条主义；埋怨从特伦特主教会议*以来使天主教僵化的一切东西。他们认为天主教会仍然停滞于中世纪，他们祝愿这个时代早日结束。他们向我讲述直到二十年以后第二次梵蒂冈主教会议才开始承认的情况；讲述对福音的信仰不应该同罗马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给它加上的特殊形式混淆起来；讲述前者有着普遍意义和永远丰富多采，而后者是同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会同这些条件一起发生变化。

一年后，我离开那里，我的军用旅行箱满载战利品：有每次谈话后草草记下来的笔记本，有人类学的资料。在巴斯蒂亚，一架小飞机等候着我，它负责运载芬芳的羊奶酪到罗克福的地窖里加工。同飞行员一起，这些东西是我仅有的旅伴。飞行员是个卡耳弗人，他估量一下我的行李，断然地拒绝运送，他要我交给船舶去运。这个旅行箱里的东西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无论如何也不愿同它们分开。由于我坚持，飞行员便认为我一定藏有走私商品，于是，他索取了一个使人目瞪口呆的价钱来安慰他的良心。

科西嘉再没有离开过我。我的调查证明，尽管它同法国结合已经两个世纪，经过那么多的自发的或者有组织的交往，那么多人分布在大陆和帝国各地，那么多的义务兵役、革命、战争，全国实行

* 特伦特主教会议(1545—1563)，进行了天主教大改革，恢复了教会的纪律。——译注

的义务教育，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深深埋藏在科西嘉性格中的思想习惯。这个海岛提供了一个样板，那就是抗拒变革，不善于沟通，经济落后，贫血的省份依赖着充血的首府——总之，它证明了一个等级制度的不信任社会——这是我自认为预感到的大陆法国的情况，但是这好象是放大镜无限地放大了的一个复制品。

第四章 两半球

促使我到科西嘉去的那个问题，我把它带到外交生涯给我打开的国家去。到底是什么样看不见的特点注定整个社会在这里在信任的推动下振作起来，而在那里，却陷入不信任的罗网？两个德国和波兰相继给了我答复。

一个民族，两种社会

1949年夏初，刚好在柏林危机和两区之间破裂之后，我到了德国。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在那里目睹迅速的变化，那就是：西德的美利坚化和东德的苏维埃化。

在西面，处处以美国社会的标准行事。在纽伦堡审讯肃清纳粹后，国家建成一个美国的复制品。此外，联邦主义在民族历史上是有它的传统的。人们跳过第三帝国，重新接上古老的日耳曼国家的自治传统。权限归各州是规律，权限归联邦是例外*。教育事业，从幼儿园到大学是由州主管的。联邦总理的权力是严格限定的，但是巩固的。限定得越明确就越巩固。

此外，这个制度推行市场经济的原则，直到它发挥最大的作用：物价和工资自由，对外贸易开放，把公营企业转到私营部门，反对计划化，反对限制竞争等。

与此同时，另一个印版却按在东德身上。一切都是苏联样本的翻版。依靠它的政治局、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代表大会、它的

* 这个例外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例如，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货币，关税，同外国的经济和财政联系，邮政，铁路等。

支部、它的附属工会以及它的外围组织，党把全部权力握在它的掌心里。政府不过是一种技术工具，负责行政管理而已。群众热情也是计划化和集体化的：5月1日，“自由德国青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在集体游行中尽情表露德意志热情。中央集权是绝对的。潘科夫*决定一切，任命一切，把命令发到最小的一个市镇。

这个德意志民族就这样好摆布？外交上偶然划一条界竟然就使它起那样大的变化？在这一边是最彻底的权力分散的信徒，在那一边则变成最系统的中央集权的信徒；在这一边是毫无约束的自由主义的信徒，在那一边却变成最严格的计划化的信徒。如果说，同一个民族被历史偶然分为两部分竟发生两种相反的变化，这是否证明相同的文化土壤可以生产出完全不同的果实呢？是否证明思想状态最终并不那么重要呢？这种情况难道不就推翻我的假设吗？

命运的专横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比在图林热更突出了。1945年，美国士兵首先开进来，他们开始在那里驻扎下来；但是，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铅笔却把图林热划在苏占区里。^①美国大兵把他们的营房交给了红军。马上，图林热人就认识了什么是国营企业，一党制，政治委员，岗楼，马、恩、列、斯的画像排在乌布利希的两旁。要是雅尔塔是另一种精神，相同的图林热人就会看到基督教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自由党人争取选票，表示崇尚自由企业和主张限制国家权力……

但是，仔细看看，就可以发现，适应一种制度，无论在这一方或那一方都不是那么自发地进行的。如果说西德在表现几乎完全一致的程度有多大，东德就在表示反对那个强加于它头上的制度的程度有多大。我们每一次越过分界线到东柏林去，都惊讶地看到

* 潘科夫指东德政府。——译注

行人阴沉的脸容和拖沓的步履；到阿历山大广场国营商店去买东西，看到售货员满肚子不高兴。当我们回到西区的时候，街道给人愉快的印象，妇女好象打扮得更漂亮，男人显得更活跃。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年轻人离开苏占区到西区避难*。在为他们而设的接待站，我看着查问他们，我自己也问他们：

“为什么你来这里避难呢？”

他们惊异地睁大眼睛，觉得这还须解释吗？调查人员害怕特务混进来，一再提出确切的问题，对证他们的答复，检查不确实的地方。但是透过这些人生活中的有趣细节，最后总是这样的对话：

“你没有工作吗，没有吃的吗？”

他们既不是失业者，也不是饿饭的，但是他们没有自由。

“比希特勒的时候还要少吗？”

“——少得多，简直没法比。”

这一句话，我们听了不能不觉得厌恶；也许，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从“右”的方面来的独裁视为不能容忍的，但是，当独裁是来自“左”的方面时，我们就认为是正当的了。1953年7月东柏林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了。坦克向工人开火。党重新把局势控制在手里；但是人口西流加剧了。情况日益恶化，到1961年，不得不修起柏林墙。

把不幸当跳板

对面的西德，其活力使人惊叹。1945年国家差不多全毁灭了。但德国人精力充沛，他们把这个可怕的惩罚当作跳板**。一切

* 1945年至1961年，估计难民的数目达一千四百万（包括从奥得—尼斯河一线以外地区驱逐出来的德国人；真正的逃难者估计达三百万或四百万）。

** 有人要说：还有美国的贷款呢？一般人们并不知道，美国对德国的贷款要比对联合王国的贷款少得多。所以，把前者的兴盛和后者的衰落都说成是美国贷款的缘故是不恰当的。

都需要重建：城市，艺术品，政府机关，工业，直到长期遭受分离之苦的家庭。

在这个废墟前面，工人和老板都说：“如果我们吵架的话，我们就无法自拔，让我们一道工作吧。在国会，我看到了就冶金工业的自我管理权利展开的动人讨论。每一个企业，都象国家本身一样，是属于所有人的；工人、干部和老板都应为其的管理和繁荣共同努力*。

纳粹主义和战争，都以自己的方式把旧社会打碎。战争考验使这个国家取得一致；到了和平时期，它愿意继续保持一致。资产阶级和工人在1945年到1948年期间，都吃过救济饭。到五十年代，他们晚上仍然肩并肩地上酒吧间；星期天，在残留着罗曼蒂克气氛的饭店，一家人聚在一起共同进餐。

从东面来的难民不存在籍贯问题，这加快了社会各阶层的混合。所有人都准备出力。等级、习惯被打破了。这个民族的精力好像全部解放出来。路德维格·艾哈德设法不再把它重新禁闭起来。他负责经济事务十五年**，他千方百计同普鲁士和希特勒的官僚主义对着干。他表示信任省和企业的主动精神，支持银行和货币的自发调整。企业精神，自发的组织能力，以及社会团结使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工业国。

摩根索***1944年曾强调让德国人重新从事农业。不久以后，这个论点显得同尼伯伦根****传说一样不现实。人们看见好象雨后春笋，许多企业简直从地里钻出来那样，厕身于世界最强大的企业行列。例如，格伦迪最初在巴维埃尔的弗茨经营一个修理无线

* 当然，原则上，德国的老板从一开始便假惺惺认为共同管理是违法的，并在1976年抗议推广，但是他们终于随大流了。

** 他以后接替阿登纳，但是，他当联邦总理时，并没有当经济部长时那么幸运。

*** 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他曾向魁北克会议提出他的计划。

**** 德国民间传说中的矮人，拥有大量财富，国王名叫尼伯伦。——译注

电的小工场。几年的时间里，他打开了一个小缺口——录音机的缺口——冲了进去，开始在德国市场，然后在世界市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最后成为电子工业的巨头之一。

1949年，在汉堡，在杜森多尔夫，在巴登，在慕尼黑，许多家庭还住在地窖里，住在废墟下面。到1952年，残垣断壁差不多看不见了。每年都有六百万幢新住宅落成，而法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建成十万幢。所有工地都实行“三八制”。晚间在探照灯光下不停歇地进行建设。

我们争吵的场面

但是，人们长期留在法国国外，得益甚多；也许主要不是因为向外国学到许多东西，而是因为我们向自己学到不少东西。外国好比玻璃窗，我们可从那里见到外面的许多景物，也可以照照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历史远景出现在我们面前，象是既成事实似的。外国人并不比我们更认识我们，但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识他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

三年到头，我回到法国，对这种蜂房般的活动耳濡目染。到了法国后，我又看到我们那种没完没了的争吵，看到我们的僵化和危机，看到所有的人尽管勤劳勇敢，但同人家比较缺乏效率。在此之前，我呼吸到的是另一种空气；到了我们这里，我就闷得气也透不过来。我相信，在政治、行政组织原则和经济高涨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关系。看到德国这个民族给我们上一堂自由课，难道不觉得出丑吗？这个民族曾经剥夺了那么多人的自由，今天由于自由而得到新生。我们为自由付出了那么大的力气，而获得的自由却那么有限。

铁幕将要颠倒过来

要是需要一个反证，波兰正好给我们提供出来。

1954年3月，斯大林去世一年之后，我们驻华沙大使埃蒂恩·丹尼里劝我到克拉科维亚当领事：当时，“非斯大林化”运动已经露出苗头，值得去实地观察一下。

在这个领事区——波兰的南部——几万“双重国籍”的法一波国民中的大部分居住在那里。他们的父辈离开波兰到法国的矿山去工作。战争结束后，他们被动员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波兰需要他们，以便经营从德国收回的西勒斯矿山，因为德国矿工都走光了。他们回去后，往往感到失望。在沃尔布利齐矿城，他们有数千人想回到法国去。北方和帕·德·卡列的矿区住宅，景象暗淡，但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天堂……但是警察局不发给他们护照。他们受骗了。他们大批地来到领事馆，要求保持他们同他们第二祖国的关系。这些人对于波兰来说是波兰人，对于法国来说是法国人。这样，在一个法国人看来，这个领事岗位成了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个最好观察站。

在我的行李箱里，我带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也带着法国的经济著作，像查里·贝特兰^②和莫里斯·罗雷*的书。把道理说得头头是道，法国人就相信。这些专家设法证明，由于经济的合理计划，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社会主义国家”的惊人发展。到1960年，苏联的经济就要赶上美国，到1970年，苏联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超过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日薄西山”注定要重新陷入像1929年那种危机里，它只是因为战争这种虚假的活动才从危机里挣脱出来。人们无论是像贝特兰那样为此而高兴也好，或者像罗

* 加工增值税的杰出的发明人，在那以后成为总公司的总裁。他的书名为：《革命，法国最后的机会》(1954)。

雷那样为此而叹息也好，都认为这个前景是不可避免的。勒昂·布鲁姆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最信任的顾问乔治·波里斯宣布：不久，在各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将免费发给面包。我们最大的专家之一^③认为，铁幕即将颠倒过来，情况不再是那些“选择自由”的人通过铁幕从东往西，而是那些逃避匮乏的变节者通过铁幕从西到东。

计划：是奇迹还是一塌糊涂

这些人是严肃的，他们的预言成为战后教授们教学的纲领。当时政治学院或“国家行政学校”的许多大师们就是这样讲学的。巴黎“知识界”很大一部分人，甚至法国外交部都相信这种预言。但是，只要在卡托维斯、维罗克洛夫、路柏林、波茨南的机关、矿山、工地、火车站、车间，张开眼睛和耳朵，就可以发现这个制度一塌糊涂*。统计数字大吹大擂，把计划说成奇迹，在消费者看来，并不怎样令人羡慕。

我请一家国营企业漆房子。我们讲妥了质量、颜色和价钱。第一间房子漆得很成功。但是以后的几天，我发现油漆工人改变了办法，再也不是刷三层油漆了，而只是用灰水匆匆地刷一下。我提出抗议，工人们让我向工长说去，工长把我支使到副经理那里去，副经理又让位给经理。经理向我解释说：企业得完成计划的要求。因为，刷第一间房子用的时间表明，这样做要比企业按计划规定所需的时间多出三倍，于是便不用油漆而改用灰水了。

我反驳说，根据规定，付出一定的代价，就应该有一定的质量。我坚持要这个质量。说到后来，经理向我表示，如果我同意外加相

* 1956年，哥穆尔卡上台后揭露了这种情况^④。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类似的话都被共产党的报纸，不管是东欧还是法国，都叫做“反动”，而哥穆尔卡却讲了这种话，而且郑重其事，因为他是党的第一书记，所以就有权讲。

当可观的（而且是不公开的）一笔钱，那么可以再用油漆。我就有办法去敷衍那个计划……

安排工作独断独行引起了消极抵抗：从最轻的表示冷淡到最重的实行怠工。只有在工余的时间效率才表现出来，只有在做私活的时候才劲头十足，也只有在黑市上才动脑筋。我们的经济学家引以为据的官方生产数字和实际情况之间，差距是多么鲜明啊！商店前的队排得越来越长。只要法国或美洲的一个表兄弟寄来一个包裹，有几双尼龙袜子，几根口红和一罐速溶咖啡，一家人就可以从中得到比一个月工资还要多的收入。西方外交人员任期满满了，按最正式的手续卖掉他们的旧汽车，价钱可以相当于他的波兰秘书十年的工资。

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为了投资而牺牲消费。这恰好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特点。可以一点也不自相矛盾地说：只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是马克思的定义所指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不断优先积累资本；现在，只有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才真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劳动者，消费者，和公民自发地形成一种社会压力，使改善一切人的生活成为经济的动力。

马克思曾赞赏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和“自发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波兰强制实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无孔不入的官僚主义。行政上扯皮的事层出不穷；秘密警察、神秘的公安部门到处散布恐怖。在从克拉科维亚到卡托维斯的火车上，便衣警察询问旅客们到哪里去，如果他们回答说：“到卡托维斯”，他们马上就得罚款并且受到“阴谋反革命”的嫌疑。他们应该回答说：到斯大林格勒——意即斯大林市——从1948到1956年，这是西勒齐亚首府的官方名字。

杰拉尔德·菲利普大吃一惊

让·维拉尔，杰拉尔德·菲利普和国立人民剧团到克拉科维亚演出四场。演出获得非凡的成功，是他们才能的成功，也是自由的成功。他们不知不觉地把自由的空气带到那里去。年轻人爬到树上看演员们从旅店出来。剧团举行招待会，我请了一些嫁给波兰人的法国妇女参加，有几个围着杰拉尔德·菲利普询问：

“你清楚不清楚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清楚不清楚到处都有警察？清楚不清楚一到明天就会有人来查问我们说了些什么话？清楚不清楚波兰人恨透了这个政权？清楚不清楚这个国家不过是个监狱？”

杰拉尔德·菲利普相当生硬地回答说：

“从我到波兰后，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可以使我想到波兰人是不自由的。”

我的客人都叫了起来。我拉着杰拉尔德·菲利普的胳膊走到一旁，我说：“她们夸张了一点，但是应该理解她们。她们得不到出境签证，她们在这里透不过气来。”

剧团离开那里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人们受压抑和渴望自由的行动。在堆放着道具的车厢里藏着一个波兰人，可以肯定，他留在那里不会是出于欣赏莫里哀和雨果的作品。

在克拉科维亚，从法国来的各个代表团不断来到这里，有经济学家，大学教师，高级官员，记者，议员，艺术家等等。这些来访者中不少人给我机会去衡量一下思想意识无时无刻地起着作用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他们不断抨击象西德这样一个国家制度，说它是“资本主义的”，因此是不公平的，是过时的。尽管西德的资本和生产资料越来越不属于一个老板——业主，而越来越属于一大群股东，在他们当中，劳动者人数不断增加，国营企业把百分之六十的

股票分给储蓄户，只要他们证明自己收入微薄。在这些地方，工人通过共同管理，负起真正的责任。消费者的爱好和愿望就是法律。然而，那些游客却对另一种制度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它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是慷慨的，前途无限的，尽管它是由几个人垄断的，不受任何竞争妨碍，决定一切事情而不受任何社会监督，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对工作不感兴趣，正象他们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一样；集体农场的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耕作小块个人土地的农民；民主是假的，政治警察时刻监视着一切。

事实似乎无法触动他们；他们的精神天地仍然分为两半球，其地理界线一个世纪以来从未作过修改。资本主义半球就是马克思所描写的那个，社会主义半球则是他所梦想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实现了，虽然差别仍然形成强烈对照，这种对照在很大程度上是颠倒过来了。但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教条主义是这样的一成不变，即使现实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不了它。

解冻和再冻

到我任期届满时，解冻把堤坝冲破了。赫鲁晓夫 1956 年 3 月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揭发了斯大林的罪行，波兰人信以为真，认为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波茨南，工人和学生造反了。他们遭到屠杀，就象巴黎公社社员遭到凡尔赛当局屠杀一样。“波兰的十月在人民当中引起了希望。”匈牙利叛乱遭到镇压后，波兰的解放也夭折了。瓦拉迪斯洛夫·哥穆尔卡以前被斯大林投进监狱，正好被从狱中放了出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热烈的情景使人感动。但是，慢慢地，官僚主义故态复萌，并且重新掌握了全部权力。比过去任何时期更甚，一切以首脑马首是瞻。于是人们又用说怪话来表示勇敢。谜语又流传开来：“为什么城里缺牛奶呢？——因为第一书记忘记了去动员母牛。”或者是：“资本主义

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社会主义是换一批人来剥削人。”

十四年以后，历史一字不差地重现。1970年12月，格丹斯克*，格迪尼亚，西克泽辛**工人发生暴动。几天之前，乔治·塞盖伊***访问波兰时曾大声疾呼：“要是社会主义在法国建立得太迟，那么就会有这样一天，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你们的国家将赶上和超过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法国广泛地流传着这样几句话：“从今天在你们国家发生的情况，可以大体看出我们打算将来在我们国家要做的事情⑤……”就像在东柏林、波茨南、布达佩斯那样，工人们数以百计地倒在枪林弹雨下。暴动把哥穆尔卡捧了上台，又把他赶了下台。

他的继任人盖莱克上台以后，也有一段太平时间，但是人们很快就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极限。一个大型专家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拟订一个计划，改革行政、经济和社会。党的一个领导人前来明确任务，他鼓舞人心地说：“你们可以谈一切问题，你们可以打破一切禁忌，只有两根支柱是不能动的：那就是党的领导作用，以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就只这两点……确实没有比摆脱一个体系的逻辑更困难的事情了。

全世界的笛卡尔派……

为什么法国旅游者对这些冷酷的教训充耳不闻呢……为什么他们对这个制度的错误那么宽宏大量呢？而与此相反，为什么对我所见到的新生的德国却表示那么藐视呢？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方面一切都是积极的，而在另一方面

* 地名，即以前的丹齐克。

** 地名，即以前的斯特廷。

*** 总工会的总书记，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

一切都是消极的。“德国奇迹”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消费和广告宣传日夜纠缠着你。讲究物质享受成风，美国利益控制了德国工业，加上军事上的保护造成德国很大的依赖性。

至于波兰的共产主义制度，同苏联和中国的一样，有着它的缺陷本身带来的优点。它成功地在野兔奔跑的旷野建立起诺瓦·胡塔新城和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农民和“归侨”接到他们的路条后，根据计划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希望生活得好一些^⑦。在动员工人，改变体制，改变自然条件等方面，中央集权制是没有匹敌的。此外，这个节节胜利的唯物主义，引起了反应，出现了热烈的精神生活。克拉科维亚的大主教、萨皮哈主教——亲王以波兰的特有的幽默感，在教坛上高呼：“让我们感谢这个政权，它成功地使我们的教堂挤满了教徒，这是战前我们天天讲道都没有能够做到的。”

但是吸引着法国游客的不是这种反弹回来的效果，而恰恰是这种制度的性质。在这种制度下，一切都是根据一个合理化计划来决定的，所有人必须服从独一无二的真理，经济必须服从理智所作出的决定。这个制度使得法国游客叫绝，说其优越性千百倍于自由制度，尽管自由制度象喷泉般五光十色，难以预测。

象西德那样的自发精神似乎否定了合理化。在这种社会面前，他们觉得茫然失措。他们在共产主义样板中，看出了一种博爱精神，那就是：“全世界的笛卡尔派，联合起来。”

当我从波恩回来时，我感到痛苦，觉得法国好象披枷带锁似的；当我从波兰回来时，我重新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因为，尽管法国差不多同波兰一样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一切决定都是从差不多同样高的地方作出的，官僚主义是差不多同样地无孔不入，但是这里没有新闻检查，没有一党制，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随意捕人，没有恐怖。

我两次异地归来得出相反的印象,到今天,我相信这两种印象同样是真实的。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不会利用它,我们把它当做黄金来使用;我们把它贮存起来,而不是让它开花结果。

第五章 从头烂起

第四共和国和它的主角们搞得那么怨声载道，甚至人们今天仍难以明白，为什么这个政权能存在十二年之久，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弊病没有跟第四共和国一道消失掉。

我当时是个年轻的官员，对这个政权和它的人员都很熟悉。不，这些人既不是庸才，也不是坏人；他们当中不止是个别才华横溢的，差不多所有人都关心国家的利益，只因为他们参加到各种力量组成的一个整体中，其结构是如此紧密，谁也没法改变它。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对我说：“你应该让人家选举你。你以后会看到，我们人人都是个小君王哩。”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小部分主权。但是，尽管他们从中尝到荣誉的甜头，这个制度却不让他们得到实权。

我又找到了我思路的阿丽安娜线索*。政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不信任和不负责任的社会，它不信任公民，普选的作用是使政权名正言顺，除此以外，它不过是一种彩票，只是人们设法排除它的偶然性而已。人们憎恨公民投票，厌恶解散议会，人们通过“竞选联盟”在选举中作弊。人们排斥反潮流的议员，或者取消他们的资格。公民是不负责任的，但是，议员们并不比公民们更负责任一些，而部长们也不见得比议员们更负责任。

因此，在共和国的最高层，人们可以发现同下面所有各级一样的弊病。这个制度得到全民族接受，因为它是整个民族的忠实反映。

* 神话中的英雄泰西依靠阿丽安娜给他的线团引路，得以走出迷宫。——译注

集体自我解脱

1958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国民议会开始举行一个人会仪式。皮埃尔·弗林姆兰蹒跚地走上讲坛。在四个星期的危机之后，柯蒂总统要求他组织新内阁。是结束这个间歇的时候了：公众感到恼火。在走廊里，专家们咕噜着：“这次，他可以通过了。”就像暴虐成性的陪审员们，疲于拒绝接受受审人，最后只好发了善心。但是，大家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可能的破绽上，将来有一天，打击可以从此乘虚而入的。

谁会想到，这个指定的牺牲者竟会死于别的原因，而且来得那么快呢？在半圆形大厅里，没有人想像到两个小时以后，阿尔及尔陷入暴乱中，而第四共和国则掉在真空中。每个人都知道它病了，差不多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这是一种慢性的残疾，患者动弹不得，但拖下去再活一些时候是不成问题的。

议员们甚至自认为有相当把握，可以享受一下头脑清醒的苦趣：“指定的总理”成为一个集体自我解脱仪式的主持人。一受到任命后，他就同这个制度共命运了。在受命之前，他还有一个短暂的机会，充当弹劾人，可以说出严酷的真情。每一个人都自我批评，缓和一下良心的谴责。弗林姆兰说道：

“政权不稳再一次使国家陷于瘫痪。在不到一年之内，三度内阁危机，三次使国家无法发挥它的力量。十二个月里，有三个月共和国处在没有领导、没有政策的状态中，这正是历史加速向前发展，世界不再等候我们的决定就自己下决心的时候……”

无情的声音斩钉截铁地念着讲稿，它落在沉重的静默之中。

“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对于一个精力饱满、可以为祖国的伟大而作出牺牲的民族来说是不相称的。它削弱了法国人对于这个制度的爱戴，直至使他们的消极不满达到可怕的地步。我们制度的堕

落，威胁着共和国的生存。”

议员们听着这篇檄文，默默无声。

逃 之 夭 夭

“一个政府倒台可以是因为互相对立的少数党暂时凑在一起，他们不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积极的多数派。”

也许，人们还没有充分体会到这个发疯的制度，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不过是个别病例，病正在扩展——而且，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今后还会扩展——直到基层：任何人做任何事，无论后果如何，都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出生的时候，任何一个新总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他要死，但是他却知道他将怎样死去：一个月，一年之后，原来表决拥护他的人又投票反对他。由于必须有一个政府班子，各政党只好暂时迁就，虽然并不甘心情愿。每当他们为了国家的外表作出让步，国家就只徒有其表而已。

责任在哪里呢？不在任何地方，同时又在一切地方。政党是自由的，政府却被牵着走。没有一个人专门对某一件特定的事负责，但表面上，所有人对什么都负责*。政府各部长之间并不团结一致；政府同它的多数派之间也是一样。部长们会指出，受到攻击的某一个政策是他们同僚中某一个人的政策，而不是他们的政策。议员们在表决的时候，不是考虑自己的信念，而是监视着他们的同僚。谁算得准，谁就是能人，他就可以高兴地抛弃一项严厉的措施，虽然他是同意这种措施的；只要他能断定不需要他的票也可以通过，这就成了；他可以表决一个笼络人心的议案而得到好处，只要他相信别人不会学他的作法就行。

* “锁住了的鸭子”：漫画报用它自己的风格，概括了“一个政府的历史”，它写道：“开始的时候，彼此伸出手来。以后，大家就熟熟手，接着又拒绝握手，后来，不得不转手。最后，大家都洗手，拉倒不管。”①

没有一个人愿意受到牵累，这样一来大家都同时“落水”，但是人们一起把身上的水“抖干”，而且抖得很快。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1954 年开了个破产的清单，一个议员反驳他说：“每届政府上任，你都参加表决了，因此你也有责任！”^②1957 年，吉·摩勒再次抬出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回答批评他的人的围攻。他说：“你们没有权利把局势的责任推到这一个党团、而不是那一个党团身上，在这个议会上，我们都有责任。”^③要想明确责任，那就是不按规则行事：如果大家都有罪，那就没有一个人会被判决。既然不能有所作为，那就得让大家无所作为。不动主义应该得到保证，总而言之是非此不可的。

这个议会的物理定律使得一个政党最好把这样一种“凑合物”捧上台，以后要把它搞掉时就可以搞掉。他们的敌人，那就是一个坚强的班子，有能力长期站住的；他们的朋友，那就是一个孱弱的政府，人家已经在揣测谁来接替它了。

互相抵消

皮埃尔·弗林姆兰继续说：“问题很清楚，我们的自由要想得到保障，那只有在权威、力量、威信以及持续性，再度成为政权的属性时才有可能。”

承认这一点，对于一个共和人士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为不稳定局面辩护时，正好是因为这对自由有好处。这种故意的孱弱难道不包含着一种力量吗？这种孱弱可以排除凯撒主义的危险。政治界和议会的大多数十分害怕这种专制制度，例如第一帝国然后第二帝国所建立的那种制度；又如维希当局企图使它复活的那种制度，正像从布朗杰一直到皮埃尔·普热德每隔一个时期就出现一次的那种噩梦，又像人们想像戴高乐将军所梦想的那种制度。

然而，请看这个互相抵消的政权却让自身以外的一种压抑不住的力量壮大起来：那就是发怒了的军人的力量。唯一能同它相抗衡的是同样可怕的力量——共产党和总工会。一边是军队，一边是共产党，他们势必把这个政权夹在一个铁钳中，一收紧就会把自由夹碎：孱弱状态长期以来起着保护作用，这时就起了自杀的作用。直到最后一次危机才使政治界接受这个判决。

然而，早在1880年，甘贝塔*就对这个议会制度有先见之明，并作出了无情的宣判，这个制度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目的是迫使麦克马洪“要么就范，要么辞职”。在他以后，从这个制度内部也曾发出过一些呼声——例如克里蒙梭、米勒兰、普恩加芬、泰迪欧等。在这里可以听出个人幻想破灭的音响，集体的幻想却持续下去。

欧洲，办不到的药方

皮埃尔·弗林姆兰接着描写了这种政权对经济无能为力的种种后果：“病因只不过是我们对外贸易的逆差。由于外汇短缺，我们被迫大量削减原料和能源进口，那么，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就意味着失业和贫困，也意味着这是一种绝望的想法。”

1954年以来，法国经济确实发展了，但同德国的奇迹，意大利的奇迹，日本的奇迹相比，则黯然失色。国库空虚，国外拒收我们的法郎。

皮埃尔·弗林姆兰继续戏剧性地慢吞吞说：“因此，政府应该考虑定额、配给和分配措施。如果我们今天后退，逃避一个紧缩政策的要求，我们明天就不得不实行一个救亡政策，严重程度就不堪设想了。”

* 法国共和人士，1879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881年任总理。——译注

当时，到处都表现得十分活跃，法国人要生产，要工作，要消费。但是，力气却白白浪费掉，货币滑坡，那堵墙愈来愈靠近了，经济要在那上面碰得粉碎：这就是共同市场。

这个欧洲，难道我们领教得还不够吗！但是，事情很清楚，法国承担不了那些义务和竞争，到了1959年1月1日边界开放的时候，这一切都随之而来了。

我十分注意被提名的总理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话，因为，从1956年秋天开始，我就参加了负责谈判然后推动罗马条约实施的代表团*。

我们差不多所有人都感到兴奋，深信能为一项关键的事业而贡献力量。罗马条约可以改变欧洲的命运，而首先是改变法国的命运：它把法国从千百年的沉睡中唤醒。保护主义曾使法国陷入沉睡中。

希望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希望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共同市场，继“煤钢联营”后，着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我的同事中，不止一个赞成艾尔弗雷德·法布尔-卢斯在“欧洲通信”中有力地表达的观点：既然法国人证明不可救药地无能管理自己，问题只能通过超国家组织去解决；在一体化的欧洲中，法国只需学德国人的榜样，他们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两年里，每一个星期四，我们一清早便到布鲁塞尔去。在瓦尔-杜歇斯的新哥德式城堡度过漫长的几小时后，当天晚上，我们返回巴黎。一路上，我们的谈话总围绕着这个唯一的问题：这个共同市场有可能诞生吗？我们僵化的经济需要欧洲治疗法，但是，它

* 这个代表团除它的卓越领导人莫里斯·富尔外，包括罗伯特·马尔卓林，雅克·唐纳迪厄，德·瓦布勒，皮埃尔·吉约马，乔治·维丹。还有外交人员，如奥利维埃·沃姆塞，弗朗索瓦·瓦勒里，让-雅克·德·布雷宋，让-弗朗索瓦·庞塞——他任秘书长——。还有金融家，如雷诺·德·拉·杰尼埃尔和让-弗朗索瓦·德尼奥，还有其他部的代表，像皮埃尔·穆萨和雅克·杜哈梅尔。

是不是已经病得太重，受不了这种猛烈的治疗，那剂药会不会把病人治死？如果我们能够等到签订条约，这个条约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会不会也埋葬在那些流产计划的墓穴里，就像欧洲军队和欧洲政治共同体那样？在讨论批准这条约的时候，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表决共同市场的人并不掩饰，他们认为，我们加入共同市场，首先关心的是要求这个组织做共同市场所禁止做的一切事。另外，他们着重指出，有不少条款正是为此^④而订立的。

这样，人们就等着看皮埃尔·弗林姆兰怎么办。他声称，他的政府所关心的最紧急的事情就是“调整经济所承受的负担，为法国进入共同市场做好准备”。痛处正好在这里。

海外领病了

最坏的事情来自别处。第四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一样，曾经战胜政治和经济混乱而继续生存。它们在这些熟悉的场所，都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为止，不致走得太远。非殖民化却使这个制度陷入困境。

帝国的幅员好像是国家孱弱的一种补偿；法国的威信只不过是平方公里或用“公民”的数目来计算的。1958 这一年，在两次谈判之间的间隙时间，我参观了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我在法国的展览馆前，看到了用金字写下的这个自豪的词句：“法国是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由于丧失了印度支那，我们儿童教科书中的一亿法国人减为八千万了。但是，这个损失并没有使教条发生任何变化；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没有使它们发生变化。人们宣读这些时仍然安详自信，就像在 1931 年的殖民展览会上一样。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传播着同化和中央集权的好处。它继承罗马精神，以 1789 年大革命的原则而自豪，激烈地

否认文化上的差别，它宣布自己就是这样的共和国，它的公民不仅是权利平等的，而且大家完全一样，可以互相交换的。怀疑这一点就是种族主义。

这些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使法国人觉得非殖民化是一系列失败的总和。

1958年5月13日这个日子，非殖民化这一幕是在阿尔及利亚演出的，它比印度支那，摩洛哥，突尼斯那一幕还要直接，还要切身，还要痛心。阿尔及利亚怀念着法国，法国怀念着阿尔及利亚。我们返祖遗传的教条主义尽情发作：它使两种人对立起来，一种是想用人类平等的名义去“同化”阿尔及利亚人，另一种是想用人民自由的的名义去解放他们。伟大的原则，巨大的利益，深刻的感情纠缠在一起，使国家的两部分猛烈对立。当民族意识如此四分五裂的时候，按比例选出的国民议会哪能不分裂呢？

历届政府都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因为没有一个是足够集中的票数去实现自己的主张。一个月之前，费利克斯·盖拉德倒了台，因为他接受了英、美的“调停”建议。人们愿意悲剧就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但是，凡是听皮埃尔·弗林姆兰讲话的人，差不多都认为，冲突今后不可避免地要国际化。在这期间，他们感谢他把确凿的事实说出来：“法国政府没有别的想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恢复和平，但是，除了尽力而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政府认为它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求全国作出新的牺牲。”

国家难道没有克服过困难吗？公社，布朗热主义，德赖弗斯事件，“大战”，法兰西行动党和各种联盟，贝当和戴高乐，共产党参加政府，然后又被赶出政府，法兰西人民同盟和普热德主义，莫边府等等都是。在1956和1958年间，我曾听到第四共和国许多政治家表示确信，阿尔及尔风暴的高潮过去后，政权就可以找到比较平静的水域，顺利地摇橹前进。不过，先要渡过难关。可是，几个小

时以后，马歇将军就被捧为阿尔及尔公共救亡委员会的头头。军队把黑脚们*的叛乱接了过去。巴黎作出什么反应呢？它把一切民事和军事权力交给了萨兰将军，萨兰将军又把权力往下交给了马歇……由于害怕实力较量，共和国低头了。

既成事实政策

这并不是第一次：共和国没有能力行动，也没有能力制止行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多少殖民地难道不是通过既成事实并入帝国吗？政府，然后议会只能追认。也是通过同样办法进行战争来保住它们的：在印度支那，当地的法国当局堵塞了同胡志明妥协的道路；在摩洛哥，它废黜了苏丹；在阿尔及利亚，它绑架了本·贝拉；到1958年初，它轰炸了突尼斯的一个市镇萨基埃·西迪-尤素福。在这些历史性事件发生之前，政府从来没有进行过讨论。

1957年，我曾陪同西方驻巴黎的一些外交官到阿尔及利亚去。从突尼斯边界到摩洛哥边界，我们在一个军人食堂听到一段毫不客气的话：“打仗嘛没有什么，但是被这些木偶在背后插一刀……”军人们一直在非殖民化前线作战，往往被放任不管，新近的耻辱使他们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传统上对“文官”们的蔑视。我无法阻止外国同伴们发现这一点。一位奥地利外交官在回来的飞机上对我说，我觉得，共和国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事实上，从雾月以来，没有一个军人比现在更感到有理由去夺取政权。政权在哪里呢？在波旁宫舞台上晃动的那些影子给人一种幻觉，好像是他们掌握着权力似的。负责的政治家们，因为是过渡性质的，所以无能为力；不负责任的官员们装出服从他们的样子，实际上这些人的权力已经没有人控制得了。

* 指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译注

病态外交

权力不仅在各部主任的办公室里，它也在几个外国首都。弗林姆兰勇敢地承认这一点：“世界上敌对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而我们没有保证可以得到我们朋友的支持。”

真是动人心弦的概括！这里面包含着我国国际地位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对美国实行俯首贴耳的政策，同时又实行为美国所反对的殖民政策，这样，法国同时招致西方世界对它的恼怒——和同东方各国的紧张关系。这够严重了，但是无疑地，最糟糕的是1789年的继承人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憎恨。

我所接近的议员们发现，这个制度有某种一贯性，在这个制度下，殖民地依附巴黎，巴黎依附华盛顿。为什么法国不是一个保护国呢，既然它拥有保护国？既是保护人，又是被保护人，它服从命令时和下命令时都做得同样自然。巴黎比达卡尔和塔那那利佛知道得更清楚什么东西适合塞内加尔人和马尔加什人。华盛顿比巴黎更清楚什么东西适合法国人。

只是在1958这一年，这种封建的平衡给打破了。美国君主插手我们的封地，鼓励我们自己的附属去造反。法国人牢骚满腹，但是甘心顺从，稀里糊涂地准备继续服从下去，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去指挥别人了。还有什么其他出路呢？去做苏联的附庸吗？有人主张这样做，只是独立再也不存在了。有组织的派系标榜它们同这两个大国唇齿相依。阿尔马纳克派和布吉尼翁派*时代，神圣同盟和求伊斯派时代，都是这样。雅典和威尼斯共和国都是这样完结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是不是快到了呢？一个看破红尘的将军退休在乡间，他对他少数几个客人说，继阿尔及利亚之后，阿尔萨斯—

* 法国查理六世和查理七世时期的两派，他们两派之间的斗争造成国家的分裂。
——译注

洛林也要“滚蛋”了。

没有权威,因为没有持续性

怎样破邪呢?这些腐败的制度怎样摆脱它们呢?这出戏三个主角,政府、议会、人民,他们当中至少要有一个具有这种意志和手段。

是政府吗?它还能有的唯一雄心就是把它被推翻的日子向后推迟一点。它一动不动,因为它来不及开动。皮埃尔—亨利·戴尚有一天对我说:“你们这些官员们,你们是不能罢免的,好好利用这种机会来准备一个长远的政策吧。政府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充其量他们只能采纳科室制订出来的某个计划。”

弗林姆兰继续说:“缺乏持续性的行动,无论动机如何正确,都不过是毫无前途的一种冲动,毫无结果的一时尝试。各届政府在它们诞生那个时刻就已开始死亡了;而太经常的情况是,它们用尽了它们的力气去推迟它们倒台的时间。”

是议会吗?议员们怎么能认真地修改宪法呢?修改宪法需要五分之三多数通过,何况对一个最没有争论的问题要凑到简单的多数票还那么费力。

1952年12月,我乘火车从斯特拉斯堡回来,和几个议员同坐一个车厢,由于内阁危机*我们从欧洲议会被召回巴黎。他们热烈地谈论着,所有人都痛快地同意认为必须修改宪法,使政府具有必不可缺的稳定性,但是,每提出一个方案,就遭到这一个或那一个不容分辩地反对。

五年之后,1957年10月,我又在同一列斯特拉斯堡的火车上。这时正好发生另一次阁潮**。同车的是一些议员,他们这一次

* 比内政府辞职。

** 布尔热—莫努里政府辞了职。

是开完六国议会的会议回来，我差一点相信我是犯了幻觉病。相同的议论，相同的论据，相同的障碍。让·勒·拜尔，一个有修养的聪明人，他向我解释说，宪法无疑是有毛病，而且起着坏作用。但是，一个好共和人士应该尊重它，因为它是宪法——而尊重它的办法还有比不去触动它更好的吗？看来，他做一个坏共和国的好共和人士一直要做到底了……

如果确实有过改革制度的决心的话，无疑地，关于方法上的分歧本来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是没有这种决心。议会制度的特点就是议会单独拥有改革的权力，自己却一点也不想去改变这样一个制度，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它掌握着一切权力——即使它不能行使这些权力。

患厌恶历史病的人民

那么，人民呢？1958年区选举的时候，我衡量一下人民灰心到什么程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选民的真正的乡土。在咖啡店和店铺的后厅，我碰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消极：“你怕什么，总是他们最有力量，犯不着你去白费劲。”“即使把他们全都扔到赛纳河里去，也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你，要是把你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你也会一样干的。”公民们面对这样一个盲目的机器，感到无能为力。意大利作家马拉帕特看得准：“法国人把自己看成一个衰落中的民族，要不然就是一个完了的民族……他们病了，这个病，我把它叫做厌恶历史病。”^⑤

奋起斗争难道有可能来自这样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吗？过去作出了答复。一般议员对权威本能地不信任，一般法国人也同他们一样。为了避免自己瞧不起自己，法国人就瞧不起“政客”。但是实际上，政客采取的态度是他们逼出来的。厚颜无耻，满腹狐疑，议员最后扮演的角色，正是满腹狐疑，厚颜无耻的人民想要他

扮演的。他们永远是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他们同流合污，陷入同一条死胡同里。

对于能否把法国从这条死胡同里拉出来，皮埃尔·弗林姆兰慢慢走下讲坛的梯级时，显然已经绝望。

“戴高乐再也不会回来了”

会议中断后，阿尔及尔上空爆发的暴雨在波旁宫的圆柱间引起了回响。这天晚上，皮埃尔·穆萨*在家里俯览着残废军人宫广场的一个套间“请吃饭”，在这种场合，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谈到共和国的命运。罗伯特·伯隆**谈到了国民议会走廊盛传这种说法：只有戴高乐能克服危机。

乔治·蓬皮杜***冷冷地插进来说：“不要幻想了，戴高乐永远不会回来掌权，你们听清楚：永远不。他不仅再也不相信权，而且也不想要权。他要写完他的回忆录。他只想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将不会让他的威信毁在一宗显然没有希望成功的事业上。

——但是有些人相信，只有他能使军人就范和修改宪法。

——也许。但是用不着去幻想了。”

得悉这个消息后，伯隆匆匆赶到就在附近的波旁宫去。

毛说****：“国家像鱼一样是从头烂起的。”是不是这样呢？这种法兰西病，这种国病，这种从头烂起的病，如此明显，如此沉重。为了把它治愈，越来越多人认为，必须和只须改变各种制度：必须吗？这是显而易见的；只须吗？就不见得那么肯定了。

* 当时是法国海外部经济事务主任。

** 马耶纳的人民共和联盟议员。虽然他当初反对戴高乐将军重新上台，以后成为他的一名部长。

*** 当时在私营部门工作，他接近戴高乐。

**** 指毛泽东主席。——译注

第六章 不能全愈的痊愈

以后的日子里，大家愈来愈担心，怎样克服阿尔及利亚的分离和军队的叛乱呢？同乔治·蓬皮杜的预言相反，戴高乐将军一反心灰意冷的常态，5月15日宣布他“准备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他令人惊叹地说：“这也可能是一种新生的开始。”病入膏肓，怎能希望治愈呢？人们只希望，不继续恶化就算好事。

噩梦在法国历史中是常有的，这时又出现了：控制失灵了。国会给政府的“全权”并没有能够阻止政权继续烂下去。警察溃散，官员各行其是，加上军队暴动；科西嘉的分离，加上阿尔及利亚的远去。能不能避免内战呢？能不能避免美国人的干涉呢？他们的舰队在阿尔及利亚海面巡弋。5月22日，安东尼·比内到哥隆贝去。几天以后，居·摩勒也学他的样，由于一群牛的耽搁，他发火了，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说：“我经历了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在波旁宫，尽管经过许多波折，但是出现了一股潮流，要求向戴高乐呼吁。总统柯蒂的唯一权力就是指定一个候选人，接受任命。5月29日采取了这个决定，并且支持这个决定，他立了大功，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劝导，这同历史传统不一样。6月1日，戴高乐将军得到广泛多数的授权。

5月13日还是6月1日？

奇怪的是，大家只记住了5月13日这个日子，而没有记住6月1日。其实5月13日不过是个捣乱的日子，这种日子多得很。而6月1日是两千年来唯一的一次掌握国家主权的人不是在外国占

领下，不受任何外界的强制，而决定放弃这种主权，把权力交给政府去改变这个制度。

1963年初，我向戴高乐建议稍为隆重地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6月1日五周年。

“我可不要把我的时间花在纪念我自己上面”，他斩钉截铁地说。

但是，别人并不忘记纪念，不过各有各的作法，各选各的日子，来使人们不要忘记那个非法的政权。1968年5月13日，反对派举行大规模示威，提出口号：“十年，够了”。全世界的报章为了这一天大搞十年总结。那就是重新搬出少数派的论点，连评语都不加。根据这个论点，戴高乐将军是通过政变上台的。那就是忘记了某些细节：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政权无能控制叛变，最后才迫使全国各主要政党向这个人呼吁，因为他的威信使他有一线希望战胜考验。还有，第五共和国从那时起经受了军队和黑脚们的叛乱。这些叛乱要准备得充分得多，进行得也激烈得多，而共和国获得了足够的合法性，也就是获得了人民足够的支持去制止它——不是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叛乱者，而是下令逮捕他们。

这个矛盾是意味深长的。例如，第四共和国的三百二十九名议员6月1日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建立第五共和国，他们自己确定第五共和国的重大原则。他们的表决马上得到舆论毫不含糊的拥护；接着是公民复决，每五个法国人就有四个赞成；然后立法选举大获全胜；最后总统选举又大获全胜。6月1日的这个多数以后还多得很，这不过是头一个。从法国建立普选制度以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对“开国之父”的这些投票却注定没有人记得。另一方面，二百二十四名反对派*拒绝授权给这个政府，他们认为这

* 一百四十一名共产党人，六名进步党人，九十五名社会党人中的四十九名，四十二名激进党人中的十八名，以及其他个别的议员，其中最有名的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

个政府是和雾月 18 日和 12 月 2 日一脉相承的。他们的那种解释得到信任。这是因为法国对凯撒主义的恐惧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一个不断流传的神话总是要胜过人们忽略了真理。

“他的寿命不会比其他人长”

有些慢性病会突然发作，进入致命的危险期。这正是共和国在这些日子里所遇到的情况，然而，不仅危险期过去了，慢性病好像也因此而好了。

病好得这样快，在我们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先例*，尽管事后来看也有点奇怪。人们当时并不要求戴高乐做到这个地步。人们呼吁他拯救共和国，不要让它落入他所说的“在阿尔及尔策划的篡权阴谋”中^①。他主要想把共和国救出魔鬼的掌握，他认为，他们是阿尔及利亚悲剧、然后是印度支那悲剧以及其它等等的祸首。

人们忘记了，1958 年 6 月的头几天，大部分投他票的议员期待他很快下台。授权的当天，我在四柱大厅听一个独立党议员谈话，他不久前还是弗林姆兰内阁的部长。他在一群聚精会神听他讲演的人说：“国民议会在 10 月的头一个星期二开会，这是宪法规定的。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要么戴高乐成功地使我们摆脱阿尔及尔的军人，要么他失败。无论出现这种或那种情况，人们都不需要他了。这一段时间正好是四个月，平均时间，他的寿命不会比别人长。”话是用嘲笑的口吻说的。大家吵吵嚷嚷表示赞同。

夏天和秋天的时间里，议员们越来越惊奇了。新共和国的建立一点也不像他们所想像那个样。他们只知道 9 月里国会要解散，因此要同选民重新打交道。由于受到旧框框的限制，直到 11

* 至多能把新历八年的例子算上，但它并不是完全合法的。

月，许多人还无法想像戴高乐将军会当总统候选人。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总统完全是象征性的。

“戴高乐到爱丽舍宫去？你别胡思乱想了。”一个不久前当过外交部长的人对我说，“他要把柯蒂留下来的；他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说话的总统了。至于他自己，他会在马蒂雍宫当总理的。根据新宪法，在整个议会任期内，他是不能罢免的。”

11月，当人们得悉戴高乐将军要在下个月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对于上述的那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戴高乐被请来是为了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难道他没有搞成就离开政府吗？因为进入爱丽舍宫，就会成了寓言里的傀儡。

矛盾的是，阿尔及尔危机是戴高乐理应解决的，却拖长四年之久；它经历了许多波折，甚至比1958年5月的还要激烈得多。但是，大家认为的“法兰西病”可以说是马上好了。法国长期孱弱、瘫痪和屈从于别人之下的情况，像有什么魔法似的消失了。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拖延，使病的痊愈更加牢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权不断得到巩固而不受党派的压力，国家的沉疴因而康复了。

国家的性质改变了，王牌就被掌握了，而且比我们的邻国还要掌握得多。过去，我曾多么绝望地眼看它被剥夺。这些王牌是：政权稳定长寿，处处都是主动精神。在某一特定方面，我亲眼看到了复兴的速度和规模。

带电的气氛

人们并不知道，5月13日暴动后八天，弗林姆兰政府被迫不得不无限期地延迟我们进入共同市场的时间：财政和经济的情况使我们不可能履行1959年1月1日到期的义务。政府很诚实地决定告诉所有成员。莫里斯·富尔是当时的欧洲事务部部长，他乘坐该部的一架小飞机去通知他的五个同僚，大概要延期一年，而

且很可能是几年，才能实施罗马条约。这个戏剧性的声明，别国的部长们听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们都认为，法国势必这样作。障碍太高了，面对着它，法国退缩了。人们商定对这个决定保守秘密，直到政府愿意正式宣布的时候为止。政权的崩溃，使它避免了这个耻辱。

在别国的部长们眼里，戴高乐将军的到来并不能挽回这个失败，而且，简直是无法挽回的了。既然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是那么拥护欧洲的，却宣布弃权，那么，戴高乐是反对超国家组织的，当然不会比他们表现得更“欧洲化”了。另外，我们经济的软弱性，是他无法可想的，要这样做也不可能。这便是在布鲁塞尔，在那个新的、而且无疑是昙花一现的共同体走廊里的议论。

但是，法国的退出并没有得到证实。人们开始不耐烦了。特别是英国，它曾经拒绝参加共同市场。我们的脱离，使它可以把共同市场毁掉，而代之以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1958年12月15日，在拉·穆埃特城堡的洛可可式大厅里，“六国”^{*}和“七国”^{**}的部长们聚集在一起开会。气氛是带电的。

“我们到了摊牌的时候了”，会议之前，顾夫·德姆维尔平静地对我说，这个晚上是决定性的。

“七国”在英国的率领下，已经开始高高兴兴地埋葬共同市场，至于我们罗马条约的五个伙伴，甘心情愿地看着由于我们的过错共同市场变得遥遥无期，于是他们也赞成“自由贸易区”。不得已而求其次嘛。

德国的经济部长路德维格·艾哈德提出了一个“折中建议”，

* 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即规定建立共同市场的罗马条约的签字国。

** 英国，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爱尔兰。它们赞成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冲淡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雄心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通过复杂的和永久性的纽带结合起来。自由贸易区只限于降低关税壁垒，其办法是随时可以变更的。

实际上等于接受英国式的自由贸易区，六国建立自己的制度只留给一个渺茫的可能性。

班上的坏学生

一个接着一个，七国，然后是五国同意了这个计划。顾夫指出，他认为德国的计划有严重的弊病。他要不要申辩他的国家还不具备充分条件去承担一个新公约的义务，即使这个公约比罗马条约的约束力要小得多呢？丝毫没有必要。他着重指出，建立一个广泛的自由贸易区将会妨碍实施罗马条约，并且把共同市场毁掉。

尽管在镶着铅白色橡木板壁的路易十五式的大厅里升起着袅袅烟圈，尽管外交人员有着固有的自制力，也无法掩饰众多的人脸上流露出来的吃惊的表情。法国人讲话的神气，好像他同造成僵局无关，而德国不是给这个僵局打开一条出路似的。

英国代表团团长戴维·埃克尔斯爵士发动了进攻。参加会议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那辛辣刺人的话：

“只有一个代表团反对这个协定，尽管全体都赞成。这个代表团代表的国家不履行它的任何义务。”

戴维·埃克尔斯爵士尖刻地指责法国陷入恶性循环中。共同市场理论上可以把我们的经济带上得救的道路。但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经受得住这种治疗，就要它先有可救之道。这样一个循环，巴黎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出来呢？既然它最低限度都做不到，它又怎能做到最高限度呢？英国这位部长高声说出了每个人心里暗暗想着的话。法国是班上的坏学生。在这十年里，我们多少次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许下诺言，但是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自己提出创议，我们自己又让它流产。我们呼吁外国政府来干预我们内部的争吵。某一个前外交部长*挑动我们的伙伴们去拒绝他的继任

* 罗伯特·舒曼，1954年8月19日。

人*提出的建议。我们没有能力接受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泛泛的约束,却硬要承担共同市场的严格规定。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知道,月底要公布一系列大胆的措施,以便恢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对话人是无法估计得到的**:除部长以外,法国代表团的团员都完全不知道。我以后才了解,几天以前,安东尼·比内自己也对计划***这样大胆,感到吃惊。他后来用自己的威信去支持这个计划。

“你说我要决裂了”

毫无疑问,十年来法国从来没有在国际会议上遭到它的盟友这样猛烈地攻击过。它也从来没有这样孤立过。直到今天,法国一向显出一副可怜相,最后总是屈服。这一次,它却毫不在乎地向它的十二个伙伴挑战。这是无法容忍的。

当财政大臣威胁要对法国进行报复时,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转身对奥利维埃·沃姆塞****说:“你去通知其他五国代表团我要决裂了。”沃姆塞绕着桌子,在每一个同他对等的官员耳边说了说。每一个官员又立即向自己的部长那边俯过身去。部长马上摘掉耳机。会议桌周围立刻一片惊慌的窃窃私语。发言的人说话没有人听,最后住嘴不说了。顾夫要求发言,窃窃私语停下来了。他冷静地宣称:

“听了刚才讲的话以后,法国不能再认为五个伙伴所提出的和解建议是可以接受的了。我遗憾地宣布,没有任何协议能在本次会议上达成,我说清楚,没有任何协议,即便是关于另一次会议的

*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 他们估计要贬值,但是没有想到要开放贸易百分之九十。

*** 雅克·鲁埃夫带着一个专家委员会,按照戴高乐将军的指示,在绝对秘密中准备出来的。

**** 当时是外交部的经济财政事务司长。

日期也罢。”

会议休会了，路德维格·艾哈德出来调停，设法取得和解。戴维爵士对自己的激烈讲话表示遗憾，因此法国改变态度，不投否决票而弃权。

顾夫固执地微笑着，一面摇着头。艾哈德满脸通红。顾夫笑得愈来愈欢。这种美妙的沉默，过去十年来我不止一次在国际会议中看见。但是，当时他代表着踉跄地从一个危机走到另一个危机的法国；他无法掩饰他的地位软弱。今天，他流露出一种安详的信心。他依靠着一种攻不破的力量，那就是保证行政权长命的制度。他可以随意向英国人打开或关上大门。他可以为了取得胜利而坚持他为自己定下的立场，要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他已经完全能够要抵制就抵制，要不吭声就不吭声。

“没有任何协定”，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在晚上散会的时候，法国的五个伙伴一点也不相信，罗马条约已经死里逃生。他们确信小共同市场和大自由贸易区都毕直沉到水底去了。

这并不是这一年来最小的一个矛盾。弗林姆兰政府完全拥护欧洲“一体化”，却被迫罢手不干，而以攻击超国家组织闻名的戴高乐却千方百计履行签订的条约，这种条约他自己是不会签订的。他还要做得那么漂亮，不要求修改，也不要求延期。条约虽然规定有保护条款，但无需引用。复兴计划使法国可以履行它的义务。它甚至可以要求加速时间表。

有事实为证，看得见的病已经治好

在所有方面，像在拉·穆埃特城堡那晚上发生的反复，使目击者和主角都感到惊讶。改变是这样确实和深刻，以致1958年初我们看起来不可能、差不多不可想像的事情，现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事了……

这个转变难道不足以使人宣布法国 1958 年以前就患上的而且为世界所嘲笑的那种病已经好了吗？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功迹，只要想想在第四共和国之前这个病如何伤害第三共和国就知道了。而且，这不仅限于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早在 1914 年，法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曾有过六十个政府*：一种想翻身的愿望掩盖着政局的不稳。法国的制度患了病，病了两个共和国之久，就这样好了。实际情况难道是这样吗？法国难道不是从绝对君主制开始，就病了吗？

要做到以前十七个政权做不到的事，重新掌握历史道岔——法国曾多少次出了轨——首先从改革君主制开始，要是失败了，革命就避免不了。总而言之，治好这个历时三个世纪的“法兰西病”，我想，这就是查里·戴高乐最大的雄心壮志，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说。

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没有建立一个新共和国。我只不过为新共和国打下基础，这是它从来没有过的。”

另一次，他又说：“我所尝试做的是把君主国和共和国综合起来。”

我说：“是一个君主共和国吗？”

“——你愿意这样说也可以。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共和君主国。”

在他第一个七年任期里，戴高乐唯一关心的是重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国家为了民族，民族为了国家。一个他要把它从党派和利害斗争中拯救出来的国家，他要给国家的领袖以稳定性，连续性和独立性；一个他要从外国控制下拯救出来的民族给他提供军事，外交和财政的手段去行使已经失去的主权。

* 我还没有把政府改组算在内。

从长远来说，他着手处理第三个方面：社会。无疑地，他热望统一，一向深知必须给“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荒唐冲突找到一条出路。他认为，既然每四个或五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投共产党的票，如果投了共产党的票就成为国家的流放犯，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但是他知道，在这方面，他是在“摸索着”走。但他不喜欢“摸索”，所以他宁可长期不走这条迷茫的道路。

直到他的头一个任期结束时，他是这样想望的：加强国家的权力，其他一切就会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结果失望了，在國家的首脑方面确实发生了一点根本性的变化，在国民意识深处也有所反响，但是中间部分却可怕地原封不动，可怕地永恒不变。

“两 年！”

第一次我同他单独会见是在 1959 年 3 月。他的办公厅主任雷纳·布鲁耶请他接见他当时还不认识的一个年青的“戴高乐派”议员。他询问我关于我那个议会党团和我的选区的思想情况。当时盛传要取消退伍军人的退役金，我告诉了他，他以庄严的宁静神气打断我说：

“那些制造法国舆论的人总是本末倒置。十年以后，有谁还会记得这一个差错呢？如果有的话，也只是那些代表自己的阶层攻击政府的人。人们不会记住这个插曲，而只会记住国家不再是封建主义的俘虏，不再受它的束缚了。”

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又说：

“确立制度，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完成非殖民化，恢复独立，这就是我的任务。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您需要多少时间呢？我冒失地问。

——我不知道，但是两年后，我们应该可以取得很大的成绩了。

他没有说：“我两年后就要走”。他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行动自由。但是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不仅不想谋求另一个任期，而且一俟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以后，他就考虑什么时候引退了。

几年之后，我把这话告诉了乔治·蓬皮杜。他笑道：

“两年！他已经比较理智了。在1947至1951年之间，当他想通过立法选举重返政坛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将呆上六个月，也就是改变宪法，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给法联邦打开个新局面，巩固法郎的时间。六个月，你听清楚了吗！然后，我就功成身退。’”

总之，戴高乐自然好像山区人常遇到的情况那样，受幻觉所骗。他们以为很容易登上山峰，但是愈接近山峰，距离反而加大了。

等他发觉的时候，他以为可以越来越加强共和国总统的优越地位，就会比较容易地克服障碍了。从1962年4月到1965年12月，在蓬皮杜两届政府的任期内，他主要关心的是加强他的职权，所受到的限制仅仅是必需在国民议会上找到一个大多数去支持政府。这就确立了制度上的平衡，这是法国一向缺乏的。今后，法国将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人民最先说了算，人民同时选出总统和国会，也是最后说了算，当总统和国会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民出来拍板定案。与此同时，国家拥有足够的权力。

从迷信雅各宾……

在这期间，戴高乐从来不曾给我这种印象，认为国家的权力应该由一些次要的权力加以平衡。相反地，他对可能存在的这种权力感到恼火。在他眼里，所有不服从他权力的，都有不合法的嫌疑。当他谈到参加管理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让工人分担企业的责任，而不是让公民分担政府的责任。

我有时害怕这种雅各宾派的严厉态度。他想用通令，决定，法

令等来进行统治，而对法律不那么感兴趣。他对议员们这些潜在的笼络人心的政客表示疑虑。

在他访问各省的时候，他感到恼火，因为他所逗留的地方的首府是省的财产，而不是国家的财产；因为省长每年要向省议会议员要求拨款购置车辆或者地毯，特别是有时这些省议员属于反对派，而这种情况绝非少见。他对我和罗杰·弗雷表示不满，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省长有求于省议员，是依赖，因此就会互相勾结。

他说：“省长就是国家在每一个省里的代表，要是他要乞讨才能让他的老婆换上新窗帘或请个厨子，那么，他就是丢国家的脸，你又怎能希望他保持足够的权威去反抗压力呢？”

罗杰·弗雷在我耳边说：“要是省长得依靠财政部的话，那他们就会一贫如洗了。”然后，他就等着挨揍。

这样迷信国家并没有使戴高乐看不见送到巴黎来的公文着实太多，问题最好是由当地熟悉情况的人去解决。“战场上，连队指挥官应该就地作出决定，不要每时每刻向师参谋部请示。”同样地，应该让官员们自己作出决定，无需寻求上级的庇护：事实上，只有他们关心全局的利益，而那些乡绅们只知道他们的选举得失和搞阴谋……1963年，戴高乐曾考虑如何恢复省的生命力，使其免遭巴黎的中央集权窒息；他丝毫没有想到把官员的职权移交给选举产生的人员，而只想到把巴黎官员的职权移交给地方官员。他并没有动摇他对国家的信心，认为国家是公众利益的唯一代表和媒介，而在民族面前，国家的唯一保证就是他自己，总统本人。

1964年1月30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多么有力地表示这种罗马精神，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显然应该是这样：国家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由人民全部交给总统，总统是人民选举出来的。除了他授予和保持的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力，不论是内阁的，民事、军事或是司法上的。”

我觉得这句话有错误的地方。他让我上他的办公室去。这是他最后制定他的正式政策的地方。我想到了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只有上帝可以有无限权力而不发生危险”。今天一个市长，明天一个更大的地方政权——省的，甚至是大区的——应该能够掌握民事的权力，而无需由总统授予或保持。民事这个词在我看来是多余的。司法这个词也一样。

戴高乐经常能接受文字上的修改，这一次悍然不顾我的异议。也许，以后他会同意修改……

……到南斯拉夫的诱惑力

1965年10月，不久就要进行总统竞选，对他来说，这将产生一种显影剂的作用，这时候他发生很大变化。他把我派到南斯拉夫。我回来的时候，他接二连三地向我询问铁托和他的制度怎么样。我尽我的能力叙述了在企业 and 各省的自我管理制度，或者，至少是我所得到的印象。

“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他是开玩笑吗（我知道他对铁托元帅是有保留的*）？丝毫不。他越来越感觉到雅各宾主义的局限性。我着重指出了南斯拉夫制度的弊病：各级机构采取互相矛盾的决定，联邦政府想购买法国的机车，省里想买德国的，基层铁路工人却想买瑞典的；一切事情弄得既复杂又耽误时间；无政府主义只是因为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独一无二的党才能最后得以避免。戴高乐点着头，他被这种国家专断和公民负责的混合，管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吸引住了。米歇·罗卡德——他那时说服了统一社会党在1969年公民投票中弃权，现在甚至盛赞它的好处——有一天向我声称：

* 他不能原谅铁托曾经反对、并在以后下令枪决米哈洛维奇将军，南斯拉夫最早的抗战领袖。

“如果戴高乐没有从我们这里盗用参加管理这个词的话，我要用的就是这个词，因为它比自我管理这个词更恰当地表达我们想做的事。”

罗卡德梦想“参加管理”，戴高乐梦想“自我管理”。他原来相信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国家的权力去解决一切问题，现在转而确信，他遇到了一种东西，其大无朋，像一股暗流反对着等级制，而中央对它无能为力。

在德·格拉斯巡洋舰甲板上

1965年投票结果这个打击无疑决定性地促使戴高乐去分别两个方面：国家方面，他对此负责，取得了不少成功，因为他的政权时间长，威信高；法国人方面，光是集中权力是不够的，甚至是不适当的。相反地，由于想自己决定一切，他发现他到处碰壁，到处摔跤，到处引起反对。

过了几个月*，在德·格拉斯巡洋舰舰尾放着的一条长凳上，我坐在他的身边。前一天夜里，默鲁罗瓦海面上发生了风暴，所以不能进行预定的核试验。我们只好在太平洋的水域上巡弋四十八小时。在放晴了的天空下，两眼凝视着白色的航迹翻起的深沟，戴高乐将军刚刚对我谈到在国家复兴和独立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接着忧郁地说：

“法国人得了一种很深的病。他们不愿意理解，时代要求他们作出巨大的努力去适应时代，但他们只要有可能，就尽力顶住时代所引起的变化。请看看过去，他们难道表现过他们能自发地组织起来，自己投资、生产和出口吗？不，他们一切事情都消极等待，等国家替他们干。国家得照顾一切，张罗一切，而特别是进行必要的

* 1966年9月10日。我当时负责科学研究和原子及空间问题。

改革，他们还要拒绝接受，因为是国家给他们做的。他们作事，不象成年人。”

关于法国，他唯一感到满意的，只是因为法国人使他不再存在幻想了。他接下去说：“他们离开不了国家，可是他们又憎恶它，只有危险的时候例外；还不止这样，只有国家能使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但是公民们怕的就是国家有力量把他们从萧条的状态中拉出来。你能要我怎么办呢？他叹气道。我没有多大办法。这就是法国，法国人就是这样。如果法国人是无法管理的，那又怎能管理法国呢？离开了法国人，我对法国是什么也干不了。”

他继续左思右想，一半对我说，一半对自己说：

“一个极权政体做起事来似乎不用考虑别人；一个民主政体却要求自己迁就他们了。久而久之，也许制度可以改变社会、经济，并且从此及彼地把法国人改变。但是不可能不遇到曲折和反复。再说，还要有时间。

——我们有吗？

——我自己肯定是没有了，你们那一代也许有。法国的寿命肯定能为我们所有的人送葬。只要法国人保持着我想灌输给他们的意志，对法国胸怀壮志，严格要求自己，那么法国是有前途的。如果他们在团结方面丢掉他们那种民族自豪感，缺乏一个超越他们自身的伟大宏图，他们就要瓦解，就会在平凡庸碌、浑浑噩噩中变为殖民地，并争先恐后地同征服者合作。但是，这样做，他们能保持独立几年呢？”

第七章 隐患露头

在等候电话小姐的时候

1961年，赛纳河盆地的几个市镇促请我注意打电话耽误时间的问题：需要十或十五分钟的时间才能叫通接线员。我写信给邮电部长；等候答复需逐级上呈下达，要调查，要视察，时间过去了，最后我收到一封信，语气十分肯定：等候是以秒计算，而不是以分计算的。

但是，抗议一再发出。一年以后，人们对我肯定说，等候的时间达到半小时，甚至一小时；要报火警的话，最好还是开你的车去。我又重新进行交涉。这一次，当局为了让我相信，在普罗文中心站装了计时表，计算需要多长时间才得到接线员的答复：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一分钟。当局表现十分热心，承认时间还是太长了。当局招收了新的接线员，缩短了时间。从中心站方面来说，时间已缩至十秒左右。可是以后还是有人抱怨。我手里拿着表亲自进行调查，发现用户方面等候时间确实达到半小时。

最后终于找到了答案，用户摇他们电话的磁电机，但是没有一条线路通的：信号到达不了中心站。尽管他们焦急，电话员却一点不知道。计时表也只有在线路通的时候才开始转动……几乎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电话重新畅通起来。当局却一直坚决否认出过什么毛病。

这是多么奇怪啊！一个公用事业同它的用户之间的联系竟然需要通过一个议员向部长进行交涉。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这一缓慢而沉重的政治交涉多么说明社会的畸形变态！

通道堵塞了，而当局却一点没有觉察，我经常想着这件事。正派的、想把事情做好的人把他们的精力耗费在不厌其烦地解决问题的细小枝节，而主体却看不到，因为主体依然未变。

三个世纪以来，法国人纠缠在政权性质和他们政府的成份上面。但是，政府的更迭，甚至政权的更迭，远没有产生他们所期待的结果。他们哼着歌，像在“安哥太太的女儿”那出戏里一样：“犯不着更换政府。”

这就使人不能不问一问，制度上的疾病本身是否仅仅是一种隐疾的征候，它根深蒂固，即使国家再健康，也不能光靠这一点把病治好。这一痼疾的特点是不是就在于我们的制度迷。

“启蒙时代”设法逃脱专制制度，深信只要从英国输入议会和监督君主的办法就行了。这种幻想，悲惨地痉挛了半个世纪，占了统治地位；政治制度最后采取了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那种形式。但是深刻的现实依然如故。行政上的等级制度，从黎塞留、马札林和科尔伯特把它制订以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制度迷还是缠住我们的思想，一点也没有放松：保皇派，波拿巴派，正统派，奥莱昂派，保守共和派和激进共和派，温和派和社会主义分子互相对峙，为的是争个高低，到底给政体贴个甚么标签，到底国旗用什么颜色。没有一个竞选纲领不提出自己的改革宪法方案，就好像这一次讨论要解决一切争论似的。

隐疾在明疾下面显露出来

最后——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国家体制问题解决了，1958—1962年的宪法使我们摆脱这个制度迷。这么一来，痼疾开始在

* 菲埃维，圣西蒙派，勒蒙台，托克维尔等证明法国大革命差不多没有起什么作用。

我们的意识中反映出来。

这就是第五共和国的成就。但是，这一成就由于它的局限性，它所能作到的仍然是很有限的。政治制度所患的明疾现在表面上虽然消失了，但又露出了社会的隐疾。

虽然国家康复了，但是很快，街上的骚动证明，有了“全权”，并不足以牢固地把“政权”树立起来。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有领导的，并且是能起领导作用的。但是在多少情况下，我们看见它滑交，陷入泥潭。只要国家以法国名义说话，就几乎从来不这样，而以法国人的名义说话时，就往往是如此。每一次国家想带动社会，想触动公共部门这个社会里的社会，想打乱习惯，情况就总是这样。

政权并不后退，但是它真正前进了吗？它把头抬得更高，但是它到处受到包围。社会似乎本能地、自动地想用一個相等的、起反作用的权力——一个反权力——制约别的权力。至于用什么来制约行政权力呢，那就求助于一些高度警惕的联合力量，如议会少数派以及大多数新闻机构、乡绅、政治集团、工会等等。为了抵消一个班子的能动性，就设法去剥夺它的行动手段，就像政治把戏的最高原则那样，让参加者互相抵消力量而让对方无能为力。

力量被抵消了的政府

这个互相抵消的法则，甚至制约着政府的职能。第五共和国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工业部长完全可以制订一个工业发展的政策，但是发展的手段却完全掌握在经济部长一人手里；劳动部长无权管理国营部门的工人，而他们是最好斗的；负责研究工作的部长无权过问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工作；负责人口的部长掌握不了住房政策；文化部长却被剥夺了最有力的文化宣传手段：电视及其它等等。最后，财政部长，他具备条件去否决一切，他是决定一切的人。

每一个法国人，在他的心灵深处，随时准备起来反对国家。自从1958年以来，不讲公民道德，从来都没有那么盛行过。表现形式是个人主义。喜欢的是玩世不恭和我行我素；留恋革命和各种反抗，爱好无政府主义神话；憎恶秩序，憎恶警察，憎恶暗探。随之而来的则是要求一种雷厉风行的无情的秩序来对付别人……简言之，这是个强大的国家，可是被捆缚了手脚，就好像古利弗在小人国。社会要求改革，但是一到真正要实行改革，就会碰到强烈的反应。

“太荒唐了”

不止一次，我听见戴高乐将军一面用手拍着桌子，一面叫道：“太荒唐了！”因为他看到一个集团的人顽固地抵制他认为公众所必需的措施；因为法国一切有组织的势力反对人民选举共和国总统；因为法国的报刊大肆攻击他阻延英国进入欧洲共同体。这种感叹他在1940年5月法国崩溃的时候曾发出过，现在仍然表达了他无可奈何的愤慨。

戴高乐不断地碰到制度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惊人的惰力。他的每一个创举都陷入罗网，不是遇上既得权利，便是地位的受益者，或是既定立场。1958年，在危机以后，他成功地修复了某些出了毛病的机构。但是，当他想通过内部的改革，预防疾病，而不是在最后关头去治疗疾病的时候，他所遇到的是，公众漠不关心，有权有势的人敌视，他自己左右的人谨小慎微*。

他想到在企业中建立职工参加管理的制度，整顿国营公司，修改有关公职人员的章程，改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参议院，中学教育实行分科制和高等教育实行选拔的办法。所有这些，他不得不迂

* 这是不是他们的过错呢？不，不单单是他们的过失，因为事情还没有来得及酝酿成熟（参看第四十六章）。

回前进或延期实行。对一个民主社会，能否强迫它实行它所不需要的改革呢？

自然界是外因已经让各种技术魔力制服了，但是人的天性却没有那么听话。安德烈·马尔罗有一天对我说，他在文化方面的活动可分为两部分：物质部分——重新粉刷门面，修复古迹，建造文化宫，举行展览，集中迄今分散的文物，综合展出——在这方面，每一次都很成功；需要精神支持的部分——上面谈到的文化宫的活动，抒情艺术的传播，学校的音乐教育等——这方面的尝试则陷入漠不关心的泥潭，所遇到的是怀疑和不信任。

马尔罗的经验，所有部长都可能有过。教育部可以每天都建立一所中学，但也可以看到每年都有一项改革破产；人们可以制造氢弹，但是，如果不能做到使法国人相信氢弹的作用，那么氢弹就不会有什么用处。人们毫无节制地扩大城市，但是并没有能够把城市变为公民的城市。

无疑地，政权取得伟大成就——制度稳定，国家恢复元气，自己恢复了独立，也给人以独立，经济对外开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王牌；这些王牌，在1958年初，没有人敢说法国会得到的。但是也有失败。这就显示了制度和思想上永远这样僵硬。

民族的基本个性^①

1959年，戴高乐责成雅克·鲁埃夫和路易·阿尔曼分析法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和提出消灭这种状态的办。工作一年之后，他们在结论中揭示出一系列症状，并且开出了药方。十五年之后，不但公共舆论对于当时所揭示的病状始终毫无认识，而且提出来的大部分补救办法一点也没有得到实行。要取消出租汽车司机、药剂师或磨坊主的既得利益吗？如果你相信那些没有把握再度当选的议员的话，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人们连发表这个英明的报告都

不敢。这是一个失败，但比失败更严重的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蹶不振。

要是把法国人害的这种病全面描写一番，法国人肯定不会相信自己就是患这种病的人。我们只看到细节，看不见整体，我们因种种情况而伤脑筋，有时是“商人骚动”，有时是“工会骚动”，有时又是什么抗议骚乱，可是，发烧被当做了病，几吨百叶菜扔到马路上，要比落后的农业给经济带来的累赘更使人不安，几个中学的混乱要比教育组织不善使人更为不安。牙痛发作使人喊叫，而结核病无声无息地腐蚀着人。

往往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实面目，而只凭那些施加压力的集团给我们看什么，就是什么。因此发生了气候颠倒的怪现象。在没有真正危险的情况下，私人利益的代表，大唱他们的调子，我们耳朵就充满了这些声音，因而惊慌起来。当悲剧来临的时候，他们却不吱声了；于是，我们又再做恢复团结的美梦，就像 1914 年 8 月的士兵那样，他们确信要在圣诞节庆祝胜利。

最后，法国的基层，三个世纪以来，差不多没有变动过。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振振有词的教条主义，空想精神，宗派主义非好则坏，敌对集团划地为牢，公民消极被动，他们不时突然造反，对经济增长不理解，以及人口和社会的马尔萨斯主义。总之，三个世纪以来，许多观察家所描绘的一切，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一种巨大的惰力阻挠了和瓦解着改革的尝试。唯一不出问题的改革，就是那些迎合我们个人主义的东西。

对国家的反作用

更严重的是，身体上的病，病势一直不减，而影响到脑，尽管当初认为脑袋可以保住。国家虽然表面上健康，但它实际上虚弱得很。相对来说，他行动稳健的时候就不像步履虚浮的时候那么受

到爱护，一个分裂的政权，如第三和第四共和国那个时候，法国人是不会造它反的。他们反对议会制，但从未真正地威胁过政权。

有一天，我问戴高乐为什么他不喜欢比例代表制，这办法是他先提出来的，然后又抛弃掉。他回答说：“民主不在于把矛盾揭露出来，而在于指明方向。”

我们有这种倾向，认为“民主”的制度就是最能反映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映各种不同而随时变卦的意见，反映各种念念不忘的东西，各种恐慌，各种掌权的欲望和破坏的欲望。这一切都在一个民族的灵魂里荡漾。但是，如果说，民主制度只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一个瓦解中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制度只会更加剧瓦解的过程。

戴高乐将军继续说：“指出方向并坚持下去，这就是国家，特别是首脑的职责。”

但是，需要有一个方向，这是同我们爱好多样化势不两立的，因为，这种需要必然要求简单化，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就不知所措了。

巨大的真空

第五共和国的矛盾，在1968和1969年的双重危机中，暴露无遗。

1968年5月，所有人——首先是那些在内部经历了这个疯狂时刻的人——对国家内形成的真空，感到震惊。人们期待从国家得到一切，但是国家所做的一切，没有一样是被接受的。失望同希望一样大。国家被抽空了内容，只剩下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政府。

这是一个真正法国式的心理悲剧：一件小小的事情——郊区一个学院的社会学系闹事——因为没有人有能力在中间的任何一级加以解决，这件事情给卷到上面去。在真空中，涌进了五花八

门、数以千计悬而未决的各种要求。要求满足了，问题却没有解决。真空一直发展到底，直到国家和它的首脑象征性地和真正地消失为止。局势的逆转是在几个钟头内发生的。国家假装要让位，证明人家少不了它。人们想忘记一切，甚至忘掉他们担惊受怕的回忆。只有戴高乐肯定自己的分析是对的，他设法减轻国家的这种脑积水症，因为他知道这种病的严重程度。他用自己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说坚决而戏剧性地在1969年进行公民投票。

由于想通过推行地区自治，权力分散，社会——职业协商，职工参加管理等办法来重新组织社会，他头一次遭到人民否定：因为他着手治本，而不是治标。法国人很愿意人们把结果去掉，而不是去掉原因。

也许他们认为，当墙裂得太厉害的时候，是常春藤缠住它才不倒的。要让他们改变想法，就需要时间和细致的工作。

个人—国家，冤家一对

社会麻木了，需要使它活动起来或重新活动起来，但是用什么合理的办法，或者通过什么奇迹般的信仰才行呢？怎样打破法国所陷入的这个恶性循环呢？一方面，人民既是消极的，又是不守纪律的，证明需要加以管制，另一方面却是官僚主义，它打击个人主动精神，窒息生命，并且使人民更加消极下去，直到他们怒而不可遏，从麻木的状态一跃而起，投身暴动之中。与此同时，国家从施加压力，转而实行镇压……当初是谁错了呢？是造反的个人，还是逼人太甚的国家？徒劳的问题。个人和国家是冤家一对。

还有挽救的可能吗？我们是不是出生得太晚了，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太老，该退出历史了？法国人的这个病，“法兰西病”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而无法挽回了呢？

第八章 “政权，就是无能”

“政权，就是无能”，有一天戴高乐对我说。这种自相矛盾的话，现在不像以前那样使我吃惊了。我领导过七个部*，有机会证明这是有根据的。关于这种以不现实为标志的生活，我想在这里揭开几幅朦胧的图像，就象突出云海的山峰一般。

1. 官办新闻

第一幅图像就是入门的图像，1962年4月15日，我的前任克里斯琴·德·拉马连纳给我看办公桌上的一排电铃按钮：

“这个是用来叫传达员的，这另一个是叫你的办公室主任的，这一些是叫法国广播电视台主任，广播和电视新闻主任，电台节目主任……”

我当时很天真，感到奇怪，怎能按铃叫法国广播电视台的各个负责人，就好像一个贵夫人叫她的使女一样。

就是这样，每天五点钟左右，你叫他们，以便制订广播和电视台晚上新闻的大纲，你也可以随时用内部电话向他们发出指示。在一点半和八点半以前，不要离开办公室。电视新闻以后，你的同僚们将打电话给你，对他们不满意的地方，给你提出意见。

这个制度从战前就建立起来了，那时，邮电部长是官方电台的

* 这是在戴高乐将军的四个内阁里：新闻部（1962年4月—9月），归国人员部（1962年9月—12月），新闻部（1962年12月—1966年1月），科学研究和原子、空间问题部（1966年1月—1967年4月），国民教育部（1967年4月到1968年5月）；还有在蓬皮杜总统的两个内阁里：行政改革和计划部（1973年3月—1974年2月），文化事务和环境部（1974年3月—5月）。

老板。创始人是让·吉罗都。战争开始时，他负责组织国家的新闻工作，这个制度一直维持下来并日臻完善，从解放以来一直到第五共和国初期，经过三十二任部长之手，其中包括安德烈·马尔罗，弗朗索瓦·密特朗，加斯东·德弗尔，雅克·苏斯戴尔。在同一座楼里，除了部长以外，还有他的办公厅，他的科室，以及法国广播电视台的全体职员。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向自己发誓决不去按这些电钮。但是，五时正，广播和电视新闻主任叫人通报说他来了，说是来“报告”的。我告诉他我没有什么指示，并说明我信任他，也信任在他领导下的记者们；告诉他，如果我有意见要向他提出的话，会在事后提出来。他说：“听候您的吩咐，部长先生。”

第二天，局长在我的桌子上打开新电台大楼的图纸，大楼刚刚竣工。他问我愿意在这个圆顶大厦的那一部分安排我的办公室和办公人员工作的地方，问我同意不同意把部长官邸安置在最高一层？问我愿意怎样布置。

前一天的启发，使我深有感受，我曾经想过一下。我对局长说，既然法国广播电视台在搬家，最好不要住外人。它不断长大，可以成年了，当部长的不必跟它住在格鲁耶尔宫，这个名字当时已经叫开了。

饭厅里的国家

我在几个小时里听说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很好认识，但是已经可以感觉出来了。如果国家广播和电视台在国家中得不到信任，那是因为每一个人认为听“法国之声”少了，而听政府之声多了。不信任的程度是很容易衡量的。对于电台来说，那就是，外围电台非常吃香*。电视方面，外围电视台在边疆省份更受欢迎；在国内大部分

* 一个民意测验公司 1962 年 4 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国家电台广播的所有频

地区,只要没有竞争大家就不看。1962年,法国只有二百万台电视机,而德国和英国分别有一千三百万和一千四百万台——虽然,安装都是在同一个时候开始的。法国的电视,就是饭厅里的国家。

我觉得,为了恢复法国广播电视台的信用,应该给它以更大的独立性。1959年,来了一道法令,在纸面上,把它从简单的一个部属的局改为一个公共事业,但是,原来机关的习惯和建制都没有改变;广播—电视还是直属部长“管辖”,并继续像国家的一个普通衙门那样工作。我的雄心就是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自治的公共企业,就像雷诺汽车公司,或者国家铁路公司那样。

环境并不怎么有利。埃维昂协议之后,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不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法国,地下军组织千方百计使它无法实施。在这个时候,对一个沸腾的机关放松控制是不是合适呢?

但是,我设法争取同意我的这种想法,即必须把事情重新掌握在手里,为此,这只手将来不应该是部长的手。这个想法取得了进展。乔治·蓬皮杜懂得局势对政府有害之处。政府不停地身受无政府主义之害,而无法控制,或者,由于采取轰轰烈烈的独断独行的作法,收不到效果而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在地下军组织的暴力冲击下,我不能不进行我当初许愿不做的事情:不止一个下午,我自己编排晚上的电视新闻。

五个月后

9月初,我开始争取到主要的负责人同意制订一个新章程的想法。突然间,乔治·蓬皮杜叫我,要给克里斯琴·富歇让出位置,富歇从阿尔及利亚回来,他体面地完成了一个危险的任务。

蓬皮杜说:“富歇刚刚告别地中海那一边的黑脚们,我总不能

道只占收听人次的百分之九,外围电台占百分之九十一,虽然它们的广播能力要差得多。

要求他在地中海的这一边去接待他们。你把新闻部让给他吧，你接收归国人员部，我把它提升为部一级。”

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搞清楚部为何软弱无力，最严重的是总免不了三日京兆。撇开新闻部不谈，我运气好，在那里呆了将近四年。至于其他几个部，我呆的时间平均是九个月。九个月的时间，一个部长很少能够培养他自己的儿孙，要是他能够怀孕到瓜熟蒂落，一面照顾着他的前任所遗弃的后代*，那就算十分幸运了。

2. 归国人员，或显影剂

在接待和重新安排从阿尔及利亚归国的人方面，我只工作了三个月。用紧急的行政办法对付紧急的局势。但是我很快就感觉到这样说是不够恰当的。基本上我们的行政效率不足以处理紧急情况。

1961年12月，议会通过了一项基本法，以便有可能在四年之内接待四分之_一的北非居民。立法人并没有想到在几个星期内，恐慌会把差不多所有的“黑脚”赶到我们的海岸，他们来了就不打算再回去了。

因此，9月份，我们就得安置九十万法国人：有要入学的儿童；有要送到养老院的老人；有农民、商人、职工，他们需要重新安置，常常还得让他们改行。这个轩然大波，像显影剂一般，显出法国有多少不适应环境的人。要想出一种新的筹款办法，发起一个新的住房计划，开办新班是多么困难啊！我们小小的过剩的商业，我们落后的农业，在接待这些黑脚时，就像受到侵略一样，黑脚们将靠自己，或者依靠我们的帮助去开一个铺子或买几公顷土地。我

* 我在新闻部取得具体的成果——而且，只是在第二年末了的时候才取得的。此外，由于十分有利的条件，我在科学研究部也取得成果，尽管我在那里只呆了十五个月。

们的行政机构没有充分的准备去介绍情况,引导和保护他们,没有能力给那些伤心的年青夫妇,流离失所的老人和受惊的孩子以他们所最需要的东西,即给他们一点点亲热的手足之情。

这个轩然大波是在夏季爆发的。归国人员部只有二百五十七个员额;1962年的预算是在1961年夏天讨论的,当时财政部争辩说,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以此为理由来低估实际需要……在这个灾难面前,人家给我一千个新员额。签字,发表,招人和分配工作,都需要时间;工作人员11月上任。我马上又要求另外七百个员额直到我自己离职以后很久,这些员额才批下来。

在考验面前,每个人都尽力而为,从来隔阂都没有像现在那样,被打破了这样多决口。从来这个行政蜗牛都没有现在那样敏捷。然而,一切仍然好像停滞不动似的。每天,我们都收到成千上万的信件和要求援助的申请。我们却不能答复。这十二个星期使我确信,如果法国当时比现在更为官僚主义一点的话,那么,黑脚们就还会留在接待站里。但是,他们却能够从制度的空隙钻过去,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依靠他们之间的团结,乘经济高涨的机会,利用我们经济结构开放的一面,大胆地为自己占据一席之地。要说当局对他们有什么帮助的话,那主要是帮助他们得到较大的自由。

3. “法兰西病”的缩影

1962年12月,克里斯琴·富歇把新闻部交还给我,内阁轮回的魔法又开始了:我又恢复了我以前那种生活。

没有什么地方要比法国广播电视台更软弱无能了。它像是公共部门的所有缺点的一个缩影。由于有关新闻、文化和政治的一切问题都是极端敏感的,这些缺点就更为突出了。

像整个国家一样,法国广播电视台须仰财政部的鼻息,而且甚

至比国家的任何其它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艺术家们是不受信任的；事事横加干预使这个机构透不过气来，其心理后果比其真正的影响更为难堪。它给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提供方便的借口，而对另一些人的积极性则是一种打击。人们一再说：“这是财政部的过错”，不管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这个严密的控制并没有达到目的。浪费是大家都不负责任造成的。法国广播电视台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封建官僚主义机构：最不够格的人谁也罢免不了他；编制节目的人自认是屏幕或话筒的终身主人。最优秀的人应得的好处，最低能的人马上也要求得到。一个人得到发展的机会，与其说是因为有才能，不如说是由于他属于某个地下帮派体系。1945年，克罗德·布德担任法国广播电视局长，他曾作过一番描写。现在对他的描写没有必要补充也没有必要删减，他当时说：“它成了许多帮派争夺的牺牲品，这里有政治帮派，也有行政帮派，虽然他们互相仇恨，但是都一致认为，它的首要目的就是养活他们这批人。”

在艺术方面，编导们硬要领导部门接受这样的协议，只要求它对他们承担义务，而自己却不对这个机关负有责任。法国广播电视台无权僱请他们以外的其他编导——如电影或戏剧的导演。但法国广播电视台的编导却可以自由导演其他电影和戏剧，要导演多少就导演多少。各个小集团把他们的节目安排原则和他们的神秘主义强加于人。每一项措施，只要有一个集团反对，不论它多么小，都成为罢工的借口，使节目部分地或全部地中断。

这些压力集团是政治化的；它们在外面总是得到响应。反过来，法国广播电视台也成了外部政治纠纷的应声虫。而一切决定，既然是由政府，至少理论上是由政府作出的，所以在舆论面前，就被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没有一个星期报纸不报道事件、骚乱或冲突。对广播电视没有一个人是满意的，不论是公众方面，或工

作人员方面,政府方面或议会方面,多数派方面抑或反对派方面。

这个难堪的局面难道不足以说明“法兰西病”的病症吗?这个机构是置于政府最高无上的权力之下,但是,权力却无法施展。政府干预一些枝节问题,但控制不了全局。由于它发现事情不妙,就愈来愈倾向于进行干预。公众发现了政府的干涉,就不高兴看法国广播电视台的东西了。政府表面上拥有权力,实际上得益甚少,而受害甚大,最主要的是既咄咄逼人,而同时又软弱无能,也就是说,很可笑。

总而言之,这个公用事业似乎已失去了它的群众。外围电台把它的听众当做消费者看待,认为他们已经成年,有选择的自由。法国广播电视台则把他们当做治下的庶民,认为公家是负责他们的福利的,因为公家判断私人的福利比私人还清楚。等级制度代替了竞争,成了组织原则,公众虽然无法可施,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

显而易见的是,应该让政府退出去,并且建立一个,或者更确切地说,建立几个企业,它们应该是自治的,应该服从真正的负责人,服从认真地设法满足公众要求的人。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领导人,有自己的任务和必要的手段。只有让我任职的时间长些,才能克服机构上和精神上的惰性,才能达到一些目标,虽不是全部。

改革消磨殆尽

首先需要把广播台和电视台分开。它们连结在一起,就好像连体双胞胎,他们的器官都是共同的。广播台主任和电视台主任*只是理论上的主任,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报道的权利和技术手段:记者和工程师都害怕他们的行会被打破,害怕他们的力量会丧失。

* 尽管他们两个都是很有才能的人:吉尔宋和艾伯特·奥利维埃。

他们只是经过长时期以后才屈服的。

我们接着动手建设广播台，从基础做起，那是一些乱糟糟的联播节目，其中没有一套是有个性的。从那时起，有三套联播节目：法国国内电台用于娱乐和新闻报道；法国文化，专门播送艺术、科学和文化节目；法国音乐，专播古典音乐。广播节目的制作人闹得翻天覆地，阻挠改革，特别是第一套节目受到猛烈攻击，说什么，这是“野野节目”，因为想“紧跟”外国电台，我们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平，这是糟踏公共事业等等。但是很快，公众就表示赞成我们的做法*。

为了对付罢工，搞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节目。它在电台经受住了考验：听众们从来没有那么满意过，在罢工的日子里，他们满足于唱片和新闻报道；我们甚至是根据这个原则去安排法国国内电台的节目。这个最低限度的节目，为什么不用在电视台呢？有一次罢工最不得人心，我们事先十分秘密地布置好了广播室，那天晚上，居然从那里进行广播：一些新闻简报和一部影片，这是公众所希望的。听众来信多得我们应接不暇，信里要求：“每天都这样做吧。”这种防范措施是如此有效，以致在五年的时间里，直到1968年5月为止，本来已成为地方病的罢工，在电视观众的日常生活里竟然消失了。

最后，我成功地开辟每天十五分钟的地方新闻节目和设立了二十三个地方电视台**。电台自然抗议这种抽取经费的做法，因为

*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法国国内电台节目从占收听人次百分之九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九。这套节目已经形成制度，正压倒外国电台的竞争。另一方面，法国音乐节目由于没有竞争的影响，也不受民意测验的检验，愈来愈倾向于重蹈行会主义的覆辙；古典音乐愈来愈后退，而胡乱闲扯愈来愈发展，法国音乐变成法国扯淡。这个节目本来为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而设的，而今愈来愈远离他们，愈来愈接近那个以此为生的音乐理论家集团。

** 还不算八个海外电台。

这笔钱本来可以用在本台的节目上……也就是说用在节目制作人身上。但是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外省的报社，因为法国广播电视台将打破许多日报在当地的垄断地位。

攻击是从创办第一种地方电视新闻节目开始的，也就是 1963 年 10 月的里尔电视新闻节目。乔治·蓬皮杜召见我。有没有必要引起这种刺激呢？但是，他很快就同意我的论点：总不能把纯粹是巴黎的生活形象强加于外省人吧。电视地方化是整顿领土的必要补充。

总理成了我的辩护人，他接见外省报社的社长并设法让他们安心。以后，其中的一个社长对我说，要是取消地方广播节目，他们就要以他们读者的名义提出抗议。在所有广播节目中，地方广播节目是最受欢迎的*。

章 程

戴高乐高瞻远瞩赞成这些创举，尽管发生了各种风波——也许正因为发生了这些风波，戴高乐才赞成了。但是他认为，这些创举没有他赞成也行。他不愿意规避任何问题，他拒绝“贱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最后，他同意认为，法国广播电视台成熟了，但成熟了并不一定就成为敌对的了。负责任的，我们信得过的人要比下面的那些没有能力真正掌握这个系统的人要强。

于是，我们在 1964 年春天制订了一个章程，并经议会通过。根据新的章程，建立一个局。这个局不再是由部长领导，而是由一个理事会来领导。理事会主要由有独立精神的人组成，他们的能

* 原来的意图——中央分权——却远没有实现。在我的思想里，各电台应联合起来，而且每日轮流负责一个对全国听众广播的节目。我们的雅各宾主义思想是如此强烈，以致第三套节目，虽然名为地方节目，但播送的却几乎都是在巴黎，由巴黎人为巴黎人制作的。

力和公正立场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局长对他的班子拥有充分权力。局享有财政自治权和事后检查权。一个同“非殖民化”相似的过程有力地开展起来。从此以后，这个章程可以随着企业本身的发展而变化**。

在这个问题上，乔治·蓬皮杜是支持我的。我只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是不得不拒绝按他的要求把新成立的局长一职委托给米歇尔·若贝尔。他对我说：“谁也比不上他。同许多其他人不同，他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技术专家。”我同他一样欣赏若贝尔的才干。但在划清政府和局之间的界限时，是否适宜于把总理的办公厅主任任命为局的领导呢？这将会在心理活动上起破坏作用的。

不管怎样，争取财政上自治失败了一半。1964年8月15日，在冷落的巴黎，“政府公报”刊载了财政部的一个决定。同部长会议和议会讨论的情况相反，它规定，财政上的检查继续事先进行。要财政部收回这个小小的政变是不可能了。它只是在十年之后才同意根据1974年章程，让大家免受这个规定的约束。本来是为了摆脱无人出头的官僚体系而进行改革，结果呢，无人出头的官僚权力仍然给改革打上它自己的烙印。

我还遭到其他许多挫折，我现在叙述其中的两个，这对于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体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 至少在开始时，他们的任命不是作为一个部的不具名的代表（就像习惯上任命国家企业的理事那样），而是作为一些高级人士，他们是以他们的道德权威和他们的独立精神著称的。这一切都在1972年，特别是在1974年分阶段地实行。

** 1963年9月，我创办第二套电视节目；我加速它的建设，我向国民议会指出，一旦第二套节目，然后第三套节目向全国播送，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加速分办的过程，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通过竞争推动各套独立的节目，这些步骤在1972年，特别是在1974年陆续完成。

法 国 之 声

无论你为了工作或是度假而到哪一个海上或哪一个大陆去，从里斯本到温哥华，从开罗到东京，你设法去听听法国电台的广播吧。差不多所有地方，你都会白费力气去转动收音机的旋钮。但是你会收到英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莫斯科电台，北京电台，甚至德国之声在广播，交替地使用他们的语言，用你居住国的语言，甚至用……法语。

本来，我们想要扩展我们的影响，要成为“电台五强”之一并不是难事，而要成为太空、核子和航空第三大国却就难得多了，这简直没法比较。但是，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如何解释这种怪事呢？简单得很。1964年，我曾作了一个预算，需要花费价值二亿五千万法郎的投资。我们当时的广播同……保加利亚的差不多。中国的广播比我们差不多多一百倍，苏联多一百五十倍，美国多二百倍。对于这样的一个公用事业，真正的公众是没有办法表示自己的意见的；因为十分清楚，它是属于国家主管的。但是，由于国家体制的问题，却无人去关心。广播的经费是由“各有关”部负担的：外交部，合作部。可是，它们对这种活动都不感兴趣，因为外交是同各国政府打交道的，而不是同各国人民打交道。

有一种办法，我们把它叫做“罗盘”，表明如果我们让我们有限的发射台连续不断地工作，就可以把收听面扩大十倍。这个想法打动了戴高乐。我们决定，在完成各地区和海外领的电视台装备后，就在兰克都克建造一个短波发射台，然后，环绕地球，建立三个强大的可以不停工作的转播站*，一俟设备安装完毕，开办的经费

* 在凯也纳，对美洲转播；在努梅亚，对东南亚和太平洋转播；在吉布提，对非洲和中东转播；二亿五千万法郎加进第五计划的附件中，这个计划预定在1966年到1970年之间实现。

就要跟上去。

这一切都没有实现。从1966年我离开新闻部以后，我发现，每次想法节约，总是首先从……对外广播方面开刀。因为每天一小时的广播只吸引很少的听众，为什么要付出费用去维持它呢？法国之声几乎沉默了*。

火星入入侵

另一个挫折波及了政治节目。电视台几乎把这部分节目完全排除在外。老实说，1958年以前，电视台没有播送过，以后也没有。没有一个政界人物曾在电视台受到记者们询问，各政党的领导人之间也没有交过锋；意见不同的记者们也没有进行过讨论，甚至连一些微妙的问题也没有播送过。当皮埃尔·拉扎雷夫，皮埃尔·杜马耶和皮埃尔·德格罗普1959年初用头版五栏的位置报道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他们白费功夫想从电视台的档案文件中寻找资料：对此电视从来没有放映过什么画面，凡是有争议的问题，国家宁可避而不谈。

电视应该证明，它反映的不是政府的意志，而是法国多种多样的意见。我要求让·弗兰办一个节目，像美国的那种“面对报界”节目，每月交替地由多数派和反对派的一个人物出来讲话。那是1964年。不久，在电磁波上，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第一次总统竞选。弗拉迪米尔·多默逊主持局的理事会。他大大鼓励我一番，他说，“今天是彻底的绝食。如果所有总统竞选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在电视里露面，人们就要转而大吃大喝。让我们既避免饿肚子，也避

* 非洲一部分除外，虽然那里也没有转播站。另一方面，另外的一个计划却实现了。我发现各部发布的新闻前后不一贯和各有自己的特色。我希望设立一个国家通讯社，像在西方各大民主国家所设立的一样，以便协调各部门的新闻政策：这就是部际新闻联络处，虽然设备有限，但发挥了一定作用。联络处的领导人是雅克·勒帕雷特。

免大吃大喝吧！让我们使法国人适应一种折中的办法，那要更健康些！”

计划同习惯是那么截然相反，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人们于是决定把执行时间推延到总统选举以后。

1965年11月中旬，法国人在吃晚餐的时候，看见火星人登陆了：五个人从容不迫，妙句泉涌，把他们不满意第五共和国和它的首脑的想法，倾筐倒篋地说了出来。电视观众感到十分吃惊。不止一个人心里想，那个大逆不道发言的人离开广播室时，会不会被抓起来……

尽管有这些挫折，新设立的局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权力有人在行使了。出乎众人意料之外，新的领导人确实在领导工作；特别是，他们善于使机关恢复信心，并且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当然批评家是不会因此罢休的。现在，再谈什么“烂摊子”是不行了，于是就谈“帮派”。此外，电视台和广播台当时的推动人，有男有女，确实很有才干，我曾经有机会加以衡量。我认为，他们对电视和广播，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政权只有给某些才能以发展的机会，允许选拔值得信任的人，给他们一个任务，并且让他们完全负起责任去执行任务，才能成为有力量的政权。

第九章 国家大脑

1. 官办研究

在总统选举后，科学研究和原子、空间问题部交了给我。我负责这个部门十五个月之久——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发现：研究部门经过仔细观察，病确实很重了。

在法国，研究工作是国家的责任，因此，这个部门理应是最有创造性，最灵活，最有效能的；但是国家有什么毛病，它就有什麼毛病。同国家一样，这个部门是中央集权的，我想说的是集中在巴黎的：三分之二的设备、经费和研究人員集中在首都附近。同国家一样，它是分隔开来的：每一个部都有自己的研究所，自己的研究員，他们不屑或者害怕互相沟通。同国家一样，它是官僚化的：研究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不能罢免的官員，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探险家；“研究奖金”对所有人都是一律的，不论他们有没有发明创造：“发明奖金”从来不发。同国家一样，它也有预算：在一个财政年度里，动不动就来个突然的仲裁。在匆促突然决定预算的春天里，霜冻多于甘露。除了这种国家病以外，还要加上社会病。我们的研究人員有忽略经济生活的倾向，也就是看不起他们的研究工作如何应用于实际的问题。他们热中于研究——这是很自然的——物质的奥秘，大自然不可捉摸的变化，数字的秘诀等。但是，如何利用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即使让其他人去利用，在他们看来，似乎都太辱没了科学和他们自己。

当然，国家关心给这些同我们思想有关的毛病对症下药；但是，药还是国家的药，因此，从思想上来说，是属于同一个传统的。

国家掌握了补救的权力,结果呢,却没有力量补救。我们有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设法克服各大学实验室分散的现象;有科学技术研究总代表处,设法克服各部划地为牢的状态;有原子能委员会,在核子的特定范围内,设法把基础研究和民用、军用方面的技术应用,结合起来;有国家太空研究中心,设法发射卫星和把它们应用于某些方面;然后又有研究部长,设法统一和推动一切。他的头衔是很有气派的,但事实上,他的力量很单薄:他是财政“封包”的分发人,封包里的东西是由别人去使用的,或者是一些封建机构的托管人,而这些机构具有脱离一切控制的倾向。

协调协调人

这些名目繁多的机构是为了补救无休止的分散,而分散总是由集中来补偿。除此以外,我又采取一项根本办法,即为这些名目繁多的机构另设三个机构,我觉得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可以争取议会支持一项促进研究工作的政策。国家海洋开发中心是为了使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等的工作比较有系统一些,他们原来分散在一百四十个实验室里,彼此完全不相往来,每方都靠微薄的经费勉强维持,而把有用的研究工作撇在一旁。国家研究工作促进会是为了发现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并为其发展提供经费。电子计算和自动化研究所是为了开展“计算计划”^{*}。

十年之后,所有这一切留下了些什么呢?我觉得结果是很令人失望的,特别是因为当时成绩似乎比较出色:三个崭新的机构由议会提出并通过,并在一年之内付诸实施;“计算计划”开始实行了;太空计划予以扩大,内容多样化,并致力于研究实用的卫星;合作

* 在我的建议下,任命了罗伯特·加莱为驻电子计算部的部际代表,任务是建立法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在此之前,他在建造皮埃尔拉特(铀的同位素分离工厂——译注)工作中表现得十分出色。

制造一个欧洲发射器的计划也重新拣起来。同联邦德国进行科学合作*，同苏联进行科学合作**，同西班牙进行科学合作***；研究经费逐年增加百分之六十——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没有。这些成就引起科学界的惊奇。应该说明，我主要是靠谁取得这些成绩的。财政部长米歇尔·德布雷对研究工作充满信心。他以他的最大热情支持我，因此，在国家的曲折渠道中，我的计划能够快步前进。

“到 1968 年，我要有氢弹”

进展迟缓，我在研究机构本身发现这一点。1966 年 1 月，戴高乐就已提醒我：

“你去查一查，为什么原子能委员会造不出氢弹来。简直没完没了！人家刚给我解释说还得等好几年。我顶多只能等两三年了！这七年任期，我完不了。我那时得站出来，以便保证成功。但是，我呆不到头，只是在走之前，我一定要进行第一次试验。你听明白吗？这是主要的。在五个核大国中，我们是否要成为唯一达不到热核水平的国家？我们是否要让中国人赶上我们？要是我在的时候办不到，那就永远也办不到了！我的后来人，不论他是那一边的，都不敢冒犯那些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产党人，老处女和神甫肯定要嚷嚷的。这样我们就会呆在门口。但是，如果进行了第一次爆炸，我的后来人就不敢不把武器造出来。

——您给我多长时间呢？我问他。

——最迟到 1968 年。”

我双手举了起来，表示无能为力。他最后说：“你去想办法”。

* “交响乐”卫星，格雷诺布尔的冯·劳·兰泽文研究所的高流喷射发动机。

** 塞普科夫的气泡室，使用“塞坎姆”法。

*** 范德洛斯核电站。

有了这个命令撑腰，我向原子能委员会的领导人进行了传达。他们都叫了起来：“完不成任务呀！”^①当时预定，只是每两年，向珊瑚岛组织一次实弹演习而已；因为需要把我们大部分舰队调到太平洋，然后第二年到布列斯特进行整修。1968年，也就是说下一次行动，因为1966年的一次已经全部就绪了。

海军的这种大规模出动，以及每两年一次的环游世界是不是非常必要呢？看来把装置放在缚住的高空气球下爆炸，可以使污染几乎等于零^②；监视可能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容易得多^③。我们可以每年夏季进行一次实弹演习，因而，时间看来可以缩短一半。

当时，人们向我提出了两个新的反对意见。氢弹需要大量的铀 235。因此需要等待皮埃尔拉特工厂全部开工。特别是，要把计算搞好，就必须依靠巨型电子计算机，美国人却拒绝交货。然而，英国人进行了热核试验，并没有用铀 235，只不过用了钚。我们当时已经大量制造钚。另外，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都没有用巨型电子计算机去进行他们最早的热核试验^④……于是，人们对我说，加速试验一点用处都没有：试什么呢？我们并没有掌握方法。我们甚至不知道从何处找寻这个方法。我只能像戴高乐那样说：“这个我不管，你们想办法去。”

有时，在部长会议举行后，戴高乐将军向我喊道：“怎么样啦？你的氢弹呢？”我设立一个“氢委员会”每个月都召集原子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秘密开会^⑤，我们共同总结所取得的进展。人们老向我提供一些心虚理亏的证明。热核溶化这个谜还没有打破。但是可以加速制造一个“改良”的原子弹^⑥；这将是一种改进了的核裂变。这样就可以达到五十万吨级。这不是百万吨级，但是从单到双，谁看得出差别来呢？可是，这种玩意儿是不能搞的。美国的飞机，苏联的“拖网船”在我们的珊瑚岛海面巡弋，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威慑力量是容不得掺假的。

隔墙赏花

人们在黑板上列举出数字来,使我愈来愈认识到我的无知:显而易见,我不懂,将来也永远不会懂得高能物理。但是我懂得一点科学历史,并且知道,大部分发明不是一些专家们关在他们的专业小圈子里作出来的,而是一些头脑清新的人,他们能够从邻居墙头上望过去,并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保持一定距离。有一天,我找总负责人罗伯特·赫什,他是一位聪明而干练的高级官员,他顽强地设法克服一切惰性。我像多瑙河农民那样天真地对他说:

“既然我们的班子踏步不前,我们要把他们换掉:我们的研究人员多年来碰了壁的地方,其他人无疑会找到路子的。让我们找一些有新思想的人吧。法国和原子能委员会都不缺这种人。

——可是,我们的班子并没有失职!他们是第一流的,并且尽了他们的能力去工作!撇开这些研究员,就等于毁了他们的前途。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罗伯特·赫什同意我对我们各自职权的想法。部长规定目标,保证提供必要的手段,发出明确的指示。总负责人完全负起执行的责任,对他的评定将根据成绩作出。但是,这里,我觉得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这个困难属于我思考和行动的特定范围。二十一年前,戴高乐创设了原子能委员会:“首先是为了制造炸弹。”他对我一再说。他任命了约里奥·居里负责这项特定的任务。“约里奥竟然答应了!他对我说,我的将军,您的炸弹,我一定把它给您造出来。我回答他说:那么,你就是高级专员。”在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原子能委员会集中了可观的智慧和手段。但与此同时,它却有点变成衙门了。正如一切大的机构一样,它愈来愈不是为它的任务而存在,而是为了它的人员而存在。研究员变成了官员。他

们是为本身的存在而存在——就像上帝一样。这就是本体论的论点。官僚主义现象像结石一样，使他们的创造能力瘫痪。他们职业前途有了保障，把持禁脔，拥有既得权利，谁也别想动他们一根毫毛，即使他们毫无发现。

又一次，我们深深触及到“法兰西病”的病灶。我越看这个优秀的机构集中了法国大量的最高智慧，我越觉得我猜到了为什么它总是止步不前，不能推进政府交给它的头号任务。这丝毫不是因为“个人”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制度的逻辑问题。由于门户之见，来自其他方面的人就受到排斥。一方面是科学家：他们也许具有所要求的想像力，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敌视军事研究。另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特别是军备工程师，他们很愿意接受挑战，但是他们缺少研究人员的训练和成功所必需的思想方法。他们之间的竞争由于“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宗教战争而加剧。在同一个班子里，由于各科目之间互相隔绝，综合工作陷于瘫痪。人们固执地把数量上的因素电子计算机，舰只的数目，裂变物质，放在优先地位，而把质量上的因素改善专家们之间的联系，集中分散的因素进行新的组合，放在次要地位。在研究工作关键所在，摆上一个人，让他领导所有科目，配合起来取得成果。科学情报的传递不是根据对工作是否有利，而是走的等级道路。研究工作上的重大抉择不是根据对物理的深刻了解去决定，而好像是级别最高，资格最老的人就是最有学问的。

科斯山的牧人

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罢手不干的恶性循环开始了^⑦。在最高级方面，愈来愈多地谈论到必须放弃热核计划，集中精力去成批制造以前决定的原子武器。原子能委员会的班子在这种压力下灰心了，障碍变得更加不可逾越^⑧。必须打破这种循环。

我要求我的科学顾问^⑨设法找一个能作综合工作的人,显然我们缺少这样一个人。有一天早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诉我说:“我也许有一个你想要的人。一个年青的物理学家。他很迟才开始学习,但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他的学历。”我接见了。他的经历是不平常的。战争夺去了他的双亲,他们原籍是俄国犹太人,本世纪初定居法国。他的父亲死于奥斯威彻集中营。年小的孩子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不得不放弃学习去放羊维持生活。他在科斯山的一家农民那里干活,当初是这家人收留他和养育他的。到1944年,他对自己说:“我已到了考高中文凭的时候了。”于是,他决心准备考试,一面读书,一面看羊,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第二年,他考进了国家技术职业工程学校,名列第一。他的老师对他说:“你应该进科技大学。”一年以后,他进了科技大学;毕业时得第一名,并且给自己改了个法国名字:罗伯特·多特莱。从此以后,他在沙克莱原子能委员会的另一个实验室工作,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这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的形象:一个特别富有天才的脑袋,能够迅速掌握综合工作^⑩所需的各种科目并且支配它们;懂得综合分析的语言,并能对这些分析进行对比。我劝罗伯特·赫什把这事情的科学领导权交给他^⑪。在他周围,我们组织一个新的班子。罗伯特·赫什巧妙地设法解决微妙的人事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如此一种改组*必然会引起。

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多特莱以他晶莹无瑕的智慧有系统地审查了各项研究工作,这是军事应用领导部门为寻找热核溶化的解决办法而进行的,他还审查了其他可能的假定。在有可能考虑的

* 莫里斯·舒曼1967年4月,在这事发生时接我的任。他是一个明白的人,因此一秒钟也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措施同他的前任人背道而驰。虽然对于一个部长来说,这种诱惑是很大的。在留出时间给自己对局势进行全面分析以后,他肯定了我对罗伯特·赫什所作的指示,并有力地对付因这个改组而引起的反抗。

一系列办法中，他觉得综合物理现象是个好办法^⑫，由于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证实了这一点。几周之内，综合办法拟订出来了。确定了需要深入进行的研究工作，并开始行动，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这个方法上^⑬。他既不需要巨型电子计算机，对于富铀也好，皮埃尔拉特工厂^⑭也好，也都不是必不可缺的……1968年8月，戴高乐晚年感到快慰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了爆炸头两个氢弹^⑮。

这里也一样，权力只不过是能够选择人，给他们规定一个目标，并让他们负起责任实现这个目标。

2. 治下一千三百万人，“你要在那里呆五年”

1967年4月，新政府上台，戴高乐将军和乔治·蓬皮杜把国民教育部交给我。我第五次被推到一个我不愿要的部里当领导——第四次被剥夺了我以为正在完成的工作。戴高乐将军忘记了十五个月以前曾对我说过的他要在任期期满之前离开。他对我宣称：“你要在那里呆五年。”但是，他想起了未来是属于上帝的，于是又谨慎地说：“至少你当做这么一回事去工作。”

他还对我说：“要让大家接受分科和选拔的办法。”他之所以给我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交给我这个任务，而且知道事情不好办。这个任务并不使我感到厌恶，我认为，给那些受完义务教育的学生指出方向和选拔学生进大学，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所必需的部分，目的在于给我们一个负责的国民教育部，掌握群众教育，而不是被它压垮。当然，还需要小心地规定方法：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这个方法只能是自由化的。需要管理的群众更使我担心。法国教育部门有八十万人员，管理一千二百五十万大、中、小学生。除了红军和通用汽车公司以外，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事业了。但是，这样一个比较只能说明人数的规模，而丝毫不能说明领导他们的方法。红军服从一种铁的纪律；通用汽车公司包括许多单位，每个单位

都服从毫不容情的市场法则。所有的法国大学，如果好像它们的创始人拿破仑所想的那样，是维持在一个准军事政权之下的，或者好像在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分为许多独立的单位，它们之间进行真正的竞争，因而得到鞭策，那么，整个来说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但是法国的教育受到保护，既不受纪律的影响，也不受竞争的影响。这种规模的事业，如果是根据互相矛盾的组织原则办事：目无纪律和垄断，统一和个人主义，那么，它怎能行得通呢？一个公职人员可以攻击他的上司，而对他却无可奈何，甚至触犯他一下都不行，难道这是合理的吗？

教育不过是两个字：多少？

教职人员——或至少是他们的代言人——害了一种数量狂热症：更多的教师，更高的工资，每个教员少教一些学生，少上一些课，有更大的校舍，总而言之更多的钱，那就一切都好了。例如，几年前，那些农业组织认为，要是要求提高土地生长的产品的价格，而又不接受任何结构上的改变，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我确信，问题不再在这里。当然，教师和经费仍然缺乏，但是所达到的增长率是令人满意的。今后，再少作一些也不行，再多作一些也不行：从幼儿园到中学，国家，也就是纳税人，已经为了每一个青少年的义务教育，花费了相当于每个人脑袋那么重的纯金。剩下来要解决的是质量问题。因为，如果衡量一下*我们的成年人，在读了十年书以后，还保留多少大、中、小学给他们灌输的知识，那么，对于我们教育的价值，一切幻想就都破灭了。我们有着进行群众教育的人员，但是我们保留了培养尖子的教育组织，教学大纲，教学法，教师的培训办法等等。结果是，我们既不搞大众教

* 例如，就像伯特伦·施瓦茨所作那样。

育，也不培养尖子。自从 1939 年以来，大学生的人数从六万增加到七十万；中学生从三十万增加到五百万。但是，没有任何改革*触及教育的本质。是着手做的时候了。

1967年4月，下一学期的一切措施已经定了，谈不上再作任何更改。因此，我为自己定下1968学年的目标，但是我还没有等到这个学年来到，从1967年5月开始，我组成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工作组，1968年2月正式改名为教学法改革委员会。我亲自领导他们思考；学校生活经过了深刻的改变，我们着手为它确定原则。人们唤起学生自发的兴趣；有系统地采用积极的方法和让学生自觉遵守纪律；每天都进行体育锻炼，特别是集体的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实行教学半天制或至少三分之一天制，可以每上三或四小时的课，就插进一些体力、艺术、技术上的活动。教学大纲将予压缩；在大部分学科中，教师讲课改为放映纪录片和组织学生对影片进行讨论。学生在口头、笔头和艺术表达能力方面受到训练。自觉遵守纪律和民主选举在班内得到发扬。教师在实习班经过特别训练，他们受到鼓励发挥他们的想像力和主动性。这个计划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不过想看看一个半世纪以来教学法有什么新发现，从中汲取教训而已，我们的想法，在参加这个工作的教学人员中引起反应，使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指望得到有力的少数热情教育家的支持。

争取时间做自己的盟友

与此同时，我筹集经费着手进行试验。我觉得在一个行会主义的、政治化的制度中实行硬性改革是不可能的。要是遭到破坏，或者虽然也执行了，但毫无积极性，这个计划就会软弱无力了。最

* 计划是有的，但是由于它们触及到许多方面，而总有一个方面反对，因此计划就行不通。

好还是依靠志同道合的人合作,共同进行一些示范性的试验,从而带领大家仿效。

从1968年开学时起,根据这个新的样板,每个区开办一个小学;每个州开办一个中学;每个学区开办一个公立中学。1968年3月,校长、州长、学区督察员接到邀请,找寻可以进行这种试验的学校。在一年的时间内,试验受到密切注视。第二年,进行试验的学校增加一倍,下一年,再加一倍。五年到头——我的合同期限——经过逐渐重新审定和修改后,改革就可以在全国推行。

关于这个循序渐进的方法,我同那些教育依靠群众的拥护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觉得我同他们*很接近。但最初,他们并不热情。

“既然你想改变学制,那就干脆点!他们对我说,怎能接受这种不平等呢:几个出色的点施行革新教育,而千百万儿童则继续读死书?”

无疑地,他们身受某些“试验”之害,这些试验很快就放任自流,迷失在飘渺虚无官僚主义中,官方教育则一点也不想追随它们的榜样。他们害怕,由于国家三心两意,好的主意很快就会完蛋。从几周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们并没有想错。我能不能承认他们是对的呢?暂时,我深信,由于学年延长到十六岁,和规定所有人必须受中等教育,教育事业受到很大震动;不能再经受一次硬性和全面的改革了。因此,事情要慢慢来,要争取时间做自己的盟友。1968年5月风暴使我们取得一致……

* 例如,马塞尔·巴泰雍,安德烈·伯奇,和弗朗索瓦·瓦尔特,他们三人负责“保卫青年学生协会”。除此以外,还有教育家,儿科专家,心理学家,他们组成教学法革新委员会。

大学在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关头

关于各个学院，我继承了一项改革，这个改革是全面的。克里斯琴·富歇原想改革学士制。各个机关准备并颁布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规定从1967年开学起，实行一个单一的样板。这些试验表明，一方面是太过分，而同时又太不够。

对于那些可怜的学院，那是太过分了。它们没有能力去进行这项改革，它们当初就不欢迎这个改革，甚至根本不同意。搞文学的由于人家把一种制度强加于他们而感到恼火，因为这种制度是理科人员所设计的，并且是为理科人员而设计的。教授们的合作是保证事业成功所必不可缺的。但是我们却得不到他们合作，他们大多数人不相信，或者不愿意那么做。

与此同时，这又太不够了，不能满足大学生们模糊的愿望，改变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个院系互相隔绝，不知姓名的人群冲进梯形教室，学习脱离实际，论文注定让灰尘盖起来，毁了整整一代青年。

最糟糕的是，这一次“自治”的尝试是头一次，又搞的很乱。这一改革虽然规定各个学院自行确定在校学生的同等学历，但是一出现困难，院长便向部请示，部又回过头来让他们自治解决。因此，这个稀奇的制度，既不够集中，又不够分散，造成时间损失，决定混乱，学生和教师普遍不满。

“选拔”制使不满情绪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我看来，设法让年青的高中毕业生进大学学习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我拒绝接受一个粗暴的和消极的选拔制度，即“大学全国会考”，一种统一的超高中考试，这是国民教育部和财政部各机关梦寐以求的。从教育学上和精神上来说，这都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来说是行不通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具有爆炸性，所以我们——在爱丽舍宫，马蒂雍宫和教育部之间——就这个问题，秘密进行工作。因为我们秘密进行工作，所以谣言到处流传。大恐慌变得有根有据。在这个问题上教师和学生都同样害怕，家长也害怕。今天是“富歇改革”，明天是“选拔”制，学习受到干扰——家长们都同样担心，都同样反对。

再一次表明，权力乃意味着无能：有权发布一项改革，但无能加以实行；有权让国家把数十万年青人的前途攥在手心里，但是这个权力很快就变得无能，因为没有任何过渡的办法。

敌对的、坚决的小集团形成了。他们的作法是积极的，起化学反应催化剂的作用，它的所有成份都是从外面来的。由于大家都不满意，所以这些革命者成为不可触犯的。他们长期这样下去，从根本上动摇着国家的基础。

南特尔样板，南特尔坟墓

对高等教育也一样，在我看来，前途正经历着根本上新的试验。

1968年3月底，乔治·蓬皮杜和我决定，我们将于夏季关闭南特尔大学校园，那里的骚乱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但是在这一年内采取任何硬性的措施，都有引起爆炸的危险。在开学的时候，我们把它建成一所样板大学，它要像一个公共事业，置于一个理事长权力之下，理事长则由一个负完全责任的理事会监督，理事会包括高等教育界人士和非教育界人士，理事由政府根据各人的专长选任。这个样板大学在行动上和经费上，享有真正的自治权。从这个试验出发，就可以逐年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大学网，设法吸收最好的学生和最好的教员，因为，这里具备最好的工作条件，最好的管理办法和有着最好的名声。

这个网始终不曾存在过。1971年，大学重新陷入困难和暴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我的接任人奥利维埃·吉扎德阐述了我的想法，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要求我主持一个思考委员会*：我们制定了“大学分科补充法”，因而有可能建立一些同统一样板不相同的大学；并创办了康皮埃纳大学，这是第一个按我们特别样板建立的大学。但是这个原型是孤立的。所有样板，如果没有人去仿效，长此下去，就很可能完了。

1968年3月，我选择了南特尔，恰恰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互相隔绝的、不负责任的制度统治着法国大学，而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表明它更加无能。但历史比我走得更快，炸弹在我能够或懂得拆除雷管以前，就爆炸了**。

* 这个委员会从1971年3月到6月在国民议会文化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办公室聚会，以我为中心。它包括大学校长尼沃和马宁，布里柯教授，法国广播电视局局长德·布雷逊和法兰西电力公司总经理马塞尔·波瓦特，原子能委员会的财政主任雅克·吉斯卡·德斯坦和埃尔夫-埃拉普石油研究所所长贝尔纳尔·德拉巴尔姆。

** 1968年5月事件在大学里是如何发动和发展的？这需要特别的一章来说明。把一切都说出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第十章 误会

1969年9月16日这一天，当雅克·沙邦—戴尔马两步就跨上讲坛的梯级，用他锋利的声音念了几段讲演词，大家就知道议会要经历过去所谓的“大场面”了。所有的演员都在场，所有的，除了爱丽舍官的那一位以外。

封闭的社会

“我们加速转变所引起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这个复杂的事实……我们今天背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总理两只手按着讲台的边缘，由于他的演讲而十分激动。

“国家到处伸手，而又没有什么效能。由于它的职权无限地扩展，它逐渐把整个法国社会都监护起来……解放以后，法国的复兴，使一种科尔伯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老传统得到巩固，国家成了一个新上帝……”

在这个议会内，从1958年以来，无疑地没有一个人这样激烈地深入分析过这个国家深陷的困境。直到1958年，政府的不稳定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问题。在改革制度和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后，继续动摇法国的困难或痉挛，就愈来愈显得无法解释了。1968年5月以来，这个问题是无人不谈的了。新政府既然这么认真地作出了诊断，它能治好法国这种脆弱性吗？

沙邦继续说：“这些畸形和这些缺陷反映了仍然是古老的或者太保守的社会结构，甚至思想结构。我们不可能进行改革，最多只

能装装搞革命的样子。”

这种语气打动了人们的心。卡佩尔院长俯向我耳边说：“就是为了听这个，我才争取当选的。”

“在一个民族的一生中，除了做梦，它很少有时间自己问自己：我想在哪一种社会里生活呢？我觉得，我们是接近这种时刻了。我们可以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一个繁荣、朝气蓬勃、慷慨和解放的社会。”

这是一个伟大的七年任期的伟大纲领，或者更确切地说，两个或三个七年任期的纲领。但是，一任总理只负责领导大家治标。沙邦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自由去掌舵，像他宣布那样去治本呢？

“虚假的印象”

多数派向他欢呼；反对派保持一片沉默。但是有迹象使人认为，鼓掌的多数派内心是有保留的，而沉默的反对派却不大隐瞒得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赞成的。议员们流水般慢慢走出去，大家混在一起。突然，在议员之间的亲切气氛下，流露出不同的态度来，在公开会议的场所，这种态度是被掩盖起来的。

“我再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才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乔治·巴兰杰快活地私下对我说，“对待第五共和国，他比我还要严厉。”

好像回声一样，加斯东·德费尔*大声地说给大家听：

“这是对我们政权多好的檄文！我要为它当辩护士！”

弗朗索瓦·密特朗走过来说：

“这是中间派的演讲，本来可以让左派来发表。他大大抬举了我们。但是他给人一个虚假的印象；他没有说出现在宣布的必须

* 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

做的事，为什么十一年来这个政权却一点也没有做。”

“戴高乐派”议会党团在保留给他们的科尔伯特厅举行了不公开的会议，总理没有来，气氛愈来愈紧张。

“沙邦并没有回答法国人提出来的真正问题！菲尼斯特尔的一个议员喊道。他对政治和社会的形势，缺乏认识！他向我们谈2000年，而乔治·塞盖伊*刚刚宣布：现在是另一个1968年5月的前夕，这个七年任期将是短命的！”

同伴们鼓起掌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府这个声明显得不合时。为什么躲在长远的梦境里，而眼前的情况是那么危急？有人叫道：“应该逮捕塞盖伊！”这个议会党团是法国本身的一个缩影：总是有人提出一个极端的方案，也总有群众加以嘲笑，群众是智慧的泉源。

“他解放了社会”

另一方面，南斯的议员罗杰·苏夏尔掀起了大家的热情。他是一个没有胡须的抗战分子，十六岁就被流放，从那时起就一直效忠戴高乐，他不是老油条，他说：

“硬说戴高乐封闭社会，这是侮辱他，侮辱我们！相反，难道不正是他把社会解放出来吗？他使宪法得到通过，保证我们获得稳定，是他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通过非殖民化使我们成为第三世界的朋友，是他结束了学校战争，使我们赶上我们的时代，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保卫他的事业，让他的事业传下去，我们不能把它看做是无效的、落空的！”

这篇演讲，议会党团把它当做自己的演讲，这个受到伤害的戴高乐分子每次发出呼声，他们就有节奏地热烈鼓掌。

* 总工会总书记。——译注

我心里想：“虽然充满了被压抑的紧张关系，但这是一个忠实的多数派；正如在家尽管争吵不休，但仍不失为恩爱夫妻。”

几个月后，罗杰·苏夏尔就尝到了“封闭社会”的苦头。由于无法取得巴黎衙门同意把东方高速公路拐向南斯，他懂得了，他是不会得到人家同意的，除非他策动一次危机。但是危机失去了控制；他在他发起的部分选举中失败了。怎能一方面动员选民反对行政当局，而同时又支持政府呢？要知道政府是理应指挥行政当局的。让—雅克·塞文—施雷伯轻易地把他抛在后面，因为他既反对行政当局同时又反对政府。

当时，赛纳—滨海区的一个议员设法扭转局面：

“我不明白！我刚刚听了最有名的记者的意见，如雅克·弗维，让·费尼奥等，他们都说，从孟戴斯·弗朗斯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好的演说……”

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然啰！沙邦捡起了左派的想法！”

“他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挑选他的合伙人！通通都是统一社会党的！请看结果如何！”

我想插话：

“当然，戴高乐打开了许多枷锁，不幸的是，并没有把所有的都打开。他想建立职工参加管理的制度，这本来可以加速解放的，但他失败了。现在我们应该走得更远，更远得多，沿着我们在戴高乐将军身边所开创的道路走下去。为什么‘封闭的社会’*这个词使我们害怕呢？又不是我们把社会封闭的。”

大家听着我说，差不多没有人吭声；我再坐了下来。弗朗索

* 这个词是 1959 年由一个美国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创造的，他把这个词应用于第四共和国，而特别是第三共和国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确实的，但也不尽然；这主要是米歇尔·柯罗兹埃进行的分析，以这个词作为总结。

瓦·密特朗所用的字眼又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总理演讲的虚假印象无疑地是因为这种使人头晕目眩的差距造成的：一方面是纠缠着人们的现实，使人不得不接受那种非好则坏的想法；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些思考，旨在打开人的思路，推翻成见。

“只有个人和法国”

过了几天*，乔治·蓬皮杜在爱丽舍宫接见我。他准时请我进去，这是四点后，三个小钟同时敲响了半小时。这儿供奉的神道是一成不变，分秒不差，就像布雷特尔馆收藏着公尺的标准那样。总统换了，但是副官们依然是准确性的长老。我得到通知可以谈一个钟头。于是，我经不住这种诱惑，居然谈到问题的本质：“沙邦的声明吸引了我，他有远见……”

总统没有回答。他询问我议会党团的情绪如何，我的委员会和我的选区情绪如何……我借一个冷场的机会，又回到我的话题上。他故意拖长时间不做声，然后喘了口气：

“封闭的社会，新社会……这是让一穆林俱乐部的老调。”

这个俱乐部是由出色的高级官员和大学教育界人士组成的，他们不同意戴高乐将军的行为。戴高乐将军谈到这个俱乐部时说：“往往人们设法让官员们在白天工作，但是，让一穆林俱乐部却有办法让他们在夜里工作。”

总统接着说：“你想像一下，吉夏尔在第一轮选举和第二轮选举之间把德洛尔的一篇东西交给我，措词同沙邦的演讲差不多。我在页边写了点东西，大意是：社会是不存在的；只有个人，和法国。但是，德洛尔在遭到我拒绝以后，居然能把那篇东西塞给沙邦**。此外，他本来也会把他的东西兜售给波赫尔，或德费尔，或杜

* 1969年10月7日星期二。

** 雅克·德洛尔自己向我明确指出：“1969年总统竞选时，我担任职业训练部秘书长的职务，我有责任采取严格的保留态度。我禁止自己干预候选人的事。”

克洛,如果他们在第一轮选举中领先的话。这些官员们,他们是高明的。对他们来说,谁是傀儡都无所谓,他们总是能够牵线的。”我说:

——这无疑不是一个在竞选中受欢迎的题目。但是,既然我们有时间,为什么我们不着手做呢?

——每个人都认为时间已经到来,该做点什么新鲜的事了!人们永远做不出什么新鲜的事来!这是青少年的幻想,或者是浪漫主义者的幻想。白纸是永远没有的!人们应该满足于把别人开始织的花毯继续织下去,而且必须按照原来的花纹织!一个新社会?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就是它那个样子;应该同它共处!没有什么事情比鼓动法国人想入非非更坏了。这并不是法国人希望我们做的事。要么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们,他们把我们当做哗众取宠的人或变戏法的人,这同我们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适得其反。要么就是他们相信了我们,以后发现他们受了骗;他们不会原谅我们的。我们应该有现实感!

他确实是坎塔尔家乡的人,像玄武岩一样坚硬,像栗树那么茁壮。他又沉默下来,犹豫要不要走得更远。

“沙邦上当了。他用一个夏季的时间去准备这篇稿子,然后,他把稿子放在这张桌子的一个角落(他用食指指着那张路易十五式的书桌的一角),就在发表这篇讲稿前几小时,好像这只不过是一篇事务性的讲演而已。他把它从口袋拿出来,放在那里,讲稿叠成四摺*!我只能怪我自己:我没有把它打开……他把他这件事办得很粗鲁。他想要我担保一个我一无所知的计划。我怀疑,即使

* 雅克·沙邦—戴尔马这一段经历同乔治·蓬皮杜告诉我的情况稍有不同:他责怪自己“忘记了给(他的)办公室注明要送一份演讲稿(到爱丽舍宫)。在最后一分钟,有人向他提出了意见,事前爱丽舍宫曾含蓄地提到这一点。他赶紧把稿子送去。②”但是他自己也感觉到,从那天起,发生了裂痕。

在第三共和国或第四共和国，一个总理要发表这样重要的讲演，会不事先在部长会议上告诉总统。但是，我不愿让事情成为一个自尊心的问题。总而言之，沙邦的野心同他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他知道，在这个七年任期里，他至少会有一个接班人，也许还会有两个。我头一天就告诉他了。请看，他在这里却打开一个二十年或三十年的远景规划。可是，在1970,71,72年，他将干什么呢？他要别人相信他什么都改，结果是什么也改不了，他把梦想分给大家，散播失望情绪。但任务很简单：我们有一个目标，它压倒其他的目标，那就是使法国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应该不要分散力量，实现这个目标，其余的就会随之而来。”

我争辩说：“但是，正是为了使法国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光是建立工厂是不够的；应该分散决策权，消除隔离屏障，缓和对立情绪，一句话，解放社会。”

“有把国家和民族炸掉的危险”

——那么，你以为可以同时什么都做吗？如果人们把墙和锁炸掉，也就有同时把国家和民族炸掉的危险，好像1968年5月差一点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些想法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的想法，他们想把国家毁掉。应该由国家来领导。你要记牢，只有我们这些戴高乐派去捍卫国家。我们的敌人想看到它被消灭掉；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维护它，首先就是保住它。有了这种开放、改变的思想，就会引起风潮，最后自食其果。要说开放嘛，我作过了。我向独立共和党和中间派*发出了呼吁。我不仅仅满足于保卫共和联盟，虽然从算术上来说，它是绰绰有余了。因为，如果一个总统只能依靠一个政治组织，这是不健康的。这个政府的成分已经预示着下届立法

* 民主进步中间派的“中间分子”（雅克·杜哈梅尔，雷纳·普勒文，约瑟夫·方丹尼，阿基利-福尔，斯塔西）在选举乔治·蓬皮杜的时候，参加了多数派。

选举可能有什么结果。但是，我们不要走得太远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一句话也不说：显然，他又要发起进攻。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演讲中，沙邦大谈社会，但他一次也没有谈到民族，更没有谈到国家的权力吗？好像这些词会刺痛他的舌头似的。但是，法国首先是一个民族，然后才是一个社会：它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才建立起来和继续生存下来的，而唯一能挽救这个民族的是它的国家。今天这个社会又一次在我们眼皮底下腐烂，我们差不多完全无能为力。至少，让我们尊重和保护那些还站得住的东西：国家和民族，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让我们重新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让我们坚持下来，使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整体，一个可以自由作出决定的整体！如果我们抛弃了刚刚恢复起来的民族国家这个遗产，如果我们害怕使用这些概括我们的信条的字眼，我们就会帮了反对派的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只背诵没有消化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把戏中，我们总是要打输的。搞得亲痛仇快，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当人们采用自己对手的政策，使自己的选民吃亏，人们就会失去自己的选民；而保住他们要比重新争取他们容易得多。反对票是拉不过来的，向他们证明自己软弱，只会鼓励他们反对自己。拉拢反对派并不能把他们笼络住，相反地却使他们更大胆。沙邦在国民议会中拥有五分之四的大多数。在任何一届共和国里，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宁愿得罪这五分之四，而去讨好那五分之一！这个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当人们拥有大多数的时候，就应该把它保住！”

我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总有点东西确实受到封锁。那就是改革的办法。当反对派和工会的实际力量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封锁的效力，就像在联合国或者在任何董事会上所说的那样，权力就受到封锁。除非反对派表示同意，否则，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一个以微弱的多数选出来的总统，无疑地，在我们的情况下，事情

总是这样的，他就注定无所作为，或者只做反对派所同意的事。要是人们选择的办法是让两类不可和解的法国人互相对峙，那就注定动弹不得。为了使国家得到发展，首先应该恢复团结一致。

——也许。但是要是这样的话，我怀疑是不是宁可无所作为，而不做反对派命令我们去做、我们的常识又要我们去反对的事。担当无所作为的罪名并不可怕。为什么养成这种非动不可的怪癖呢？当我们周围一切都在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平衡，避开暗礁，不要沉船。在科学发现和革新以及国际交流的旋风里，重要的恰恰是在变局中保持自己的本色。因为，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变动总是要发生的！要维护我们的基本准则！的确，要有勇气去抵抗那种语言怪癖。”

“人们把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理想化”

“请看我的总理，他也一样，有他的社会计划。不过他忘记同我谈就是了。这种左派的胡言乱语是叫人无法忍受的。要搞这种可笑的时髦东西，可不要来找我。还有，人们谈论法国人的时候，就像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似的。但是，要是这样的话，他们自己会知道的。另外，差不多三个世纪以来，人们把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理想化了，最先是孟德斯鸠。他让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情报局摆弄。这个社会是金钱社会，是属于寡头政治的，看不起穷人，而且，至少是同我们的社会一样保守，有它自己的永恒不变的规矩。它有着重大的、不人道的、无法容忍的缺点。它正在腐朽没落，正是在它到处发生破裂的时候，人们却要把它当作典范！改变社会，这就是说，要彻底地换血，要把五千万法国人赶出去，然后代之以五千万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就是他们那个样子，他们以后仍然是这个样子。医生不会对一个病人说：‘先生，你是多血质个性的，这不合适，如果你是多胆汁个性的，我就可以把你的病

治好。’医生治病，是不考虑病人什么个性的，他们并不设法改变他的个性。只要能够，他们就尽力治好他们的病。

我大胆地说：

‘可是，你不相信法国人会自我更新吗？当然，人们不能指望吹口气就改变他们的个性，但是可以改变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制度，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的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1959年，实行新的制度和加入共同市场，就引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我们的病经过治疗已开始见效，例如政府不稳定和闭关自守所引起的病。’

——你以为法国人变了吗？他们方式变了，也许生活方式变了，但是思想没有变。另外，他们本能地懂得变的危险。他们想像着，当进行一种大家所希望的改变时，这种改变本身将会引起无止境的一系列变革，这是当初人们不愿意要的，或许是没有料想到的。他们以此类推，认为事物的秩序就全要打乱了。首先，法国人是保守的。这就是所说的保存自己的本能，请你想想。我嘛，我认为这是健康的证明。你总不能对法国人说：由于你们的思想和你们的民族文化，你们不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民族了；我们要改革这一切。你要去向他们宣传文化革命吗？我们又不是在中国！”

“圣杰曼·德普雷*的语言”

他使劲地挥动一下手，好像要把幽灵赶跑似的。

“不，如果说法国衰落的话，这不过因为法国仍然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而农业在现代世界里，同工业比较起来，重要性小了。不要枉费心机了。我们的原料没有其它国家丰富。英国和德国没有条件发展农业，它们工业发展得更好。我不是说什么也不能做，我

* 圣杰曼·德普雷，巴黎一个区的名字。——译注

是说不能同时什么都做。不能分的比收的多,买的比卖的多,也不可能把经济增长的收益同时用来集体投资和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要有选择。我选好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让我们落后的工业赶上去,创造就业机会,来容纳农业现代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这是一个很具体、很现实的任务。但是不要向法国人谈什么法国的民族缺陷。这没有用。一个民族是不大愿意让人家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的。我对法国人说:‘让我们把法国工业化吧。’他们会理解我的。什么‘封闭的社会’,‘新社会’,‘新社会公约’,‘变革’等等,这种语言是很能适应巴黎知识分子的,因为他们连公牛和母牛都分不清。让他们在圣杰曼·德普雷高谈阔论去吧;但是不要硬说可以用这些小玩艺去统治法国。”

那个副官不断地推开门缝探脑袋,这个守时的旗手准是坐立不安了。

总统继续说:“法国人就是他们那个样子,沙邦也好,你也好,我也好,都改变不了他们。改变一个人改变不了,却想要改变五千万人!管理法国人,就是按照他们今天在这里的情况去对待他们,设法不让他们干蠢事干得太多。”

我想到孟德斯鸠,乔治·蓬皮杜刚刚认为他害了崇英病,而把他否定掉。但是孟德斯鸠很明智,他劝告大家注意,不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民族,生动活泼,和蔼可亲,有时候冒失,常常轻率,但却有勇气,慷慨,坦率,有某种荣誉感,那么,不要想用法律去制裁他们的缺点,这样才能不妨碍他们的优点。”这就是自古以来所说的分清莠莠的寓言,不过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罢了。

“我要稳定局势”

总统站起来,用他那沉重的步伐送我出去。

“老板就是我。戴高乐将军留下给法国最好的东西就是总统有最高支配权。要是让最高权力重新回到赛纳河那边，容许由马蒂雍宫，而不是爱丽舍宫采取重大决定主宰前途，眼前就等于是国会重新占了上风，而政党制度又会死灰复燃，内阁将再度不稳定。这就是重复第三共和国初期的恶运。我既不做麦克马洪，也不做朱尔·格雷维。我要维持局面！”

在门后面，有两个人等得不耐烦了。那就是雅克·沙邦—戴尔马和瓦勒里·吉斯卡·德斯坦……在离开爱丽舍宫时，我想，一出悲剧的布景已经摆好了。总统和他的总理之间互不理解，就像总理同他必须依靠的议会党团之间互不理解一样深。在一篇演讲的背后，有多少误会啊！

戴高乐多数派十分错误地控诉沙邦，含沙射影攻击戴高乐将军。同样错误地，反对派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听到了对第五共和国的最后判决。第二个误会证实了第一个误会。多数派的保留态度，只有总统发出紧急呼吁，才会得到克服；我那时知道不能指望这个了。总统的保留态度要更为复杂：在这样重要的一点上让步，就等于承认马蒂雍宫对爱丽舍宫的优势地位；但恰恰是总理把总统置于既成事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如果一定要事先得到同意的话，他一定会遭到断然拒绝。

为了使人不得不接受“新社会”，沙邦的热情能否最后战胜蓬皮杜的固执呢？如果前者想让他计划得到实现，他唯一像样的机会，就是有一天取代后者的位置。但是，为了有机会当选总统，他就得把他的计划收起来。这是现体制所要求的逻辑。正像戴高乐有一天在我面前拿罗马帝国的安东宁的逻辑来作对比那样，继承人要取得“继子”的地位，就必须避免反对他的“继父”……

要说奇迹，那就是尽管有这样根本的分歧，但没有引起更大的争吵。在总统的身旁，就是这个总理三年来忠诚地为法国服务；而

到了那一天，人家向他提出要求时，他就毫不迟疑、毫无怨言地离开马蒂雍宫。在临终前几个星期，乔治·蓬皮杜最后一次到外省旅行，到了波瓦蒂埃，他在奥利维埃·吉夏尔，雷蒙·马塞林和我面前，就沙邦—戴尔马和他的新社会讲了话，他的话是这样充满了豪情，他似乎描绘出一幅光明的远景。

他们彼此对自己的信念都一样真诚：一个认为必须改变社会，使它做好准备迎接二十一世纪；另一个认为应该维持民族和国家。也许，1969年，这两个人搭配反了；总理的眼睛盯着长远规划，总统则设法躲开眼前的覆辙；为制度着想，总统应着眼于远景，总理则应注意道路上的绊脚石……

理所当然，总统占了上风。他确实保证了法国得到从未有过的工业增长。但是，正如他曾说过那样，不过维持了局面。新社会依然是神话，封闭的社会则是现实。

第二部

罗马病

第十一章 “伟大的世纪”—— 没落前的全盛

路易十四，两只鹌鹑和夏尔·戴高乐

这是1963年5月在琼扎克。戴高乐有计划地访问我国各省，走遍了夏兰特。市长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说道：青年时代的路易十四，有一次要到圣让·德吕兹同他的未婚妻相会，途中曾在这个城堡里逗留，现在已成了市政厅。在指给我们看的桌子上，他曾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只鹌鹑。

戴高乐将军欣赏这些追忆：通过它们，他觉得法国历史向他迎上前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试探他对这个“伟大君主”的想法。饭后，我便和他攀谈起来，有意引他说话。

我大胆地说：“多么可惜，路易十四没有保持他青年时代的本色，在他同西班牙公主订婚的时代，他是想把事情搞好的。但不久，他就只想到耀武扬威，打仗，加剧专制制度和集中权力来满足耀武扬威和打仗的需要。”

戴高乐没有表示惊奇，也没有表示不耐烦，他用调羹在他那杯咖啡里搅拌了一会，没有回答我的话。然后，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

“你太严厉了：说这种话很时髦。我并不认为这样。路易十四

使王权获得尊严。他时刻关心法兰西国家的伟大。他制服了封建制。

——为什么要制服封建制呢？投石党叛乱被粉碎了，封建主已经不再能威胁国家了。路易十四只须让他们呆在各自的省里就可以了。他们本来可以在那里成为有用的人和参加建设……但是建设并没有搞起来。

——你责备他活在法国和活在他那个时代吗？换一个人会不会做得更好一些呢？我就不信。”

戴高乐将军承认，迫害詹森教徒和撤销南特上谕是个错误；他承认，外交和军事上的冒险导致了许许多多挫折；但是，基本上，他认为路易十四的朝代是个伟大的朝代。他赞成路易十四加强中央集权*，压缩各省、市、议会的自由，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政策把法国的血放尽了。

林中空地周围的黑暗森林

在几乎所有的外国历史学家眼里——从编写学校教科书的一直到进行最专门研究的历史学家^①——路易十四没有什么宏图大略，只不过想别国的君主和民族向他屈膝：他蹂躏弗兰德斯，荷兰，帕拉蒂那，雷南各地区，奥斯特盆地；他炮轰热那亚和布鲁塞尔；他强迫其他国家承认法国大使的领先权；他侮辱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他撕毁条约；他许下诺言，以后又总是反悔。为了纪念伟大的路易铸造了打扮成罗马皇帝形象的勋章，骑马的塑像，布满了凡尔赛宫长廊和天花板的壁画，这一切显示了什么呢？那就是君主们躬身朝拜太阳王。他想使法国受到尊敬，但结果只不过使法国受到憎恨。

戴高乐想使法国受到尊敬，同时让法国受人爱戴。他对于什

* 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正如我在上面说过那样，从1966年起，有了变化。

么是伟大有完全另一种想法：所谓精神上的伟大就是和平的发扬光大，就是帮助人类和各民族得到解放。他怎能为相反的事出力呢？

当然，他提出减轻罪状的理由为路易十四辩护，并没有错。专制制度，撤销南特上谕，这是时代精神使国王不得不这样做的。戴高乐就是在“伟大时代”、“伟大君主”的形象下长大的。在伏尔泰之后，一直到很近的一个时期，法国历史学家把这种形象灌输给法国人。共和国的官方历史编写人甚至还进一步灌输这种思想。权力集中的君主国就是雅各宾国家的前身。这些神话是我们文化本身的一部分。路易十四同路易十三一样，科尔伯特同黎塞留一样，他们安息在民族神话的先贤殿里。谁敢触犯他们的光荣，谁就没有好下场*。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视力上的幻觉。在很长时间里，法国的历史就是巴黎的历史——历史本身也中央化了。从没有文化的乡下人到忙忙碌碌的资产阶级，外省人是不大谈他们的历史的。唯一提供见证或写他们回忆录的人是所谓“优秀分子”的那部分人，他们受到宫廷和城市的吸引，就像灯蛾扑火。文化是从首都传播出去的，因此首都永远垄断着文化。

需要有米歇莱的直觉才能感到外省“衰弱和暗淡”，才能猜到为什么“这就是各省的命运，既中央化而自己又不是中央。似乎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削弱和抑制了他们”。但是米歇莱内心是赞成中央集权的，所以他马上就安慰自己说：“不要把法国分割来看，而要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正因为中央集权十分强大，所以削弱了地方生活。②”

* 为了补救起见，人们找到了替罪羊，其实咒骂路易十五，是很错误的，因为，正如皮埃尔·加克索特清楚地指出那样，他的统治显然比路易十四的统治造成的灾难小一些。

这种削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大群历史学家*就开始加以描写和解释了。给养，疾病，时疫，犯罪，监狱，疯癫，死亡，宗教活动，文化爱好，思想情绪，以及人类生活和活动的其他许多方面，直到那时为止，差不多为传统历史所忽略的，都进入画面了。随着视线的伸展，在凡尔赛明媚的林中空地周围，出现了一片黑暗的森林。

布蒙着眼睛

有几个见证人，不是显赫人物，但有洞察力，他们感觉到史诗下掩盖着悲剧**，他们提出的警告没有人听。例如吉·帕廷曾警告说：“穷人们等不了人家来解救了，所以他们在法国各地纷纷病死，穷死，因受压迫、贫困、失望而丧生……我觉得那些托皮南布人***虽然过着野蛮的生活，但要比法国的农民幸福。”③到今天，人们还不知道费纳隆 1694 年曾给路易十四写了一封勇敢的信：“您的人民正在饿死；田地几乎荒弃；城市和乡村人口减少；各行各业凋敝，养不活工人。所有商业倒闭。您国家的实力给您毁掉了一半……整个法国只不过成为一个凄凉的大救济院。”④

费纳隆看到了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的情况，只要肯把鼻子伸到凡尔赛外面去****。他看到了混乱，猛烈的骚动。但整部正规的历

* 例如编年史学派，包括费尔南·布罗德尔。但是也有一群有才干的研究人员，像菲利普·阿里埃斯，伯尔塞，皮埃尔·肖纽，弗朗索瓦·克鲁泽，米歇尔·富科尔，弗朗索瓦·弗雷，皮埃尔·古伯特，埃马纽埃尔·勒罗瓦—拉杜里，罗伯特·曼德鲁，让·马捷沃斯基，奥里维埃·马尔廷，罗兰·穆斯尼埃，德尼斯·里歇，皮埃尔·德·圣-雅各布。

** 有眼力的观察家，如沃班，博瓦吉尔伯特，海·杜沙斯特勒，卡佐·杜哈莱一家中的某些人，尼科拉·德马烈等。拉布吕耶尔的见证太有名了，用不着援引也知道。

*** 巴西的一个部族。——译注

**** 确实有两个法国。费纳隆——确切地和根据最新的研究材料——描绘了法国内地许多省份的不景气。但是法国沿海地区有几个港口的公司朝气蓬勃，蒸蒸日上。

史却千方百计不去看这种情况。

国王，他的大臣，他的朝廷，他的官僚机构却若无其事：“这种虚荣使您硬了心肠，您爱虚荣超过爱正义。您活着，好像眼睛蒙上一块致命的布。”

1710年，费纳隆写了第二篇文章，叙述了法国悲惨的局面他大声疾呼，表示他的忧虑：“人民只不过靠奇迹才活下来；这是一部又破又旧的机器，过去人们怎么开动它，今天还是那样运转，一旦遇到障碍，它就会碰个粉碎……人民过的是非人生活；现在不能再指望他们忍耐下去了，因为他们被折磨得无以复加。损失了三月份小麦收成的人再也没有活路了，其他的人也濒于……由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所以他们也就不怕了。”^⑤

巨大的优势一点一点地失去

今天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路易十四——或者他的王国——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倒是荷兰，英国，瑞士，瑞典在差不多相同时期的情况——他们方向相反。然而恰恰是这种情况揭露了我们美化法国历史的倾向。路易十四好像是这样一个人，他希望把法国放在高峰上，永远不再落下来，除非历史发生了意外，如1870年的失败和1940年的崩溃。然而，法国今天之所以不过是个“中等国家”，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相对的没落造成的——同另外几个国家比较而言。这个没落历时三个世纪。路易十四“伟大的世纪”只不过是没落前的全盛。

在黎塞留统治下，法国成为或重新*成为天主教第一大国^⑥。当路易十四选择他的尊号叫做“至高无上”，他只不过强调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三百年以后，在二十世纪中叶，这个优势剩下

* 在第十三和第十四世纪的不同时期，法国就已经是这样了。

了什么呢？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吗？这个地位，英伦海峡彼岸那个国家自 1814 年以来就以此自居了，莱茵河彼岸那个国家自 1870 年以来也以此自居了。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吗？这个主导地位已越过了大西洋，或者走向乌拉尔那边了。巴黎只不过主宰一个削弱了的、经济增长率很低、停滞不前的民族*，一个为永远不平衡的政治制度所折磨的民族。

然而，这种没落远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一个民族可以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即使它的繁荣的泉源早已枯竭，就像一颗熄灭了的星，它的光还一直传来。十八世纪的欧洲带着法国的印记。直到大革命为止，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包括俄国在内，都没有那么稠密的人口。法语取代了拉丁语而成为国际语言，法国有足够力量可以同欧洲联合起来的所有国家对抗。它不止一次做到这一点。从路易十四个人统治初期以后一百五十年都是这样。法国人的巨大优势是一点一点地丢掉的，就像资本溶化那样。

科尔伯特的典型失败

现在姑且不去解释，为什么在十七世纪中叶从法国开始的运动竟一天天衰落下去，而其他的运动在它的周围却向前发展。这儿只需要指出一点，这种沧海桑田的变迁恰恰在中央集权和管制经济的体系在我国奠定下来的时候；同时捐税沉重，这是必需的，因为要建立一个到处伸手的国家机器和支付穷奢极侈的君权开支。优秀分子无所作为，主动精神受到打击，贵族的偏见使非出身高贵的人几乎不可能提高社会地位，最多只能封为贵族。由于反经济

* 这个现象常常不受经济历史学家的注意，因为按人口计算的平均增长率并不太坏。这不过是一个错觉。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拿人口猛减的经济当做资本，而这种经济则是人口猛减的一个主要原因（参看下一章）。三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停滞是显然易见的。只要比较一下长期以来法国的生产总值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生产总值，就可以知道了。

的偏见,这些僵化的优秀分子无法从事商业、工业和银行活动。另外还有津贴,官位的收益,捐官制度,没有能力采用新方法等等,这是沉重的负担,由于朝廷的豪华排场,长期以来把这一切掩盖起来。

在路易十四的后面,有一个体制,它以一个人的姓氏为名,那就是科尔伯特。但是“科尔伯特主义”在科尔伯特之后还继续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它还继续统治着我们。科尔伯特以前只不过是一种衙门经济的象征。然而,从十七世纪起,这个体制导致了轰动的经济失败,其中有着对我们时代有现实意义的教训^⑦。

科尔伯特追求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同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或者二十世纪的计划社会的幻想相比:那就是使王国繁荣起来,办法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驯服的工具,去执行首脑合理地采取的经济措施。在驯服这一点上,他成功了,在繁荣方面,却是另一码事。

一个国家强大才能富足,富足才能强大:既然财富包含在金银之中,而土地又不生产金银,强大的国家就应该使自己具备手段来取得它们。法国输入少,输出多,它损人利己地发了财,只要别国不打同样的算盘……

在这个计划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自然的。从一个强大的民族中,国家本来应该汲取它的力量。国家把一切力量收揽到自己方面,使民族衰弱无力。因为,当科尔伯特提到国家时,他并没有想到民族,没有想到它工商业的生命力,没有想到它自发的和革新的蓬勃发展,而只想到王国的官僚机构,指挥和控制一切活动。

科尔伯特决定一切,他大量地颁布法令,规定木材开锯的规格,布匹的宽度或者蜡烛的重量等等。他不愿意配合,而要创造工商业活动。随着他档案里的计划出笼,他设立无数的公共事业:“皇

家工场”，“皇家铸造厂”，“皇家兵工厂”，“皇家公司”等等。个人的主动精神用不着问都是可疑的，只有加以限制和控制，才能容忍。经济用墨斗划上线，改过来、改过去后，成为“法国式”的，就好像那些法国式花园那样。

国家管制经济本来是为了杜绝舞弊而采取的措施，但通常的结果却是助长了舞弊。它守住了某几个城垛，但总是忘记了另外一些。像科尔伯特主义那样助长贪污渎职的体制是少有的。^⑧

这一切使大家顾不上冒风险去做英国人所谓的“生意”：银行，大商业，大工业——只有这些能奠定真正的繁荣；正如当时在北欧发生的情况。

起瘫痪作用的干预

科尔伯特的不断干预最初引起幻想。纺织品生产中心恢复了生气，例如，诺曼第的“细布”，皮卡迪的“拍式织布机”，博维的“小哞叽”，兰格多克的呢子等。但是生产始终恢复不了路易十三时代所达到的水平。在铸造金属、黑白铁、优质钢等方面，法国人技术落后，一直到二十世纪还是这样，常常要向外国，有时要向敌人买大炮；皇家工厂只要津贴一停就一蹶不振。那么，领导这些单位的人呢？他们因为得宠所以摆在那里，他们靠的就是得宠。他们为何不用更多的时间去博取上面的青睐而去改进技术和推销产品呢*？至于皇家工人，他们没有多大热情。

对外贸易呢？它要成功就必需在王国周围筑起关税壁垒，同时还不要在其他国家遇到任何关税障碍。这种条件完全是空想，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强烈反对。我们的贸易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宫廷慷慨建立起来的公司当初不可一世，以后便逐渐破产。

* 例如，博维的工厂是由一批无能的人领导的^⑨。

法国是由国家垄断一切主动权的，结果大大落后于它的各个对手。在他们那里，国家让私人企业完全自由行动。从1683年科尔伯特死后，国营企业不是苟延残喘，就是奄奄一息。奇怪的是，私营事业却马马虎虎维持下来。新地岛的鳕鱼和托尔法的明矾给圣马罗某些船主带来的收入，要比科尔伯特的所有公司* 给皇上赚的钱多得多。皇家公司——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国营企业——由于官僚主义横加干涉和僵硬的规章制度而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为了进行同样的交易，私商则迅速成立“公司”，租赁船只，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通过千百条私人的渠道，同伦敦，同阿姆斯特丹建立可靠的联系。如果主顾要的是廉价的薄细布，私商就绝不会把耐用的呢子拿给他们，尽管这是科尔伯特通过朝廷敕令详细规定如何制作的。

不信任的社会

这样，法国主要仍然是个农业国，但这是因为不想动，事实上也不动。农业是法国人认为自己的长处，但从这个时期以来，却成为他们的短处，原因是技术落后。农村收入需要提高，才能刺激制造业；商业需要繁荣，食品价格才能提高，农业才能得到鼓励提高生产率。这些微妙的结构，英国人和荷兰人本能地猜出来了，因为有了发挥主动精神的自由，本能就变得更为敏锐。凡尔赛君主制度却不顾这些结构，因为它们不合乎教条；另外，由于君主制度是专制的，所以还加以禁止。

为什么用了这么大的力量，所得效果却那么可怜呢？这是因为科尔伯特制度，整个来说，使人产生不信任，它是从不信任出发建立起来的。技术专家的空想缠住了科尔伯特，他自己是“唯一他可

* 某些公司为了避免倒闭，从本金中抽钱分红；而英国或荷兰的公司每年给它们的股东分红百分之二十。⑩

以信任的人^⑪”。

商人和制造商到处饱尝国家不信任之苦，于是对国家也就不信任。他们不信任那种怀疑多端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向自由和私人利益开战；皇家官员阻挠自由贸易；这些大臣的手下善于发财致富，可就是没有让法国富裕起来^⑫。

这个灾难，一直到 1732 或 1733 年*还可以感觉到它的后患。要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科尔伯特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同样地，要把这种完全幻想出来的繁荣归功于他，也是天真的。科尔伯特更多地是一个样板的代号，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他那个时代的官吏具有同他一样的成见：他们陷入这个制度里面，想向前推进，企图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结果，却进一步加剧这一灾难。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只不过是行政的一面：这是两个可以对换着用的字眼，可以用来指同一个等级制度的随便一个侧面。

怎样衡量衰落

就像两列火车以不同的速度，在平行的两条轨道上行驶，一个国家可以同自己比它向前进展了，但同别的国家比较却在后退。法国的变化不应根据它本身的增长，而应更多地根据它的各个对手的增长去加以估计。西方最富裕的国家被许多其他国家超过了*，而他们本来是远远落在后面的。法国一直落后，只出现过两次例外：路易十五和拿破仑三世在位的时候。奇怪的——也是有意义的——是，这也是三个世纪以来最受诋毁的两个时期。

荷兰，英国，瑞士，美国，英自治领，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所有

* 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发生严重的不景气。因此，不能把责任推给科尔伯特。但是荷兰人，继而英国人，继而瑞士人和瑞典人，通过商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危机，在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中，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 在人口密度上，然后在人口上；在每个居民平均收入上，然后在总产值上。^⑬

这些国家,在这个或那个时期,都经过工业革命和农业变革。法国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经历这种革命和变革,而且是缓慢的和局部的。法国是在走路,而别人则是起跑和冲刺。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三个世纪以来的统计数字:法国几乎总是落在北欧国家的后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拿我们最经常的对手来比较,虽然我们人口增长要比英国缓慢得多,按人口计算,英国和法国的生产差距在十七世纪末已经相当显著,而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就更加拉大了^⑭*。1800年,法国工业仍比英国工业多生产百分之七十,人口则为英国的百分之三百。但是,法国工业已经落后了。1810年,法国只有二百部蒸汽机,而英国有将近五千部,人口却只有法国三分之一^⑮。英国工业在商业的带动下,增长得迅速得多,在1821年就赶上了我们。到二十世纪初叶,生产比我们多百分之六十^⑯。

拿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斯堪的纳维亚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情况。法国在按人口平均产量上和每平方公里产量上本来压倒它的北部和东部邻国,逐渐地,情况颠倒过来。按人口平均,产量似乎后退得比较缓慢一些,这是因为统计数字隐瞒了这一点:法国人口同它邻国人口比较起来像冰消雪化。这个障眼法掩盖了那种可怕的后退。

从自我陶醉到自虐狂

我们在一步步地衰落,而我们闭眼不看,自己骗自己。我们的错误思想里面,最难根除的是我们对自己的错误估计。太阳王,在他面前各国人民顶礼膜拜。大革命的军队把自由带给各国人民,拿破仑给自己加冕,教皇为之瞠目。尤金妮帝后主持苏伊士运河

* 确实,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方面一样,1850年和1870年间,差距明显地缩小了,这是第二帝国时期,是奢华时期之一,也是臭名昭著的时期之一。

通航典礼；克里蒙梭率领世界第一流大军打了胜仗。那么多的通俗画，从小学开始，就给小法国人去看，让他们相信，从黎塞留后的三百年，充满了法国的伟大。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王子的选举胜利表明了法国人民的倾向，他们总想把历史变做传奇，然后在那上面制订他们的政策。滑铁卢给忘记了，大家都投票赞成奥斯特里兹之战。

我们从自我陶醉到自虐狂来回摇摆，都是说不通的。直到十九世纪末，我们继续相信我们依然是个“大国”。1815年的经历还不够，还需要经过1870年，有些人才开始想一想了。但是还得等七十年，我们才真正明白过来。那是在色当第二次大败之后，也就是国家在打击下开始醒过来的时候。从那时起，没落思想侵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灰心丧气，而恰恰这个时候，这种思想是再也说不通了。……

要是从1871到1913年这个时期(第三共和国最美妙的时期)法国经济的增长和西方十二个工业国的经济增长^①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法国同意大利和西班牙一起，居于末位。每年总生产的增长率要比带头的国家美国少三分之二。从1913年到1938年，工业生产后退了，尽管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②。一直到了1949年才恢复1929年的生产水平。

1939年，法国还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已经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了。从1945到1950年，法国从废墟中重新站了起来；要说废墟，它没有联邦德国或联合王国那么多，也没有它们恢复得那么快。1958年以后，从指标看，进展一直迟缓：如电话，高速公路，电视机，技术水平等等。

法国并没有真正的起色

这样，1945年以前，法国并没有真正起色，真正的起色只是

1954年以后,特别是1962年以后才明朗起来。三个世纪以来,法国勉强地建立一些工厂,但是,并没有形成思想习惯好让这些工厂得到蓬勃发展;它赌气不要大商业;货币政策同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它所作的只是没有前途的冲动。长期以来,加速的动力是那么少,而拉后腿的煞车却那么多,因此它的工业化是一种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工业化^⑩。

失而复得的阿尔萨斯的冲击

这个情况同原有的想法相反,无疑是显得太暗淡了。有人会反驳说,法国两个“伟大世纪”的文明是很先进的。的确这样:用粉红色大理石建造的特里亚农宫殿;无比华丽的路易十五式家俱;欧洲所有君主都来向我们哲学家请教的活泼的思想,以及到处都使用的法国语言。这证明了法国当时以它的风格、文学和艺术,占居着支配地位。可是同时,我们大多数省份却对付着过日子。一场晚霜或一场淫雨,就会形成一场灾难。法国披着光荣的外衣沉睡。当大革命和法帝国震撼整个欧洲的时候,英国,荷兰,瑞士从路易十四以来就拉开了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不久以后,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差距也跟着拉大了。

法国的士兵1918年进入阿尔萨斯,他们许多人都十分吃惊地发现到处有自来水,下水道,电力,电话,社会保险机构等等。阿尔萨斯从1870年到1918年并入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改变了面貌。法国同这一部分失而复得的领土比较起来,就好像落后了半个世纪。然而,天蓝色的军装引起了欢呼。解放了的阿尔萨斯人重新找到了他们的祖国;法国士兵则发现了现代世界。

第十二章 人口江河日下

法国人相对衰落首先可以很简单地从他们的人口数量上来衡量。但是这一个尺度，法国人却没有加以采用。我国人口增长停滞不前，我们大致断定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或者，严格点说，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前后开始的。一般说来，我们不知道这个现象在十七世纪就已开始出现。但是知道到了大革命的末期这一现象越来越严重，成了灾难。

这个发现是最近的事，同样地，历史学家对人口学发生兴趣也是最近的事，他们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一个民族历史兴衰的标志和决定因素。*

1. 人口衰落，令人吃惊

第一次认真尝试作出估计的人是沃班，他在1707年发表了他的工作成果**。提出了一千九百万居民的数字，无疑地比路易十三时代少，甚至也比菲利普·德瓦洛瓦时代少。1648年和1662年之间，1693年和1695年间，在整个王国内发生人口悲剧性下降；

* 1965年前后，研究工作发生了一个转折①。开始比较清楚地看到人口变动和经济及社会平衡之间有着模糊的相互关系②。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地方历史研究工作③，通过各省的文献资料，修改、检验或斟酌以往所作的部分总结，例如，默维的直觉认识是有启发意义的。虽然有计划地对教区注册进行研究，也只是到了今天，才能明确人口变动的情况。国家人口研究所1975年得出了出色的成果，正在陆续发表。④

** 他的根据是1697年和1700年间，在博维利埃公爵发起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这个数字（大概涉及五十万平方公里，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为三十八人左右）。雅克·杜帕基埃认为，应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二千一百万，即等于密度四十二人。

1709年和1720年间再度出现。八十年内,法国人口踏步不前,每平方公里大约只有居民四十人左右。

这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现象,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但由于它的长期影响,已左右着今天法国的局势。

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人口无疑是有所发展的,但这并不是所说的“人口革命”^⑤。人口到1740年前后本应达到二千四百万,1790年前后应达二千八百万。在绝对君权统治的一百五十年内,法国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比起它本来有可能和应该增长的,差得很远。

根据1806年的人口调查,数字是比较准确的。1790年人口约为二千八百万,到1810年增至三千万,到1850年增加到三千六百万。然后一直到1946年,人口才最后超过了四千万。

不幸得很,这一有限的增长,很快就变为微不足道,但却掩盖了出生率的猛降。因为死亡率大大缩小了,寿命可以希望延长二倍,甚至三倍。这样,死亡的灾难转移了地方:出生率从千分之四十降至千分之十九,几乎同死亡率一样*。法兰西民族正在走进坟墓^⑥。无论资产阶级家庭也好,农民家庭也好,两个孩子——甚至独生子——已经是普遍现象。到了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比重减少。只有外国移民能制止人口衰落的现象。

法—英竞赛

世界只有相比较的历史。法国人口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它在工业文明中竞争的对手比较起来,是怎样变化的呢?

从中世纪到“伟大的世纪”,法国享有压倒的人口优势。在人口密度上,甚至在人数上都一样。它以自己的人□压倒了世界上

* 四千万的数目第一次是在1926年达到的。但是,从1934年到1939年,法国每年平均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三万。

其他国家；只有中国除外。法国的重要地位，同它取之不尽的人口资源常常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蒙克列斯廷^⑦所歌颂的丰富资源。

然而，法国的每个竞争对手，人口增长愈来愈迅速。同他们比较起来，法国好像得了瘫痪症。

增长率在短短几年里是不说明什么问题的，也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但是时间长了，却会把一切都打乱。在路易十三时代，当法国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在四十人左右时，英国人口密度为二十人左右^⑧。到1789年前后，英国的人口密度赶上了我们。在这一百五十年里，英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口数目增至二倍以上，而法国的进度却远远落在后面^⑨。在以后的一百五十年*，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大革命这个转折点以后。

总的来说，法国从1640年到1940之间，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的四十人增至七十五人，而英国则从二十人增至二百二十人：一方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十七，而另一方为百分之一千。更有甚者，除了一百万“黑脚”（其中将近一半是原籍法国的）和加拿大六百万仍旧讲法语的法国人外，实际上，法国人在世界上并没有到处繁殖。黎塞留死后三个世纪，祖籍法国的二千万人，只发展为四千四百万；而克伦威尔的四百五十万同胞却产生了盎格鲁—撒克逊大家庭，总人数在二亿七千五百万左右。我们的人口增长只及英国人的三十分之一。

从队头到队尾

这个比较也可以用在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对比上**。法国人

* 英国（不包括爱尔兰）的人口从1800年的一千万增加到1850年的两千万，到1900年的三千七百万，1910年，英国人口超过了法国的四千万，而达到五千万。法国仍留在原地不动。

** 拉丁国家除外，其人口相对停滞情况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差不多同法国一样严重。

口在三个世纪内,只勉强增加了一倍,而其他工业国家则增加了五倍、十倍、甚至二十倍。1640年,我们欧洲的邻国远远落在我们后面;到了1976年,它们都遥遥领先*。

这样一来,力量对比便颠倒过来。1640年,基督教国家人口没有一个达到法国三分之一,只有俄国例外,它虽然幅员广大,也只达到三分之二。从1789年开始,很明显,法国的人口资本没有增殖能力了。几年以前,俄国就超过了我们。奥地利王国各邦紧跟在我们后面**。德国的各邦合起来也是这样。最后一次,大革命和帝国的各个战役显示了法国对它邻国的数量优势。人家仍把法国叫做“大国”,但它已经不再是大国了。一旦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其他的领先地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就一个接一个地完了。

从1800年起,各大国先后赶上并超过了法国:1830年前后是奥匈帝国,1860年前后是德国,1870年前后是美国。英国和日本是在本世纪的转折时期,意大利是在1930年前后。

2. 解释的尝试

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是无需去解释的。法国人并没有费力气去为这个重大的现象寻找答案,他们甚至不愿意正视这个现象。然而,也有人提出一些解释,但是随心所欲的。十九世纪的反僧侣有时把出生率下降归咎于神甫、修道士和修女的独身生活。这是可笑的设想,要知道男女修士合起来从没有超过一比二百法国人的比例^⑩。在统计学上,这是微不足道的***。还需知道,这些男女,

* 当法国人口密度为九十五人时,联邦德国却达到了二百四十九,荷兰达到三百六十四,比利时达到三百二十一,而瑞士达到了一百五十六,虽然它的面积的三分之二是不能住人的。

** 根据马尔塞·莱茵哈德的著作是二千三百万。

*** 同广为流传的意见相反,教士在现代法国的人数超过了在君主制时代的人数;1976年为十六万五千,而1788年为十三万五千,1816年为五万二千^⑪。

为了上帝的缘故，自己免除生儿育女的义务，但是他们尽力让其他人遵守这种义务^⑩：十九世纪，马尔萨斯主义的地区分布图同非基督化的分布图是分不清的。最后还应知道，世界上最信奉宗教的一个社会——法属魁北克——出生率之高是难以置信的。

新法兰西人丁兴旺

魁北克的例子恰恰可以用来否定另一个假设：即法兰西这个民族“天然地”不像另一个民族那样多产。怎么能叫人相信呢？因为，原来的六千名左右的男女农民，他们来自皮卡迪，诺曼第，布雷丹，安朱，波瓦图，在黎塞留、马扎林和科尔伯特*时代迁移到新法兰西去，到1690年，繁殖到一万人，1713年增至二万人，1763年增至七万人。在巴黎条约签订后，留在当地的六万人，绝对听其自生自灭，他们也同英国人混杂，但到1960年却增加到九百万，即等于他们的移民祖宗的一千五百倍^{⑪**}。按照这个速度，1640年的法国人本来应该增加到三百亿。

这是想入非非，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这种提法掩盖了真实发展的一个因素：即死亡率。由于假设否定了，所以解释的线索就有了。因为从天然繁殖能力来说，十七世纪的法国家庭一点也不比美洲的表兄弟们差，速度是一样的，每二十四个月或最多每三十个月就出生一次——也就是哺乳的时间——在十八年内，平均一直都是这样。

关于自然繁殖能力，天然的关系在旧世界里受到了可怕的无法预料的干扰。有三种差别把新法国和旧法国分开来。首先，在法国本土，一个家庭因为丈夫或妻子死亡，而一直带着一个或两个孩子生活下来，这种事是常有的；而在加拿大，成年人的死亡率要

* 似乎可以确定，在科尔伯特之后，他们那里就没有增加新的移民了。

** 这个数目中的三百万后来移居美国。

低得多，人口众多的家庭已经是个规律。其次，在法国，避孕的习惯流传得很快，而加拿大法国人由于生活有保障，对此并不关心。最后，在旧大陆，三分之一的孩子在头一年就夭折，半数在达到结婚年龄之前死亡。总的来说，由于营养不良和疾病，一个人平均只能活到二十五岁。在新法国，繁殖率不是只能勉强维持原有人口，而是足以在两代人之间把人口增加到三倍，也就是说一百年内增加十倍，在两个世纪内增加一百倍。

同法国的法国人不同，加拿大的法国人其人口增长不受妨碍：他们的自然繁殖能力没有任何经济上或心理上的障碍。他们像在祖国那样从事农业经济，但它是一种可以伸展的农业经济，他们可以无限地扩展他们的耕地*，魁北克人尽管依然务农，但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口仍然无止境地增加。

人口密度的四十大关

我们觉得，从新法国的人口增长得出奇，可以看出旧法国不育的真正原因。对一种衣食经济，在取得新的医学发明和引进新技术以前，人口增长所碰到的障碍正好是衣食问题。活着的人的数目，只有解决了衣食问题才能增长。然而，法国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最近进行的研究有力地证明，每平方公里四十人的一种密度——把好的小麦地和葡萄地同贫瘠地合起来平均计算——是西欧农民传统经济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法国也许因为拥有最易耕种的、天然最肥沃的土地，所以比别的国家先达到这个极限数字。以后，除非发生技术和工业革命，否则就注定踏步不前。法国十分之九的人口从事农业，困在自己疆界之内，缩在自己的一小块一小块

* 十七世纪，人们分给他们以圣洛兰沿岸的“第一流”土地，以后又分给他们“第二流”的土地，接着又是“第三流”的土地。人口的繁殖同衣食经济可以不发生矛盾，因为农业面积可以毫无困难地扩大^①。当时，相同的情况也出现于俄国，波兰和芬兰。

土地上,是不可能养活二千万以上的人的。要是它超过这个数字,大概像亨利二世和路易十三时代那样,那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一场自然灾害使它的人口又降低到命里注定的数字以下。

但是,面对这人口密度四十的大关,法国盲目地往上撞,只有发生了灾难才大致恢复这个数字*。自然繁殖能力猛烈地向着大关冲去,因此,需要相反的猛烈力量把它拉回到平衡点上来。贫困提供了可怕的解决办法。人民给推到致人死命的贫困中去,它带来了饥馑,营养不良和疾病。

旧社会可怕的生物学平衡

谁只要愿意探索,就可以发现,时代的见证多得不胜枚举:团体组织和各阶层百姓的诉怨,文森·德保尔所接到的信,费耶对投石党闹事时期所叙述的恐怖情景……十八世纪末叶,人民不是大批死于饥荒,就是忍受残酷的饥饿。请听听蒙蒂昂 1778 年所说的话:“我看到了贫困的最底层:到处是饥饿,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人民颠沛流离,痛苦得失去理性,他们一无所有,羡慕牲口的命运,奔走于荒野以草充饥,分吃野兽的食料……几乎没有一个城市,一个省份不发生粮荒的^⑮。”经过一年的饥荒,旧社会就完了,君主制由于无能保证每天的面包而死亡。

瘟疫,饥荒,战争。整个十七和十八世纪,在普罗文的所有四个教区,也许是在王国的其他四万个教区,每次做礼拜时人们大都一再恳切祈祷:愿天父把我们 from 瘟疫、饥荒和战争中解救出来。有三种灾难,一种是政治上的事故,一种是流行病造成的事故,还有一种是经济上的事故。它们之间难道没有一点关系吗?事实上很

* 雅克·杜帕基埃指出,这种调整,今天在像中国这种地方,是通过晚婚来进行的(平均男方到廿七岁,女方到二十五岁),有三条规则已经是社会公认的了:不结婚就不准有孩子;已婚夫妇分居两地;没有房子不结婚。

可能是一种可怕的连锁反应。

有一篇很重要的论文^⑩，除了几个专家外，并不受人注意，作者让·默雷*证明了旧社会人口急剧衰落同“衣食危机”之间的关系，只要收成不好或者仅仅是担心收成不好，物价就飞涨。在普罗文，六年之内，黑麦的价格几乎涨了十倍**。到处是投机、囤积。于是，“生活昂贵”打击着所有出不起这个价钱的人——即大多数法国人。人们叫孩子们到十字街头讨饭。大家转而购买腐烂的、发热的、“有霉点”的谷物，价钱比危机前的上好小麦还要贵；人们煮吃路边的野草，偷摘还青的麦穗，名符其实地“吃青”。

养不活人的衣食经济

饥荒不过是慢性营养不良的一个高潮而已。接连的荒年是不饶人的。只要两个严寒的冬季，或者三个多雨的夏天，饥馑的噩梦就会出现。大队气势汹汹的乞丐，满身虱蚤，引起伤寒症；老鼠大批入侵，带来可怕的跳蚤，传播鼠疫。身体稍差的人就好比秋风扫落叶，人们不断死于无辜。^⑪

“花边战争”***给已经陷入灾难的国家以大难。兴盛的人民可以忍受征粮、征税和征兵，但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民却受不了这种新的负担，特别是过路军队及其大批盗犯的蹂躏。

农业太原始，生产率太低和太不稳定，贫困的恶性循环——无知、迷信、肮脏，不卫生的破旧住房挤在一起——这是居民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为什么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技术进步、农业的技术改进以及新的作物等等，在英国和荷兰从十七世纪以来就

* 为了提出我的某些假设，我得到让·默雷很多帮助。可惜他过早去世。国家人口研究所研究结果重新作了结论。根据皮埃尔·肖纽的说法，有的地方有生活昂贵而没有流行病，有的只有流行病而没有生活昂贵。

** 在 1688 年和 1694 年之间，涨了八点六倍。

*** 指十八世纪这个时期的战争。——译注

发挥作用,但却不能繁荣法国呢?这就是真正问题所在。

僵化的社会

这里,我们的假定开始现出明朗的轮廓了。黎塞留在法国身体周围打下了石膏胸衣,科尔伯特又把它加固,正当其他国家开始行动的时候,这件石膏胸衣难道不是把法国变成一个僵化的社会吗?

从1694年开始,费纳隆*是不怀疑这一点的,他写信给路易十四说:“您的傅保们教会您的统治艺术,只不过是信任……您的大臣把国家的所有旧信条都动摇和推翻了,以便把您捧到您权威的最高峰。”由于把一切主动权都操在自己手里,路易十四使法国变得“软弱无力”。“您手中拥有一切,而一切人只能靠您的恩赐过活。”^⑩

各省的财务司只听命于国王,他们把无法忍受的强制办法,强加于人:“再也没有信任了,也没有人害怕权力:每一个人都设法逃避法规^⑪。”费纳隆揭发弊病所在,而大家却不以为然:僵硬的中央集权制是黎塞留当时制订的,作为临时措施来对付危机的加剧,其唯一过错就是在科尔伯特主义的名义下,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制度,既侵犯人,又侵犯自然。

法国沦为一个农业国,一个军事的、大陆的国家,并且从此因循守旧,环境、传统、社会风气都把它往那里推。等级制度把每一个阶级固定在自己的水平上,让人人安分守己。革新受到抑制,而当时革新本来应该蓬勃发展的。在这种精神状态和组织状态下,法国长期地——直到今天仍然部分地——是一个农业社会,耕作法是古老的,但是要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土地是必需的手段,也是

* 人们企图贬低他,但是他常常表现出惊人清醒的头脑。

成功的标志。这块土地，人口已经很稠密，但是还要靠它来衡量一切。难道还看不见，在旧社会“法兰西病”就已经露头了吗？

灭顶之灾

一种商业凋敝、工业落后的不发达经济，能养活多少人就生育多少人，等到养不活了就来个赤地千里。整个社会制度在实行惨无人道的马尔萨斯主义：当它不能养活法国人的时候就把他们弄死，法国人就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一个水潭中前进，只要有一个深坑，那就会淹死。在这个时候，其他人已经在游蛙泳了。

自由生长，加拿大的法国人找到了这种自由，因为他们可以无限地取得未开垦的处女地。但是，这种自由是法国的法国人无法得到的，因为旧世界的土地已经占完了。商业发达的、进取的国家却取得这种自由，因为它们发现了另一种经济。首先是联合省*然后是英国，再后是瑞士轻而易举地越过了每平方公里四十个居民的大关。商业和工业城市的富裕，农业技术的变革，航海业的发展，没有疆界的贸易，于是，全部居民都卷进了这个经济增长的旋风中。科尔伯特主义的失败几乎给国家封闭了经济增长的道路。

如果有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创造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的就业机会，法国本来可以有能力养活两倍、然后四倍的法国人；实际上，肯定也会有两倍然后是四倍的法国人，因为，甚至用不着让他们生下来，只需不让他们死掉就行了**。可是，结果情况很差，太差了。只是到了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人口才慢慢地有所增长。

死亡率稍稍降低，同经济的稍稍进展成比例。有几个港口和

* 荷兰的前身。——译注

** 历史学家们并不欣赏这种过去的假想；请他们原谅我在我的关键的假设中使用它们。

都市^⑳开始实行贸易经济。商业起了激发作用。“生活昂贵”的现象和流行病缓和了一些。无疑，物价上涨了，但是缓缓地，有规律地上涨，表明营业额在增加，这对现代化是有利的。销路扩大了。但是这种进步比起英国和荷兰来，已晚开始一个世纪，而且要缓慢得多。

从不自觉的马尔萨斯主义到自觉的马尔萨斯主义

特别是在这贫困的几十年里，法国人学会了害怕生育。要养活的人口太多了，他们丧失了信心。于是，他们最先学会限制生育，在长时间里，西方也只有他们学会限制生育。蒙蒂昂不安地说：“人们欺骗自然，连乡村也这样。”^㉑

不久以前，人们知道了法国实行自觉限制出生率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专家们长期以来以为控制生育——这种致命的秘密——从上古时代，只在青楼和上层社会中实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才流传开来。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情况确实如此。法国经济革命比英国落后一百多年，可是有一种奇怪的对称现象，在限制生育方面*却比英国领先一百年。

大革命掀起了生育的浪潮：前途是美好的！突然间，在1799年出现了一个转折，一直持续到1940年，旧社会的家庭观念崩溃了，却没有别的东西来代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可是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向外扩张，是促进人口的。确实不是大革命引起这种人口灾难，而是大革命的失败引起这种灾难**。

拿破仑的法典加强了这种倾向。在农业的法国，由于规定平分遗产，就不得不限制孩子们的数目，要看父亲有多大能力补偿放

* 让·甘尼亚奇^㉒、研究了十八世纪维克辛三个村子的教区注册，证实了夫妇们在生了第二个孩子或最多是第三个孩子后，就有计划地停止生育了。

** 这一假设是雅克·杜帕基埃提出来的（参看附录1），似乎是说得通的。

弃当庄园主的孩子们。这就把人困在斤斤计较的盘算中，困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其界限不再是整个社会，而是每一个家庭。

人丁兴旺，百业发达

相反地，荷兰，英国甚至在达到极限密度四十人之前，就发现了经济能动性的秘密：它们顺利地跨过了这个极限，因此，在它正在变革的经济中，保持着不受拘束的人口活力，保持着对生活的可贵的信心。它们自发地懂得，在一个发展的社会里，繁荣和人丁兴旺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限制措施——妨碍贸易自由，保护工农业不受竞争的威胁，限制生育等——是相互助虐的。

矛盾的是，英国这个马尔萨斯的祖国，是坚决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法国在官方是不接受马尔萨斯的，却成为他的理论最吃得开的地方，这还是在他确定他的理论前一个世纪。他确定了一种农业文明的人口限度，但这时，在英国，这种农业文明已经消失了。但是法国却死不放手，它采用马尔萨斯的办法，而这办法是属于一个反对生命的社会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孩子，商业也就没有那么多主顾，工业就没有那么多劳动力，企业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劲，殖民地就没有那么多移民，特别是前进的动力就没有那么大。

3. 令人担心的远景

1946年，法国似乎进入一个新时期。二十三年来，它增加了一千万人，就是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过去，要一百三十五年才增加一千万人口。三百年来，这是头一次可以谈得上人口迅速增长。我们是不是进行一次人口革命呢？可惜得很，不是。

这一增长不仅仅是因为出生率提高，也是由于寿命延长了。十五年内，人的平均寿命从六十岁延长到七十二岁。生育增长是个事实，但这并不是一个像大家那样吹嘘的真正的婴儿高潮。出

生率从1946年到1963年只能说是过得去的：从千分之十八增至千分之二十*。离十八和十九世纪加拿大法国人的千分之六十还远得很。

1964年前，人口情况比较健康，但也只有十八年，接着出生率再度下降。一代人勉强地接替上一代人。1972年以后，这个倾向恶化了。1975年出生人数不到七十三万，而1969年是八十三万，1948年是八十七万……大革命前的三个王朝虽然是停滞时期，但平均每年出生人数介于一百一十万与一百二十万之间。这样又回到马尔萨斯主义上去，回到集体自杀上去。

这一后退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兴旺才是意外的，因为它是三个有利因素促成的。首先是1938年至1945年之间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措施：家庭补贴，家庭法规等。然后是一种迷信经济扩张的情绪以及对未来的信念，这是刚出现不久的现象。由于制定了“计划”，也加强了这种信念。最后是因为大家模糊地认识到人口的不景气造成了1940年的大灾难。

过眼之烟：1963年前后，归国的人回到法国、矿工罢工，农民、小商人以及经济扩张“沾不到光的人”造反：法国人感到变革带来的不安，经济增长造成的烦恼，还有对前途的恐惧。1940年早已过去了。家庭津贴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地球上人口过多的恐慌“世界性”地蔓延开来。

人口高涨了十八年，但是停滞了三百年；这个现象最近才出现而且很不稳定，不足以抵消长期传统的影响。

经济扩张的回旋余地是那么狭小，一点点变动就可能把苗头颠倒过来。例如，1947年—1963年的进展看不见了，唯一的原因

* 然而，这成绩是不平凡的，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生人数少，所以年纪大的人多于年青人，减少了可以当父母亲的人数。多子女的家庭多了，但出生率进展却比较差。

是三个积极的因素不再存在了,即:人类寿命延长,移民入境,不愿意要孩子的人,仍然怀孕。

直到1960年,人的平均寿命继续延长,男人从六十岁增至六十八岁,女人增至七十五岁,然后就突然停止不前了,需要巨大的医学进步才能使平均寿命稍稍延长*。

外国的劳动力——波兰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葡萄牙的——成为更新的主要因素:欧洲的移民是受天主教熏陶的,很容易就归化。但是,这些泉源相继枯竭了。

最后,非志愿的生育,正如阿尔弗雷德·索维十分清楚指出的那样,成了十七个吉利的年头里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唯一因素。社会进步需要生孩子,但大家却不愿意生,社会只能偷偷地捞摸一点。然而,在这方面,人的意志愈来愈能使大自然的妙用落空。

日益萎缩的民族

寿命延长和生育下降使法国恢复了它的传统面貌,即一个衰老民族的面貌,对生活缺乏信心,不愿经受风险。

与此同时,争夺实力并不仅仅是欧洲人的事了,它在世界范围内展开。1850年,世界上每三十四个人还有一个法国人,但到1976年,那就是八十一个人中才有一个法国人了。法国从比例上缩小了一半以上。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00年,那就是一百二十个人中才有一个法国人。在两代人寿命内,法国从比例上缩小了四分之三**。

* 多育的极限是唯一重要的,却没有因此而缓和。

** 1850年,法国还只不过落后于中国、印度和俄国,它拥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仍超过“大德意志”,当时,它还不是一个国家(三千五百万人),日本(三千三百万),英国(二千五百万),意大利(二千四百万),美国(二千三百万)1976年,它退居第十三位,落后于中国(八亿到九亿),印度(六亿),苏联(二亿五千二百万),美国(二亿一千五百万),印尼(一亿二千六百万),日本(一亿一千万),巴西(一亿零五百万),巴基斯坦(六千八百万),西德(六千三百万),尼日利亚(六千万),英国(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五千六百万)。

当然,由于医学上进步而引起第三世界人口膨胀,对我们人口的减缩产生的作用,要比我们本身的萎靡不振所起的作用更大。然而,请想像一下,三个世纪以前,我国的人口密度是西德的两倍,如果是一样的话,我们就该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法国就名列第五,位于美国之后、日本之前,在欧洲则是第一名——它一国就要比英国和德国合起来还要多。这是不是对历史要求过分的呢?

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1964年以来法国人口再次下降,越发是个悲剧,而公众舆论,甚至领导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的确,大部分白种人国家从1964年以来,都发生过出生率曲线下落的情况,但是,在它们那里,上述现象是从未有过的。在法国,它使我们重新陷入百年来的覆辙中。人口很多的国家可以让自己停顿一下,但是像法国这样一个人口不足的国家是不能这样的。

法国情况令人更为不安的是,新的下降时期正好是“青壮时期的几辈”人们期待青年人口大大增长的时候。法国是工业化国家不劳动者比例最高的。一千名劳动者要养活一千七百七十名不劳动者,而德国是一千二百名。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只会恶化。要有所进展是困难的,因为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已经需要付出愈来愈大的努力了。法国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数字是国家衰落的标记。

障碍来自精神方面

但是,法国人还不承认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对自己说,怎能人口停滞说成经济停滞的原因呢?人口猛增难道不是正在破坏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吗?他们脑袋装满了各民族平等的教条,不愿承认,人口学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是会产生不相等的作用的。

要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迈出最初的几步，卫生上的进步最初保护了生命最薄弱的两个环节：童年和老年。但劳动人数的比重降低，可以用于投资的收入减少，发展的速度就受到障碍^⑳。

相反，那些在经济上取得突破的国家，人口增加刺激经济活动，因为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具备了。出生人数如大大超过死亡人数，就会不断引起新的需要和爱好。在欧洲战后的两次经济奇迹中，人口的挑战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啊！西德吸收了东方来的一千三百万难民，波河平原容纳了三百万从南方来的移民。在民生的挑战面前，为了应战，这些国家就在民生上大下功夫。

法国人下意识地拒绝承认这些事实。他们根深蒂固地保持着这种信念，认为人口增长带来失业和贫困。“要养活的人口越多，就越难养活自己。”在二十世纪后期，我们的反应就像我们十八世纪那时的老祖宗一样。我们始终没有掌握经济的发展规律。我们保持着不发达国家的那种思想习惯。这些国家同它们的资源比较起来是人口太多了。我们经济上的马尔萨斯主义溯源于自身，引起了人口上的马尔萨斯主义，然后又从中吸取养料*。

要是不担心前途，就会养孩子。为了生育，得有信心。法国人有没有信心呢？我们只是对我们担心的东西深信不疑。这是“法兰西病”新的可怕的一面。

* 民意测验不断地证实了这种古已有之的心理。有一个问题是这样提的：“有些人认为，法国人口愈多，法国就愈繁荣，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二十二个回答同意，六十八个回答不同意，十人未置可否^㉑。反对者为同意者的三倍。反对生育的最大百分比是在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人中间以及年龄从二十到三十四岁的人中间。愈是年青的人，就愈害怕人口增长^㉒。这是国家前途最令人担心的。

第十三章 拉丁国家的没落

我们看到了法国在它的自然运动中停顿下来了。我们看到了科尔伯特给经济配备的发动机设计得这样糟糕，以致它的加速器变成了它的制动器。我们看到了法国人如何在一个世纪以来向着人口密度四十的大关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在文字上成为马尔萨斯主义者之前，在精神上早已成为马尔萨斯主义者了，而且差不多一直是这样。我们看到法国萎缩不前，与此同时，北方的国家却热中于生活、创造、生育、向世界开放和征服世界。

但是，这个法兰西病，我们还得要看到它并不是孤立的，尚有一大串国家当它的难友。这是历史的秘奥，这种秘奥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人们偏偏不肯去看。

世界围着纳瓦尼广场转

窗户正对着椭圆形的纳瓦尼广场中心，对面是圣艾格尼斯教堂。

作家英德罗·蒙塔尼里对我说：“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广场吗？它是罗马的中心，因此是宇宙的中心。它把宇宙分成两部分，或者是差不多两部分。南边是懒惰和贫穷，北边是勤劳和繁荣，从那里愈是向热带走去，人就愈是懒汉，盗犯，迷信之徒，乞丐；你愈是向极圈走去，那么你愈是发现那里的人充满活力，好动，有文化，有科学头脑。然而，文明发祥于南方，它从美索波塔尼亚传到埃及，然后到克雷特岛，再到希腊。从那里，它在西西里登陆，像战时美国人那样，然后北上。罗马拚命地向亚历山德里、泰尔或迦

太基那边看。南方是精美,丰富,朝气蓬勃,科学发达;北方呢?野蛮。现在却适得其反。”

我对他说:“纳瓦尼广场仍然位居中心,世界正是围绕着你们转。”

蒙塔尼里在开玩笑,但是他的夸大描写并未失真。

中世纪结束,新时代开始,欧洲的这一部分在宗教改革后,仍继续信奉天主教,在这个时期,似乎还要长期掌握世界命运的关键。“拉丁姐妹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还有佛兰德,南德意志,奥地利,波兰等把财富吸引到它们那里去*,产生许多艺术奇迹,拥有最有才能的实业家,最能干的商人,最灵巧的手工业者;它们发动海员和冒险家去寻找新大陆,独占旧世界的荣誉。

十七世纪初叶,这一部分欧洲成功地扩展了它的地盘。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赢得了它们的帝国,或者建立了它们的“商埠”——这是西方在非洲、亚洲远及中国的桥头堡。事实上,整个美洲成了拉丁的美洲。意大利当时分为几十个邦,只能分享这一扩张的油水,派出孤立的先驱或雇佣人员,如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维斯普西或维拉赞诺。但是它拥有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好的银行家。当时的教会如此得势,执其牛耳者又是意大利。

在这个时代,欧洲南北的差距是对北方不利的:联合省,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汉斯**^①只是一个繁荣地区的北方边塞,拉丁国家才是它的中心。

然而,1600年后不久,天主教国家,特别是拉丁国家,都一起逐渐得了一种奇怪的萎靡症。荷兰人和英国人利用这种昏睡状态

* 意大利、佛兰德和南德意志居首位。

** 即联合市(特别是港口和商埠)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以汉堡和卢比克为首。

领头在西方进行扩张。由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地质运动，西方的中心从地中海滑向北海。没有、确实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当代人预见到这种意外的事故；而在前一个世纪，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今天的历史学家发觉这一点。如果在梅迪西斯时代，有人告诉一个佛罗伦萨居民，或者在科尔伯特或皮扎尔时代，有人告诉一个塞维利亚或巴塞罗那的一个居民，或者在瓦斯科·德加马时代，有人告诉里斯本的一个居民，说他们的国家丧失它们的地位那一天快要到来了，而取代它们的将是迷失在大雾弥漫之中的北方民族，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呢？这好像是一场打靶游戏，一只看不见的准确的手把靶子一个接一个地打倒。

葡萄牙：从过分发达到不发达

十六世纪，葡萄牙拥有无数的海外属地，闪耀着眩眼的光芒；蓝色瓷砖、彩石、宫殿、科英布尔和波尔多大学，诗人卡莫恩的诗篇光辉夺目。

十四、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显示出非凡的集体精力。穆斯林刚刚被赶回非洲，国王、以及他们周围的权贵或资产阶级就跟踪出发征服摩洛哥海岸的港口，然后又在 1425 年征服马德尔，1427 年，征服阿速尔群岛，1436 年征服里奥·德奥罗，1456 年征服卡普·维特各岛屿；1465 年攻下萨奥·乔治·德密纳*，从 1482 年开始到达安哥拉，1500 年起，到达巴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这一次，他以钦佩的心情使用史诗的语言：“葡萄牙人航行在大西洋上，发现了非洲最南角；广阔的海洋把他们带到了东印度……②。”

这一切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没有这种冒险的热望激发那些征服者，如果没有这些人卓有远见的天才，例如这个被称为航

* 现属于加纳。

海家的亨利(1394—1460年),他自己从来没有航过海,但他让别人去航海。

美国星际航行及空间管理局的方法

在欧洲大陆尽头的一角,在他的萨格雷斯堡,他并不满足于浪漫主义的梦想。他是现实主义者,讲究实际,认真细致。他筹划探险,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实业家,对于行动的一切方面,都很关心。

例如,他注意科学研究。他推动人们去认识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测量学,而特别是这些科学的实际应用。他改善航海的仪器,改造他的船只,以一个真正的航海事业的技术家和工业家的面貌出现。萨格雷斯成为一所航海和殖民学校;迪亚斯,麦哲伦,瓦斯科·德加马,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曾经是那里的学生,是他的学生。

他招徕外来的技术力量,吸引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海员以及德国的天文学家^③。他所实行的正是我们今天自以为我们发现的办法,即所谓“吸引英才”和“杂交丰产”的办法。他把力量组织起来,比美国人所实行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早了五百年。

从陡峭的海岸出发,他派每一只船出海,总要比前头那一条船多走出几天的航程,然后命令它返航,并报告一切观察结果,就像为征服月球而陆续派出阿波罗宇宙航船一样。

在这同一个世纪末,葡萄牙在教皇的仲裁下占有了新世界的一半,另外一半给了西班牙。*

然而,一百年之后,葡萄牙僵化了。从那个时候起,它好像无能适应世界的发展。它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机会,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它仍保留着中世纪的组织和思想习惯。

* 仲裁是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主持的(1493年5月)。这个仲裁后来由多尔德西拉斯条约加以修改(1494年6月7日)。

令人惊奇的西班牙

西班牙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也胜利地进行扩张。

甚至在 1519 年科尔特在墨西哥登陆之前,西班牙已经在美洲建立它的帝国,包括一部分加勒比海,巴拿马地峡,佛罗里达。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个帝国无限地进行扩张:阿兹台克人的墨西哥、印加人的秘鲁在几个人几支火枪几匹马的面前陷落了,但是使其陷落的绝对武器是精力、想像力和信念。

由于征服了中美洲和南美洲,不久之后,黄金这种“神奇的金属”*涌进了西班牙,这都是黄金国在“它遥远的矿山”中“放熟”的。

这种发财致富没有一点是出于偶然的。因为经济思想从中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便很发达。到十六世纪,巴塞罗那已经是一个工业十分活跃的地方。塞维利亚拥有一千六百台织布机,使用工人一万三千名^⑥。托勒特和塞戈维亚充满了丝绸和纺织工场^⑦。

然而,西班牙这时陷入了不景气,虽然,殖民活动已开始带来资金,动员社会和造就一批无所畏惧的人。但是人的思想却起了真正的变化**。人们在思想上抛弃了以前最崇尚的东西:进取心和事业心。商业欧洲的见证人发现,这个迄今如此热情的民族陷入

* 这种“黄金”主要是白银,从 1545 年开始在波托西矿区开采(该矿区位于现今的玻利维亚,当时属于秘鲁西班牙总督管区),美国历史学家汉密尔顿^④计算,从 1503 年到 1600 年之间(不算走私,因为无法统计),有七千四百四十吨白银和一百五十四吨黄金从美洲运到塞维利亚,该处已成为“欧洲之肺”^⑤。日本只是在赫雷迪亚或其征服者的想像中“放熟”黄金。之所以说“放熟”是因为中世纪时人们相信,不论任何金属,日子久了就会变成黄金。炼金术则是想用点金石来加速成熟的过程罢了。

** 历史差不多总是这样:变化的迹象在前一个时期就显露出来。西班牙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衰落,最后开花结果,那就是领土和宗教野心超过了商业的动力;重新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西班牙精神,把所有非“纯血统”的东西都清除掉——即犹太人和穆斯林——因而排斥了人口中最有活力的分子,接受不了资本主义的新生现象。同法国相比,专制主义幻想和权力迷梦出现得更早和更为严重,这是衰弱的根源。

了所谓“西班牙懒病”——也就是“蔑视商业活动”。整个民族都厌恶有关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活动，而只热中于宗教、朝廷和骑侠的活动。有一个观察家写道：“他们全都成了贵族迷^⑧”。

“我们所有人都是绅士”

在每一个社会里，社会风气的主要趋势总是按照上层人物所树立的榜样形成的。在西班牙，唐·吉珂德取代了征服者的地位。

佩剑的绅士垄断了官职^⑨。阿拉贡议会决定不接受任何从事商业的人进入议会^⑩。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计让人家承认他们是“绅士”，没有能力这样做的人也装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渴望能给招收到这个骑士官僚体系里任个一官半职，这个不可一世的官僚体系当时统治着西班牙。

西班牙的国王，表现出这种新精神，甚至在法国仿效他们的榜样之前，就在他们的国家建立了衙门式的君主制。好像他们从殖民地抽走黄金一样，他们抽走他们国家的生命力，堆积在一旁，毫无用处，或者挥霍浪费一空。比在法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等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所有阶层无所作为：贵族失去了首创精神，对开发土地和经营经济失去兴趣；资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和工业，而追求官职；教会变成了政权的工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要说它的“财富”，西班牙把它堆积起来，而不是用以投资^⑪。它购买制成品，而忽略生产这些产品^⑫。

西班牙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迅速的进步，但仍保存着广大的古老的部门。根据最近的一次调查^⑬，佛朗哥统治结束时，劳动人口百分之九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小农户把过多的劳动力拖在土地上；大农户由于缺乏资金，现代化并不见得比他们快；现代化的部门都附属于外国，贸易逆差惊人。正如葡萄牙的情况一样，贸易逆差只能靠两个因素去缩小，即旅游业和侨汇，这是不发达的

特点。输入消费者，输出生产者。此外，在从独裁到民主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

农业的、等级制度的、古老的拉丁美洲

因此，同通常为人接受的解释正相反，所谓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被它们的殖民地弄得无所作为、这种说法不是事实。它们是被它们自己弄得无所作为的，而它们的殖民地本应能够使它们有所作为。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是它们把它们的美洲弄得无所作为，而北美洲沦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殖民地却在发展的征途上，一帆风顺地前进。

然而，拉丁美洲的王牌，只要善于加以利用，一点也不比美国和加拿大的差*。但是，拉丁美洲却同它的两个伊比利亚祖国遭到同样的命运。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的后代只满足于瓜分领地。虽然有过无数的革命，他们仍然是地主：领地、庄园或大农场主**。长期以来，这个世袭的宗族，死死抱住它的传统，只把他们的收入投资于他们的宫邸。

拉丁美洲的经济动力全来自外国，并且经常回到外国去。智利开发的铜，巴西的铁，委内瑞拉的石油都是这样。本国人不管他们多么富有，不肯出一点气力去购买外国资本。当年知名英雄的后代，不爱过问商业，也不爱过问工业。

美国当时是不是劫掠这些国家，并继续这样做呢？但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洲大陆的霸权在拉丁美洲造成不发达，而在加拿大却造成超级发达呢？一种经济之所以成为殖民化，只是因为它是可以殖民化的缘故。

* 例如委内瑞拉已开始提供了一个榜样，开采它的石油资源，发展人口和表现出对技术进步的欲望。数千名委内瑞拉大学生到其它先进的工业国家留学。

** 经营得有好有坏。

南方和北方有着同样出色的天然资源，而且南方显然动作得更早，但是为什么同一个大陆的两部分却出现这样巨大的差距呢*？无疑地，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比北面的十三个州只落后半个世纪，他们要摆脱两个宗主国的枷锁，高呼“自由”，但是，他们仿效美国只限于在政治独立上，而没有扩展到社会组织方面，个人自治方面和各种思想准则方面。征服者的后代和教会仍旧是社会的主人，社会仍然是分为等级的，同以往一样，服从于教条主义的秩序，同样地，倾向于在故步自封专政和革命专政之间，左右摇摆。

意大利：从充满活力到衰弱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不仅是艺术兴旺，同时也是繁荣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工业的市场经济，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形式下，在意大利得到发展：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地，早在十二世纪，就出现了“康明达”，即我们的“合股公司”的老祖宗，以及不久后诞生的“公司”，即我们的“集体名义公司”的最早雏型。

强大的梅迪西斯公司，从十五世纪开始，同它所谓的独立公司一道构成一个真正的控股公司。1455年，在布鲁热，一个住在这个城市的米兰人控诉当地的梅迪西斯子公司交付九捆不合规格的羊毛，这笔货是从伦敦的梅迪西斯子公司购入的。法庭请起诉人去告伦敦子公司，因为这两家公司是不同的公司。美国的历史学家德鲁弗指出，如果一个美国人起诉新泽西美孚油公司，因为纽约美孚油公司卖给他的货物有缺点，借口是洛克菲勒控制着这家公司，那么，判决也会是一样的^⑭。梅迪西斯家族同洛克菲勒家族

* 气候上的差别只能提出来解释赤道地带的情况（主要是亚马逊森林地带）。墨西哥和巴西的亚热带气候同美国南部相似，而拉帕拉塔河各国和安达斯山各共和国的气候，一点也不比北部的温带气候差。

一样,都学会了分散风险。

意大利人不仅是银行家和商人,他们还是实业家,革新家和技术先锋。伦纳多·达·芬奇 1482 年在卢多维克·勒摩尔王朝要找个职位,他是要求做工程师工作的,他说:“我曾经绘制过极为轻便的桥梁图……我可以把要围攻的一个要塞的护城河水引走……我可以同任何一个工程师相匹比,无论是建造公共的或私人的房屋,或者把水从一个地方引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他又好像偶然地提到“在绘画和雕刻方面,我也不怕同任何人较量^⑮。”

他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它反映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才能水平,这个民族因此而成为一个技术民族。索罗金曾经统计每个世纪和每个国家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他指出从 800 年到 1600 年,意大利提供了西方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⑯。突然,从 1600 年,这个喷泉开始干涸了。而从 1726 年到我们今天,意大利所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二至四。很快,意大利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形象只不过是一片杂乱无章的贫困地区,和在回忆一去不复返的光荣中睡着了的都市。

艺术——被摘下的花朵

这个突然的衰落,正统的历史把它算在“伟大的发现”的帐上。贸易的潮流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去。但是,为什么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也在大西洋边上,却同意大利同时盛衰呢?请看看世界地图罢:里斯本、科罗尼、塞维利亚和卡迪克斯比伦敦、鹿特丹和汉堡更靠近美洲。热那亚和那不勒斯比北海的各大港口更靠近中美洲和南美洲,更靠近非洲和亚洲,甚至也更靠近北美洲,如果走亚速尔群岛这条路的话,这也是当时帆船最经常走的一条航线。

我们是不是从人的方面去找找真正的原因呢?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要说得很明确,让我们只开个头吧。尤巴迪,维尼夏,托斯卡

尼,利格里无比兴盛的时代正是当时人们把雄心壮志放在商业、手工艺、纺织业和兵器制造业的时代,这种兴隆是同社会对这些事业的兴趣一齐衰退的。

意大利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同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样,都放弃了生产活动。它们把自己累积起来的成果浪费在欧洲最盛大的节日欢庆上。“到威尼斯过狂欢节”,伏尔泰时代的国王们把这句话当做出游的借口来用。还有艺术呢?从此以后,它就像摘下来的花朵一样,在一个时期内,它还发出鲜艳的光彩,但是已经得不到养分的供应了。

航海经商的大城市都在苟延残喘。教廷各邦在神权政府的统治下,像西班牙一样是中央集权的,很快也同西班牙一样落后了*。在南方,愚民政策的拥护者反对科学和自由意志,认为这是魔鬼的产物。意大利沉沦下去了。

工业总算成功地在十九世纪的波河平原上建立起来。意大利凭借它最近的发展,重新在世界上攀上一个体面的地位;但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九国中,它和爱尔兰位居末位**。为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它还需把民主和效率结合起来。

奥地利的能动性遭到打击

拉丁国家并不是只有它们受苦。

十七世纪中叶,奥地利因战胜土耳其人,赢得帝国称号,并因反对法国王朝得胜而威信高涨一时。然而,情况就像凡尔赛王朝一样,观察家在果子中发现了蛀虫。

维也纳的富丽堂皇并不比凡尔赛更能遮人耳目:神权秩序的

* 同统一的拉丁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的大中央集权相呼应的是分裂为许多小邦的意大利的小中央集权。⁽¹⁾

** 1975年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到二千万美元,而排头的国家超过三千万美元。

法衣束缚着国家。社会的每一个阶级都局限于它的既得权益内。国家严格地分为等级；革新受到打击，人民分成集团，互不通气，他们受到压抑，只靠外力推动：首先是反宗教改革，然后是意大利的巴洛克*，然后是法国或德国的影响。

官僚主义的控制愈来愈紧，经济和社会仍保持其古老状态。农民占人口的十分之九，他们的劳动主要是为满足朝廷贵族挥霍浪费和国家开支之需。城市因行会规定而逐渐瘫痪，剩下来的一点点劲头汇集于首都。

1866年，奥地利军队被普鲁士军队所击溃。萨多瓦之战不是因日耳曼两兄弟暂时成为敌人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一种农业的、落后的经济同一种工业的和自由贸易的经济之间的较量，是一个不动的社会同一种能动的社会之间的较量，是瓦罐子同铁罐子相撞。当普鲁士人因打胜仗而加速发展的时候，奥地利似乎给灾难压垮了。1918年的失败一点也没有触动德国的深厚的内在力量，但是却永远埋葬了奥匈帝国。

马比书多

从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波兰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在城市里，矗立着市政大厦，巨大的商场，贵族家庭的住宅富丽堂皇；克拉科维亚成为中欧的佛罗伦萨，它是意大利建筑师建造的；在贾杰伦大学的拱廊下，大学生们熙熙攘攘，那里有著名的教师，如哥白尼；格丹斯克(丹齐克)的贸易不断增加，直到十七世纪初，到1618年达到顶峰；作家们成功地要求推广教育：由于有一千多所学校，男子的四分之一能读书写字。

可是，到了十七世纪初，波兰进入衰落时期，它的落后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它是农民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大增加的唯一国

* 意大利的一种建筑风格。——译注

家(从十六世纪的百分之六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其他的社会成份,特别是资产阶级,则降低了;城市人口在减少^⑨。

封建在逐步地恢复,波兰的愚民政策和迷信代替了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好奇心和宽容。贵族以鄙视教育为荣。在布拉尼奇城堡里,马厩里养着两百匹马,但图书馆里只有一百七十本书^⑩。

在邻国虎视眈眈之下,波兰惨遭瓜分和后来沦为附庸的条件成熟了。

卷 扬 梯

奥地利和波兰同这些拉丁国家有共同点,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国家突然停顿下来,没有跟上现实和生活。正像葡萄牙、西班牙、拉丁美洲、意大利以及法国,它们在基督教的大分裂后,继续属于“天主教和罗马教”。

在宗教改革的国家和反改革的国家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别一直影响到它们的逻辑。这些差别不断加剧它们的影响。基督教大家庭分裂了,同族兄弟之间有富有穷。

在经济革命之前,历史就是地理。一个国家的农民蹲在他们的土地上,目标只是为了生存,因此,他们的做法就是使一切尽可能少改变一些。但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是一种发展现象,它对一切民族来说都一样。历史意味着改变。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跟上步伐。各个国家就像一群步行的人,他们在一部卷扬梯上前进:一部着了魔的梯子,它同人们前进的方向相反,飞速地转动。人要是留在上面不动,就会很快地后退,谁迈着小步,就会慢慢落后,谁的步子迅速些则可以赢得一点地盘,只有跑步的人能够有所前进^⑪。

在反改革那些首要国家中,人们好像不但不会跑,甚至走都不会似的。在法国,人们则只会徐徐慢步。为什么呢?

第十四章 宗教改革后社会的飞跃

在卷扬梯上，宗教改革后的社会飞速前进。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不止一个见证人指出这些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之间拉开的差距*。到十八世纪，事实已十分明显，以致方特纳尔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等都发出惊呼。小小的英国居然能抗衡庞大的法兰西帝国，再次引起了英国热。斯塔埃尔夫人，夏托布里安和本杰明·康斯坦，圣西门和圣西门派吉佐和托克维尔竞相指出新教和民族集体活力之间的关系。1870年证实了这种观察结果：雷南和泰恩，埃密尔·德吉拉丁和阿纳托尔·弗朗士，弗雷德里克·勒帕莱的弟子**等都研究这种优越性的道理，没有一个人对这种优越性表示怀疑。

“上帝创造大地，荷兰人创造荷兰”***

一个布列塔尼自治主义者以十分坚定的信心对我说：“布列塔尼同荷兰一样大。当我们被兼并的时候，我们甚至人口要多得多。现在人口少了五分之四，只有以前十分之一那么富。这就是法国给我们的礼物。”

他所作的比较是触目惊心的，根据是确凿的。他只忘记了一点，那就是这个对比本来可以应用到法国每一个省份，只有伊勒·德·法兰斯例外。除了首都所在的这个省外，兼并了布列塔尼的

* 有些人，其中包括博苏埃和荷兰人让·德维特，曾作出颇为精辟的说明。

** 德摩林，埃密尔·布米，埃密尔·德拉维利，弗拉梅里昂，欧内斯特·雷诺。

*** 荷兰的古谚。

国家，全都得了同样的病……

但是，荷兰的历史却截然相反，这怎能叫人不吃惊呢？这个国家，天然资源那么贫乏，而三百年来，在世界经济上却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气候是严酷的：猛烈的风，严寒的冬季，还有雨、雾等。土地很少，稍多于三万平方公里——等于法国的四、五个省，而且，有一半是通过艰巨的斗争从海洋夺来的，或者需要保护以防河水泛滥。海岸原来没有任何可靠的地方适合做港口，原料和能源也都缺乏*。

然而，从十七世纪开始，荷兰成为征服者而奠定了它的地位，拼命去发财致富。1604年，英国有一个指示，已经把荷兰人树为榜样，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商人”。荷兰的实业家，商人，航海家接替了葡萄牙人，涉足于南非洲，德坎沿岸，印度洋，马六甲和盛产香料的岛屿。他们同中国、同日本的贸易十分活跃。十七世纪初，他们的大货船纵横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

荷兰人建立了实力雄厚的航海公司，如1602年的东印度公司，1621年的西印度公司，同一年，他们又涉足北美洲；纽约最早的名字是新阿姆斯特丹。不久以后，他们的商行和殖民地像一条腰带围绕着全世界：好望角，锡兰，爪哇，苏门答腊，福摩萨^①。他们甚至夺去了汉斯商人在波罗的海和俄罗斯的古老而又有利的贸易。

甚至比英国还早，这个小小的加尔文教国家在商业文明中就占了首位。荷兰首先接受了宽容的思想，它成为一个十字路口，吸引着一切外国人。他们给自己一个选举的和权力分散的制度。

1614年，联合省的海员比西班牙、法国、英国、苏格兰合起来还要多；天主教的安德维普把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让给了经过宗

* 除了坎皮尼和林堡的煤矿，发现于十九世纪末，还有天然气，发现于1959年。因此在以前的三百年中，对荷兰的发展无关。

教改革的阿姆斯特丹，1609年在这里建立了头一个证券交易所，开设了第一家银行。

在航海业和大商业的刺激下，某些工业如造船，德尔夫陶瓷，纺织品等，欣欣向荣，一个城市网发展起来了。资本家对农业投资发生了兴趣；为了向海洋夺取成千上万平方公里土地，需要资本；为了使生产合理化，需要资本。荷兰实现了西方的第一次农业变革，在当时是最出色的。从十七世纪开始，它向专业化发展。生产自己最拿手的产品：花*，麻，酒花，烟草，人工饲料，良种母牛（以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奶牛），还有黄油和奶酪。它输入的是别种东西。

无疑地它在十八世纪大大失色了，而英国和汉堡醒来了。但是它后来又继续上升，今天，它是欧洲九国的酵母，鹿特丹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乌尼勒维公司，菲利普工、商业帝国给分散在各国的二十五万人提供工作；在电器和电子方面，可以同最大的美国公司比美。菲利普公司白手起家，赢得了国际地位——就像荷兰人一样——这是靠他们的革新精神、精力和办事能力做到的。

小店东的国家**

十六世纪在世界的旅途上还遇不到多少英国人。商业冒险家出去同协会出售他们的布匹，最远也不过是波罗的海。他们几乎不敢到地中海去冒冒险，占有新的土地，征服市场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或法国人的事。尽管有莎士比亚的天才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奢华，英国人那时还只不过是个小民族。

二十世纪初，联合王国成为世界之首。它的几个农民成为真正的“农业经营家”；它的人口，城市占五分之四，仍继续增长；它的

* 从1636年开始，便在哈勒姆地区大批种植郁金香。

** 英国在二十世纪的衰落将在第十六章论述。

伦敦是首屈一指的港口和市场；它的商船队占世界吨位的百分之四十五；它的舰队按照规定超过了名列其后的两国舰队的总和。联合王国是第一银行家和第一投资家，英镑起着国际货币的作用，金本位其实是银本位^②。它的工业在欧洲占第一位*。英帝国占有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拿破仑轻蔑地说：“这是个小店东的国家。”沃尔特·雷利爵士**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对此作出了答复，他说：“谁掌握了商业，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财富，也就掌握了世界。”

英国人是通过商业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他们在荒野上放牧羊群。为了出售羊毛，就要寻找销路，于是装备了一支船队，并且加以保护。一步一步地，从挑战到反击，英国的政策成为海军和帝国的政策。从十七世纪开始，仅仅在荷兰人几年之后，英国人就在印度树立了他们的里程碑，并开始占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逐渐遗弃的那一部分美洲，在那里殖民。商业碰到什么，什么就变。皮特提前了一个多世纪就曾说过：“英国的政策就是英国的商业***”。

十七世纪初最早的经济的发展，给别的突破发出了信号。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农业地区在一个积极的和开明的贵族阶级领导下，发生蜕变。其象征是萝卜勋爵——真名为汤森勋爵——他之所以得到萝卜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极力宣传以萝卜和苜蓿为主的轮种制^③。轮种代替了休耕，这几乎使耕地一下子增加了一半。为了鼓励现代化和合并土地——比法国早两个半世纪——强迫耕种的人把他们的地围起来，小农户由于没有能力照办，就遭到淘汰。这

* 英国工业生产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 1850 年是百分之六十，1890 年仍占百分之三十五。当时，美国的工业超过了英国，而正好在 1914 年前，德国工业也超过了英国。

** 他是把烟草引进欧洲的人，另一个人是让·尼古。

*** 根据 1651 年航海法，输入到英国的货物应该直接来自生产的国家，只能由这些国家的船只或英国船只运载。

个时代是严酷的。

然后，在一个不可抗拒的运动中，产生了我们以后所说的“工业”。革新日益增多，并互相促进。由于找到了把焦煤同铁结合起来的秘密，找到了约翰·凯的飞梭和卡特赖特的织布机秘密，以及由于降伏了蒸气，英国奠定了空前的实力基础*。

跟随荷兰社会的足迹，英国社会通过它善于贸易、革新、经营、冒险的能力，打开了通往新文明的途径：技术的、工业和城市的文明。这个世界比哥伦布发现的还要新。其他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试图跟着它向这个世界进军。有的顺利些，有的没有那么顺利。

瑞 士 奇 迹

瑞士并不比荷兰更得天独厚。它稍为大一点，但山那么多，以致一半的土地既不能耕种，又不能放牧。除水力以外，没有能源，没有或几乎没有矿藏。

卡尔文曾严峻地改造日内瓦，把它变成新教的罗马。从此以后，瑞士——同荷兰，普鲁士和斯堪的纳维亚一起——成了新教徒所选中的地方，他们是从法国赶出去的，此外还有制造商和商人，他们从事冶金术，食品工业和药物研究等。

瑞士法郎是建立在一大堆黄金之上的，它的钞票是世界上唯一的货币，由国家银行以百分之百——甚至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的黄金来保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十分兴隆。苏黎世，巴尔，日内瓦的金融市场是国际性的。

瑞士的工业使用最少的原料，用最大的人的创造性来加以提炼和加工。它善于专门生产高质量和高精度的产品，通过他们的本领*把大量的加工价值加在产品上。

* 1760年和1805年之间，生铁的产量增加八倍④。1720年和1800年之间，经处理的棉花总量增加三十倍⑤。

有些人想像，由于保持中立，瑞士可以节约军费。然而，它一直把很大的财政力量用于军事威力上，按比例要比法国多。的确，它没有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但是，那些机械论者，却又把“德国奇迹”或“日本奇迹”归功于毁灭性战争的奇效……然而，多少旁的国家并不特别好战，也没有遭过什么战祸，却拖在后面，老是不发达。

最为惊人的也许是，瑞士在西欧虽然人口密度最大，却妥善地避免了城市的高度集中和农村人口外流。它找到了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之间，乡村和小城市之间的和谐关系。它是富足的，不可动摇的。如果说它有一个国家机构的话，那也是勉强存在的，它仍然是地方政权的综合。难道不正是因此使它对经济发展适应得那么灵活吗，整个社会协调一致那么令人羡慕。是什么样善于共同生活的才能使得这个山区民主国家能够在平衡和运动之间保持得这么平稳呢？

“自己创造的国家”

在两百年期间，从独立到我们今天，美国人民展现出闪电般迅速发展的宏图：一个有四百万人口的小小农村社会成为一个超过两亿人口的大陆国家，成了世界第一强国。

如果以为这种优势只是最近的事情，那就错了：从1890年开始，美国工业就赶上了英国，并居领先地位，以后从没有落下来。

人口的猛增表明着这种经济高涨，同时又刺激经济高涨。从1790年到1860年，人口每隔二十三年就增长一倍，到1860年增至三千二百万。1880年，它的人口达五千万，成为西方世界最多的。然后在1920年超过一亿，1950年超过一亿五千万。

* 天主教州(它们在1848年桑德邦战争中反对新教州)明显地没有那么先进。这是一些农村的、传统的地区，而新教州则投入贸易经济中，并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统治。

人们常常想像这个国家是一块空旷的盆地，是欧洲把它填满的。其实从1820年到1920年，它只得到二千五百万移民：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仅仅加强它的天然生命力而已。美洲的进展，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创造，长进，相信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的信条。最早的技术进步是从英国和荷兰来的。但是不久，发明创造就在当地从四面八方迸发出来。早在1814年，波士顿的一个商人洛厄尔，在一个工人保罗·穆迪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纺纱和织布工厂；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同一家企业里把纺织工业的两个基本生产过程合并在一起。奥利维尔·埃文斯发明了一部高压蒸气机。富尔顿在拿破仑那里碰了钉子后，同朗赛和菲奇一起建造了最初的蒸气机战舰。1846年，伊莱亚斯·豪制造了缝纫机——这是里昂人巴特勒密·蒂莫尼埃早在1825年发明的，但是他没有得到重视，后来死于贫困。同一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机。1851年，盖辛海纳发明了排除铁的含碳量的方法。那时就已经谈论“美国的制造业体系”了，也就是大批生产标准化和可以替换的部件。

1840年前后，美国的实力开始加强了。在二十年内，它爬上了第二大工业国的行列，仅次于它以前的“祖国”。但是这种能动性碰上了农业的、等级制度、奴隶制度的社会，这种社会是在南方以棉花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北方和南方，实际上是两个对峙的国家。一方面，农业的、贵族的榜样使它倾向于故步自封，依靠人剥削人的制度；另一方面，商人工业家和资产阶级作为另一种类型发挥着自由的作用，促使它永远向前。北方胜利了，解放了美国的动力。

斯塔的纳维亚或北极圈下的繁荣

十九世纪中叶，瑞典是一个阴沉的和贫困的国家，漫长的冬季是在烛光下度过的，赖以为生的是土豆和咸鱼，结核病和酒精中毒造成居民大量死亡。阿道夫·古斯塔夫二世当年的伟大而现在就

只剩下来一个回忆了。冰、雪和解冻妨碍着交通；大部分土地都是花岗岩质土壤，许多作物都不能种植，能种植的，严寒又阻碍其生长；地下资源并不像所想像的那么丰富。只有铁矿比较多*。广大的土地上遍布着水塘。它更像一片原野而不像一个国家。

然而，1914年左右，瑞典却成为欧洲按人口计算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今天，劳动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而在本世纪初则为百分之五十。瑞典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产品有一半是输出的。

它专门生产需要高度技术的产品——滚珠轴承，特种钢，汽车和飞机制造业，摩托车，钻凿工具，电话等。瑞典在按人口计算的国民产值上占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瑞士。

什么原因可以说明这种突然的飞跃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发明创造成倍地增长。一大批革新家靠了他们的创造精神推动了这种变革。发明火药的艾尔弗雷德·诺贝尔，至今仍是最负盛名的，尽管他建立了诺贝尔奖金以减轻他作为炸药商的罪过。另外还有其他许多人。1855年伦斯特罗姆成功地制造了以磷为主的安全火柴；夏尔—古斯塔夫·德拉瓦尔——法国一个胡格诺教派的后代——发明了一部离心脱脂机和一部先进的蒸汽涡轮机；斯文·温奎斯发明了滚珠轴承；古斯塔夫·达兰发明闪光灯塔；拉尔斯·马格纳斯·埃里克森发明了电话听讲两用话筒。这似乎说明工业革命是从思想革命诞生出来的。

以瑞典为榜样，挪威和丹麦在相同的土壤上创造了奇迹。这些严峻的半岛缺少阳光，没有热量，到处是荒野、沼泽和沙土，但依靠了先进的技术，聪明的组织，而无疑地主要依靠自觉的集体纪

* 况且，在极北部的最好的矿层只是在最近才发现和开采的。

律,成功地达到繁荣的高峰,连得天独厚的地中海地区也不得不表示羡慕。

文明的完整形象

这样,我们看到,商业和工业文明的始源是两个新教国家:英国和荷兰。它的最灿烂的成就也是新教国家:斯堪的纳维亚,瑞士,美国。但是姑且放开这些典范,而去比较一下中等的成就,这方面也一样,对比是多么鲜明啊!

一方面看看以新教为主的文化领域,其中最发达的国家有美国、瑞典、加拿大、瑞士、丹麦、联邦德国、挪威、澳大利亚、荷兰、芬兰、联合王国、新西兰;另一方面看看十二个大部分天主教的国家,其中最发达的有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波兰,阿根廷,委内瑞拉,西班牙,智利,葡萄牙,乌拉圭。第一组国家按人口平均每年收入为三千五百美元*,第二组国家则不到二千美元**。而基督教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则遥遥领先。

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技术和科学上的问题,这同政治和社会进步是分不开的。正是在新教影响下的国家,低收入,不平等,不卫生和新闻检查等现象,已接近消灭;民主意见一致的程度最高,儿童死亡率和文盲比重最低,民主扎根最深。这些国家不仅仅是工业化的,它们有着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司法的、文化的因素,神秘地相互作用着,构成文明的完整形象。

* 这二十四个国家是按1974年情况排列的,1975年有了变化(参阅附录494页)。

** 根据世界银行1974年年鉴,在超过二千五百美元的十五个国家中,十三个信奉犹太—基督教(美国,瑞典,加拿大,瑞士,丹麦,联邦德国,挪威,澳大利亚,荷兰,芬兰,以色列,联合王国,新西兰)。只有法国(第六位)和比利时(第九位)例外。

在人类漫长的行列中

为什么从十七世纪初开始某些国家能掀起这样迅猛的发展呢？这几个火车头国家在人类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最近的三百年在人类历史中也只占十分微小的一部分。这是历史最大的一个谜。人类从地球上出现到今天已有三四百万年了。然而，这小小一队新教文化的国家，却使人类越出了他们一直走着的老路。人类因人口增多而向前推进，而又定期地因贫困大批死亡。贫困是这种向前推进必然给人类带来的后果。这一小队国家使人类逃脱这种可怕的生物平衡，其中流行病、饥荒和战争定期地抵消了过高的出生率。

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言里写道：“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只不过给追随它的人指出他们自己前途如何而已。”这正好是经过宗教改革的国家所做的事。在人类漫长的行列中，他们远远走在前面，给其他国家描绘出发展的宏图。

第十五章 两种速度

这样，在反宗教改革后，仍然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睡着了。在改革后，新教国家却醒来了。让我们只是说，在反改革后或改革后罢；目前还没有什么根据可以让我们说，由于反改革或改革。

但是分界线并不是处处都那么单纯的。它把某些社会分割为二。民族只有一个。以前的历史是共同的，然而却分为两个集体，有时是极不相等的。

这种经济劣势使人迷惑不解，在同一个国家的新教集体和天主教集体之间是不是也有呢？如果有的话，那就应该认为宗教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了，民族因素不再同宗教因素相偶合，而且也许不再混淆宗教因素。

这里并不缺乏例子，作为反证。让我们举出其中的四个吧：德国，爱尔兰，法国和加拿大*。

天主教德国和新教德国

在德国人当中诞生的宗教改革并没有争取到全体德国人，他们的宗教统一性因此而完全破裂。从那时起，德国成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插花地。

就新教部分而论，德国没有荷兰，英国，瑞士或甚至美国那么迅速地进入工业化时代。这是不是一个例外呢？在肯定之前，应

* 在美国和荷兰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但是卡尔文主义榜样的优势从一开始就如此之大，以致在这两个国家的天主教集体中，很难找到反改革社会所独有的那些特点。

该指出，经过宗教改革的德国是路德教的而不是卡尔文教的。德国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正因为这样，它停留在策源的阶段。路德教是一个教会，无疑地是反天主教的，但它是一个等级制度的教会和教条的教会，对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路德教是介于天主教和卡尔文教之间。这可能关系到为什么受卡尔文教影响的国家在十七世纪便得到高度发展，而路德教国家却要到十九世纪，天主教国家则需要等到二十世纪。就好像在路德教会的一层涂料下，解放能动的的作用成熟得比较慢，而在卡尔文教起催化作用的国家里，成熟得就比较快，但是路德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还是要快些。

还可以注意到，普鲁士所显示的面貌同天主教国家类似。中央政权是强有力的，所依靠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社会是分为等级的，纪律是极端的。在成为一个新教社会之前，这是一个战斗的国家。正像路德教会一样，国家浸透着天主教精神。

但是，在十九世纪，德国开始建立现代化工农业，当时是新教徒把国家的其余部分带动起来的。在几个教派同时存在的邦和在德国的均势里，也是新教徒——或者犹太教徒——最经常地掌握着大商业、工业和金融事业。新教徒的普鲁士早在1840年（先于法国）就拥有重要的铁路网。至于天主教徒们则局限于小商业和家庭手工业。马克思·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其立论的出发点，正好是他的一个信徒马丁·奥芬贝彻在1900年写的一篇论文，论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巴特地区的各自地位^①。奥芬贝彻证明，天主教徒住城市的较少，文化程度较低，占有店主、手工业者和机关职员职务，而新教徒则大批地取得工业家、技术家、银行家和大商贾的地位。西部和南部的天主教乡村，在小农所有制的影响下，脱离不了衣食农业的习惯。相反地，北部和东部的新教徒则很快地实行现代化的经营方法。

这种势力对比曾在上一个世纪引起了实力较量，在分裂为许

多邦的德意志，生命力和故步自封势力之间的冲突是在两极的周围摆开阵势的：新教的北方以普鲁士为首，天主教的南方，以巴威略为中心，并以奥地利为依靠。生命力取得了胜利。德国 1871 年 1 月重新统一在霍恩佐林王朝下，投入工业化和经济扩张运动。

继萨多瓦（1866 年—1913 年）后的半个世纪，德国的实力和潜力真正地建立起来了。我们这些法国人，总把这个时代涂上“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色彩。这是太忽略了以下一个事实：德意志帝国不是“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它只是君主立宪制的联邦。每一个邦（普鲁士，巴威略，符登堡等）有自己的王朝，自己的议会，自己的立法，自己的预算，有时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代表。德国仍然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多种多样，多中心，并不断扩张，其中的每一个天主教邦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它善于灵活地发展。这一事实，常常太不受人注意了，可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说明为什么日耳曼德国有它的生命力。

然而，在这种多样性的中心有一种统一的能动性。1906 年，一个瑞士的历史学家保罗·塞佩尔写道：“在我看来，现在的德国是处在发展的开端，有可能达到现在最天主教化的国家的水平。衙门精神蓬勃发展^②。”早在事情发生前四分之一世纪，塞佩尔就已预测到有一天“一个显赫的人物，将会光辉地体现一贯正确的精神力量，并把这个原则扩大到一切方面^③。”这个人物是从南方来的——从圣日耳曼帝国最天主教化的那一部分来的：这就是希特勒，他出生于奥地利，在巴伐利亚得到民间最大的支持。而在 1944 年 7 月反对希特勒的谋反者中，大部分却是新教徒，特别是卡尔文教徒。

1945 年以后，在英美的影响下，我们可以看到，分散权力的倾向在西德占了优势，重新接上了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传统；而联邦结构似乎足以把那些魔鬼撇开，他们曾借着中央集权的机会进攻德

国人民。

现代化的爱尔兰和落后的爱尔兰

背景是简单的,但也是够特别的。艾尔,这一爱尔兰清一色的天主教部分,1921年得到了独立。比艾尔小六分之五的厄尔斯特则继续附属于联合王国,拥有相当于它的邻邦一半的人口*;但是其中一部分是新教的(百分之六十五),另一部分是天主教的(百分之三十五)。

艾尔,从它的经济来看同不发达的国家相似。农业是它的主要活动,把一半人口拖住在农村。它输出农产品,占全国出口的四分之三,另外,出口只能补偿进口的百分之七十。只有靠旅游业才能保持收支平衡。四分之三的农户仍保持着原始状态,以衣食经济为基础。工业本身也只靠耕作和牧场这两个乳房来喂养:威士忌酒,啤酒和毛线衣。

南爱尔兰的生活水平因而受到影响,它的总生产低于厄尔斯特,而厄尔斯特的面积却小得多。这是因为以贝尔法斯特为中心的六个郡早已工业化,从十九世纪开始,它们就已从事亚麻加工和造船工业。

厄尔斯特和艾尔之间的天然资源差别是否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呢?丝毫不是,况且,天主教居民的经济落后状态同样地可以在厄尔斯特内部看到。

如果把清一色天主教的艾尔来同新教占多数的厄尔斯特来比较,或者拿厄尔斯特居民中的天主教部分来同它的新教部分来比较,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一样的。新教徒“创造”了(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或者“霸占”了(据天主教徒的说法)发财致富的职业:工

* 1973年,艾尔人口有三百万,比爱尔兰北部多一百五十万人。

业、技术，港口活动，大商业，银行，保险事业。总之是实业。天主教徒则局限于衣食经济的传统职业：农业，开采泥炭，渔业，小商业，手工业。

这仅仅是殖民统治的现象吗？当然，没有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会忘记德罗格达的屠杀：“那些卑贱的野蛮人”，像克伦威尔称呼这个小城镇的居民那样，在1649年遭到无情杀戮。直到今天，当你参观这个发生了大型的奥拉都惨案*的城堡遗址时是不能不令人发指的。当时，爱尔兰人不断受到英国人压窄。

但是从十九世纪以来，英国人是否阻止爱尔兰天主教徒进行农业现代化，从事商业，发展工业呢？没有。直到1921年，在统一的爱尔兰没有，1921年以后，在双宗教的厄尔斯特没有，从1921年以来，在独立的艾尔，那就更没有了。那么，障碍是不是主要在·人方面呢？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不是拒绝接受现代化经济呢？

他们像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那样固执地向人口密度四十的大关猛撞。当他们闯过了这个关键的密度之后，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逃脱饥荒，只有大规模地向外移民。在整个十九世纪，主要是到美国去。这是真正的大失血，使爱尔兰丧失了一大部分人力资源**。即使我们侧重于殖民剥削这个唯一的假设——再说，历史资料是否认不了的——那么，仍然并且总是需要回答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为什么天主教居民是可以殖民化的，而新教居民却不可以呢？

在厄尔斯特，数世纪以来的仇恨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立起来，但这不仅仅是宗教上的争端，它具有宗教战争的猛烈程度，由于种族之间的冲突而拖延下去，并继之以阶级斗争。

这三种仇恨把两个社会对立起来，一个是创造商业文明的社

* 1944年6月10日，德国人把当地全部居民杀害。——译注

** 在美国人口中，爱尔兰移民适应了当地的文化，但仍保留他们的宗教。

会,一个是为农业文明而建立的社会。它们当中,无论哪一个看来都无法摆脱这种对峙的局面。

法国,或活跃的少数

法国同爱尔兰相比较,给我们的假设提供了反证。“压迫者”是天主教徒,在我们这里,德罗格达叫做圣巴特勒密或者龙骑兵的骚扰。但是“被压迫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新教集体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法国并没有真正成为双宗教的国家;然而,就它的比例说,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新教集体具有优越的生命力。

当路易十四 1685 年废除南特上谕的时候,新教徒只占法国人口十分之一,但是他们是最有教育的,最会办事的,最为机敏的人。

在差不多两百万法国新教徒中,无疑地,足有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由于受到迫害而离开了我们的国家。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迫害为废除上谕作准备,并在废除上谕后继续下去*。往往是那些取得最好成就的人觉得自己最有能力在别的地方得到成功。这也是他们所做到的。他们迅速地在瑞士,荷兰,英国,普鲁士和直到瑞典或芬兰,归化为当地人,常常在当地取得最高的地位。在阿姆斯特丹银行,1685 年后,盈余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他们带走了他们的资金,同时也带走了技术,制作秘方,或简单地说,他们的进取精神。

与此同时,留在法国的新教徒继续在经济上表现出他们的能动性,大大超过了其余的居民④。

他们善长经营金融事业,这正是君主制政权的弱点,即使在废除上谕后,政权仍起用他们。饥不择食,救国压倒了上谕。

巴特勒密·赫沃特是贝尔纳·德萨克斯军队的军火供应人,

* 据塞缪尔·穆斯牧师的最新和最精确的估计,有二十五万人在废除上谕后出走。但是迫害和人口外流继续了一个世纪以上。

他成了黎塞留、马扎林然后是科尔伯特的经纪人。1650年，他任财政大臣，以他的巨大财产资助国王的事业。塞穆尔·贝尔纳随后接替他。路易十四决不因为他是新教徒而触犯他，而是亲自在马尔利接待他，他们这次散步由于圣西蒙的文笔而流传后世；路易十四竟然把他封为贵族。

上谕是路易十四废除的，他的嗣君不好意思对法国或外国的新教徒银行家表现得更为宗派主义；新教有这种消除国界的本领^⑤。苏格兰的新教银行家劳，被邀请营救路易十四遗留下来的财政灾难；日内瓦的新教银行家尼克在革命前夕被邀请协助国家从破产中摆脱出来。但是这些外来的东西，虽然移植过来，却没有能够长牢。今天的许多“技术合作”的情况也不见得更妙，差距太大了，而时间有限^⑥。

在1789年大革命期间和以后，新教徒常常从瑞士回到法国，同犹太人一起，成为法国上层金融界的巨头——甚至是仅有的巨头。在法兰西银行，他们当了董事*。十九世纪天主教人士在巴黎创建的唯一商业银行，开张不久就倒闭了；总联合银行是1878年创办的，以后在中欧进行投机活动，四年以后就垮台了。直到我们今天，法国没有一家商业银行原来不是由新教徒开办的，或是由犹太人开办的**。长期来，新教银行业的“公司”（施林伯格，霍丁格，纽利兹，马勒，维尔纳等）有很大势力***。

如果翻阅政治学年鉴（1870年新教徒创办的），财政督察年

* 马雷四代人从1800年到1936年国有化的时候，不间断地占有一个席位；在那里，还有四个霍丁格，三个皮勒·威尔，两个德勒塞，两个维尔尼，一个密拉博，一个安德烈，一个纳弗利兹，一个果戈尔^⑦等。同样的姓名也出现在许多保险公司的领导人物中，或者在佩雷尔——以色列人——1852年所创办的动产信托银行的主要股东之中。

**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论述犹太少数民族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活跃的、自由的和多中心的少数民族。

*** 但有削弱的趋势。

鉴,外交年鉴,商业顾问年鉴,审计院年鉴,以及最大的企业和工业各行联合会的年鉴,你就会发现,胡格诺派后代在法国经济生活主要部门的比重,同法国经过宗教改革的集体在人口中的比例,是无法比拟的。

废除南特上谕在加拿大的余波

“啊!如果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当年让法国的新教徒前来新世界定居——魁北克的首席部长以一种忧郁的幽默口气对我说——头一批登上月球的人就会是说法语的,而不是说英语的了!”

1967年9月,戴高乐把我派到魁北克——这是在他发出“自由的魁北克万岁”口号之后数周。人们在群众欢呼声中作出合作的建议,接着应该提出具体的内容了。在一家老牌饭馆,丹尼埃尔·约翰逊邀请我和他的两个部长马塞尔·马塞和克罗德·莫林不利。他作了上面这个出奇的事后假设。他接着说:

“所有这些法兰西的精华,白白地在欧洲流散,对法国十分不利,而当时的美洲正等着人去居住哩!这些移民本来可以毫无困难地压倒新英格兰的英国人,而现在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压倒了我们。我们是一个法兰西小岛,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海洋里连看都看不见。”

谈历史,讲“假如”总是有点可笑的。但是每想到这一点,又怎能不可惜那半百万的新教徒移民没有到新法国去定居呢?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人数上以及在能力上,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就会大大不同于西部的六千多个贫穷的农民,他们当时是我们在美洲的全部殖民。那就会比当时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人多两倍。英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同,他们的少数教派或“持不同见解者”得到方便,移居到大西洋彼岸,法国则拒绝让遭到驱逐和赶散的“宗教群众”去碰碰这个运气。专制主义是无情的,它排除异己,即使在流放中也

不放松*。

多数派低人一等

今天,看到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伤心:甚至在法国人占百分之八十多数的魁北克,英语也是富人的语言,法语则是穷人的语言。

魁北克同爱尔兰一样,问题不在于众所周知的压迫的少数,而是多数派低人一等,需要法律的保护不是少数,而是多数。新来的移民——意大利人,希腊人,德国人——在这方面并不会搞错。十分之九马上就归化为小部分操英语的居民;他们决意合并到统治的少数中,而不是被统治的多数中^⑨。

这样,魁北克的法国居民,在他们保持和发展的土地上受人支配,他们的命运是最为矛盾的。操英语的居民拥有六所大学中的三所,电视台和广播台的半数,差不多全部大的金融、工业和商业机构,加拿大的法兰西人无可否认地在魁北克掌握着省和市的政权——在一个权力分散和联邦的制度中,这是主要的。然而,他们的困难更主要的根源不在于权利和政治方面,而在于思想习惯上。出于面子关系,人们装模作样,说什么魁北克的悲剧是“语言上的”。然而,英语只不过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思想和社会的外表,而法语也只不过是一种处于守势的思想和社会的标志。

从钱普林到达魁北克起,直到1763年签订巴黎条约,新法国的法兰西人是受老法国遥控的。中央政权在巴黎裁决的都是“花园里走失一条牛呀,教堂门口发生争吵呀,甚至争论一名妇女的贞操问题之类的纠纷^⑩。”科尔伯特曾指示总督弗隆特那克“要不知不觉地取缔那个代表所有居民提出请求的理事,因为最好让每一个人自己为自己说话,而谁也不要为大家说话^⑪。”在这个时候,新苏格

* 这个废除上谕的余波,魁北克的历史学家是很熟悉的,但是大多数的法国人,甚至历史学家却不知道。最新的关于路易十四及新教徒的著作并没有提到这一点^③。

兰或者新英国的殖民则受到鼓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

巴黎条约签订后,这个社会就无人过问。它是原始的,胆怯的,受压抑的,一直没有改变。加拿大的法兰西人蜷缩起来,他们的社会是等级制的,由教会权力控制的。由于害怕共同生活,他们自我孤立起来。他们就这样度着他们的岁月,一直原封不动。而这个时候,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加拿大的英格兰人却造就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改变是不是还有可能呢?今天,法兰西—加拿大这个集体感觉到不可能从落后中赶上去了。直至1960年,它的人口增加得这样快,以后,却经历了现代社会中所能见到的最猛烈的出生率下降。好像他们已经不肯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⑫。会不会来一次最后挣扎呢,好像有一些迹象,除非这样……

德国,爱尔兰,法国,魁北克,这条文化路线证实了我们的探讨所得到的初步教益。在同一个社会内部,思想解放了一部分人,又压抑着另一部分人。到处都可以遇到这种规律支配着的几乎使人恼火的差别:一部分是打上新教的印记的,而另一部分则打上天主教印记。

第十六章 例外证实了 规律: 英国的昏迷

我们的小小文化地理，一宗一宗地证实了新教社会具有适应“发展”的最大能力。正是在它们那里，通过它们，商业和工业界过去和现在取得最辉煌的成就。联合王国虽然长期以来是这一文明的典范，但是它现在不是表现出它自己也不是永生的吗？难道它不是一个重大的例外否定了我们开始得出来的规律吗？

今天，英国成为欧洲的“穷亲戚”*。1914年战争前夕，它已经不是唯一的带头人了。在两次大战中间，它已显得有点气短了，但是，真正的逆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年代。在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阶梯上，英国人攀登得没有那么快：德国人和法国人加快了他们的步伐，在1960年前后赶上了他们。目前，英国人在欧洲九国的末尾踏步，紧跟着他们的是意大利人。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到1980年前后，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二十四个成员国中，英国人就只能比希腊人，爱尔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好一点。

这个民族曾经那么善于全力以赴，经受考验，却似乎对危险估计不足，要不然就是把他们的幽默感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而不愿面对严酷的现实……

* 而明天，也许是别的国家，它们由于自由而冲昏了头脑，例如荷兰。

**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包括自由世界的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下降的迹象不断增多。伦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止，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到1976年退居第十位，联合王国在国际工业产品贸易中的份额从1963年的百分之十五点三降至1973年的百分之九点三。在西欧所有国家中，它一直是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个。

退休的国家

英国人对这种没落没有作出反应——也许这是他们不能再次振作起来的原因。但是他们怎么会衰落的呢？

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属地吗？的确，任何其他强国都没有征服过那么辽阔的属地。不过，英帝国只是个校友会而已。但是，荷兰，法国，比利时也丧失了它们的帝国。对于它们当中的每一个来说，属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英帝国对英国的重要性；然而，非殖民化却推动了它们的发展。另外，英国在政治上脱离得很成功，但是并没有在贸易上脱离。

更为严重的是，英国放弃了在世界上的金融地盘。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流失了大量资本，到1938年，它同纽约一起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为了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伦敦却成了债务人*。而迄今为止，它是用投在国外的资本所得的收入，来弥补贸易上的逆差。国际收支就受到了影响。更糟糕的是：伦敦银行区并没有抛弃出口资本的习惯——毫无疑问，资本在当地使用，本来会对国家更有利。

例如，用来使工业现代化。过去，英国人的成功是靠他们的先进技术。然而，他们却忽略了更新设备，建设新工厂。这样一来，他们的产品便不再有竞争能力，不能在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扩展运动中占有他们的地位。

在这里，碰到了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以及荷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着手使他们的装备现代化，而为什么英国人却让自己放任自流呢？**

* 借了三十六亿英镑。

** 当时，英国从美国得到的援助，在比例上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包括联邦德国在内，虽然传说不一样。

三百年来，英国人忘我地工作，靠了纪律，大胆，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求他们作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困难的壮举——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接受了挑战，但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大规模的罢工有一个时期影响了作战的力量。丘吉尔只是靠答应将来有一个福利国家才制止住这些罢工的。

英国人经受了考验，作出了努力，现在要求享受成果了：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下午早早回家。他们不自觉地说出，他们更关心的是国民幸福总值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他们深信其他工业国家将来必定追随他们的榜样。

但是，他们难道不是侮辱未来吗？因为他们所作所为就好象是个退休的人，有正当权利希望享受一下好日子，因为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可是对一个民族，就不能这样说了。这个社会原来是世界上精力最充沛，最有进取精神的社会，现在却沉迷于享乐和福利国家的毒素中：人人为自己，国家为人人。

降 压 事 故

丘吉尔是战争年代的风云人物，在和平时期的选举中，被击败了，把地位让给了工党。于是他们毫不吝惜地把丘吉尔当时不得不答应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有保证的、用法律规定下来的、官僚主义化的福利。

随之而来的是，英国背弃了它的传统。国有化^①给经济自由化，甚至给市场法则打击很大*，社会化的政策使一个迄今酷爱个人竞争的国家适应了集体化。

* 1976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六十八的英国人认为国营工业比私营工业效率低（1969年是百分之五十五），赞成继续国有化的人从百分之三十二减为百分之二十。^②

有史以来，一个国家由于政府不断加强干预而得到好处，而同时又能避免官僚主义所分泌出来的毒素，这种事情从来不曾有过。但是，一个人甘愿生活在一个养老院里，那就必须忍受一些小的不如意的事情了。最好是和和气气地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

福利国家大概同英国的传统大相径庭，而英国正是依靠它那些传统精神树立其伟大地位的，那就是：敢冒风险，首创精神，企业精神，吃苦耐劳，激烈竞争等。

道德准则的颠倒引起了国运的逆转。

潜水员习惯了海底的高压，要是他太快地回到水面的安逸环境，他的器官就会受不了，就会遇到降压事故；幸运一点是昏迷，不幸的话就会死亡。英国社会所受到的降压大概太快了。瑞典人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所走过的路程，英国人想几年内就走完。瑞典人对国有化表现得慎重得多，即使如此，社会党执政，采取了明智的渐进政策，但仍不免急于求成，终于弄得怨声载道。

工会权力过度膨胀

国家的官僚主义不是独一无二的。工会的官僚主义一点也不比它差。英国工会经常在法国被誉为模范：“啊！要是我们的工会领导人也是那么合情合理就好了！”这样一句口头禅早已失去它的意义了。

直到1969年^③，英国人仍在汽车出口方面占世界第二位。这个地位，由于大规模的罢工，一年之内就失去了。这仅仅是英国工会制度的惊人效率的一个例子。

工团主义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和强有力的政府面前，也成为强大的了。大劳工，大资本，大政府，这个平衡是富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在一个贫血的资本主义和一个软弱的政府面前，工会的力量就更大了。十九世纪，它们是欧洲最早得到批准的工会；1914年，

它们拥有四百万会员——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会。今天，它们的权力过分膨胀*，工党成了工会的党。保守党不善于抑制这种新型的封建势力。

工会和资本之间的传统平衡，以一个想不到的面貌出现；资方让工会加强它们的势力，只要能挽救伦敦银行区，使它仍然是资本和原料的世界经纪中心就行。英国的金融界利用这种客观的合作强迫国家为了过时的威望直接作出沉重的牺牲——间接地加剧了工会的行会主义：两块磨石，把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碾得粉碎。

由于职工会会员自然不愿改换工作和工作地点，工会便制止了一切改变的尝试。既然他们能够规定不得减少职工的人数，为什么要想法利用新机器去提高生产效率呢？英国的航空工业和汽车工业比相同部门的法国工业多用一倍工人，激烈的竞争，企业和职工的流动性促使技术不断地更新。英国经济的能动性，正是由于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刺激而形成的。今天“野蛮的资本主义”让位给了“野蛮的工团主义”。然而，所得结果不是社会的能动性，而是经济的故步自封，在短期内，则是社会萧条。

当然，实行民主轮流执政，可以恢复被破坏了的平衡和唤醒那些不自觉的人**。

衰竭还是退隐

当一个人老的时候，他是整个人老了。当一个社会老的时候，它是局部一块一块地老的。那些不老的部分就觉得很不舒服，英国的衰老是可以用它的年青人逃跑来衡量的。一种逃跑是就地的、无害的，表现于离奇的举动，奔放的幻想，还有流行的歌曲；另

* 即使工党左派头头安东尼·丰奇伍德·本也承认：“工会自己也需要改变④。”但是无论他也好，他的党也好，都无法迫使工会作出改变。

** 工会运动的领导人 1975—1976 年同工党政府签订了协定，限制工资。因此，靠工资收入的人生活水平下降了。但是，通货膨胀率一年之内下降了一半。

一种逃跑是实际的、危险的，那就是英国的大批的优秀儿女纷纷到美国或加拿大去。从1950年起，许多本来可以对英国社会起激素作用的人，如研究人员，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离开了英国*，英国成为一个中转国家，它的优秀分子一大部分出走了，而贫穷的人则进入英国，把它往后拖，并且带来了种族主义。

难道英国只是火箭的第一级，用来把美国发射到轨道上吗？如果要评价整个模型是否有效，那么就应该考虑到整个火箭，而不是只看到它的第一级，燃料用尽以后，这一级就掉下来了。

但是，如果说，英国要销声匿迹了，那是很轻率的。我们曾谈到荷兰在整个十七世纪闪电般飞速发展以后，在十八世纪，也曾藏匿一个时期，那么，为什么英国就不可以经历一个暂时的退隐时期呢？

英国犹豫了那么久，终于加入了共同市场，表明英联邦逐步脱离它的梦想；孤立的处境使人不安；面向欧洲，英国不得不变得现实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在北海很丰富**。这是一个机会，也是国运的一个征兆。因为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就是依赖它的能源的。

英国仍有许多王牌：它科学水平很高***，技术先进，还有伦敦银行区，遍及五洲七洋出众的商业金融网。

社会组织必需不再继续阴险地毒害英格兰灵魂，挫伤它的积极性和革新精神，不再虚荣浮华⑥。英国的力量在于它的道德准则——即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感——只要一天不恢复，它就不能克服官僚主义和懒散作风，那么，就没有多大希望重新得到发展。

* 琼斯委员会⑤对智囊外流作了详尽的研究，它透露说，每年毕业的工程师，高级科学人员和技术人员有三分之一到外国去，打算在外国定居。

** 石油和天然气应该使英国到1980年完全满足它的能源需要，而不受那些支配能源的年青国家的威胁。它的资源有可能在十年内用完，但是这十年将使它得到它显然需要的机会再次喘口气，除非是它沉睡不醒，比十七世纪的西班牙睡在它的金银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 1976年，英国有三十五名在世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第十七章 需要排除的解释

对于天主教国家的停滞和新教国家的发展，能不能从自然方面找出一个解答呢？南方是不是有一种惰性，一种因为天气热而引起的贫困呢？

气候吗？博瓦罗把它看做老生常谈。不同的气候往往造成不同的性格，孟德斯鸠把它提到理论高度。一位博学的教授^①甚至还认定了所谓“最大的气候能”。然而，生命的精力从南方移往北方，而不是气候。拉姆西二世的埃及，阿塞巴尼帕尔的亚述，佩里克雷斯的希腊，并没有等到空气调节好了才繁荣起来。愿意劳动，几乎到处都可以劳动——在阿拉斯加和在尼格夫，在西伯利亚和在大溪地都一样。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同西西里一样热，瑞典和火地岛一样冷。

从气候得出的解答是这样，从土地——地貌及资源等，所得出的解答也是这样。地形学和地质学负责发牌，但是还得会打牌才行。

海外贸易需要港口，需要避风浪的地方。参差不齐的海岸线和海岛可以成为发展基地。但是，希腊虽然在地理上从“佩里克雷斯时代”就没有变动过，却丧失了它的元气。圣马罗港并没有什么变化，却从繁荣而变成萧条。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地理学家，有各种各样的建设家，但谁能想到在亚德里亚海底的某些沙滩上会诞生高贵的威尼斯呢？

天然资源的分配是不能说明各个国家的基本变化的。西伯利亚蕴藏的天然资源同整个欧洲合起来的资源一样多；巴西的同美

国的一样多；巴基斯坦的同日本的一样多，请比较一下结果吧。

当一个民族对工业发生了兴趣，那么，资源的缺乏并不能阻碍它的发展。它会在国外找到它在国内找不到的东西。瑞士是世界上巧克力和咖啡精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它自己却不种植可可，也不种植咖啡，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可以购买。日本缺乏煤*，它便把水泵反过来安装：它以出售制成品所得的钱去支付它赖以制造这些工业品的煤。

腐朽的住宅

这样，原因既然不在于自然的物理特点，那么是不是在于人的特点呢？

怎能不看到，除了日本以外，所有先进的国家都是白种人的国家呢？而在它们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国家又居首位呢？白种人，他们当中，某些民族是不是比别的种族在工业文明方面更有天才呢？

关于这种解释的著作写得不那么多了，但是窃窃私语还继续有。直到今天，科学能够肯定种族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生理方面的：肤色，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形状，脑壳的形状，头发的颜色，身材；至于性格的特点，却从来没有能够跟躯体的特点联系起来。^②

相反，民间的种族主义却表现得一清二楚。种族主义指责有色人种的种种缺点，正象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指责欧洲无产阶级的缺点。那时不是说他们是贼，懒汉，鼠目寸光，撒谎等等吗？这是一切失去责任感和人格的人的毛病，——他们的主人把这些毛病说成是天生的，拿这一点作理由去奴役别人。那是过去的工人的历史，是昔日仆人的历史，今天仍然是黑人的历史。同样的处境，

* 日本开采一点点煤，但产量不足，并且并不适用作炼钢工业的焦煤。

同样的行为,同样的评价。

的确,环境决定性格。即使把侮辱性的外层去掉,这些缺点也依然存在;这些缺点是同经济和社会不发达分不开的,其结果又使这些缺点延长下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只要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缺点就会逐渐消失,无论是黑种工人还是白种工人都一样。

我们是多么喜欢分类和划等级啊!身体的特点显得如此简单、明瞭,就象天然疆界那样。皮肤的颜色,嘴唇的厚薄,鼻子的形状,让人看起来就象文化的外部标志,思想的窗户,这样就把外表当做原因了。

然而,我们最初观察的结果并没有变。谁能否认两个民族在工业文明创造上能力是不相等的呢?但是,让我们不要把一种复杂的心理现实,仅仅看做是种族的简单的生物现象。一个民族的特性和^③文化——就是它——造成了如此突出、持久的差别。它就是从习惯、所接受的思想、先入为主的成见、基本道德准则、社会的组织原则等衍生出来的。

在一个新的区域,人们指给我看某些腐朽的住宅:葡萄牙人和北非人所住的地方,我去看了看。的确,墙上长着厚厚的一层霉。在同一层楼上,完全相同的住宅却完好无缺,居住在那里的则是法国人。“你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对我说,这就是种族,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一个建筑师帮助我找到了答案。葡萄牙人和北非人习惯于较为温和的气候,冬天把房屋封得严严实实,门窗的缝都用胶纸糊上。这样,水气就越来越多了。

几年以前,在卢旺达,一个丛林的飞行员在我们的飞机冲出赤道森林上空的一场暴风雨时,看见我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他向我喊道:“你的反应同我一样;黑人的反应正好相反,这就是种族。”

我们降落时,他解释说,要是飞机座舱在暴风雨里颠簸,非洲人总是心情愉快的。相反,要是他的丛林飞机飞出暴风雨而进入细雨云的时候,他却看到非洲人眼睛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们转动着眼珠,指着从玻璃和舱壁之间透进来一小条水流。他们习惯乘独木舟顺激流而下,所以,对于再大的颠簸,也不在乎。但是,只要有一点水流进来,他们就十分恐惧,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独木舟很快就进满了水。这是“种族”的缘故呢,还是一种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恐惧呢?在这种河流上沉船,就等于送命:鳄鱼总是游得比人快的。

宗教因素

气候,资源,种族,空气,地理或人种的物理现象,所有这些解释,一个一个地把我们重新打发到人的心理上来。

我们在上面几章里曾勾划出发展的简略地理。从那里,好象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假设:商业和技术文明是不是新教的女儿或姐妹呢?

这个问题几乎是笑话。宗教和经济发展怎能有什么关系呢?高炉怎能受到敬神形式的影响呢?

然而,这是个避免不了的问题。夏尔·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大帝后面,总有个亚里士多德”,在拿破仑这个拉丁天才所蔑视的“小店东的国家”,它的成就背后为什么就不会有清教徒的学说呢?

马克思的错误

除非事情正好相反,清教徒的背后就是小店东。要是这样的话,卡·马克思就会是正确的了。根据他的说法,经济问题只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精神上、宗教上、道德上的表现,只不过是经济背景的上层建筑而已。

马克思④，恩格斯⑤和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⑥，他们也注意到新教和天主教国家之间进展的差距。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结论是不容怀疑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国家之所以成为新教国家，为的是使教条和宗教道德适应他们经济制度的需要。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近代历史研究肯定了这种解释⑦。

宗教改革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地震。如果马克思是对的话，那么，要产生这次宗教革命本应先有一次同等规模的经济革命。可是却找不到这样一种经济革命。文艺复兴的伟大发现和伟大的探索，虽然在思想上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没有引起经济上的变革。教士路德把他的九十五个论点贴在威顿伯格教堂门口，比科尔特在墨西哥登陆还要早两年。

如果马克思的看法是对的话，宗教改革本应在当代最富有的和能动性最大的地区，在资本主义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发达的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佛兰德和布拉邦等地出现和传播。然而，这些地区恰恰全部都不在新教影响之下。十六世纪欧洲最大的实业家，热那亚、佛罗伦萨、巴塞罗那的商人和金融家，直至十七世纪初叶，仍支配着欧洲的经济命脉，他们继续效忠罗马。富格是那时的洛克希德或洛克菲勒，他的王朝却为赎罪的教规出钱。教王利昂十世是个银行家的儿子*，他把路德革除出教门，而路德把银行家开除出教。

相反地，正是在经济最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象瑞士，德国一些最穷的邦，和淹没在雾里的北欧等，宗教改革找到了它最适宜的土壤。

* 他原姓梅迪西斯。

一个杰出的不知名的人

如果卡·马克思错了，那么马克思·韦伯是不是对了呢？因为正是德国的这个杰出的社会学家善于把新教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但是他做得最微妙。

这个杰出的人在法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我们从心底、从头到脚不赞成他那些想法，一直等了六十年，他的书才用我国文字出版，我们才能读到^⑨。

这个时候，书和思想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新教国家，争论十分激烈^⑩，但实际上却没有触动象我国这样的拉丁国家^⑪。社会上的反应和从前一样，不愿意看到扰乱自己的东西。

马克思·韦伯并不认为自己发现新教人民在取得经济进展上比天主教人民更有天才。我们已经在上面看到过了，这个事实三百年以来已经得到各种各样的观察家所证实。对于马克思·韦伯来说，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⑫。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道德之间的联系。

他解释说：一方面，卡尔文教派相信命运。他们丝毫不能改变上帝为他们作出的抉择——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这样一个抉择，他们认为已经让他们猜到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事业的成就是上帝意旨的一种体现。他们的事业愈繁荣，他们就愈觉得自己是上帝选中的。

另一方面，这种繁荣是作为一种上帝意旨来追求的，而不是为繁荣本身而追求繁荣。苦行主义纯净了这种繁荣。上帝谴责奢侈，他们就过着简朴的生活^⑬。新教的苦行主义斥责懒惰，鼓励勤劳和合理活动，反对阻碍占有欲望的传统压制，但是它谴责过度的

* 这是他书的书名，1904年版。^⑧

挥霍浪费^⑭。它推动生产,而抑制消费^⑮。卡尔文教派一方面想发财,同时又要过简朴的生活,夹在中间动弹不得,便自发地去储蓄和投资。

马克思·韦伯对他的时代太熟悉了,所以不会硬说清教徒的苦行主义继续得到崇尚。但是,他坚持认为,在十六和十八世纪之间,也就是在所谓“起飞”时代,这种道德观足以使新教国家在资本形成方面领先,等到原来的原因已经减弱了,这些国家依旧继续得到好处*。

原因不只一个, 结果也不只一个

正象马克思一样,虽然韦伯很关心“质量”,但是他受到十九世纪倾向“数量”的影响。他的论证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寻找那些产生过剩资本的新教因素。他简单地把工业发展看做资本主义,又把资本主义看做资本。这样一来,他就认为,宗教因素在工业发展中发生作用,主要是通过积蓄和利润制度化这种杠杆。他会不会是把望远镜倒过来看问题呢?

宗教改革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巨大的新教因素在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经济革命的巨大因素在发展。韦伯简单地把前者看做原因,即苦行主义;把后者看做前者的结果,即资本积累。要不要在经过宗教改革的思想体系和工业文明体系之间,确定其因果关系呢?在两个兄弟的、彼此相邻的火山,人们本来可以探索它们共同的地下深度,可是人们只满足于在山脚下建立一条小桥,把一个山脚同另一个山脚联接起来。但是离火山口和爆发却很远!

* 我们表示抱歉,因为把马克思·韦伯如此丰富的思想太简单化了一些——他在1904年以后的著作中,把他的思想大加斟酌——我们主张在一部理论性的著作中专门深入论述这个问题。

经济,决不仅仅是经济

马克思只看到两个因素在起作用:资本和劳动。韦伯看到第三个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在他的发现上,他不敢坚持到底。他把文化因素看做次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是资本。

然而,在我看来,这第三个因素比其他两个因素更有决定意义,而且支配着其他两个因素。在经过宗教改革的国家,可以看到人们完全从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信任个人和团体,爱好科学研究,爱好技术,鼓励首创精神和经济的思想习惯。在反宗教改革的国家,可以看到人们屈服于等级制度的权威下,不信任个人和团体,形成一种组织,敌视自治和革新,抱有反经济的成见。

托马斯·达金^⑥早已认为财富如果使用于正当的目的,在道德上可能是好的。相反地,卡尔文虽然批准有息贷款,但是加以种种限制。生产贷款是资本主义的必不可缺的动力。要使贷款成为正当的,就得让借款人得到同贷款人相等的或比贷款人更多的收益。职业贷款人——即银行家——是受到谴责的。所有这些想法同资本主义思想是不大合拍的。

卡尔文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半。在他以前,许多教会人士和人文主义者表现得更为大胆^⑦。十六世纪,整个西方打开了资本主义的智慧和精神的道路。但在短期内,新教主义意味着宗教重新严厉起来,把好些道路堵塞了。

大部分卡尔文教派的初期社会,在日内瓦,荷兰,苏格兰和帕拉坦那,都对经济活动制订了落后的规定^⑧。这些社会,由于宗教斗争而变得无情,它们没有能够逃脱宗教狂热。一直要等到卡尔文教派发生“偏差”,在阿尔密纽斯和苏西纽斯的门徒中,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例如在阿姆斯特丹和利德^⑨的“阿尔明尼亚”市。又如在日内瓦,当它在十七世纪末叶摆脱了正统派掌握的时候^⑩。

韦伯点出一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向来得不到承认^②:现代经济的独特性是不能唯一地或主要地在物质基础上形成的。韦伯的同代人,马克思主义的也好,自由派的也好,他们认为资本、天然资源和大量劳动力就足以引起经济高涨。韦伯的功绩在于他预感到精神方面的原因可能在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上起作用。

应该在他的航线上,而且更深入地,通过思想习惯去找寻什么原因使得工业文明仅仅在几个世纪以来,仅仅在几个社会中繁荣起来。

第十八章 为什么西方分道扬镳

从十七世纪初叶起，西方的基督教就分道扬镳了。为什么拉丁国家的土壤变瘦了呢？而北方国家的土壤却肥沃起来？怎么那些筹划家，创新家，革新家在这里总是可以成倍地增加和发挥他们的力量，而在别的地方，一种社会惰力却把他们消灭或者瘫痪了呢？

也许，我们可以冒昧地在这里提出一个答案。基督教在改革和反改革之前，包含着矛盾的因素。作为个人命运的宗教，基督教通过把主观努力和上天赐福结合起来，释放出解放的力量和生命的力量。与此同时，它教导要超脱尘俗和安分守己，促使人逆来顺受，相信宿命论和接受等级原则。这种混合，说明为什么整个基督教从我们时代一开始直到十六世纪，走过了多么暧昧的道路。

古代的文明大部分都不喜欢劳动。只要有可能，就把劳动变成奴隶的专业*。犹太—基督教文明使劳动受到尊重，成为信教的人应该喜爱的一种义务。耶稣把一个仆人贬入地狱，因为他没有把主人交给他的钱去生利钱^②。他的信徒保罗禁止游手好闲：不劳动者不得食^③。

特别是，耶稣发出了个人号召。头一次，宗教不再是一种手段，通过仪式和祭祀去安抚外面的魔鬼。它使灾难成为内在的东西。由于把善恶之争放在每个人心里，从而产生了空前的变动。

* 当赫西奥德在《劳动和时代》，吉尔在《乔治克》中歌颂田园劳动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反潮流精神。在希腊的某些城市，要是从事商业或工业就会丧失公民资格。对于罗马人来说，无所事事(Otium)本身就包含着价值^①。

它使人失去平衡,从而促使他行动起来,出去冒险,但是同时得到上帝的保佑。这个上帝是歌颂人类的。这是一个信任的宗教,能够建立一个信任的社会。一个上进的宗教,能够发挥上进的本能。

但是基督教的这些能动的原则大部分都被抽空了。从四世纪开始,支配教会组织的是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当时,解放的使命落在凯撒国家遗留下来的等级制度和教条制度手里。教会因为不再受迫害,如释重负,却落在康斯坦丁皇帝皈依的圈套里,滑进后罗马帝国的模子。当后罗马帝国在野蛮民族入侵的恐惧下解体的时候,教会是唯一坚持下来的结构。无疑地,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结构,乃是由于,它仍然还是一个结构。在一切制度一扫而光的时候,教会取得了权力。当时没有任何事情促使人觉醒。六个世纪以来,成为地方病的无政府主义没有促使人觉醒。无政府主义反过来促使人想有一个强暴的严密的秩序,但这种愿望也没有促使人觉醒。

生命力和繁荣

然而,从十二世纪开始,企业精神和革新精神动员起来了。城市得到了新生。基督教,从拉丁国家开始,表现出非凡的文化、艺术和经济等方面的繁荣景象。

市场,钟楼,教堂至今仍然是这种繁荣的见证。从威尼斯到布拉奇,从鲁恩到纽伦堡,人们制造,贸易,旅行。在这些城市里,不但出现现代经济,而且还逃脱了军事和宗教封建主义的紧密罗网。革新精神和自由精神在那里得到蓬勃发展,表现于新的职业、贸易和自治等方面。市政赢得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在这个胚胎中的新世界,政治自由同经济自由一起苏醒了。依靠了这两者,一种新的人物诞生了,这就是资产阶级企业家。

例如贝纳德托·扎卡里亚^④，1248年生于热那亚，十一岁便到东方去，在福塞矿区开采明矾，自己建立一支船队。他把在乌克兰和保加利亚买来的谷物，以及俄罗斯的皮革和鱼，运到热那亚；运到东方去的货物包括有香帕尼的布，意大利的武器，科西嘉的盐。扎卡里亚的生意一直做到黑海边的特雷比琼德，一直到亚美尼亚。他把他的船队借给一些国家的君主，五十八岁时回到热那亚，以后，死在他海边的宅邸。

这样的人受到基督教思想所具有的责任感的驱使，他们的自由是在那种“罗马式”的等级制度的边沿得到发展的。在边沿，而不是在对面反对。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想要扩大这个边沿，并且开始取得成功。

直到十六世纪初叶，谁提出疑问，即使在我们认为无关重要的方面，也会在异端的罪名下被开除出教。人们只容许一种统一的思想。

然而，以伊拉兹马斯^⑤为首的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人文主义者激烈地反对这种教条主义。伊拉兹马斯认定，唯一的真正统一是要来临的，但这不是单一性的统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人们只能按照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的原则去团结人。只有忍让，才有和平^⑥。智慧要求人们在制定信条的时候，满足于多种多样的最起码的共性，而不是颁布各种信仰，规定得那么死板，以致只有用强制的办法来强加于人。只有不同的眼光才能认识真理，就象一个车轮的辐条向轴心汇合。

这种革命的思想在几年之内得到非凡的成就。古坦伯格发明印刷术好象正好用来传播这种思想似的。伊拉兹马斯在整个欧洲都有信徒。他可以自豪地写道：在他们当中，有皇帝，有英国、法国和丹麦的国王，有德国的费迪南邦君，有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君主，主教和学者。1522年，他的同胞和朋友，阿

德里安六世成为主教。基督教徒的逐步解放是近在眼前了。

但是,这种解放流产了,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在宗教改革中爆发了,但在反改革中被扼杀掉。这个运动本来可以把整个基督教推向前的,但由于自身的分裂,却把基督教分裂达几个世纪之久。

文化革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差不多所有持久的成就已经都体现在伊拉兹马斯身上,尽管路德的想法相反,说他滑得象泥鳅一样。尊重个人自由,肯定个人责任,“每一个人^⑦都可以掌握真正的神学”,认为需要把圣经翻译出来,使宗教接近人民。正当这些思想逐渐得到接受的时候,路德的进攻精神很快就造成冲突的局面。伊拉兹马斯的办法是思想交锋,坚持不懈和多方面的渗透。路德的办法是进攻。

路德拒绝服从罗马。他把伊拉兹马斯初步设想的普及圣职的理论推论到极端,说是:每一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是自己的牧师。这太过分了,于是引起分裂。伊拉兹马斯是个改良主义者。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正象所有革命一样,它引起了反革命:反改革。

在这两方,极端态度占了上风。新教的主要使命是解放人类,但是一支解放军首先是一支军队。当它要艰苦战斗的时候,尤其如此。在反对教皇派的斗争中,宗教改革加强了自己一派人的战斗性。神圣战争对于发展思想和经济自由并不是最有利的氣氛。

开始的时候,路德派和卡尔文派用另一种神权来代替神权。但是——这对未来是有决定意义的——他们把神权建立在本身就不稳的基础上,因而神权也就不稳了。作为伊拉兹马斯的信徒,卡尔文鼓励他的教友对他们自己负起责任,他发动了一个他自己也没预料到的运动,这个运动不容易控制,发展下去就必然粉碎中世纪的等级结构,并代之以民主结构。从十三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觉得,各种力量,创新的兴趣,办事的欲望正在释放出来。宗教

改革加剧了这种发展。

分裂者不可能恢复有利于自己的统一：分裂只能产生分裂。博苏埃把教派的增多看做是新教错误的标志。我们的时代精神却从这里看到了多党执政的能动性。

给普罗米修斯平反

卡尔文比路德更加认为人的秉性是坏的，由于原始罪孽而永远腐化。只有上天降福这种想不到的奇迹才能挽救他。卡尔文教徒放弃通过具体活动使自己得救，而相信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可是，在他们那里，却往往发现，他们的精神生活贫乏，而具体活动则得到发展。但天主教徒则歌颂要通过具体活动使自己得救，但往往他们的精神生活很丰富，而对具体活动则不关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种真正的辩证的转变。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具体活动受制于神运，因此应受到等级制度的严密监视，这样，便在正统的思想下，变成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新教徒对于能否接触到上帝已经不存在幻想了。既然上帝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被抛弃的。既然你太腐化了，不能到天上去，那么地上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了。正因为具体活动——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对于新教徒来说已成为一个自治领域，他们的创造能力能够在这里表现出来，他们对上帝漠不关心，教会也不加干涉，人就可以自由活动。天主教徒是把自己埋困在祈祷中来求得满足他的超脱的本能，而新教徒是通过全力以赴地投入平凡的工作中来超脱自己的。天主教的信仰在神秘中得到发展；新教信仰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事实上，如果能够对人的精神目的拟就一种学说，可以改善他的物质处境，那就太方便了。通过这种转变，可以多么心安理得啊！

宗教改革——从长远来说——主要后果就是同等级制掌权的原则决裂，是同以教条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决裂。后代人依靠卡尔文的教导，使自己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例如，通过重新解释圣经来为他们的经济态度寻找正当理由。新教徒，从他们同罗马断绝关系的时候开始，可以自由地创立他们需要的神学根据。他们成功地破除了禁忌，给普罗米修斯平了反。

这种解放是否足以说明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发展上的差距呢？不完全能够。因为人们已经看到，那些仍然是天主教的国家在以前三个世纪中获得出色的经济发展。如果能继续下去的话，它们无论在那一点上都不会比新教国家差的，甚至可以根据逻辑推论，由于它们所获得的速度，它们本来可以加快它们的进展。

换句话说，经过宗教改革的国家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不过是继续整个欧洲从十三世纪以来的发展路线而已。这是仍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因为不发达而中断了这条路线。是这种不发达向我们提出了问题。使人迷惑的事实不是新教的曲线向上升，而是天主教的曲线往下降。正当所有物质、经济、财政特别是智慧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可以使欧洲——首先是南欧——一帆风顺地进入技术发展的时代，宗教的破裂打破了运动的统一。而当某些社会奋身进取的时候，其他的却抛了锚。

新教成功的秘诀是记载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的。现在应该来衡量一下反改革在这一部历史里引起的分裂有多么大。

文化反革命：反改革*

从 1545 年到 1563 年的十八年内，罗马教会通过特伦特主教

* 现代的历史学，从杜普隆到德卢莫，宁愿用“天主教改革”这种说法，更为公正地评价这个运动有不可否认的积极结果。但是这等于掩盖了特伦特主教会议的反攻性质，在基督教社会里对于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发展来说，这个消极的和引起论战的结果是主要的。

会议整顿家务，它扫除了千百种不纯洁的东西，重新树立虔诚的风气。但是要是受到进攻，它就排成四方队形。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奋起自卫，使用它的一切权力手段，使自己得到加强并军事化。

宗教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一分再分，造成千百个教派。这种改革往往是狂热的，不是吗？无疑是这样。但是，能够选择* 自己的信仰狂热就是自由的第一步。反改革相反地把天主教的系统精神和罗马的统一思想推向极端。它的阴影笼罩着仍忠于罗马的欧洲。它散播压抑气氛，从而阻碍技术、商业和工业的进步。这些地方本来已经有那么好的一个开端，反改革造成政府机器的僵硬的集中，它是名符其实的反动的、极权主义的运动^⑧。

我们不要受不起引诱而去指责反改革。它确实应该挽救基督教秩序的：房屋起火，而盗匪趁火打劫的时候，能够发善心吗？

一种神圣的义愤和强烈的恐惧支配着等级制度的卫士。要么就打胜，要么就灭亡！而在惊惧的时候，集体也好，个人也好，都重新流露出其基本个性。教会之所以是天主教的，并不是毫无原因的。它一直试图用加强管辖的办法来解决危机，每一次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它不是通过精神或道德的办法作出反应，而是增加教规**，“天主教病”就愈来愈严重。

宗教领域首先受到影响。只有一本教义，圣经只有一种译本，即拉丁文本；只有一种真理，那就是特伦特真理。人的精神被迫沉睡不醒。有什么东西动一动，就开枪射击。就象林中睡美人的宫堡卫士一样，梵蒂冈的卫队，一直到第二梵蒂冈主教会议的时候止，继续身穿古装手持火枪。

* 异教从本义和字源来说，就是选择，就是精神自由。

** 正象勒布拉的论文清楚地指出那样，路德事件是两世纪以来教会的第三次大危机，前两次是“巴比伦的囚禁”和“大分裂”；还不算 1439 年费拉勒和佛罗伦萨主教会议上最后决定的拜占庭分裂。

从哥白尼到伽利略

天主教的恐惧一直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伊拉兹马斯逝世前一年，教皇答应给他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但不久后，却把他当做异教徒。科洛尼的一个修道士创造了一个公式：“伊拉兹马斯下了蛋，路德把蛋孵出来，愿上帝允许我们把蛋砸碎，把小鸡杀掉。”伊拉兹马斯在世的时候，巴黎就禁销他的书，法国翻译他著作的人在火刑中丧了命。1559年前后，他的所有著作都成为天主教的禁书。宗教裁判所到处搜查他的书。西班牙大主教巴特勒密·卡兰扎不就是因为曾经拥护伊拉兹马斯而死于狱中吗^⑨。

自由思想遭到迫害，这正是它在科学上得到发展的时候。1520年和1530年间，克拉科维的贾杰伦大学司铎哥白尼以最公开的方式讲授太阳不是围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他甚至把他的著作献给教皇保罗三世，并得到他赞扬。七十年后，查奥丹诺·布鲁诺以自己的名义重新提出哥白尼的理论，却被当做异教徒死于火刑^⑩。再过三十年，伽利略又这样做，结果被投入地牢，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他比布鲁诺灵活一些，放弃了他的“错误和异说”，但是他仍然受到软禁，直到他死为止。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罗马陷入了恐怖，认定这种“假毕达哥拉斯学说”最后导致“天主教真理的毁灭”^⑪，搅乱开天辟地论就等于怀疑圣经，整个基督教的建设就可能垮台。同不变的真理相对的是不动的地球……反改革的欧洲有系统地放弃科学甚至求知的好奇心。要科学做什么呢？既然天启已经使科学成为无用的了，所以科学是有害的。

这并不是说，教会人士放弃了教育事业了。恰恰相反，他们虽然迟了一些，但是懂得不应让路德教派和卡尔文教派独占扫盲工作。在所有天主教地区，都开办了学校^⑫。但这只是为了让教会

人士教育世俗的年青人——就象教区神甫在主日说教时向教徒布道一样——应该想什么，做什么。通过耶稣会教士和基督教学校的教友，教会着手塑造人的智慧。几个世纪以来，教会让他们在修辞学的练习中和在不现实的崇拜古代天主教的仪式中兜圈子*。

拉丁国家仿效罗马教会

在佛兰德、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商业在中世纪可以使人获得权力和尊敬。富商们给教会捐献，把他们家族的一些人安插在教会里，但是他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商业和工业上。然而十七世纪的意大利或弗拉曼商人开始不得不为保全自己而挣扎了，因为他们已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城市已成为一个等级的金字塔，其道德准则是完全不同的，即适应等级制度的上层的。以前，为了确保自己的财产，商人只需设法加以扩充就行了。此后，他还需要外来的保证。他不再是把所有能动用的钱都用在“巨大的冒险事业”**和新兴的工业上，而是给儿子买个教会的职位或政府的官职^⑩。

事实上，教会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政府和经济：受到反改革影响的国家自己也变成等级制度，复杂的官僚机构，紧密地服从中央权力。

西班牙在反改革的十字军中名列第一，是头一个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菲利普二世把帝国的命脉中心迁到马德里，然后又迁到埃斯库里阿尔的寺院宫殿中，他精细，有条理，勤劳，不愧被称为“文牍国王”^⑪。他成倍地增设中央和地方监察机构以及司法机构，***耗费国家钱财，使纳税人破产，治下的臣民瘫痪。

* 这种做法如此有效，以致以后的新教教育机构也仿效其榜样，三百年以后，世俗的、反僧侣的教育也予以抄袭。

** 航海贸易。

*** 秘书处，理事会。

葡萄牙人最初在分权和集权之间犹疑不决，但终于选择了中央集权制度^⑮——从此就一蹶不振。

意大利也逃脱不了，尽管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它为数众多的邦每一个幅员狭小，使它陷入无数的微型中央集权制——比大的君主国更为严密，更为烦琐，更为使人喘不过气来。在萨沃瓦和皮埃蒙有伊曼纽尔—菲利贝特；在托斯卡尼有科默一世；在曼图有岗扎格家族；在威尼斯有十人议会——且不谈罗马行政会——他们破坏了市政自治，受理最细小的私事，至高无上地决定一切^⑯。他们开创了这种省的专制政权。三百年以后，斯坦达尔在《帕尔梅寺院》一书所描写的，就是其最后没落的情景。

这样，在所有方面，反改革都在煞车。在一切地方，它都创立和保护等级制度，打击新生事物，建立一个不信任的社会。

英才外流

从基督教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伊拉兹马斯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把天主教教条主义的堤坝削低一点或钻一些空子。在这里，路德和卡尔文则把堤坝完全决开。相反地，反改革则在那里把堤加固和加高。这种异向的发展已经可以开始说明力量为什么从南方转移到北方。此外，还要估计到这样一个不大为人知道的、而且很难认识的现象：移民。

在仍然是天主教的国家，人们追捕“异教徒”，也就是越轨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便到其他地方去碰运气，或只是去避难。新教国家收留他们，不仅把他们看做是受迫害的兄弟，而且当做勇敢的、有作为的人，从当时那么富裕和先进的南欧带来了才干和资本。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个别的移民合起来产生了什么结果。英国

的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①7}曾研究了十七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实业家,他发现他们全都是移民和移民的后代,有里斯本或塞维利亚的犹太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伊拉兹马斯派,达尔布公爵所迫害的弗拉曼人,还有那些瓦伦人,亚历山大·法内斯让他们自己选择归顺罗马或者流亡*。还有从米兰、科默、洛卡诺、吕克逃出来的意大利人,他们怕因为自己的宗教见解——主要是伊拉兹马斯派的而不是卡尔文派的——而受到迫害。瑞士繁荣的最早缔造人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移民,然后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胡格诺派。

早在1660年,“荷兰大行政长官”让·德维特本人也是移民的后代,据我所知,在上述贡献的问题上,他是第一个理论家。“要是外来人不增加,我们就不可能增加我们的渔业、航海业,也不可能增加我们的制造业。新来的人不得不把他们带来的少量的钱去冒险,而某一个新来的人如果靠了他的技巧发明了什么新的方法或贸易,当地居民就可以分享好处^{①9}……”

发展的突击队

优秀的移民这种促进繁荣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曾看到它如何发挥出来。1933年以后,德国和奥国的大批犹太人抛弃了旧大陆到美国去定居,他们重新推动那里的发展,例如实验室和大学,这些机构的功绩在于能够收留这些移民^{②0**}。

当时,商业经济的先锋是不多的和脆弱的。有时,构成这种先

* 1631年,这些移民占最有地位的荷兰公民的三分之一。荷兰西印度公司差不多完全落在瓦伦人手中。十七世纪最大的荷兰实业家德格尔家族,莫玛兄弟,斯皮林,马塞利家族,霍菲特等差不多全部离开了南部的省份,在达尔贝公爵的蹂躏下,这些省份继续或重新成为天主教的地盘^{①8}。

** 例如心理分析和高能物理在美国取得进展,正是弗洛伊德学院的维也纳心理分析家和爱因斯坦学院的物理学家逃避纳粹的迫害威胁大批来到美国的时代。

锋的几百个人的去和来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停滞和衰落，那个地方的兴起和繁荣。积聚的过程便开始了：如果受迫害的集体的一些成员逃走了，他们留在当地的亲人受围困的不安心理就更沉重了；如果移民在接待国家里得到发展，他们便马上让亲友到他们那里去。为什么十七世纪初阿姆斯特丹得到飞速发展，而安德维普却衰落下去？因为一小撮优秀的安德维普人越过那几公里地方到自由的天地去^②。发展是突击队的业绩。

最重要的是促进一个社会的那个因素。就有点象一个班里，有几个用功的学生或捣乱分子在起带头作用，只要他们换一个班，班上就会变样。

第一个信任社会

在结晶的过程中，结晶的形状决定于原来的分子如何，其余部分就在它的周围凝集。在颇大程度上，那些一直落在后面的国家，后来转信新教，就是在这些移民的周围结晶的。这些移民在那里传播他们的道德准则：爱好冒险，责任心和个人奋斗。

移民逃脱了社会茧子，要打破许多禁忌。情况确实这样，特别是美国十七世纪从分裂的欧洲来的那些有文化的富裕新教徒，那些十九世纪来同他们汇合的爱尔兰和意大利天主教徒，他们同一个社会结合起来，而这个社会已经有它自己的规律，而且会保留这些规律。为了生存，人们成了先驱。

在这些最初的移民影响下，西欧的整整一部分成为富有冒险性的，个人主义的，热衷于上进的。社会不再是强加于一切人的背景，一个命里注定的、分为等级的环境，而成为——至少最初是这样——一种集体的事业，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同等的热忱，同等的权利去参加。

1620年登上“五月之花”号船的百余个英国清教徒，表达了对

社会生活的新看法。他们全体一致渴望一个新世界。在登陆前，他们签订了一个公约，是第一个写下来的、由大家缔结的社会公约：“我们同意结成一个公民集体，以便更好地组织起来和保证安全(……)为此，我们颁布，制订和确立公正的、对一切人平等的法律，以及法令，规章，宪法，职责。其根据是在一定时期内看其对全体利益是否合时和适当。我们郑重表示愿意予以遵守和服从^⑳……”。

这些朝山进香的长老们突然之间主人也没有了，领袖也没有了。在“五月之花”的中舱里，一个建立在互相同意基础上的社会，一个信任的社会诞生了^㉑。

在美洲，这个负责的和协商的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在欧洲，它在两个世纪中逐渐地从旧社会解脱出来，但是只有在革新天才能够立足的国家里才这样。相反地，那些处在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勇于进取的人走光了，更为重要的是，进取精神也没有了。

多中心道路和单一中心道路

如果不怕强调得太过分一点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直到十六世纪，基督教会是一分为二的，它包含着解放的一面，这是出自福音和保罗使命的；又有压迫的一面，是从凯撒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宗教改革逐渐肃清了凯撒权力的一面，而把解放的力量释放出来，反改革则扼杀了解放的潜在力，加强了镇压的倾向。

一种文明是否富有成果，要看它是否允许各种差别互相交流。新教国家实现了伊拉兹马斯的教导。它们——好象不由自主地，通过暴戾的专制的痉挛——发展为宽容的和多中心的社会。天主教国家在统一思想的纠缠下，驱散了多派系的主张，而建立了单一中心的体制，结果是，这一边经历了艰难的历程，那一边则迅速前进，走向民主；这一边是陈陈相因，那一边是革新进取；这一边

经济遭到鄙视，那一边经济受到颂扬。

从海王星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差别可能好象微不足道，主要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差别。但是，在出发点上，只要角度有点偏差，就可以使这一支箭射中靶子，而那一支箭却射不中。

十七世纪初叶以来，反改革国家的力量受到了阻碍。我们看到它们全都糟蹋了它们的机会，沉迷于幻想或怀念过去光荣的美梦。另一方面，经过宗教改革的社会的力量在思想革命推动下，创造出另一个世界，如此活跃，如此强大，以致它的反弹力量直到今天，还能够震醒那些沉睡的人。

第十九章 教会的长女， 凯撒的孙女

劳对我说：“先生，我当初怎么也不会相信我在管理财政期间所看到的情况。要知道，法兰西王国是由三十个财务司统治的。没有议会，没有委员会，没有等级，没有总督，我几乎还要说，没有国王，没有大臣：只由派驻各省的三十个谏议官决定地方上的祸福和丰歉。”

达金逊侯爵^①

法国呢？在所有天主教国家里，它的情况是特别的。它成为独具一格的单一中心制。

新教传进法国，发展迅速而有力。它没有能够征服法国，但是在失败后，却生存下来。宗教战争结束了，打成个平局，胡格诺派的首领亨利第四登上天主教的王位，因为顾全国家大局，皈依了天主教：国王是唯一的裁决人。这样，法国严格说来并没有发生反改革，它的君主政权威用不着去批准特伦特主教会议的法令，尽管主教团——教会会议——迫不及待地执行这些法令；宗教裁判所没有建立起来；文化生活大部分逃脱了宗教的羁绊。

法国在汇合点上

这以后，从黎塞留开始，法国发生某种反改革，神授的王权绝对集中，不过是稍稍世俗化的神权统治的一种形式。另外就是迫害新教徒。但是一个世纪以后，法国通过“启蒙哲学”接受了宗教

改革，这是从英国、荷兰、瑞士，通过英国热，法兰克·马松秘密组织活动和卢骚主义传来的。

这样，法国处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汇合点上，也就是在发达和不发达的汇合点上：它没有遭到粗暴的阻碍，象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或波兰那样；另一方面，也没有能够迅速地进入贸易经济，象荷兰、英国、瑞士那样。总的来说，它落在后面，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也有几个活跃的现代化的孤岛。在法国，自由思想得到肯定，但是不利于教会，不利于国家，而在新教民族中，自由思想是在教会和在国家的范围内得到肯定的，总之同教会和国家不发生抵触。

因此，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悲剧影响了法国人的历史方向。如果说它把法国推上缓慢地衰落的道路，那么，这是“法国式”的。在其他拉丁国家，教会指挥一切，在法国则是国家指挥一切。

这是因为国家存在。长久以来，它编织了一个法规、制度、效忠体制的网，这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由于恐惧，人们就强化秩序，这时，只需要拉紧王朝的网就行了。

神圣的国王

法国有史以来，政权主要就是宗教性的。因为法国是教会同国家结合的产物。我们的全部历史是从公元496年克洛维斯的洗礼时开始的。主教独自掌握了高卢——罗马民族的天然权威，就是在他们积极的支持下，这个小小的法兰克部族酋长得以摆脱他的竞争者。他占据了一部分领地，成为后来法兰西的雏型。这样，政权便具有君权神授的性质。在秩序处于完全瓦解的情况下，这个五世纪的西方，是一个没有警长的西大荒，在那里，上帝的手似乎保护着这个有条不紊的政权孤岛。

五个世纪后，当查理曼王朝瓦解的时候，在北欧海盗袭击的暴

力下，法国又成为西大荒，权力遭到粉碎，伯爵和男爵收拾残余权力，保留在自己手里。王权从 987 年移栽进了卡普特家族，最初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道义上的权力，但恰恰是从这个神圣的核心扩展开来。在这种封建混乱和暴力爆发的情况下，人们的目光就集中在国王一人身上，因为他是宗教和政治结合的化身。

这个现象在西方是绝无仅有的。贞德取得了教会的同意，拥戴一个软弱的国王登基，她自己就只能是一个法兰西的圣徒。国王，从胡格·卡普特到查理十世，能够实现奇迹，他们接受了祝圣礼，就能治愈瘰癧；国王摸你一下，上帝就把你治好！在其他一切地方，权力都是人情味的，太人情味了。马加维利按照他那种犬儒学说认为：你拿到了就是你的，或者是没有人看见就捉不住你。他用夸大的说法，表达了破除权力神圣的迷信。只有法兰西王国使王权神圣化，并且通过这一点把国家神圣化。

从罗马到巴黎的长征

罗马的官僚们说：有没有人想到，如果耶稣诞生在一个牛圈里，这是他们的功绩呢？“在这个时候，发出了凯撒的一道敕令，命令普查所有土地，所有人都要登记，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城里办理^②。”不仅是在犹太国，而且从布列塔尼一直到波斯边界，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同一天出动。这是一部惊人的机器，具有非凡的效率，但也具有很大的弱点。在四个世纪里，帝国经受住一切进攻，统一了文化，使国家组织臻于完善的地步。

罗马不单是征服了世界：把世界编了号，分为块块，划成格格——这是这个体系好的一面；但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它把沉重的不断繁殖的官僚体系带给世界。一个老历史学家说：“罗马统治的原则就是把个人毁掉以利于国家，把省毁掉以利于罗马，把一切毁掉以利于皇帝^③。”

既强又弱：这个庞大的组织一大片一大片地崩溃。这种崩溃使人们强烈感到，崩溃的原因在于这个组织本身，它把全部资源都放在头部，使整个身体不堪一击。

三个伟大的国王曾把法国从封建王权变成民族国家：菲利普·奥古斯特实现了王国的统一；圣路易使政权和司法重新得到和解*；菲利普·勒贝尔把法国人团结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周围。一个国家，一个法律，一个政府，在一个半世纪中，三个卡普特国王把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三种职能集中起来。社会、行政机构和思想习惯都树立起来了，成为不可摧毁的。

菲利普·勒贝尔的这些思想是他的“法学家”给他启发的。他们是从罗马法**的残余中学来的。教会虔诚地把罗马法保存下来。这些法学家来自南方，在意大利上大学。他们引进了后罗马帝国的原则。对于法国人来说，这都是旧事重提。罗马难道不是在漫长的五个世纪以来，通过潜移默化，教给了不守纪律的、异想天开的高卢人什么是首都的支配地位、土地注册、公路编号、规定价格、征收捐税、等级制度——秩序等等吗？

宗教改革的考验来到了法国，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耐心锻练，是经受得起考验的，特别是这个打击没有把它摧毁，于是就更加稳固了。

路易十四执政时，法国人已被折磨得够了，意大利人统治了五十年，西班牙入侵二十年，长年累月德国、英国、苏格兰军队蹂躏他们，还有投石党人变乱。因此，他们把王室的绝对权力理想化，把它看做是统一的象征。他们通过崇拜他们的国王崇拜自己。

* 的确，他一面在橡树下主持公道，一面又下令屠杀卡塔尔人。

** 事实上，君士坦丁的“第二罗马”法同第一罗马法比较，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查士丁尼在六世纪写成法律的。纪尧姆·德诺加雷是这些法学家中的一个好典型。

凯撒的孙女

就是这个时候，法国真正成为教会的长女和罗马帝国特别宠爱的孙女，天主教会本身也是罗马帝国的女儿。

那些结构长命得惊人！四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会就仿效后罗马帝国的组织；十七世纪初，天主教国家组织——法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是这样——也仿效天主教会的组织。神甫从主教那里接受权力，而主教又从教皇那里接受权力。同样地，在一个省的边远地方，督察从财务司那里接受权力，财务司从大臣那里接受权力，而大臣又从国王那里取得权力。无论怎样官卑职小，任何官员都分掌一部分皇朝的政权，正象在教徒眼里最卑微的乡村教士也是教廷一部分教权的掌握者。这样就产生了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在我们的机构里，它是很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扎根在我们的心目中。

今天的法国人是不知道这些根源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周围都是些官僚。他们以为这种现象是新近的。1968年10月，我在我的选区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在我询问的人中，三个人就有两个认为中央集权是从1958年以后出现的，百分之五的人认为它是在1945年诞生的。说拿破仑就是创始人的，只有百分之一。至于说在拿破仑以前就有了，这样想的人一个也没有。

这样一种错觉，托克维尔曾指出过：“这会使法国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认为，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新鲜的。在旧社会，正如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城市，镇子，乡村，甚至最小的屯子，医院，工厂，寺院，学校，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可以有独立的主张，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自己的财产。”④

行政王朝

因此,法国的历史就是缓慢地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就是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愈益集权于君主、大臣及以其名义行事的官僚们的行政王朝的历史*。萨利集中乐器,黎塞留组织乐队,路易十四以最强音演奏一支交响曲,把我们震得到现在耳朵还聋

这个逻辑反映得更多的不是统治者的既定意志,而是集体的愿望。从菲利普·勒贝尔一直到第五共和国都是这样。萨利把财务司的暂时任务交给国务参议或谏议官。黎塞留把他们任命为常任高级官员。创建这些职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他们被派驻法国各地,把一切事情揽到自己手里,然后转到凡尔赛的机关去。从那时候起,根据天主教模式塑造的国家战胜了中世纪的自治传统。相反地,在新教国家里这个传统则导致地方民主。

达金逊侯爵发现,1672年这个制度已经完全形成:“我们的政府已经在一个新体制上安排好了,这个体制意味着每一个部门的大臣有绝对权力,一切分掌这个权力的机构都已取消了。这样,朝廷就完全象人体内的心脏一样,一切都要一次又一次地经过心脏,然后才流到身体的最末端去⑤。”

为了对付愈来愈多的事务,国务秘书招来的官吏日益增多,人员越来越臃肿,因此事情就更多了。“帕金森法则”泛滥成灾。财务司把他们的督察官先加一倍,后来又加三倍。他们招来大批的吏员,吏员招来大批的吏目,吏目又招来大批的文书。他们特别同总督察保持愈来愈大量的文书来往。收信人一个人阅读不过来,这就成为一条理由,去增加科室,档案卷宗以几何级数增加⑥。

* 文森·德古内除使用这个词外,还加上官迷这种说法。1745年,格林姆证实这个词是个旧词了。1645年,雷兹主教就说过探探官僚机关的空气,以表示看看准备采取什么决定。

法国人为自己管理自己而形成的中间组织取消不见了。有人想象,1962年,除了在巴黎和里昂以外,不仅所有市长的职位,而且半数的警长职位都以拍卖方式出售*。那时,拿出来这样拍卖的已不再是权力了,而只是头衔^①。

路易十四指示他的大臣要向他奏报,“无论甚么事情,那怕是发一张护照也好”。他的大臣又把御旨传达下去,以免在君主面前冒犯错误的危险。

财务司对市政和济贫院进行行政监督,检查各团体的债务,亲自出席市政会议。征收赋税,主持各财务机关的事情,配给供应,以及军事措施、各项工程建设,一切事情都归他管。通过这三十几个高级官员,君主便无所不在,没有什么地方是君王的阳光照不到的。

“大臣,就是我”

原则上,确有一些乡绅治理的地区,也就是一些照理说部分地由自己管理自己的省,例如兰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但是行政王朝耐心地把它们控制在自己手里。财务司和各阶层为首的贵族和教会权贵之间的对话,是那么暧昧,颇象今天省长和乡绅之间的对话^⑧。另外,经常是财务司表现得更有胆略。法国就这样养成习惯,把主动权让给国家^⑨。

废除南特上谕不过是这种发展的最后结局。国家把那些小“共和国”——即王国中的新教城市——的权力蚕食殆尽。新教徒反迫害的起义宣言采用的理由,跟反对国家扩张权力的暴动一样^⑩。

整个王国象个织得很巧妙的网,君主象只蜘蛛在网中央吞吃

* 当然,因为战争,需要金钱,所以造成这种大拍卖。但是这也是出于制度的本性。

掉一切自投罗网的碍事的人。立法议员皮埃尔·勒蒙泰比托克维尔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完全戳穿了这些机构：“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虽然路沃瓦没有说：国王就是我，他的行为表明就是这样；但他的财务司可以说：大臣就是我。皇朝的力量就可以这样径直地下达到社会等级的最末端^①。”不幸的是，社会力量却不能从国家的末端重新上传到国王那里。法国处于被动状态，睡着了，因为国王、他的大臣和他的财务司照顾着它：“行政系统到处用官吏的话来取代公民的热情，从而扼杀了公众的主动精神^②。”

三个等级的对位法

除了行政等级以外，贵族和宗教等级也掌握在国王手里，他利用这一个来对付那一个。

说实在的，贵族等级只剩下一个影子而已。路易十四把头衔一点一点地给予那些为他效劳的人。到朝廷去，争取国王看自己一眼，博得皇上一句话，这就使贵族生活大为生色。凡尔赛成为一个封闭的天地，在那里面，一个不知所措的阶层的人在团团转。

贵族被仪节和封爵所束缚。第三等级被行政等级束缚在其行会、城市和职业上，剩下来需要限制的就是教会了。法国教会独立化做到了这一点，它把王权和宗教合并起来；好象民族感情的两面，结合在一起。

由于控制了行政、贵族和宗教系统三个方面的统治，国王得到了毫无限制的权力。每一次他选择一个财务司，一个公爵或者一个主教，就等于进一步叫大家唯命是从。

愈来愈僵化

在黎塞留、马扎林、科尔伯特之后，这个制度继续暴露出它所造成的后果。头脑清醒的观察家发现，地方政权不见了。路易十

五的一个大臣抱怨说：“实际上只剩下两个省是由乡绅治理的，而且这些绅权还不断受到财务司和官权的侵犯。大的市政府，象里昂、斯特拉斯堡、巴黎等也只能绝对服从^⑬。”路易十六的一个大臣*更高声地抱怨说：“我们敢说，政府的做法太过分了，简直到了幼稚的地步(……)如果一个地方有一笔开支，那就得同督察**拉关系。因此就得按照他所采用的计划，使用他喜欢的工人，按照他的旨意去付工资……陛下，人家就是用这种方法在法国扼杀一切市政精神的，直到连公民的感情也扑灭了；他们禁止人民行动，给人民派监护人。”

要是比较一下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况，也许我们会对这个多样化社会所存在的东西感到惊奇：度量衡混乱，各地有各地的习惯法，行会，大学自治，布列塔尼和兰格多克保持了绅权。……总之是所有这么一些东西，使查理·莫拉斯说：旧社会的法国是以国王为首的许多共和国综合起来的。但是，这些共和国已经是徒有其表而已。它们已经没有建树的力量，而只有阻挠的力量。

如果中央集权制还没有产生大家向来所看见的它那种压路机的作用，这是因为还有一些实际障碍对机器起了制动作用。由于交通缓慢，地方上仍然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主动性。指示往往只能是一般性的，至于如何执行，则由国王的钦差自己看着办。随后，技术上的进步，使中央机构能够对最微小的细节进行干预。一艘帆船的船长在大海上打开一个函件，得悉交给他的明确任务，然后由他自己决定怎样去完成任务：“因为在船上，除了上帝以外，他就是唯一的主人。”今天，一艘巡洋舰的舰长无时无刻不同海军参谋部联系。没有一小时是无人过问的。邮政马车时代的总督比夏普式电报时代的，或更糟糕的电话时代的省长，有更大程度的自治。

* 马尔塞布以后同特隆歇和德塞齐一起参与为路易十六辩护。

** 相当于副省长。

然而，人们终于憎恨国王的“专制”，而本来应该指责的是王权集中制度。它过度集中，不断给人以专横的印象而产生着仇恨。但同时这个集中又是不充分的，因为国王不够强大，不能摆脱那种使他的积极性瘫痪的特权。国家感到这个制度的弊端，而看不出为这个制度辩解有什么好处。无疑地，应该从这个矛盾去寻找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因。

这是一个仍然有现实意义的矛盾。

革命的循环

革命名符其实。的确，根据它的字源的意义*，它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来，即：官僚机关的无上权力。革命为了结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策动的大动荡，最后只不过使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剧而已。

当时的体制对于过度强大的中央政权，仍起着一些平衡作用。如城市的建制，行会，贵族传统，宗教的独立性，议会，世袭的或用钱买的官职等。制宪会议本来可以朝地方政权这个方向加以改革的；世袭和用钱买官的办法本来可以用选举的办法来代替；教会的势力本来可以用政、教分离的办法去解决；法官的势力可以用政权和司法分权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法国革命把专制制度这些起平衡作用的东西也扫除了。它使法国处在政治体制的真空中，然后给它盖上薄薄的一层民主外罩，一遇到困难、骚乱、战争，就给刮跑了。

由于仓促行事而引起了大混乱，革命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回到它开始要废除的制度上来。首先是利用旧制度的人，依靠那些他们的头头已经被淘汰的雇佣人员，这样似乎省事。新瓶装的全是旧酒。

* Révolution(革命)一字也作“周转”解，即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上。——译注

官僚们，有些往往是地位低微的，利用旧统治阶级被扫除而引起人才缺乏的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由于没有人同他们竞争，取得了象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的地位。他们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就说服一个没有经验的政权去加强中央集权制，并从中取得他们的势力。从1789年到1799年，没有一个政治权威能够树立起来，但是行政机构却很兴旺。

拿破仑的铁靴

压制，不满，爆发，强压，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这个制度不停地分泌出为了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毒素。革命依靠伪装的中央集权制勉强维持下来。波拿巴依靠不可一世的中央集权制把法国从大革命中拉出来。他在省长的名义下恢复财务司的职位。他加剧旧制度的中央集权，而革命那怕是不自觉地，却是在反对中央集权下形成的。

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每一次为了建立和维持下来，经受了不知多少困难，因此不会不把中央集权制看做天赐的利器。政治激情爆发，并不是为了弄清楚要不要省长，而是谁来派省长和撤省长。

1814年，达托瓦伯爵说：“在法国，什么也没有变，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法兰西人。”这是永恒的真理。对于旧制度，革命，帝国，一如对于君主制或者以后的共和国，有一点是共同的——什么样的一点啊！那就是中心点。

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把事情进一步恶化了。它们的政府是这样短命，以致只能执行行政机关所赞助的任务。

这样，在大革命中出现的辩证法得到了验证：一个政府的权威愈小，就愈需要有力的行政机构来弥补它的弱点；一个政府愈专横，就愈需要中央集权的工具来施展其权威。有哪一个政权既有

胆量,又有能耐用地方民主去代替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呢?

这个行政的恶性肿瘤怎样在三个半世纪以来腐蚀着法国,这是法国人最缺乏认识的一个事实。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前后十分矛盾的。莫拉斯谴责了“莫洛克”国家*,但是,又是他自己崇拜那个建设这个国家的王权。谁没有听到过自己最辛辣地批判“官迷”而又骄傲地炫耀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当官呢?没有一个政界人物不说他自己是个分权主义者;没有一个人不要求本区的中学“公办”的。

最主要的前后矛盾,莫过于相信国家的权力只应在最上层用保持行政不稳定的办法来加以限制,而不是在基层让正当的组织——镇,或者区,或者市,或者省——去管理自己的事务。

伟大的僵局

这个前后如此一贯的历史,在基督教分裂的时候,显示了法国情况的独特性。王权国家使我们避免了社会在教会官僚机构掌握下僵化,它打开了比较现代化的道路。神圣化的政权保留了等级制度,因而使社会力量得不到解放,但经过宗教改革的国家却得到了解放。集体的力量在法国没有被毁掉,也没有得到发展,而被国家吸收去了。

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之间,法兰西通过国家,给自己打开了一条辉煌的大道,好象在凡尔赛宫前的大道一样,那里可以让六辆马车并排奔驰,但是同什么地方都不通。

法兰西是由国家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行政机构。我们的行政机构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它作出了辉煌的贡献,使我们的国家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明。

* 莫洛克是古代叙利亚阿莫尼族人的上帝,当时人们把孩子丢进火中去祭祀他。
——译注

但是，中央集权的势力太大了，并有增无已，使法国成为一个不信任的社会：从行政王朝到行政共和国，从行政管理到行政经济，个人和集体的首创精神都遭到压抑。

从国家得到了什么，因而不会反对国家，这个逻辑法国人知道得太清楚了，法国人从那里得到了自己的光荣和伟大，所以不善于拒绝迁就国家的弱点。这样，我们就慢慢衰微下去；可是，出于某种离奇的幻觉，却以为自己在兴旺起来。

第二十章 解释历史的尝试

发明创造吧，那么你就必然受到迫害，象罪犯一样丧生；依样划葫芦吧，那么你就象个傻瓜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

巴尔扎克^①

我们习惯于把发达看做正常的情况，而把不发达看做丑行。这种反应是高尚的。有没有根据呢^②？

我们今天所谓的不发达，我们忘记了这是人类的自然现象，从有人类以来就如此。贫困和暴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类，这脆弱而又固执的过客。有过那么几十年，由于有利的环境，他们成功地站住脚和繁荣起来，于是，根据这么一点，就谈论什么黄金时代了。但通常的情况是，一家人家破人亡，幼儿和产妇死亡，不是时疫便是饥荒，总是交替来临，永无止境。

从什么时候开始，“甜蜜的法国”逃脱这种恶运呢？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不发达伴随着我们，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大革命是在1789年的一个夏天爆发的，那时正是古老落后的国家闹饥荒，一片恐怖气氛同公元1000年时一样。1832年，霍乱使巴黎大批人死亡，连首相卡西米尔·佩里埃也不幸免。狂犬病也一直游荡到世纪末。直到今天，成年人“舍不得把面包扔掉”。这些贫困的年代，社会是不会不记得的。

发达了一两个世纪，同三四百万年不发达比较起来，不过等于二十四小时里的最后两秒或四秒钟而已。要不要问一问为什么人

类的差不多整个历史都是由不发达来决定的呢？为什么五分之四的人仍然处于不发达世界呢*，再也用不着提出相反的问题了。怎样约三个世纪以来会出现一种文明，使得五分之一的人能够完全逃脱这种悲惨的命运呢？

成功的欲望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埃里亚，四百五十名工人因为一家工厂关门而失业了。大部分人呆在家里，等候有人请他们干别的工作。其中一些人从被解雇的那一天起，便开始找工作，他们跑遍各个职业介绍所，系统地翻阅招工广告，向他们的工会、教区打听，收集职业训练班的教材，以便学一门新手艺。甚至要离开自己的城市才能找到的职业也去看看。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处境是一样的，他们一样要吃饭，要花钱，要一个稳定的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主动地去谋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另外，上百种情况表明人类清楚地分为两种：“一部分人，对于他们来说，任何情况都是一种挑战，他们想尽办法去应战；另一部分人是不那么关心这种事的^③”。这种推动小部分积极性的动力，麦克·克莱兰把它叫做“成功的欲望”：这是一种要把事情做好的愿望，而不是为了赢得威信、或者社会上的尊重，“而是为了得到个人成功的一种内在的感情^④。”

动机心理学证明，最有力量的动力并不是贪利，而是要赢得胜利的一种体育爱好，是创造的乐趣，是实现新思想的欲望^⑤。

*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目前的“不发达”加剧了，因为生物平衡（人口和资源）不再起作用。人口的增加由于多种汇合起来的因素（医药而特别是抗生素，运输，吃不饱代替了饥荒等）已经不再是定期的大规模死亡所抑制得住的了。

“在你身上有更多的欲望”

这种渴望成功的欲望，我姑且把它叫做奋发图强本能，标志着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动物是受重复本能所控制的。自从蚂蚁或蜜蜂，蛇或者海獭，狼或者鹿出现在大地以来，所有个体都是同一种类的重复，而每一种类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重复。

相反地，人是天神下凡，但仍然记得天上，他有上进的本能，经常听到这种本能的召唤，要超过自己，超脱日常活动，超过其他人，超脱看来是人的命运。阿尔伯特·卡穆斯在准备写反叛的人，安德烈·马尔罗在写他的“反面回忆录”，达里尤斯·密洛在他的残废人小车上作曲的时候，他们三个都对我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相信人家是从来没有做过的。”纪尧姆在安德山脉说：“我所做到的，是任何野兽所不能做到的。”在这种语言中，没有丝毫高傲之处。仅仅是热情——热情是灵魂里的神——来自上进的欲望。如饥似渴地求知，如饥似渴地想象，如饥似渴地创新，如饥似渴地成功立业。“求您今天把我们每天的饥渴给我们”^⑥，“在你身上有更多的欲望”，“再多一点”。还有什么祈祷比这样的说法更美好呢！这是人类的格言。

活跃的少数

这种超越本能潜在于所有人身上，但只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得到发展^⑦。一个革新的社会就是这少数人有相当分量的并可以自由行动的社会；一个僵化的社会就是这一小部分人分量有限并且不能动弹的社会。

对革新的内部机件进行研究，从文明刚露曙光的时候开始，就会惊奇地发现只有少数人对此作出贡献，而偌大无朋的多数只是在长时期中逐渐地跟上来。在十八世纪初的诺福克郡，耕种一块

地要动用三个人和六匹马。柯克创造了一个犁，在进行相同的耕作时，只需要一个人两匹马；另外，小麦的产量从每公顷十二公担增加到十八公担。附近的农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采用这种犁。柯克幽默地说：“我的改进，每年以一英里的速度前进^⑧。”每逢有一个革新家，有多少仿效的人啊！几十个先驱——建筑家、商人、创建家——这一小队人马是多么脆弱啊！该如何小心使它不致被束缚了手脚！

因为力争上游的本能可以受到社会和思想习惯的压抑，也可以受到鼓舞。在一个单一中心的社会里垄断，靠地位取得收益，经济不受竞争的威胁，都会压制这种图强的本能^⑨。在多中心的社会里，贸易和市场经济促使个人和集体你追我赶互相超越。

马克·克莱兰的信徒指出，语言反映了成功的欲望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相互关系。例如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充满了活力的西班牙，表达这种欲望的词句、形象充满了文艺著作、官方文件和个人书信。从十七世纪起的衰落时期这样的词藻就消失了^⑩。

乔治·蓬皮杜最后一次到外省去*，在把我们载到波瓦蒂埃去的“快帆”飞机上对我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别人有卑鄙的打算，而最卑鄙的莫过于想赚大钱了，这就象说，佩基上前线送命是为了增加他的稿费；或者说，索尔仁尼琴编了一出迫害的戏为的是增加他书的发行量。”

为什么经济本身就不能服从比金钱利润更加有力的动机呢？在发了财后，企业主拿他赚的钱去冒险，手工业者喜欢把活做得“完美无缺”，干部想树立自己的地位，推动他们这样做的是梦想，比利润这种“诱饵”更有力，更神秘。利润，即有利可图，是经济结构的基本法则，无论他们是“资本主义”也好，“集体主义”**也好。反对

* 1974年1月24日。

** 虽然需要等待五十年的时间才使集体主义经济的实践家们放下教条，承认国营企业也不得不从利润的规律。

利润,就是反对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利润并不因此而成为经济首创精神的唯一泉源,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泉源。它只能事后衡量是否成功,亦即行动是否同实际相适应^①。

挑 战

最经常的情况是,人们行动是为了作出反应。人们超过自己是为了避免让别人超过。这种情况是莱昂·布洛瓦认为唯一能够唤醒基督教的:“哥萨克和圣灵赶快来!”托因比把这一切叫做挑战。这个词被乱用了,但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受到警告:要完蛋了,不然就得找出对策。直到1941年底,美国人拒绝参加反对轴心国的战争。珍珠港突然袭击向他们发出挑战:他们的反击是同他们的集体生命力成正比例的……他们不只限于制造设备和建立军队。他们有越来越多的发明创造。赫拉克列特和帕梅尼德就已经说过:“战争是万物之母”,因为它是最后的挑战。

通常,挑战也不是那么戏剧性的,那些伟大的技术发明,开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这是纺织工和织布工的斗争引起的。纺纱工生产要比织布工慢五分之四,在约翰·凯发明了飞梭以后,那就更慢了。纺纱厂无法供应织布机所需要的纱。在需要的刺激下,纺纱工的智慧开动了:哈格雷夫和阿克赖特发明了一种纺纱机,局势便颠倒过来了。织布机织不了纺纱厂供应它们的纱。卡特赖特便设计了第一台机动织布机。就这样,从这个挑战到那个挑战,发明创造便在棉织工业,然后在整个纺织工业中不断涌现,最后在整个工业中不断掀起。

可以说是苏联的第一个“斯普尼克”^{*}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

^{*} 俄语:卫星。——译注

文明通过各种革新的突破,取得进展,迫使人类互相赶超,打破了疆界,又通过新的跃进,恢复疆界。

非物质的第三种因素

这样,我们便面对着思想力量的活动。我建议把它叫做非物质的第三种因素,一个质量的、无形的记号,它乘或除头两个因素——物质的有形的和数量的因素——即资本和劳动。

事实上,今天看来,资本的属性问题是次要的,不管马克思是怎么想的。资本的持有者,无论是私人*或合作社,或公众集体,经济的基本条件变了么?丝毫没有。只要还有一点竞争,只要政府的干预不致完全堵塞了市场结构的的活动,无论对哪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资本和劳动都是同样需要的。尽管资本换了手,但在技术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工人的情况显然是相同的。雷诺汽车厂工人的命运同培梭汽车厂工人的命运差别在哪里呢?

劳动的问题也是次要的,无论这种看法是多么粗暴。劳动力总是可以找到的,必要时可以从外面输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加以培养,改进,或通过自动化的办法予以减少。

然而,有一种因素把什么都改变了,而传统的经济学家——无论是亚当·斯密或者马克思**,或者凯恩斯——都忽略了,就是这个第三种因素,这个如此难以捉摸的因素。

在个人身上,这种因素常常以天赋的形式出现。在工业巨子身上,总是可以找到这个因素的。西尔万·弗劳拉对我说:“即使把我象条虫那样光身留在撒哈拉沙漠^②,一个钱也没有(但只要在商队路过的地方附近),几个月以后,我又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这

* 个人或家族,或者一大群私人,甚至人民股东。

** 直到离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捷克人奥塔·西克和R·里茨塔站出来,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才得到考虑。

只是一个比喻。但是一个大车修理工人的儿子，十一岁就离开学校，那时，难道他不就是这样光身的吗？但是，他一队商旅也没有错过。

在社会中，第三种因素是以一种思想的整个倾向为特征的^⑬。文化环境形成一种土壤，在这上面，有一些植物可以生长，另外一些却枯萎。请看英国的草坪，同我们的草地大不相同。为了有这样的草坪，必须坚毅地重复相同的动作：剪齐，滚平，浇水，剪齐，滚平，浇水……这很简单。但是在法国，人家总是忘记了其中某一道手续，滚平，或者忘记了先后次序，或者忘记了持之以恒。结果，所得的不是草坪而是一片野草。相反地，英国妇女热心研读烹调术的书籍；法国妇女则善于做菜，这是文化问题。

我们起来反对存在第三种因素的说法。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集体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式可能引起具体的结果。我们比较喜欢用物质去解释物质。我们不愿承认，英国之所以首先工业化，主要不是因为它有煤——正如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而是因为英国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先驱，有能力利用这些煤炭^⑭。

等级制度带来事务主义

一个社会和一种经济的生命力，难道不是用它是否鼓励革新的方式来衡量的吗？让我们按照这一线索进一步深入看看等级社会和自治社会之间有什么显著差别吧。我们可以看到前者是事务主义的社会，后者是革新的社会。

一个等级社会的成员怎能不埋头事务呢？你属于这样一种秩序，在那里头头代替你去思考，上面要你接受头头的推动而不要偏离。只要活动千篇一律，生活怎么会不单调呢？但是只要发生一点什么变化，那就什么都行不通了。改变是头号公敌，因为它破坏人人属于全体这样一个公约。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只有一个解决

办法：保持原状。

这样的—个集体安全体系，很多人是愿意付出代价的。罗马帝国，旧社会的全盛时期，拿破仑帝国，斯大林的俄国，从特仑特主教会议到第二梵蒂冈时期的教会，在他们过去以后，留下来很长的怀念之情。在这种严厉的秩序下个人服从集体，但也分享集体的光荣和伟大，凡是尝到过这种秩序的人，都会长期地留恋和怀念。

钥匙圈或赞美疯癫

一种生气勃勃的经济不仅接受异想天开的东西并且据为己有。我有一天听到居伊·摩勒大骂钥匙圈，还有什么比这种“新玩艺儿文明”更荒唐的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癫狂病，把几十亿金钱花在制造钥匙圈上，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人却在饿死？社会主义消灭这种浪费，而把生产力用在有益的活动上。”

但是，如果钥匙圈，从荒谬方面——让我们说，从怪诞方面——证明，只有在可以随便制造或不制造钥匙圈的经济里，革新才是自由的、多样的和积极的，那又怎样呢？说不定就是要容纳无用的东西，才能保证一切有用的东西可以出头。也许，不发达就是因为没有能力去革新——和生产，比方说，钥匙圈这样的东西……“人类的进步是用智者的疯癫对疯人的智慧作出多少让步来衡量的*。”

建立在专制作法上的经济总是很难进步的。旧社会的法国，每一个行会都烦琐地规定每一个手工艺人在制作和出售他的产品**时必须遵守的标准。由于被迫按照规定去做，革新就被扼杀了。幸而，规定有一些漏洞，革新从而可以得到发展。新教徒引进瑞士

* 另一个社会党人若莱士说的话。

** 让我们提醒大家注意，这种行会制度并不是君主政权创造的，它从十三世纪就诞生了，因为人民认为，个人自由组织是不会不遭殃的。

的技术，在穆鲁斯*建立一家印花布厂。它是自由创设的，因为它幸运地没有被纳入行会的轨道。这家工厂办成了。这样一来，几十名手工业者本来在规定的职业中喘不过气来，就投身这项事业，奠定了穆鲁斯的繁荣。

“革新分子”这个词本身，在法国长期以来是贬义的。“疯婆，分裂分子，革新分子”，按拉辛的说法，就是人们当时骂王港修道院的修女的话^⑤。而狄德罗指出，革新分子这个字“差不多总是用在坏的意义上的，因为人们对于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如此恋恋不舍，难解难分^⑥。”我们是否就变得那么不一样了呢？

土豆的不幸

以土豆为例，对于营养不足的西方，这是一种最有用的改革。英国很快就懂得了可以从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取得多大的养分。莎士比亚和弗朗西斯·培根都称颂它的好处。1619年，它成为宫廷筵席上的珍品。1664年，约翰·福雷斯特在他的小册子上可以这样写道：“英国因种植马铃薯而更加繁荣。”

法国却固执地拒绝这种根块植物，本来法国多少饥荒和死亡可以得到避免啊！直到1787年，巴黎皇家农学会仍认为土豆只“适合于奶牛”……和英国人的一种产品。

可是，在这个时候，帕门蒂埃的斗争差不多取得了胜利。他知道，问题不在于使马铃薯适应法国的土地，而在于冲破思想上的封锁。帕门蒂埃善于用计。他集中力量去进攻金字塔的顶峰。他说服路易十六把这种新植物的花插在他衣服的扣眼作为装饰；作为一种时装，它吃香起来；朝廷和城市给争取过来了。这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为了把农民也争取过来，帕门蒂埃让士兵日夜在一块

* 直至1798年，穆鲁斯是个独立的共和国，同瑞士的州相通。

田地周围站岗，他在这块地上种上了这种奇怪的植物。当他把岗哨撤掉后，邻人都蜂拥而来偷取果子，以为这种果子一定很珍贵，竟派士兵去看守。越是禁止的东西，人就越想得到*^⑰。

条例应全部更换

一个等级制的组织，要求所有部分以同一步伐前进，好象一支军队一样。如果不能全部采纳的话，改革就会遭到反对。这就等于说，改革几乎总是遭到反对，除非遇到危机。

“军心浮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去检验这个真理。我向几个部队的头头进行了调查。第一个上校回答我说：“这次浮动，我们当时感觉到了。我曾经建议实行一些改革，无疑地，本来是可以缓和空气的。但是上面警告我说：“你不要在这上面开玩笑！你的团又不是只有一个！不要忘记了，在任何情况下，改变规定都应该是同时针对所有部队的。”

另一个上校对我说：“我曾想过把晚点名改变一下，准许所有入伍的人每天从下午六时到翌日清晨一时，穿便服外出。我遭到指挥部反对。人家叫我等候通过新的规定再说。”

规定，没有什么地方比部队里规定得更烦琐了。“驻防条例”和“内务条例”是日常生活的真正教科书，两者都是1930年制订的***。这些文件已经无法实施，因为风气已经改变了，而条例却不变。

* 然而，一直要到复辟时，土豆才传入农村，到路易-菲利普时代才出现炸土豆片。

** 1975年。

*** “驻防条例”始终没有改变，只有“纪律总则”，即确定如等级组织等的规定，1966年得到现代化。1975年经过革新，这是在调换一名部长和发生严重危机之后进行的。同时革新的还有“内务条例”这两份文件合乎时宜地把执行任务的严格性同任务以外时间的自由化分开来。

通过负责的自治实行革新

单一中心的社会把任何改变都看做违禁,在其对面,多中心的社会则欢迎和鼓励革新。

所有生活水平高的地方的分布情况,同那些同时发展多党民主结构和竞争经济结构的国家分布情况,恰恰相符*。难道这是偶合吗?

革新是一种冒险。独立采取首创行动的乐趣,起着鼓舞的作用,使人不觉得困难。要是循规蹈矩拒绝冒风险,这种乐趣是不能产生的。如果任何行动都要得到层层批准的话,新思想就只能停留在胚胎阶段。在一个自治的社会里,新思想可以碰它的运气。如果失败了,只是革新家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成功了,就会有大批人效法。

研究人员就象野雁一样,如果你把它们驯养,它们就会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怎么能把不可预见的事纳入计划呢?布莱克发现了碳酊,而当时他是在寻找一种治胃痛的盐^⑧。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化学家巴斯德制服了狂犬症。也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物理学家伦琴发明了爱克斯射线。历史得到了更新是因为有了碳14。史前时代得到了更新是因为有了氦。发明很少是在预期的地方出现的。

科学精神和创造精神只是在现代的基督教世界里才兴旺起来。刘易斯·莫福德^⑨统计了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十五世纪有一百二十七宗,十六世纪有四百二十九

* 参看附录(640页)各国按1975年平均每一国民生产毛值排列的名次。头十六个是多党派的民主国家;它们当中,有十三个是属新教国家,三个从社会学上看是天主教国家(第九名比利时,第十名法国,第十四名奥地利)。我们要提醒一下,从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名次排列的五十年以来,这个名次相对地说,没有多大改变。

宗，十七世纪有六百九十一宗，十八世纪有一千五百七十四宗，十九世纪有八千五百二十七宗。这些发明创造大多集中在多中心的社会。在二十世纪，这个指数的增长加速了，而且，这种集中到多党派民主国家的速度也更快了，尽管在极权国家研究工作也作出很大努力……从1917年以来，许多革新震动了人类，比任何政权的更迭更为厉害：喷气飞机，雷达，电气机车，电视，激光，火箭，抗生素，血清……而其中没有一种是来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单一中心制度的国家。

诺贝尔指标

一个有才能的社会学家^②统计了一下应用科学（物理，化学，医药和生物学）的“诺贝尔指标”。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数目同他们每一个人所在国家的人口比较一下，在现今时代说来，是一个相当好的标准，足以表明世界各国科学革新的能力。这个指标所显示的名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瑞士名列前茅，接着是丹麦，奥地利，荷兰，瑞典，联合王国，德国和美国。法国名列第九*。

这个研究显示：

——“新教”国家同“天主教”国家比较起来，占压倒的优先地位（总数的五分之四）；而在“天主教”国家中，新教徒和犹太人又占压倒的领先地位；

以色列人得奖者**占有巨大比例。（奥地利名列第三是因为

* 请参看附录图表。有人会反驳说，这个奖金是由一个新教的学会颁发的。但是国际科学界盼望这个奖金的热烈情绪表明科学界并不怀疑，斯德哥尔摩皇家学会主持下对自然科学得奖人作出的选择是公正的。另外，可以用来做反证的是，诺贝尔文学、数学、和平奖金则更多地发给天主教国家。

** 犹太人问题值得大大论述一番。犹太教的道德准则在新教的伦理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旧约长期以来是天主教徒所不理会的，旧约以及由于信奉旧约而产生的共同文化，看来构成犹太人和新教徒之间的纽带。萨姆巴特早就看到这一点。

以色列的一代科学家定居于维也纳，直到 1933 年为止，他们当时逃避纳粹主义。)

——小国同大国比较起来占优先地位。排列中的头五名都是属于人口不到一千万的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一如在经济方面——数量并不象普遍认为那样，并不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梯级经济是一张王牌。小的自治单位争奇赌胜是一张更重要得多的王牌。

先 锋 精 神

为了让科学精神真正开花结果，光有自由的好奇心是不够的，需要有饱满的激情，要把假设变成发现，把发现变做发明，把发明变做革新。要善于把研究工作变为事业。这就是我称之为“先锋精神”的特点。具备这种先锋精神的人才是一个优胜者。没有他，就不可能把改变的想法变为现实，即经过这种想法加以改变了的现实。

例如，威廉·比尤克尔^②，这个荷兰人认为，为了避免鲱鱼腐烂，就要不让它同空气接触，并把最容易腐烂的部分去掉。他把技术制订出来：清除内脏，把鳃切去^②，把鱼紧挨着排列起来。马上，这种容易保存的食品就大受欢迎，以致荷兰把它用来做交换手段。这样，鲱鱼就成了财富，弥补了大自然对荷兰的刻薄。这个民族的命运也就起了变化。

革新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善于把人们想不到要联系起来的因素，联系起来，而成功地使其变为有用的新事物。

然而，对挑战的反击在人类历史中远非是规律。一百万，接着是二百万，三百万以色列人在沙漠的挑战面前，起来应战；而数以千万计的人在相同的地区，却低头屈服，认为天然环境是命里注定的。

划地为牢以及僵硬的分工,是一切等级制度的特点,使得难以集中所需要的因素去综合革新的力量。请看看贝尔纳·帕利西,他把家具也烧了,以便达到陶瓷上釉的温度。克里斯托夫·哥伦布迫使那些造反的船员相信他一定可以发现通往中国或印度的道路。马克思创造了使劳动阶级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的学说。亨利·福特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建立了制造汽车的流水线。弗洛伊德破天荒地创造了一种解释下意识和治疗精神病的方法。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所有这些人,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差别,都是革新家,思想的先驱,爱冒风险的实业家,心灵手巧的应用家,精力过人的改革家,争奇赌胜的创造家。如果他们要等候等级制度批准,才敢想敢做,那么,他们能有什么作为呢?

有些多中心的小单位,个人和集体可以独立地采取决定,使自己适应需要,进行革新和向前迈进。大的单一中心的整体就象史前的怪物一样,它们之所以消灭是因为它们的体积本身妨碍它们适应周围环境。

第二十一章 发展的激素

1. 发展的连锁反应

几千年以来,人们相信,只要吃得多,就可以长大和身体强壮。这是个数量问题。今天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机体的发展是受质量因素支配的:这些催化剂,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起作用,它们自己却不消灭,而且看起来好象没有发生作用似的。这就是酶和激素。只要缺少了它们或者失调,新陈代谢就会混乱,胃口不好,精神衰退,生长停止。经济增长的情况也一样。但是,在这里,催化剂是文化上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因素。

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尽管有丰富的原料,以及从出口原料和劳动力所得到的外汇,但如果它们不采取一种经济思想,它们就只会得到部分的增长,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赘长,而不是发展。

为什么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的作用,为什么在法国国民力量集中于政府手中对于西方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演变,那么具有决定意义呢?这无疑是因为所提到的那些道德准则;在某些社会中,只要存在就足以促成发展的连锁反应,而在别的一些国家中,由于它们不存在,就阻止了这种连锁反应。

对于西方国家的命运,新教和天主教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组织原则:一方面是多中心的,另一方面则是单一中心的。这些原则大大超过了宗教本身,其力量是这样的大,以致它们在宗教激情平息下来很久以后仍然继续推动这些社会。它们甚至在十九世纪的世俗化运动和二十世纪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以后,仍能保存下来。

一切好象是：等级制度的社会把它们本身内的发展催化剂抑制住了，本来，在它们自己发生抽搐之前，这些催化剂是存在的。相反地，自治的社会则大量地分泌这种催化剂。

这种生物化学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让我们更密切地观察一下吧。

托马斯·库克和唐·吉诃德

有责任感的自治，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过了，它是主要的激素，因为它激发起其他的激素。你所负起的责任，你自己甘冒的风险，促使你行动。经济的能动性是建立在财政信用这个赌注的基础上的；财政的信用又以精神信用为基础：贷款人的赌注押在借款人的可靠性上。信用就是值得信任和给予信任。给予你的信任把你动员起来。不过，还要你配受这种信任：行动合理，努力不懈，守时，有秩序，有方法，有纪律，遵守义务等等，是经济发展必经之途。

1845年，有一个苏格兰人，是浸礼教牧师、戒酒会的发起人托马斯·库克，组织他的信徒进行一次集体旅行：票价低，旅馆干净，不售白酒，收费低廉。这个办法受到欢迎。他便再次进行组织，得到信任：费用较低，一切预先安排妥当，落脚的地方经过细心挑选。1851年，在初步成功的鼓舞下，这个牧师创设了库克旅行社。不久后，他便组织周游世界的旅行。

广泛招徕旅客，收费低廉，又主张节约开支和戒酒，他有着坚毅和冒险精神，追求实际成就，这个牧师兼实业家多么能代表清教徒的思想和发展中的社会啊！

唐·吉诃德则只在他的梦幻周围旅行。托马斯·库克和唐·吉诃德是两种文明的象征，象征的不同体现了文明的不同。说实在的，人家愿意去认识的是唐·吉诃德。但是，要去看唐·吉诃德，却非要去请教库克旅行社不可。

金钱—自主的手段

从十七世纪连锁反应一开始，头脑清醒的人就看到了那些特点，今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把金钱同发展联系起来。这样，金钱，作为自主的标记和手段，恢复了名誉。自由的人被认为有能力很好利用金钱而绝不去滥用它。“我们应该鼓励基督教徒，让他们能赚什么就赚什么，能节约什么就节约什么，事实上，也就是说让他们发财致富”，这是卫理公会教的创始人约翰·韦斯莱牧师的话。新教徒吉佐以后不过是对这种说法进行一些修饰而已：“用劳动和节约去致富。”这个口号，法国人出于他们的思想习惯大加抨击*。

所谓管理得当即意味着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价值高于所消费的财富的价值。这样的剩余，同反经济思想国家普遍的想法相反，并不是从任何人那里抢来的。它是顽强地同因循守旧、匮乏、缺点和浪费进行斗争的结果。所有工业化经济，即使共产主义的也一样，都追求利润，不过用有收益这个不那么露骨的名义罢了。

投资精神

节约和投资精神是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激素。是同个人超越自己的努力齐头并进的；需要有自制的能力，把长远利益放在眼前利益之上；需要克服铺张的习气，需要某种清苦的精神。

查里沃瓦神甫在十八世纪曾访问北美洲，对于英国移民所表现的某种清苦的作风和法国移民的铺张习气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新英伦和英帝国治下的省份，到处繁荣富庶，人们的财富似乎用不完；而在新法兰西，则可以看到富裕的外表掩盖着贫穷。英国移民

* 如果有一天，一个大胆的历史学家敢于为吉佐恢复名誉，那将是一个迹象，意味着法国开始破除它的反经济的思想了。

积累财富而不去花费；法国人则有什么就享受什么，没有的也要夸耀^①。”在法国人的心里，有一种天生的膨胀的欲望。

工业革命这样突出的特点，即成批生产，难道其本身不就是这种节约精神的一个结果吗？英国的资产阶级衣着简朴，颜色平淡，大家都差不多，这样，他们就鼓励了纺织工业成批生产；在天主教国家，人们的衣着则追求稀奇古怪，色泽鲜艳，尽可能是一人一样。最后却是新教徒的服装占了上风。

在拉丁国家里，人们毫不吝惜地挥霍金钱来出风头和标新立异：庆祝节日，放焰火，大规模狩猎，装饰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教堂等等。在新教国家里，人们宁愿投资于大批生产，这就必需扩张经济：需要收回生产设备的成本，增加顾客，招徕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等等。

竞争——脆弱的胜利

独立自主还会促进竞争，这是发展的另一个激素。

生物学上的竞争——生存斗争；政治上的竞争——权力斗争；军事上的竞争——武装斗争，是自发的。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竞争是高度地人为的。原始社会里没有这种竞争；在西方长期存在的，和今天在稍加革新的形式下仍然存在的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里，也没有这种竞争。经济竞争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决定性的进步。

竞争是培养责任感的学校。谁在竞争的条件下建立一个企业，是要承担一切风险的，成功的话，就得到利润；失败的话，就要破产。

掌握垄断权的人一定会被引诱去加以滥用；捧着铁饭碗的人必然吊儿郎当：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呢？一个企业主独占一个市场时，就觉得可以自由提高价格：为什么要提高生产效率呢？荷兰人让·德维特富有启发性地阐述了十七世纪中叶自由企业竞争的好

处：“国家只能从那些工作得最多的人那里得到较大的好处，而专利公司是不会有更大贡献的，因为它们不必害怕有人损害它们的生意。格朗兰专利公司的捕鱼业盈利很少，因为它的船员开支很大，而同时鱼油、鱼脂和鲸鱼都处理得不好，人们把这一切存在货仓里，没有迅速地加以出售。相反地，私营的船主以最经济的办法去装备他们的船，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加快捕鱼速度，利用一切，使一切都发挥作用；寻找新的市场，使鱼的出售获得最好的价钱^②。”这听起来是多么象现代的语言啊！

这样经营事业逼使人在风险中生活，这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因此就出现订立同盟，徇私舞弊等现象。国家不停地加以追究。只要一家企业受到威胁，检验真理的时刻就来临了。如果国家帮助一家衰落的企业，到了超过理智的地步，经济就会充满活死人。人们常常以为，经济的自由主义意味着国家不进行干涉。其实正好相反。市场经济的逻辑要求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去实行竞争。管制经济同一个自由化政治结合起来，最大的弱点就是损害自由竞争。施加压力的集团——资方、劳方和政界——成功地对国家进行敲詐，他们依靠国家，绕过市场规律。

国际竞争能力的标准是主要的。保护主义给予经济一种虚假的和暂时的安全。一种受保护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以高于外国制造的同样产品的价格出售，就会削弱国民经济。现代经济是一种永久的考验。它是搏斗家所创造的，只有依靠这些搏斗家才能进步，甚至才能生存。

难道这不是富有象征性的吗？最落后的部门，如建筑、农业、分配——或在另一类别中的教育事业——恰恰是竞争最少的部门。法国差不多不曾有过真正的竞争制度。从萨利一直到罗马条约，差不多无间断地*受到关税壁垒的保护，不受主要竞争者的威

* 只有几年例外，即在 1786 年和 1860 年条约以后，而且范围有限。

胁。它还梦想加强行会主义和恢复保护主义。从1958年起,竞争的原则正式宣布了,但是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破坏它。

自由的庞大机器

在计划经济信徒的眼里,市场经济的活动是混乱不堪的。但是,试看竞争体系是怎样运转的。

每一天,在市场上,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在进行选择,是储蓄呢还是花钱呢,是买肉呢还是买鱼呢,是买葡萄酒呢还是买啤酒呢,是买新鲜食物呢还是买罐头呢,是保持自己的处境呢还是改变自己的处境呢,是居住在城里呢还是郊区呢,是购买某一个牌子的汽车呢还是买电视机呢。

通过这无数的决定,消费者对于经济方针施行无上的权力:如何使用他们的收入。这等于行使一种选举权,比票箱所批准的还要具体,还要经常得多;市场这个东西,在经济上来说,行的是直接民主,可以说,这是所有制度中最民主的。

数以千万计的自主决定中心,每年进行亿兆次的交换活动,一切都纪录下来,好象在一部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一样。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调整它们的生产,改变它们的计划,打乱它们的投资。

这些决定中是否有许多不合理的呢?甚至可以说,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不合理的。这是一种有秩序的活动,一面是几百万的自由选择,另一面是数以亿兆计的招徕顾客的竞争活动。这是一种无止境的活动,个人和集体相互适应瞬息万变的生活。

有人要说:“广告宣传任意摆布顾客们,使他们无法摆脱它所造成的幻觉”?但是为什么又承认,他们有能力识破笼络人心的政治宣传呢?一个极权政权不让公民有选举的权利,因而也不让消费者有选择消费的权利,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对于一个政治自由化的政权来说则是不合乎逻辑的。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另一种产

品,或者另一个消费者协会去戳穿这种一面倒的广告宣传。

贸易经济不停地把产品、情报、批评传播开来,使每一个生产者毫不延误地改善他的产品,否则就会被另一个竞争者所取代。我们不要硬说这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让我们只是说,它是经济进步最有效的杠杆。

日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挑战

我们证明了新教同市场工业文明的进步之间有着相互关系,而人们长期执拗地不善于投入这种文明;同天主教之间也有着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不应使我们灰心。路德而特别是卡尔文加速了在他们以前已经开始的一个发展过程,但并不是有意识的。反改革同样是无意中抑制了这一过程。长期以来,无论加速也好,抑制也好,都好象同宗教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最好不过的例子是日本。它一点也不关心宗教,但善于发挥它所洞悉的力量。

1853年,佩里准将的美国舰队强行通过长崎海峡。海军陆战队登陆。这个封建的农业国只好向国际贸易开放它的港口。十一年前,鸦片战争在中国也造成同样的情况。象它的巨大的邻国一样,日本正在变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骄傲地死守着它的文明,不愿在思想习惯上作任何让步,就只好拱手奉送它的所有财富和实力。日本则在思想上作了很大让步,但却发展了它的财富和实力。

一个世纪以后,从1968年,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已成为“第三大强国*^③”。这是因为它接受了佩里海军准将的挑战:它开始改变

* 说得更精确些,日本是由于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登上第三位的(在美国和苏联之后)。的确,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毛值还远远落在西欧之后,包括欧洲的拉丁国家,但是日本大大接近了西欧基督教国家的领头的队伍。赫尔曼·卡因预言,日本人将于2000年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它的思想。

它向它的老师学习,准备雪耻。它派它的青年到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去学习,精于利用西方的专利证和技术,仿效英国的议会和美国的预算,普鲁士的警察和体育馆,瑞士的钟表,瑞典的滚珠轴承,挪威的拖网渔船,德国的光学仪器和商业法典,美国的大学校园等等④。

日本只有那么少的王牌,却获得那么大的成就:在只有法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上*,百分之八十的面积是不能住人的,只有百分之十六至十八的土地可以耕种。台风,海啸,地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往往引起生活的大动荡**。岛屿之多,地势之复杂使得交通困难。资源是贫乏的:煤少而差;几乎没有石油和天然气;很少矿藏。在日本,只有丝和鱼是丰富的。

然而,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成了一个真正的经济增长实验室。供给一亿以上的居民所需食物的四分之三。1976年的工业生产相当于联邦德国和法国的总和;或者相当于所有其他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苏联的西伯利亚的总和。它是世界上商船,摩托车,缝纫机,照相机,显微镜,半导体的最大生产国,在美国以外的二百家最大的企业中,有四十五家是日本的⑥。

1868年的一个古老落后的社会到1968年庆祝“明治维新***”的一百周年,感觉到自己实现了一个集体奇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是一种“飞去来器”运动。然而,日本人仍然是忠于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的。到我们今天,经济思想已同基督新教分开来了,虽然经济思想是从新教思想汲取其主要力量的。

* 而日本人口等于法国人口的两倍多。

** 1923年的地震把东京和广岛毁灭,造成十万人死亡⑤。

*** 日本字意为“光明的时代”或“启蒙时代”。这个名字是给年青的天皇明治起的。他在1867年登基,英美文明是在他统治下引进日本的。

2. 经济桎梏

这种瞌睡病,拉丁欧洲从十七世纪便身受其害,到底是哪种瞌睡蝇引起的呢?大约在这个时代,出现一种道德等级,经济、生产劳动、企业精神、技术、革新都受到轻视,甚至受到压制,而其他的活动则评价过高,蓬勃发展起来,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非生产的:荣誉,文彩,玄谈,安分守己,清高等。

多中心社会让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效能,而单一中心社会则加以扼杀。还有更糟糕的是,到处设置禁区。

我们的反经济行为最初是在上层分子的影响下形成和维持下来的。在旧社会,上层分子是贵族,而法国的贵族,特别是从路易十四以来,是生活在“丧失身分的恐惧”中,贵族要用鲜血付税,所以豁免用金钱付税。他们只是为了效忠上帝和皇上而活着。如果他们“降低身分”,如果他们从事一种“机械”的技艺——也就是体力劳动——或者从事商业,他们就会失去贵族的资格^⑦。朱弗罗瓦·达邦侯爵——就在美国宣布独立那一年——被他的家族抛弃,因为他亲自动手造了一条轮船,可以在杜普斯河上航行。

孟德斯鸠虽然有现代思想,但也脱离不了他的阶级偏见:“贵族在君主国里经商是违反商业精神的。贵族在君主国里经商是违反君主制精神的。”但也有少数例外,即贵族可以保持其身分而同时从事采矿业、玻璃制造业和海军军备。在大革命前夕,有上千个贵族家庭参加工业:八万个家庭中的一千个^⑧。实际上,禁锢的阴影扩大到整个社会上^⑨。

在大革命很久以后,这种禁锢仍然继续存在。就象“有些贵人什么也没有学但什么都懂”那样,他们什么也没有赚回来,但却拥有财产。受到尊敬的人是那些没有生产财富而消费财富的人——即贵族和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一个人把辛辛苦苦赚来的财富乱肆

挥霍,即使象用钞票来点火抽烟那样,他也是会得到宽恕的……而在新教国家,作法正好相反。

圣西门伯爵在 1819 年《寓言》一书中揭露贵族、军人、政界、宗教和行政占有优先地位的怪现象。他假定说,如果法国丧失了领导人,它并不会有任何损失:“有大批的法国人可以担当王兄王弟的职位;但是如果法国失去实业家,银行家,工程师,它就会一蹶不振。”在复辟时代的法国,这样一个寓言还不能深入人心,在这个古老的天主教国家里,是太反潮流了。圣西门被送上法庭,判了三个月监禁和五百法郎罚款。就在这个时候,贝里公爵被暗杀了。检察官在他的控词里,控诉圣西门用他的寓言鼓动路维尔犯罪……

资产阶级对经济的背叛

如果贵族的道德准则没有通过单向的毛细管作用,蔓延到资产阶级那里去,反经济的偏见本来不会那么严重的。资产阶级他们是要用金钱交税的,所以必须从事经济活动。贵族就因此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低人一等,资产阶级也这样认为。要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所做的事,那又怎能热心地去干呢?他们本来可以成为促成经济发展的主人,但是这样醉心于贵族的道德等级观,以致只想着,只要能够得到“现成的财富”,就马上抛弃那种“自为的财富”。至少一直到美好的时代*,很多平民或平民的后代,发了财,就放弃生产活动而去找一个政府职位,大肆铺张浪费:就这样得到社会上的尊敬,从而厕身于特权阶级的行列,分享国家的威权^⑩。

十八世纪,巴黎的食利者加入马松秘密组织要填写他们的“身分”:有一些人说自己是“过着贵族生活的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宣称“象贵族一样生活”,还有些人干脆填上“什么也不干”。对于这

* 指 1900 年前后。——译注

些资产阶级来说，贵族的同义语就是游手好闲^①。直到我们今天，多少发了财的资产阶级出高价为自己的儿子找个高官职位，而不愿让他当一家法国公司的驻外代表。

即使这会使不止一个反宗教的知识分子吃惊，人们不得不承认，最早反对利润的是宗教。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榜样，在反对利润上，增添神学的威严：禁止担任神职。经院哲学看不起生产和交易。孟德斯鸠有理由强调说，“我们因商业毁灭而遭受的所有灾难都是经院哲学家们的空论造成的。他们把商业同奸诈联系在一起”。到中世纪末，开始有一种“进步”的演变，但反改革把它粗暴地打断了，直截了当地谴责利润，认为不仅贷款收息是罪过，整个经济都是罪过。

反对消费社会

这个背景如此牢固地树立在我们的灵魂里，就象童年的回忆一样。在它下面，多少古代的乌托邦，多少现代思想没有能够开出花朵来。1534年，让·德利斯在芒斯特和丰斯法利夺取了政权，自立为“新西昂之王”。在这以前，他经商失败。他在芒斯特统治了几个月，决定废除私人钱财，“自私”的财产，废除买卖、利息和高利贷，这一切是“违反仁心的罪孽”。他失败了，但是不象想象的那么严重：他的精神留在所有人间天堂制造者的心里。1968年5月的一张招贴就宣传反对“消费社会”：“我们反对这样一个世界，你不是饿死，就有可能闷死。”

如果说，唐·吉珂德和桑蒂亚戈的主人耀武扬威地走过比利牛斯山脉，那么在英伦海峡彼岸和莱茵河彼岸是不大遇得到他们的。在英国和在苏格兰，大人物的名字和大财产总是合在一起的。在德国，我惊讶地看到德国的名门望族在工商业界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萨尔姆的一个亲王经营一种汽水；塞恩-威根斯坦的一

个亲王在南美洲出售平民化汽车；普鲁士的亨利亲王推销某个商标的口红。这些当朝君王的儿孙自豪地重振家业，修复祖传的官邸。

人们明白为什么集体主义的政权摒弃选举，也摒弃市场经济，这是因为领导人比消费者知道得更清楚消费者应该消费什么东西，比公民们知道得更清楚谁应该领导他们。

但是，在民主社会中，反对市场经济的原因看来只能是流传至今的古老禁忌。

在原始社会，交易只起很小的作用，而利润大多数时候被视为偷窃。神学又给这些禁忌加上精神上的根据。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又给它们增添现代科学的香气，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苏维埃式的计划化长期吸引着法国的知识界。

不要市场就必然引起黑市。要是把经济放在紧身衣里，它总得想办法动弹啊。于是，一种平行的经济便形成了。旅游者在苏联可以发现，在国营商店里是买不到官价牛肉的。在集体农庄的市场上则可以任意购买，但是每公斤的价钱相当于一个普通苏联人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而农民在小块土地上的生产效率要比他在国营农场的生产效率高八到十倍。

官僚经济

技术专家的梦想是在纸上决定前途，满不在乎地决定甚么东西对治下的人是合适的。多迷人啊！把数字、数据和目标，一行紧挨一行地排列下来，好象阅兵时的军队一样！他们这样爱好“合理性”，把常识都忘了。

我们的财政部，从1963年以来，固执地反对提高简装书的价格，因为这同普通版的书不一样，是列入物价指标内的。然而制作这种书的费用超过了售价，因为售价是固定的，而成本费用则不

是。如果简装书的出版商找不出办法绕过这个禁令，那就会再也看不到这种平民化的版本了。而如果把3/4开的书的价钱降低，这些版本对于推广读书风气所作的贡献就会大大超过所有的政府。政府的规定造成一种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荒唐现象。出版商想法把原来是“单部版”的书叫做“双部版”，把双部版的书叫做“三部版”或“四部版”。物价局并没有受骗*，但是，主要方面保住了：规定得到尊重，指标没有动。把戏耍过了，但对谁耍的呢？

我们乐意把管制经济——行政的干涉——看做是现时代命里注定的：也许这种想法使我们忍受着不敢造反。我们应该认识到，相反地，许多世纪以来，管制经济一直是法国的一个特点，法国之所以落后，它起了主要作用。也许，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面有些东西是过时的。

十七世纪末，阿尔萨斯市集每隔多长时间举行一次，是由凡尔赛规定的。1689年，国王批准在斯特拉斯堡每年举行两次马匹市集。1683年8月，路沃瓦问他的财务司：“哪一天可以准许吉罗马尼的居民集市出售他们的牲口？这一天，在方圆三十里内，不应有市集。^⑫”

十八世纪初，在布列塔尼，王国的官府严密监视有些规定的执行情况，例如禁售外来布匹，生产纺织品，从事家庭工业等等。稍后一些时候，又进行缩减牧场和渔场的面积和数量，因为海军大臣莫勒帕根据一个督察的报告，认定“布列塔尼的鱼场太多，损害集体^⑬。”与此同时，法国却在闹饥荒。

1738年，大臣们商量在巴约海军总部的港口开设鱼市场。无疑地在某些方面要进行一些改革，如肃清那些假拍卖，因为这破坏了拍卖。但是，象这种事还需要皇上的敕令吗？国王决定，捕获的

* 简装书的价格于1976年调整，事情已经过了十三年。

鱼,应该陈放在沙滩上,夏天半小时,冬天一小时。“渔民把打来的鲷鱼分开时,每份不得超过六条^⑭”。而如果新的情况表明应该把陈放的时间增加一刻钟,或者每份鱼可以改变一下,增减一两条,那么,是不是要去惊动皇上呢?当然不,那就只好违反常识,去执行法律,或者绕过法律,按常识办事。

发动机出故障

从十七世纪以来,我们的传统经常使发展的发动机出故障。

是喜欢冒险吗?一个封闭社会的道德观更喜欢的是保险赚钱;是流动性吗?人们不喜欢到别的省份去,也不愿换个职位。失业也一样,人家设法给失业者保证安全。此外,所有公民最后都迷信社会保险这种十足的神话,即使他们自己同保险措施一样,都受到破产的威胁。

爱钱,象维吉尔所说的可耻的垂涎黄白^⑮,永远是一切人的本能。但是它总是受到宗教、道德或社会禁令的压制。在所有的文明中,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商业和工业文明,它成功地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在我们国家里,压制则仍然是主要的。

在我举行庆祝我们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招待会上,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对我说:“多可惜啊,卡斯特勒教授没有领取他发明的光学抽吸法的专利权!如果领取了的话,他本来可以发一笔财的,现在却肥了美国人,他自己吃亏了。”

在场的一位高等师范学校出身的青年科学家冷冷地插嘴说:“这证明他是诚实的。”不愿领取专利证,放弃从发明创造中获利,这是诚实的证据……最好是说……个人无私的证据。这能说就是为国家服务吗?更确切地说,这难道不是不自觉地随俗浮沉、乖乖地跟着大众的思想习惯跑吗?

利润使人堕落,金钱带来污染。到后来,竟然耻于取得成就。

总而言之，它引起一种羡慕和蔑视的混合感情。有一位公共工程的实业家，是一个出色的管理人员，熟悉业务，他兴旺起来，但同时受到轻视：“你想一想，他父亲是个泥水匠”。上层分子几个世纪以来向大家鼓吹了什么偏见，大家对他们也就反映了什么偏见。个人成功是可疑的，只有在几代以后才得到宽恕——也就是说，当它成了祖传的东西的时候。

正当的收益和不正当的收益

然而，无需进行多高深的经济研究，而只需有一点常识，就可以分辨出：

——不正当的收益，即靠地位得来的收入，利用缺货进行投机，损公肥私等；

——正当的收益，即补偿和奖赏革新家在创新时所冒的风险，也就是说，他需要工作，投资，付出他的精神、时间和精力，努力取得成果，而这个成果是个未知数，不一定有收益的。此外，没有他，就不可能取得这个成果^⑩。

由于把不正当的收益和正当的收益混为一谈，反收益思想在拉丁国家造成重大破坏；有谁革新而有所得，即使今天仍然受到谴责。

有些国家，反改革强化了教条主义，在一切具有这种特点的国家，反对经济是反对自由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所谓“谴责资本主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摒弃现代世界。此外，罗马毫不犹疑地多次公开申明这一点。例如庇护九世批文说：1864年，教廷明确谴责“进步，自由化和现代文明”，它特别申斥经济自由化，斥责它把劳动变为商品，把工资变为价格和把大权集中在几个人手里。

在罗马清教主义和马克思清教主义之间，国家清教主义完成了这三部曲。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行政法院要求所有股份

公司成立时应申请政府批准,就象开“妓院”一样。请翻开商业法:第五编第七十一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政府管理下,商人、船长、汇兑代理人、经纪人等聚会的地方”。有名的法学家洛克雷根据1724年和1785年御前会议的法令总结出这一条规定的精神。根据御前会议的法令,“除在证券交易所外,不得集会提出或商议交易”,这样,除在政府管制下,均不得商议交易。

游泳动作

在集体生活中,经济动机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性欲在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的等级社会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深深埋藏在各式各样心理中的束缚,压制了这一切。我们只有在冲破这些禁忌之后才能进入一个成年的社会,和从落后中赶上来。

有时候,偶然的¹机会可以启发和解放遭到压抑的个性。对于法国来说,共同市场可能是这种机会。法国学着它的伙伴的样子做。观察和模仿自己不大了解的一种经济动作,勇敢地做着游泳动作。水能把它浮起多久呢?但让它学游泳和喜欢水总是比较好的。

第二十二章 玛特和玛丽

1. 玛丽的优点

我们已见到了新教社会同天主教社会相比较其发展速度差别之大。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差别在经济和人口发展上所产生的一些后果。

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对外影响，历史作用，并不是只取决于它的物质财富和它的大小。陷入痉挛的意大利产生了但丁；人民生活安定和平和经济发展的瑞士产生了手表。法国和其他天主教国家所患的萎靡不振症并没有影响它的文化和艺术生命力。光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尺度去衡量一个国家的成就，就会陷入斯大林的唯物短视症，他曾询问梵蒂冈手下军队有多少个师。

当法国探讨过去时，所看到的并不全是懊恼的事：回顾我们的历史，虽然我不愿迁就自我宽慰，但也并不丧气。我们也有一些值得自豪的地方，这就要不光是拿经济增长率来衡量我们国家的成就。

然后，到了今天，历史覆盖了历史，使它的轮廓模糊起来。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对比原来是那么鲜明的，一方面是拉丁欧洲，因循守旧，等级森严，古老落后，患痉挛症；另一方面是新教欧洲，生机勃勃，迎着世上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嗅出未来的风向。——这个对比，到了二十世纪末就更为复杂化了：一边是崩溃，一边是觉醒，一边到处是危机，一边把历史推上新的途径。

更活跃的精神生活

当西方在十六世纪分道扬镳，它就不再全面协同行动了。基

督教的一部分追随玛特,另一部分追随玛丽,她们是拉扎尔的两姐妹。这一个“从事一种复杂的活动”,“为许多事情操心 and 忙碌”;另一个则“坐在上帝的脚下^①”。在积极的玛特和静观的玛丽之间,每一个民族都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在基督看来,是玛丽选对了。

法国以圣母玛丽亚为象征,一直比新教国家有更活跃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宗教在那里不只局限于一种模糊的神学。一直到我们今天,它不断产生神秘主义者和圣徒,也产生造反者和反潮流者。多亏宗教,每一种精神都是个人表演的舞台。还能有更好的创造人物的方式吗?

对于宗教,法国人认识到官感和精神如何微妙地结合起来。在玛丽的国家里,艺术的兴旺同天主教的持久生命力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发明创造,被排斥在技术和行动之外,便通过艺术和文学得到实现。由于不能同实际结合,它便在想象中发展起来。受到反改革影响的国家看到巴洛克风格得到胜利。虽然经济停顿,社会僵化,但是艺术丰富、多采,自由开放。不能创造生命便创造幻想。日常生活表现为歌舞、戏剧、小说、诗词。作家和艺术家,诗人和小说家都受到社会真正的崇拜。

小老百姓的生活也以自己的方式适应这种精神。它长时间保持着一种品质。而在玛特的国家里却一落千丈,因为那里工业集中,系统地根除古老的农民集体,把集体生活“群众化”。社会仍然是这样一个集体,在这个社会里大家喜欢给自己进行种种表演,并且善于丰富文化生活。与众不同的人物在“生产”中却得不到发展。有时他们成为塔塔林或马里尤斯*,这比较有趣。虽然社会进步来得慢,但却没有剥夺被剥削阶层的真正财富,即人本身的财

* 塔塔林是法国作家都德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后来成为好吹牛的小市民典型;马里尤斯是法国作家巴诺尔剧本的人物,富于幻想。——译注

富：他们保存了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天才。村子里的这个说书人本来可以成为大学教授，他成了大学教授，村里会更幸福一些吗？

强大组织的耐力

除此以外，等级制度组织具有巨大的耐久能力，例如，法兰西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世界上的罗马天主教会。能够持久本身就有优越性。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是对人类社会的最严重威胁。善于维持秩序，控制权势、暴力的失常活动，实施共同的法律和理想——这是值得尊敬的。无论是多么沉闷，多么故步自封，国家仍把法国人维持在一起；它把方形的草场修圆，差不多一直修成六角形*。它经过多少次战祸，革命，政治动荡，同宗教分离，社会颠覆运动，仍生存下来。

无论是多么沉闷和故步自封，罗马天主教会坚持下来了——尽管经过东方的分裂，阿维农的流放，大分裂，宗教改革和社会的世俗化，在最艰巨的岁月，继续保全慈善精神。在喧嚣和狂怒声中，它传播了上帝的声音，不停地宣传人类的精神团结。

离奇的相互关系

现在来看看玛特国家的优越性，这仅就实际效能而言，无论经济方面或政治组织方面，以及最后，在确立全国的一致见解方面。

因为，无论玛特的国家，或是玛丽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前后一贯性。自从十六世纪基督教分裂以来，发展了两种独立的、反向的连锁反应。两种连锁，每一个环节都影响到宗教、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两种反应，也许都还没有耗尽它们的爆炸力。

回顾以上各章，把时间压缩一下，就象电影摄影师用一个全景

* 指法国。——译注

镜头把各个远景压缩一样，让我们试试把这两种发展的前前后后作一个扼要的描绘。哪怕这样做会有点简单化，并且有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这不过是一些偶然的有效联系，而其实这些联系肯定是前后一贯的、趋向一致的，正如在一个体系里所存在的那样，也就是说，一个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整体。

让我们拿二十个可以视为典型的国家为例。十个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奥地利*、波兰*、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十个新教传统的国家：英国、荷兰、瑞士、丹麦、瑞典、挪威、美国、英语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大部分都不是唯一由天主教徒，也不是唯一由新教徒组成的。它们很多人已经不受基督教影响了。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在形成公共精神，创建各种制度和道德等级的时候，曾经是由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定调的。可以说，这些国家，从社会学上看，是天主教的，或新教的，哪怕在这些国家里不信教的人到处都占了多数***。

2. 玛特的优点

在新教国家，教徒是直接同上帝发生关系的，他只服从他良心的裁判，他自己读圣书，组织起同样是自主的宗教团体。

* 这些国家，在所提到的时期，受到历史的严重挫伤（长期的外国占领，肢解瓜分等），有时表现出异常的特点；但是从大部分标准来看，它们确实属于同一类型的。

** 除了魁北克以外加拿大的所有省份。

*** 我们没有提到德国（这个国家，由于教派的竞争严重分裂，无法把它划到这一文化或那一文化中）；也没有提到比利时（它开始时，受反改革的影响很深，但以后对荷兰和英国的影响大大开放；在利奥波尔·德撒克斯-科布尔的推动下，从1830年开始，系统地按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贸易主义的类型建设起来）；也没有提到魁北克（它同天主教社会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也有许多特点是英国统治所造成的）。让我们再说一遍，这是一些缓慢的发展过程，经过很长时间才可以觉察出来。例如，宗教改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只是在十七世纪受卡尔文教影响的国家和十九世纪受路德教影响的国家的国家才真正地显示出来。虽然某些资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梵蒂冈以来，就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了。

统一教会分裂为各不同的教会，推动了思想的多样化。各种宗教或哲学信念都得到容许和平共处。难民们受到殷勤的接待。宗教权和民政权很快就在事实上彼此独立，但没有真正地对立。

习惯法逐渐压倒了成文法。大原则比细节的规定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先例不停地促使法规演变，跟上现实的步伐。个人在社会上的自由很快就制度化。

阅读圣经对于个人成功是必要的。初级和中级教育迅速发展^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活。

每一个学校或者是自治的，或者直接由地方当局管理。公立学校的建立只是作为私立学校的补充。学制多样化有助于经常更新教学法。

教学建立在信任的教育制上，它强调首创精神，毅力，耐劳，自觉守纪律；最严重的过失，莫过于辜负所得到的信任。

教育是尽可能具体的，具有实际用途的科目受到最优先的待遇。体育同其他的活动一样重要，是作为一种道德来教育学生的（让他们有君子感）。现在世界上所进行的集体运动（足球、橄榄球等）是起源于这些国家的。

教育很快就普及到女子。妇女相当快地在公民权利和民事权利方面取得平等*。

革新和贸易的社会

这些社会具有巨大的革新精神，在那里，很早就爱好技术。经济渠道主要是靠技术更新而扩展的。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受到尊重的阶级，即实业家阶级。他们促使新事物诞生：新技术，新资本、能源和原料来源；新市场和不断更新的主顾。

* 只有瑞士例外，妇女到 1971 年才获得完全的选举权。

市场工业经济的规律得到接受和公开宣传：供求法则，私人首创精神，追求收益和竞争利润，自由订约等。赚钱是取得职业成就的标记。

社会的分散组织，基层集体的力量，技术的迅速传播等等，加速了思想和财富交流的进展。

这个运动甚至席卷最反对改革的部门，也就是农业。它迅速从衣食经济过渡到贸易经济。由于引进机械，减少了人力，用节约的劳动力来从事工业活动。“农民消亡”来得很快。

这是商人的社会。商业属于最受尊敬的一种活动。外交和殖民运动的目标就是发展商业贸易。信贷促成银行、保险和储蓄事业的发展。

这是工业的社会，在那里，最优先的地位是给予这样的企业，它设法把一种产品用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卖给尽可能多的顾客，结果促成大批生产、自动化和科学管理等等。

民主社会

行政权很早就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控制。各种权力互相平衡。宪法的稳定性并不妨碍逐步调整。

地方民主补充和平衡着国家民主。地方权力有着广泛的职能；国家官僚体系相对地说减弱了，公民们可以知道谁负责任。他们接受各种政治体制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制度，他们认为制度的缺点是可以补救的。

少数人丝毫不觉得遭到大多数人遗弃，但也不抛弃大多数人。各个党派轮流(或同时)参加政府的作法毫无困难地得到遵守。

公民具有高度的公民道德。社会的压力促使人们尊重政权机关的指示。社会是协调一致的。工会出现得很早，它具有一种协商精神，关系有时是十分紧张的，但可通过谈判得到缓和。阶级合

作比阶级斗争更受欢迎。

反潮流影响不了公众一致的见解，而仅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并促进不断的改变。共产主义扎不住根；颠覆活动顶多只是一些民间闹事。

3. 玛丽的萎靡不振

等级制度类型的社会经历着完全另一种连锁反应，成为玛特国家突出的对立面。

神甫是教徒集体的领袖和上帝的代言人。教会的概念同教士的概念混淆起来。宗教社会成为一个等级。国家教会服从教廷超国家的权威。不懂拉丁文的教徒长期以来习惯于生活在宗教的仪式中，就象一整套神咒。教士长期以来拥有自己的财产，垄断教育，同国家保持特殊优越的关系。谁不同意主流思想就遭到排斥。那些“偏离者”（新教徒，詹森教徒，阿尔明尼亚教徒，索斯尼斯教徒，以色列教徒等）长期以来遭到迫害，甚至斥逐。

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成文法上，是根据罗马天主教法典草拟的。各种规定——精确，繁多——妨碍了发展。个人自由迟迟才得到肯定。

教条主义的社会

教育倾向于仿效等级制度的样板。初级和中级教育发展缓慢。教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通外界。

差不多所有学校都由国家或教会的等级制控制（私立学校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办的），公立学校努力模仿教会垄断教育的办法，为我所用。

教育部变成到处伸手的官僚机构，它规定学校生活和教育的最小的细节。中央集权的组织和统一样板的作法，增加实验教育

的困难。教育进一步利用不信任的作用。上课的情况是一个什么都懂的教员在什么都不懂的学生面前表演。如果遭到反对，中央权力要不就趋向于更加强硬，要不就完全垮台。

教育故意搞成抽象的。只要显得更抽象，就被认为在教育上取得进步。纯粹空论比实际应用更受欢迎。理论数学比应用科学更有威信。

体育运动被视为次要的科目。仅有的一些地方性运动项目是用来表现个人的神通(斗牛,击剑,自行车赛等)。

妇女长期以来受到管制。女孩接受有组织的教育要比男孩迟得多。妇女并不是轻易地获得平等权利的。

翻版的社会

科学上的发现很难应用到技术发明上，而要应用到工业革新上就更困难了。

要取得经济增长只能等待消费增加，而不是设法更新技术、产品和科学。

“实业家”受人敌视。他们的闯劲遭到挫伤，于是他们就想出一个保险的办法，即利用地位得到收益，而不是改变经营方法，增加生产或扩充销路。

经济活动不大受欢迎，比不上宗教、行政和文化方面的活动。市场工业规律常遭到抛弃，发财致富受到嫌疑，只有接受遗产例外。

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贸易是困难的：社会隔离，个人同他所依靠的等级制度不相融洽，技术传播困难，阻挠了现代化交流的进展。

长期以来农业对变革避之若浼。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于土地上，农民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

商业也是古老落后的。社会的上层如果从事商业，就会丧失身份。商业所依靠的是设法强迫顾客接受所要推销的商品。

带息的信贷长时期以来遭到禁止，信贷的机构不善于适应环境。银行长期以来是在少数民族和宗教集团(新教徒，犹太人)手中。国家对银行并不放心，设法把银行纳入自己的系统。

工业更重视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主要不是降低价格来增加顾客，而是通过垄断来保护自己，保存现有的主顾。在很长时间内，制造业不超过手工业水平。

痉挛的社会

代表制度难以确立。要不就是专制政权，要不就是议会政权，历次宪法都太僵硬，因此短命的太多。地方民主比国家民主更难建立。

决定是强加给公民的，公民实际上没有可能参与拟订这些决定，即使这些决定是密切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负责人是没有姓名的，不可捉摸的。

意见一致是谈不到的。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反对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反对足以促使制度起变化的改革。

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人，他们的合法地位要得到承认就需要有一个巨大的多数。不卖账的人往往只好走极端。最有影响的工会就是那些不卖账最激烈的工会。“阶级斗争”的概念享有很大威望。

公民道德修养不高。投机取巧，“耍滑头”，“玩弄花招”得到鼓励和尊重。

共产党被视为天主教会的替身——天主教的一种反面形象：这个组织同样是超国家的，全球性的，教条主义的，有纪律性的。军队受到诱惑，想去干涉政治。

4. 新情况和后遗症

一方面是自治,信任,实用价值的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则是等级制度,不信任,教条准则的连锁反应。这两个图解大体上可以适用于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即从实行反改革的特伦特主教会议结束(1563年)到第二梵蒂冈主教会议开始(1962年)的四个世纪。

但是,这些图解不再足以解释一切问题了。天主教传统的社会,而特别是法国,发生了新的情况。随着第二梵蒂冈的到来,天主教本身也进行了改革。它大体上卸下了罗马教会的盔甲。这是一个主要事件。在眼前来说,天主教为了适应时代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例如,在法国,从1962年到1977年,三个天主教徒中,就有两个不再到教堂去。但是继续去的人,经过许多波折,重新加强了他们的信仰。

第二梵蒂冈的巨大好处就是把教徒同等级制度结合起来。对教会来说,是个好处,而同时,对所有天主教所塑造的社会,间接也有好处。即使大部分都已经背离了基督教,这个教虽然失去了强制思想的手段,却重新树立起榜样的作用。拉丁社会故步自封的最重大和主要原因不存在了。

这个文化封锁和某些经济封锁,同时破除了。法国从1945年以来,而特别是从1959年进入共同市场以来,踏入了一条新的轨道。由于坚决投入欧洲的怀抱,法国重新对斗争的新鲜空气发生兴趣。

其他的拉丁国家,只要稍稍能够把权力和自由调和起来,就可以从落后中赶上来。南欧已经取得进展,还可以取得更大的进展。正因为直到最近一个时候还是古老落后的,所以拥有较早工业化的国家所缺乏的后备力量,在长期衰落以后,四个拉丁姊妹国也许已开始复苏了。

这种发展就这样冲淡了我们所挑出来的两种典型的对照。

在这个二十世纪末期，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同一个危机：也就是变革太快。而这种变革是西方各国强加于其他国家的，现在正是它们在经受着资本主义危机。

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说，还要加上第三种危机，这就是我们特有的浸透罗马精神的社会和行政模式的危机。

未来的冲击在我们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里，在我们的教条主义思想结构里，引起了抽搐和颤抖。这有可能导致收紧统治的罗网。但是，与此同时，等级制度的罗网泡在越来越自由化的环境中，社会上见解一致的程度落到最低点。强制的纪律变得无法忍受，它并没有由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所代替。法国在等级制度方面来说是太自由了，而在民主方面则又是太专制了。在这个瓦解中的凯撒式社会里，权力起着诱导剂的作用；而民主则起着溶解剂的作用。这二者都好象失去了本来的积极意义。这样，问题摆出来了：法国能实现它的第二梵蒂冈吗？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有可能是昂贵的，因为国家的债务是沉重的。

余磁力作用

法国由于制度稳定和向世界开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四个世纪以来困扰着它的各种疾病，还有许多后遗症远没有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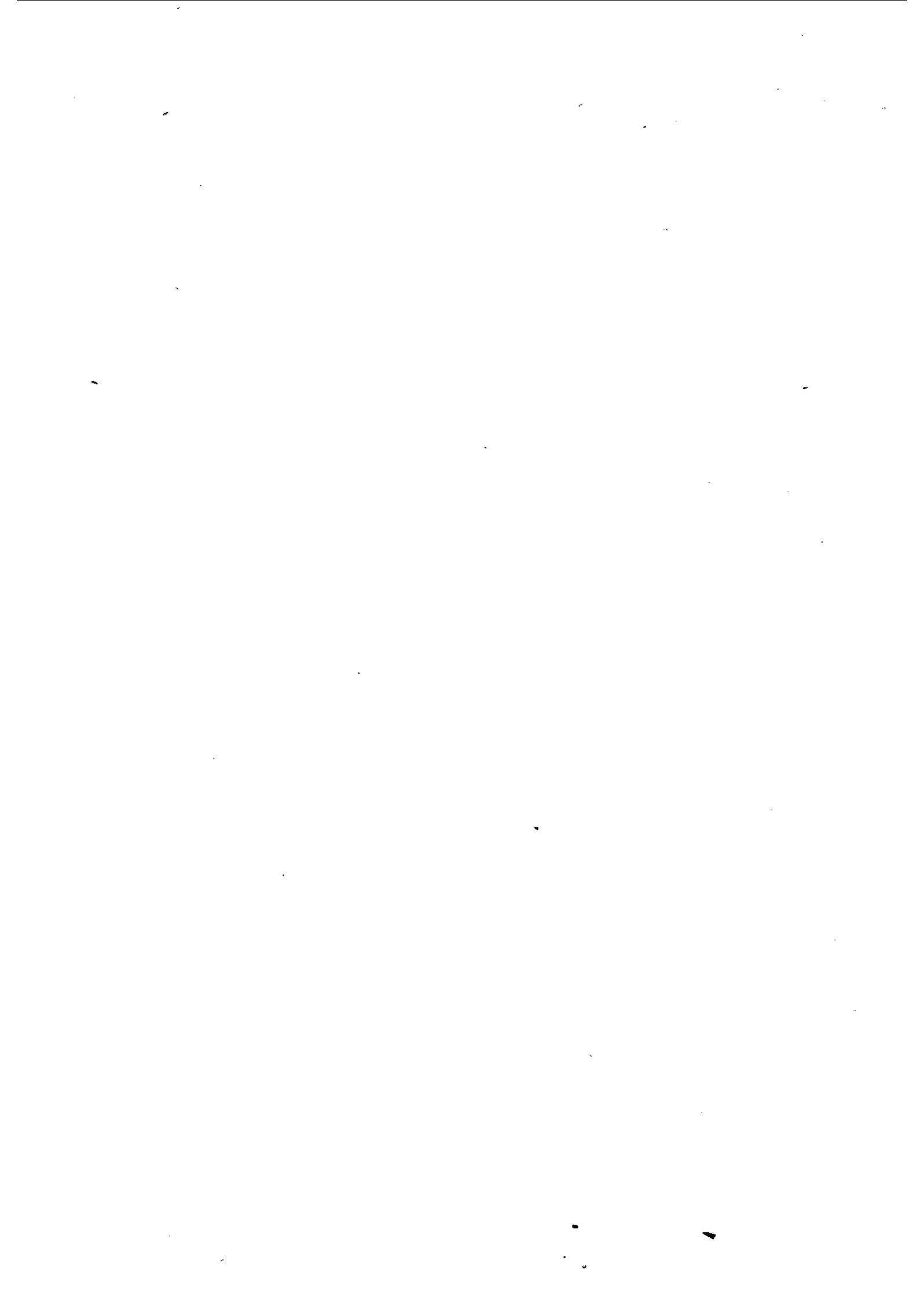
当一个磁场吸引一块铁，吸引力在磁场作用停止很久以后还继续存在。这种余磁力作用，社会物理学里是很常见的。例如宗教虔诚淡薄了，但是，宗教所造成的思想习惯仍然影响人们的精神。宗教社会产生了一种同它类似的文明；这种文明在发展。国家的代表不再把造反的农民吊死在树上了，但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继续从根本上对立。最现代的政党标榜“决裂”战略。在社会的中心有一条缝，随时都有开裂的可能。

由于文化的分裂加上经济的脆弱，政治社会相当脆弱，这是种种落后累积起来的后遗症。我们是靠两种经济生活的：一种是现代的，积极扩展的；另一种是落后的，衰退的，注定要灭亡的。后者的惰性使前者的发展遭到很大的妨碍。法国人拥有世界上私人掌握的黄金的四分之一，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就这样让他们很大一部分资本在一旁沉睡；同时，国家则把第二部分黄金管理起来，通过不停干预，打乱了第三部分黄金的使用方法：这一部分黄金是活跃的，但掌握在私人手里，并且，由于另两部分黄金免除了负担，还得把它们担子担负起来。枯树林子是稠密的，但我们的经济作风并不利于廓清这些枯树林。

法国过去作出了选择，这时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它马上不再自食其果。法国几个世纪以来实行行政专制，建立了一个僵化的社会，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农业和商业仍旧是古老落后的；人口江河日下，工业化进展迟缓，实行保护主义。

对于“法兰西病”历史的这种漫步回顾，也许能使我们得到了解答现今情况的钥匙，例如，它显示出，没有经济进步，就没有社会进步；没有经济思想，也就没有经济进步。它显示出，法国人应该爱他们的商业，工业，技术，因而也应爱他们的出口商，爱他们的工业家和他们的技术人员。它显示出，他们应该承认，市场法则，只不过是经济上的民主法则。

对历史给我们设置的持久障碍，在那么多无谓的政治倾轧之后，我们只能进行必要的思想革命来加以克服。



第三部

没有凯撒的凯撒主义

行政在本质上总是趋向于集权的。信任是精神动力，是政府的动力，是任何规定所不能代替的。人们白费力气设法通过规定的途径——即在纸上——实行分权：如果上级有不信任思想，斤斤计较个人职权，爱管鸡毛蒜皮，那么，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谁也没法让上级无所不管，因为这是上级的责任，至少是间接负责的。合乎逻辑的另一结果则是，如果上级高兴直接过问一件事，它的意见总是压倒下级的意见。

事实上，人们懂得，这等于把决定权转移，不是由调案的高级官员个人判断处理，而是由机关或法庭的某个职员处理，通常来说，这个职员的级别比不上具有调案权力的高级官员，提出的意见也比不上他的可靠……行政集权的扩大是政府腐败和紊乱的一个原因。

库尔诺(1864)①

第二十三章 技术专家越俎代庖

1958年9月28日,星期日,在里昂车站的月台上,十几名旅客要到威尼斯去参加关于共同市场的一次圆桌会议。他们热烈地议论这一天要举行的公民投票,即将决定建立第五共和国*。特别快车要在二十点开出——正好是投票将在巴黎和大部分城市结束的时间。我们要等到第二天才知道结果。

只需让赛纳和马尔尼省投票

我走开一会儿去打电话给赛纳和马尔尼省,那里到十八点以后就停止投票了。在布莱塞-赛纳区,计票工作已经结束,据宣布有百分之七十九点五赞成,比总情报处的估计高百分之二十;在默伦计算本省的票数,在普罗文计算本区的票数,工作还在进行,但是都在百分之七十九左右。我得赶上我的旅伴。火车开始加快速度,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我提出不同意见说:“这些数字什么也说明不了”。赛纳和马尔尼省一向是戴高乐派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在米兰火车站上,意大利报纸宣布法本土有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五的赞成票。埃德加·富尔把情况的关键说出来了:“本来可以省掉一次公民投票,只要让赛纳和马尔尼省投票就行了。”

* 这一群人包括政治家:埃德加·富尔,弗朗索瓦·密特朗,莫里斯·富尔,安德烈·布特密;工会活动家皮埃尔·勒布伦;官员皮埃尔·尤里,雅克·杜哈曼,罗兰·普雷和我。

** 他显得熟悉选举地理。事实上,1947年的市政选举,1951年的议会选举,那里的法兰西人民同盟都占了优势。

以后的十一次全国性征求民意*——即另外的五次公民投票和六次总统选举——普罗文-蒙特罗选区的结果同法本土的结果始终相同，毫无变化。从一条河中取出的一坛水，只要地点选择得好，是可以大体上知道整条河的河水成分的。赛纳和马尔尼省同另外四个省**也具有这种古怪的特殊地位：省选举的平均百分比同法本土的平均百分比相差不到百分之零点五。今天，大家对选举预测那么准确感到厌倦了。然而东方-特快列车的旅客那种天真的惊奇感觉，在1958年秋天的这个清晨，从没有离开过我。

法国的缩影

于是，从那时起，我便专心地诊断这个平凡的选区，它是四百七十个选区中的一个，同其它的普通选区一样。无论巴黎这个大都会，或者十足的农业区，或者是大城市，都不是法国的缩影，如果说，在普罗文行政区的这个小小世界，选举情况同全国一样，这是因为这个选区是按照国家的榜样组成的：居民的成分——工人、农民、职员、官员、男、女、老、幼，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等——分布情况同整个国家的一样。这里离巴黎只有八十公里远，但人家觉得好象有八百公里。这里已经是外省了，有它的部族，宗派，巴尔扎克时代的村、镇，以及它的“大家宅”，有昏昏沉沉的时候，也有热情奔放的时候；除此以外，星期日还有不多不少的巴黎人——每七个选民中就有一人是在那里有别墅的。所以这个小小世界是完整无缺的。

长时期以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落后的法国，沉睡在田

* 立法选举显然具有过分的地方性和过于依赖竞选人，所以不能在一个选区里确切地反映出全国性的倾向来。

** 马尔尼，奥比，朱拉和维埃尼，从1958年到1974年的六次公民投票和六次总统选举。

园梦乡，一成不变地抱住那种冷冰冰的道德观念。传统的士绅都长期保留着他们忠实的门客。这个古老的社会难以改变它的负责人，同样地，负责人也难以改变这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法国，它胜利地顶住了变化，但是自己又开始变得太快：农庄迅速地滑向市镇，乡村滑向首府，首府滑向巴黎。突然之间，各种有力的潮流把这个似乎睡着了的集体搅动起来。

快速民意测验法

一个议员搞社会学就象朱丹先生*作散文一样。市长、省议员、行政区议员发现，什么门都是对他们开着的。他们得到邀请参加复查委员会，访问学校，处理家长们提出的意见，视察滑雪班，知道谁需要劳保补助，深入各个家庭，报丧，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参加所有喜庆活动。如果他要写点什么东西，他可以得到各种具体材料，是任何民意测验机构都无法向他提供的。

当我想知道法国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就询问那些来请我帮忙的普通老百姓。这要比民意测验耗费少，而同样可靠。开始的时候，我害怕人家不大愿意回答问题。我搞错了，差不多所有人都喜欢人家重视他们提出的意见。这种询问往往得到意外收获。议员，报刊，政治派别的顾虑突然变得遥远了……对于社会的潜水员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发现啊！景物起了多大的变化啊！

“徬徨的人”

当我想找一个形容词来描绘选民，在我办事处进进出出的那些人就出现在我眼前，我只找到“徬徨”这么一个词。有时候他们自己也用。如果我这本书还有一些激动人心的地方，那么无疑地

* 莫里哀剧本中的人物，是个市侩暴发户，好附庸风雅。——译注

是为了怀念这些陷入困境的男男女女。

这种困境是什么形成的呢？大多数时候，不是贫穷或疾病；对付这一些，法国人是有办法的，他们使用骗自己、逆来顺受或鼓起勇气等一切武器。但是有一种矛盾的情况使他们难以应付：社会组织本来是为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给他们主持公道而设立的，但结果往往是把他们的事情搞得更复杂，反而使他们蒙受冤屈。

公民们走到行政机关的柜台口，就象马蜂撞到玻璃上。税务局要向他们追收欠税，其实是税务局自己弄错了，却并不认账。人们拒绝给一个寡妇补助，因为找不到死者三十年以前一个顾主的踪迹。社会保险部门把要求报销药费的申请退回去，理由是没有规定的证件，其实投保人已经六个月前就把证件寄出了，而自己并没有留下副本。一份要求建筑房屋的申请始终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有一个窗户不合历史文物局的口味，而那幢房子将来是要建在离教堂大约不到五百公尺的地方，尽管从教堂那里是看不见这座房子的。但是，要了解这一点，就需要到现场去，这是官员们差不多从来不干的。

如果那么多的选民都来见他们的议员，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一个内行的人，一个魔术师，可以帮助他们看穿行政管理机构的秘密，解除对他们的威胁。每一个人都给我提供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有一条鸿沟：一方面是设想的规定，旨在保证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公共事业”和“社会援助”的好处；而另一方面是感受到的规定，在执行时，往往是冒失的，专横的，盲目的。是怎样一种困境啊！多少普通的老百姓面对着这个官僚世界，好象什么也控制不了它，而它却把大家都网罗在手续的迷宫里！有一名妇女把她的所有证件扔在我的办公桌上，哭着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还有多少人连这样的交涉也不敢办，只好算了呢！

不平等成风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原来应该纠正不平等的办法，反而使不平等加剧了。为了找到该找的机关，正确地填写表报，在文牍圈套里坚持下来，就需要有比中等教育高得多的文化水平。第一次请求遭到拒绝后，要推翻这个决定，笼络反对的人，就需要有才智，口才，甚至还要有施加恐吓的手段，以及人情关系等等。当然，情况并不都是这样；但最后，主要得到的印象是：集体组织是为那些进行统治的人效劳的，简单地说，这是因为进行统治的人更善于利用这些组织。今天再也不是有了财富就可以过舒服的生活了，而需要有本领应付复杂的经济、财政、税务和社会手续。

选民们之所以来见我，是因为他们信任专断的办法。他们宁愿接受议员的专断，因为他们可以同他打交道，但不愿意接受官员们的专断，因为官员是坐在行政机关的柜台后面拒人于千里之外。往往他们本来可以直接同主管机关的领导交涉去处理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害怕一碰钉子就无法收拾；他们知道行政管理机构是不喜欢改变主意的，因为，它是一贯正确的，而等级制度对原来的决定差不多永远都是官官相护的。去请教议员，就等于把等级制颠倒过来，就是说：由上级发出施仁政的命令，一直下达到坐在柜台后面的官员那里。起码，有人有这种天真的想法。

这种困境促使人家来敲我的门，我觉得这说明了为什么法国人对改革会有两种心情：有时是这一种，有时又是那一种；有时要什么都改，有时又要什么都不改。很少有来访的人，要求什么特定的修改，可以取得具体的成就或明确的改革的。人们不要求实行净化或建立过滤站，而是来抗议施工扬起灰尘，行人道坑坑洼洼，气锤发出噪音。人们只反对由于营造设备或者改变一个规定而造成的干扰。要不然的话，就要求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

是革命分子或保守分子，而差不多总是二者兼而有之。这就是行政机构塑造出来的法国人，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觉得可以对改革起什么作用。

要说“徬徨迷惘”，城市的人比农村的人更厉害。在市镇里，市长或市政秘书是比较容易见得着的，他们给人执笔，查档案。在城市里，特别是人口拥挤不堪的大居民区，这种依靠没有了。在陌生的环境里，人就变得越来越孤独。

空空的“大居民区”

蒙特罗及它的塞维尔“优先区”^{*}使我能见识见识大居民区的荒唐悲剧。

1957年，行政当局出于无上智慧，决定赛纳和马尔尼省的城市建设要在“三M”进行，“三M”就是莫，默伦和蒙特罗。根据巴黎的命令，蒙特罗这个安静的一万人的小城市就被勒令把人口增至三万。但谁也没有征求过任何一个蒙特罗人的意见。

1959年，“优先区”划定在塞维尔的一块高地上，当年，拿破仑骑在马上在这里指挥蒙特罗战役，这是他许多先胜后败的战役之一。堆砌工程开始了。然而，在大部分这类地区，建设显然比这里成功得多。从直升飞机上或从高层楼顶上，景致好极了，但在高层楼房里面或在长条楼房里面，就不那么妙了。

市政当局，谁也没有征询它的意见，只能眼巴巴看着，无可奈何。“优先区”，这意味着行政当局在市的范围内给自己一种绝对的治外法权。但是，慢慢地，这个运动滑出了轨道。行政当局便改变主意，放弃了“三M”计划，而采用新城市政策。莫和默伦夹在两个这种新城市中间——这两个城市是马尔尼·拉瓦勒和默伦-塞

* 优先城市规划化区建设“大居民区”的行政运动。

那尔——所以丝毫不受影响。但是，蒙特罗便粗暴地被放弃了。另外，行政当局又发现了工业向外省疏散的好处。于是，一方面继续把水泥架子排列起来，同时又顽固地不让那些应该迁离巴黎的工业安置在蒙特罗的工业区，因为赛纳和马尔尼不属于“外省”……只有在精疲力尽的斗争后，少数工业才得到破例批准。

1970年前后，事情清楚得连瞎子都看得见了：职业同住房脱节；受新住宅吸引而来的新居民在当地找不到工作。很快，在四千所住宅中，就有八百所无人居住。在1971年市选举中，温和派的市政当局本来同这个“风琴箱式收缩”毫无关系，却被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赶跑了。这次投票不是意识形态不同的结果，而是为了表示抗议。蒙特罗人发脾气了，这是理所当然！不向他们的市政当局，又去向谁发脾气呢？可是，它自始至终被行政当局撇开了，而行政当局却有恃无恐。

坏事干了，地方议员一点牵连也没有，但却遭了殃；我们的风景区被这些大白长条房子糟蹋了；我们的城市由于这些赘疣而失去平衡，人们被迫住在这些集中营式的房子里，年青人游手好闲，怀着敌意，形成犯罪集团；还没有算上那些只有十三岁的女孩子，为了五个法郎或者一包糖而出卖自己的身子。

“疯人院”

这是个老病了：1945年，各个机关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下执意推行这种城市规范化。这种思想从它宣扬集体生活的意义来说是集体主义的。科布西埃以他的威信支持这种选择。在马赛，人家把他战后的最初作品之一叫做“疯人院”。知识界大大嘲弄了马赛人，说他们不理解这个现代天才。但是常识是在马赛人一边的。人民本能地表示怀疑。可惜人家没有听从他们。

个人的房子太贵了吗？一点也不。一幢包括三、四个房间的

住宅，独门独户，位于农村的承建区内，价钱并不比在一座大楼内的住宅贵。土地缺乏吗？也不。如果法国的一千五百万个家庭都住在独门独户的房屋里，每幢都在五公亩土地的中央——民意测验证实，这是五分之四的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也不过占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一点三。可是人家把我们塞在城里。于是，在严格划定属城市规范化的地区，地价马上就上涨。

在市镇和大小合乎人情的市区，大家互相认识，这就有一种无形的社会监督，每个人都在众目之下不致受到不好的引诱。在一座大楼里，孤独的人群，缺乏自我监督。可以听到邻居浴盆放水的声音，但不知道他是谁。由于互不认识，所以互相怀着敌意。我看到过三五成群的男孩子把停在街道旁边的汽车车翼扭歪，我把他们叫住，他们回答说，“管他妈……”

有一天，我参加了同大建筑师埃密尔·埃洛的电视辩论。我支持法国人希望有个人住宅的梦想——在我的选举办事处，这种梦想屡次流露出来。“大界石”楼的创建人只是对我说，建筑天才在独门独户的房屋上是发挥不了的。我又问他，住房是为了发挥建筑师的才能呢，还是为了住户？他大言不惭地说：“应该善于使别人幸福，不管他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

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的一种不可告人的想法，象我二十年来的观察给我证实的那样：集体受到监护；个人束缚在规章文牍里；议员的正当权力被不知名的官员从中捞走。“法兰西病”就是这样在当地流行着。

然而，我所见到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幸福，而这并不是因为别人没有把幸福强加于他们……差不多谁都可以提供情况给我这本书作证，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首先想的是他们。

头顶金矿

困难在于选择。1838年，阿力克西·托克维尔请求他的朋友古斯塔夫·波蒙为他收集关于中央行政集权的事例。“我想用现在的事例去证明我是对的。如果您能够想起来，给我提供一些事例，我将十分感激。我想证明国家如何逐渐侵占了一切，从各个方面取代了个人，进行统治，制订法规，使所有事物和个人一律化。目前，我还没有足够的材料^①。”

十五年以后，还是那个托克维尔，把自己的担忧告诉还是那个波蒙。他得到的事例太多了：“我好象一个寻找黄金的人，而整个金矿掉在我脑门上。我给笔记的重荷压瘪了，再也不晓得怎样从那里把我的宝藏拿出来^②。”

哪怕收集材料的人雄心比较小，也会遇到这种麻烦。要是你根据假设和你自己的经验找到了密码本，来解释现实，那么一切事实对你来说就成为一个信号。在十八年的政治生涯中，我所处理过的每一个案子，都可作为研究案情的材料，进行深入诊断“法兰西病”。在这个时期，各式各样的许多要求，扰乱着法国的这一块地方。许多其他地方也都是如此，每一个要求都使我们能够对法国社会，对它的紧张关系，对它的精力消耗，以及线路故障，进行光谱分析。

这些冲突，其中一些给我这本书的各章节提供了简洁的说明。但是，在这一大堆事例里，我想从从容容地谈两个事例。请读者宽恕我不作任何删节，因为正是那些细节，刻画出社会把戏的演员，权力的底细，隐蔽的反应，思想习惯等。经过了许多世纪的宏观俯瞰，我愿意提供一个微观的境界，就好象戏剧的幕间插曲一样。前面我们刚看过法兰西病的以往病历，后面是我们要列举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病和思想病的临床症状。

技术专家贾纳斯*的两副脸

这是两个悲剧，除了受害人以外是谁也不知道的。一个是骇人听闻的社会丑剧——矿工的待遇，最苦的矿工却得不到。一个是骇人听闻的技术丑剧——在二十世纪末建造一条罗马时代的引水渠。两场斗争，一场在八年时间里，一场在十七年时间里不断出现意外和反复，而从来未能冲破漠不关心的壁垒。公众一点也不知道这些荒唐的情况，不知道七百名矿工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也不知道一条毫无用处的引水渠竟耗费国家大量的钱，足以用来建筑五百公里的高速公路。

这事已经够令人深思了。在一个超中央集权的制度里，一群人如果受到损害，他们所引起的反应，不是以他们所受到损害的严重程度来衡量的，而是以他们能够对首都施加多大压力来衡量的。几百名孤立的工人，二十几个农业区，是无力去发动舆论的。官僚体制的社会对小老百姓向来是冷酷无情，而它本应是要保护老百姓的。

关于这两个悲喜剧，我可以看到所有的角色，从基层工人一直到总统。我也在那里扮演我的角色，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的权力在那里是多么不中用啊。

总之，每一个例子都揭露了技术专家贾纳斯的一张脸。在头一个例子里，行政当局拒绝做常识要求它做的事；而在另一个例子里，却做了常识所谴责的事。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拖沓不前；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象压路机一样向前开动，把它所碰到的一切都压得粉碎。

这两种相反的态度，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太常见了。它说明了，

* 贾纳斯，古代传奇人物，是拉蒂昂国王，能知过去未来，因而被画成一个双面人。——译注

为什么在我们事业的管理上，处处落后和发生差错。

“法国不需要高速公路”

是一个疲沓的官僚机构吗？例如，这个行政部门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从1945年到1970年，拒绝建造高速公路，同一个世纪以前路易-菲利普时代对待铁路一样^③，采取完全相同的态度（很可能是不自觉的，因为人们不大讲历史课）。

1950年代，愈来愈多开汽车的人感觉到惊奇：一越过了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边界，他们就可以在这些更安全和快速的道路上驾驶，为什么在法国就不行呢？

战后，我第一次到美国去，对于那里收费的高速公路建造得这样快，感到吃惊。这些公路的主角是私人公司。它们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没有比这个更有利可图的事业了。各个州只是加以监督而已。联邦政府只在最初的时候参与此事，为的是推动和裁决路线。它自己不动手，而是让别人去干。

我回到法国后，便设法争取我的一个朋友支持我这个新发现，他在公共工程部长办公室工作，任财政督察员。他对我说：“这样一个制度在法国是永远建立不起来的。桥梁公路建筑部门不会放弃建筑公路的垄断权，财政部也永远不会让一些自主的资金筹集起来，而不受它的控制。在我们国家里，高速公路只能靠公家的钱去建造，但公家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就别想我们会会有很多高速公路。”事实上，人们对西部若干公里的高速公路已感满足，这是战前修筑的，当时德国已拥有八千多公里了。

很久以后，1963年有一天，公共工程部长马克·雅克在举行部长会议时坐在我的旁边，在一次烦人的传达报告时，把一个1951年发出的文件递给我。这是公路局长的一个通知，内容是要证明高速公路对于那些不幸缺少公路的国家，象德国、美国等，是

个好办法，但是对于象法国那样幸运地有着很多公路的国家是不合适的：我们拥有很多公路，以首都为中心，星罗棋布，公路两旁种着树，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就这样规划了，我们的桥梁和公路部门有着几百年历史，一直修建和改进公路，难道全世界不是都在羡慕吗？另外，一个数学数字证明，要是交通繁忙，只需加宽现有公路的路面和修建岔道就可以解决了。那个时期的公共工程部长，亲手在这个通知的页头作了这样的批示：“你是对的，法国不需要高速公路。”签这个字的人，下一年便成名了*。

马奇诺防线

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行政管理机构却向前猛冲，表现得十分自信。在它发挥这种盲目的能动性的例子中，后果最严重的无疑是马奇诺防线了。

在我房间的墙上，我在1939年钉上了一张法国地图。我用三色小旗和毛线，根据报纸的报道，描出马奇诺防线这个防御蛮敌的水泥堡垒来。我梦想着德国的不断进攻将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三层厚的防线上碰得粉碎。然而，有一点使我焦躁不安：从瑞士边界起，这条三色的篱笆笔直地向北伸往阿尔萨斯，然后向西，沿德国边界，接着沿卢森堡边界偏过去。但是它在比利时一角的隆古昂便停了下来。接着就只有—些边界虚线了。它的间隔在我看来就象—道—道打开的大门。要是德国人从比利时通过呢？1914年，难道他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为甚么不把马奇诺防线—直延长到海边呢？

我把我的忧虑告诉了父亲，他直截了当地打断我的战略噩梦说：“你应该知道，参谋部用不着等你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并且作

* 需要象阿尔宾·夏朗东那样无视行政当局所设置的禁区，才最后使法国从1970年开始，有一个真正的公路规划。

出了答案。”

继之而来的事情——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证实参谋部并没有看到一个顽童一眼就看穿的问题。马奇诺防线是技术上的壮举，在战略上却是荒唐的，可是，什么也阻止不了制造这个昂贵而又不合适的、没有用的杰作。

是杰作吗？当然！四百五十公里的地下公路和铁路，能够抗得住最厉害的炮弹的钢铁和水泥，机房输送着电力和调节空气。成千上万吨的粮食和弹药埋藏在这些地下室里。清洁的食堂，浴室，电影院，图书馆，保证这个巨大的地下城的娱乐活动^④。

昂贵吗？当然！五年里花费了四十二个亿^⑤。按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家预算的比例计算，比我们的核武器花钱还多^⑥。

不合适吗？这条防线是根据防御性战略建立的，同我们的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对捷克和波兰所承担的义务相矛盾，因为这个政策和这些义务要求进攻性的战略。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常有的通病。

无用吗？唉！三十个师被拖住在这里，毫无作用，与此同时，德军撇开这条守卫得很好的防线，从阿登尼这个旁门进入法国。

怎样弄到这种地步的呢？这是因为让军事技术专家自由行动的缘故。当议员还在讨论经费的时候，工程就已经开展得热火朝天了。有人当时表示过怀疑，提出要有坦克和空军。陆军部长班乐卫回答他们的时候，使用了权威的论据*：“我向你们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所依靠的论据是最复杂不过的……最杰出的专家们有时有意见分歧，但是，无论如何，在若干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只能表示同意……在我向财政委员会提出的计划上，要开始建造三个经过特别研究的堡垒。技术人员——我再说一遍

* 1928年11月28日。

——是同意这个计划的。我要求议会不再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己见，给予政府所需的经费。政府肯定将有效地把经费用在有用的地方^⑦。”

这样，就在议会制度里，政权表现得很天真，居然承认自己无能制订一种学说，解决国家命脉攸关的问题。它只好拜服技术人员的权威，为他们取得一致意见而高兴，满足于批准他们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决定却已经付诸实施了。班乐卫的继任人安德烈·马奇诺更清楚地供认说：“边界委员会，或者作战高级会议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有一个好处，就是居然有了个计划^⑧。”这样一种论据在法国是经常遇到的。各机关只作出一个计划，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政权一级机关只好采纳。

而这个唯一的计划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一个长时期的官僚体制的胎育，通过专家们之间的妥协，通过从委员会到委员会的推磨游戏而产生的^⑨。

军队要有个计划，要有办法。参谋部机构提出了水泥工事防线。这是个图省事的办法。就象从行政管理机构来的许多主意一样。这个主意，就其本身而论，并不笨：它并没有阻止人们去防守阿登尼峡谷，也没有阻止建立装甲师团，也没有阻止加以得当地使用……而且，在细节上，是设计得很好的。但是，后来却成为荒唐的，因为这个主意具有排他性质，而排他性在全盘决定上是常有的。实际上，采取这些决定的机构是为了准备一些枝节上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事情好象是，行政管理机构把全部精力都消耗在单独一项事业上：就象为了完成任务，只需要有一项宏伟的事业，让行政部门从中欣赏自己的宏伟形象，就可以了。

因为自从马奇诺防线定为军事政策的金科玉律以来，法国就撇开了全面性的决定，不再从全局出发去对待这一成就。新任陆军部长莫林将军竟然在1935年初这样回答保罗·雷诺强调装甲

部队的要求,他说:“谁能相信,我们花费了几十亿修建了一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还会不死守而进攻呢?我们难道发了疯吗,竟然要走出这条防线去冒什么无名之险吗^⑩?”而事实上这种疯癫症却闹得越来越凶了。

当行政当局的制动器扳动的时候,怎能在轨道上把它推动呢?当车出轨的时候,又怎么能够煞车呢?因为这些相反的事例每天都有,使我们想起,克里蒙梭的话说出了一个多么颠扑不破的真理:“战争是一件太严肃的事情,不能把它交给军人去办。”人们可以把这句似乎开玩笑的话应用在许多专业上和用在许多专家身上。但是,抓总的人又在哪里呢?全面的观点又在哪里呢?

自封为王的国家

无论是死死顶住那些必要的革新,或者一个劲地猛冲,作出毫无理性的决定,官僚体制总不失其本色。可以从以下两件事,看清这一点。

还用得着指出吗?我对我们任何行政机构,对我们的任何官员,都没有特别的指责。还用得着指出吗?在这个制度里,他们不过是零件,不大可能不那么作。而且他们也是尽力而为的。我要批评的不是人,而是我所描写的那个体制。

这个体制在二十世纪末,同凯撒的典型象得出奇。这个典型是罗马军团,接着是罗马帝国出色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凯撒主义不再体现于凯撒身上,它成为集体的了。昨天一个国王把自己当做国家,今天,国家把自己当做国王。

第二十四章 煤灰子

他们是灰色的，长满茧的手是灰色的，原来蓝色的工作服也是灰色的。甚至他们的脸也是灰色的。就象他们在劳动的坑道尽头丧失了他们的肤色，或者是从大地的内脏挖出来的胶泥把他们染成了灰色。

我认识他们是在第一次参加竞选的时候，这是1958年4月在布莱-塞-赛纳区。在我举行集会的咖啡馆里，他们三三两两坐在一桌，默不作声，眼睛凝视着，面前放着一杯白葡萄酒。他们甚至连牌也不打。闯进来的人，扰乱了他们的安静，引起了人们怀疑的目光和敌对的态度。女招待员说：“不要理他们，这是些挖胶泥的。”

这是……？在奥姆-塞-伍尔齐，埃维利，夏梅松，索瓦西-布伊，同样的哑剧又再重演：同样苍白消瘦的人，两肘支在桌上，面对一杯酒，听而不闻，穿着他们灰色的衣服。

劳保大夫对我解释说，这些胶泥矿工衰老得很快，粘土灰尘染灰了他们的皮肤和衣服，飞入他们的肺部。许多人得了矽肺；过了五十岁，他们就呼吸困难。由于潮湿，他们患了顽固的风湿病。特别是，他们的生活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没有希望在当地找到另外的工作：农业机械化后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要比工业能够招收的要多。离开家乡需要极大的毅力。只有退休了才得到解放。然而，他们要到六十五岁才能退休，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成了什么模样了呢？

在 矿 下

我一当选议员，人家就在1958年的12月让我穿上工作服和套靴，戴着白头盔，提着矿灯去参观粘土矿。有十多个企业共同开采这个矿场*。陶土开采和加工共雇用七百名采泥工。他们下到井底，离地面数十公尺，上下井使用一部简陋的吊车，把粘土升上地面也是用这些吊车。为了到劳动的地方去，他们得弯着腰，通过几公里长用坑木支起来的坑道，跨过支柱、坑洼和水坑。路程这样远，因此必须连续工作。到了工作面后，矿工就得在那里呆八小时，除了中间吃一顿饭外，没有歇息时间。另外，经常实行“三班制”。一个电铲重约二十公斤，你得伸长胳膊举起来，挖掘粘土块。

在潮湿的空气里，工人光着膀子，汗如雨下。挖泥工把粘土铲下来，装在“矿车”上。用坑木支住坑道，汽锤声震耳欲聋，在地道里发出回声。只有最老的和最弱的人有时在露天工作；加工工作就是他们开采工作后所得到的休息。

事故并不少：一列载满粘土的斗车在一条倾斜的坑道上失去控制，撞倒工人，出了轨；甲烷气漏出来，引起窒息；瓦斯爆炸；坑木突然下陷。有时有个水泡溢出水来，象瀑布般涌入坑道。

恶 运 当 头

在访问北方和洛林矿区后，我感觉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矛盾。在法国的所有矿工中，只有挖泥工仍同《芽月》**一书中所描写的一样悲惨。从左拉的时代以来，煤矿和铁矿的劳动幸而改善了一些。坑道加宽了；坑木用金属架代替了；开采工作差不多完全自动化。

* 矿区伸延三十多公里，直到维尔诺克斯-拉格郎德，奥伯省的省界。粘土是用来制造耐火材料和陶器的。

** 左拉描写矿工生活的名著。——译注

但在粘土矿中,劳动并没有改变。从六十年代初起,有些煤矿工人因矿场关闭而改到粘土矿工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坚持数周以上的,都觉得那里的工作条件太差了。

更糟糕的是,从煤矿转到粘土矿工作后,他们就丧失原有的优待。从1945年起,矿工由于这种优待得到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五十岁即可退休。由于这一规定不适用于粘土矿,挖泥工怎能不把这种歧视看做冤屈呢?

然而,矿工待遇却早已慷慨地扩大到矿场的行政工作人员,在矿区的总部,无论是杜埃、梅勒巴,或圣铁蒂恩,编辑人员,染红指甲的女秘书,都享有“煤黑子”的待遇,但是没有“煤灰子”的份。

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变得迟钝了,大多数人连“抗议”都没有想过,宿命思想把他们压垮了,只有七百人,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他们的煤矿同行共有十八万人,集中在一个国营企业里,本来有能力动摇国家的根基,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挖泥工的唯一工会——总工会——只限于要求把退休年龄降低到六十岁。这种照例的要求,本身就象泄了气似的。唉,挖泥工并不碍事啊!每年,他们的代表都来见我,领头的是工会书记梅蒂尔·亨尼伯特,他有差不多五十年工龄了。他们写信给有关的部长建议他们自己来矿里看看:“我们深信,这样一次访问就会让你们看到,我们要求把退休年龄从六十五岁提前到六十岁是有充分根据的①。”

结果什么也没有。第二年,新的请求,新的信件,又都放到以前信件的发黄了的档案堆去。

从面对面到肩并肩

最老的老板,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这种状况。1958年,我惊讶地发现老板们从来没有同工人代表见过面,一起商谈这

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他们来打头阵呢？至于工会方面，就怕面对面的商谈会吃大亏：老板们的利益是同工人的利益势不两立的，商谈起来数他们能说善道。

一开始，就需要把他们都召集到会议桌旁。这做到了，但不是没有困难的。一年一年过去了，新的老板比他们的前辈较为关心社会问题，他们接管这些企业，选了一个年青的领导人罗伯特·舍瓦利埃，人很聪明，也还开朗。此外，他们感觉到愈来愈难招收新工人。如果挖泥工人的退休年龄提前的话，劳动力可以稳定下来，招工可以比较顺利。他们表示，如果我们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准备把养老保险金的资方份额增加。

在十二年内，即从1959年到1970年，我在工人的要求和资方的同意下，一再进行交涉，争取让挖泥工得到矿工的待遇，如果得不到全部的话，起码得到主要部分，即退休办法。但是枉费力气。

于是，我就缠住那些部长，无论他们是管社会保险事业的^②，或管工业的^③。我用不着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说服了。老板也好，大夫也好，他们都承认，一个挖泥工，过了五十岁或五十二岁，就不可能下井工作了，而过了六十岁，连在地面上工作也不行了。然而，退休金是按最后十年工作的平均工资计算的，正好是挖泥工工作能力最差，挣钱最少的时期。因此，挖泥工付出双重的代价：当场付出的是他们的健康，后来付出的是他们的退休金。部长们认为工人的要求是正当的，并答应让我积极处理这个问题。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要有的话，就是一封吞吞吐吐的信，千篇一律。

没有个人出路

不，人家不能答应我的要求。粘土开采业不属“矿业”范畴，而归“采石场”一类。劳动条件同问题毫无关系。我的矿工不是矿

工。矿业高级会议是根据开采出来的实物归类的。如果开采的实物经济价值高，象煤炭、石油、天然气，它就称为可以租让的，开采的权利不再属于土地的主人，而由行政管理部门自主地租让给某一个企业，这样你就有一个矿场。如果开采出来的实物的经济价值够不上这个特别的待遇——例如粘土，又如石灰石，水泥石和石膏石等——业主仍然是地下资源的主人，企业就得向他收买开采权，这样，你就有一个“采石场”。

因此，矿场，不象你可能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地下坑道，这是人们在那里开采政府认为经济所必需的产品的地方。例如矾土是在露天开探的，却列为租让矿场的产品；而粘土是在地下开采的，却被视为在“采石场”开采的。“就是这样，没有一点办法可以加以改变。”

同行政管理部门的保守主义相呼应的是议员的保守主义。对于土地主来说，如果把挖泥工同矿工等同起来，也就是说把粘土列入可租让的物资内，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这样一项法律是不会得到国民议会通过的，更不会得到参议会通过。这条防线守得很牢。

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责备，提出个别解决的办法。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挖泥工的命运，但是可以改善一个挖泥工的命运，让他能够享受提早在六十到六十五岁之间退休的待遇，只需有医生证明，说他不适合劳动就行了。

这种前途在挖泥工那里完全得不到欢迎。这种退休金不能同有报酬的劳动同时兼而有之。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它自己的逻辑认为，既然健康受到损害以致于“过早衰老”，那就必须停止一切活动。有得就有失嘛。挖泥工则认为，他们不适合继续在矿场劳动，但可以从事花园或花圃劳动。既然其他矿工到了五十岁，教师、铁路工人、电工到了五十五岁——更不用说军人了——可以退休，而同时从事一种有报酬的活动，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让他们讲话以后，我体会到还有更糟糕的一点：被认为“不适合劳动”就好象受到一种侮辱*。通过个人鉴定被宣布为不适合劳动，而自己的伙伴们却继续工作，他们就会失去自尊心。他们要求享有提前退休的权利，但是要大家都一样，不然就什么也不要**。

保 密 恶 习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我要求社会保险的一个总督察员来进行调查。可是部里反对。话是这么说的：“我很愿意让你的要求得到实现。这样向你提要求的人就可以知道，我主管的部门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害怕这样会使人们对以后采取的决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些决定可以肯定说是不同意他们的要求⑤。”

既然没有办法解决，那就用不着去视察了，以免使人误解，以为事情有希望了……到最后，我终于争取到派人来视察，不过有一个条件，即必须秘密进行。后来，视察确是秘密的，连对我都保密。从1965年到1968年，社会保险部门的一个总督察员几次到当地去。虽然我是政府中的一员，可是我从来没有搞到一份视察报告，连一份摘要都没有。比国家机密还厉害，这是行政部门的机密，政府不能过问。

人家又指给我一条明路。这又是一条死胡同。社会保险法规定一些办法，照顾一些人，但必须是“工作特别艰苦，足以造成机体过早衰老的”，工作时间至少二十年⑥。显然，这正是当前的情况。但是，还要有一个委员会“列一张艰苦工作”的表⑦。经过了几年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八种职业，其中包括“坑道矿工⑧”在内。但是

* 所使用的字眼会产生什么心理作用，行政管理部门是不管的，就这样，治安员成为警察，租赋成为捐税，参军成为义务兵役。

** 劳动部长利用人们不情愿的心情做文章，来缩小问题的意义：“我觉得很奇怪，挖泥工人行使这种权利的人数比我预期的要少。”④

财政部坚决反对通过这个单子，认为这是降低退休年龄的一个危险的先例^⑨。

委员会眼看工作一筹莫展，便再也没有开过会；社会保险法的这一条款，以后也没有得到实施。然而，明确艰苦工作的定义，本来可以结束这种最触目惊心的冤情。同机关的想法相反，我相信，这个办法不会引起大家一到六十岁就赶忙退休，而可以缓和这种要求，因为，大家都知道，普遍实行这办法不过是笼络人心罢了，但是，如果困难的情况都得不到解决，那就必须实行这办法了。

总理无能为力

如果说各个部都在原地转圈子的话，那么，总理是否可以停止这个把戏呢？米歇尔·德勃莱接见了。当时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正在鲁斯举行，后来达成了埃维昂协议。我觉得惭愧，总理这样忙，我还占他的时间。我们的谈话，使我痛切地感到他和我自己都无能为力。本来有空余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官员不愿干，政治上的负责人愿意这样做却没有空余时间。

后来有一次，我同新总理蓬皮杜泛泛谈论时，抓住机会告诉他这个情况，说明法国行政机构作梗的一个典型事件。他象平常一样，迅速、准确地判断说：“要是财政部反对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就没有多大希望实现，如果财政部和管技术的部同时反对的话，那就毫无希望了。除非是事情具有这样的政治意义，它需要总理或总统作出决定。不幸得很，这件事情不是这种情况。唉！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避免动感情”

我又去打扰米歇尔·博卡诺夫斯基*。他对我证实了乔治·

* 当时任工业部长。

蓬皮杜的诊断。

“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行政管理部门反对改变挖泥工的待遇。你要得到成功，唯一希望就是亲自说服掌握这个问题的那个官员，使他成为你的盟友，想法让他改变立场。”

我遇到一位科技大学毕业生，他目光锐利，讲话准确，有严密的辩证思想。我对他说：

“你来看看粘土矿场吧，你对那种不公正的情况，一定要感动的。”

他以坚定而有礼貌的态度回答我说：

“一个行政负责人应该避免动感情。如果我们给卷了进去，那么整个体制就都跟着进去了：住房、暖气、照明免费，以及提高工龄补助，不仅给现在工作的工人，也给退休的工人，甚至要给他们的寡妇。这样，就免不了使他们的顾主破产。为了工人们本身的利益，我们应该加以反对。”

——挖泥工人工会宣称愿意当着你的面，同顾主联合会签订议定书，保证不要求这种规定以外的其他待遇。

他下结论说：

“——你避免不了工种差不多的工人马上提出相同的要求。现有六万名工人在采石场工作，而产品却够不上向国家领取租让开采权。

——你所提到的那些工人，差不多全部都是在露天工作的*，只有少数采石场**是在地下开采的；但是，挖掘是用炸药进行的。这些材料的结构可以容许挖凿宽阔的坑道；大卡车可以直接开到工作面上。我们可以把改革局限在地下的工人，他们是在架设的坑道里工作的。这错不了。”

* 采沙场，砂砾场，采石场。

** 石膏，水泥石，石灰石和重土。

那位官员摇头说：

“肯定会有一个工会或一个议员出来要求把粘土矿工的待遇扩大到其他的采石场去。

——你对你自己难道就那么缺乏信心吗？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可以推托二十年之久，而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你就不能拒绝吗？况且还没有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来。

——我们这个部门丝毫没有反对粘土工人的意思。我们之所以没有接受这个要求，是因为我们确实办不到。”

他翻阅他的档案，用拉丁文说：“我们不能够。”

“你提出的要求，早在1946年，工业生产部长就已向我们提出过。我们没有答应。国民议会共产党议会党团1947年提出了一个差不多的议案^⑩，并且几次卷土重来。从1959年以来，你的交涉遇到同样的命运。”“你看”，他微笑着又说，“我们并不歧视任何人。”

官僚机构和共产党一样：要么全部，要么全不

战后，矿工待遇的规定得到通过，共产党议员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粘土工人，即不仅在退休问题上，而且在所有其他的优待上，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是巧妙的。如果事情弄僵了，共产党就可以理直气壮谴责国家、资方和多数派，如果事情得到部分解决，它又可以表功和提出更高的要求来。

跟我谈话的人，对于我给他指出在这种要求和我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差别，无动于衷，他说：“我们不能推翻矿务法，矿务高级会议每一次都表示不赞成^⑪。”

我想，这就是最有力的理由了。矿务高级会议在矿务人员心目中，就象罗马议会在天主教会心目中一样。既然它在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始终拒绝改革，这时同意改革就等于撕毁矿务法，其神圣不可侵犯就象贾斯廷法典和拿破仑法典一样。这就会推翻等级制

一贯正确的不成文原则。

这个高级官员同来自各方面的急躁、冲动的人，哗众取宠的人比较起来，显然体现了公共权力的严峻、伟大。他所尊重的是国家，同时，他要别人尊重他的集体立场，毫不妥协。

“戴高乐什么也办得到”

我接触到国家的铁石心肠，打动不了它。粘土工们想到去接触国家的首脑。梅蒂尔·亨尼伯特和他的同伴们要求我安排他们同戴高乐将军会晤，他当时在普罗文访问。

我设法打消他们的这个主意，总统怎能有时间去管他们的事呢？他们摇摇头。一种着了迷的信念鼓舞着他们：“哦，要是他愿意的话，他是什么也办得到的。”

1965年6月17日，这是个伟大的日子，我邀请一个粘土工代表团到市政府来。将军很用心听他们讲话，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问题，答应处理这件事。这件事情给他印象很深，因为吃午饭的时候，他向我谈起，他不能想象，就在到科龙比路上，在地下数十公尺深的地方，矿工们竟然跪在坑道的泥浆里劳动。

几个月过去了。梅蒂尔·亨尼伯特来向我表示他的失望：“他不可能把我们扔下不管。从1940年以来，我一直信任戴高乐。”我劝他写信给戴高乐，提醒他这件事^⑫，并且我自己也向他的办公厅进行交涉。

在巴黎，官僚机构的日常运动开始了。戴高乐要去处理国家大事，不得不把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办。于是，总统府询问部长们，部长们询问各级机关。然后反过来，慢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反对意见传送到爱丽舍宫。答复终于作出来了：不可能。

粘土工对国家元首的神力抱有多大的希望，他们就会感到多大的失望^⑬。至于我自己，身在政府之内，从头到尾体验了一番，

我在国家里是多么无能为力！

只有闹个乱子才行

1968年6月，我再度成为议员，我又试探有没有可能在议会里采取行动。我提出了一个法案^⑭，得到社会事务委员会一致通过，这是个虔诚的姿态；可是法案的主动权是捏在政府手心里的。要使我的议案能够列入议程，就得有政府帮忙，对于这个问题，政府显然是不愿使劲的，于是我又回到原地踏步。

我开始问自己，是不是要来它一次危机才能把这个档案重新翻出来呢？必需使这个问题突然变得很紧急就象马上需要解决似的。但是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并不算紧急，怎样把它变成紧急的呢？无疑地，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引起那么多的荒唐行为：暴动，把臭鱼、烂梨倒在马路上，行凶，自焚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官僚机构面前，一个易冲动的人怎能不想到使用炸药呢？无论如何，我得找到一种炸药，比较……文明的。

很幸运，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地位给我提供了小小的方便。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一套是在任何议会制度之下，都在政府和议会之间通行的。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

1970年11月，国民教育部长奥利维埃·吉夏要求我的委员会给予方便，通过一个法案，使一次会考生效。在此之前，行政法院刚刚以手续不全为理由宣布那次会考无效^⑮。议会应通过事后表决弥补行政上的过错：难道能要求我帮这个忙而拒绝我为粘土工提出的要求吗？

我便通知米歇·若贝尔*，要求代价。

他对我说：“我们很同情你的这种尝试。”

* 当时是爱丽舍宫秘书长。

他没有告诉我“我们”是谁，我也无需知道这个。我只要得到保证，“府里”不反对就行。然后我通知雅克·德洛。*

“我们是处在被封锁的社会里。如果你愿意1969年9月16日那值得纪念的演说不成为空话，你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敲诈我们吗？

——为什么把这个叫做敲诈呢？如果我是工会活动家，你会说是协作的。我们谈判就是了。我保证使会考生效的议案能够通过，如果你答应我让粘土工退休的话。但是要是情况相反，我也向你保证，结果也会相反的。

扣留人质

奥利维埃·吉夏外出旅行，他的国务秘书皮埃尔·比勒柯克要在国民议会上为会考生效案辩护。我向他表示抱歉，我要把他留做人质。这是不“妥当”的，但是我只好不妥当了。一会儿后，雅克·德洛又打电话给我，他说：

“我研究了那个档案，觉得很好。我们设法说服总理。但是你不要把矿工退休和会考生效‘扯在一起’。”

——这是我唯一的谈判手段了。当然在公开会议上，我不提这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西蒙·诺拉**掌管这件事，他以后打电话给你。”

我守在电话机旁边。危机来了。在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停留不动的时间突然加快了速度。不久，西蒙·诺拉打电话给我：

“总理刚刚表示，他同意了。当然，我们的协约只是在你让会考生效议案通过后才有效。

——一言为定。

* 他是沙邦-戴尔马总理管社会问题的委员。

** 总理沙邦-戴尔马身边负责经济事务的。

——这会起麻烦的。但是总理为你提出的论据所感动，根据你的说法，这件事情是被封锁的社会的典型事例。我马上打电话给希拉克*，由他代表政府。”

虽然我还不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梅蒂尔·亨尼伯特和他的矿工，不敢告诉罗伯特·舍瓦利埃和他的老板们。我请他们作为旁听参与这个决定粘土工人命运的辩论。

“我从政治道义上谴责……”

1970年12月9日，会议在晚间举行。在四柱大厅，财政部国务秘书希拉克向我冲过来，说：

“我接受你的议案，因为总理给我下了命令。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你的行为是完全违反我的国家道义感的。”

——难道你的国家道义感就是在行政部门做错事的时候你肯定它，而在议会做对了的时候你却去反对它吗？如果议员都要把自己同政府混同起来，而政府又同它的行政管理部门混同起来，那么，要我们有什么用处呢？

——我从政治道义上谴责的就是这种作法，一个多数派议员，竟然从政府里扣留一个人质，而这个人质又同事情毫无关系。这种海盗式的作风在我们多数派的成员之间是不能接受的，况且大家都是属于一个组织的。

——应该有胆量闹一些小乱子，以免大爆炸。这个危机，我们能够控制得住。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出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由衷憎恶，对等级制度的由衷尊重，希拉克坚持严厉批判我的行为。不仅是他一个人，在以后好几个星期，我得悉许多高级官员认为我的行为十分唐突，怎么能够允许

* 财政部国务秘书。

粘土工人靠了一次失效的考试而搞到了退休呢？

另外，雅克·希拉克十分漂亮地把戏演到底。他修饰了我的议案，主动地加上相应的费用开支，只有政府才有这种力量*。我在委员会议席上讲了几句话，对他表示感谢。他也讲了几句话赞扬我的社会道义感和政府的社会道义感。

议案获得举手一致通过，只需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时是清晨一点了。我到旁听席上去找那些观看辩论的寥寥几个观众：粘土矿的工人和老板，他们都是乘坐老板的车一起来的。我把他们带到小卖部去。梅蒂尔·亨尼伯特有点哽咽地说：

“我为这事斗争了二十五年，但一转眼就解决了！而且没有一个人反对！”

他在这种矛盾的情况面前目瞪口呆：为什么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做不到的事情，在几秒钟内却变得那么容易呢？那些障碍和那些反对的人到哪里去了呢？他反复地说，眼睛望着他那杯啤酒：

“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

他的同伴和他要求到六十岁退休，人们却答应让他们五十岁退休！他们从来不敢这样想过，连做梦也不敢。

在以后几个星期，普罗文沉浸于欢乐之中。粘土工变成矿工了。他们举行庆祝^⑩。亨尼伯特和舍瓦利埃发表了演说。矿区最老的粘土工——他十一岁就下矿了——被推举出来把象征着矿工的礼品赠送给我——这是一盏大·维·矿·灯。他站在亨尼伯特旁边，弯着身子，显得很胆怯，不知道说什么和做什么才好。他们两人象征着一个世纪的劳苦。他们用他们的姆指使劲拭着眼泪。

没有能够参加庆祝的粘土工人给我写信：“我在这里要向你表示深深的感谢，这是出自我心灵的最深处的，比我一向在那里劳动

* “矿业社会保险关于老年、残废和死亡（生还者补助金）等规定的受惠者，包括主要从事开采或加工耐火和制陶粘土矿的工人，这些矿藏是在支架坑道中开采的。”

的矿井还要深得多^⑰。”或者是：“这一仗要比拿破仑打胜奥斯特利齐还要光荣得多，而在那一仗中肯定流了大量的血^⑱。”……

共产党等级制重新掌握了事态

亨尼伯特写了一封信给我，并且在他的同伴中让五百人签了名，尽管大家上班的时间不同，矿场又很分散。他把信拿到邮局的窗口。但是我始终没有收到这封信。

收件员进行了调查。据说，亨尼伯特在邮局窗户前面，当着几个见证人谈到了这信件的内容，这个文件耗了他多大力气啊！以后，信就失踪了。调查很快就结束了，有这种必要吗？当亨尼伯特收集签名的时候，他受到了猛烈攻击，人们抨击他是“黄色分子”。

总工会的矿工工会把事情掌握起来。有一天，全国范围的一个负责人到了普罗文，强迫亨尼伯特辞职：他犯了“阶级合作”罪，所以由一个纪律性更强的同志代替他。

尽管这种帮派算账是可悲的，但他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战胜了社会仇恨，战胜了乌托邦，从而使我们得以战胜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既然他在工会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可失了，我就设法让他得到了功勋勋章。这太过分了！他的同伴们不来参加授勋典礼。他遭到大家疏远。这是工会的新领导对大家的指示，只好遵守。

工会不久就可以轻而易举改变矿工的情绪。因为在议会的短短阵雨后，行政太阳又恢复它独一无二的威力，使得包着这个问题的外壳变得更硬了。

……行政等级制也一样

如果我的武器是法律，那么行政部门的武器就是行政法令和通令。它以熟练的技巧去加以运用。在法律通过六个月后，我发

现还没有开始制订执行的法令。我又一再进行疲劳轰炸式的交涉。人家有礼貌地请我参加起草工作。可是法令还是出不来。一年到头了^⑱，我找到了沙邦-戴尔马。

“关于增加工资问题，拖延一年并不很严重，因为一次补发就解决了。但是关于退休年龄，要是拖延一年的话，这对原来有可能享受退休的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

沙邦发火了。他发脾气产生了作用。四十天以后，法令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出来了^⑳。

但是还要再等六个月，执行的决定才在政府公报上出现。没有执行的决定，法令就无法实施^㉑。

罗伯特·布林*对我说：“你应该觉得幸运了。十八个月，这是破纪录的时间。经常需要四五年，还不算那些永远出不来的条文。”

法律、法令、决定都解决了，通令的斗争又开始了。行政部门找到了两个新要求，就把原案推翻了^㉒。

这些要求把法律的实施范围局限于矿下工作的人，他们必须只有在矿下工作，过去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㉓。可是，有些粘土工，特别是最老的那些，是轮流在地面和矿下工作的。这样，在还是那一个企业内，只要改变岗位，就会引起社会保险制度的改变。另外，争论的问题只牵涉一小部分人，还不到全体人员百分之十，这就显得更微不足道了。后来全靠埃德加·富尔^㉔**个人的意志，才得以消除这个障碍。事情已经过了一年^㉕。

矿工最好就此罢休

行政当局并不就此认输。它们又设置另一层封锁。在新规定

* 当时任卫生和社会保险部长。

** 当时的卫生和社会保险部长。

通过以前工作的矿工，他们的老年退休金遭到削减*。这样，六十岁以上的粘土工人所得到的退休金比他们按照社会保险一般规定本来可以得到的还要少。他们长年来为改革而斗争，而人家把他们逼得不如此罢手。

我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按矿工待遇发给的退休金，不应低于按一般待遇发给的退休金。但是，又一次常识同“原则”相抵触。财政部^{②7}，工业发展部^{②8}，社会保险部^{②9}，异口同声地拒绝这一要求。

我只好再去要求总理个人裁决。皮埃尔·梅斯梅尔作了公平的决定。

然而，从通过法案后算起，两年多又过去了。热情转变为怨恨。大多数矿工觉得，还是那些人——“他们”——用一只手假装拿东西给人家，而设法用另一只手把东西拿回去。感谢信变成指责信。再也没有什么人偷偷地把这些信拿走了。

“是谁签署法令呢？是谁下命令呢？这当然是部长先生们了。在我看来，如果说行政上拖延时间的话，这是因为您的缘故，部长先生^{③0}。”

审查文件要有一个委员会，但只是到了1973年6月，委员会才在纸上成立起来。最早提出的要求，要到1974年才能处理掉。根据新规定，退休办法要到1976年**才开始实行。也就是说开始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已经三十年，我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已经十八年，议会通过这项法律也已经六年了。

与此同时，矿工工会却采取一种激进的反对态度：“矿工退休

* 理由是他们以前向社会保险部门交付的一般保险费，要低于他们原来要付给矿务社会保险部门的新规定的保险费。^{②6}

** 还要算上——奇怪的是，情况不总是这样，但往往如此——需要十八个月或两年的时间，开始退休的矿工的退休金证件才得到办理。在这期间，他不再领到社会保险的一般退休金；如果没有这项改革，他本来可以马上得到这种退休金的。

办法并不解决一切问题。矿工的全部待遇是根本要求，这个要求现在还没有得到满足。除了退休办法外，应给予粘土工人，地面工作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以矿工同等的待遇：如住房、取暖免费、医药费百分之百报销、工资照付的额外假期等^②。”

工会的新办事处不承认前办事处所承担的义务，即：除了退休办法外，不要求矿工所享有的其他好处。不守信义和行政上的拖沓方便了工会的战略，并使一项职业上的要求转变为社会冲突。

一段悲哀的故事

1973年选举后，普罗文的一个老板对我冷笑着说：

“我早就给你说过：挖泥工人不投你的票。你辛辛苦苦，完全白搭。”

我们在灵魂里难道是那么不民主，以致猜想，凡是为大家办事都是为了在选举中捞到好处吗？给几百个人减轻痛苦是不是没有好处呢？

在这一长长的故事里，老板，工人，议员，政治家，官员，部长，政府首脑和国家首脑——所有人都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表现出自己的性格，所有人，从基层到顶峰，都落在这个制度里，就象落在粘鸟胶上一样。多数派的任何一个议员、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长，都无法发动一项改革——而实际上却是那么简单。

这不是任何人的过失。所有人都处在不利的地位上，无法触动这把锈住了的锁，要不就是站得太低，够不上这把锁，要不就是太高了，没有时间弯下身子来……多少精力浪费了！多少怨恨积累起来！

这是一段悲哀的故事，就象一对夫妇离婚，各人都有理。

第二十五章 地下水里起风波

既成事实

1967年5月里一个星期天，塞纳河边一个小村子的村长跑来找我。这人一向和蔼可亲，这一天却神气里有点儿不痛快。他说：“您知不知道，‘他们’给我们来了怎么样的一手？”

我在那时节，正当着教育部长，在多少教工人员、学生、家长眼里，我就是那个“他们”。可是在村长眼里，我却是本地区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议员，有本事保护村长，不让“他们”欺侮。他把帽子捏在手里转：“他们要把我们那里划成什么待建区！”他叫喊一声，仿佛放出了一句见不得人的话。

他递给我一封信。塞纳-马尔纳省省长在信里通知他，政府下了命令，在塞纳河和约纳河沿岸划出一个“待建区”，下面有很丰富的地下水*。接着，又是来访，又是电话，没多久，我就听说有四个区，二十二个市、镇、村长一起收到同样一封冷酷无情的公函，通知他们说，公家已经采取了决定。这个决定把他们所属的乡镇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而且在事前，无论是国会议员，省议员，或者是市、镇、村长，一概都没有接洽磋商。这个计划名叫“蒙德罗上游塞纳河和约纳河引水区兴建计划”，简称“蒙德罗计划”，纯粹是在机关科室里酝酿成熟的。这时候，连“小心！”都没喊一声，就动手付诸实施。

* 所谓“待建区”的规定，真够得上称做雷厉风行。有关地段都实行冻结，免得有人投机，谁也不准再进行买卖、交换、继承、合并、投资，哪怕是搭一个棚子，排排水，掘口井，安排灌溉，不管什么，一概不准。

大封君

这个计划自从 1959 年就开始考虑。1962 年由三个公司着手制定。^①1966 年，“塞纳-诺曼第流域金融公司”把这件事揽了过去，任务是防止巴黎地区的水源污染。这家公司财力十分雄厚。它的预算*并不取自国家补助，而是直接向市镇乡村和工厂企业抽税。这样一来，国会就管它不着，无从提出讨论^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什么局呀，混合经济公司呀，什么国营企业呀，象雨后春笋，纷纷出现，而咱们谈的这家公司恰好是这些大封君的出色典范。这些大封君是国家的卫星，往往脱离国家的控制，自己走自己的轨道。它们能够担任国家传统机关所不能担任的新任务，因为传统的行政机关没法摆脱公共会计制度的层层约束。

上面讲的这个计划旨在开发一片“天然清流”的地下水，离塞纳河和约纳河**的河床不远，每天可以供给巴黎居民饮水六十万立方米。那家公司争取到该地区省长公署和中央装备部同意它拟订的计划。“待建区”的命令一经颁布，战斗就打响了，地方上的各种力量都动员起来，成年累月进行斗争。

风波起

采取简单的安全措施，保证巴黎居民用水***，岂不是极有道理的事情吗？任何略有理性的人怎能起来反对如此正当有理的计划呢？我尽力想让市、镇、村长们心平气和一些，当下对他们说：

“要当村镇的好公民，首先要当一个够格的法国人。咱们可别

* 1977 年度经费为四亿七千九百万法郎。

** 在蒙德罗上游长达三十公里的地段上，有两条缓慢的地下水流，地面两条河的流速较大。

*** 为了省事起见，我把巴黎市区和郊区的居民，一律叫做巴黎居民。

象那么一批人，他们在上一个世纪不肯让人造铁路。当然，国家必定得公公平平地赔偿损失。这事，我会照顾到的。”

话虽如此，这档子事里头确实有点搞不清楚的地方。为什么要搞一个“待建区”？其所以想出这个主意，无非是要“掌握城市规划，在农业地产价格引起投机活动以前，抢先下手。”^③可是引水工程必然会给这些地产带来许多约束，谁又会对这些地产进行投机呢？这种地产只会跌价，决不会涨价。干吗要划一万二千公顷，等于说三十公里长四公里宽这么大一块地方？为了将来开井用的地皮，划那么几百公顷就足够了，干吗搬起岩石来砸苍蝇呢？

这么宏大、不切实际地划“待建区”，其中大概有什么策略上的考虑：只要让这个“待建区”搞得天怒人怨，遭了殃的人只要能逃脱这场大灾难，那末引水工程相形之下便好似小巫见大巫了。行政当局摆脱了实际的牵制，地位便大大加强，便可以随心所欲了。

问题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没有牵制的力量，对抗的力量就来啦。没几天，哪怕是最沉着的乡绅们也采取了敌对态度，不久又从敌对变为仇恨。他们一开口便嚷嚷要驾起拖拉机，把高速公路堵死。他们要带领冲锋队，手持钢叉，占领省长公署。他们要把挂着的猎枪取下来。他们显然要采取这么样一种作风：拖住我吧，不然，我就要闯祸了。我们确也想方设法拖住他们，结果还好，祸并没有闯成。

当然还有一条法律的门路可以走一走。地下引水计划不属城市兴建规划，为了前者去成立“待建区”，显然是违法的。塞纳-马尔纳省议会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护法协会，向行政法院提出控诉。

规避讨论，确是高招

主管这项工程计划的高级官员们，对于这场官司有点皮里阳

秋。省议会吵吵闹闹吗？本来是把戏里的节目。要是当年的马扎林执政，他就会说：“让他们去唱那曲子好了。”至于那护法协会奔走呼号也很自然，本来就是为了要闹才成立的嘛。

不过，气氛越来越愤愤不平。省长保罗·德鲁佛列接受了我的建议，召开一次吹风会议。他来到普罗文，后面跟着一长队小卧车，卧车里走出十来位省长和司局长。市镇村长，农会代表和同业公会的代表们，倒并没有让这一番威风凛凛的派头所吓倒。会议厅里很有些象山呼海啸。

德鲁佛列沉着应付。这位方面大员跟普通官员差不多，都不缺乏勇气。他们都不怕面对面谈判^④。他们心里想，不触动私人利益就没法为公共利益出力效劳。他们早已胸有成竹。听众们既然都是在为自己辩护，当然就难免缺乏诚意，这些人的高明意见能有什么听头呢？谁同意发言，谁就同意谈判。而公共利益是不容谈判的*。尽管这样，德鲁佛列毕竟还是充分发挥了他说服别人的才能。他答应去研究解决办法，减轻“待建区”引起的种种不便。

政府机关居然如愿以偿，把“待建区”变成众矢之的。事实上这东西本来就没有必要。就象比剑的人腾挪躲闪，把原来双方的位置对换一个个儿。结果，只要取消“待建区”，所有受害的村镇便甘心情愿同意引水工程在他们的地产上兴建。而政府机关呢，一俟工程开始，便可以考虑撤销“待建区”。

巴黎地区的新省长莫利斯·杜伯莱一面答应减轻约束，一面催促动工，认为“工程早就应该开始”。他在1968年年底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组里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地方议员，旨在排难解纷。他

* 这就是法国的高级官员对于自己使命的一般看法。他们不同意把国家的权威拿出来讨论，因为这样只能损害和削弱国威。我在别处却往往看见，比方说在美国吧，相反的情况：每逢采取行动以前，跟对方进行磋商被认做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良好的接触，交际办得很好，谈判往往就没有必要。

宣布决定把“待建区”的一万二千公顷压缩到六千五百公顷。1969年11月又减为一千公顷。这样一来，行政上等于自己承认，过去白白地给“待建区”多划了一万一千公顷。赔偿吗，分文无着！

无声的苦恼

“待建区”成立之快，撤销之慢，真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直到如今，撤销令始终还没有送到公证人那里。地产依然冻结：出售，分割，继承，抵押养老金，任何法律行为都没法在公证人那里登记。1972年有一天，一位老年的农民跑来找我，他说：

“我打算退休，想把地产出让，弄到了养老金再走。交涉都已经办妥，手续全都办好，天知道这些手续有多么麻烦！好啦！‘待建区’来啦！整整五年啦，什么也甭想办。公证人不肯登记。”

他从头絮说他的苦恼，忽然抽噎起来，大颗泪珠悄悄地滚下来。

其实，在1970年，行政法院已经撤销了成立“待建区”的命令，可是机关里根本没把法院的判决当一回事儿*。个人必需服从法院的判决，不服从便由武力强制执行。可是公家却不一样，公家决不会对自己使用武力。所以行政法院的判决书不过是自欺欺人。

行政机关的专横作风令人愤慨，而对于引水工程的进行则逆来顺受，这就是代议人员的精神状态。11月6日，莫利斯·杜伯莱在巴黎主持的工作组会议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状态。省公署和塞纳-诺曼第事务局的高级官员，以及巴黎市区的代议人员，都一致责备塞纳-马尔纳的代议人员，把地方利益摆在民族的紧急利益之上：六百万法国人遭受着缺水的威胁。面对着这样的联合阵线，我方只好撤退并决定同意引水工程，唯一条件是确实证明引水确

* 诸位说不定认为，命令一撤销便不再生效，不用再由行政机关打什么报告。这样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事还得由行政机关行文通知撤销，公证人那里才有交待。

有用处。

事实是，1970年春天，我们收到一宗册页浩繁的文件，声称决无任何办法可以代替蒙德罗计划，地下水费用不贵，跟在巴黎城郊处理的地面水比较起来，相差无几，而落实蒙德罗计划不会影响农业。为了顾全面子，塞纳-马尔纳的省议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那份文件的论据。我当选为报告员。

委员会成员九名，反映了省议会的不同成分*。我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从来不影响工作，我们的意见始终一致，一直到作出结论。每逢把具体任务交给当地的代议士，大家都会感到意外，因为各种意识形态上的交锋马上销声匿迹，而平时一碰到抽象的选择，老会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的调查从1970年6月一直进行到9月，查看现场，研究那些沉睡在档案库里的文件，听取市镇村长、“待建区”受害的农民、采沙场老板的意见，等候地质学家、水文学家以及卫生学家的鉴定。前后三个月，我们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

在这以前，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引水计划会在技术上并不是必要的，在经济上根本行不通。难道不是国家最大的机关拍胸脯担保的吗？可是，我们发现，没有一项研究设计是进行到底的；没有一个负责人肯花我们委员会所花时间的十分之一，去认真地设想和讨论一下。政府各有关机关假如没有欺骗我们，至少也欺骗了他们自己，因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自己毒化自己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机关人员就是这种情况的受害者。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些文献材料，无非为了保护居民，免受剥削。结果却发现，有人竟那么样不自觉地准备浪费公款。我们把案情看得越透，越觉得自己不仅在理性上而且是在感情上受到了打击。突如其来的打击是

* 省议会的成分，从共产党到独立民族中心党。

十分沉重的。

这水或那水,巴黎龙头水

整个计划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假设上面的:河水经过工厂处理,不算好水,必需渗些泉水。可这个假设是错误的。谁都在电视里见过,肖齐勒鲁瓦过滤厂开幕典礼*,省长举起一杯过滤水,不慌不忙地品尝一番,然后咂着嘴唇,对准电视镜头说:“这水其味无穷,简直是艾维安的矿泉水。”这个电视节目大大触动了受威胁地区的居民。“离巴黎十公里的塞纳河水,既然可以提出艾维安的矿泉水来,这是省长说的,那末何苦远离一百公里跑来抢我们的水,糟蹋我们的乡村呢?”村镇长,省议员,见了我就引省长的话,这是省长说的,仿佛是什么至理名言,无可辩驳。

我去参观了几处类似的厂子^⑤。你以为处理河水是用去污水来消毒吗?非也,用的是强大的机器进行过滤。工厂不过把自然界几星期的过滤活动缩短为几小时。污染了的河水从一头进厂,通过重重过滤器,过滤器一黑,马上洗净,放过净水,即清若山泉。

最后才在清水里施用消毒剂^⑥。其实泉水也要这么处理,如果要经过长距离管道运输的话。运输前后,各进行一次化学消毒^⑦。

这样一来,天然净水也就不是天然洁净,而是经过处理,有了一点药味。

洁净指无菌而言^⑧,河水也罢,泉水也罢,都要处理。如果洁净是指没有化学药剂,那末,处理过的河水也罢,直运巴黎的泉水也罢,都是不洁净的^⑨。

巴黎喝水的人并感觉不出有什么差别。

* 过滤厂每天能处理水八十万立方米,随后达到一百二十万立方米,独个儿就等于“蒙德罗计划”的一倍。

我们这才明白别人对我们隐瞒了的东西：即两种方式的争执。一种原始方式，让水在地下天然净化，然后进行人工的长距离运输；一种是现代方式，河水自流，流到消费地点附近，进行人工净化。在世界各地都是后者取代前者。只有附近的泉水不够了，才到远处去找*。

净 水 不 净

我们原来相信蒙德罗的泉水是“天然洁净”的。可是我们的第二次发现告诉我们，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蒙德罗和勃雷地区的地下水有两个来源。其一经过很厚的石灰层长年净化，其净可比山泉。另一股水则在石灰层上面的沙石里通过，是道道地地的河水。不管在什么季节，引到的水，经过石灰层过滤的“天然净水”只占百分之十强，百分之九十是沙滤水，就是说河水^⑩。

实际上，两股水都渗和在一起：石灰层在地下十公尺左右，顶部有缝，石灰净水一抽走，上面的沙子水便从裂缝里渗下去。任何官方文件也没有指出这一现象。是我们研究了机密文件，询问了机密文件的作者，才发现了问题**。

我们只好再回去向事务局的领导人说：

“蒙德罗的天然净水是个神话。为什么偏要远去一百公里，历尽千辛万苦，去找脏水，再去处理，而偏不肯用巴黎城外的塞纳河水？”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

* 世界上一般大城市用水，都远非附近地下水所能供足，今天基本上都靠处理河水。

** 早在1964年，塞纳省长指定五位专家（阿勃拉尔，阿尚博，古隆医生，维贝尔，瓦尔）写报告，其中明白宣称：“在任何季节，引出的水里总渗有少量的石灰层过滤水，而大量的水都是渗透冲积层和石灰层隙缝的塞纳和约纳两条河的河水。在枯水期，情况更加明显。引到的水差不多就是塞纳和约纳两条河的河水。”

一百升水里掺一升泉水

“蒙德罗计划”预定这股子地下水每天供应水六十万立方米，占巴黎市区六百万立方米用水的百分之十^⑪。

可是我们又有了第三次发现，这个水里还有从别处来的水。巴黎市区有这么一条规矩，泉水、河水到了蓄水池和管道里都混在一起，比例则随市区而异。有时候，泉水比较多，大部分时间河水比较多。用水人却一无所知。

蒙德罗水里，“天然净水”本来只占百分之十。巴黎用水里蒙德罗水又占百分之十，所谓的净水结果只占百分之一。我们完全沉溺于子虚乌有之邦。

二百五十升用水里饮水才占半升

我们的第四次发现是，巴黎市民用水虽多，绝大部分却不是饮用。每人平均每天用水二百五十升，饮用的顶多只有一升半。真正配叫饮用的，装在杯子里喝的水，还得减为半升，等于百分之零点二*。

其余是卫生用水和家庭用水，没有理由要用泉水。

巴黎市民十人中有九人喝瓶装矿泉水。所以饮用水问题差不多全部由矿泉水解决^⑫。从1950年到1976年，每年消费的瓶装矿泉水，由五十万升增加到三十五亿升。巴黎地区的需求率最高。

可是官方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有一位官员不动声色地说：“矿泉水？不知道。”尽管如此，蒙德罗计划，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改变不了巴黎市民对于自来水的评价。

有一天，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们说：“自来水里去污水的味儿

* 每人平均每天有一升水做汤，做菜，做热饮，渗酒喝，原来的水味吃不出来了。这样来用矿泉水，只算是多余的。

越重，大家就越放心。”其实，大家越不放心，因为氯只管杀菌，可是破坏了水的天然纯净，没有受到人污染的天然纯净。瓶装泉水却既无细菌又无污染。人家大可不必再把矿水说成奢侈品了*。它和大自然一样是生活必需品。

公众完全不靠行政机关作出决定，自己找到了出路。问题自然而然解决。官方为什么不肯认账呢？是私人的主动性把公家比了下去，所以不乐意吗？很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由于没有能力从事改革，因为既没有能力听，也没有能力看。市场经济要服从消费者的意愿，并且要发现这种意愿，表达这种意愿。市场经济靠交换来解决问题，交换就是互利。而官僚制度则想用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⑬。

煤灰子的事虽然凄惨，地下水的事却比较有趣。把我们证实的那些事复述一遍，竟有点象古尔德林写的滑稽小说。分配给巴黎市民的五十万升水，四十五万升是分配给喝矿泉水的人的，只有五万升分给只喝自来水的人，其中饮水只占一百升，而一百升里面只有十升是从蒙德罗引来的，其中天然洁净的水只有一升。但是经过化学处理，并且跟旁的水渗和在一起，也就不再是什么天然净水了。

计划的用心值得赞扬，让巴黎的居民能喝上清泉水。不过，蒙德罗的天然净水能充这个用途的，在五十万升里只占一升。在化学上叫做微痕。

然而，丑闻还不止于此。

设计事故

审计院进行调查，发现巴黎正在跑水。水的供应增加百分之

* 不该把矿泉水和鱼子酱、鹅肝酱混为一谈。名牌矿水每升零点八法郎。大瓶一法郎二十。普通瓶装值零点四法郎。最低工资每小时十法郎，一瓶矿水只值两秒半钟的劳动。

二十，水表上记录下来消费量却只增加百分之五，管道陈旧，跑水越来越厉害^⑭。

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到了1963年只好修补管道，调整压力。这下子，在三年里，每年供水量减少了三分之一^⑮。可是，改善供水系统的机关没跟设计机关联系。在1962年已经为1975年采取了紧急的设备规划，而经过了调整，巴黎市已经可以大量超额供水，直到1990年不会有问题。然而规划改善设备并没有中止，当然啰，公家是不兴反悔的。

这就是审计院证明的情况，但是审计院的报告又有谁去看呢？被痛骂的行政管理部门为自己的部长拟了一份为自己辩解的说帖。部长只有时间签个名，可没有时间拜读，因此，部属科室的所作所为完全无瑕可击。有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酸溜溜的文章。一位议会议员书面提出了质问。可是大家漠不关心，一切沉沦海底。

要说内行吧，机关科室当然是内行，可是他们有他们的内行法，偏偏就要出这样的乱子。他们彼此隔离，采取决定时，视界狭隘，有些因素没算进去，特别是心理因素，或者是经济因素。他们作风僵硬，不考虑事态的演变，哪怕是根本性的演变。他们让表面上的负责人担负作出决定的责任，可是负责人又哪有时间来考察案件的理由是否充分呢。

一位代议士当然远不如技术权威那样内行，可是只要他责任心强，反而不大会出这等漏子。因为他的看法从公开讨论中产生出来，比较全面，尽管还不够精确。

定案的威信

我们把发现的事实通知了各方，可是制订计划的人一次也没有试图反驳。他们完全可以打一场没完没了的专家仗……可是，区

区几名地方代议士配吗，值得跟这些人打一仗吗？我们的主管范围本应该限于要求一些慷慨的赔偿，现在这样干法超出了职权。我们的对手很叫人想起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一幅漫画：卡洛纳在乡绅会议上问那些画成了火鸡的乡绅们说：“你们想拌上些什么汁儿拿给人吃？”乡绅们回答说：“我们根本不想拿给人吃。”卡洛纳说：“那你们就超出了问题的范围。”

订计划主要负责人之一，有一天当着我的面说：“我要叫村镇长们双膝下跪。”问题的范畴属于力量对比。

在诉诸力量时，莫利斯·杜伯莱却善于显得和气迎人。他对我们说：“专家嘛，总得相信他们，不然，让他们干什么呢？我的专家们替我定了这个计划，我因此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好计划。”他说完哈哈一笑，十分迷人。部分听众也受到了感染。真是一位干练的人！他多么擅于缓和气氛啊！

我们回答说，调查了三个月，没碰到一位专家对我们的论据提出反驳，反而有不少人支持我们*。这样引权威为论据的庸俗作法，似乎一度使官方阵脚发生动摇，大省长默不作声，直到他的一位部下转身把一个文件指给他看。大家瞧着大省长脸上焕发 的光彩。他高声朗诵公共卫生高等理事会定下的原则：“天然净水应当优先用来让人饮用；因此，必需严格保护地下水，防止质量上和数量上发生任何降格。”他为了结束这一场讨论，接着说：“公共卫生的最高权威既然作出了规定，我认为蒙德罗计划已经具备定案的威信。”

在以后几个月里，动不动援引卫生高等理事会的学说，简直成了仪节，开会时是如此，在书信往来中也是如此。定案的威信嘛……

* 专家姓名和报告摘要，见附件和注解。

我们请教了卫生高等理事会的几位理事。他们都回答说：“如果就地选择地下水或地面水，那当然是地下水好。如果在消费地点附近设厂净化河水，与远道运输地下水，在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总之，落实一项原则，要看两种办法的地点和成本。不过，财政上也罢，经济上也罢，成本问题能引起公家的兴趣吗？

拉维莱德屠宰场

恰恰正好，我们的调查最后发现了蒙德罗计划出奇地缩小了工程的估价单。

最初的文件连提都不提。我们要求审查数字。答复是引水工程要花三亿五千万法郎，而工厂处理同样数量的河水，只花二亿四千万，但是，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价格的大小。百分之五十强可不小啦，而所谓差别，据我们发现，原来是虚假的。更深一步考察还会发现，蒙德罗的泉水跟巴黎近郊滤水厂过滤的水比较起来，不是什么贵一半，而是至少贵五倍，甚至贵十倍*。

有一天，罗伯·麦克·纳马拉很有风趣地对我说：机关企业想兴建什么的时候提出的估价单，必需乘一个 π 数才行。这一条规律是很容易检验的。兴建比埃拉德，制造协和超音速飞机，修建拉维莱德屠宰场，都比估价超过三倍，弄得舆论哗然**。这类的估计错误经常发生，不过一般都没人发现罢了。

* 工厂用的是 1970 年的价格；引水工程用的是 1962 年的价格。工厂兴修一个蓄水池，其效益至少等于蒙德罗的引水渠道。在引水工程的估价单上，根本没算上还水的费用。而且赔偿农户的损失只算了五百万法郎。

** 举例的性质并不一样。建制比埃拉德和协和式机，事属创举，本来没法知道到底该花多少钱。可是兴建屠宰场和蒙德罗引水工程，却是无以自解的。前两项创举在技术上实现了决定性的进步，增加经费本来是合乎情理的，而后两项工程在技术上全属一般。

行政部门吃了我们的批评，便提出一项新的估价单，把造价改为八亿法郎。这样的设计仍然富有印象派色彩。我们只得再去向专家请教。据估计 1970 年需要二十到三十亿法郎*。要看赔偿损失到底需要多少。反正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克扣赔偿，等于剥削四个乡区，要么合理赔偿，支出就更加浩繁。

所以，从低估计，造价要超过屠宰场两倍，从高估计可达三倍。折衷估计则等于原子武器的年度预算。本来原子武器的费用，时常有人在说，给法国添了沉重的负担。不然就等于打通莱茵河与罗纳河工程经费的一半以上。这笔经费拿来造高速公路，可以造五百公里；拿来造现代化医院，可以造六十座；拿来造公寓，可以造三万五千所；拿来增添新的职业，可以让五万人就业^⑭。

一项毫无用处的工程计划，代价竟达到这样骇人听闻的程度。

贪污的幽灵

这还不过是财政上的成本问题。至于引水工程给人添的麻烦，让人该赚的钱赚不成，经济成本，档案里面是根本不理睬的。

对土壤来说，一家农户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试验。在一块沙地上，他把地下水抽出，灌进塞纳河，离那儿四公里的地下水位，一下子下降一公尺。有一位农业总工程师，在我们的请求下，研究了引水计划对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⑮。他证实了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几十个水泵全部开动就会减弱土壤的湿度，地面上就得为白杨、为玉米浇水。地下抽多少水，地面就得浇灌多少**。受害的村社只好重新掘井，改修水渠。至于山坡上的村落，下山取水不再解

* 详细的计算载在 1970 年 9 月 28 日和 1976 年 1 月 30 日塞纳-马尔纳省议会专门委员会报告。到了 1976 年，最低估计超过三十亿法郎。

** 按原量还水的设备和人员，全都没有预计进去。巴黎市水政局在富尔齐地方有一个把塞纳河水归还地下水的渠道系统。单单这个地方的管理维修人员就有一百，水量却只有蒙德罗引水工程的十分之一。

决问题，谁也保证不了原来的水源依旧存在。当地的生物生态平衡都会给引水工程打乱。每逢人们要搞乱大自然，总免不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结果闹个无法收拾^⑮。

我们这个委员会有一次开会，我提出问题：归根结蒂，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搞这么一个完全看不出道理来的引水计划。我们的一位同事说：“你真天真，没有道理，当然就有旁的原因：油水嘛！搞个计划，估价那末高，还值不得承包企业作出点小牺牲吗？”说这话的是一位国家工程师，刚刚退休。

会议桌旁，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人人都汇报一些外边听到的话。我说，没有真凭实据，我绝对不相信有什么贪污。我说这话的时候还不免有点激动。当然，谁都不会提什么证据。可是听着人家窃窃私语，说什么：“几十亿几十亿的钱，决不会谁都捞不到一点儿的。”听着叫人生气。国家的技术干部，在无人出面的机关科室里，独断独行，引起一些不可容忍的含沙射影，实在不太健康。造谣诽谤大概不过是硬说技术单位别有用心。镜头里的形象吗？在技术上显神通吗？私人财团为自己的利益参加了工程设计吗？为了收回设计费用而继续施加压力吗？不管怎么样，只有公开讨论再作决定，才能免除恶意诽谤。

行政当局寸步不让

批评的话说了不少，也得提一些建议。有必要区分两种需要。

首先，烹饪、家务、卫生用水每天二百五十公升。自来水应该清澈无菌。巴黎市区周围的过滤厂满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不用花那末多的钱，可以供应到 2000 年^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选择了这个办法^⑰。

其次，必需供应可口的天然净水饮用，而蒙德罗计划却没顾到这一层。我们早就注意到，巴黎市民特别喜欢喝处女泉水。巴黎

地下泉水十分丰富，只要加以合理使用就行^②。哪一位巴黎市民没有瞧见过拉马丁广场的自流井旁，本区居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甚至有人带着瓶瓶罐罐，老远的开了汽车前来取水？为什么不就近装瓶，供应清泉水呢？至于矿泉水，医疗水，那就由国家去搞名牌货好了^③。只要国家管理，保证质量，那末把普通的地下水贴上泉水的标签也没什么*。国家可以豁免这类出品的税收而减低售价^④。这样，人们就能喝很便宜的瓶头水。公家也尽到了责任，事情让人去干，国家则加以管理。然而，公家却宁可颠而倒之：自己搞了又不加管理……

我们的委员会在1970年夏天进行调查。9月28日，塞纳-马尔纳省议会组织讨论，参加的人有流域事务局的官员们和大省长。这些人死抓住一些原则，象什么天书教条似的再三念诵，尽管我们调查的结果已经证明这些原则立不住脚。省议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我们作出的结论。

简直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流域事务局几乎感到没有什么必要公布一本白皮书。对我们的报告只字未提。对我们的论据根本不作答复。官僚主义的眼神儿是直愣愣的。罗马的官僚机构只知道罗马的引水渡槽。

两千年前，拉丁人远引泉水，用的是当时的先进技术。那是完全说得通的。饮水比重很大，因为当时还不会在城市附近过滤河水。十九世纪时，情况并未真正大改。家庭和卫生用水跟饮水比起来，占的比重并不很大，地面水的净化还不理想。古法还有理由存在。

到了二十世纪，喝自来水的人越来越少，讲究人都喝瓶头水。地面水的净化技术有了决定性的进步，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需要。

* 公家管理泉水装瓶，有时候并不解决问题。好些消费者协会和报纸都有根有据地揭发了泉水污染的事实。有的因为引水防护不周，有的因为装瓶条件不良。

传统方式在全世界都不再应用了。为什么法国行政当局偏偏非死抓住不放呢？

我到总理府去找沙邦—戴尔马总理碰碰运气。他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档子事，可是依然狠狠心装得十分关怀，等我谈了几句，他用哀求的口吻对我说：“给我一份书面的东西罢。”口气里不免有一点点不耐烦。书面的东西在总理手里只能呆几秒钟，在办公厅主任手里也呆不了多久便到技术顾问手里。技术顾问和制订计划的人是同行……公文顺着等级下达完了又上呈。谁能指望公家拆自己的墙脚呢？不知要碰上什么样的奇迹这条应声虫才会发表一条不同的见解呢。奇迹当然没有出现，这条应声虫依然重复我耳熟能详的老论据。

在以后的两年里，凡是多少有点关系的部长们，我都跟他们打过交道，可全是白费心机*。官僚机构象蜘蛛一样把他们困在网里。人人都答应帮忙，可都是白费气力。而行政机关却若无其事地走他们的棋子，用政权对付公法**。

完全出于偶然，我又去总统府试试。接洽的人是米歇尔·若贝尔。他的思想敏锐，马上就讲通了。可是，行政管理部门却不承认有什么偶然性。过了两个月，同样的答复又到了我的手里。

而且，这些徒劳无功的尝试反过来对我不利。因为一封封公文对我作了否定的答复，而公文是具有各级政府机关权威的。科室的决定就是大官的决定，怀疑一个默默无闻的科室的决定，等于怀疑总统，怀疑共和国本身。部长和本机关是唇齿相关的，总理和部长是唇齿相关的，总统和总理是唇齿相关的。牵一发则动全身。

* 由我来责怪部长们无能为力，很不合适。因为我已经讲过，我自己也担任过几任部长，类似的情况我经历过不少。

** 行政当局到蒙德罗下游的村镇里去做一番公益调查，同时却又维持着所谓的待建区，而待建区已经法院判为违法。

科室的举措跟铁板一块的等级政权溶为一体。

申诉无路的民主

可以向政府申诉嘛，我在政府里有的尽是知交。可是，归根结蒂，政府也不得不为了顾全威信而低头。政府机关难道能让权威和错误和平共处吗？

省议会尽管可以调查，发现，证明，却没人把它当真，因为它没有权力。国民议会是会被人认真看待的，因为有人怕它，可是，需要它过问的事情太低级，为此而动用不信任案未免有点用牛刀杀鸡，所以议会对地方案件总是容忍一些，不肯破釜沉舟。议会议员自己是地方上选举出来的，纠缠进去不得了。只好到议会发言台上去提提抗议。

行政机构象一堵花岗石的墙，光滑得没有人能用手把它抓住。发动新闻战吗？多数党跟政府是一体，不允许“给反对党授之以柄”。

国家元首乃是各级行政机关的最高保证，假如他肯亲自出马，会不会有回天之力呢？

1972年秋天，我有机会向蓬皮杜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坚持要我率领保卫共和民主联盟，投入立法选举。我们两人在一起吃罢了饭，我扼要地叙述了这个案子，并且告诉他说，我已经束手无策。总统坐在椭圆形的大理石桌子前静静地听着。他生着病，脸面浮肿，我们都非常担心，但是他的注意力和分析能力依然十分敏锐。他并不问什么细节，只显得有点吃惊，怎么会提出了合理的论据而在各级行政机关哪儿却没人听取呢？他点一枝雪茄烟，把我带往现代化的小客厅，里面摆着浅色的麂皮大沙发。他说：

“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吗？”

——我很想办。

——这事将影响你重新当选，对吗？

他态度现实，不受词藻的束缚。我迟疑一下，这个案子的成败关系不会太大，一百个选民里面也许会有一个为此而改投他的票。不过，话得说回来，人民如果要影响政府作出的决定，除了靠选举还能靠什么呢？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要对总统施加一些压力。

——是有关系，我说。

——我们想办法给你解决。你去找布札德，就说是我叫你去找他的。我马上就通知他。

这件事，任何合情合理的道理全不管用，时间花了七十个月，在短短几天里就办妥了，可办法是完全不合理的。酒席筵前一席话，一下子改变战斗的阵容。本来，大家不断的用威信要紧这条理由来对付我。这种荒谬的逻辑只有用更加荒谬的逻辑来打破它。我提出了自己的威信问题，碰巧符合国家元首的想法：“我敢肯定，这是发疯。”“我想办法让他们罢手。”

皇帝的本事

最最无关政治的问题，难道就非用“政治”来解决不可吗？行政机关遵从的规章制度十分精细，目的在于限制君主的权力，而现在呢，只有君主才能限制行政机关的盲目性。

罗伯特·布札德编了一出说得过去的戏，答应了我的请求。他预备全部取消“待建区”，推翻“为2000年着想”的计划，把惊动四乡的约束一概取消。不过，他得考虑怎么样给有关部门保全面子。我一向认为有本事的部长能掌握科室，只有没本事的部长倒过来受科室约束。这时候才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样简单。有作为的部长自己定下基本目标，然后掌握达到目的的手段，决不能让属下机关跟自己作对。在部长与部属之间经常有一本账：一面是负债，一面是资产。如果部长不给部属任何好处，部属就会让部长

垮台。因为机关是不动的，而部长只不过是过路人。

罗伯特·布札德经过千辛万苦才搞起一个环境部；谨慎从事当然是聪明的做法。我们的协议便是在这种基础上达成的。这出戏的演员们统统都到齐了。1972年11月15日，我们被引进一间金碧辉煌的大厅，从前是皇上的家具间。开头，事情照计划进行。代表团让我发言，对面是罗伯特·布札德。他表现得十分随和，有一种魅力。高级官员围绕在他左右。

忽然之间，一切似乎重新成了问题。是不是我犯了错误，没有完全忠于剧本呢？我指出引水计划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说不通的。一位在场的高级官员受了侮辱，一跃而起。他声色俱厉地指出，在技术上，只有他的机关具有权威。工程的成本多少，蒙德罗的地下水是否十分之九来自塞纳河，地方代议士都管不着。他们只能讲讲当地居民受到的损失。

巴索歇·莱·布雷的市长是区里市、镇、村长协会的主席，他气得脸红脖子粗，说道：

“我呀，我没上过名牌大学，可我懂得什么是井，什么是地下水。我知道，只要我的农场一抽水，附近的井就会干枯。”

那位高级官员用同样的口气答道，公家要的水不是沙水，而是在更深的地方，隔开在石灰岩下面的水。那位市长站了起来，伸着手指说：

“你不知道石灰岩的顶层有裂缝吗？上面的沙水跟底下的石灰水是隔不开的吗？这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到过我们那儿。请你到我们那儿来看看，然后，你再说话。”

霎那之间，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公家方面，可以让步，不能认错。代议士方面，觉得年轻先生们在文件堆里办事情，实在叫人忍无可忍。一出火辣辣的心理剧把疮疤的盖子都给揭了。

罗伯特·布札德非常高明地让大家平静下来。地下水并不怎

样急需，工程可以停止进行他要求大省长放弃“待建区”^{*}，不过也得考虑二十一世纪嘛。过了两小时，大家松了一口气，一一告退。实施引水计划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地下水侥幸地保全了下来。

机关科室在优势压力之下，秩序井然地撤退了。“待建区”虽然已经判为非法，但是弄得整整四个乡区瘫痪了六年，一直等到这时候才算撤销^{**}。没人再提引水工程了。四个乡区重见了太平岁月。

比鲁士式的胜利^{***}

我本该多加提防。有人告诉我说，罗伯特·布札德决定停止计划的时候，流域事务局的一位领导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场比鲁士式的胜利。”在机关科室看起来，任何纠纷都是消耗战。机关科室则是天长地久，永恒的。可是，造化小儿忽然淘起气来，在1974年，让我当了三个月的环境部长。我连想都没有想到把推迟到2000年的文件叫做档案。居然在1975年年底，有人传说，第七号计划要管1976年到1980年，内中列有引水工程的落实。

这就不难看出，引水计划表面上打了三年瞌睡，实际上却跟地下暗流一样在地下进行。

流域事务局吸取了八年纠纷的教训，对敌方力量进行分化。它让采沙场老板们懂得，不反对引水计划，会给他们带来一切好

* 行政法院差不多在三年前已经判决予以撤销。

** 行政机关强迫业主们申明愿意出让地产，同时出具一张地籍证书，证明地产已经不归“待建区”，一切费用由业主自理。这样一来，公家不仅把私人地产白白地、非法地划归“待建区”整整六年之久，使私人遭受严重的损失，而且强迫他们证明自己并未受到损失。

*** 比鲁士王于公元前279年苦战击败罗马，告诉人说：“再胜这么一次，我就完了。”言其得不偿失。——译注

处。只要他们表示谅解，有人就会慷慨地发给他们开发证书。他们马上就明白了。对农庄主也是这样，事务局拍胸担当了他们的要求。引水工程会抽干地下水影响他们的农业活动吗？没关系，由事务局花钱兴建灌溉网，引塞纳河水灌溉。

不过，计划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合理一些，而只有更加不合理。这样一来，就更加增添了费用。当初他们本来不需要花这笔费用的。当然啰，人们仍然有权批判荒唐无稽的事情，不过更加难以取信于人罢了。省议会重新把专门委员会组织起来，重新进行调查，把新的情况列入结论。有关机关却并没有因此而当一回事。1976年夏季的空前旱灾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论据，证明“恢复蒙德罗计划是十万火急的需要”。

然而，巴黎市民尽管没有蒙德罗的地下水，却从来不曾缺过水。过滤厂还大有潜力可挖。再加，供水的总量并没有改变，因为，河水也罢，泉水也罢，都是一个流域里的水。巴黎市民比别的人更爱喝矿泉水，这样就自己解决了饮水问题。

反之，四个乡区里村镇的供水却受到了威胁，因为由于干旱，井水的水位降低了。假如引水工程告成，把地下水位抽低，那末可以断言，不仅灌溉成问题，连饮水都会供不上。所以，引旱灾作张本，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过，话得说回来，何必多费口舌呢？只有重新奔走交涉，施加压力才能解决问题。西悉夫岩石* 滚到沟底里，还得重新搬上山去。

* 西悉夫是古希腊暴君，死后罚进地狱搬岩石上山，一到山顶便滚下深涧，再搬上山，永无休止。——译注

第二十六章 两头厚皮大象

蒙德罗事件和胶泥工退休问题都为我积累了好些经验。公家一方面做得太多，另一方面又做得不够。可称相映成趣。

部长们的善意和毅力给科室的威力消磨干净。机关科室对于自己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极力捍卫，其认真和顽强，能不叫人五体投地？

第五共和国历任政府积极主动的威权应付这种日常事务，和第三第四共和国历任政府老好人式的忙忙碌碌比较起来，并不见得怎样解决问题。

议会先则太强，后来又太弱，抵不过技术力量。实际上，议会投票通过行政当局所反对的法律已经无能为力。议会对于行政机关差不多没法监督，也没法检查。

尽管事关司法，司法当局却没有发言权。法院不能受理胶泥工人的案子。要是在美国的话，第十四条修正案禁止一切歧视，胶泥矿工就可以援引平等保护的条款，向随便哪一个法院要求享受与煤矿工人完全一样的退休条件。在斯堪的纳维亚，最棘手的案子可以仲裁解决。在法国呢，行政机关的力量强大，既能自动获得政府的支持，又能获得多数党的支持，任何仲裁都无从考虑。对于受蒙德罗待建区损害的农户，行政法院已经把行政命令判为无效，可是行政部门却把法院的判决视为无效。结果胜利者还是行政部门。

负责官员不管案子重要不重要，只管案子紧急不紧急。有时

候，重要案子永远成不了紧急案子*，而次要的案子却吸引了负责官员的注意力，因为这种案子成了时事。发生危机乃是使一件案子成为紧急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危机一来必然引起高级领导人的过问，也只有他们才能解决问题。

代议人员提供的消息都不大有人理睬，因为能“作决定的人”没那么多时间，而且，越往上去，决策者办案子的时间就越紧。而依赖下级作决定，级别越低又越不负责任。

为社会某一阶层作出的有利决定，不能及时落实，对决策者是不利的。提要求的方面闹将起来，很快就会叫人把好处忘掉，何况这些好处之得来并不全由请愿人的努力。因此，政府的拥护者取得了成就，反而加强反对派的地位。

帝国的光荣

第五共和国时代的法兰西怎么会搞出这么样的一桩事情来？国家正在很英明地预备把中央菜市场搬走，把屠宰场分散，而另一方面却去维莱德兴建一座大而不当的屠宰场，造价相当于二十五座现代化的医院。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决定的来龙去脉，原来事情虽然搞了起来，而决定却没有真正采取。只有这样才可能了解公家怎么会采取某些矛盾而荒唐的决定，闭着眼睛大搞草率的计划。

再说，比维莱德屠宰场的错误还要严重两三倍这样的错事到底有没有办法不让再搞下去？负责防止污染维护天然平衡的行政部门，却坚持落实这样一个计划：既不能丝毫减轻污染，反而大有可能破坏自然界的平衡，行政机关负责把公款用在刀刃上，却反而准备在受不到制裁的情况下挥霍国帑。

* 例如，外交政策问题十分重要，但形势若不紧张问题很少会显得紧急，政治人物也就不大关切。人口问题也是这样，尽管问题关系到民族前途，但是差不多谁也不感兴趣。

国家机器悍然不顾自己给百姓造成的麻烦，不顾国家财力会吃多大的亏，顽固地把错事搞到底，好像一架电子计算机那样，按程序运转到底。国家是一贯正确，可以无所不为，可以系统地搞无政府主义，可以挑担子挑到挑不动，可以规定千重约束，万种掣肘，一意孤行非达到目的不可，尽管这么做起来，会变得更加荒唐。公家心里非常明白，再做过头也不要紧，错事的后果决不会落在自己身上，吃亏的总是老百姓。

每一个公务人员，分开来看，个个忠诚、廉洁、聪明、内行，不过，一个组织的力量总比它的个别成员强，超过它的任务。

公共团体要求权力；内行人做事不一定合理；地方代议人员不懂技术，但也没有坏意，而且知道好丑，老百姓会激动，政治力量可以过问，行政部门一意孤行，百姓逐渐瘫痪，凡此等等都不是出于意外的。这样持久的意外，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展开一幅大失败的景象，其中的特点组成我们现行的制度，而我们正在这个制度下生活。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制度的帮凶。我们迁就姑息技术专制，让它不顾一切去大放光彩，扩大影响。

过犹不及

上面两个故事既相称又相反。彼此都关系到最基本的现实：天天喝的水，重体力劳动者退休的年龄。这两个故事都照亮了我们社会现象的阴暗角落。在公家方面，都无例外地犯教条主义，厌恶纠正自己，远离现场，藐视别人，规避对话，坚持错误，爱搞愚民政策，而愚民政策呢，就产生于不搞公开讨论。在私人方面，“治下的黎民”则时而逆来顺受，时而起来造反；神圣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和乌托邦式的要求夹杂在一起，弄得官僚主义的仲裁看起来仿佛也有道理，哪怕这种仲裁是专断的。治下的百姓对国家抱着一肚

子气,而又怀有希冀之心,大家一样地白费气力。

行政机关就像全身甲冑的厚皮大象,推它赶它毫无知觉。要末顽固地一动不动,不管你必要性有多么明显,反正不搞改革,要末埋头直冲,谁也没法让它拐弯,它身上披着那末样厚的皮。

一头厚皮大象坐着,一头厚皮大象冲锋,很可以像库斯巴德的人头公牛那样双双放在神秘的法兰西门口,守卫着里面的迷魂阵。

第四部

社会结构的病症：极端不负责任的社会

第二十七章 不负责任

迷宫深处，蛰伏着一个大家不大熟悉的权力体系。认识这体系的运转情况以及它的作用，人们就能认识什么是法兰西病。

关于这权力体系，我不打算在这儿进行科学分析。就象一位游览向导给游客指示一些游览的路线，我想组织几次访问，探访我国这部发号施令的机器。

首先让我们见识见识山山水水的基本性质：不负责任。

在等级制中，哪怕是一个最最微不足道的决定，从来也不会跳过一级。一位低级职员要请一次假吗？他得循级呈报。上级决定再沿老路逐级下达。宗卷的厚薄不关事情的大小，而看机关的大小。

精力全花在上呈下达上，有时候，上呈还没到顶，下达还没到底，力气已经花完。上面推动的事不一定能贯彻，下情并不都能上达。知情人不做决定；做决定的人不知情。甚至有时候，谁也不做决定，没有任何决定而事情也会凭习惯势力办下去。

正式的通道麻痹了，地下的通道却十分畅达。有一位教师接到职工会给他的调任或提升的通知，一直等了几个星期才接到主管机关的通知。职工会出的简报用自己的方式，把教育部的政策方针通知教师，就是说写得叫人看得懂，而天书似的“公报”则不是

容易看得懂的。

等级制把采取决定的程序包了起来。就算有人在采取决定，可谁也不知道这人是谁。然而，等级制的效率不管有多么低，到底还在维持着，因为要是没有等级，等级里面的成员就没有理由存在了。如果一位中层干部让人跨越过去，那末他还会有什么权力呢？他不知不觉地会反对一切快速的通道。快速的通道就会“短他的路”。因此，他反对分散，一分散就会把他挤掉。

远距离操纵

等级制者，远距离操纵也，但在五里雾中，又没有雷达。执行的人尽管所处的地位不难发现墙壁，但他照样四面碰壁。你抱怨吗？他说他只不过是搞具体工作的，负不了责任，再加，与其半负半不负责，不如干脆不负责任。邮务员或是税务员往往在柜台窗口对你说：“你要是不乐意的话，去找部长嘛，不然就换一个多数派。”

被遥控的人宁愿“撑伞”，“自蔽”。假如发生一件意外的情况，他决不会发挥自己的主动积极性，而只会去向上级请示。在这么远的地方采取决定，怎么会适应当地的情况呢？采取决定的人不负责任，落实决定的人也不负责任。结果，双方都仿佛患了脑亏病，象经过脑切除的狗，走起路来迟疑不前^①。

卡弗喀* 描绘一位中国将军守卫长城，鞑靼进犯，将军遣飞骑驰京，告急请旨。驰驱一月，朝臣决策请旨又过一月，归途又经一月驰骤，其间，形势已变，而将军严遵圣旨行事，被打得落花流水。

一派荒唐话吗？不见得。1870年，普法战争法方失利，巴黎被围，法国人民激起的卫国热情，可不就是这样烟消云散的吗？当时，甘贝大号召勤王，但不信任将领，非要亲自挂帅，远在都尔城，

* 卡弗喀，捷克作家(1883—1924)，善于揭示人生的荒谬无聊。——译注

根据前一天的军报*，打电报指挥作战比实况迟一天之久。可是，电报是多美的科技发明呀！何况还有电话！所以，他也是大小战役一概被打败。

小 头 头

有了那末些半明不暗的空子，居然没有人来加以利用，行使了权力又可以不负责任，不那末做才怪呢。能量流转不畅就会停滞，在等级制的半路上能量就会在小头头的手里结晶。离顶峰较远，不怕上面监督，而且还有文官制做靠山。离基层呢，也比较远，采取了决定，引起什么反应，大可不必介意。反正，治下的百姓是不大有路申诉的。这便是官僚权力的理想境界。他们巴不得随心独断，谁也不能过问，他们手里掌握的权力最为霸道，既不出于选举，不受选民检查，更没人跟他们竞选，又不是直接委任，出了问题可以撤职。他们的权力经过层层委派，实际上是从来不会收回的。

这些官员并不把自己当做代议士能使用的技术人员，代议士可以让他们比试比试，考察考察，不称职的可以请开，可以辞退。这些官员却把自己当做前台傀儡的牵线人，真正掌权的人。

地方上这样的小霸王，决心随心所欲，直到告老退休，又有谁没有领教过呢？这样的人独霸一方，为所欲为，任何处分到他周围的护墙上无不碰个粉碎。护墙是职工会用水泥建造的。总不能怪罪职工会热心护卫中下级官吏，而不去保护掌权大员，听凭中下级官吏受“政治权力”支配罢。

小头头并不一定是国家官吏。行政病也流行到文官制的后

* 其实，甘贝大不相信将军们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1870年11月9日，多莱勒德·巴拉丁在古尔尼埃打了胜仗，没有追德国人，使得洛瓦尔省的部队失去了机会去解巴黎的围。这一点是敌方事后承认的。甘贝大对于军人集团胆子太小，不敢宣布必要的处分，只好自己直接向各部队的司令员下命令。

面,侵入市镇、乡村公所。我领教过一位镇公所的秘书,历任镇长都尝过他那种既无能又凶狠的态度,从来也没法辞掉他。有一位行政总稽查经过仔细调查掌握了一整批证据确凿的罪证,刚好遇到一位魄力过人的镇长,也许该说不知死活的镇长,居然提出给予纪律处分,以警告了事。可是还太过火。“受害人”连打几场官司,都由市镇公所秘书职工会以他的名义一场一场地赢了官司。最后,还是职工会的一位领导施了仁政,他去找镇长说:“判例就是这样,你的官司非输不可。这位仁兄呢,的确不怎么样。我们老赢官司也没劲儿。咱们还是来个折衷吧。”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这是违反职工会纪律的,可是这位正直人却值得佩服。

法国大革命前夕,农绅阿瑟·杨格在法国旅行,领教到一位官员,这人不肯发给他**在勃桑松逗留的许可证**,脸上一副小官吏故作偃蹇的神气,死死抓住他的规章制度,他的风俗习惯,坚持他的既定立场,决不松嘴,因为他一心要表示出大权在握^②。除非给他几枚金币……

又有那末一位副工程师,凡是当地的承包商非给他送厚礼不可,不然就成不了交。一省的人都众口啧啧。可是没法收集足够的证据,除非甘冒谁也不肯冒的风险,于是大家只好扳着指头去算,还得再过多少年,这条地头蛇才肯退休。

有些地方,贿赂成风,简直成了规矩,甚至往往是唯一的规矩。谁也不否认**行贿**,可是谁也不清楚到底什么人**纳了贿**。反正是油水的世界。

有的地方确有贪污,但是舆论不容,民主体制也四面围剿。议会派调查团。在英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叫做**贿赂案件**。丑闻一暴露,法院就会处理,地位再高也逃不过去。国家制度运转好坏,都靠这些来加以证明。

拉丁国家在上列两类以外,属于第三类。贪污确实存在,法国

也许比较起来稍为好一些，但是谁也不肯认账，因此谁也不肯加以制裁。

法国叫揩油，意大利叫打点，西班牙叫门包，都是人们熟视无睹的。出了事也能压下去。问题确实应该彻底处理，但是谁都不敢碰一碰。

非人格化的权力

一个官员越是滥用职权，他就越加避免用个人名义。这样一来，滥的是权力而不是他这个人。

这种做法恰恰跟封建制度的做法相反。我们由于认识不足，一向把封建和专横等同起来，殊不知封建体系全属人与人的关系，是封君与家臣之间的相互关系。

等级制取代了封建制，实现了并且自以为实现了(权力的)非人格化。采取决定的不是什么杜邦先生，什么杜朗先生，而是这个处，那个局。官吏随时可以对调，所以不能称名道姓。他躲在匿名的集体后面。甚至甄别优劣的考功记分也淹没在许许多多一视同仁的措施里面。优秀人员的奇才异能磨灭了，低能庸才的也不大显眼了，大家都凑和到一条迷迷糊糊的线上。在这座庙宇里顶礼膜拜非人格教，没有处分，没有责任，甚至奖赏也没有了。

公务人员办公窗口贴上姓名，在国外是常见的事，在我国却与众不同。这样做公务人员是不乐意的，因为如果治下的百姓迎面看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岂不会想整整那个当官的？可是，又怎么能看不到当官的越是不可捉摸，那个机关也就越发遭人厌弃？

我们把孩子交给了人，这样的人该和我们有多么密切的个人关系啊！然而，一座没有眼珠子的衙门，把一批无名无姓的教师打发到没有灵魂的中学堂去，而他们并不是学校领导选来的，教师们也没有选这家学校。教师能认识家长的屈指可数。要谈负责的

话,学校的负责人,班级的负责人,家庭的负责人,似乎彼此之间都该订得有个人契约。而我们的制度却排除了人格化,非得叫人不负责任。失明症不断发展。今后将由电子计算机来任命教学人员了。这是把逻辑推向疯癫。

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下,为什么公立学校里总是不那么太平?为什么私立学校完成同样的使命,付同样的工资,就不大出问题呢?行政关系没有了人情味儿就会引起埋怨。人与人的关系中断了,只能在反权力的热情中,只能在私底下重建起来。鼓励和警戒,表扬和批评,能使个人掌握社会守则,并把个人动员起来。匿名制度取消了奖惩褒贬,而个人并不因此而心情舒畅。

1958年的宪法特别遭人攻击是因为规定了个人权力。难道一些比较新、比较好的东西不是这个宪法带来的吗?这个宪法树立了这样的威权,凡是握有权力的人都得以个人身份负责,然后用这样的权力代替了非人格化的权力,代替了议会制集体匿名的不負責任。新制度是健康的,决定出于一个人的脑袋,一个人的心窍,在众人的监督下,由一个集体负责的班子予以落实。

公共部门之所以痛恨“个人权力”,还有什么可以惊讶呢?毫无疑问,国家雇用的人员,集体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力,既没有风险,又没有制裁,自然不知不觉下意识地感觉到“个人权力”是对非人格化权力的污辱。

猜忌的天下

“别把钱丢了。”“放了学别瞎逛。”做妈的心里惦念,所以孩子还没有犯错误,她就有种种猜想在头了。她把孩子困在寸步难行的天地里。现代心理学已经指出,这种消极的命令多么容易把一个人瘫痪成神经质的人。

勒紧了自由的缰绳,不尝试也就不会做错事,等级制能磨灭人

的责任感,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切预先请示。

在行政机关的大家庭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当权派疑窦重重的作风。出名的事前检查,并不是什么额外的麻烦,而是不信任社会的中心问题。花钱的人决不能是批准拨款的人。中层拨款的人在理论上是负责任的,但是别人不会信任他在预算范围主动决定开支,而这个权力本来是交给他的。任何一位市长,机关领导或部长,他们受到的对待,都象一个置于家庭会议监护之下的挥霍浪子。

这样的制度着实古怪,用心在于撙节开支,结果却适得其反。我看见过最最正经的官员,对这种掣肘和约束,窝着一肚子的气,便用十分孩子气的办法来出出气:应该花的那一百万他拨不动,他就把另一项批准了的款子成百万地花个干净,哪怕花得毫无好处。他的逻辑是:一个机关不把拨到的款子花光,哪怕是往窗户外边扔,也会让人瞧不起。以节约为借口的规章制度,往往给浪费提供了方便。

公务人员之间如果有竞争,那就人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即使在原则上对此有所肯定,而竞争实际上是绝然不存在的。请看大学里的情况。1968年带有方针性的法律规定了大学的“自治权”。既称自治,想必可以享受主动积极的自由了罢,可以发挥想象力了罢,可以竞赛了罢,一言以蔽之,可以竞争了罢?

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呢?不怎么样。大学自治原来是假的自治。竞争是假的竞争。大学人士并不要求真的竞争。是生怕影响自己的铁饭碗吗?一有竞争,没有学生的学科就得取消,太拥挤的学科就得扩充,不景气的研究中心就得关门,而另行组织较有朝气的班子,开辟新的门径……这样,大学就可以经常在科学的利益与社会需求之间权衡利弊得失。真正自由竞争的大学最善于折衷兼顾。英、美的大学就是这样。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对称力量,不兴竞

争的大学就会趋于瘫痪。权力集中就成猜疑的世界。

念诵书面发言稿

一位有朝气的科室主任或是司局长建议一项措施，一家有事业心的国营企业拟订一项计划，部长身旁的顾问主管这个部门，他看了中意，但是从来不以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可是再来一个创议，他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有什么计划请他审查，他总认为一见倾心岂不降低自己的身价？为了生存，他就得摆摆架子，放慢或者停车，至少两次来那末一次吧。因此，等级制这部梯子变成了一部禁令重重的梯子。

喜欢痛快的实干家，趋向于躲开等级制的梯阶，躲开它的阉割作用。让·莫内老爱说，如果他想通过各部的计划重建法兰西，那将一事无成两鬓斑。他成立了计划委员会，绕过各部。但是时间一久，行政系统依然把计划抓了过去，比如公路岔道，在市区象潮水般涌现的时候，就变成市区里的林荫大道。

计划工作一纳入行政机器，便又聋又瞎，再也瞧不见听不见法国人民的实际问题了。纯理论的预计错误，本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集中制下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如果计划工作能够依靠社会的自我调整，那末就会顾到高速公路，电话，国内航空线，医院，看护人员的需要，而决不会去把城市集中得象些妖魔鬼怪，也不会去造那么些的摩天大楼，那么些条条块块的大楼，弄得廉价住房公司没法让人住满这些大楼，那就会多造一些房客们喜欢的独家小住宅，也就会感觉到、并且摒弃法国人不肯要的那种庞大主义。法国人梦寐以求的是小村庄，个人住宅，分散的工业。

仿佛一位演说家，先随便来几句想法，然后随着听众的反应，即兴发言，那末讲的人和听的人就会有共鸣。然而，当官的只会嘴里念念有词地去念诵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从头至尾，不兴改一

个字。反正听众没法溜走，就边瞌睡边嘟囔。

政府本来应该能够出其不意采取行动：要主动就先得保密。可是行政机关的责任在于执行公共决定，所以必需毫不含糊，一目了然。而人们见到的却往往适得其反：内阁会议保密纯属儿戏，行政机关却包得严严实实，显得神机莫测。

甚至议会也掌握不了必要的材料来考察行政部门。每逢议会提出问题，各部的答复都尽可能不着边际，只要对于国民代表的礼貌不至于十分过不去。事实是，议会没有任何考察的权力，也看不到文件资料，更没可能提询主管的官员，要听就听部长的。对待反对党，那是敌人，他就使用规避躲闪的一手；若是多数派，那是朋友，也就不太肯使部长为难。

议会是唯一能够穿透机关保密的地方，可是反而帮助机关保密。议员在选民面前，自己觉得应该对人民的行政机构负责，但是他们又没有负起责任来的手段，因此，国家体制使得议员们也不负责任。

“教堂是美术局的”

四个省议会议员，三万六千市镇村长，四十五万市镇村公所议员，盘踞在地方上，也是各有职守的。人数尽管众多，却并没有在地方上形成责任网，他们的权力是支离破碎的。他们由于无能为力而推卸责任。

离巴鲁瓦*不远，有一座哥特式的小教堂高踞小山顶上，向霄汉挑战，召唤雷电霹雳。自从十三世纪以来，已经遭了雷击，烧掉好几次。

我对村长说：“你得安装一支避雷针，不然还会吃意外的亏。”

* 多纳马利乡的村社，属塞纳—马尔纳省，蒙都瓦区。

村长申辩说：“教堂是美术局的，又不是我的。你不知道？我是碰也碰不得的！哪怕动它一个钉，也得挨揍。”事实是，这个教堂已被列为历史文物，已经不是村长的事情。他并不抱怨。可是要安避雷针，不知要往返多少公文，花多少时日，而且还要得罪行政当局。农村里的市镇长差不多都有这么一股子问心无愧的稳健作风，巴鲁瓦村长至少是做了他自己能够作主的事情。他是心安理得的，幸而如此。刚过了几个星期，小教堂又遭雷打。消防队还没赶到已经化为灰烬。

官吏是职业人员，工作是全日制；市镇长，省议会议员是业余爱好者，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官吏们以庞大的机器为后盾，而代议人员则以散兵上阵。斗争的势头，谁胜谁败已明明白白。

市镇长，地方议会议员，有时候沉于梦想，很想当一个真正的负责人员。可是一接触到现实，他就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地方利益的普通代言人，迎面是整套的官僚机器，若要做成点事情，就得要敷衍他们。要是现实一些，那就安安分分地满足于这末个角色，时而当辩护士，时而当起诉人，时而当调停者，就在暧昧模棱之中起他的作用。

他的生活就是长时期地等待，全都消磨在奔走交涉里面。他并不处理案件，而是从这个机关到那个机关跟踪案件。用词多妙啊！行政机关的错综复杂，仿佛就为了叫他灰心丧气而安排下似的。法国几乎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地方，在那儿谁也不明白到底自己有些什么权利。三万六千市镇村长怎么样才能知道，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可以的，哪些是被鼓励的。他们不断地接到通知，可是既没时间看，也不爱看。消息太多了等于无消息。浩如烟海的细节，只好归归类，主要的东西滑过去了。

地方上的代议士，大都渴望知道情况，却又缺乏法律修养和经济知识，情况也不接头。不该为他们在各地区、各省设些暑期大学。

吗？行政当局从来不肯主动帮助市镇村长进修业务，而这门业务却是最美的一门业务。行政当局听之任之。这很好理解。他们越缺乏知识，官僚制度就可以万寿无疆。机关科室安排下一个混沌世界，只有它们自己才摸得出一些头脑。就象书记秘书们天才地制造混乱，没有他们便什么也办不成。

一个技术单位的处长，有一天，讲给我听他关于负责人不平等的理论，他说：“我们不能不采取决定罢。代议士可是全然不懂的。他们没有能力跟我们来讨论计划。我们用的语言就不一样。商量吗？当然很好，现实却是另外一码事。所以，只好由我们来指挥，但是又要想办法给他们一种印象，好象是他们在指挥。非唱唱戏不可。”说实话，唱是唱的假戏。代议士不是傻瓜。公众也不傻。

也有时候，地方上的代议士想故步自封，免找麻烦。只有无所作为的权力最方便舒服。他们就使用它，有时候还滥加使用。这儿仍然是由于现行制度，不负责任的现象扩大了。另外一些情况，适得其反。如果一位市长，出一条不平常的主意，机关科室就名之曰“款外举措”或者叫做“额外举措”而予以驳回。假如他还要坚持，那就引起人心惶惶了。干脆禁止罢，又不好办。只好拖延搪塞。有那末一位市长，想搞一个滑雪班。家长出钱多少，看收入而定。省财务员不敢反对，也不敢答应，可是他还是有办法的。他要求市政府议决开具清单，列上各家姓名和收入数目。这样一搞就是两个月，雪早就化了。

隐隐约约的恐怖

地方权力之所以如同国家机关一样，成不了有人负责的体系，大部分是由于法国的村镇过于星散。三万多个村镇小得每个不满一千居民。这就产生两个严重后果。第一是农业区在地方集体里，在省议会里，在参议院里，比重都太大。份量好象大了，权力却

小了。实际上变成仅供咨询。

第二是，城市没有决策中心。五十个居民也好，五十万居民也好，一样的机构，一样的权力。这是平等所要求的。1880年，一个城市的权力和一个村子拉平。把三万六千个市镇村长变成企业主，既能全权管理自己的事业，又能全权采取主动，这样能行吗？不行，他们办不到。把他们集中起来吗？他们不愿意。行政机关当然不情愿在自己面前崛起许多团体，来指挥自己，或者撇开自己。

只要市镇长向国家的技术单位请求兴建一项设备，他马上就成了俘虏。技术部门搞出一个开销很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节约呢？技术单位为地方集体随便兴建什么，不是都有很可观的抽头*吗？而且是完全合法的。

万一市镇长不同意估价单，那就压力来了，耳朵边会有叽叽咕咕的声音：“我可劝你这末干……最后总得听行政部门说了算……行政部门的记性可好着呢……”

有三个农业公社**，打算兴建一个改良土壤系统。三个村长向公共工程局和农业工程处提出申请。两个单位各自开了估价单：要就要，不要拉倒。要了便有国家补助，不要当然分文莫取。这三个村子都只有那末百把人，即使拿到补助也搞不起来。

三位村长一道决定放弃补助，另请高明。他们找了一家排水公司，完全照技术单位拟订的计划行事。结果在一位测量员的指导下把工程搞好了。他们并没有请教公家，如果依靠公家，哪怕得了补助，事情照样搞不成***。

* 抽头看工程价格，从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

** 塞纳—马尔纳省，南齐斯区，布瓦东、贝萨勒、维尔加农三农业公社。

*** 布瓦东村的工程花了八万五千法郎，而估价单要二十五万，出入三倍。贝萨勒村花了一万四千法郎，而没有去花那十四万，相差十倍。另外，在桑西·莱斯，普罗文，两个技术单位，一个要十六万法郎，另一个要二十二万法郎。结果花五万法郎由私

象这三位村长敢作敢为的例子是难能可贵的。大多数市镇村长心中都暗怀恐惧。他们不敢相信,按规定,他们有权请教公共工程,同时照样有权请教私商。更不敢相信国家工程师会无报酬担任技术检验。他们想都不敢想,竟然可以指定公家机关去为公众服务。

又是对手,又是同谋

普罗文有一座出名的教堂,一个叫圣阿友尔·阿贝拉尔的在那儿讲过多年道*。大风琴的风箱该换啦,琴管也得检修。风琴公司开了估价单**。教堂已经官定为名胜古迹,归文化部管。中间插进一个委员会认为:“这架风琴是宝贝,不能随便一修了事,得进博物馆。”美术院拨了补助。不过,全法国能满足专家们要求的琴匠只有一个,不仅修理要花四年,而且收费超过一般价格四倍。结果补助金原封不动,破风琴仍旧是破风琴。

区里四十来个村镇决定成立一个辛迪加,收集垃圾,加以处理。厂房造在哪儿呢?到处找呀找呀,结果看中了一处废石矿***。顶上一个小树林子,把厂房遮住,厂房就建造在树林下边。垃圾都看不见。真是理想的去处。

一家私商负责造房,技术单位承造一条路,通到不远的国家公路。有一天,我大吃一惊,树林子忽然不知去向。本来就看中了树林子才选这个地点的嘛!公家的推土机手安慰我说:“等工程就

商包了。县里召集技术单位让他们解释,为什么开价那末悬殊。技术单位不得不承认,包商的工程十分牢固,但说不完全符合文件规定的“指标”:管道每隔五十米该由眼睛看得见,而不是每隔三十米,如此等等。反正,选择不在于工程质量怎样高精尖,选择在于土里土气一些,或者根本什么都没有。

* 1079—1142 中世纪法国著名神学和哲学家。——译注

** 五万法郎。——译注

*** 石矿在维莱纳·莱斯·普罗文。

绪，再种小树嘛。瞧着吧，可好哩。”当然啰，三十年后又是一个树林子了。

行政上对待代议士，有那末一股子家长式满不在乎的神气。代议士呢，对行政机关也暗怀怨愤。要发生冲突就会相当猛烈。可结果平安无事。他们彼此作了让步。技霸和地头蛇打交道，总是紧张的，也总有办法解决的。这种互相依存的把戏，一般都在省议会演出。“你给我个馒头，我给你块糕。”选举出来的也罢，上级任命的也罢，最要紧的，莫过于呆下去。一定要一道呆下去。

官吏有官吏的王牌：业务，能力，等级，牢靠的团体，政治上中立，跟谁都好相处；省议会议员们也有自己的王牌：关系恶化就会坏事。他们是吃普选饭的。

这种关系跟当年殖民地的行政官和地头蛇的关系有什么大不一样呢？前者貌似恭顺，尽管带点儿屈尊和调侃的味道，而实际上却可以独断独行。后者呢，表面上大权在手，实际上凡事依赖土豪。

不是市长，就是市议员也是不时出乱子的。忽然忍不住发火，发话说：“我们得不到满足就辞职！”省长很想来这么一句：“你辞职，我马上同意。”然后托人转告当事人。可是，他不愿意“掀起风波”。大家心照不宣，来个折衷让步。代议士只想给选民瞧瞧，一切坏事都因为他们做不了主才发生的，一切好事都有赖于他们才能取得。公家呢，觉得这样玩法挺不错，反正吾行吾素。

我认识一位市长，给他治下的百姓发了一张造房许可证，上面盖了印，心里却希望兴建司出面反对。必要时，打个电话接一下头，叫他不要批准，同时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而市长却可以当众抱怨行政上太不容情。行政上却也很能容忍这种小把戏。脸皮厚点，不在乎，反正来而不往非礼也，到时候价钱不会小的。

妈妈太钟爱孩子，不让他长大成人。弗洛伊德把这个叫做“骗

儿妈”；奥托·兰克叫做“蜘蛛妈”，盘踞在蛛网中心伺机而动；莫里雅克则把这叫做“育儿器”。法国人千百年来，在集体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无不碰上这位过于强壮的母亲。今天仍然碰上了她。

育儿器不让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再抱怨孩子不成人。她借口孩子不成熟——其实是她不让他成熟——不许孩子迈出一步。老孩子看见要学会享受自由，觉得十分艰巨，直往后缩。妈骗孩儿，儿挨骗，两人同谋，一道走上绝路。

第二十八章 偷梁换柱

他们本该如此

我们俩在林子里快步走着。米歇尔·德勃雷突然在路中央站住。他喊道：“不！行政机关不掌政权。它的作用只限于准备工作，然后执行决定；它不能采取决定。只有政权机关肩负责任！你之所以对我讲什么官僚机构，专家统治，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统治国家等等，只说明政权机关失职。行政人员只要有人指挥他们，他们是听话的。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政权机关失职，行政机关才有理由出来保证政权的延续性。今天，政权有人行使。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还有失职，那不过是个人的问题！”

我觉得米歇尔·德勃雷对于国家怀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激情，他心目中的政治人物和官员都有点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满不是那么回事。权力往往由不负责任的人在行使。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偷梁换柱”。

这是老话了，是跟中央集权制一起诞生的。在路易十四时期，人们已经感觉得出来。可是，路易十四却是十分留心为君之责，绝不肯失职的。达尔尚松写道：“交给各部大臣处理的细节，关系却十分重大。没有他们，什么也搞不成，可是什么事也不是他们自己搞的。他们不能不把一切都交给属员去办。属员成了真正的主子^①。有人会说，后来情况不是转变了吗？不错，不过还是朝同一个方向转变。

只管签字,其余都归我们办

君主时代,有所谓代笔书记室,能模仿君主的笔迹,替他签字。路易十四、十五、十六的大部分“真迹”,卖给收藏家的,都是那些默默无闻像机器似的官员代签的。甚至于到了今天,不少部长也只好让部下模仿自己笔迹代他签字。我到格勒内尔街当了教育部长,秘书捧来几个柳条筐,里面装着几百封公函,任免呀,调动呀,叫做“动态”。中学校长,其他中等学校的负责人,都在等我的签字,好去上任。从此以后,每天晚上,手推的“签字”车必然光临我的办公室。这样一个姿态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怎么能去了解一位从未谋面的中学校长在莫塞尔省是否称职?责任叫瞎子担着。真正负责做出决定的人,却躲在这种制度的夹缝里面。

我们这儿,什么事都要讲究象征性的礼节。尽管对于这架庞大的机器我是毫无具体的控制能力,但是做这么一个虚假而却有决定意义的姿态,居然就动用了国家的权力。我象有什么魔术似的,把基层和顶峰联系起来。

这就是那种偷梁换柱的怪现象。

有两种人:一种人赶早准备,采取决定,然后不慌不忙加以落实。另一种人凭着雷轰电掣的签字,瞬息之间作出决定。第一种人,就算是关心效率高,提出来的材料几乎都是独一无二,没有抉择余地的。要就要,不要拉倒。“你不签字,你把路全给堵上。”第二种人,要做决定就做呗。就这样,一切问题的责任由政治人物来担当,而问题的来龙去脉,在他却完全是心中无数的。在行政部门的心目中,政治人物的任务就是发表行政上的演说,批准行政上的计划,把行政的事变成官方的事。

这两种人之间有着微妙的依存关系。政治人物,哪怕相互属于敌对的体系,都倾听着同一些选民,见面则尔汝相称,彼此都很

了解，他们出于同一血统。官员们，不论对首长多么忠诚，总不免跟同僚们自成体系，而首长是掌握不住的。

有时候，政府人员对于这么一种情况觉得有点痛心疾首。一位新人仕途的部长，准备在国民议会参加辩论，他先到总理那儿去请示。总理对他说：“你的演讲稿，我已经看了。我看行。”部长吃了一惊，问道：“什么演讲稿呀？我还没写呢。我来就是为了向你请示再写嘛。”总理笑道：“哈哈，我懂了，我呀，人家对我也来过这么几手。”原来是部长办公厅主任自觉自动拟好了演说稿，径直送往马蒂雍总理府，就是没有想到给部长本人瞧瞧。部长马上把办公厅主任开除，因为他干了一桩大家都干的事情。

领导谁就得追随谁

官僚体系的偷梁换柱作风，有一条免开尊口的规矩在为其作掩护。官吏们满足于掌握实权。如果还想公开掌权，那就是去冒无谓的风险。政治人物心里都清楚，行政机关是自己的下属，否定自己的下属，那将是江湖义气所不容的。

谁想揭发这种现象，谁就倒霉。

罗伯特·舒曼干了一件不太得体的事。他对这种现象做了清醒的分析。他揭发驻在拉巴特和突尼斯的总督署执行一条“既成事实”的政策，而这两个部门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拨归他管辖。他说：“我确信，不恢复正确的责任观念，和下级服从上级的观念，任何重大改革是无从着手的。”^②

这篇文章引起了舆论哗然。一位部长没法保证左右属员的忠诚，不怪自己还怪谁？罗伯特·舒曼从1946年开始一直在历届政府当部长，从此以后部长再也没有他的份了。

有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在幕后注视这一事态的发展。他们都知道，部长既不能够抵制部下的压力，也没法拒绝承担责任，尽

管他对部下作出的决定一直是反对的。文章发表以后几个月，乔治·皮杜尔接替了罗伯特·舒曼，他又来了这么一手。他想反对拉巴特总督府的主张，徒劳而无功。总督府在法国殖民者的影响下，想撵走穆罕默德五世，代之以一个傀儡苏丹。总督府拟好计划，付诸实行。部长非做出抉择不可。皮杜尔尽管满腹牢骚，表面上仍然装得颇为尊严，仿佛这么个办法不是别人强加于他，而本来是他自己的主张。“既然这些天机咱们猜不透，不如索性假装就是自己干的。”

官僚体系在法律上是专权的等级制。在事实上却坏在目无纪律。机关科室有隐身术，人多，不受任何实际处分。因此，凡是明智的首长，差不多都不愿意和部下较量。

行施压力的集团也罢，反对派也罢，谁也不打算搞乱这场人不知鬼不觉的把戏。职工会呢，跟机关单位很好商量，彼此经常接头，咬着耳朵办交涉，悄地里成交，然后出现平衡，运转起来，双方都满意。这种无言的协商，政治权力是摸不着边的。行政势力和行会自卫，互相支援，形成没有反对派的政治。

至于反对派呢，集中全力攻击“政权”，岂不太妙！反对派几乎永远在“政治”事件中，让行政部门脱身事外。这是一种悄悄地招罗同情者的办法。这样，官僚体系偷梁换柱，就可以畅行无阻。

不仅畅行无阻，而且是心安理得。

知情人不知情

第四共和国时代，我时常有机会观察到同学和同事们那种对政治人物的高傲心情。我们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们是华而不实的；我们是终身职，他们要看选民的喜怒无常；我们只服从国家大计，他们则以哗众取宠为生；我们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他们却疲疲沓沓。我们和假渊博的外行相对照，自己觉得是个真专家权威。

1957年在布鲁塞尔，我听见我的一位同学代表预算司禁止部长兼法国代表团团长莫利斯·富尔向五同盟国宣布，法国准备以高比例分摊一笔欧洲发展海外地区的基金。我那位同学说：“不行，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反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胸有成竹，正像一位君主心安理得地说：“这是合法的，因为这是我的意旨。”莫利斯·富尔让他一句话堵得气都转不过来，发誓去向内阁总理居伊·摩勒告状。但是，这位青年财政督察员胜利了。莫利斯·富尔不得不认输。

决策的权力，从选举产生的部长过渡到官吏手里，对民主没有什么好处。可是，人们会想，至少对效率会有好处吧。决策的权力，从害选举热的人手里转到不偏不倚、思想客观的人手里；从心中无数的人手里转到心中有数的人手里。是那么回事吗？

记录，报告，研究，报表，鉴定总结等等，堆积如山，很能给人一种假相，好像是按照笛卡尔的教导，提供了全面的根据。但是，这些材料放过了活生生的现实，而只有活生生的现实才能揭露具体情况的意义。阿尔弗雷·索维很有风趣地指出统计数字可能歪曲现实。他说：“一位妇女对丈夫是忠诚的。另一位却对自己的丈夫每星期不忠诚两次。两位妇女平均每星期对自己的丈夫各不忠诚一次。”行政部门不愿意去认识个别的情况，个人的具体情况，只看平均数字，只看抽象的人。就这样，收藏家把褪色的蝴蝶用针钉在樟脑粉里。他在捉蝴蝶的时候手指头把翅膀上醉人的粉彩摸掉了。

技术权威和政治人物，彼此对立，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亨利四世已经责备巴黎的法院判官不了解法兰西的现实。他说：“你们不认识我这个王国里的毛病，也不认识这里的优点，我却深知这里的一切病症，因为我身历其境。如果我不自己亲身经历，我就不会知道得那末清楚^③。”安东尼·比内，有一天对我讲了类似的

话。他说：“年轻人走出行政学院，自以为啥都知道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书实在念了不少。而实际上呢，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还没有生活过。他们不懂得法国人。一位代议士老接触选民，他便认识了人民群众。行政学院毕业生却不是这样。他们能为我们这些政治人物作有益的事，但必须服从我们。”

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一位政治人物能够直接·影响·推动·几百人，却不能够直接·影响·推动·几十万·人。现代的庞大主义感染了官僚机构，只能使政治·人物·退·隐，而使·技术·权威·登场。

自行车存车规律

行政官吏处理了次要问题，让政治人物腾出时间去处理大问题，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古罗马人说：“领袖不问细节。”“上级没有必要处理的事，一概由下级处理”，这是罗马教会的原则。若不引用这些原则，任何等级制度都是行不通的。这岂不是有关国家兴衰的大事情吗？

然而，相反的情况却屡见不鲜。一位部长去到议会，出来时，包包里塞满了潦草的笔记，都是他逢人谈话时记下来的。诸如：“我上个月写给你的信，还没有答复我呀……”“我那个联欢会的津贴……”“兴建化验室……”“免除电视费……”“调动一位小学教师……”议员们把政府部长淹没在鸡毛蒜皮里面。这就是当今制度底下剩余的议会制，因为当今的制度禁止政府部长摆脱细节，为的是议员们恰·恰·根·据·细·节去判断部长的办事能力，然后跟他互相默契。所以不如说，“领袖不问大节。”我见过六位总理，既有勇气又和和气气地应付那种如同雪崩一般请托说情的人。他们的部下为了让他们扮演这个角色时安逸些，便去代替他们作出根本性的抉择，甚至都来不及向上禀告。

有人还记得“普罗文纲领”，这是多数党在1973年制定的竞选

纲领*。皮埃尔·梅斯梅尔发表了一篇演说。我出乎意外地听说：“下届议会将把官俸与私方工资看齐。”这样一项要求，连公务人员职工会都从来没有敢提出来，因为人们大约都知道，私方工资之所以高于官俸，那是因为私方职员经常受到企业破产和解雇职工的威胁。而官员则终生在职，直到退休。原来是总理的一位部下，最后一刻在演说稿里添上这末一条高见的。这么一来，执政党便让一位不见经传的官员④给它套上了套子。这位官员虽然不见经传，但所处的战略地位却是非同小可的**。

别以为行政当局只满足于掌管次要，因而让开主要。原子能高级委员会曾经很幽默地作出了一条相反的规律：“讨论一件案子所用的时间，与预算有关部分的三倍时间，成反比例。”⑤这句话，帕金森也已经记载了。一项核子规划花钱几十亿，委员会兵不血刃便加以批准；而要兴建一个自行车的存车场，却争论得十分热烈。

这条“自行车存车规律”可以通用于任何讨论会。哪一位市镇长没有领教过呢？技术单位奉市长之命制订的全部预算，市会议员只花几分钟就通过了。相反，如果要去造一间盥洗淋浴室，马上会激起一场自发的、而且是没完没了的辩论。

在省议会里，行政单位采取的政策很少在那儿讨论，比方说关系到划定一条涡轮机火车的路线，或者确定一些新城市的位置这样的事，尽管这些案子确曾在地方议会里提出过。可是，本市法院里换几盏挂灯，一议就是一个小时。在国民议会里，浩如烟海的预算表册，几乎从来没有在国民议会引起什么问题，而电视到底收费多少，却讨论起来没完没了。

怪事是可以说明白的。重大抉择需要深入研究。政治人物没

* 当时我在保卫共和联盟领导一个设计组，拟订了纲领里的措施。我们的建议都提请盟友独立派和中间派考虑，并由总理府审查。

** 十分奇怪的是，这个提议，谁都没有发现。太出奇的事情没法叫人相信。

有时间自己搞，也没有办法到本机关以外去托人搞。官僚垄断研究，往往搞成请吃罚酒。相反，细节最便于讨论。行政部门非常赞成，因为“皇帝总得消消遣，解解闷”嘛。

三个在催眠状态中采取的决定

我举三个例子，都是根本性的决策，都是由行政部门默授给部长采取的。一个是制造原子武器的决定。一个是制定一项热核计划和兴建皮埃尔拉特核工厂。一个是制造另外一种炸弹，后来成为南特尔的“场地”。三个案子有一个共同点：所有决策的人谁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决定。他们说这话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他们受的是遥控。他受了行政催眠，作出决定。催眠一醒，什么都不再记得。

(1) 原子武器

1965年11月，在总统竞选运动中，孟戴斯·弗朗斯面对米歇尔·德勃雷，猛批核武器的原则，并且明确指出，“他任总理期间，虽然决计赞助在民用方面研究原子能，但是绝对不考虑作军事用途。”^⑥

这样推卸责任的话，和我当时所记忆的全然不符。我当时参加了欧洲原子谈判的法国代表团，对于事情的内幕，我自信是知道的。过了几个星期，我被任命为科研部部长，也主管原子问题和太空问题。孟戴斯·弗朗斯在1954年采取决定的正式文件，我都能够看到。而我的记忆并没搞错。决定的原文，由于档案保密，要到2004年才能公开。可是我有把握来申明，的确是孟戴斯·弗朗斯为原子武器作出了不可逆转的决定。尽管他至今还在否认*，照我

* 1973年9月，蓬皮杜总统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会后发表公报，孟戴斯·弗朗斯在公报里再三否认说：“由我负责期间，从未批准任何制造和拨款的决定，去创建一支法国的原子力量^⑦。”

看来,荣誉应该归他。请看事实:

(一) 孟戴斯·弗朗斯,除了总理和外长的职务以外,直接负责原子事务。

(二) 1954年12月初,他决定在原子能委员会里成立一个“总研究处”。处的工作由他交给布沙莱上校,不久晋升为将军。布沙莱将军接受的秘密使命是,初试原子爆炸,生产武器样品。伊夫·罗卡尔当布沙莱的助手。他原来是领导师范大学的物理实验室。法国的高教界只有他一个人宣传原子武器。大家都知道他和法朗西斯·贝兰的争执。因为贝兰反对原子能用于军事。伊夫·罗卡尔的抉择是有意义的。

(三) 1954年12月26日,孟戴斯·弗朗斯主持一次部长联席会议。会议在外交部他的部长办公室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四十来人。其中有财政部长埃德加·富尔,国防部长艾马虞尔·当柏尔,研究国务秘书亨利·隆香蓬。会议做出的结论与预备文件建议的结论完全一致。预备文件则出自原子能委员会之手。总理宣称,他确认法国如果不先进入原子俱乐部,便不可能主张解除原子武装。因此,他决定“提出一项秘密计划”,制造核武器样品和一艘“原子潜艇”^⑧。

(四) 1955年2月,孟戴斯·弗朗斯下台。但是,1955年5月,确定原子试验的日期,是明白引用他在1954年12月做出的决定的。此后,步步按照规定的日期,终于1960年初,实现了初期的原子试验。

亲自参加1954年12月26日会议的人,会后都确认木已成舟。只有一个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而这个人却当着四十个人的面,决定闯过关去。

这个决定是原子能委员会的专门单位在事前准备好的。他们关心要符合原来的指示,这是正当有理的。原来的指示是戴高乐

将军在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时候发下的。他们大力说服总理办公厅,采取局部的保全措施,逐渐创立一支原子力量。

那么怎样解释孟戴斯·弗朗斯的抗议呢?当然,他完全是诚心诚意的。只能有一个假设:他采取决定的时候,意识不到真正的后果。

(2) 皮埃尔拉特和热核计划

1962年7月15日,加斯东·巴列夫斯基负责原子太空问题的科学研究,在议会申辩时主张建立皮埃尔拉特分离同位素的工厂。这是法国热核计划的中心问题。他向议员们解释:没有富铀,法国过不了钚的关,就没法从简单的原子弹过渡到氢弹。不错,美国人答应把富铀卖给我们,比皮埃尔拉特的成本便宜得多,但是我们要监督我们,限定我们只许民用。这样一来,我们便不得不自力更生,不得不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生产富铀了*。

加斯东·巴列夫斯基指出,仿佛是附带说说的,兴建皮埃尔拉特的决定,是居伊·摩勒在1957年3月作出的。

第二天,前总理表示愤慨,因为不愿别人把这件事算在他的账上。他说:“什么工厂呀?目的何在呢?什么也没说。所以我不能不表示惊讶,对这种公开肯定,表示吃惊^⑨。”

他着重提出,1956年1月30日就职演说中,他曾肯定说,法国庄严宣布,放弃一切原子武器,不管是本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原子武器^⑩。

居伊·摩勒努力回忆,并在公开文件里寻找,只找到了他拒绝核力量的意愿。但是,他如果能够去请教请教档案,他就会证实为了制定热核武器计划而采取的基本决策,一概有他签的名。因为

* 正如本书第九章所说,1967年多特雷的发明,能使热核的初步试验,不必使用富铀,因此也就不再需要皮埃尔拉特。

环境条件和偷梁换柱,都使他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忘记了他的就职演说。事实的压力,机关单位的压力,都比人的心意顽强得多。

出征苏伊士失败后,在11月中旬,他决定加快准备工作,在撒哈拉进行第一次核试验。11月30日,他的国防部长莫利斯·布尔热斯·莫努利和总理府的社会党人国务秘书乔治·纪叶^⑩,签了一个军方与原子能委员会的议定书。原子能委员会继续承担孟戴斯·弗朗斯交给它的任务,制造各种类型的原子弹。另外负责从事必要的研究,兴建一座分离同位素的工厂。1957年3月,居伊·摩勒政府再前进一步,决定建造四个皮埃尔拉特工厂,低型的,中型的,高型的,最高型的,完全无法民用,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法国一定得要从事初步的热核试验。

从1957年到1962年,事情本身和负责这件事的人后来的说法,相隔了五年,对孟戴斯·弗朗斯来说,则相隔了十一年。居伊·摩勒如果真的作出了决定,他肯定不会忘记自己采取的那样重大的决策。说他撒慌罢,也不大可能。那末怎么样呢?他也是无意识地干的。他的部下不曾有一个人肯冒风险去提醒他*。

(3) 南特尔的场地

从原则上讲,南特尔事件的重要性远不如前两件案子,但其后果却似乎更严重。

1960年8月,建筑部长决定拨三十二公顷的军用场地,给南特尔大学造校舍^⑪。

1962年7月,教育部长最后批准了建筑方案,兴建一整套大学用房,从1963到1967年按原计划陆续竣工。

* 除非是在自己援引的原则和政局的必要,两者之间的矛盾明显得没法自圆其说,因而引起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失明状态。

1968年5月,有一位议员在波旁宫——国民议会——讲台上责备政府,兴建南特尔大学,选地十分不得当。地点那么坏,环境那么差,难怪学生要闹革命。他说:“正就是在南特尔开的头,这部魔鬼的机器*……决不可在倒坍败落的环境中兴建新的大学校舍^⑬。”

谁能说这位议员讲得不对呢?南特尔的大学生像五马分尸似的觉得左牵右掣:一方面是十九世纪最凄惨的败落景象,另一方面却是二十一世纪的崭新建筑。校址离城又远,大家只好老守在校舍里,不像巴黎大学生那样,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外度过。

原来,建筑部长,教育部长,提出质问的议员,并不是三个人,而是同一个人**。

有人对他提出了这一点,他一口否认,当然是完全出于诚意的。

“没那事!没那事!我从来也没有开过与这件事有关的会。”

一位政治人物,先后当过两个部的部长,决定在南特尔造一座大学校,过了几年又质问现任政府,为什么做出那末坏的选择,这决不是记忆力差的问题。其所以痛斥自己所做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不知道在骂自己,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清楚地意认到,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我还有例子可举。可是,只举这三桩已经够了。中央集权制湮没了国家的方面大员。中央集权制让他们肩负重大决策的责任,而他们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衡量决策的后果。

“快乐的火车”这个电视节目,曾经风行一时。这是一部动画片。火车在银幕上不见全貌,只一节一节地出现。每节车装一件东西的一部分。得猜出来是桌子呢,母牛呢,还是小船。火车开了

* 指1968年法国5月大风暴,由大学生啓衅。——译注

** 皮埃尔·徐德罗是第五共和国最出色的一位部长,完全不是指责他个人。对上文两个案子也是一样。成问题的不是人,而是制度。

过去,看电视的人只看见所有东西的一部分,谁也没法在记忆里把那些东西搭配完整。行政机关时常在政权机关眼前开过一列快乐的火车,车上装满了零件。可是只有它自己才能够配搭完整。

部长走马灯

官僚体系偷梁换柱,并没有因为第三第四共和国的衰弱而不搞。其理由有如下几端。

第一是内阁各部不稳定。1958年*并没有终止这种不稳定。当然啰,国家元首是稳定的。总理就差一些,但还有行动的能力。平均他这个角色可以演那么两三年。不过,保险丝总是要烧断的。在官僚集中制底下,不可能有地方保险丝。因为,省的执行机关也罢,大行政区的执行机关也罢,都起不了保险丝的作用,只有政府部长才能起这个作用。

只有稳定的内阁能让政治权力制服官僚权力。因为只有呆得长,才能有所作为。持久性乃是权力的原料。农家租佃,动辄三、六、九年。嘿!要是部长们都只有一年的任期怎么办呢?本来嘛,能呆得住的,才算个部长呀。托克维尔当外交部长不到一年,不管他才能多么出众,他给法国外交留下的烙印就是不如平凡的特鲁安·德·吕伊,或者瓦列夫斯基。这两位,一个当了五年,一个当了八年。哪怕在多变无常的第三共和国时期,也留下一些卓越的部长姓名,可都是以长寿著称而打破纪录的。例如,戴尔卡赛,白利安……第三、第四共和国尽管总理像跑走马灯,可是也有补救的一面,某些部长去了还一定能回来。第五共和国的总理是稳定的,可是部长又像走马灯。祭祀照旧祭祀,不过换了祭品。有些部在社会上扎根扎得最深,但那里的人却扎不住根。这种部的不稳定,与

* 1958年戴高乐上台。——译注

前政权相比，并无逊色。比方说，从1958年6月到1974年6月，农业部换了十一位部长。情报部换了十六位。教育部也是十六位。能做一些长久事业的，没有不是在任比较久的。在外交部有顾夫，在财政部有德斯坦，在文化部有马尔罗，在武装部有梅斯梅尔*。假如像俗谚所说：“两次迁居，胜遭回禄”，那么可以说两百年来，国家的办事效率，早给野火烧干净啦！

最稳定的政权，哪怕是最不民主的，也脱不了这个毛病。1855年和1862年世界博览会总干事弗莱德利克·勒·布莱，在第二帝国全盛时代揭发说：“我们的历任政府，合法性有所加强，稳定性却不见得……按照自然法则，只有稳定的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这就是被官僚体制所争取去了的地位^④。”

新的共生体，专家政府

官僚体制的第二条奸计，是从1958年在专家与部长之间搞出一种新的共生体。

这第二条奸计，部分来源于第一条奸计。认识一个部，熟悉熟悉这个部千头万绪的规章制度；估量估量这个部里的高级官员；设计一条人事政策，争取人尽其才；深思熟虑，拟订一些改革方案，并付诸文字，对一位不是“家生家长”的部长来说，一般总得花它一年时间吧。也只有这么办，才能免出没法弥补的毛病。可是，部长的寿命一般到不了一年。为了缩短当学徒的期间，自然就会出现这种倾向，把部务交给精通业务的官吏。

而且当政的思想，本来就鼓励这种倾向。在第五共和国对国家职能的看法里面，高级官员早就听出了共同的语言。他们很快就上达指挥岗位。好几个关键性的部，直接交给了最出色的部员。

* 分别在任十年，九年，十一年，八年。

可是,部员当上了部长,很有可能仅仅当一位最高级的部员。至于政治性的部长呢,他们很快就明白,自己的力量不在哪一个议会党团的分量,而要靠自己主管的衙门。于是他们就倾向于保卫自己的机关,免受议会的压力,而不是相反。

两个阶层彼此接近了:代议士变专家,专家参加竞选*。

毛曾要求“又红又专”。第五共和国以另一种方式,也要求政治立场和行政专业彼此结合。两种作风,两种行动派头,配合成一种完全法国式的国家体制。行政和政治在高峰汇合。总统,总理,大部分部长,同时参加两个世界**。行政系统当然不吃亏。政治方面有好处吗?

明于取舍

行政阶层之稠密,强大,有组织,简直谁也甬想逃得过。这不是说,政治人物不作此想。他们也试图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过一想自己来一套,总是自己遭殃罢了。

克利斯蒂安·比诺在1956年当外交部长,想凭自己一个人出征苏伊士,把外交部撇开,连外交部的秘书长路易·约克斯也都不要。这样,他便自己放弃了在外交上作任何准备工作的手段。结果,国际仇法情绪,其反应之强烈,远征失败之惨,无疑和撇开外交部、因而引起外交部暗中的拆台是分不开的。

埃加·比萨尼,阿尔班·夏朗东,都曾想减削他们辖下的技术

* 行政学院高才生中有:1956届德斯坦;1958届尚德那戈和我;1962届雅克·杜哈梅和伊夫·盖纳;1967届希拉克;1968届奥托里,马洛,勒龙等等……没有当选的不算在内。

** 自从戴高乐将军去职后,高级官员当部长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沙邦·戴尔马政府里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六;梅斯梅尔三任政府里分别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三,六十五点七,六十八点九;在希拉克政府里占百分之六十九点七;在巴尔政府里占百分之六十九点四。行政学院,师范大学和科技大学的毕业生,经常占主要地位⑬。

大单位的职权。斗争十分激烈。等到这几位敢作敢为的部长离任以后，一度受屈的单位，依然各霸一方。

有些当部长的，比较巧妙，一般都想用办公厅来保护自己，少受部下机关的压力，但是这样一来，补救办法也不免会有弊病。办公厅的人员差不多都来自行政部门*，彼此之间存在微妙的联系。这种性质模糊不清的机构，属于双重领导。对部长是个人关系，对机关是集体关系。办公厅起的调停作用，往往只能使部长从属于自己部下的关系，稍为可以容忍一点罢了。办公厅给他一种发号施令的错觉，尽管事实上他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至于公民们呢，尽管他们向部长这个政治人物去申诉，而判断却依然只能由机关科室作出。议员要为公民的申诉撑腰，便给部长写信；部长则叫属下机关作答复。当然，那位申诉人接到的答复不会跟原来的答复有什么两样，因为这种答复早就在卷宗里准备好了。有那种不买账的议员，想把案子公开出来，怎么办呢？书面提出的问题在“公报”里，得到部里一模一样的答复。如果这位议员把“书面提问”变成“口头提问并且进行讨论”，那又怎么办呢？部长把答复口头念一遍，答复仍旧是科室用同样的词句写出来的。“公报”再把“口头答复”登载出来，依然变成“书面”答复。

不管向什么样的上级机关去申诉，调查走的是同一路线，答复也来自同一科室。不一定老是这样吧？当然不一定。不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如此。

有没有办法避免偷梁换柱呢？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效能最高的部长明于取舍，善于集中精力搞几件要紧事。因为他处于包围之中，不可能四面出击，弄得一败涂地。他只能杀开一两条血路。时间不能超过一两年。所以，他必须避免去选择一些无足轻

* 单讲这么一点吧。办公厅的经费里不包括人员薪金。那末，人员对发薪的原机关，自然不会忘情。

重的目标。

公民的耐心是十分动人的，当部长的又怎样去回报他们呢？公民们知道，部长和自己一样，也当着俘虏，可是又期待他来解救自己。“人家没有全告诉你们。瞒了你们好些事情。你们并不了解情况。我们呢，我们是了解的。你们不了解。所以，老百姓不怪议员，不怪部长。”原因呀，责任呀，都在那些“当屏风的人”身上。马丁·路德在攻击教皇以前，向知情的教皇去告不知情教皇的状。公民们并不想责备选举出来的部长，而是要保全他的职权，还其本来面目。部长是代议士，他也是一个受制度支配的人。法国人能够意识到，制度的力量是多么不可抗拒。所以他们只好不断向人求教。

1789年5月*，百姓诉苦书里已经充满了一片哀声：“哎呀，但愿皇上能知道！”结果却是辛酸的。

* 法国大革命前夕。——译注

第二十九章 泛滥

规章制度的观念缠住我们，而我们的法官却不愿意懂得，
大国有无数事物是绝对不该由政府过问的。

(1760 年左右)格利木^①

官僚体系替代了最高政治权力，并不就此满足，还想替代治下的百姓。

官僚体系把无限的能量贡献给才能超众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员”对于公益怀有毫无忍让的激情。“能员”是个尊称，而且往往名副其实。奇怪的是居然会引起抱怨。

专家治国的脾气是变不了的。“权力是他们的法则，他们的先知，典范，习惯，法权。他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仔细，事必躬亲。几乎谁都看他不见。把人家的嘴堵住，他会使用一种干巴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种雷厉风行的东西。”这人就是圣西门亲见而加以描绘的伏瓦散，路易十四的总监。今天的司局长，财政督察，省长，难道不就是这般模样？

历史的否定，公民的厌恶，啥也触动不了行政衙门泡透了的那种一贯正确感。他们有一种坚定得忘乎所以的信念，认为那些爬上等级制顶峰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本事知道等级下面的人要些什么才合适。传统的教会里，是立志独身的神甫去教导订了婚的男女青年认识配偶生活的秘密；在我们的社会里，则是官员们才知道，工业家、出口商、农民、艺术家各自该做些什么事。

国家大计变成了国家谬计

国家的职权远远超过它的民族使命。

逐渐、逐渐，它取代了地方权力，取代了行业，取代了家庭。它通过数不尽的措施，干涉农业，工业，商业，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它包办公安、公路交通和卫生。正如卢瓦耶·戈拉尔所说：“点路灯的是君主的委员。”不管是旧政权还是新政权底下的官吏，有哪一门活动能逃过他们的影响？他们手里有规章，禁令，津贴补助和后门可开。今天比前几世纪还要厉害。“‘国家大计’结果弄成了‘国家谬计’^②。”

集中制的政权从来也不会反对集中。哪怕过度集中对政权有百弊而无一利。

就这样，国家亲自执行电影检查，搞得人人齿冷，个个憎嫌。唯一的效果呢，无非是为禁演的影片做义务广告。结果，国家差不多放弃了这么一项特殊权力，同时却又舍不得正式撒手。其实呢，分散决定权反而有用得多。四千个市镇的市长、村长，只要当地有电影院，都可以有权力禁止放映列为黄色或是暴力的片子，只要在地方上会引起不利于公共秩序的问题。其实，也只有这么一个标准，能为禁令作张本。不过，这个标准不能定出全国性的实施办法，因为，宗教圣地鲁尔德的居民比起海滨游乐胜地圣特罗贝的居民来，思想感情不太一样。在某一个地方显得有伤风化，在另一个地方却是司空见惯。然而，行政系统的雅各宾主义绝不承认这样的区别对待。

十 公 尺

国家这个东西，本性就是什么都想管。人们曾见杜尔戈怎样去规定教授们使用时间，采用什么教学方法，怎样按年分配学科，

并以一个接一个的通令，讲解应怎样给打狼的农民发奖，等等，等等……而杜尔戈却是最英明的一位大官。

在他以后，那种废寝忘食的管人狂日益发展。1970年，有一位农业部长，在“公报”里发表一条部令，规定公羊交配问题。

轻视当地情况，乃是管制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凡是不合乎行政机关自以为掌握了的情况，那末事实便不成其为事实。有一位新任的财务官去到布列塔尼，向凡尔赛打回报告说，这个省有母牛三十一万七千二百六十二头，有羊二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四头。部长回书，表示惊讶。倒不是笑他提供数字那么样精确，而是因为母牛多于绵羊，而这种情况是别处哪儿也没有的。一定是计算里有错误。嘿嘿！偏偏没错。在布列塔尼，就是那么回事。

在勃利地方，有一个小村子，叫做诺夫木杰。村子里的小买卖只剩下了一家咖啡—南货—针线铺。有一天行政当局下令叫铺子停业。问题出在学校。咖啡馆离学校一百九十米，而照章该离二百米。直到这一天为止，咖啡馆和学校的距离尽管差了十米，可实际上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我以为这事好办。多十米，少十米……行政部门却毫不含糊，谁能保证开了这么一个麻烦的先例，不至于就此把有关学风的距离，缩短到一百九十米呢？十米、十米又十米，这样有个完吗？结果还是妥协让步：咖啡馆的大门修条墙堵死，绕道走后门，这样便伸长了八九米。大家装做数字够了，村子和行政部门都过得去。而事情呢，竟拖了一年。咖啡馆老板搞得情绪消沉，到别处开店去了。本村的这家铺子，从此关门大吉。

瘫痪了的万能

每一个行政部门都得表现自己有存在的必要，觉得自己只要有这么一份权力，就有责任搞个令行业止。

行政部门喜爱的是宁缺毋滥，不能绝好，不如不要。什么才算绝好呢？这得看行政部门定的指标，看行政部门的想法。

与其办“便宜”托儿所，不如不办托儿所。妈妈拿孩子没办法吗？活该。游泳池要么搞得跟奥林匹克一样，至少半奥林匹克，要么就甬搞。尽管办个奥林匹克游泳池，要用那么些人，除了大城市以外，没人吃得消。一位青年体育处处长对一位管理着五千居民的镇长说：“何必搞一个简易的露天游泳池呢？我们给您盖一个室内游泳池。”事情过了二十年，镇上还在等游泳池。二十个年级的孩子本来都该学会游泳了。

在勃利省的平川地上，小河流水，两岸绿树成荫。有时候，一棵枯树，一根大风吹折的大丫枝掉进河里，拦河挡住。遇到暴雨，河水泛滥。搞一架机器铲来，马上解决问题。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处理这件事，用几年工夫，制定了一宗伟大的计划。小河流水变成了大型运河。在施工中，两岸绿树一棵不剩。要是这么一笔账，那么开河干吗呢，来一架切树机岂不省事？

求全与无知一成亲家就能出这样的妙事。事情发生在留尼汪岛坦本疗养院。省长陪我参观时，对我讲了这个故事。

“我把业已拟订就绪的计划送交卫生部。所缺只是一个签字手续了。可是计划送去一年才送回来，签字仍付缺如。为什么呢？因为疗养院必须朝南，以便最大限度享受阳光，而我们却座南朝北。那个科室花了一年才做出了这么一个答复，可就忘了一件事：留尼汪岛地处南半球，正午时分，太阳是偏北的。

怎能期望国家给它自己规定纪律呢？甚至在美国、瑞士那样的国家，中央集权也在与日俱增。可是，在这些国家起码有个对称，足以抵消集中的倾向：执行联邦措施的是地方权力机关，而不是中央政权。

有一位大企业主^③告诉我说：“分公司负责人应该自己管自己

的事情。我达到了目的。一个星期，我只签发一封信。”能有多少司局长，省长能够想象得出这么一种做法？他们能不觉得受到了剥夺，失掉了作用？任何等级制是不懂得分权的，只知道自己挤死自己。

不该做的事尽量做，该做的事偏不做。自己签了字就该守信用，买了东西就该付钱，天下还有更简单的事吗？可是，国家机关差不多永远办不到，而且日期还是自己定的。一拖就几个月，那是家常便饭。国家还债不痛快，不止一次把私人的企业搞破了产。

我已经指出，国家补助会把整整一个地方集体搞瘫痪*。为的是剥夺工程的主动权，否则工价可以比较便宜。国家的补助，至少在另一方面可以起点推动作用吧，可实际上一点也起不了。因为，分配补助成了例行公事，既无益又浪费**。

滋生蕃殖

行政机关想补救人满之患，唯一能想得出来的高招，只有大批添人。人们并没有等帕金逊出世，才提出这么一条法则：“大属员招小属员。小属员还觉得自己的身份太高，不宜干活，再招更低级的雇员来办自己那一份工作④。这是路易十五在位时候的情况。

这么大群的官吏，一天到晚忙于签字，检查，自己填表格，叫人填表格，朝一面僵死的镜子里去看统计，这才真是白费精力！招揽那末多人才去搞行政工作，而且都经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实在可惜！在法国正急需有作为的人才，在国内进行革新，在国外不失时机！

然而，对于机构臃肿，我们已经习惯成了自然，简直很难意识

* 见第二十七章。

** 就在这种情况下，审计院在1976年批评农业部发补助，“纯属依样画葫芦”，不分青红皂白。

到应该节省人力。普罗文市政府开办一条免费公共汽车线，理由是，收费需要一套官僚机构，占收入的一半。可见一个市政机关，有可能不管那清规戒律，另搞一套，而国家却办不到。

有一个省政府，在1976年要求本省议会^⑤投票拨款招雇灭虱员，对虱祸进行斗争。政府为此而发出的文件，写得十分渊博。省议会一位议员指出虱祸这个词，在六册大罗伯字典里找不到。在新添第七册里也没有。省政府回答说，词见十册大拉鲁斯字典。词义是虱子引起的疾苦。省政府的用意是要招雇公务人员，替学童捉虱子，就是想不开开展宣传，发动家长大举灭虱，由各家自行使用剪刀，肥皂，花露水。要解决问题，就得建立一个新机构，接着来一套新章程，新职工会，任命正式员工。用不用指出，左派在野党全体一致投票通过了省公署的报告？教师职工会也加以支持。加上几位官方的无条件拥护者，建议居然被采用了。尽管多数派的成员大都不太愿意。

财务机关专政

财务至上可分两个等级。一是官方对一切非官方而言，一是财务对其他行政部门而言。

那么多人人害怕的机关单位，但一碰上利佛里大街的财政部，就都吓得发抖。而财政部是谁也不害怕的。

财政部和其他各部及其下属单位，双方老展开着两败俱伤的消耗战。有一位名牌女学校的校长^⑥为本校医务室订购药品提出申请。申请书退了回来，而要紧的许可签证却未见发下来。她找呀，找呀，总算找到了财政监督接电话。她请问到底为何拒绝她的申请。回答是：“清单上有一项香圆水，似乎没有必要。”

女校长抗议说：“学生有时候晕厥。香圆水能让人恢复神智。您至少得说明理由嘛！”

“我要是老得说明理由，那就啥也甭想拒绝啦！”

你们也许以为，政府预算大体上是由总理规定，然后由各部部长负责向下分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各部部长既不是向总理，也不是向财政部长，而是向财政部预算司的专员，按预算里的章节项目，一文钱、一文钱地说明用途。而那位专员呢，抓住最微小的枝节问题，跟你辩论有关部长打算采取的举措，到底有无根据。专员的答复往往是否定的。那末，要不要去求总理仲裁呢？这样办是有风险的。仲裁人至少两次有一次要，肯定花费而否定节约。财政当局又会巧妙地抵制执行那不中他们意的决定。比较明智的办法，还是跟财政部去协商解决，也就是说，承认财政部至高无上，然后乞求它的恩赐。

财政部的万能权力，鼓励着不负责任。部长们既然有权选择，也就有权拒绝，部长们都得自己负责。其中一些人却禁不住对申请人、对职工会和对压力集团说：“我是求之不得，可是财政部不答应呀。”

国家管得越宽，结果也就遇事找它。它要不管就失人心。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849年11月11日宣称：“现代之大患，在于错误地认为政府万能，能满足一切要求，能纠正一切弊病。”等他当上了皇帝，成了拿破仑三世，他也集中权力，轮到他来保持法国人的“错误认识”了。

国家到处伸手，毁了自己的权威。开明民主国家的观察家，看见法国的博物馆为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觉得十分奇怪。国家还管理剧院，掌握舞女的命运。法国最有名的剧院，还是拿破仑一世在莫斯科颁发的一道上谕规定着它的职能的。

在这样一个制度底下，政府如果长期出不了奇迹，那就表明它不够称职，既叫人厌倦，又叫人失望。在别的国家，国家能够改革，能够管理，便叫人心满意足。而法国人却习惯于更多地要求本国

的政治家。权力几乎类似仙法，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仿佛那不勒斯人等着瞧圣尚维埃的血块重新化为液体。不幸的是，这些英雄人物的广大神通差不多总以失败告终，弄得不好还会惹起滔天大祸。这在我们的历史里屡见不鲜。

国家成为众矢之的

国家既然掌握了一切权力，法国人也就叫它对一切负责。普通公民，地方代议士或者是官吏，都受制于中央政权，因此也就把一切归罪于中央。维维安在上一世纪初写了这么一句话以后，情况并未起多大变化，他当时写道：“政府在一切事务中管得那末多，心怀不满的人都认为，若要挽救危局，摧毁国家乃其第一要举。”

归根结蒂，法兰西病就是犯在这一怪现象上面。政府既然对一切负责，它就遭到全体的反对。它管得太琐碎，没法推卸对于全局的责任。正因为它直接处理最具体的业务，所以它就摆脱不了最抽象的要求。

巴黎奥迪翁剧院遭到占据的时候，马德兰·勒诺* 劝占领的人，不如去闹佛里·贝尔热歌舞剧院。可是众人不爱找那家私人办的剧院，不管这家剧院多么富有代表性，代表着消费社会，而众人所攻击的恰恰就是那消费社会。人们恨国家，超过一切，而国家的象征只能是那受国家补助的奥迪翁剧院。

法国人都不爱买账吗？不一定，他们还是买国家的账，只要事关国家应该独断决策的领域：财政的根本平衡，公民的安全，外交，国防，战争与和平。谁也没有反对货币贬值。从1914年到1939年，正当议会制盛行，法国由政府决定，进行了战争。1946年，政

* 事出1968年法国五月大风暴。马系有名的女演员。——译注

府根据一项决定，决定上签名的主要有多列士，开始在印度支那启衅。当时并没有掀起反对的浪潮。1954年，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发动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也没有遭到反对。国家似乎在顺应情况的需要，采取决定。它在起着正当的、份内的作用。人民并不反对国家握有对治下百姓的生杀大权。

相反，只要它走错了路，走进了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领域里面，它就会引起厌恨。人们本能地讨厌国家不务正业，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共和国总统之所以当选，政府之所以获得议会信任，并不是为了零敲碎打地治理法国。

人们最恼火的是，琐碎的细节恰恰是公民最感兴趣的东西，也是公民最善于自己经管的事情。可是，个人要把窗户开大一些，不能不去申请发给一份营造许可证；公社得不到装备部和内政部的联合决定，便不能够为预防暴雨成灾而动工兴建沟渠。这就是公民最最难以容忍的。国家和最高级的官员们，在自己头上积累起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是谁引起的呢？就是那束缚人们手脚的制度。

中央政权，唯一的彩头

既然一切都来自中央政权，地方选举的作用就只是给中央政权当台阶了。

政治斗争除了掌握国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多数党也好，反对党也好，每一次参加竞选，都全力以赴。公共生活集中起来，就会出现戏剧化。不可避免地会使人心紧张，进入不流血的内战状态。

在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士等真有地方民主的国家，具有某种倾向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执行机关，过着共处的生活，不得不进行协作，并各自学习维持国内和平。两者之间可能发生紧张，但不会导致对抗较量。选举胜利与失利，不过象足球队的输赢。赢队输

队本是老搭档。

国家发生危机

国家发生危机,或者战火纷飞,上级的命令是不容争辩的。在这样的时候,中央集权大有好处。可是在平时,甚至在采取重大步骤的时候,中央集权却包含着严重的危机。国家过度负责,公民便无责可负。一部法国历史里,革命和叛乱擢发难数,探其究竟,无非由于过度负责和无责可负。权力集中本来是用来应付危机的,结果却培育了危机。权力集中造成戏剧性的气氛又从而为之张本。

中央集权是绝对权力的盟友,是其天然的成分。它引起专制,然后逐渐滑向冒险、战争与革命。自由体制一沾上中央集权就受腐蚀,并且成为大家都拼命想抢的彩头,因而也就没法长时期维持稳定。

当然啰,自从1960年末,情况不无变化。行政部门比较容易进去了一些。接待方式也有了一点人情味,公文手续简化了一些。不过,使事情复杂化的根本原因,依然没变。在许多人的思想里仍然等级分明。在机关心目中,治下百姓全是外行,只会作弊。在公民的心目中,行政机关依然是居心不良的体制。

法国的政体尽管多变,中央集权却一直因袭下来。中央集权曾把各个政体弄得脆弱不堪,而集权制本身却健康不受动摇。国家依然无孔不入。

第三十章 混乱

政治集中之必要，
正如行政集中之可恨。

路易·布朗^①

③ 巨大的卡车驶下沙丘，一头扎下去，半边打滑，半边爬坡。哈西·梅萨乌的工程师介绍这辆百吨大卡，颇为得意，因为他们掌握了大规模运输的手段。他们说：

“我们运输钻井器材，卡车往往陷入沙地，车轮彼此相连，由一个发动机控制着，一个轮子陷进沙地，其余的轮子都转不动了。怎么解决呢？发动机独立起来就行了嘛！六个轱辘互不牵连，各有各的发动机，各有极强的弹簧，不管地面多么坑洼不平，轮胎总是紧贴地面。一个轮子陷进沙地，其余的轮子照样转动前进。”

井架上飘的三色旗，不久便要放落下来。卡车是留下来了。这将是今后表现法国影响的一种现代方式。我们将在撒哈拉留下尖端技术，适应新的需求。我们的国家是否可以从这里得到启发呢？独立的轱辘，强力的弹簧，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在法国，人们从来没能意识到，整体的强大，可以建筑在部件的行动自由之上。

主张中央集权的人一向假装相信，他们的对立面旨在分裂国家。他们认识不到，僵硬的官僚体系对于民族团结毫无补益，而只能威胁最为可贵的自由，即主动创造的自由，反过来又威胁到团结本身。

“哲学家”的错误

理由很简单，长期混乱，使我们分不清政治领域和行政领域。政治权力成为行政权力的俘虏。卡车陷进沙里，大家抱怨司机。

跟多中心的国家不一样，在这些国家，行政权力基本上是属于地方民主体系的，而在我国，行政权力主要属于一种自顾不暇的政治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又帮不了它什么忙。

国家的名称并不确切，而三百年来法国的特点就在于来源于此的思想混乱。由于混乱因而民愤迷失方向，事事归咎政治最高领导。民愤又是哪里来的呢？来自行政集中的恶果。

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怨声虽已载道，却又弄错了靶子。尽管有少数几个人*揭发官僚体系的扩张，绝大多数人却只知道责怪君权无限。

“启蒙哲学”醉心于英国，却又认识不到英法两国政体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巨大的行政权力，而并不在于君主的滥用权力**。

伏尔泰没有掩饰他钦佩路易十四的政府体制。卢梭则宣称，如果一个公民叛离国家的宗教，就该处以极刑。在“三巨人”里面，只有孟德斯鸠一个人预见到，还有比权力“国有化”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限制权力。“人们老把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大不相同③”。话虽如此，孟德斯鸠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今天，人们可以用一种政治和行政分别层次的理论，来代替他三权分立的学说。

* 首屈一指的是拉·罗歇富戈，佛邦，费纳隆，布瓦纪贝，圣西门公爵，达尚松……古尔内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就写道：“我们在法国有一种病症，为患甚广，名曰官僚症②”。

** 这种错误分析，有些思想敏锐的人马上就发现它会引起极坏的后果。比方说，约瑟夫·费艾佛，原来是排字工人，曾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几家报馆的编辑工作，后来当了帝国的首长。他在“谈英国的信”里指出“法兰西病”并没有治好。

也许法国可以省掉一次革命，如果在启蒙时代舆论更加开明一些。

自取挫折的道路

不管怎么样，我总觉得，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由于思想准备不够。

倘若制宪会议想搞的权力分散早已深入人心，那就不会一碰到困难便一扫而光，也不会让中央集权制取而代之，而且比已经废除了的中央集权制还要坏得多。公众的思想如果更加开明，就不会容忍罗伯斯比尔那样稀奇古怪地神化中央权力。帝国时代和复辟以后的法国，其所以没能或者没肯纠正大革命的错误，就因为法国人连领导阶层在内，一直不明白国家的痼疾到底是什么。

小孩子让门压痛了手指头，就把门踢一脚，嘴里喊道：“可恶的门！”我们面对着集中的权力，反应跟小孩子一样的不讲道理：“可恶的国王！可恶的政府！”从1790年到1946年的历次制宪会议，都犯有同样的错觉，以为要防止国家专制必须把政治权力交给议会议员，并丝毫不减削政治权力的职能，以为这样就行了。它们保持了国家的全部职能，却又让国家没有办法去行使这些职能。

人们想用经常的分权制，来减轻集中的专制。人们在派别和封建割据的空间，把权力分开，从而形成互相抵消的局面。不然就在行动的时间上，把权力分开，以慢性的不稳定，来保证政府来不及扎根。归根结蒂，集中并没有减轻，只是把中心搞成瘫痪。结果，只留下了害处。

哲学家们分析错误，加上千年罗马的影响，使法国认定——人们很想说，从此一成不变——一个统一国家的权力，只要交给人民的合法代表去行使，那就绝对不怕这个权力管得太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使人民大吃专制的苦头。而且这种专制是

集体的，没人负责的，所以压迫性特别厉害。

政权延续靠行政

古斯达夫·德·波蒙在第二帝国时期，责备税务员，看纳税人投不投政府的票，来决定他准不准他们延期缴纳税款。长久以来，省长们早就是执政党的高级竞选代理人。当然，这种情况已成历史陈迹……但是，依靠行政的影响，帮助政治力量维持自己的地位，这种诱惑力是很大的。这是混淆政治与行政的直接后果。即使不受诱惑，还会存在一种彼此猜疑的气氛。

分发各种津贴，形形色色的后门，颁发勋章……不都是当选人精明强干的表现吗？但是也降低了当选人的品格：政治人物只会到处讨好。当一名行政机关的寄生虫好处就是这么一些。选民干预了这种把戏，自己觉得惭愧，只好把亏心事归咎于政府。

选区投票赞成或者反对政府，对自己的飞黄腾达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没法计算的*。反正，公民心里不太踏实，隐隐约约觉得统治者是用小恩小惠，棒棒糖，站壁角来统治自己的。

以混乱为借口

因此，部长要讨好部下，就“包庇”他们，甚至为他们的错误辩解。但是，在议会的走廊里，在记者席上，他又借口行政机关的霸道，来原谅自己，弄到他自己好心没有好报，空怀报国之心。议员竞选的时候，靠的是批评行政，等到再次竞选，那就要求助于行政。这是耍两面派的规律。

在这种制度之下，谁也不满意，因为谁都不是各得其所。这种不安心的情绪，来自一些显然不对头的决定，因为它是在混乱中采

* 总之，到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止，谁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①

取的。两个部之间发生争执，可以由总理裁决。行政部门之间彼此不通声气，所以经常发生争执，不是由总理，便是由总统，在这个会上，在那个会上，用几分钟来进行仲裁，就象刑庭首席裁判官，流水作业似地审判小骗子，猥亵犯……这是一个蹩脚的印象派用的手法，毫无光彩，一片迷糊。

因此，不管体制有多么民主，事实上却不由自主地接了君主的班。好似上苍注定的一般。在这样的制度里，归根结蒂，谁也说不清到底是谁在决定什么。

象在瑞士，荷兰，联邦德国，美国那些国家，多中心的功率，靠的是中央政权只管总的方向。而后逐渐地，地方权力随着一种表面上混乱的次序，向国家权力指示的方向行进。这种行进是渐进的，因为服从的是多党制的柔软手腕，而不是集权制的铁臂，所以，总而言之，比较善于按照现实情况行事。

很多人认为法国拥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它有统一的政体。我观察了三十年，想法恰恰相反。我深信，多中心国家的社会比较灵活，生活比较安心。行政中心与政治中心合而为一，这是很危险的，对国家很危险，对公民也很危险。

当选人兼职，则权力尽归消蚀

公共权力的层次混乱，别有流毒，即当选人的委任混乱。

英、美、德国人看见法国的部长、议员可以兼任市长和地方议员，老觉得奇怪。在他们的国家里，身兼几项选民的付托是禁止的。每一种选举各有其特性。普选处理全国性的问题。地方选举只提出地方问题。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民主传统。地方当选人，不能兼任议会议员。有无一项条文规定不许兼任呢？没有。但实际上有。因为一年一千五百小时的会议，投票次数很多，议员必须亲自

到场投票。1975年11月30日公布的白皮书指出，英国议会和苏格兰与威尔斯新议会的议席，是客观上无法兼任的。同时又指出，但不宜就此定为法律。

公务人员若要进众议院，必须预先辞掉公职。1705年的“皇位继承法”已经规定了这一点。1918年的“议会法”，1927年的“皇家公职人员法”都又加强了措施，保证行政系统的中立。一位世袭的贵族院议员如果当了政府官员，可以列席贵族院，但既不能发言，也不能投票表决。公务人员辞了职，便不能再任公职。

在法国却不一样。国会里，省议会里，市政府里，官吏泛滥，人人都保持了公职的好处，随后还可以重回原任，如其不能迁升，至少官复原职。这些人，在当议员以前，在当议员期间，在当完议员以后，都不断地把派性带到他们的原机关。

而且，地方缙绅梦寐以求的是，一身兼任议员、市长、城乡公所议长，省议会议员*。有一些讲究的人，还要额外设法当选为欧洲议会的议员。另有一些人，还得添上一个市议会议长，或者一个省议会议长。还有一些人，一面当部长，一面继续在选区搞议员工作，尽管宪法里有明确的规定，这样的人必须把议会议席让给自己的代理人。

事实上，地方问题的关键都在巴黎，所以选民都希望同一个人能够兼任市长，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甚至政府部长。

我们不去分散管理权，反而把政治争议下放到区里。结果是，地方管理也罢，国家大计也罢，都搞得一片混乱。市区选举变成议会选举的试点。人们通过市区选举来窥测全国性的多数派是否呈现出一些要变动的迹象。地方民主只是使一些人做梦也想到繁华

* 由于法律上的错误，顶不住习惯势力的压力，议会议员都自动当上省议员。只有法兰西岛这一块地方，国会议员只有一部分兼任省议会议员。但是另一部分里的一部分可以想办法当上市长或省议会议员。

的巴黎去建立自己的业绩。反正一切都是在巴黎完成的嘛。

正是因为代议士的作用很小，所以才能出现这种现象。反过来，这种现象又使代议士永远起不了该起的作用。表面上看起来，兼职能使代议士更有作为，而实际上，却使代议权在行政权面前日益削弱。

地方上一身多职的缙绅，让种种请求呼吁压得透不过气来，只好求教行政机关，而行政机关总是肯帮忙的。如果这人另外还操一门职业，那末一身而兼数职很可能弄得自己所受选民的付托，一样也完不成任务。于是，他就想把这些事务的实际责任，推给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拿走了实权，还你的是面子。

该不该责备议会议员，在国会里，在参议院里经常缺席呢？这不过是他们任务分散的症状而已。选民给他们的各种付托，不断包围他们，他们只好从自己的选区奔往巴黎。到了巴黎，跑完这个衙门，再跑那个衙门。而他们的选民呢，只抱怨他们不管自己的小事情，从来也不抱怨他们不能够好好地起他们监督和立法的作用。

巴黎，通过省长，副省长，市镇长，把地方政治包办下来。公民们无权自己处理自己小范围内的小问题，因此只好委托他们的议员，到巴黎去搞他们的地方政治。而且，地方民主，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患了贫血症，没有足够扎实的群众组织做它的后盾。兼职之风成了真正分担责任的主要障碍。因此，选民的付托，都被一个狭隘的几乎是无法拔除的政治阶层抓了过去。

于是，兼职加剧集中；兼职人员总想到最高的地方去活动，到他有兼职、能让他接触到最高阶层的去活动。兼任国会议员的市长，一旦同省政府有什么麻烦，他就会去找部长。部长把案子往上调到巴黎，尽管这件案子本该由地方主管。最妙的是，部长之所以那末办，竟然出之于一位地方代议士的请求。

这些做法，不予禁止，便成为天经地义。因为，国会选举也好，

参议院选举也好，大部分候选人不是市长，便是省议会议员。手里没有这些王牌的，似乎低人一等。所以，实际上，他们也不得不向大家看齐。

这种办法当然能使受益的人满意。他们干吗要改变现状呢？在野的，在朝的，谁也不来揭发。咱们经常可以瞧见，每逢行会式的利害趋于一致，不管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争执，同盟总归可以订立起来。一个厨师，兼当马车夫。主人叫他，他问道：“您叫的是马车夫呢，还是厨师？”在精神分裂症里面，最荒唐的是省长们害的那一种。他在省里代表政府，又是地方集体派给中央政权的委员。没有他，省议会的一切商讨都不过是拜佛许愿。省议会议员对省长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各色各样的问题，越来越使各个职能无法彼此代替。职能既然不一样，怎么可以混合在一个人身上呢？往往由于一个人的本领，暴风骤雨居然在省长的双重乌纱帽下平息下来。但是老实说，一位省长能不能同样地忠心耿耿，又体现政府的意愿，又体现省议会的意愿呢？假如有这么一个国家，检察官、律师、审判官的职权都由同一位官员来行使，你说人们该不该觉得这个国家的法制很成问题？

公共权力的权限很混乱，省长的职能很混乱，选民的思想很混乱，各种混乱彼此助长，悄悄地互相勾结起来。

分 别 层 次

法国人，也许主要是领导集团，必须长时期致力于消毒，才能够理会到，只要总的利益不真出问题，个人不该放在国家的后面，而应该放在国家的前面；地方政权不该放在中央政权的后面，而应该放在中央政权的前面。

法国人三百五十年来，一直崇拜中央政权，所以瞧不见这么简单的一条道理：官僚集权制是和自由、负责的社会不共戴天的。而

有自由,负责任的社会,却很能适应一种拼凑起来的政权。议会和政府集权,能使国家强盛;行政体系集权,必使国家衰败。

尽量把行政职能从中央权力的管辖范围内抽出来,放在地方民主的责任下面,本来是一条十分简单明了的路子。可是,大概由于太不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所以显得特别复杂。法国的革命者和制宪者,曾经对英国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又崇拜美国,但是长期以来对英美一知半解,缺少真知灼见,所以,两世纪来,始终没能走上这条道路。在大革命前六十年,日渐衰老的王室,如果能够听取一位大臣的警告,那该多好啊!他说:“各省、各市必须能够相当独立地行动,在君主制里面行使真正的民主^④”。这句话今天仍然有效。

仍然有效吗?不,该特别有效。当年的法国还是农业国,文盲很多,对这么个制度还不怎么乐意。而今天的法国,工业化和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不该再迁就苟安了。

第三十一章 划地为牢

“他们都是处长”

在克恩*有一座古老的殖民地府第，作为省政府，省政府木制的楼梯上，每一级都站着一对夫妇。楼梯顶上戴高乐将军等着和贵宾们一一握手。人们把他们称做“乡绅”。接待官员高喊：

——登记处长先生和夫人……

——卫生活动处长和夫人……

——农业处长和夫人……

——档案处长和夫人……等等，等等……

戴高乐将军在握手的空隙里，低下头来对我说：“他们都是处长。”克恩一共有三万五千居民。可是，处呀，科呀，与本土随便哪一个省府都是分毫不差。一个行政的小天地，搬到了芭蕉树底下，依然丝毫未动，有如在加利福尼亚一块一块石头砌起来的中世纪宫堡。

处长队伍过完以后，我向其中几位请教：这么遥远的一块法国领土有过一些什么演变。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听到很多东西，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人，我倒领教了不少。他们似乎只关心本行，只知道自已为它充当桥头堡的行政部门。他们关在密封的格子里。

部落和山头的万花筒

从外面看起来，是官便是沆瀣一气，自成体系，与世隔绝。从内部来看，却又是多么五花八门！搞公务的这一行，像个万花筒，

* 法属圭亚那首府。——译注

里面分成无数部落，彼此之间都遵从一种微妙的等级制。年深月久的竞争分化着他们。

大体系里面组织小体系。名牌大学，高等考试，大机关，大专业，自成集团，不通外界，各有自己一套仪礼、风俗和习惯。所谓竞争，并不意味着比赛。争的是，在各自的边界线上打游击，扩大自己的领域。桥梁工程师对农业工程师，行政官吏对工程技术人员，科技大学对国立行政学院，审计院对行政法院，财政督察对外交部……仿佛军阀混战。

每一个行政部门，每一业务单位，都想形成独立的体系。国家控制越广，业务单位就愈加五花八门，各自划地自锢，结果造成这样一种怪现象。按理说，等级制的中央集权该能保证统一和平均。然而，等级制的中央集权的逐渐形成却滋长新的山头主义，否定自己根据的原则。

政治权力不想再去摧毁这种封建割据，只想“分而治之”，让它们互相抵制。巴黎省长不管治安如何维持；警察厅长不管行政；国土保安司和国家情报和反间谍局，老死不相往来；宪警归国防部管辖；警察归内政部管。若要一道追捕犯人，其搭配之难有如杂技表演。连各家的电台波长都不一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警长在办案的时候，抖抖霍霍地找公用电话牌子，去叫宪警队长。这位队长跟他一道办案，离他只有几百米远。就这样，1940年5月，前线邻近部队的指挥员，因所属兵种不同，只得到最近的村子里去互相打电话……

尽管没办法，也得设法活下去。官僚机关找到一种办法，可以避免单位之间的争吵：官官相避，各坐各的办公室。

只要同坐一屋，就没法不互相理睬，那末，斗争就会愈演愈烈。最通常的结果是株守不动，彼此抵消。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民航总局，公路局和水运局，彼此划地自封，勾心斗角，结果，除了把我

国的交通网搞得十分落后，还能有什么下场呢？空中火车没来得及出世，就掐死在母胎里。理由是推进功能不良，其实是幼稚病没能治好。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设想并非来自铁路公司，所以害怕别人威胁它的专利。在北部地区，运河之所以开始“大搞”，那是因为煤炭生产衰落，铁路公司已经没有必要那末样拚命保卫自己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大搞运河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必要了。

你在印度旅馆里按一下电铃，叫侍者撵走一只蝙蝠，侍者会对你说，他不能干这个活，应该由他的一个同事去干。如果这一位请了假，不在，怎么办呢？活该。多尔努瓦伯爵夫人叙说菲利普三世是怎样死在西班牙的。有一天，屋里怪热，国王受不了，而管火的大臣不在，其余的侍从们谁也不敢违背宫廷规章而代替那位大臣的工作^①。

战前，法国曾想同时执行一条完全攻击性的外交路线和一条完全防御性战略路线。希特勒不用多久，就发现了这一矛盾。可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吃了这一次苦头而把病治好。

右手不认得左手

如果自己觉得是唯我独尊，也就会觉得非他不可。1956年9月，埃及人把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我被派往开罗把公司的领航员接回国。很多人宁可再等一等。他们说：“只有我们熟悉运河的通道。只要有一艘船搁浅，纳赛尔便非把我们叫回去不可。”结果，纳赛尔招了一些希腊、德国、挪威的领航员，不费吹灰之力，便接了法国领航员的班。

好些行政单位或技术团体，享受垄断专利，十分得意，自以为非他们不可。这些单位的力量有根据吗？每一个人都得证明自己是唯一有能耐处理问题的人，而且这些问题是任何其他问题都无

法比拟的。

1967年，让·马赛尔·贾纳内决计在波木地区试搞一个现代化的医院。他想结束我国医院设备低劣的苦恼。我也想在普罗文搞一座波木式的医院。

在荷兰，我瞧见过用轻型的预制构件，兴建同样的医院。市政府廉价买一块市区边缘的地，造一些馆榭式的医疗建筑，要求能用十年、十五年。到了期，城市布局又进步了。地产涨了价，可以用来到稍远的地方兴建一座最现代化的临时医院。这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发展的需要。

办法虽好，却在行政机关的成见面前碰一鼻子灰。因为行政机关要末不造房子，要造就造一个天长地久的东西。还有，别人试验成功的办法根本是不屑采用的。

我想用兴建校舍的例子，来说服卫生部医院司司长怎样克服房荒。

他反驳我说：“国民教育的经验不能给卫生部门生搬硬套。在医院问题上，问题不在创造，而在配备。医院是不能成批生产的。对别人合用的，对我们不合用。”在分手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说：“波木的样品不是我要搞的。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下文倒是有的，不过要迟几年，要等罗伯特·布兰换一个司长。

我们这个漂亮的医院，就是这样搞成功的，也没超过预算，也没超过限期。但是，投产却要等几个不同单位的决定。一个单位规定编制，一个单位管任命医生，第三个单位管护士。单位虽然三个不同，却都异口同声的嚷嚷人荒。编制空着人不来，新医院好久没法开动。护士学校要过三年才动工兴建。主管辅助医务人员的机关，要节省预算。对它说来，根本无所谓，预算规定投资四十亿，才用了一半，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辅助医务人员来说，想像中的节省，实际变成浪费。他们不来，只好雇临时工。同样的

工作，工资却高三倍。有什么要紧？钱有社会保险出嘛。临时工介绍所真有造化。官僚机构划地为牢，正好让它们大发其财。

支离破碎的市政设计

谈到蒙德罗·徐尔维尔，我曾提起第四和第五共和国，在市政问题上，宛如一对双胞胎。这也是划地为牢集中制的结果。凡是一个城市，不成套，就成怪物。在这么一个微妙的拼花什锦里，每一个成分都得跟其他一切成分和谐协调。可是，在这么一个制度底下，又怎么能和谐协调呢？每一个人在他的犄角里做决定。如同一架大风琴，谁也不许按键子，而每一根琴管子却随兴所至地演奏起来。一位市长想修一个新市区，他得向许许多多行政机关去乞讨批准。有多少设备，就得去乞讨多少回。修路吧，找装备部。造简易楼吧，找住宅国务秘书。盖学校吧，找教育部。搞医务所吧，找卫生部。警察局吗？找内政部。邮局找邮电部。造体育馆吗？找青年体育部。市长没有任何办法能让那末些行政机关彼此接个头。如果兴建的规模大些，那就只好成立一个“协同安排区”。不这样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全部让行政机关去搞。市长的唯一抉择：要末在杂乱无章中打转，要末送给别人去搞。

有一位市长要造一所中学校。他得申请八十次，通过十四个不同的机关。这还不算。等到发现建筑工地离一座名胜古迹不够五百米，事情就麻烦起来了。我们曾经想兴建一座宿舍和一座体育馆，地点不错，离普罗文中学也不远。宿舍属教育部。体育馆归青年体育部管。总的来说归文化部，而文化部的审美观容忍不了那座体育馆，因为这个中世纪的城市必须照顾一些美观问题。一个委员会接着一个委员会，足足十年才做出决定。体育馆是造成了，可是离中学校足足有一公里远。

国立行政学院，或团结梦

1945年10月，师范大学阅览室里摆着一份报纸。我无意中瞧见一条小新闻，报道成立一所高等学校。要进任何大专业机关，要担任任何高级的公职，非得先在这个学校毕业不可。这是垄断。我当时一心想进外交部，见了新闻，便跨上自行车出去打听消息。走到圣日尔曼街，一家古老的府邸有一位闲着没事的接待员，在那儿把几张椅子搬来搬去。他告诉我说：“还没安顿好呢。人倒有几个。”接见我的是一位青年人。他站在一张帝国式的大书桌后面，桌上干干净净，一张纸也没有。他听罢我的问题，便热烈告诉我：

“直到现在为止，每一个大的业务团体，每一个部，都有专门的考试，跟别家不一样。一位新官上任，进的不是国家机关，而是一个行会。这个制度促成推举制和世袭制。行政法院裁判的儿子，外交官，财政督察，审计院审计的儿子能像旧社会的议员一样，父子相传。而我们这个新学院，将让拔尖的人才同样经过考试录取，废除荒谬的界限。这个学院根据同样的原则，培养我国全部高级官员，使他们具有这样一种激情：国家机关为国民服务。”*

我后来才知道，这一位年轻人那么样雄辩地描述了学院的宗旨，原来在戴高乐将军的办公厅办事。他的名字叫做米歇尔·德勃雷。办这个学院本来是他想出来的。现在是他奉命着手筹办。

这一股子雄心壮志，今天怎么样了呢？士族阶层开了条缝。部级机关里面，只要是行政学院的老同学，就能隔部来往，尔汝相称，打打电话。他们的同学关系在行政堡垒的堑壕上安了小桥。可是

* 他还说：“选录新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只限于巴黎。必须公平地向外省开放。文官考试旨在内部选拔，应与学校考试取得平衡。”这些正确思想，后来怎么样了呢？下文再看。

壕堑依然，深难见底*。

国立行政学院的确有那么一点成了团结的熔炉。但是，学生也在那儿学会了争夺和分等，同学之间，斗争十分激烈。谁能钻进前十五名，才有希望选进大业务团体。以下二十名还有希望选择名牌部会。毕业名次关系到一辈子。一旦进了机关，实际上不会再有机会出来。

到了出教室服兵役那一天，每一个人都得顺着名次宣布他的抉择。一位名列前茅的同学，大家以为他要进外交部，可是他却选了行政法院，那就马上发生连锁反应，一下子人心大乱。苦心搭配出来的设想全崩了。想进行政法院的人，只好到审计院去。想到财政部当行政员的，却去了内政部……我见过不止一个，整整二十四小时，自以为在大业务部门有了一个位置，谁知道大门没开，没进得去，过了三十年还耿耿于怀。

成败取决于半分。我的一位同年，老考第一名，不知怎的得了个第二名^②。成绩发表后一小时，他去找了一个手榴弹，是他打仗的时候带回来藏在什么地方。后来，别人在维利埃尔森林找到了他。脑袋已经炸破。这当然太极端了。不过，类似的情况仍然发生过几次。这都说明争夺怎样演成灾难。争夺激起的不是进取精神，而是行业精神。

时价变了。到了第五共和国，省长身价高了，外交级跌了。但是划地为牢的传统却原封未动。发榜以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发榜以后，各就各业，你忌我妒。

香勃努瓦的火车

一面划地为牢，一面又远距离操纵，往往弄得谁也不去做行动

*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情况有所改善，不过很慢很慢。

所必需的综合工作。

比方说,在巴黎—巴尔铁路线上的隆格维尔,充当普罗文的车站。正像奥勃雷充当奥尔良的车站。隆格维尔跟普罗文相隔七公里,中间有一条内燃机火车线,联接两地,一天有六次班车。

从1967年起,兴建了一个新市区,叫做香勃努瓦区。地点就在这条火车线边上。区里的居民都希望能就近辟一个站。我去跟铁路公司办交涉。没有结果。如果答应在那儿停车,国营公司就会肯定这一条支线,而它却只想这条支线跟许许多多其他支线一样,一律停办。

过了不久,香勃努瓦有了自己的中学,停车站却依然杳如黄鹤。每天早晨,一百五十个孩子,从隆格维尔坐七点的内燃机火车。开车五分钟,就开过他们的中学,再开三公里,才到普罗文车站。他们在那儿等候一点一刻钟,再坐校车开回三公里,就是方才走过的三公里。荒唐的事到了下午再重演一次。十六点半放学,十八点才到家……如果内燃机火车在香勃努瓦停一停,就可以省掉校车,调整钟点。孩子们早晨可以多睡一点一刻钟,白天省等两个小时车。这么一节约,抵偿设站的开支绰绰有余。

然而,铁路公司鼠目寸光,支线亏本怎么办?不管你怎么样交涉,反正推个一干二净。我呢,我仍然严格遵照经过考验的仪礼,向历任运输部长去讲情。部长们被说服了,发出了指示。可是指示却到不了收件人手里……我尽管在最高领导那里解决了问题,但解决办法并不下达。倘若到基层去办,他们又让我找上级。这把戏玩了八年,才让顶峰和基层通了气*。

* 衙门里总有几条妙计,备而不用。求全主义能够解救划地为牢。铁路公司初步估计,露天柏油站台要花三万法郎。沿线村镇答应给钱。忽然,公司认为不能只为上下学停车,要停班班都停。这就够了正规车站的条件。三万法郎一下子变成四十二万。村镇花不起,计划仍旧落了空。

这件事原来几天就能办好,只要就地作出决定,比方说由省议会做决定。因为省议会本来管全省的交通供应,由它来判断,设一个停车站台或者办一条校车接送线,到底怎样才合算,这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决定权却属于无名无姓互不通气的行政管理部门,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门户之见,壁垒森严

原来,是中央集权制要求分工,要求机关划界。可是机关划界自守,就没法综合使用各种手段,而且使决策权趋于瘫痪。这样一来,就只好上溯到能够综观全局的地方,才能采取决定。因而无穷无尽的事非得取决于最高当局总理府,甚至总统府。只有跳过那种划界自守的格局,事情才能顺畅。机关和机关之间,若要解决纠纷,只能跳过仲裁,越级申诉。

身在门户的官员,是不能够自作主张、对另一门户作出让步的。想也白搭,简直如同一个国家在捍卫主权似的。让个步,会有被推翻的危险。而等级制在本质上,就是人们不担风险。

宁可拒绝协商,不能在任何一点上让步。对本行以外的人,一切讳莫如深。对上级则逐日报告,等候指示。

我国的行政官员都是优秀的人才。可是他们所在的部门,却日夜操心,只想抵挡竞争,杜绝风险。我国的将军都很出色,而参谋部却半身不遂。我们的军队比别国落后一场战争。他们门户之见,壁垒森严。

僧侣社会

官僚机构是当官的;同样,宗教是僧侣的。卫生是大夫的。教育是教师的。知识是知识分子的。校长,董事长,则是科技大学的。

官僚机构划地自守的风气,蔓延到整个法国社会。各个行业

都有自己的特权,为的是本行业的利益。但是格外授予的东西,变成既得的权利,变成不可磨灭的权利,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一个社会越是等级森严,僧侣意识就越发厉害,综合全局的职能便日益衰落。

行会是不让竞争的。奥里维埃·吉夏曾经提议,减少小学低年级每班的平均人数,让那些自愿义务照顾儿童的姑娘们帮助那些有文凭的女教师。这一下可闹翻了天。许多情愿服务的年轻姑娘,被儿童教师工会拒之于千里之外。建议火速撤回。

大革命没有把行会制革掉,反而使行会制得到加强。咱们今天来瞧一瞧,行会正虎视眈眈,只要有什么人向禁区伸伸腿,便剑拔弩张。行会之间,越近越猜忌。正如一个世纪以来,跟僧侣作对最厉害的莫过于教师行业。行会对立,依然如故。尽管思想意识有所接近。许多教士思想“左倾”,但是要求教育摆脱宗教的思想仍然存在。

行会都想保全自己,怕受外界感染,也怕内部变质。想到前途,总要自己更加了不起,更加强大,更加受人尊敬,不过模样依旧不变。它要的是发展,却又不肯改变。

分 等 食 堂

每个行会内部,隔阂不断创新。直的也有,横的也有。在兵营里,你会瞧见高级军官餐厅,普通军官餐厅,下级军官食堂。在不少中学校里,门上贴得有“高考教师食堂”,“证书教师食堂”,“助理教师食堂”这是普遍的组织原则。分片制贯穿一切:法官或律师在同行里分新旧;铁路员工分跟车不跟车;航空人员分飞的爬的;技术部门分矿业、桥梁、农业工程。

托儿所在这儿,幼儿园在那儿;少年宫在另一边;中学又在别处。“特种教育处”的困难学生由教育部管;“医教走读处”归卫

生部管。彼此不通声气。两个衙门，两种行会。

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划地为界。从前的社会自然形成集体，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年龄，在一起生活。这种集体，现在到哪里去了？人们还能上哪儿去接触不同的人物来丰富自己？今天，大家都在自伙里生活：工人在车间里，干部跟干部，年轻人成群行暴，老年人孤苦伶仃。人跟人还能交往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咖啡店。

自我延年

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人们进师范大学，一辈子只能一次，出来却管一辈子^③。”科技大学，行政学院，中央机械学院都是这样。名牌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懂得，芳龄二十，跨过神圣的校门，命里就注定了将高踞社会的金字塔顶。

在一千个法国青年里，两百五十个中学毕业，一百五十个上大学，只有一个能上名牌学校。从此，大部分人在社会里的地位都就此定案。可是，科技大学录取的榜尾一名，比起落选的第一百名来，分数上下相差平均不到百分之二点五。而录取的榜尾一名，跟落选的第一名比起来，不过差百分之几。多奇妙的准确性呀！就那末一点把入选的和落选的分清楚，把人的一生，就此分割开来……

在全世界，恐怕很少有像法国那样看重文凭，把文凭看成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在美国，一张文凭只开始时起作用。平均过了五年，就要对人下判断。看的是这个人能干什么，不是看他从哪儿来的。在法国，文凭简直是远程火箭，只要不出事故，就能把你一直送到退休。

李奥蒂写道：“在一个国度里，毕业，考试，名次，仿佛是从胎里带来的。这等神经质的倾向，只有越来越让我们去追求高官厚

禄。这种东西是最能使我们衰败的^④。”有了出身，几乎再也不怕开除。中学教师考试录取以后，天翻地覆也没有你的事。有一位同学对我说：“我考取以后，就不会再犯错误的了。你只管提你的意见好了。”

共和国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官僚统治的国家。“政治阶层”寡头统治。其精华为议会制。选总统要选真正是自己的人。新的选举制，把法兰西共和国变成了人民共和国。可是法国人民爱自己的官。1969年和1974年两次选举，当选的人都盖有师范大学和行政学院的印记。

新旧“平民肥皂”

这种风气很难改变，因为它源远流长。旧社会是“特权”社会，有了特权的人，只想在自己背后把门关上。若要在社会里向上爬，非得走一定的路线不可。从做买卖的到贵族，整整的一部分小资产者都愿意到次要的小法院去担任司法工作。要在社会里升迁，需洗刷掉身上难闻的平民气息，什么也比不过用“平民肥皂”^{*}。

十八世纪的耶稣会教士，充当了宣传员，替一个人才济济的等级制做宣传。当时，他们已经想不要让王朝慢吞吞地向世袭贵族统治过渡，而想通过考试形成一种个人功才统治。他们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仿照天国的官僚体系，建立学校会考。中国已经废除了科举，法国却没有。1763年撵走了耶稣会教士，这才为了代替他们而创办起教师考试。直到如今，教师考试固然存在，会考制度也依然存在。

人们在二十岁就有了终身官职。但是许多人在摇篮里便有了几品顶戴。说话要有口气，思想要有方法，社会要有关系。若要官运亨通，这些都必不可少。不过，不从小学起，这套本领很不容易

^{*} 社会升级往往要经过四五代人^⑤。

学全。创立功才统治,本是为了平等一些,公平一些。可是马上又引起另外一些不平等。

拔尖制

1958年以后,人们产生一种稀奇古怪的错觉,遍及乡村小学教师,一直到国家的顶层。大家以为,中学和大学学生,人数突然猛增,原因在于“人口的波浪”。其实,战前的小年级学生有六十到六十五万人。战后的大年级,学生人数增加到八十至八十五万。可是,人口增长根本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如果教学工作只需要添人百分之三十,那倒不难解决。问题是增长达到百分之一千或百分之一千五百*。和民主的狂澜比较起来,人口的波浪算不了什么,只能算是水面涟漪。因为问题完全在于中学实行了强迫教育,而大学则人人都可以上。

话虽如此,把原因搞错却有深长的意义。把发展算在出生率的账上,就不必去改变质量。原来的教学制度是为几万名大中学生设计的。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子弟,生活在优越的文化环境里面。天分特高的公费生并不是主流。这样的制度不适应成百万少年。他们的文化根子不一样。他们将弄成不能适应现实的人。对这样的少年,生搬硬套原有的教学制度,那是注定要他们失败。学校把他们大批招来,等于叫他们上圈套。用学校来提拔人,会起反作用。所以,不管表面上怎么样,出生依然明显地是个特权。

在1968年5月风暴期间,大学生提出的意见,大部分恰恰都想推翻“拔尖制度”**。有一个时候,人们认为这些意见非被接受不

* 1939年,中学学生三十万。1968年达四百五十万。1939年,大学生六万。1968年七十万。

** 1970年出版的《罗伯特字典》增补本,1971年皮埃尔·吉贝尔的《新名词字典》,都说“拔尖制”这个词是我在1967年创造出来的新词。我反对“拔尖制”这个事实,只剩下一个新名词⑥。就像中国的将军们用响亮的诗句歌颂胜利而结果吃了败仗。法兰西乃是西方的中国。

可。事情过了几个月，啥动静都没有了。官大人制度重新占了上风，差不多什么让步都没有。

拔尖制为了保持自己，高筑堤防，十分微妙。连竞选纲领里哗众取宠的口号也不能奈何他们。他们不主张靠财产继承，只主张继承一些文化。只有晓得口令的人，才能达到等级塔顶。怎能克服这个制度千秋万世、代代相传的倾向呢？单讲权利平等，现在是不够的。而要建立机会均等，则又其难无比。在位的人则千方百计为自己，为子孙保住位置。想改革这种现象，恰如胶柱鼓瑟。除非革一场命，用造反的不公平，来代替制度上的不公平。可是，不用多久，就轮到造反时的不公平，变成制度。

勋 章 事 件

授勋的目的在于鼓励立功。但办得是否公平呢？1964年，一下子废除了十七种勋章。本来都是由各部授给的。废除以后，只搞了一种新的国民功勋章。这项改革，荣誉军团早就有此主张。它向来反对滥发勋章，因为授勋并不由它作主。恰好戴高乐将军也有这个意思。他反对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取消，只剩下文艺勋章、学院勋章和农业勋章。乔治·蓬皮杜挺温和地反对说：“这十七种勋章，都是颁发给劳动人民的。得到勋章的人，一辈子都引以为荣。上一次矿工罢工，我在总理府接见工会代表，他们胸前高挂这种勋章，而今天我们把它们取消了。这些勋章涉及面广，人数多，而且是普通百姓多。这是功才勋章永远也办不到的。功才勋章会给部长办公厅的人，高级官员和缙绅们在半路上截去。而且老是这帮子人。就是原来垄断荣誉军团勋章的那些人。老百姓是连门儿也没有的。”

戴高乐点点头，半晌没做声。我相信这个正确的意见一定触动了他。但是已经来不及。生米已成熟饭。拔尖主义终于胜

利了。

钻牛角尖

最高的门户是知识分子的门户。但是也支离破碎了。

中国人用一个字来表达“学问精深”。这个字写出来像三个螺旋钻，也像牛角。学问精深就是钻牛角尖嘛。越钻，窟窿眼越小。学问越精越深，天地也就越小。往后去，谁也没法跟上他了。他就独自一个，去跟研究工作中最微细的东西打交道。

有一位青年考古学家，脑袋里想写一篇论文，谈荷马时代的兵器学。文献资料越搜越多，浩如烟海。他觉得明智的办法是缩小范围，只研究头盔。但范围还太大，于是再限定为冠缨。他很有风趣地说：“今后，谁要谈荷马时代，希腊战士的冠缨，就非引用我的论文不可。”然而，光荣的冠缨就在他头上飘荡。

知识分子的官场里，每一个学科之间都密不通风。分析文章有如蜂屯蚁聚。综合性的作品却远远不够。当然啰，有必要让专家们去致力于特殊的课题。不过，要想使文化的生机不至于泯灭，还是需要不隔绝于其他研究，不隔绝于思想生活，不隔绝于群众的道德。应该让不同的科目互相联系而喷射出发明创造的火花。

专业是单薄的。专家是戴眼罩的。因为害怕竞争，害怕“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就去研究微不足道的东西，尤其是没有实用的东西。一位伊朗学生，在政治学基金会提出论文，研究伊朗的计划经济^⑦。评议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学家。他想找一些伊朗问题专家，来组织论文评议委员会。他发现，研究古代波斯，从上古直到十四世纪的人有的是。可是，越接近现代，人就越少。结果，找遍了七十五所大学、四万法国大学人士，现代伊朗问题的专家，一个也没有。

二十世纪的贾法吕斯*

蒙泰尼,卡尔文,拉伯雷写法文都很规矩。随便哪一个有文化的人,看懂他们的书是没有困难的。对于笛卡尔,帕斯卡尔,达兰贝,狄德罗,克罗德·贝尔纳,贝格松也是这样。我们这个世纪,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行话越来越多,门户也越来越多。从拿破仑法典——司登达尔曾以它的文采为自己的榜样——到现今的各部通令;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注解人;从弗洛伊德到弗洛伊德的门徒,其衰微堕落,竟跟福音堕落为繁琐哲学经文的情况,不相上下。清清楚楚的思想,明明白白的表达方式,一变而为僻拗的教条,晦涩的注解,但是,这么一来,就没有风险了。莫里哀把贾法吕斯演成一个不朽的人物,善于把简单的话说得曲里拐弯。贾法吕斯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中间。

鲁瓦约蒙开了一次座谈会,题材选得很妙:幸福**。有几位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作了发言,可是并不想人家都能听懂。他们越讲,我越觉得进了蛮文馆。有人做了一篇报告,我简直一个字也没听懂。做报告的是一位心理分析家。我向他请教说:“可不可以允许我向您提两个问题?第一,您幸福吗?第二,您能让请教您的人幸福吗?”他滔滔不绝地做了答复,我仍然听不懂。大概他是在教导我,头脑简单的人是捞不到幸福的,而清白高洁是庸俗的。这是一位拉岗式的人物,名还没有出,晦涩倒已经可观。

这种作风在理论上是可以解释的。有人提出这末一条原则,要探索一种现实,必定要用一种外行听不懂的语言。探索得多么远呢,不一定,可是,若要知道到底走了多远,你先得狠狠的下工夫,听懂他们的游记。拉辛和莫里哀都主张以“逗人喜爱为至高无

* 贾法吕斯是莫里哀喜剧中人物。——译注

** 1949年7月。

上的原则”。划地自封的风气,却会导致相反的原则:“没法理解的东西是深奥的,可以理解的东西是平淡的。真能搞研究的人,特点就在于公众理解不了他。”

贾法吕斯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占有统治地位。然而,人文科学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因为讲的就是我们嘛。心理学也罢,社会学也罢,伦理学、哲学、神学、地理、经济、法学、人类学也罢,里面决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够用别人听得懂的话表达。说行话等于在语言上采用保护关税制。保的是专家垄断,不让好奇的眼光,批评家,竞争者接触到他。

孤 岛 语 言

你以为,不同的专业要在不同学科之间进行研究,必定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吧?必定要把自封为科学的行话先翻译成普通的法语吧?这恰恰是绝对干不得的事!就这样,专家们一下子忘掉了他们称颂多学科的议论,急忙回去求庇于孤岛语言*。

《再生产》这部书,现在已经成为古典著作,我们随便来摘引一段:

“作为一切 AP**的成就,要看接受的程度如何,怎样承认教育机关的 AUP。也要看接受的人掌握沟通教育的文化准则的程度如何。特定的一种 AP 的成就,在特定的社会从业里面,要看这种 AP 要求的文化的专断与另一种文化专断的关系体系而定。前一种文化专断,在有关社会从业里占统治地位,而另一种文化专断,则是教育奖励灌输给一些集团或者一些阶级的。那些接受 AP 的

* 每一门人文科学,在跟公众见面以前,甚至在向有关科学开门以前,难道不该在本门科学内部让人不费气力便能理解吗?比方说,语言学,本来是语言的科学,居然也制造出一种语言,同一个字要看地方,表达不同的科学对象。比方说,语义学这个词,有时候和符号学相同,有时候却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 AP 是教育活动,AUP 是教育权力。

人,是从这些团体或阶级里提出来的^⑧。”

这样的妙文,一来就是几十页。请读者不要害怕。读者并非智力落后。如果真想搞懂,也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论点,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还是很值得讨论的。就是说,教学倾向于宣传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标准。统治阶级尽先把自己的文化特权传授给自己的“接班人”。反过来,文化又去维持现在的社会制度。

这几位作家,挺身反对这种“反民主,讲拔尖”的现象。但是,谁反对民主,讲究拔尖呢?不是他们自己,还能是谁呢?他们用自己的词汇,筑起一座碉堡,对周围的农村实行恐怖统治。他们躲在词汇特权的背后,向大学生征收封建贡赋,使大学生不得不学会这种土话方言,去博取文凭。

从前,吉尔伯·穆利曾经主张过人民的艺术和文学,应该让人民看懂,所以也应该听人民的。他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他的朋友们都躲开他,因为他顽固地要人理解他。这叫他的朋友们十分为难。结果他在离群索居中去逝。

知识界之所以比别人更加支离破碎,那是因为它既忠实又夸大地代表着整个社会。工人自治的口号轰动一时,如火如荼。作为社会理想,难道不是体现出各个门户的深刻倾向性就是追求闭关自守,互相隔绝,脱离现实,仿佛在太空失重似的吗?

一旦实行“工人自治”,人们便将在小圈子里生活。必须给它一个对立面,成心在外界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对于行话、黑语的贵族式崇拜,必须代之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让具有各种文化的人,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够听懂。

大概这就是文化革命。也恰恰是有文化的人最不愿意搞的。本来应该由他们来给社会树立一个开放门户的典范,可是,刚刚相反,就是他们集中体现了行会世界行动僵化。

第三十二章 充血

在法国已经只有一个省，就是赛纳省；只有一个城市，就是巴黎。在我国社会的骨子里，有一个不断衰败的元素，一个死亡的元素。

路易·布朗^①

在法国，每两次电话里总有一次是跟巴黎市区有关系的。交通越发达，巴黎城郊的建设就越加处于优越地位。恶性循环已经有了轮廓。巴黎吸引着电话定户，定户也就充斥于巴黎。于是，电话事业的投资越来越多，结果，一面减轻了饱和，一面又加剧饱和。血液向头部大量流去。

老问题了：“从前，法兰西是一位美人，身材匀称。慢慢地，美人变得有点像一只蜘蛛。大脑袋，细长胳膊。今后还要变成长腿蜘蛛。脂肪，精髓一概涌往巴黎。外省则干枯消瘦，筋疲力竭^②。这个比喻在十八世纪初叶已经存在。此后，脑袋大得超过一切比例，全身失掉了平衡。现代化更加快了这种发展趋势。

在电话充斥以前，铁路充斥。在铁路充斥以前，驿道、快车、快邮充斥。在高车驷马时代，巴黎已经出现“交通阻塞”。

巴黎处在硕大无朋的蛛网中心，交通线路纵横交错，经济上的好处是决定性的。1842年6月11日，基佐法律把巴黎定为全国铁路干线的起点。法国人来来往往，通过巴黎就便利，不通过巴黎就不便利*。谁要从斯特拉斯堡到里昂去，或者从波尔多到布列斯

* 在十九世纪中叶，巴黎和外省通客车，时速四十公里。货运每公里、每吨0.12

特去,都愿意在巴黎转道。那怕只打打经济算盘。在物质上也罢,精神上也罢,全国人民都向往着首都。

交通阻塞引起不安。忽然之间又运转自如;刚加过油的机器,一下子停住了。1972年,家庭津贴管理处停止办公。七十五万津贴户,十万封信搁了起来;照单付款,拖迟了好几个月。1974年,邮政拣信中心发生故障。诸如此类……行政机关越庞大,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就越受威胁。

城市拥挤

在一块有限的地面上,无限发展老鼠群,老鼠就会变得凶狠起来。母的把窝毁掉,公的互相残杀。城市集中也会搞乱人群的生理平衡。城市拥挤带来各色各样的社会弊病:少年犯罪,成年犯罪,神经衰弱,人为乐园。巴黎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其人口密度超过任何大城市*。

今天,有如老树空心,巴黎的中心区渐渐空起来,而且正在资产阶级化。职员、工人都往郊区迁移;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都往中心区集中。巴黎失去自己最突出的优点,再也不是:市民彼此交往,社会不同阶层肩头碰肩头,大家和衷共济一道生活。

巴黎的经济跟人口一样臃肿。全国就业巴黎地区差不多占四分之一^③。每人的平均收入大致达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倍。越来越多的人住在郊区,却要赶到市中心去工作。巴黎地区每天有一千三百万人赶来赶去。首都成了硕大无朋的交通网**。

毛病太显著了,国家终于做出反应。许许多多治理计划订了

法郎。而外省和外省通车,时速只八公里。运费却上升到每吨0.20法郎。

* 平均每公顷三百人。伦敦一百三十二人。纽约二百五十四人。

** 最惨的是,郊区居民仍然拥挤在集体的楼房里。跟伦敦的郊区不一样,伦敦郊区居民几乎全都有个人住宅。

出来，煞住这个妖魔继续扩张。但是，妖魔虽然制服，而这个妖魔仍旧存在。

这个妖魔是国家集中制养出来的，反过来，妖魔又控制了国家。国家和高级行政机关，混在一起，分辨不清。国家变成了巴黎的国家。正像过去那样，国家与宫廷混淆不清，国家便变成凡尔赛的国家。

安德烈·西格弗利在一本很有趣味的社会学著作里^④，调查了一个世纪以来阔人住家的市区。这些人是财政督察员，行政法院理事，大使，学士院院士，苏伊士运河公司管理员。这些人都住在京城豪华的住宅区。从路易十八世复辟，到普恩加赉当总统，这些人从马莱区和圣日尔曼区，迁移到蒙索平原，然后再往帕西，奥德伊和纽伊迁移。1968年，治理国土代表团进行住宅登记。科技大学和行政学院的毕业生整届整届都登记上了。结论如出一辙。在法国掌握实权的人，全都集中住在几公顷的地面上。

行政学院想削弱巴黎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做到了没有呢？在正确的道路上确实走了几步，但不过几步而已。所谓文官考试，本来想把员额的半数留给出身寒微、来自外省的应试生。结果只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很多的所谓文官，不过是以前没有考取的大学生。他们转了个弯子，考上一个比较容易一些的学校。毕业的时候，等到去抢大专业和名牌部的时候，淘汰外省人和文官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了。能合乎要求的人，仿佛只能世代相传。当然，最有名望的出路，仍然大部分留给了同一阶层。从这个阶层里拔取的，尽是大企业主，高级职员，高级新闻界人士，高级银行界人士，高级医务集团和大学人士。当然，跟1945年以前比起来，已经不完全一样。那时候，这些出路是完全不容别人染指的。简而言之，既得利益集团，在法国依然存在，而且很大的程度上，全在巴黎。

十个法国人，有九个不是出生在巴黎的。但是，那十分之一出生在巴黎的人，比起其余十分之九的人来，当上大官，掌握实权的机会却多得多*。

巴黎主义

巴黎的寡头体系，也吸收外人，条件是要纳入体系，化为一体。

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有些拗性子的人，老觉得古怪，为什么三百人的情绪，胜过两千万人^⑤。今天则是几千人的情绪，胜过五千万人。五十步笑百步，进步有限。

既然一切决策都在顶峰，那末顶峰的微观气氛，对决策的影响之大，也就莫与伦比。这种气氛是一个社会阶层造成的，是一些能施加压力的集团。它们最有力量，因为它们最会隐蔽。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在身份相等的人中间建立起来，他们说同一语言，用同样的习语，爱用同样的语音语调，话说半句，便能心领神会。气味相投，说理自然中听，岂非理所当然。自从黎塞留红衣大主教当国以来，法国经历了十八次政权。不知有多少改革，多少举措，就因为遭到这个小集团的否决而终归流产。

外国观察家没有一个不觉得奇怪^⑥，怎么巴黎包办了一切领导职能，无论是在政治上，行政上，经济上或是财政上，而全国另外没有一个城市和他分享这些。这种包办还不限于此。巴黎对于全国，还实行一种思想帝国主义。

法国文化之所以巴黎化，大半是受了国家的影响。科尔伯特控制文学、艺术，正如控制工业生产一样。历代君主招揽建筑师、

* 巴黎政治学院的毕业生，去考国立行政学院，比起外省政治学院毕业生来，录取的比例要大八倍。不错，许多外省的应试人，也都到巴黎继续深造，但是，名牌学校的问题始终没变。这些学校是哺育权力的地方。差不多一半学生，都是在巴黎上学准备考试，然后录取的。

画家、雕刻家、作家，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第三共和国的历任总统，都去为沙龙画展开幕。戴高乐一心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文化部，由安德烈·马尔罗主持其事，与行政机构结为一体。乔治·蓬皮杜最恳切的雄心，乃是波堡文化中心。国家经常吸引文化，集中到自己周围，一向如此，未免古怪。

有没有其他国家会像法国那样，一个词汇问题也由政府来判断。而且政府作出的决定，在实用中起了强制作用。1966年7月，爱丽舍宫开会讨论“计算计划”，讨论计算机到底该起个什么名字。有人主张叫“程序机”，有人要叫“计算机”，有人要叫“情报机”。有人从技术着眼，要叫“程序技术”，“计算技术”或“情报技术”。最后由共和国总统核准。新名词定出以后，报纸照登。日常用语也就加以采纳。可见中央集权制力量之大。

国家的弱点

正因为政权集中在几公顷的土地上，他的弱点就是受制于行会势力的集中压力。巴黎就像一个角斗场，场子里台阶式的座席上坐满了享有特权的观众，观看激烈的权力之争。

只要北方的矿工跟矿领导发生冲突，岗城或艾纳蓬的工人罢工，危机便在圣日尔曼大街的几座古代府邸展开。这种做法之所以行得通，无非是因为很多人都能得到好处。行会有好处，因为这样比较有可能把自己的要求变成全国性的危机；中间阶层有好处，因为可以摆脱自己的责任；政府有好处，因为把决定权集中到政府一级，更能肯定政府的威权。

巴黎的势力是强大的，也是脆弱的。正因为强大，所以才脆弱。巴黎吸干了国家的元气，切断它从全国人民那里汲取生机的源泉，把国家封闭在高温而不稳定的环境里。巴黎主义挖国家的墙脚，随时可能把国家毁掉。巴黎人喜怒无常，往往一时冲动，便

把法国断送。

马克沁·杜岗叙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巴黎举行国葬礼。有人对路易·菲利普说：“皇上呀，多美啊，这些巴黎的居民！”国王叹了口气，回答说：“他们回到家里，才更美呢。”真是英明的先见。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心血来潮，巴黎人尤其如此。由于问题出在巴黎，其结果自然越发严重。

自从马扎林以后，每逢巴黎发生民变，执政诸公总是号召外省来稳住局势的。不是借他们的兵力，便是借他们的选票。就这样平定了投石党和1848年的革命，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至于那些失掉政权的人*，如果也能够依靠外省，那就大有可能保住政权。然而他们几乎想都没想。他们是巴黎主义的受害者。相反，1968年5月29日，只要戴高乐在巴登跳上直升飞机，他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巴黎。这等于路易十六逃过了瓦兰纳。当然，戴高乐不是路易十六。

比方说，王国的所有钥匙都摆在一个橱里，那末，只要打开橱门就行了。维维安^⑦在王朝复辟后曾经说道：“要掌握住全部国家力量，必定要控制住巴黎，占领京都各部衙门，掌握电报。”在中央集权制形成以前，尽管巴黎投靠了英国人，查理七世仍然可以在布尔热当法兰西国王。在集中制形成以后，只要巴黎一陷落，法国就完了**。

巴黎给了法国多大的声望啊！美中不足的是，把绝大部分的高级活动，集中到一个城市里面，会形成一种激动的气氛，有碍于深思熟虑。若不从巴黎出发，哪一个作家能够发挥影响？倘若让巴黎拉了过去，哪一个作家能够搞好他的作品？

* 路易十六，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普，欧仁妮皇后。

** 在1814,1815,1871,1940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伐尔密和马尔纳两个胜仗，拯救了法国，因为顶住了敌军进攻巴黎。

能够激动巴黎人的东西，往往引不起绝大部分法国人的任何兴趣，也许还会惹起他们讨厌。法国的京城，把整个法国变成了外省，搞得土里土气，而自己也变了个省城，谈论的事情脱离不了一两种思想。固然谈的不是副省长夫人的衣裙，但也不过是经济停止增长罢了。并不是无限夸大一件小事情的重要性，而是一个“小小的想法”忽然成了每一个人时时刻刻在盘算着的念头。说是说时时刻刻，其实不过一霎那间，来得快，忘得也快！在这个转盘似的都城，时新的东西转得可快哩，愈转愈快。

法国之所以觉得脆弱，之所以有时候觉得眼花缭乱，那是因为法国的中心是一个陀螺。

外省的贫血症

奇怪的是，整顿国家的问题一直到1962年以后，才觉得需要制定一条政策。而问题却由来已久：“巴黎和法国的荒原”，差别悬殊，愈来愈厉害。照拉末奈的说法，三百年来，中央集权制引起了“巴黎脑充血，外地到处瘫痪。”^⑧

整整一个十九世纪，外省成为沉闷厌倦的同义词。基佐叹息说：“巴黎吸干了整个法国。请问怎样才能治好这个病？病源那么复杂，而且有些是没法治的。”“什么时候巴黎才不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把全国那末多的人才引来吞没呢？”^⑨

整顿国家的努力，顶着强大的逆流搞得筋疲力竭。只要巴黎还是那样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谁能希望把这样恶劣的情况扭转过来呢？血液全往脑袋冲，肢体末端则得不到血液的灌溉。

外省的贫血，首先体现在人口问题上。三百年来，一向是外省的出生率高出巴黎很多。但是，人口外流拉平了这个差额，而且不仅拉个平，巴黎抽走的是年轻人，给外省留下的只是退休老人。

巴黎的肚子

左拉提出“巴黎的肚子”，不是偶然的。巴黎就像戈雅画的古罗马农神，张开血盆大口，吞吃自己的儿孙。必须不断地送鲜肉给他吃，还得要使菜单多样化。他不仅吃人民，还吃人才。那末多的有为青年奔进巴黎，有一些成功了，可又有多少人在那里被埋没葬送呢？多少幻想在那儿破灭？出一个拉斯蒂涅克，却要多少个吕邦普雷*？

这样一个社会能算健康的么？百分之四十的自由职业者和高级职员，百分之四十三的技术人员，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都集中在首都。在外省兴建几座大学，是一回事，而要改变风气，请教授们肯去外省，却是另外一码事了。曾经有人想把科技大学下放，结果呢，放到萨克莱高地，就在巴黎的门口。而且现在已经想打窗口里爬回来了。旧金山或者是慕尼黑的知识生活和经济生活，可以轻而易举超过华盛顿或者波恩。而在里昂或是在里尔呢，人们只想截留一点不夜城的余光残照：巴黎的人在想什么呢？讲什么呢？干什么呢？

在外省中小城市开办工业，最大的问题不在物质上，而在文化上。厂长和干部往往是这样二心不定：“把自己埋进穷乡僻壤”，孩子没法到巴黎去上好学校，妻子会闷的慌。当地只有些瞌睡沉沉的小买卖，一批公务人员，人人存着三日京兆之心，仿佛手里老提拎着一只旅行箱。工厂呢，用的劳动力都不大熟练。

当然，自从1960年中，情况起了变化。生活似乎起了微微的波澜：乐队成立了，剧团演出了，艺术家展出作品，文化宫开始向沙原输送文化。但是，巴黎帝国主义手段十分高明，这些努力长期

* 拉斯蒂涅克是巴尔扎克《高老头》一书中的主角之一。吕邦普雷是同一作家《幻灭》中的主角。头一个当外交部长。第二个身败名裂，终于自杀。——译注

觉察不出来。京都满不在乎，好像除它以外什么都不存在，好像外省终究是没有什么文化可言的。好像只有办赛会，外省才有点生气。因为巴黎和明星们宠赐光临。他们这种短暂的流放，吸引人们的注目，掀起一片喝采声。他们不能够做长期不懈的工作。外省不是他们的本乡本土嘛。

这种死亡的元素，可能传染全国，因为全国是统一的。每逢奥克西当语系、科西嘉语系、布列塔尼语系、巴斯克语系地区的人，对我们诉说他们遭受无法容忍的压迫，我们不免微微一笑。凡是过分夸张的东西，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我们也许更需要看得到，这种压迫不仅加之于上述各种语系的居民，而且差不多遍及一切外省人。要求自治，不过是地方上愤怒的语言。

压迫这个词儿是太重了吗？假如你是外省人，你有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口音，你的姿势，你的反应，可是，你得受另一个城市的影响，爱好方面的影响，风气上的影响。而你自己的东西却在那里被人瞧不起，那不是压迫是什么？上哪儿去接受“再教育”呢？仿佛倒是自己有什么缺陷似的。为的乃是别受排斥。这样怎么能让人不产生受压迫的感觉呢？瞧瞧这些沙荒，难道不是由于进步的东西一概集中到巴黎，才使法兰西全部疆土成为沙荒的吗？

民族岌岌可危

工业革命发生较早的国家，城市和乡村揉合在一起。城市并不大而无当。大镇子一个接一个。中间地带有林子，有草原。德国、瑞士、荷兰就是这样。长期赶不上时代的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中部南部，葡萄牙，农村人口外流，成了天灾人祸。整个省治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许许多多村子，只靠年迈龙钟的老人，苟延残喘。在罗才尔省，1851年有居民十四万四千七百人，1930年剩下十万人，1976年只有七万人了。你会说：罗才尔太穷了，资

源少。不见得比瑞士的格利松区差多少。然而格利松从1950到1975年,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八十。

法国害了一种四肢坏死病。空虚产生空虚。居民少了,就想减削公共服务单位。公共服务单位越少,人就越不容易呆下去。

被人遗忘了的地方,中心地带也发现坏死病。比方说克娄斯省。1851年人口二十八万七千,1975年剩了十五万,出生率在全法国最低,死亡率在全法国最高。原因是人口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当地的工资,有一半是最低工资。年轻人既怕失业,又受不了那种大家一道等死的窒息气氛,只好悄悄地离开农村。留下的人,一般都不肯成家^⑩。很少有年轻妇女甘心去过农村生活。

这种日趋衰落的省份,居民逐渐滋长异化感和被人遗弃的感觉。只要从历史、语言或者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找到某种莫名其妙的借口,引起希望,他们便死死抱住不放,他们这种绝望的挣扎,难道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吗?难道能怪罪他们吗?但愿大家别搞错了,布列塔尼跟巴斯贾一样,人们顽强地要求活下去,那儿煽起的乱事,只不过是垂死的挣扎。大陆上的人往往取笑科西嘉人说:“你们怪我们到你们岛上来殖民,其实是你们把大陆当了殖民地。”问题是,科西嘉人去大陆,并不是自愿地去找出路,而是被迫去的。他们今天要求在自己的海岛上,自由地在他们的家族社会里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种没有理性的秩序。为了维护家乡的土地不至于四分五裂,竟弄到人们进行威胁,甚至于争斗。哪怕会更加引起分崩离析也罢。

为了能使法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生存下去,该不该让外省成为不毛之地?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使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抉择:认为统一是中央权力意志的产物呢?还是不同成分同意共处的结果呢?同意国家要进步,就得无情地把自己的肢体砍掉呢?还是同意让全体成员在国家的进步中都得到好处呢?

法国人不肯作出这样的选择。而中央集权制却似乎强迫他们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种选择。这并不是全都能补救的。法兰西民族的血肉之躯，有些部位已经无可挽回地受了创伤。不过，另一种选择仍然还有可能，那就是真正地把各种责任重新分配一下。

可是，自治派愈陷愈深的做法，大有毁灭一切机会的危险。他们的做法好比一个溺水的人即将灭顶，他手脚乱动，不让救他的人把他拉上岸去。归根结蒂只有利于雅各宾式故步自封。只要他们一旦觉得威胁到国家统一，他们就为自己反对的东西作张本。就是为集中至上论添柴送炭。那些诚心诚意主张本省自治的人，也尊重国家的统一，最好能够认识到，瞎搞一气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愿他们能注意到一些大变动的预兆。

因为，不管怎样，毕竟还是出现过一些机会的。

国家自己也开始有所反应。整顿国家成了官方关切的事情，已设法把经济手段重新分配给全国各方面。巴黎不那末镇慑得住人了。统计表里已经每年出现成千的人离京赴省。有些人开始考虑到巴黎社会以外去谋生就业。自从七十年代初，安排在巴黎不一定算是高升。有人已经发现格城和斯特拉斯堡，都有数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人的觉悟能使这些苗头发展起来，能推动道德标准改变次序。这些亮光集中起来就成为黎明。

第三十三章 解体

二者从根本上不能并立，一方面是我们熟悉的国家一统制，另一方面是行使大革命给我们保障的各项权利。

普鲁东^①

1. 没有对等的力量，只有反权力

阿兰激发“公民去反对权力”，体现出非常法兰西式的作风。街坊行路人虽然没有看过阿兰写的书，但是也有这么一种说法，来表达他们的敌意。这种说法在上文已经见过，跟达尔达兰的一样，叫做他们。“他们竭尽所能，跟咱们过不去。”“他们又出了什么馊主意啦？”他们这个词儿，要看情况而定，或者也可以同时指国家，政府，议会，多数派和反对党，特别是指一切行政部门。他们者，乃决策之人也。

他们都该负责：面包贵啦而麦子太贱；生活费用上涨太快而工资涨得不够；税太重而补助太少；通货膨胀危险而稳定物价带来许多约束；葡萄酒销路不畅，就限制种葡萄；社会保险补偿不够数而又大量亏折……凡此等等都该唯他们是问。

国家与人民为敌

在人民心目中，政权这个东西，从骨子里就隐隐约约地有点凶险的意思。一辆新车子，如果是私人的，不会引人怀疑；假如坐车的人，哪怕只掌握一星半点公共权力，大家就觉得是一种偷盗公民的行为。

杜尔戈已经提醒路易十六，老百姓都愤愤不平。他说：“他们把行使权力，看做是弱肉强食的法则。他们之所以顺从，没有旁的理由，只因为没法抗拒。只要有办法，就要躲闪规避。仿佛陛下在与人民为敌。”②

成立共和国以后，这种敌对状态依然继续。总统呀，议员呀，确是选举出来的。可是，人们是不是选择了行政机关和国家呢？行政机关和国家从古就有，如此而已。官和民从来都是两个对抗着的世界。柜台上的小窗口，维持着官民之间暧昧关系。办例行公事嘛。有时候，双方中的一方面，显得傲气凌人，另一方面则搀和着敬畏和蓄愤。街坊上的人，接受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大体上宁愿一面顺从，一面发牢骚。

有一位批发酒商③，打算退休，把铺子出让给人。买主不要他存窖的味美思酒。他便准备运回家去。行政单位硬叫他先付每公升五个法郎的税。他既拿不出钱来，又找不到买主，只好把七百八十瓶美酒，都是藏了二十七年的陈酒，统统倒在河里。这种做法怎能不激起人们的怨恨！随便什么政治上的分歧，也不会结下那么深的冤仇。

在英国、荷兰、瑞士、美国，个人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它具有自愿协定的约束力。个人权利有法律明文为依据，就像产业所有权一样。有传统势力为其后盾。个人权利不是从国家那里夺过来的，而是由国家负责为之保障的。

在我们的等级制之下，个人权利是靠不住的，仿佛是单方面恩赐的，因而是可以收回成命的；又好像是用暴力从国家，或者从特权阶层那儿夺过来的，所以仍然有被用暴力夺回去的危险。

全面反对的权力

官僚统治的国家，是大革命扶保登极的，从来就不许别人对

它有所触犯,比起前任官僚统治的君主制来,毫不逊色。帝王的神权也罢,人民的神权也罢,国家反正保持着神治的性质。国家有无所不管的权力,所以也就激起全面反对的反权力。双方都奉行这么一条原则:不能全有,宁可全无。政治的和工会的“反权力”,不在于推翻这个或那个决定,而在于推翻整个制度。反对派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政权和宪法。工会主义反对的是企业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说,反对西方世界。

法国民主工联总书记和德国工联进行了一次辩论^④。后者是德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民主工联总书记说:“只要大的生产工具所有制不起变化,我们不相信企业能够民主化。”跟他对话的人却认为,一家企业可以用民主方式经营组织,尽管企业仍归资本家所有。而一家国营企业却办不到,尽管企业归国家所有。法国的工会人士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是教条所否定的。

两个等级既是平行的,又是反向的。

凡是在一个国家里,大家认为国家是在起着它该起的作用,就是说在保障着公民和国土的安全,那个国家里便不会出现“反权力”。“反权力”只能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在那里,政权的合法性似乎可以受到责难,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干涉。

有集中的权力,便有集中的“反权力”来对付它。在旧社会已经是这样。那时候,各省议会是反对凡尔赛的温床,都在巴黎议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1871年,巴黎公社派特使去里昂和马赛,招安这两个城市里自发产生的公社。这些公社试图保持自己的自由,而巴黎公社则要它们严格服从自己。在真正权力分散的制度下,政权都会就地碰上各色各样的对称力量,来加以限制。缺少这种对称的力量,必然就要产生一元化的“反权力”。

哪怕为了芝麻大小的事,也要全国反对派的首脑和全国政权

的首脑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有一位加拿大记者觉得很诧异：每逢发生社会纠纷，在法国就是没有办法去问问地方上的工会负责人。地方工会负责人总是叫你去中央工会总书记⑤。

每逢一位省长跟一位省工会书记打交道，这两位演员总是各人背一篇文章。一篇是政府写的，另一篇是工会中央写的。他俩一丝不苟地互相答对，而提词人却都在巴黎呢。

工 会 垄 断

垄断权力的欲望，自然唤起垄断“反权力”的欲望。在企业里，工会最恨厂主直接跟工人打交道，不要工会当中间人。他们所以那么害怕成立企业委员会，因为企业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是由基层选举出来的。可是他们害怕错了。因为他们常常能够控制住企业委员会。

从报纸业遇到的困难中，广大公众可以看到书业工联是多么强大。这个行业工会在战前已经大得可观。在1944年，报业的新业主们非常高兴向它求教，为的是兴办新的报纸。而书业工联的垄断地位在1939年已经有了轮廓，1944年在巴黎已占绝对的垄断地位。很多法国人听了都觉得惊讶，怎么到了1975年，任何一个印刷工人没有总工会的会员证就不能够到巴黎的报馆里去做工。工会的垄断不仅波及招工，而且控制了学徒学艺。工人力量和民主工联都不得不买总工会垄断地位的账。尽管这是显然违反劳动自由的。

我国三大工会，你争我夺，好不厉害。忽然又奇迹一般平静下来，只要有其他工会再想成立，那就三大工会一道反对，只要工人要什么其他的自由，它们也一道反对。什么自由呢？一个企业班子里任何一名成员，不管他加入了或者没有加入工会，都有自由在企业职业选举的第一轮中当候选人，在企业委员会里指定职工代

表。可是这种自由根本不存在，尽管法国四分之三的职工都没有加入工会。要当候选人，必定要在1944年登记的工会给他提名。这完全像在议会选举和市政选举中的候选人，必需有解放时期已经存在的政党，给他提名。

新的罗马党

为什么共产党，就是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葡萄牙，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拉丁国家十分强大，除非建立了军事独裁，才能逃脱它的控制呢？为什么它在这些国家竟然迷住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还是比较活跃的。可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共产党和一些法西斯活动，都只是一些民间传说的玩艺儿。这又是为什么呢？

凡是在工业社会里，向往革命的人只有找到了这样的土壤，才能够繁荣滋长，也就是那些遭受政治等级和精神等级沉重压制的地方。凡是到了早就组织分散、享有创造自由、善于适应变局的社会里，那就吃不开了。共产主义是一种“反社会”。在一个比较松动的社会里，个人活动和集体活动都能起作用，在这样一个地方能有共产主义，这是没法想像的。

罗马的典型活在共产主义里面，不过形式是消极的，外表上采取了教会的形式，根据的是圣经。它最讲究正确地解释圣经；培养的是集体纪律和服从命令，作为道德标准。对于信徒们，它搞一些外部的仪式，严密的教条和内部的安全。它既有责备，也有帮助照顾。

罗马精神一向强有力地笼罩着法国，笼罩着拉丁国家。最强大的工会，扎根最深的党，跟教会一样遵奉着同样的组织原则。罗马教会，自从那么多的世纪以来，一直广泛地教育着社会。共产党人是颠倒过来的天主教徒，是梵蒂冈第二以前的天主教徒。

多中心的社会，对待人心不满，是一发现就处理的。单中心的

社会则把人心的不满,推向造反,由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他们小心翼翼地管好堆积起来的炸药。极左分子认为,日久不用,炸药就没办法用了。共产党人则宁可管好不用。这是可能的,但是谁又能说得定呢?这件事也让法国直打寒噤。

国家在一元化的、集中的“反权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经常把那些没法把自己组织成“反权力”的人,置之度外,听其自生自灭。而这种人的命运,往往是十分凄惨的。诸如景况贫寒的老年人,或者是一些受排斥的人。没有一个反对党,没有一个工会肯来迫使国家认真关心集体的根本需要。把假期分散,制止城市无限制扩大,促进城市分散,鼓励农村增添人口,鼓励生育,反对厌恶生活,这些都可能是全国性重大问题。在权力和“反权力”的把戏中,必然剩下一些落脚货。

政府当保险丝

人民不幸,吃了中央集权国家的苦头,因而也经常想把它推翻。体现国家的那个人,从个人来说,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从来也没有人见过一位君主能像路易十六那样,关心小百姓的疾苦。这个老好人上断头台的时候,人们大叫“打倒暴君!”其实是别人作的孽,由他受罪。是不负责任的官吏,在一个半世纪的期间用成百万支针,刺痛法国广大群众,结果由他遭殃。

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集中制一直在法国孕育着革命情绪。要说选票吗,与其说是选贤任能的手段,还不如说是表达不满的方法。

帕慕斯敦勋爵曾说:“假如我想在英国搞出一场社会革命来,我只要首先实行一种像法国一向实行的中央集权制。不管在王国的哪一个角落里,只要凡事搞不好都算在政府的账上,那就会大失人心,最后什么政府也吃不消。我深信要天下太平,必定要全国各地的政务都交给绝大多数人自己管理^⑥。”

中央集权，迟早会使一切民愤都集中到政府身上。艾斯代雷尔森林失火吗？大雪堵住了南方高速公路吗？飞机空中爆炸吗？年轻人烧死在舞场里吗？都是政府的过错。政府渎职，没远见，自负，无能。

政府老发生危机，给予中央集权以最妙的口实。众人切齿的国家和必不可少的国家，二者之间妥协的产物，便是不稳定的国家。正如从复辟到第四共和国，历任政府都起一个保险丝的作用。每逢有必要就起保险丝的作用。每届政府的垮台，并不由于犯了多大的错误，而是由于集体的不满达到了高潮，国家有需要让群众出出气。出过了气，接班人的措施就可以容忍了。其实，交班人也就是为了这些措施而走清秋大路的。

只要权力集中，老自以为了不得，那就必然会出“反权力”，不起平衡作用，只起阻挠作用。只要中央政权的责任减不轻，继续当替罪羊，那末治国的艺术就只剩下这么一条：尽可能巧妙地安排一些避雷针，让主要人物，让总统不至于过早地遭到雷击。

2. 国家反对国家

在“反权力”引起瘫痪以外，再加自我毁灭，这比公民反对政权还要坏，比国家里边有国家还要坏，这是国家反对国家。

拒绝握手

1959年2月一个晚上，戴高乐去到虞尔木街师范大学。这是老规矩。总统七年任期的头一个冬天，照例要到师范大学去主持每年一次的舞会。戴高乐走向舞厅，一小群人簇拥着他*。

* 校长让·伊波里德，把我塞进了这一小群人。其余是教育部长安德烈·布洛歇，大学校长让·萨海尔，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法兰西学士院终身书记莫里斯·热纳伐。还有乔治·蓬皮杜和雷纳·布鲁耶。两个人先后担任过戴高乐将军办公厅主任，就是他们俩敦请戴高乐来校参加晚会的。

就在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把我们闹个目瞪口呆。学生们身穿晚礼服，排成圈圈，围住戴高乐，把他跟其他宾客切断。他照例伸着手向年轻人走过去。可是一只手也不伸出来和他握。学生们把手反向背后，胳膊牢牢圈住胳膊，让圈子外面的人，没法伸手进来和他握手。

我们惊慌失措地彼此瞧瞧。戴高乐只得作罢，依然不动声色地快步绕厅一周，然后引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晚会继续进行。我们问那些傲气十足的青年先驱，为什么给共和国元首来一个那末样的过不去。答复是：

“没人肯跟独裁者握手。”“这是个过去的人物。我们不跟老古董打交道。”“这是个彭富斯*。”“我们总不能让捕快、包打听在学校里横行吧？”说话的人用手指着甲冑辉煌、肃立两厢的共和国警卫军。另一个学生，用下巴做了一个很俏皮的动作，接着说：“师大抵制过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和贝当。今天抵制将军总统。”

“你是共产党吗？”

有的人回答说：“不相干。”这些人大概是共产党。

另外一些人说：“根本谈不上。莫斯科管个屁。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斯大林派，甬提。”

他们知道吗？他们的学长们都彬彬有礼地招待过两任总统，阿里奥尔和科蒂。

“当然知道。这两位，没什么可责怪的。傀儡嘛。”

“将军是师大请来的客人。不管怎样，地主之谊总是要尽的嘛。”

“我们哪，我们可没请他。也许校长请他。伙计嘛，不能不请东家呀。他不过奉命行事，自己作不了主。”

* 师范大学的口头禅。这是一位军人的名字，叫做彭富斯上尉。他在1880年代率领过学校的一个营。

“你们吗，你们也是公职人员。你们抵制国家元首，可是又作出诺言，为他效力。有赖他，你们得以享受特权，住得舒服，吃得脑满肠肥。代价呢，国家只要求你们念书，爱怎么念，就怎么念。”

他们激烈地回答说：待遇不够高(最低工资的两倍)。这乃是剥削他们，硬要他们从一生中拿出十年为国家卖力。什么国家呢？他们痛恨的国家。为什么痛恨呢？因为是一个国家。

国家职员造反

报纸对于上面那件事，含蓄得出奇。但事情本身，很能代表法国社会的某些特点：抵制政权的传统，对于警察的反感，知识界反对军国主义，潜伏期的内战，1848年革命的浪漫主义，抽象而一成不变的观念，揉合一切的思想方法，扫清过去、重建未来的雄心壮志，同时却又摆脱不开历史留下的概念。青年的特权分子，既想为国家效忠，又要造国家的反。娇生惯养的孩子，讨厌宽宏大量的恩人，正如贝利熊先生讨厌他的救命恩人。

新上任的共和国总统，头一次出场便碰上了逆理的现象：公职人员造国家元首的反，而这些人却是公认为归国家使用的人。

戴高乐将军绝口不提这个晚会。但是，我深信，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从此不再踏进法国大学的门。但是只要一去外国，便非访问一些大学不可。

这些骄横的青年，不代表一切大学，甚至不代表整个师范大学。而教学人员，尽管人数占公职人员的一半，却并不和其他公职人员完全一样。书生气十足的教育部，并不把他们摆在社会的边缘，而是把他们当做制度的尖子。他们采取的态度，往往起典范的作用。

“不负责任的”官吏

人脑是感觉的中枢，本身却并没有感觉。脑肿瘤不用麻醉，就可以动手术，病人毫不觉得疼痛。国家是全国感觉的中枢，却不受全国其他部门的约束。官吏造国家的反，什么也不用害怕，他们自己就是国家嘛。国家宪法保护着他们。他们可以不买账，而不冒任何风险。

他们做得好，做得坏，结果对他们来说都一样。他们卖气力，就会让人家骂他们假积极。没有再恶毒的话了。如果工作拖拖拉拉，陈陈相因，上级却差不多是没有法子加以制裁的。行政机关固然有所谓效率奖金，但在工会的压力下，只好不分勤惰，一律均摊。

农民有时候生气。他们说：“你们瞧见过没有，这些法国电力公司的小伙子？一根电线掉在地上，他们就来那么五六个人，坐的是卡车。其中一个人爬上杆子……其余的人坐在路边上打牌。何必拘束呢？反正是咱们掏腰包！嘿嘿！要是在咱们农庄，能这样干活！”大概是农民光了火，有点儿夸张罢……

难道我没瞧见？多少次，为了拍两三分钟的电视节目，要我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机关大院里，开来一辆好大的卡车，一个十四个人的技术队伍。原来是行政部门和强大无比的工会订了契约，把组织这样队伍正常化了。每一位队员，一举一动，都是自己作主。谁要把队员人数减成十三位，那就会引起总罢工。

相反，如果去叫外国电视台，或者叫环城区电视台，顶多顶多来那么三个人，摄影师兼开汽车，照明师录音，记者铺电线。没有化妆师。

就这样滋长了“官患”。儒勒·西门早就在公民的性格里指出了它的后果：“公德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公德心，便没有自由。可是，公德心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是树立不起来的。十二个公民里

有一个官*，一个官少爷，三四个候补官^⑦。”在儒勒·西门以后，“官患”日亟，国家雇用人员已经到了四百万人^⑧。

国家部门的反国家主义

为什么工会在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做法大不一样？而工会是同一个工会，守则是同样一些守则。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搞清楚这种玩弄力量的把戏。

在私营部门，争吵再厉害，解决起来，通常都很快当。任何企业没法生产得少，而销售得多，借贷得多，而偿还得少，分得多，赚得少。供求法则使得资方和工会，都不得不乖乖地遵从现实的原则。

在国营部门，人人都明白，厂子关不了门。不管怎么样亏折蚀本，不是有国家预算在那儿“塞无底洞”吗？工人不会开除，也不会因为停产而没班可上。罢工的日子，也没人记得要照扣工资。罢工变了带工资休假。国营企业的领导，不会觉得自己的前途成什么问题。他们实际上有把握不会开缺，开了缺也不会吃亏，新缺决不能比旧缺差，起码完全相等。衙门经济用自己那些安定人心的规矩，代替了铁面无私的市场经济法则。衙门经济保护自己人，哪怕叫买主吃亏。市场经济则先买主，后职工。在国营部门，尤其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时候，工人提出要求是不会碰钉子的。

这样又出了荒唐事。在工人的观念中，国家天生是无私的，东家则天生是“唯利是图的”。然而，社会斗争最激烈的不是对付资本家，而是对付国家。大规模的社会危机**，老是在国营部门爆

* 儒勒·西门到了今天，可能会说，六个有劳动力的人口里，就有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官患加倍了。

** 1936年5月国防工厂罢工。1947年12月煤矿工人罢工。1953年邮政铁路工人罢工。1960年德卡兹维尔矿工罢工。1961年海军制造局罢工。1963年北方和洛林矿工罢工。1968年5月工人部分占领雷诺和萨飞穆工厂。

发的。

国营部门抵抗“反权力”的力量最为薄弱。弱则启人覬覦之心。国家的权力本来应该在这儿表现得最为强大，而实际上却比哪儿都弱。每逢总工会给国营铁路公司一下子，给国营煤矿一下子，政府受到的打击远胜于共产党议员在议会里提出一个弹劾案。国家一元化，最有利于传染蔓延。法国儒安工厂发生一次强力罢工，连在本集团里都没有蔓延开来，而这个厂子却是财团里的一个子公司。相反，行政部门和国营企业却好比一片草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脚踏两只船

法国就这样挣扎在两种相反的体系之中：一方面是官僚体系，另一方面是自由体系。由于有了官僚体系，自由体系便吃不开；由于有了自由体系，官僚体系也受到抵制限制。

无政府主义者倒让他们说对了：没有一个社会不压制个人，不镇压个人。可是，惟独法国来得异样。国家对待自己所用的人员，决不肯施加任何约束。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有化是有附带条件的：禁止罢工，一党控制工会，制裁完不成任务的工人，表扬积极肯干的工人，经常的思想工作，控制消息，无处不在的密探。这样的制度是合乎逻辑的。自由制度也是合乎逻辑的：尊重消费者的意旨，铁面无私的供求法则非让这样做不可，禁止一切限制性的措施，平等竞赛，以成败定论，无可申诉。

在我国则恰恰相反。整个组织建立在互相矛盾的原则上面。理论上是专制的，实际上并没有实权。发号施令在于等级制，但又为行会制所抵消。享受自由而不负责任。只有权利，并无义务。就职和退休绝对安全，既无制裁，又无义务。是不是总有一天，我们

得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到底压力该来自上面呢？还是压力该来自事实呢？

思想停滞，到了奇妙的程度。不管你局势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样的现象依然代代相传，循环不息*。从前，官是可以捐的。今天，考试考上了，便能做官。结果都是一样的：先是，官官都捧铁饭碗，然后成立国中之国，最后来个国反国。

行政法院一直在加强行政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但是，公职人员的自由、独立和安全，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还能跟最起码的纪律并行不悖吗？为了力图公职的安全，难道不会反而削弱公职吗？公职人员冒的险，不在于随声附和在本行里面反对派的压力集团，而在于反对他们的口号。“反权力”采用隐蔽的恐怖主义，比国家的制裁不知可怕多少倍了！

奇怪的是，只有极小一部分公职人员滥用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仍然兢兢业业，廉洁奉公。

中央集权如江河日下

官僚体制的诞生，有着两个因素。后来二者不可兼得，这个体制便运转不灵了。

头一个因素是战争，不然就是战祸日亟。整整三百五十年，从1620年到1970年，法国从来也没有十年不打仗的。内战也好，国际战争也好，殖民地战争也好，或者敌军入侵，占领了部分国土。倘若十年以内确保和平，是否可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了呢**？

第二个因素是对等级制的普遍尊崇。法国的群众，一向遵从

* 公职人员享有行会的严密保护。若要对个人采取任何例外措施，竟非得立出一条法律来不可。1975年，为了一位在罗马音乐比赛会上得过第一大奖的人，能当共和国警卫军的乐队指挥，而他却不是军人，于是非得为此而制定了一条专门法律。

** 今天，和平的前景确实存在。这是亨利四世以后头一次。

威权的原则，对于国家和老板的框框，遵循不逾，认为国家和老板的权力都出于天授。因此，自愿把自己禁闭在官僚体制里面。而现在呢，他们已越来越不愿意了。

从前有那末一段时期，报效国家如同宗教一般。尊重法律是理所当然。公务人员上班迟到，是件大事情。现在看起来，真是过了时啦！

出路在专政呢，还是在自由化？

官僚体制的远距离操纵，为害太大，修修补补，顶不了事。而国家呢，谁都得听它的，这样得以保障秩序。可是，它却在自己的内部放任闹独立性，变成出乱子的根源。现在离做出抉择的时刻，已经不远。

人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专制的政体，一个公开的国家经济，十分和谐地配合现行的行政集中制。问题是必须接受那些在别处已经显露过的种种后果：消灭一切政权所掌握不住的工会，中断个人权利，坚决镇压，大搞政治警察。

1968年6月，戴高乐将军曾对我说道^⑨：“痼疾乃在公共部门的心脏里。我们给他们罢工的权利，是错误的。是不合逻辑的。但在私营部门，罢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有力量对付资方。否则，劳方是没有办法对资方进行自卫的。双方之间须要平衡。可是，在公共部门，国家的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国家。工人占领私营工厂，本来就是在自己的家里嘛。国家雇用的人员，占领公共场所，可不在自己的家里。当然，已经把罢工权给了他们，现在再来收回，未免迟了一步。但是，仍然有必要想方设法，摆脱这个困境。本来应该效忠于国家的人，成了对国家威胁最大的人，此风终不可长吧？”

我看，他应该再添这么一句：最不威胁国家的人，也就是为数

仍然最多的人，却受国家管得最紧。

倘若法国真想摆脱当前那种矛盾百出的局面，又不愿意投入那种没有矛盾的独裁制度，那末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便是合情合理的自由制度。必定要使全国人民，首先使统治阶级承认：没有责任，便没有自由；没有义务，便没有权利；没有取信之道，便没有信任。

第三十四章 平衡失调

尽管这个社会造得东倒西歪,至少那政治制度总该扎根比较牢靠罢?

能肯定吗?自从1958年以来,我们好像逃脱了这么一个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危局:不是独裁就是无能。这又能维持多久呢?

有一天,戴高乐将军埋怨了我一顿,因为我佩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制度,简直五体投地。他说:

“我们的制度是西方最好的。无论在英、美,或是在西德,它们的政府,都不具备我们那样的可能性:行动的连续性。这个优点是非同小可的!我们的稳定性,比得上那些全能极权的国家。而人民投票次数之多,是空前的。”

第六共和国

安德烈·马尔罗在1971年,对我讲过近似的话。但是,对于这个奇迹似的制度,到底能维持多久,他却表示多么担心。

他说:“我们的国家稳定,不亚于独裁制度,可是多出来一个民主。这是雅典的福气,因为出了一个培里克利。当年的光辉,一直照耀到我们。这时候,一位本领高强的人,跟民主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扶植了民主,而不加以压倒。他维护了民主,而不玩弄。后来雅典人奉承了哗众取宠之辈,那便完事大吉,斯巴达人坐了江山。今天,咱们的培里克利,已经与世长辞……”

这种悲观情绪是相当普遍的。乔治·蓬皮杜当上了总统,后来由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接了他的班,报纸上都说:“第六

共和国开始啦。”可是，任何深刻的变革，也没有发生。表面上也没有，实践中更没有。这个新名称没有理由存在*。1962年10月的全民表决，恰好防止了第五共和国沦为它缔造者的天下。爱丽舍总统府变成一切体系的吸力中心。人的风格，因人而变。制度却一直没变。

第六共和国固然没有开始，第五共和国却有歪曲变形的倾向。

总统制的诱惑力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开了汽车送我回巴黎。我们俩刚在柯龙贝，到戴高乐坟上行礼。他对我说：

“将军在世的时候，谁也不大去想这些制度到底运用得怎么样。大树底下好乘凉嘛。他去世以后，就得把各种力量都平衡一下，分清主管，加强政府与总理的权限，也就得加强议会的权限。可是，他的继承人却没有那末办。他们在坡上一直往反面滑，连脚都停不住，越来越把一切都拉归自己。他们越来越以总理自居，而不是以总统自居。有人把这个叫做政权总统化。然而，一位总统想有一天算一天地决定一切，那是跟法国人的作风不相适宜的。”

总统制有诱惑力。很多人对此向往，却不知道美国的总统制跟咱们的全不一样。在美国，总统和国会，彼此是独立的，可以彼此有异同，不会惹起真正的危机。因为国民的脾性，总是倾向妥协的。也因为，谁也不想让宪法和社会的基础出问题。在法国，咱们有宗教战争的传统。反对派里面，有一批人不肯运用宪法，不承认当前的社会要把局势推向极端。各种冲突都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便可能引起政权的危机。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

* 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起什么大变化。没法跟1877—1879年^①的危机相比拟。那时候的危机使第三共和国起了大变动。在麦克·马洪以后，第三共和国是应该改名的。在戴高乐以后，第五共和国却不必改名。

而且，特别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几乎一切行政以及立法的主要部分，都属于五十个州，作为中央权力的对称力量，不让中央权力到处泛滥。总统能够全权处理的，只紧紧地限于联邦主权这一狭窄的范围以内。如果我们想模仿美国的总统制，首先得把统一的法国变成各省自治的联邦政体。总统制不受联邦制的局限，这种事倒并不是没有，不过只有在拉丁美洲才瞧得见。政治制度，好比大学制度，我们自以为学了美国，其实是学了拉丁美洲。只是来点规章制度，是改不了拉丁国家根本的……

里程碑一个个抛向后面。过了巴瓦森林，勃利地方的丘陵起伏，比较悦目赏心。我们的论点彼此交叉，弄到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哪一个明确指出了我们共同信念的成分。接着，谁也不吭声了。就是在这样的時候，大家都觉得，基本观点已经趋于一致。

总统的使命是当霞飞

普选代替了兰斯城国王加冕用的圣油。制度的精神，要求总统担当起经国大计。总统不是象征性地体现，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和连续性。作为军队的统帅，最高级的威慑武器由他一人掌握；公民的生命由他支配。他手里还有一份权力，向来是谁都不讲的，却是一份根本性的权力，可以叫做弥缝权力。公共权力之所以能够打成一片，靠的就是这个弥缝权力。

从时间上来讲，比方说，总统在位，而部长们遭到国会弹劾，只要新的选举还没有让他任命新的政府，总统的使命就在于继续保持留任部长们的合法性，这样就不至于出现政权落空的灾祸。政府交替的时候，由他保持前后任之间的连续性。而一位新上任的部长，很容易想跟自己的前任搞得大相径庭。厉害一些的，甚至要一反所谓“我的前任乃是无能之辈……我的后任只会搞小动作……”

就空间而言，总统的使命在于弥补政权的缺陷。我们这个世界，瞬息千变，很可能出现这么一种情况：要求一种新的权力来应付一种新的需要。必须克服那种划地为牢的现象，重新让大家通气。这就是该由总统操心的。

最要紧的是，总统能够而且必需在情况要求的时候，担当起最重大的责任。在疑云阵阵、人心惶惶的时候，人们的眼光应该转向谁呢？应该转向他。他当选总统，并不只体现出一党一派的意愿；他应该代表的，不是他原来的那个政治运动，而是公民们要求作为整个民族在一起生活的意志。

若要谈，总统最基本的任务是让人有地方去申诉，那末，谁也比不上第五共和国的缔造人，比不上他那样对此深信不疑。在全国性的争议中，可以向他申诉。前提是，他能得到人民的衷心信任。同时，还得要他通常都能把自己放在纷争之上。在大难临头时，可以去向他申诉。

戴高乐在德·格拉斯巡洋舰甲板上对我说^②：“历史嘱咐我们，叫我们维护这个职位。我国人民有作鸟兽散的危险。法国人每逢多事之秋，资产阶级领头，一心只想脱身事外。他们彼此都不相信。1870年9月，1914年8月，1940年6月，都是如此。刚挨了一下子就动摇。事前却叫得好不响亮：敌人敢来，不够一口。真是又胆小，又爱吹牛，除非把他们好好地管起来。可是，他们不能老有个霞飞将军，来把他们在马纳河边组织起来嘛……反正，如果上帝保佑，今后有个人来，带领他们那么办。这大概是我送给他们的主要礼物。共和国总统由他们选举出来，目的就在当他们的霞飞。”

从两极化到两个法国

每一次选举，都产生一个多数派，一个少数派。每一次竞选，都

分胜负。这是民主法则。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只要咱们自己不当这种区分的俘虏。只要选举揭晓，少数派不以退居局外自居，并且承认当选的总统，的确是全体的代表。然而，层次混淆，感染了整个制度。总统选举分层次，正如在其他选举中一样，不管是立法选举，乡区选举，市政选举，甚至工会选举。这种层次，回过头来，更加严重地把它那种无情的逻辑带进了一切体制和集体。它用阶级斗争来加剧党派斗争。结果便是我们国家历来的恶梦：不共戴天的两派对立。两个集团的力量，几乎不分高低，各自拚命想把自己变成铁板一块。两个宗派主义，彼此排斥，形成国内的冷战。

我不相信有人能够制止这种内战，只要还有人顽固地讲什么总统的多数派，把总统当做多数派的头头，并且死也要在一切选举中，保持获得多数。只要一次民意测验，或是一次选举，显示出民意起了变化，马上多数派便变为总统的少数派。马上国家——通过它的元首——便失掉了合法性。本来嘛，总统从他当选的那一天起，就应该是大家可以去申诉的地方。从他当选的第二天起，就不该再有什么总统的多数派。既然我国实行的是议会制，那就应该有一个议会多数。多数的成员就该支持政府，无论如何不该弹劾政府。情况那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议会多数的当然领导人，就是总理嘛。如果，总统以多数派的领袖和政府的领袖自居，那末总理就只能以多数派联盟里面一个党的领袖自居。这样一来，总统和总理都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国家元首如果体现的是分裂，那末，他就实际上起分裂的作用。他怎么能够既当打官司的一方，同时又当裁判官呢？

乔治·蓬皮杜已经感觉到，总统经不住为期七年的行政重负。所以他提议把任期缩短两年。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来解决，可以减轻工作量，不必缩短任期。任期长了，可以保证

稳定。

问题是，这样有利于反对派把共和国总统降为多数派的头头，削弱总统一职的庄重性和严肃性。只要他有隙可乘，就可以攻击他的作为，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总统面对着在野党的猛烈攻击，需要亲自鸣鼓，召集部下……潜伏着的内战，便以战养战。

保 留 区

1959年11月初，保卫新共和联盟在波尔多开会，雅克·沙邦·戴尔马弄得全场大哗。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保留区”的概念。他说，戴高乐要为自己保留一个亲自活动的领域，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

其实，大多数议员，都想让“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论点占上风。沙邦则敦劝他们信赖自己的启发人。他去劝告本党的积极分子，让他们为自己的积极性找条出路；他并没有去劝告议员们限制他们的权限。

这样去解释宪法，有人说是他出的主意，那是不对的。不过，这样解释宪法是否不够明智呢？因为，这样一来，总统就不会到日常的行政部门去行使他的权力了。

除非在罕有的特殊情况下，戴高乐将军在整整十年内，一直主张把自己的精力严格用于最高的领域，即有关国家前途的根本大计。每逢我们去找他，谈论我们各部制订的计划，他都细心倾听，但是通常他都避免表态。

这是尊重别人的责任，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恰恰相反，凡是最重要的案件，他都要求由他担负全部责任。但是，其余一切，则让各部部长去负责。他经常说：“需要一个共和国总统，也需要一个总理。”

有一次，在1972年10月里，我冒昧向乔治·蓬皮杜指出，照

在我看来,他过于过问细节。他有点激动地回答说:“一位总统,离开了日常政治,就会失掉联系,就会脱离实际,他就不是主人了。我不当昏君,把权柄送给掖庭令。你还记得吗?1940年勒布伦面对崩溃;1958年5月,科蒂号召军队听命政府。谁也没有听他们的。如果一位总统,要在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候,有人听他的话,他就得让人养成听他话的习惯。”

我总觉得不一定。总统是全体法国人选举出来的。他的权力并不在于亲自处理日常事务,而在于不裹进纷争,超然掌握国运。即便在第三共和国,在1914年欧战以前,也曾经有过一种“保留区”。每当一位内阁阁员在内阁会议上冒昧提出有关外交政策的问题,艾密尔·贡伯照例都打断他的话说:“让共和国总统先生和外交部长先生去处理这个问题吧。”*

当然,这样来比方,不一定恰当。问题在于不让外交大计受议会里心血来潮的影响。长远和眼前,总得有所区别嘛。这是本能地针对不稳定、出于自卫的反应。这个用心,目前仍然是当务之急。

不知节力,自贻伊戚

有千百条好理由,让总统越来越到处插手。他之所以当选,难道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强吗?他所处的地位,让他看得远,威望高。因此,他作出的决定,比较有可能是最适当的。反正是贯彻得最好的。总理,部长,高级官员,都争取总统的赞同,因为他有任期长的优点。逐渐逐渐,事无巨细,全都找他,成了习惯。同时,戴高乐可以以历史人物自居,因为他本来是历史人物嘛。他的接班人可不具备这么一项条件。而且,在他那个时期,总统的确担负着大

* “法俄同盟”,“英法协商”,“三国协商”,在1914年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三个条约是由三个人搞成功的。一位是鲁贝。一位是戴尔卡赛,他任外交部长达七年之久,基本上与总统的任期相同。一位是驻英大使保尔·冈彭。

力神赫居礼的工作：建设新的共和国，争取独立，让原来的属地也得到独立，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后，总统的作用就比较平凡一些。最后，总统选举，似乎在国家元首的对面指定了一个在野党的领袖，可是赌注实在太大，总统再也不敢责成总理一个人去跟这么强大的对手进行较量。

在我看来，这些好理由，都不过是些假理由。也许处于等级最高层的人，可以少犯错误，可是不犯则已，一犯便贻患无穷，并且难以挽回。不如给下级以犯错误的权利，避免上级表态。其实，人们对于上级的期待，是要他不偏不倚，不要让上级多犯错误。因为人们是期待上级不犯错误的。至于在野党的领袖呢，把他放在总统的同一高度，等于把他培植成惊人的“反权力”。

积极的裁判员

乔治·蓬皮杜在1963年3月矿工大罢工的时候，深受刺激。我当时是情报部长，就在他身边度过这一场危机。那时候，戴高乐急于插手。他完全负起了征用的责任。好不精采！公报刊载了征发令，在签名的前面，加上一条“签于柯龙贝”。

这一个难受的月份度过以后，让·斯多采尔*跑来瞧我。他从来没有拜访过一位部长。这一次是民意测验的结果，叫他放弃一下他一向所持的保留态度。根据民意测验，国家元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陡然下降到空前的程度。仅仅几个星期，他的民心指数，从百分之六十四跌到百分之四十二**。这个现象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呢？是不是因为戴高乐哄动一时地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

* 斯多采尔是巴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法国舆论调查所所长。这个学院是他在大战以前成立的。

** 1963年1月22日，一百个人里有六十四个答称满意。1963年3月22日，只剩了四十二个人满意。

呢？事情是在1月里发生的。会不会是因为那件行刺未遂的案子呢？有人想用望远镜瞄准的枪，在军官学校行刺戴高乐。真是千钧一发。这件事说明了，危机时期还没有过去。此外，会不会是因为矿工罢工呢？这位社会学家心里老在捉摸。

到了星期六，我问了三十来个选民。他们都挤在我的来访接待室里。我问道：“怎么啦？什么事不对头啦？”没有一个人提起给英国人吃闭门羹的事，也没人提行刺未遂的事。大部分人连听都没有听说。大家都指责征用矿工。他们觉得戴高乐失了身份。他跟“资本家”和“快手包打听”合伙对付工人。而在群众下意识里，最受人尊重的工人正是矿工。这下子，他不再是除暴安良的好汉了。一直等到1965年6月，就是说，过了二十七个月，他的威信才回升到百分之六十四。

这一经历，很清楚地显示出，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必须成为统一的象征。总理可以跟工会对立，如果他觉得有必要那么做的话。国家元首可不行。他跟第三第四共和国总统不一样。他们是消极的裁判员，只管数谁赢一下，谁输一下。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却是积极的裁判员，裁判一切他愿意受理的事情。然而，他本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都敦促他只能受理非由他受理不可的事情。

总统掌握大权是件好事情，受了迷惑而在并非真正必要的时候去用他的权，那却是坏事情。因为，这样就有大权旁落的危险。

公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责任不能混淆。选总统不是让他来规定牛奶的价格，任命科级干部，而是要他为公民们保持国家民族的真面目。

宪法二读

我们在乡村小步。温暖的冬日照着米歇尔·德勃雷和我。他对我说：

“宪法有两种读法*。第一读，总统固守在国家主权的范围以内，凡不是根本性的事情，都让政府去办。第二读，总统以总理自居，全体部长的日常工作，都听他指挥。总理不过成了他的首席部长，他在议会的代言人。”德勃雷补充说：“在戴高乐将军时，对我是实行了第一种想法的。后来蓬皮杜上台，也是这样。蓬皮杜当总理的初期，和以后顾夫当总理的初期，采取的是第二种想法。等到蓬皮杜当了总统，沙邦当了总理，开头仍然使用第一种办法。后来，第二种办法占了上风。梅斯梅尔当了总理，便变本加厉……第一种方式，比较健康，应该属普通法的范畴。只有在国内外形势逼人的时候，才去向第二种办法求救。”

配偶问题

总统、总理，既应该成双成对，又应该各有千秋。这是事物本身决定的。他们的共同生涯从来不是平安无事的。

这个共同生涯，有着 1877 年 5 月 16 日创伤的痕迹**。麦克·马洪要求儒勒·西门辞职。内阁到底听谁的？听总统和议会呢？还是只听议会？后来证明，只听议会。举行了立法选举以后，特别是参议院改选以后，麦克·马洪不得不像甘贝大预见到的那样，先服从再辞职。儒勒·格雷维接了他的任，他却是前后一贯，始终不渝的***。他自动放弃行使他的大部分职权。卡西米尔·贝利埃和密勒朗，都想恢复旧制，但都徒劳无功。直到 1958 年为止，总统只算一个名誉职。他跟内阁总理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的危险。

有没有旁的办法摆脱历史遗留的重荷呢？完全可以下个决心

* 宪法二读的学说，创自行政法院参议贾诺③。

** 梯亥尔兼任总统和总理。其后，麦克·马洪把两种职位分开了。但是他把总理叫做他的“办公厅主任”。他先娶居弗尔，后要儒勒·西门，照他的意旨行事。

*** 他曾在 1848 年反对设立共和国总统。

把两个职位分开，总统和总理各司其职。总理不要以总统自居。他应该满足于赢得议会和舆论的同意，去推行总统的大政方针。总统呢，也不要把自己降到总理的地位，而让总理去领导多数派，并协调各部部长的工作。只要双方各自保持距离，那就是为法国当了好勤务员。

自然啰，把距离变成切片，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戴高乐对此十分敏感。1965年10月，他有一天对我说：“咱们的宪法有一个缺陷。万一总理在一件舆论所关切的问题上跟总统决裂，同时又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总统就会陷于瘫痪。这乃是铠甲的隙缝。”

他想出了一条预防的办法。1967年4月，蓬皮杜有点忧心忡忡，他偷偷对我说：“我不知道我的总理还当多久。将军那末样怀疑我，竟至于叫我写一份辞呈给他，由他随时签发*”。

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叫人扫兴，认为应该在宪法中补充一条，以便避免。另外一些人则主张，让宪法保持它那种不可捉摸的性质，这样对于它的灵活性有好处。

必要而又难搞的轮换制

不过，如果议会选举否定了总统选举，这样的结合还有可能吗？只要遵守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

总统轮流引用两种相反的观念，那是不太可能的。他有了自己的议会多数，有了自己的政府，他就可以亲自执政。如果政府是由他的主要对手们组成的，那末他尽管当他的总统，其实还是个局外人。相反，如果他跟自己人在一起，能够不管细节，那末跟对手们

* 我不知道这个要求是什么时候向他提出来的，是他再度当总理的几天以前呢，还是早在1966年1月？反正他是有点伤心的。他两次当总理（1962年4月和12月），在他以前，米歇尔·德勃雷当总理，在他以后，顾夫·德姆维尔当总理，都没有先写辞呈。请米歇尔·若贝尔原谅我，跟他写的有出入④。

在一起,仍然可以由自己来管大政方针。当然,假如对手们来势凶凶,那么任何折衷办法都行不通了,危机就会没法避免,那只好向这个最高的裁判去申诉,请人民来裁决了。然而,尽管议会多数倒了一个个儿,选票的差数却并不太大,那末,总统也许可以要求来一个妥协,指定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总理,同时在新进议会的实力派里面,掌握一些有好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是颇有先例的。例如“国民联盟”** ,或者“大联合”***。

这样的制度,有时候会有人责备它妨碍民主轮换制,他们主张实行两种方式不同的轮换。一种是在总统选举时,进行大轮换;一种是在总统七年任期内,趁议会选举的机会,进行小轮换。总统一旦发现原来的多数变成微弱的少数,他可以任命一位总理,替他设法重新拼凑新的多数。

但是,轮换制怎么能够太平平地运转呢?假如,共和国总统彻底投身进去,往往会弄得跟政府合为一体。“总统化”是不会加强政权的,只会使政权趋于脆弱,因为它使政权失掉灵活性。

然而,轮换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能使反对派不至于坚持僵硬过激的态度,不至陷入空想的乌托邦,而我国的民族性,就是有点喜欢这一套。有时候,政治人物一进政府,便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哈罗德·威尔逊在执政以前,声称反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反对再搞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决定放弃英国的核打击力量。一旦到了唐宁街首相府,他就采取了他原来抨击的立场。谁都知道一些类似的例子。在法国也是一样。没有掌权,不妨做做美梦,一掌了权就不行了。也不能够再让别人做美梦了。

* 蓬皮杜把这样的人叫做“当时的埃加·富尔”。

** 就像戴高乐将军在1944和1946年之间实行过的那样,把共产党请进政府。

*** 有如联邦德国,在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实行过的那样。普选表态不够清楚,只好由两大党一道组织政府。

铁打江山,也是不行的。老在朝,老在野,都会脱离现实,会昧于日常的真情实况。因为只要一脚踏到街上,别人就会认识他。聊天不行啦,买点零碎东西,逛逛马路,都不行啦。轿车里一坐,跳下车来就开会。老在场面上混,混来混去便习以为常。时间久了便与世隔绝。世界的形象,越来越跟不上现实。自己的毅力也就逐渐衰退。

只有和平轮换制,能够扩大人民的一致同意。否则,法国终究是脆弱的。可是,毕竟还要有最低限度的人民同意,多数派才会跟少数派在根本问题上有所协议,诸如尊重宪法,尊重体制,尊重法律;对“超级大国”保持独立;以威慑力量支持国防,而这个威慑力量必需永远保持先进;维护市场经济和私人的主动积极性。总之,必须接受政权和社会的根本方针……

让议会的职能起作用

另有一种情况,使总统的行动胶着在日常公事之中。这就是因为,他以政府为职业之外,还以议会为职业。

执行机关有施加压力的手段。立法机关也有施加压力的手段。可是二者多么不同!议会手里的武器,不是太厉害,便是不顶事。来一个弹劾案罢,既毁了政府,也毁了议会。要不,就只是些书面质问,口头质问,形式而已,既过了时,又起不了什么作用。

行政机关恰恰相反,手里有日常可用的有效办法,能把议会多数搞得束手无策。不接受修正案,便能抵制表决。引用宪法第四十条*,是在财政上把议会的创议送上断头台。规定有优先权的议程,几乎等于把议员的建议权扼杀掉。

议会一届接一届地开着,人人都觉得这部议会机器已经多么

* 宪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议员创议增添新的开支。

运转不灵。一位当届主席，高踞在波旁宫的讲坛之上，含愁微笑说道：“这出戏非但观众看来没劲，连演员都觉得没味道。换一份海报罢^⑤。”参议院议长大声疾呼^⑥：“可笑、无聊简直到了极点。”国民议会议长，还来个锦上添花^⑦。

要说“可笑”，确实可笑，一年十二个月，倒有六个半月没有议会。例会开幕，会有一个“技术上的空隙时期”。例会尾声往往忙得不可开交。立法者只能用几个小时来研究审查一条法律，而这条法律的实施条例，却平均要花政府官员们三年的时间。于是，议会成了登记室，真的立法职能，只好由委员会去行使。

当然，更令人悲叹的是，还有另外一项议会的职能几乎已归废弃，这就是监督执行机关的职能。议会根本没法监督。如果要它实行监督，非得先给它广泛的调查手段；还得要各部部长不再千方百计给本部门“打掩护”，而是鼓励议会去从事这项根本性的使命，正如英国人所做的那样。

从基层搞平衡

人民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在一定时间内，重新给了法国以一致性和力量。若要这种好事造福久长，那就要国家趁这股东风，把责任分散，在基层实行民主，正如在顶峰所做的那样。

如果下不了决心，或者是要下决心而办不到，那就仍将是人民群众的直接选举，搞垮总统权力。因为是他集中了全国的怨愤。他既然没有能够把反对派和提要求的人推给次一级的合法而又负责的权力机关，那末，他在命里就注定了总有一天会让心怀不满的人跟老觉得吃了亏的人联合起来，把自己打倒。好比一棵橡树屹立在山峰上，免不了要遭雷击，宪法给他的职权也将同归于尽，法兰西则跟它的一部灾难史，重结不解之缘。最后一个国家方案，就会在十七个国家方案以后，列入流产方案的单子。

挂在屋顶上的房子

经过每一次失败，人们仍然死抓住一个制度不肯放手。而这个制度本身，就是非动摇倾侧不可的。奥迪隆·巴罗*自己问：“难道我们永远就学那样的建筑师吗？这帮人造房子，一次又一次的只管造，连造二十次，每一次都是一造好就垮**。原因呢，只有一个，屋顶太重，没有任何坚实的房基。而他们却顽固不化地一再兴建，死也不肯改变原来的计划，继续不断地在建筑中犯同样的毛病。”

今后，坚实的房基已经有了，总统依靠的乃是磐石般的普选。但是，屋顶依然太重。木结构和全部房身，都挂在屋顶上。只要地基稍为下沉，整所房子便会倒坍。但愿那地板能够靠自己站住脚。

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末期，必须在公民和公共权力之间，找出一种新的平衡来。工程是浩大的。在一点上有了进展，别处也会有进展。在一条战线上遭到挫折，也会牵动大局，后果可怕。

只要能够限制中央权力的职能，限制它直接行动，放宽和加强个人和团体的自发积极性，就能够巩固国家的基础。就能够不让屋顶坍下来。到那时候，也只有到了那时候，社会的建筑才经得住狂风暴雨的侵袭。

* 1847年创始“筵席运动”。1848年12月到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

** 这种意见，在当时是对的，到了今天，依然是对的。天授的王权，只三个星期便土崩瓦解。那是从1789年7月14日到8月4日。立宪的王权，只有1792年8月10日一整天。罗伯斯庇尔专政只要热月9日一天。执政府只雾月18日几个小时。1814年3月的帝国皇朝只有几天。1815年3月大宪章授命的王权，也不过短短几天。1815年6月19日的百日政变才二十四小时。1830年7月宪章王朝还不到三天。1848年2月的立宪王朝只有两天。1851年12月2日的第二共和国一天。第二帝国三个小时，1870年9月4日。第三共和国一天，1940年7月10日。维希政权几天，1944年8月中旬。第四共和国三个星期，1958年3月13日到6月1日。至于第五共和国呢，差点儿在1968年5月27日以后的三天里一扫而光，幸而5月30日戴高乐大声疾呼，才死里“逃生”。但已是千钧一发了。

第五部

论精神结构的病症：故步自封的痉挛症

好处从外面硬送进来，必然变成绝顶的坏事。对一个国家来说，便是昏昏沉沉，庸俗的唯物论，舆论销声匿迹，官吏无能。在此辈统治之下，人们一无所知，亦复一无所爱……行政衙门毁灭了灵魂的弹力。

艾尔纳斯·勒南^①

这就是人类自由的秘密，
我们政府的秘密，对它和对它的自由，
我太支持它，它便得不到解放，
我支持它不够，它就垮台……

……神秘的园林，奇妙的园林，
法兰西灵魂极痛苦的园林。

查理·贝奇^②

第三十五章 明镜廊

约纳丹的鹌鹑呀，
清早下了一个白蛋蛋；
蛋里钻出一只小鹌鹑，
长得跟它一模一样。

这头小鹌鹑
也下了个白蛋蛋，
蛋里不免也钻出
一个鹌鹑下蛋蛋。

这样可以一直搞下去，
倘若不先拿来做法蛋^①。

罗伯特·德斯诺斯用几句童谣，划出了社会的死圈子：一切都是你学我，我学你，陈陈相因，循环不息。象征派猜出了太极太和：芬芳，五彩，音响，都是相互酬答的^②。他们大概还不知道，他们那种念念不忘的东西，超过了物质的本质，而触及到社会的本质。“可见”和“不可见”的配合。这对于观察社会的人来说，都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

你没有这样想像过吗？比方说，你瞧见一个画师在同样一个画师的背上，涂抹油彩。一位黑人，对着一盒香蕉糖笑。盒子上画着他的肖像。一只猫蜷起身子，对着一瓶杜波内酒，瓶上也画着一

只猫。大家一道组成一连串自己的形像，形像越多越小。社会就像一套镜子，一面照一面，直到无穷。社会秩序，抄袭路易十四，前呼后拥，走过凡尔赛宫的明镜廊，使效果分外热闹。

疑忌的遗传线

我们再深入这一局游戏，设法弄明白精神上的机枢。

社会是力图纯一的。它不同的细胞自行繁殖，仿佛听从一条遗传学的规律，有如现代生物学在人身上发现的那样。儿童在家庭里，发现世界，是通过别人提供给他的典范的。家庭、宗教、学校、军队、企业、政治体制，都把同一形像反射给他，直到无穷。一切都好像是这么搞的。各种社会都对卢梭的一句名言，作出反应。名言虽短，却富有爆炸性。卢梭为人，那末样温柔，而人世却对他那末样冷酷。他曾说道：“人生而性善。”两种反应，两种典型。一种是信任人的，开明的社会。一种是多疑的，闭塞的社会。

比方说，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善能走自己的道路。什么权力，什么等级，什么秩序？不过是生机勃勃的自由要有的一些范围。个人的命运，终归是个人自己的事。决不是集体的事。

比方说，人之初性本恶。就是说没有能力自己辨别，什么对他好，什么对他坏。对于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来说，秩序非得由外力强加于它不可。

法国人从来也没有信服过卢梭。好几个世纪以来，大体上是这么一个社会，在陈陈相因，循环不息。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在散播，在加强，在扶正那天高皇帝远的权力。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在十九世纪初指出：“在巴黎，指导一切的是这么一个假设：没有一个人懂得自己的利害所在。或者是，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照管自己。”此后一百五十年，正如此前一百五十年，法国人老在监护下过日

子,别人假想的无能,终于产生了真的无能。

从社会的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到处都有同样的现象。假定基层都是外行,顶峰一贯正确,永远由上而下,绝不由下而上,单向交流。顶峰呢,神而明之,在云端里高不可攀。权力呢,若要长期勒住缰绳,不肯放松积极性的自由发挥,那就势必至于奉了天命来办事。从罗马帝国,到今天的法国,威权一直在那儿督察,申饬,惩罚。社会打成格格,越打越好。集中制也越发完善了嘛。罗马的憧憬实现了。无微不至地行使权力,除了自己以外,什么都不放过:学校呀,车间呀,医院呀,监狱呀^③。你的日常生活,你的等级,你的任务,都是政权派给你的。它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大,扩大得没完没了。

克利特人的新怪论

“五月花”海帆船上的百来位香客,有了传宗接代的人。头一个细胞,成了永恒的典型。然后,代代相传。今天的美国社会,消化了几千万移民,消化了奴隶制,又消化了奴隶制的废除,消化了西大荒,消化了南北战争,消化了城市化,消化了两次大战,消化了几次殖民战争,消化了世界霸权。而占统治地位的准则,依然是当年“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徒”的准则,哪怕这些人在全国已经成为少数。

恰恰相反,法国跟其他拥有天主教文化的国家一样,经过了多少世纪,依然是许多微观社会搭起来的一座金字塔。而每一个微观社会,本身也是金字塔。产生它们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那不安全的感觉。为了抵抗侵略,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求助于疑忌和原始手段。在罗马是龟阵,在拿破仑是方阵。凯撒的典型能够维护受到威胁的社会秩序。所以,任何叛变,甚至于任何要求解放的意志,都说明这种典型是有理的。不买账的人的怪论,在这儿跟克利

特人的怪论接上了头*。不买账的人要打倒等级秩序。他们到处闹事，动摇等级秩序。可是，等级秩序正是从乱子里产生的。因此，无政府状态，只会加强等级制。

开头是家庭

家庭乃是母细胞。孩子生活在远距离操纵的社会里，他是在家庭里懂得了什么是权力的。先是抚养爱护的权力，后来就不买这个权力的账了。但是到底还是服从了这个权力。

一直到六十年代，法国的家庭仍然是权力的头一个模子。家长的权力：每一个人都在家里学会了服从权力。男子的权力：男子最善于保卫家族，不让他遭受灾殃。他最善于使用武器，在拉丁社会里，称雄，称公，乃是十分强健而能叫人放心的壮盛男性。年龄的权力：第三共和国时期，有人说：“为什么法国由七十五岁的老人统治？”回答是：“因为八十岁的人都死了。”最近还可以见到，法国最大的报业托拉斯是由八十高龄的人领导的。法国人民满怀信心投奔老人，已经有过几次。这说明年龄还在起着多么优越的作用。家庭里的权力，不像过去那样生硬，很愿意显得慈爱可亲。这个权力是有根据的，因为它一心保护儿童。在英美的家庭里，很快就教育儿童独立自主。而我们却只想把时间尽可能推迟，不愿意让孩子“长了翅膀自己飞”。其实这种说法，就暗含着害怕儿童成长自立。仿佛家庭这个细胞一涨破，我们都得夭折，所以就不能让孩子成长。

六十年代一阵狂飚从英国吹来。这一阵龙卷风，震动了法国社会的传统，家长，男子，前辈贬低了，“基层”，妇女，青少年抬高

* “有一位克利特岛上的人说，克利特人都撒谎。既然克利特人都撒谎，那末克利特人撒谎的话就是假的。他们并不撒谎。如果克利特人不撒谎，那末讲这话的克利特人，就说了真话。因此……”

了。权力和家庭,大受冲击。创伤很深。时间急转直下,因为长期以来什么都纹风不动。

妇女不像男子那么平等

家庭中,仍然把某种框框强加给妇女。在拉丁国家里面,仍然提倡三从四德。

伊萨贝丽达·庇隆怒气冲冲地,把一份发言稿扔向她的亲信罗贝兹·雷加,然后在阿根廷的电视镜头前面对工会大发雷霆。二千四百万电视观众看得气都透不过来。好家伙,这个女的居然当起男子汉来了。第二天,一场总罢工把阿根廷弄得全身瘫痪。在天主教的领土上,妇女可以做不少事情,甚至可以作为民族团结的美好象征,条件是尊重男性的权力。

女性比较弱,因此就比较卑下。自从夏娃以来,就是经不起引诱,所以女性是危险的,而她还会引诱别人。她在社会里,地位卑微。因为军队和教会是社会的最高典型。在武士的心目中,妇女是无足轻重的。除非是在休兵时期。因为女性不能打仗。在教士看起来,正如戴尔杜良所说的,女性乃是“魔鬼之门”。

然而,基督教崇拜处女玛丽亚,颂扬贞操和母爱*,宣扬尊重女性和男女平等。如果在社会上办不到,至少爱慕天帝是平等的。基督思想里面暗含着的这种平等观念,为什么偏偏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里发展得快呢?而新教是不奉圣母的。原因大概在于,新教以个人号召为主,天主教则受等级制的教会统治。信教以人为对象,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而僧侣则不给男女以平等待遇。整整好几个世纪,教会根据格拉西安的法旨,规定万事男尊女卑。一直等到1957年,才由教皇庇佑十二世宣告:“人不分男女,尊严不分

* 这跟上古的娘娘神不一样。娘娘神象征受孕于男性,并不象征贞操;她象征耕地播下种子。

上下，一律平等，绝无所谓男尊而女卑。”但宗教等级，仍然只为男子而设。

在拉丁社会里，对此的态度，在教会内外差不多是一致的。当然，法律终于把与男子绝对平等的权利给了妇女：同工同酬，同样的公民权利，同样的选举权*。不过，人们有千百种手段来绕过法律，也没有少用这些手段。

从来就是这样，密封会引起种种空想的高调。为了赶紧上马，使劲一蹦，翻过马背，从那一边滚了下去。妇女要求平等，以至于想消灭一切区别，一切使两性相互丰富起来的根本区别。如果女性的特点是一切人类社会必不可缺的因素，那又将怎么办呢？

教会的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的耶稣会教士

“主要是责罚他！”一直到最近，有多少小学教师常常从家长嘴里听到这句话。孩子不听话，家长气透了，就这样把他托付给教师。办学校就是为了接家庭的班，进一步灌输等级和威权的观念嘛。

我们的学校，继承了耶稣会教士的遗志。耶稣会教士的教学热忱是“反对改革”，这在教学中留下了痕迹，而且是多么深的痕迹啊！耶稣会的开山祖师圣伊涅斯曾宣称：“必须听凭上级治理，自己犹如一具尸首，由上级任意摆布。”真是罗马式教育的至理名言**！

艾米尔·杜尔哈姆曾经指出，国立中学和公办的中等学校，都原原本本地照抄了耶稣会的体制和方法***。就这样，整整三百年

* 一直等到1945年，才由戴高乐将军强制实施妇女选举权。这在1868年，已经在美国实施④。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这一措施在参议院遭到否决。因为当时的参议院是反对僧侣的，害怕妇女选举，会“受神甫的影响”。

** 这句拉丁文的名言，至今流传。

*** 多米尼格·儒里亚1899—1900年在巴黎大学教课，再次指出了这一点⑤。

之久，法国的精英都受这样一种教条的熏陶。拿破仑要他设置的中学堂里，用“国家的耶稣会教士^⑥”。第三共和国把伊涅斯·德·罗约拉和拿破仑的衣钵接了过去。梯亥尔曾说：“国家自己认为是自由开明的，它有责任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自己的模样^⑦。”照儒勒·费利看起来，国家的教育事业，旨在把学生变成共和国家的驯服工具*。反对教会办学的精神，要取代僧侣办学；其实二者的本质没有什么两样，都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都为自己的利益，使用同样的技巧。科学有其信仰，也有其教条，有其殉道者，有其僧侣，也有其刚愎自用的方面。除了科学，别无生路。

神化抽象知识

学生是空瓶子，老师得用漏斗，把瓶子灌满。阿那多尔·法朗士这样说，是取笑所谓的师生关系。老师只给不受。学生只受不给**。教师不去适应儿童和少年的进度，而叫他们顺从自己的速度。跟不上便淘汰。这是拔尖制，等于在暖房里养花。天分差一点的孩子，遭遇就会很惨。而这种孩子却占大多数。

知识高于教师，并为教师的优越性作张本。知识越抽象，高人一等的理由也就越充分。法国的教学制是依抽象的程度分等级的。越脱离现实，威信越高。越不为生活作准备，便越受教师、家庭和学生自己的敬仰。直到最近，古文还在摆布这个等级制。“今文”乃是“古文”的糟粕，而“技艺”又是“今文”的糟粕。只有高小曾在十九世纪末叶企图摆脱耶稣会的典范，努力简单化和具体化，想

* 儒勒·费利的某些通令，宗派主义惊人。幸而他还写另外一些文章，如他那令人钦佩的“给小学教师的信”。

** 当然，老师有知识，学生没知识，这是没法否认的。可是有些人早已理解到，学生们，就其总体来说，比较容易结束他们无知的状态，如果老师教给他们的，不是要学的科目，而是生活的方式，不去把学生的无知跟自己的知识挂钩，而是把自己的知识跟学生的愿望挂钩。

创建一种教学制度，一种群众性的，而不是拔尖式的教学制度。但是到后来，高小也被整个制度同化了。今天还是这样，“技艺”想显得清高，拚命搞抽象。证明职业水平的文凭，不按职业的需要分等级，而按照笛卡尔归类法的要求分等分级，尽管按职业的要求，是经过大肆宣扬的。

拉丁文要衰退了吗？那不要紧，赶快把等级制重新调整一下，不再以神圣的拉丁文为标准，而以数学为标准。不过，首先得把数学搞得更加抽象一些，决不能像过去的“算术”。而日后我们唯一使得上的，还是算术。简言之，就是要把数学搞得谁也用不上。除非是几个精里精，尖里又尖的人。所以，号称现代的数学，仍然是代代相传拉丁文的化身。

不错，学校跟家庭和教会一样，都免不了爆炸，而教师却无师自通，学会了那么一套：言语严厉，引伸推论，教条一式，引用书本。这是因为教师不肯根据学生的求知欲，而只仰仗权威——知识和精神的权威来支持自己。

他在学生的心里，引起一种持久的自卑感，只有诉诸强暴才得解放。学习困难的学生，特别是大部分出身于文化程度不高的阶层，怎么能培养出个人尊严的意识来呢？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老受人瞧不起，老让人说他们无知、无能，压得抬不起头来。

所以，这样的想法是虚假的：仿佛教学在数量上的民主化，会自然而然地加强民主精神。

在伊顿中学的运动场上

我们简直没法想像，能有另外一种教育制度……居然也可以行得通。非得要让经验来冲击一下。1947年，我住在伊顿中学受到了这个冲击。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自觉地遵守纪律。在这所中学堂里，学生投票选举自己的班长、队长，

负责一个时期行政工作，照管年轻的同学，帮助他们游戏，运动，复习功课。必要时，还要处罚。

这个制度旨在发扬集体意识。竞赛是很活跃的。不过不是个人竞赛，而是集体竞赛。一个班分四组，体力和脑力尽量分配得平均一些。对分数的竞争十分激烈。不管是数学，还是橄榄球。因为，娱乐也是培养的一部分。消遣的方式很多：有音乐，图画，雕刻。体育的比重很大。据说，威灵吞公爵在大战的当天晚上曾说：“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中学的运动场上打胜的。”伊顿中学牢记着这句名言。

可是，有人会说，法国的学校已经不像你描绘的那样了，但愿天老爷开恩，就让它原封不动罢！兵营中学吗？也许，那也比混沌中学强吧？说真的，强迫命令的教学法，不过成了一棵汁液枯干的空心树。

纪律森严的拿破仑式中学，一去不复返了。学监、学长的威权，一去不复返了。学生们一向就会以思想开小差来抵制。今天则讲起哄。在英美，这种情况比较少。法国却越来越多。有一位美国的大学人士，是我在1967年给了他方便让他研究这种现象。他从这里面看出了法国学校的一个特点，并且反映出公民对待国家的态度^⑧。但是这种现象，在当时还不算太多。这位大学人士于1975年再来法国，重新去访问了他上一次访问过的大部分班级。我见到的是，班上经常起哄。学生自伙只管玩，聊天比教师讲课还要响亮。教师们瞧见他那种目瞪口呆的模样，反而显得吃惊。他们都以为，这种过火的行为，是从美国传来的。他费了不少气力来给他们解释，也不一定收效。教学仍然保持着等级制，却又没有权力。精髓空了，躯体已经腐烂。

把强迫教育延长到十六岁，是不是产生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后果？是不是助长了青年犯罪迅速加剧？这种情况，人们从六

十年代末已经有所觉察。十四岁的少年,不想上学,也可以不再上学,偏偏都给圈死在这个教学制度里面。少年的这种经历使他感觉到是一种个人失败。一百五十六天难以忍受的约束,二百零九天无组织的闲荡,怎能不想发泄发泄呢?于是成群的行凶犯罪,养成凶暴的恶习^⑨。他们在学校里学会了取巧,破坏,已经积习难改。

法国的学制,再不能长此糊里糊涂地继续下去。1968年的五月风暴,并没能改变教学的根本方向。总的来说,等级制产生的矛盾,依然存在。学制并没有自由化。学校并没有取得自治,并没有自己负起责任,也没有实行竞赛,也没有树立内部纪律,来振作一番。

这是因为教条主义的学校,等级制的组织原则,都遵循着同一个体制的逻辑。而彼此信任,自主竞争的教育,也有它自己的体制逻辑。二者完全相反。任何法令没法把这一个来代替那一个。

掌管钥匙的人

一切等级制,都在经受着冲击。首先是教会。它给法国社会留下了多么深的烙印。有一位外国观家心中纳闷:“上帝是法国人吗?”^⑩赞美诗里唱道:“天主教徒和法国人是永恒的。”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要知道法国人是否保持了信仰。法国人仍然当天主教徒,那是由于各人所受的教育和文化。几乎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信奉天主教,有的人看来往往是违反自己信念的。所以,尽管他们表示漠不关心,其实,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一个人信了天主教,便无时无刻不受教会的约束:没有神甫,便不能忏悔,便不能灵交,便不能参加宗教集会。好像要过宗教生活,非走等级制的道路不可。大概小孩子会不自觉地养成习惯,以为只有教会能给他超度。尽管一到成童,孩子便越来越不爱奉行

宗教仪式,但是他一辈子都将带上这末一种烙印,觉得自己进天堂入地狱的钥匙,是在别人手里攥着。

法国的教会,长期僵化,对新教改革进行斗争,不但更进一步僵化,而且进行了军事化。拿破仑再施以官僚化。龚伯二叔又给它来一套积极分子化。时至今天,又害了抽风,因为在临终以前,还想“革新”。

一个封闭起来的组织,怎么能打得开呢?一个单中心的等级制,怎样才能够适应时势,而不至于爆破呢?教会正在想方设法对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法国的问題。

几年来,教会做了些匆匆忙忙、杂乱无章的努力,重新争取到一些人,另外一些人心里纳闷。总而言之磨灭不了几个世纪留下的痕迹。罗马的模子是破了,我们在模子里却长成了现在的形状。

家长式的企业

企业主等于家长。这是典型的法国公式。家庭、学校、宗教,都给法国印上了痕迹。在经济上也是这样。无论农、工、商业,都是家庭体系,经常占着统治地位。

我认识一位做铁器活的工匠。在三十年代中期,买卖十分兴隆。后来,社会法律迫使他给工人们社会保险,给工人带工资休假,他都不肯,说道:“我倘若把这些权利给了工人,我以后怎能再指挥他们?”他宁可把工人辞退,自己一家子干。四十年过去了,车间依然如故,大小一点没变。另外有一家,规模原来一样大小,可是接受了新事物,今天已用上近百个工人。

这种家庭结构,外国人看了很吃惊*。他从这里面,看出了这种马尔萨斯论的基本原因。我国的经济,已往受了它那末大的影

* 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杰斯·匹茨①。他认为法国经济之所以落后,就是吃了家庭企业的亏。

响,现在还在受着它巨大的影响。人们念念不忘家产,把家庭的利益,放在企业的利益之上。不止一个企业主,不肯把股票送进市场,怕的是家庭失掉自己的绝对控制权。风险小了,利润也就少了。不肯冒险以求增加利润。企业呢,放弃扩充,因为不愿意超出家庭的圈圈。

过去,家庭企业曾经跟有限公司、百货公司竞争,今天又跟大农场,“大商场”,超级市场较量。每逢这些新型企业自己开辟了道路,就会同古老的企业发生一种同谋的关系。一是要和平相处,二是要有那出了名的差别收益,新企业才去扶持那些旧企业。

甚至大企业也采取家庭企业的榜样。这样的资本家自己开玩笑,把自己叫做“天授的东家”,决不分权。哪怕是国营企业,也不免以此为典范*。在国营企业里面,代表天授权力的是由政府指定的一位董事长。他从天空降下来,高踞企业的顶峰,作为国家权力的化身**。

“主人翁思想”

直到现在,法国人还是很少有这种主动积极的能动性。从前有伏尔泰给了它一个很美的名称,叫做“主人翁思想”。就是说,统治的全部艺术,就是“把独立自主,传授给大家,因为自主就是力量”。自由和“多元论”,在法国已经成了一种教条。但是从来没有成为具体的组织原则,不管是在公共生活方面,经济或社会生活方面。这种情况一天不彻底改变,谁能希望我们摆脱罗马等级制的

* 徐德罗报告书甚至明确指出,他所主张的企业民主化,不适用于公共企业。连半公共企业也不适用。

** 另一位美国学者,名叫达维德·斯·兰德。他研究史学^⑩,曾经强调指出,家庭企业助长了法国的垄断资本,以及不劳而获的市场。因为,取消了竞争,企业就不需要具备竞争的能力。这种家庭式的企业,不仅是有限公司的典型,而且也是国营企业的典型。

后遗症呢？

这种等级森严的微观社会，一个套一个，就像套几套酒杯，套娃娃。能老这样下去吗？这种社会，内部已有腐烂的危险，更加剧了整个社会堕落衰败。集中的自由制，加上正在腐烂的等级制，两者混合起来，便要发生爆炸。

凯撒和乌龟

很久以来，法国的进展像乌龟爬行，仿佛罗马军团摆下的龟阵。每一个军士都哈了腰，把盾牌盖在自己的脑袋和背上。盾牌是长方形的，中间拱起，恰好保护住脑袋和后背，然后跟他前后左右的盾牌接起来。军士们这样合为一体，在弩箭刀矛下面，缓慢行进。人呢，都躲在乌龟壳下面。他们要攻城爬墙，便把乌龟变成金字塔，人往人上爬，最上面的齐城可登。龟阵到这时候，一动也不能动。一动则全垮。罗马军事组织，到此登峰造极。拉丁社会又把它无尽地应用于民间生活。

问题是，社会的生存并不单单靠一个秩序。秩序之外，还得有一个灵魂。这时候就来了个凯撒。他既是严父，又是长老，又是主子，又是东家。

在等级的顶端，有一位神授的领袖。作为君主，他能把傀儡制说成是有意义的。作为家长，他便又慈祥，又神明。他充满了自信，自信能够转移历史长河的方向，不管是什么历史。

德·拉特尔在德国任法国驻军司令。他离任前往印度支那，向法国驻德高级专员告辞。那时候，高级专员是弗朗索瓦·庞塞。时间在1950年12月。他信心十足，喜气洋洋，毫不怀疑他一定能够实现奇迹。的确，他会实现奇迹的。短短的一个星期，他便把混乱的局势，扭转过来。

他对我说：“战役胜负未决，双方都有可能吃不消。这时候，司

令员掌握着胜利或失败的关键。”

这位“让王”*飞向印度支那的时候，气概不可一世，真像红衣大主教黎塞留出征拉·罗塞勒。像路易十四，年华双十，如旭日东升。像雾月十八日以后的拿破仑。像1917年的克莱蒙梭和贝当。像1918年的福煦。像1940年伦敦电台的戴高乐。或者像他1958年在拉·贝鲁士旅馆的时候。这些都是从危机中产生的威权。这样的领袖之所以能够服人，一靠他的气概，二靠他对自己吉星高照，充满信心。

罗马式的社会生活，有时候是有点英雄气概的。往往是有戏剧性的。怎么能撇开这种高压电流、这种英雄史诗，甘心要那种散漫的潮流，把多种多样的创举写成杂乱无章的散文呢？在一个社会里，制度已在败落，人民能不能有足够的“主人翁思想”，不再需要有主子了呢？

* 德·拉特尔·德·答西尼，在越南惨败，父子都死在那儿。“让王”是让二世，惨败于英国黑太子之手。在英国当俘虏而死。是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主要环节。——译注

第三十六章 革新的阻力

1. 故步自封

社会的一切细胞，都把永恒不变的秩序，把这种秩序的形象，你送给我，我送给你。这是反新教改革微妙的表达形式，在伟大的十七世纪，曾经盛极一时。这种永恒不变的秩序，通过佛日拉，笼罩了语法。通过马莱尔勃，控制了诗歌。通过高内伊掌握了悲剧。通过笛卡尔取走了哲学。通过鲍徐艾夺去了神学。通过法兰西学院管住了词学。通过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把握住政治。谁能说不伟大呢？这是法兰西风光的秩序，法兰西智慧的秩序，法国官吏的秩序，是吉罗多歌颂的度量衡视察员的秩序。

永恒秩序的保人，便是受命于天的王权，勾结了超凡出尘的教会。圣旨用的语言，都含有永恒的味道：“着巴黎王家法院忠爱众参议，公布并登记发交各件。希仰体朕旨，俾此举垂范千秋。忠义爱卿，法国冢宰，奉旨加盖宝玺。”这样，前保“奉天承运”的王权，后保大玺灿然的圣旨，两头死死钉住，千秋万代，永袭冈替。

法国园林的布局，象征着这种永恒不变的世界。墨斗牵绳，掐算精细，自然界任何即景生情，都是可恨的。既费时间，又费工本，只要园工稍一放松，马上就出现一派荒凉衰败的景象。树木成了图案。过道衬托房屋。人的意志压服了自然。永恒不变的园林艺术，诞生于意大利，非得要来到法国，才找到了自己登峰造极的表达方式。这种园林体现的社会是等级制的，划地为牢的，军事化的，手工业的，农村的社会；是密封的世界里一种雅致的园林。

英国式的园林，只想布置自然，使其更臻完美，并富情调，决不

矫揉造作。这种园林，与自然界十分逼真，即便不用园丁也行。英国式的园林体现什么样的社会呢？在这种社会里，是非的标准在于尊重自然规律而加以巧妙的运用，相信事物的自发势力，及其成长的本能。

居维埃是法国人，达尔文是英国人，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英伦海峡的这一面，发扬固定论。在那一边，发扬进化论。对两方面来说，都是十分自然的。

五十年代，我受到过震动。这话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那时候，德国和美国的城市熙来攘往，干劲冲天。我看了回来，耳朵还嗡嗡直叫。一到我们的外省城市里，因循守旧，仿佛埋葬在一个尘土堆积的匣子里。在国外那些地方，人人忙得不可开交。工地上，尽是起重机、推土机在奔忙。而在咱们这儿，日子过得慢腾腾的，小买卖，小手工作坊，官僚机关里瞌睡沉沉。生活悠闲呢还是人民衰败、暮气沉沉呢？一百二十年前，巴尔扎克在《比艾雷德》这本书里，描绘过普罗文市。到了今天，仍然维妙维肖。看了真叫人触目惊心。

有人对我说：“别想改变什么啦。事情一向就是这样。什么也不会动的。”

然而，毕竟还是动了。法国到处都动了。眼前二十年，比过去一百年，动得还多。好象是被人逼着干的。干了还有点儿晕头转向。法国那种舒服日子，有些已经不见了，但仍然不善于适应，反应缓慢。换演员，可没有换布景那么方便。

过去的压力

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农民。这不仅仅因为我国农业人口的比例比任何先进国家要大*，而是因为在我們本能的深处，在

* 1968年，法国百分之十五，英国百分之二，美国百分之三，比利时、荷兰百分之三。

我们思想的深处，我们仍然有农民意识。

这并不是不可能：维希政府曾经是很久很久没有瞧见过的最最得人心的政权，至少从1940年到1941年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维希政权迎合了国民深切的向往。瞧着乱哄哄的城市，人们歌颂田园的美妙。归田吧，搞手工吧。怀着保守思想的法国，从来也没有那末样心安理得。复古的潮流，当时是那么的强大。

在农民生活中，主要是学会有耐心。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反正要等季节来起作用。英国人，或者是美国人，总是在想：“时间就是钱。”要把时间变成钱。在拉丁族人心目中，在农民和官吏的心目中，时间算不了什么。可是，时代的速度，要求你尽快作出决定，逼着你同陈旧的习惯一刀两断。

很少有国家像法国那样留恋自己的过去。像法国那样长期由一个部，管着那么些欧战退伍军人。像法国那样只要引用过去，便能说明现在。

我见过这么一个小城市，每逢11月10日停战纪念，游行队伍分四站，穿过全城。头一站是1870—1871年烈士纪念碑，在那里献花。到了1971年，市政府觉得可以取消这个第一站了。普法战争结束已经一百年，遗民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可是，欧战退伍军人居然因此派了一个代表团，表示惊讶和愤慨。

每逢国家元首接见外国元首，漫画家便把他描绘成路易十四。极左分子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巴黎公社时代。矿工一罢工，便仿佛在阅读左拉写的“芽月”。农民拦截公路，自以为就是农民起义的后代。我们老在古画里过着现代生活。

甚至意识形态，也都是祖传的，是长期因袭下来的。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乃是十九世纪末叶卢梭信徒的子孙，也许到二十一世纪末叶，就会变成戴高乐派的祖先。今古之事永无止息。而扮演漂亮角色的，却老是古人。

故步自封的诱惑力

人们既然在一成不变的社会中生活，干什么就得十全十美。进步吗？有的。不过目的不在于改变，而在于尽善。卡朗·达克曾经说过：“静止是军人最美的运动。”

从黎塞留时代开始，工艺生产已经有了保证秩序、美感和掌握分寸的规章制度。土伦船厂制造王家战舰，比埃尔·布热在那儿当家。他为一大群画家和雕刻家定出蓝图。连科尔伯特也吃惊。因为跟英国船比较起来，法国战舰只管外表华丽，但航速小，杀伤力小，船数也少。他下令少搞些那种花哨的玩意儿，多注意一些效能和数量。那些给船舶装璜打扮的人，便去向路易十四告状。为了皇上的气派，必须维持王家海军的艺术声誉。布热的官司打赢了。太阳王的战舰依然金碧辉煌，较前毫未逊色。问题不过是送掉了制海权。两百年来，制造猎枪的技术，不曾有什么进展，却是雕上了花，柄上嵌了象牙。而英国火枪商俗气得很，只想搞些枪出来能够杀伤，能让越来越多的顾客买得起。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占领了欧洲市场^①。

我们的气质却一直没怎么改变。在兰斯造的一座潮汐发电厂，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获得收益。问题在于需要再造十座才能有收益。可是连一座也没有再造。蒙鲁意的太阳能炉确实搞得不错。可是只此一家，别无第二个。咱们搞样品，真是精益求精，日新月异，可就是不大批投产。大家不远千里都来取经，就是不肯传授。大家不肯搞马上能交货的厂子来满足目前的需要，使用期间倒不必太长，只要合乎当前的技术条件而宁肯搞传子传孙的杰作，这样一来，时间便过去了。

法国人在一成不变的天地里，都是自发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他们很难相信经济增长能造福于人。他们的倾向是，少养孩子比

较容易抚养。少收医科学生和少出医科教师，可以免出“廉价”的医生和教授。少准人家当巴黎出租汽车的司机，免得“人多失业”。他们很难承认，宇宙是在发展，能够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便不肯订长期合同来减轻不平等。在拉丁人的心目中，任何契约，凡是着眼在未来发展的，一概无效。

这种恶性循环，为自己创造了天长地久万世不绝的条件。是这样，因为就是这样，而决不可能不是这样^②。我们这种民族性的特征，民主制度一面加以批判，一面又加以维护。这难道不反映出咱们的公共精神吗？政治人物如果他们听信选民们只在口头上说说的希望，竟然就去强迫他们改变现状，那就必定自取灭亡。

政治人物几乎是一向只吃自己创议的亏，而从来不会吃自己故步自封的亏。一位市长，或者一位议员，哪怕仅仅出于惰性，想方设法不让任何新的工业来打乱自己的选区里社会职业的结构，他们这种做法，大有可能一辈子连选连任。在他面前，老是那么些选民，彼此熟悉，而且都受过他一些小恩小惠，慢慢地都成了他的部属。倘若他千方百计地去加强活动，引起变化，他就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请问，在法国有谁曾经要求过工业化？要求过多生孩子？要求过减少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有谁曾经鄙弃保守落后，而追求尖端技术？

长远利益得不到压力集团的支持。台上的人都是些不肯下台的人。怎么能够指责一个民主国家甘于保守呢？选民本身就是保守派嘛！

2. 抽 风

法国有这么一些怪现象，一面故步自封，抵制任何革新；一面忽然大动起来，从这一极端冲向另一极端。这两种现象，形成鲜明

的对照。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其主要的一些本能，竟是那末样的难以改移，甚至在两三千年前给他们画的肖像，至今还维妙维肖。而与此同时，这些人日常的思想，通常的爱憎，又是如此的善变，终究把自己都搞得莫明其妙。往往回顾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惊讶得和外国人一样。^③”

原因是，咱们这个民族尽管痛恨变化，却又最爱造反。当权派搞改革，要受指责；观望等待，也受指责，而指责他们的人民群众，一会儿敌视新鲜事物，一会儿又因为不搞改革而火冒三丈。

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故步自封，时间久了是没法忍受的。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度里，爆发乱子好比煤矿里煤气爆炸。政权的坑道里，日积月累的易燃气体，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引起爆炸。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受压抑者的发泄”。

动乱的魅力

公路运输工人宣称：“我们用两用拖车去把路堵死，他们也许才会肯动工修一条岔路。”一位工会代表说：“我们一天不去撵他们，扭他们，他们是不肯取消分区工资的。”家长们说：“我们不让孩子们上学，造新学校的经费就有着落了。”

只有引起了动乱，才能迫使官家不得不考虑考虑。天高皇帝远，你要见效，就只有这么办。所以，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一个潜在的闹事者。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历史，是一部集体暴动的历史，叫做“民心激动”。当时观察家写的回忆也好，记的日记也好，都有大量的这种记载。“卢昂城里，人声鼎沸，暴乱正在酝酿。要不是那三千驻军，议会事件早就激起民变了。^④”巴黎市民造街垒，就像水獭造水坝似的，出自天性。“巴黎若不挖掘砌街的石块，便不成其为巴黎^⑤。”

社会的暴烈行为在集体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已经不像旧社会时代那样盲目行凶，一味拚命。实际上，工人们取得的一切好处，如工资，带薪休假，社会保护，星期休假，劳动间歇等等，没有一桩不是经过大闹大乱从资本家或是从国家老板那儿夺来的。所以，工人们怎么能不只想让工会代表自己去进行斗争，而毋庸协商呢？他们怎么能不觉得，威胁乃是最有效的呢？造反几乎每造必成。不造反，几乎从来一事无成。

在短期间，动荡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堵塞了的地方那么多，只有危机来了，才能通气。1936年春天的社会危机以后，1944年8月全国解放以后，1958年5月第四共和国垮台以后，1968年5月风暴以后，都只用几个月的时间，便进行了宪法改革或社会改革。其实，很早很早，大家都已看出，这些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又“不可能”。不少社会早已自流灌溉，唯有咱们法国却还是大造堤坝，然后准备决堤。

平时，多用无人出面的方式就会使形式主义和匿名方式得势。坚强的个性，受到排斥，因为坚强的个性同平庸懦弱是格格不入的。相反，在多事之秋，雄杰便应时而出。这种人一般都叫人侧目而视，这时候也顾不得了。“救世主”正是在群情汹涌的时候*出来掌权。这叫做，危机出“危机英雄**”。

法国人的强悍劲

在一个鼓励自治的社会里，个人必须善于管理自己，免得让社

* 比方说，先不谈1958年5月阿尔及尔起义以后的戴高乐将军。就说莫边府以后的孟戴斯·弗朗斯；1940年6月，全军崩溃以后的贝当；法郎大贬值时候的普恩加赛；1917年失败主义盛行时候的克里蒙梭；色当溃败以后的甘贝大；1848年革命以后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 宪法第十六条，大概是一部宪法里最受责难的条文。其实倒是最有见识的条文之一。根据这个条款，国家元首可以处理危机，平息动乱，而不必改变宪法。

会来管理。所以以下的现象决非偶然：凡是那些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凡是表达这些的用词，都来源于英语。例如，自管，自治，自效。个人必须时刻自己警惕。心理学家把这种态度叫做“强迫观念”。

相反，他们说我们的集体作风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性质。经过长时期的颓废，我们突然猛打猛冲。在战争中是这样，在和平期间也是这样。这种狂热的激情，使“法国人的慄悍劲”成了一句俗话。我们很愿意把我们崇拜过的东西付之一炬。内伊元帅发誓把拿破仑大帝装在铁笼子里送回来。结果呢，却把自己的部队送给大帝来收服巴黎。前后两种作法都是诚意的，但也都是绝对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法国社会抽起风来，不大会像外国人想像的那么严重。我们把嘴巴凶狠，代替了真正的凶狠。“快揪住我，不然我就要闯祸啦。”一直等到大祸真的临头……

同样，人们宁可要一场革命，把前后割断，来一套崭新的东西，而不喜欢通过改革，不断地进行革新。有时候，我们要求改变一切，竟达到发狂的程度。一道命令，把日历废掉。为了开辟新纪元，便宣布一个法国的元年。歌词唱的是：“把过去一扫而光。”哪怕是比較稳健的人，也晕头转向起来：“什么都有可能。”可惜并非如此，并不是什么都行的。

无益的痉挛

危机这个东西，在短期间似乎必不可少。从长远来看，却没有好处，甚至是有害的。没有好处，因为和平演变能让相近的国家经过长时间避免冲击，取得比较能持久的结果。说它有害，因为由痉挛引起的暴烈行为，把人搞得精疲力尽，灰心丧气，甚至奄奄一息。

* 圣西门说：“萨伏亚公爵殿下，不会把一场战争从头打到尾的。除非他已经成双倍地倒过戈。”

法国历次危机,都是这样陈陈相因。在爆炸以后,无政府主义盛行,只有加倍严厉,才能恢复秩序。自从投石党作乱以来,每一次大乱,接着便是“拧紧螺丝钉”,“重新加紧控制”。每一次疯子挣脱了束缚,便得给他换上更强的套索*。一次心肌梗塞症得了救,及时治疗结核症,可以康复得丝毫不留痕迹。而最难治疗的却是些抽搐性的病症:过敏,气管炎,痒疹,颤抖症,脑伤风,破伤风。医学上叫做痉挛型症候。在社会里也有这种现象。我们只要一个时候不抽风,就会发癩。

3. 不买账的保守派

德国作家弗烈特利希·谢堡,对我们做出这样一种离奇的评论:“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最有文化的人民之一,一向反对用技术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何等强大的抵抗力啊⑤!”

法国人有这么一种倾向,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不仅好像什么也不变化,而且好像要争取什么也不起变化。他们的危机,往往由于不肯进步。一方面,可以说是“保守思想”不肯,可是另一方面,比较微妙一些,也可以说是“革命思想”不肯。

在任何国家,都有人不愿意承受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约束。但是,在多中心的国家里,人们克服了这种不情愿的心情。如果还有一些不愿意的人,那也不能抱怨任何人。能抱怨顺应时代潮流的进化吗?进化的潮流从四面八方围困着不乐意的人。进化向你们挑战。有本事的便起来应战。

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对单中心意识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国家万能,能够挥戈止日,能叫地球快转。让国家下令,马上进行改革,大家一起都搞,可不就行了吗?

* 有时候来软的。有如 1830 到 1832 年; 1958 到 1959 年; 1968 到 1969 年。有时候来硬的。有如在 1652 年, 1800 年, 1814 年, 1815 年, 1848 年 6 月, 1851 年和 1871 年 5 月。

可惜办不到。那就抽象地批评批评现行的制度，可是一到具体进行改革却又不愿意。戈比诺有一段讲政治制度的话，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都是适用的。他说：“在法国，共和政体有这么一个特点：谁也不要它，可是谁也舍不得它。”法国人就是喜欢保持现状，可是又对现状不满。法国人既保守，又不买账。他们就像艾里丝和马赛尔·儒盎多夫妻俩，黑天白夜吵架，可又谁也少不了谁。

不 对 劲

报纸经常谈论什么“灰溜溜的情绪”。戴高乐把这种现象叫做“忧心忡忡”。其实就是不对劲，就是出乱子的先声。先声也罢，出乱子也罢，反正都是由变局引起的。人们觉得这种变局，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无法忍受的。

六十年代，军队里不是感觉不对劲儿吗？非殖民化引起了变动，而军人们却抵制这种变动。接着又抵制核力量引起的变动。农民不是也感觉得不对劲儿吗？他们抵制耕作法的变动，结构的变动，销路的变动。干部们感觉不对劲儿，那是因为他们的条件和企业的管理都起了大变化。诸如此类。1948年，巴黎的警察感觉不对劲儿。因为当时的内政部长想要引用广播车……

新事物风起云涌，往往会使一些顽固的头脑蒙上一层愁云。在这么一个时代里，产品，方式方法，甚至思想，都在日新月异，转瞬之间便过了时。这种永无休止的运动，把我们搞得永远觉得不对劲儿。除非我们下了决心，跟运动一道动，把我们的毅力用来适应时势，而不要用来拚命阻挠时势的发展。戴高乐要求法国人“适应时代”，跟时代缔结良缘。可是面对我们的时代，我们却觉得自己是些孤眠独宿惯了的老光棍。

骨子里，我们生怕让世界潮流冲走。全世界进行竞赛的潮流，使思想和技术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忧心忡忡，这是不是

个别的情况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自信呢？答应跟别人去比较比较，不就会使我们自己的行为发生问题吗？不会使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学来的教条都发生问题吗？会不会使我们显得低人一等呢？把自己埋在“已知”里便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未知”的威胁。竞赛能逼出革新来。

虚伪的恐新病

际此二十世纪末叶，恐新病已经不再摊开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躲藏了起来。又想变，又怕变，微妙地揉和在一起。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反对新事物，宁可说自己追求新事物。可是，由于自己的职业关系，不由自主地拖进了革新运动里面去的人，却又暗暗地希望侥天之幸，出件什么意外的事情，豁免了自己。

五十年代，普热德派的小商人，让社会的进步搞得手足无措，没法跟上，甚至根本不想跟上，居然上街游行，前面高举横幅标语：“一定要变！”1956年1月2日，他们叫喊着“任满的议员，请开吧！”蜂拥前去投票选举。政治人物非更新不可啦，免得自己被更新掉。十年以后，农业组织撵走了一位部长，因为他卖力进行普遍的改革^⑥。谁要改革，便换掉谁。为的是自己不变。工人罢工，从来不是为了要求具体的改革，而往往是为了阻止改革。因为决定推行的改革，不是人们要求的改革，采取的时机也不合适。所以就一方面反对这项改革，一方面又要求一种理想的改革。当然，什么理想的改革，那是没法实现的。

一 盘 胶

改革派的气力，就在这种精神气氛里往往弄得气衰力尽，有时候还会弄得吃大亏。问题是，任何改革都会触犯一些事情，触犯一些人。要求全体一致，等于永远一成不变。不仅如此，可以说是永

远维持一种暧昧状态。但是，硬要思想不通的人去进行改革，那就一定会碰壁，碰上一座推不动擦不开的鸭绒软壁。冲劲再而衰，三而竭。期限越拖越长，文件开始遗失，障碍便越来越多。从一篇头脑清醒的演说，到实现目标，中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距离来自不同的思想状态，为不自觉的破坏活动，留下了无穷的可能性。

如果不顾一切，改革居然成为事实，这种事情也是有的，那些似乎受到威胁的人，就会巧妙地进行回收工作。他们会想方设法，使改革影响不到自己。他们能够遵照字面把精神变掉。

法兰西的集体，叫人联想起一种东西，粘不叽叽的像一碗胶。搅了几下，慢慢地又恢复原状。用强制手段吗？凡是想维持自由的政体，几乎完全束手无策。说服教育吗？人家报之以怀疑。国家则动摇不定。叫人服从罢，自己的力量太弱。叫人理解罢，说出来的道理太过抽象。叫人信任罢，自己就不信任人。

一个行会制兼集中制的国家，任何改革只能来自内部。任何物体都倾向保全自身。没法期待监狱看守改革监狱的看守制度。由上而下吧，也不行。一个政府，没法硬搞改革，因为政府都有嫌疑，有出于“政治”动机的嫌疑。一有政治动机，别人就要反对，不愿支持。由国家元首来搞吧，聪明一些，但还是不要动用自己当公正人的威望的好。由基层来搞吧，也不行。基层有火气，容易冲动，会把已经稳定的局势弄僵。

唯一行得通的办法，只有从旁边着手，通过竞赛，示范和事实的压力。这个办法可以绕过障碍，创造气氛，在行进中证明运动是对的。改革这个东西，只要人家不是想强加于我们，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反对它，反而会觉得有必要，并且不再觉得是跟我们做对的东西，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像气候一样笼罩着自己。

只要改革派不采用这种办法，人们就有理由为他们担心，担心他们弄得像贝内洛普一样，白天织布，夜里拆布。

第三十七章 权力神圣

天下如果有一个字叫我生气，这个字就是“政权”。到哪儿都有人把这个字迎面朝你扔来。政权，政权！好似一个无名无姓的家伙，不知哪儿钻出来的，倒像开天辟地以前就有它。又好似一尊神道，又亲密，又可怕。它独自从外界统治着法国人，又和法国人混在一起，什么也逃不过它。

一谈起“政权”，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从天上带来了专横跋扈。这不是对民主的污辱吗？而民主制度又是怎样来的呢？民主制表达的是不断地，老老实实在地，通过各色各样的选举，咨询民意。这种方式之所以一直在实行，那是因为它在政治上不知不觉地深入法国人的人心。当然啰，这种方式会叫人怀疑一些政府的合法性，但是也承认这些政府行使职权的必要性。这些职权便是：发号施令，执法裁判。反正政权是要人来行使的。也许，庙宇已经空了太久，神道已经回到瓮里去了。

用一个宗教词句，也许不见得不合适。现在已经很少有什么社会还像咱们的政权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奉天承运的君主，在1793年1月一个美好的日子里，送上了断头台。但是权力这个东西，在法国依然是天授的，只要有人在行使这个权力。照勒南的说法，大革命“破了君主制的法”，尽管这个制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没有破国家的法。

日常生活里的神道

从此以后，我们只好让自己相信，权力是从下面来的。而在心

里却老觉得是从上面来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权力对我们具有很大的魅力。因为我们是法国人，从古以来就是顺民。我们现代化了，似乎应该相信民主权力。但是我们的遗传性，却老在向往着权力神圣。

这样的政权，浸透了宗教色彩，还很有点妖术的意思。法国几百年来，一直信奉着这么一种宗教。上帝经常干涉着凡人的俗事。我在科西嘉岛上曾经瞧见过，一位神甫，身穿法衣，诵经念咒，驱除橄榄树上啃橄榄的害虫达库斯。我的怀疑情绪居然发生动摇。有一天，我瞧见飞蝗蔽天，落在田里。它们的缺嘴咬嚼着，蝗过之处赤地一片。神甫念诵拉丁语的神咒，农民跪在地上跟着念。神甫朝着飞蝗，用圣水壶，按十字架的耶稣像，向空中洒水。蝗虫飞走了。神甫和乡里人都很高兴。但并不表示惊讶。

这种信心，确实动人。而拉丁社会就是怀着它，一直延续几百年。这样的事情，不在我们心底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是不可能的。政权这个东西，很容易带宗教性质。因为宗教本身就体现了政权。

桥师神皇

教皇又名“桥师神皇”^{*}。这个称号是从罗马皇帝那儿引来的。凯撒成了宗教宗师，便给自己加了“桥师”的尊号。这在罗马是来源很古的。基督教世界的神权，上承罗马始祖罗木鲁斯的神，几千年从未间断。二十八个世纪以来，代代相传，有如一佛涅槃，二佛出世。真是一种政治转世。

罗马遗传下来的这一巨大的精神力量，教皇也不得不分润一

^{*} 罗马第二代国王，叫做努马·彭比留斯。他设有官职，叫做“桥师”，兼管造桥和念咒。桥师不仅管工人造桥，而且算他自己也造桥。罗马初期王制，掌握的一切权力和名义，全都落入教皇之手。所以教皇的权力，遍及任何人和任何事情。这跟初期罗马王一样，也跟后来的罗马皇帝一样。教皇是主子^①，是人中第一人。十一世纪的教皇语录里有这么一条：“只有教皇能用罗马皇帝的尊号^②。”

些给俗家政权。不管那儿的大小君主，没有不想把神圣的朱衣，披到自己身上的。尽管在十六世纪曾有那么多的君主，改奉新教，那不过是想对教廷表示独立。

他们这么一做，虽然加强了自己的主权，却也失去了不少神圣性。他们脱离了罗马，也就失掉了罗马的神通。他们的政权，纯粹是俗世的，跟天主教国君的政权相比，神奇的味道便差远了。然而，他们的臣民就更快变成公民。

正 统 观 念

一直到大革命，法国的君主政体，继承着神化权力的宗教体制。后来，法兰西国家，摆脱了教会僧侣的统治，却并没有摆脱神治。国家与教会分得太晚。我们不谈1905年划分国家与教会的法律，我们谈的是十八世纪人们思想里已经在盘算的政教分离。法兰西国家把民事和宗教事务长期混在一起，自己已经成了教会，成了罗马教会。

任何权力，若要传之子孙万代，必定要是不可争议的。所以一定要把专断独行，放在教条的挡箭牌后面，要让君王体现出法律的化身。

当然，也有人想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面是个人权力，一面是非个人权力。但是老百姓只同意了人格化的权力：君主的权力，路易的权力，或者是拿破仑的权力；在比较跟我们接近一些的时代，那就是一些传奇式大人物的权力。今天则是总统的权力。他们的亲信都有这样的称呼：戴高乐派，蓬皮杜派，吉斯卡尔派。这是其他任何民主国家所没有的。

这个权力，必需不让群众喜怒无常的冲动所左右。神圣的是政权本身，而不是掌权的人。掌权是过渡性的。体制，政权必然是合理的，非人格化的。体现政权的是一整套命令和禁约，把每一人

都约束在客观的规范里边。由教条给个人权力划下了框框。任何力量也比不上真理那样强大的约束力，尤其是由教条体现出来的真理。因为，体现真理的力量，用之者无愧于心，承受者无惭于德。

有用的教条是书面的。神圣的权力，应该依靠经典。罗马教会有自己的经典，继承了罗马法典，而传之于无穷。法兰西国家不把自己的经典传之万世，是决不甘罢休的。君主时代有“习惯法”，拿破仑有法典，今天有一部大量生产的立法机器。

在大革命以前，法家不太走运。他们的系统精神遇到了不变精神的阻力。一大堆支离破碎的规则，怎么能搞出一个系统来呢？各省，各个议会，都把自己的一些规则看做不可侵犯的东西。大革命扫除了各省的独特性。系统精神大可以搞一套真正的杰作出来了。谁都知道，这样的杰作，一下子就能拍板定案，永成定局。同时，一成不变的思想，可以踌躇满志……

事实上，咱们那种立法迷，倒有很长一段时间饶赦了咱们的民法典。过了八十年，才在工会结社权的下面，加了一条附款。过了一百年，才在结社权下面再添了一条附款。又过了一百六十年，才为妇女权利平等的条款，加了一条附款。这样总算为妇女解脱了从古以来的三从四德。民法典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受到了偶像似的崇拜。有那么一位名叫普罗斯佩·朗博的人，竟然用教义问答的形式，出版了一部民法典。天主教的教义问答，头一条是：“什么是上帝？”国家的教义问答头一条则是：“什么是法律？”答案是：“法律是行动的准则。由高级权力所制定。人人必须予以遵守。”这样，的确严肃得多，比什么“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严肃得多。不但严肃得多，而且法国味浓得多。

教会的僧侣和国家的僧侣

罗马教会的权力，是由僧侣来加以行使的。法兰西国家的权

力,也是这样。那儿是教廷的省,这儿是政府的部。那儿是神甫和各种教会的教士,这儿有各部门的官员。

罗马教会把基督徒分成不同的两类。这两种人差不多彼此以外国人相待。一种出了家的基督徒,另一种则是在俗的基督徒。出了家的僧侣是产生于真理的。他们是神圣的。他们既不结婚,也没有财产。这样一分开来,僧侣便可以统治俗家了。国家却没有仿照教会的做法,没有模仿得那么样彻底,把国家的僧侣也都分出去。话虽如此,国家官员的身上确实遗留着不少僧侣作风。

禁忌性欲吗?拿破仑曾想官员们保持独身。结果对教师们是办到了。直到今天,外交界还保持着过问人员婚姻的权利。军事规章里甚至明文规定:军官未经团长同意,不得结婚。在国家公职人员的集体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像部落时代不与外界通婚。军官与军官的姑娘婚配,大官跟大官的小姐结婚。在第三共和时代,村子里非教会的小学教师家庭,往往像是牧师的_·家庭。个人的_·贞操,变了集体的_·贞操。同一个词变换说法,证明决非偶然。贞操思想成了_·门户之见。

关于钱的禁忌仍然厉害。当官的固然并不是不许有财产,但有钱是得不到好评的*。官员领的是官俸,不是工资。俸禄不是为了酬报勤劳,而是让当官的维持官禄。在国家“僧侣”的心目中,金钱依然是罪孽的象征。特别是对别人的财产。这时候禁忌的作用就大了。尤其是动产。动产是不可捉摸的。从生意里来,到生意里去。这东西岂不可鄙!利润是丑恶的!

教会对钱的禁忌,并不妨碍它作为_·集体掌握大量的财富。国家“僧侣”的个人禁忌,并不妨碍他们_·集体地去运用经济力量。他们集体的纯洁性,并不因此而受影响,甚至是钱,生意经,生产品,

* 外交界除外。

货物出售,都变纯洁了,只要是他们集体干的。

干吗费气力去找些合理的论据反对人家要求国营呢?这种要求出自人们的感情深处。合理不合理是扯不上的。雪铁龙汽车公司是肮脏的。它那些职员,那种神秘劲,就是鬼鬼祟祟。国营的雷诺汽车厂,则是纯洁的。这儿的工程师是些大法师。私商是剥削者。国家银行的董事长则是十字军英雄。石油在私人手里是会污染的。煤炭到了公家手里,就变纯炭精。国家的神圣权力,碰到什么,便能使什么变为神圣,真有七十二变的能耐。

国家“僧侣”跟教会的僧侣一样,都意识到自己在社会里占有特殊的位置,一种出众的领导地位。

这就产生了谦恭和骄傲的把戏。高踞等级顶峰的大师,便有意地谦恭自卑。这样便能使骄傲变纯,并且保持一种非人格化的性质。相反,至于那些处在最底层的人,他们真正的卑微地位,也不是毫无抵偿的。他们必不可少的作用,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自豪感。

大概谁也没能像戴高乐那样,把骄傲和谦恭玩得那样到家。他和自己的职位,完全合为一体。他在自己的职位上,把他雄杰的本性发挥到高不可攀的程度。一旦离开了职位,他一下就变得十分朴素。如果说国家有它的苦行派,也有自己的圣徒,那末他便是其中之一。他表现一种非个人的伟大气概。他的风度是只此一家,别无第二。国家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国家。

为了表达这个现实,他坚持在签署法令的时候,注明他所在的地点。有时候在戈隆贝他的乡居别墅,有时在德·格拉斯号巡洋舰上。他每逢出巡,往往叫这艘巡洋舰跟随待命。这样可以随时用法国战舰来体现他的合法正统。这个合法正统,尽管行踪不定,却是绝对的。在他看来,乃是民族国家的象征。罗马已经不在罗马,而在我在的地方。

神圣权力的属性

权力这个东西，盘踞在法国人思想习惯的深处，像蜘蛛那样吐丝结网，自成一个世界。

庞大的行政体系，有各种不同的部门。它们最关心的是各自的位置先后。对外起象征作用的时候，尤其如此。在公家举行大礼的时候，最小的礼宾细节，排列席位的先后，都需要用法令来加以规定。过去有人取笑路易十四的朝廷仪礼，繁文缛节。可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叶，行政仪节的严格僵硬，一点也不逊色。有一条法令告诉你，上诉法院的首席审判官，位置在大学校长之前，宝星勋章之后。

每逢新部长上任，分配部长办公厅的办公室，总要闹个人仰马翻。因为，权力的大小，要看屋子占平方米的多少，要看家具的式样。在广播大厦，内部升级要看隔扇。大厦是圆的。一间屋子有一个窗户。最低的生活空间是一窗一间。然后，两个窗子。有了三个窗子，就当副主任了。四个窗子便是主任。在战后的年代里，法国军队占领了德国和奥地利。占领军总部明文规定级别待遇：专用车，办公住宅，仆役，餐具，一直到地毯，厚的薄的，也分三等。

在十五世纪已经是这样。产妇房里的糖果盒也大有讲究。王后、公主一盒四层。贵夫人，一盒三层。稍次的命妇，一盒一或两层^③。

现代的仪节，讲究摩托仪仗队。可是有了摩托队，神圣里面就有了恐怖。一位部长很难叫他的摩托仪仗队免按喇叭。人家大致是这样来道歉的：摩托车上的“双音”喇叭，音色那么样优美，不按太说不过去。有一位省长，比较不在乎，他回答我说：“外省有点像殖民地，你不吓唬他们，他们便不敬重你。”

有种权力爱大吹大擂，有时甚至于爱吹吹牛。也有一种权力

却喜欢鬼鬼祟祟。神秘本是神圣的守备队嘛。在这上面，国家又得向教会请教。然后通过国家，把典范传授给整个社会。有时候，我对企业主们说，若要参加管理，先得了解情况。当然，制造保密长期计划，不便公开，但是让职员心中有数，甚至让工人心中有数，那是有好处的。企业主们听了这话，高举两臂，喊道：“你说得真对。了解情况，乃是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不能让人参加管理。一旦没有了保密，那我们还有什么权力呢？”

1798年，一位夜猫子党人，被押上断头台。他喊道：“君王万岁！君王是人间的天帝！”也许这话有点过火。可是跟下面这件事比较起来，比方说：为了崇拜理智之神而在巴黎圣母院大行教礼，这不同样有点过火吗？在这两种情况下，过火却体现出真情。画漫画，不就是这样吗？君主派也罢，共和派也罢，信教也罢，要求政教分离也罢，法兰西国家是产生于神权的。法国人的心情很像拉默乃*：“人是从来不肯受制于人的，必定要使权力从天而降④。”法国人虽然已经不记得权力从何而降，但是他们的心坎里，总觉得权力是神圣的。否则便不成其为权力。

* 拉默乃，法国哲学家，1782—1854年。

第三十八章 服从

驯服好似邪欲，而人却又少不了它。

让·纪东^①

钱币局铸造一种金牌，上面刻着青年的路易十四检阅一支精兵。每一个兵都举着一只胳膊，伸着一条腿，动作整齐划一，无瑕可击^②。这是等级制完美的象征。团体之所以登峰造极，无非由于个人完全放弃了自己。羁勒住了那么多的自由，消磨光了那么多的自发性，为的是让等级制不可一世！就是嘛，最理想的国家，就是要顺民们让国家行使权力。仿佛看戏的人，看得入迷，又打寒噤，又笑又鼓掌，捧得演员们拚命维持台上假场面，拚命激发台上假场面。

宣扬服从，笼络人心

凡人都有灵魂，都有良知，而国家则想拿来作为给自己的祭礼。

贝尔以极妙的警句写出了教会对教徒们的期待：“一定要宣扬服从信仰，笼络信徒们的心灵^③。”上帝的真理对思想是有魅力的。圣奥古斯丁曾叫道：“主啊！我越服从您的意愿，越自己觉得自由。”

从一开始，罗马就已经知道，没有规矩，没有统一，服从的这个原则，是没法维持的。“信仰的服从”，“服从教会”，混为一谈。然而，在十六世纪的大危机以前，纪律十分开明，几乎近似放任。在

那时候，西方根本没有人想到能不服从罗马，所以权力就不用斤斤计较。等到一宣扬理性的威权，个人的良知，马丁·路德，尤其是卡尔文，便逼得教会加紧严格执行最最罗马式的一些原则。拉默乃简而精地概括出这一演变：“信仰，对天主教徒来说，成了服从的行为，而对基督教来说，却成了独立的行为④。”

为什么法国这个国家接罗马体制的班接得那么高明呢？因为这个体制的中心是服从。

在教义问答课本上，罪孽不是旁的东西，不过是不服从教会和天主的训条。偷盗行为，虽然是罪孽，但不完全因为别人受了害，而是因为上天禁止偷盗。服从，成了道德的条件反射。

这种制度，宁可容忍抢劫和荒淫，决不放过对教会所宣扬的真理作任何自由的批评。因为，强盗和淫棍，是知法犯法。他们是承认这种法制的。也可说，他们反而突出了法制。至于离经叛道的人，分裂教派的人，则是否认法制的。所以，教会的制度，对思想和组织上的问题，比对实际的道德问题，严厉得多。严厉得多，也就更加禁令森严。

法兰西国家，一直到大革命，本来就是这个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都应该服从国家。偷盗了君主的东西，是可以原谅的。甚至像贡德、杜雷纳那样，跟官军交过锋，也可以饶恕。要是造反嘛，大仲马的“三剑客”，还记得罢，他们是奉君命，效忠纳善，除奸去邪。至于对君主有什么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君王是圣明的，一贯正确的，“比教皇还要圣明”。卢森堡公爵曾经毫不犹豫地这样启奏君王。

大革命以后，国家体制对服从更有妙用。尽管在我国人民中间，集大成的是教会，“决不给自由的敌人以自由”这一句名言，相当确切地表达了罗马精神。

反对宗教改革的僧侣们，赢得别人服从他们，是靠基督徒罪孽

深重的心情。公共权力，不用把手伸得那么长，长期以来，便凭仗法国人一种糊里糊涂的负愆感。婉转一些，可以叫做“慑服于警察”。然后把这种心情变成“明哲的起点”。法国人可以跟民法耍耍滑头。正如多少世纪以来，他一直对宗教法也作点儿小弊。这只算“小罪孽”，差不多算不上亏心事。

教会和国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权派既然是一贯正确的，犯错误的当然只有平民老百姓。

思想警察

教会停止使用思想警察，还是第二教廷以后的事。决不能低估千百年的实践对人民思想的影响。直到最近，国家跟教会双管齐下。在旧社会，出版任何书刊，都得由国王批准。所以让荷兰和英国印刷局发了财……1704年，一道谕旨给整个印刷业作了规定。路易十四制定了一张名单，只有名单上的城市才能合法地从事印刷。大革命以后，政府集中力量对付报刊。直到十九世纪末，报刊才真正得到了自由。不久又有电影检查接上了班。

阴险的手段，毕竟最为有效。等级制从来就想用绳子牵着作家们走，用金色的饭碗，豢养知识分子。拉辛的剧本里，有些腐蚀性的影射语，可能被人看出来。与其禁掉他的戏，倒不如劝他放弃戏剧，去当国王的史官。有多少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拉了过去。一朝一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知识分子自己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形成一个“反对政权”，再把对方的知识分子拉过来。这样的循环，也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把手套翻过来，仍然是同一双手套。

锁链痛

可别把事情说得一团漆黑。正如贝尔说的，服从能擒人，给人

带来安全，叫人心情平静。人是不安分的动物。服从，就能安分守己。

拉封丹有一则寓言，描述一条狗和一只狼。狗吃得脑满肠肥，但是颈带锁链。狼饿得肋骨嶙嶙，却能自由自在。像狗那样，倒很愿意戴锁链的，锁链给主子去掉了，它就茫茫然丧了家。因为它爱它的主子，爱得连怕他都觉得怕得有意思。

当附庸，当惯了就会非当不可，就会害怕独立自主。因为独立自主了，会担风险，要负责任。

1838年，英国解放了巴尔巴特地方的奴隶。两百个黑人杀死了一个名叫格林内尔的人。这人本来是他们主人。原因是这个人不肯再留下他们当奴隶。自由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太沉重的负担。

在多莱德，至今还做一种西哥德的弥撒。念的是拉丁文。一千五百年来，原封未动。就是这种弥撒，听的人最多，简直好像第二教廷的影响，人们到了教堂门口就停下来了。一个西班牙人在出大门的时候，对我说：“这才是个真正的弥撒。不是鬼划符。为什么叫做弥撒的人非把脸冲着听弥撒的人呢？人们要神甫背冲着自己嘛！老百姓需要听命于别人嘛！圣饼罐路过的时候，教廷只叫人低下头。可是大家刷的一下一齐跪下了。比方说，我们就是喜欢下跪，又怎么样呢！”

这种唯命是听的遗传性，多么值得景仰啊！有些信徒，不接受第二教廷推行的一些起解放作用的新仪式，难道还有什么难理解吗？一旦服从等级制锁链的习惯突然消失，人心里的解放感就形成一种危险。权力一不完整，便有可能一扫而光，连同权力所保障的东西，也将被扫除干净。得了解放的社会，对弱者是冷酷的。弱者得到了自由，便失去了等级制的保护。拉戈代尔在讲道时说：“贫富之间，自由放任压迫，法律解放贫弱。”

受扶养的人民

“牛崽子！”这样灰心失望来估量法国人，有时候是真的说对了，有时候却出于传说。这种称呼叫人疑惑不解，也叫人受不了。在戴高乐将军的常用词汇里，人们觉得，这种牛崽子并不是什么雄健的小公牛，而是没到岁数的骗牛。李欧蒂将军年轻时候，在安南远远地观察法国，已经写过这样的话：“法国人是些精神太监^⑤”。话是说得很不留情，听了很不受用。能不能琢磨出点意思来呢？

历史上这种例子是不少的。一些很有魄力的民族，没多久就人心涣散，好像受了阉割似的。在罗马实行共和制的时候，公民都愿意为国捐躯。因为国家是人民共有的。罗马实行帝制以后，种族仍然是同一个种族，就是让官僚集中制搞得非驴非马，再没有毅力来管理国家事务，不久便连保卫国家的能力都没有了。军团里尽招募些蛮子当兵。军团的头子都当皇帝。政权越管越宽，人民越来越驯谨，结果人民便躺在政权身上过日子。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吗？

法国人是历史的对象

“唉，我呀，我是不问政治的！”还有什么话更能比这句话表达出我国人民放弃公民职责的心情吗？这是明哲保身呢？还是得意洋洋地卖弄自己的清白呢？我们把不关心国事看做是一种德行。这并不妨碍咱们过了一忽儿又抱怨国家搞得不称咱们的心，抱怨阴谋家和浑蛋背着咱们搞政治。

需不需要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去找根源呢？法国人是衰弱了。因为他们一切都依赖国家。大祸临头，便土崩瓦解。这在咱们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屡见不鲜。除非出了个伟人，知道怎么样去让集体的意志像地下泉水似的喷射出来，怎样用一种人们几乎遗忘的

语言，把人民召唤起来。

外国观察家为我们写了成篇累牍的文章，往往爱指出我们的消极性。比方马拉巴特曾经说过：“法国人民是多么忠于自己的本性啊！他们一味听凭历史的摆布。希特勒差点儿就掌握了法国的命运^⑥。”萨沙·吉特利，作为讲演家，爱谈这么一个掌故。事情发生在1940年。在巴黎陷落后不久，希特勒跑来参观他所征服了的国家。有一天早上，他靠在琉璃宫的石栏上，眼瞧着塞纳河的流水。一个渔人，钓竿扛在肩上，从河岸走过去。这人满不在乎地瞧瞧一帮子德国军官，中间便是希特勒。他一面往前走，一面嘴里叨念道：“嘿！就是他。”稍为过去一些，他便坐下来，在河边上钓起鱼来。萨沙·吉特利每一次称赞这样一位老实人，会场里老会响起一片掌声：“这才是真正的法国人，这才是一个善良的法国人，这才是真正爱国的人。”

这个法国人的态度，萨沙·吉特利的赞扬，听众的欣赏，都是一些特征。

随便什么人，要想去鼓动一个城市，或是一个村子，都知道那些地方参加社会活动的人是多么稀罕。见义勇为的人，老是那么几个，其余的人，都像瞧热闹的，围着观看一辆卡车把装载的东西撒了满街，就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帮一把忙。

“瞧热闹”这个词儿，出奇地描绘了法国人。大概不过是历史上长期歪曲的结果。“各人自种洋葱头。”“我不是护士。”甚至于“我挣钱不是为了干这个。”安全保卫，救护工作，都由社会交给了不同的单位。出了事故，由抢救队救人。妇女受了袭击，有警察来管。公家的事，由议员、代议士负责。个人是不愿意管，也不应该管的。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好啦。就这样蔓延开了一种经常推卸责任的现象。

照许许多多写新闻纪事的人看起来，法国人的特征是精力充

沛，活动力强。这种看法一直盛行到现代的初期。现在却好像掏虚了身体。因为人们习惯于等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做出决定来拯救他们。政权吸干了一切个人的主动积极性，结果把主动精神的源泉都搞枯竭了。

越提防，越难提防

你越觉得个人不配信任，个人就越不足以信任。尽管开头是有道理的，到底还是没道理的，只要你说他管不了，时间说长了，他就真正的什么也管不了。如果一个人，从来就在铁轨上推斗车，他能马上去驾汽车而不出事故吗？

若说文化需要革新，那末，到底是安德烈·马尔罗的眼光远大呢，还是一个市议会的眼光远大呢？不是有这么一个市议会，非得把几口高纳维尔的钟放在自己文化馆里不可吗？要讲能动性，到底是计划委员的能动性强的呢，还是因循守旧的小手工业者的能动性强的呢？不能不承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的确是章鱼似的国家，像个千手观音，是巴黎的计划人员，是众人切齿的专家治国论者，最关心长远的前途。如果全然不要过渡，马上发挥法国各地方的主动积极性，恐怕一开头只会听到一些山头主义的高谈阔论。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搞得没了它便活不成。要末就是中央集权制，要末就是外行治天下。

这是一种假设。仿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管事水平。是上天规定一成不变的。然而，经验有没有告诉我们：担负新的责任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人靠他自己起的作用，为什么放弃这么样神奇伟大的动力呢？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微妙的禁锢社会。它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一架梯子上。每一级都是事前指定的。这样一直到告老退休。

法国人一就业，便守着个家再不想动。他纳入了等级制，就此

躺在等级制上过日子。个人把主动权出让给了集体。这是要不得的。因为集体很不善于行使主动权。等级制里的人，可以躲在程序手续的背后说：“你正式向我提出嘛。”“我们书面答复你好啦。”什么借口都可以用来拖延时日，分散责任。有人把跳栏赛跑坚持到底，又有多少人半途而废！总机上忙得不可开交，你去拨电话机子，拨来拨去就懒得再拨了。不然就去想旁的办法。

任何等级制都起禁锢作用。谁曾见过共产党里出主动积极性？把政治上反对派的形式更新，只能归功于极左分子。他们自发的异议却显得无比地有效，比重要的革命党更能引起变化。一个采取了等级制的大政党，只会发号施令，就像蜜蜂分泌蜂蜜一样。并不是说这里面出不了思想，而是一出来便检查掉了。能影响“组织”吗？答复是：差不多从来不能。共产党等了五十年，才摆脱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

整个制度，所有这些思想习惯，都把法国人民保持在某种未成熟的状态之下。一个少年，天赋高，很出色，往往十分迷人，但在成年以前，毕竟还没有完全成熟。儿童时代，时而消极被动，时而奋发奇想。一股劲起来，燃得快，熄灭也快。爱梦想，爱装样子，这叫做轻率不稳重。儿戏吗？玩玩就腻了。

他最爱的玩意儿，还是“自由”。他以为是他自己发明了自由。他自己深信不疑，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他发表的。忘记自己念过独立宣言。当时，弗兰克林曾把这个独立宣言在巴黎散发。甚至还念过那古老的1620年英国清教徒公布的宪章。沙尔·莫拉斯说得很对，在法国自由一直是一位“外国贵人”。可是法国人并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会讲自由的语言，脑袋瓜里仍然想的是权力，他们既敬重又害怕权力，就像家里供的神祇。

时间久了，连思想也闭塞起来了，因为长期不起抵消等级制的作用。好比一个蓄电池，只有用它的时候才蓄电。

第三十九章 闹独立性

正由于权力这个东西高高在上，神秘得很。权力这个东西是不肯跟人交谈的，又由于它除了要求服从以外，不准许有任何旁的态度，这自然就会逼出另外一种态度来，那就是造反。

物极必反

百依百顺和闹独立性这个把戏，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到邻近一个地下停车场去取车，碰上了这样一件事。两个工人在修车库的大门，一个人站在梯子上拧螺丝扣，另外一个给他递工具。我要把车开出去，轻轻地按了一下喇叭。两个工人便恶狠狠地对我说：“等我们搞完了。”“要等多久呢？”“至少一小时。”我再说也是白搭。“管理员跟我们说，没有三辆车来就别停工。”

第二辆车开过来了。下来一位夫人，马上发起火来说：“我给钱在车库里占一个车位，不是为了让别人把我像耗子似的关在耗子笼里。”“别侮辱人！”我过去打圆场：“这位夫人并没有侮辱你们。”“是侮辱了我们。她把我们叫耗子。”误会没法解释。我要求见管理员。“不行，不能去打搅他。”

那位夫人便使出她唯一的一招：大闹一场。她按住喇叭不放手，吵得人耳鼓欲破。路上瞧热闹的人，围成了堆。这才跑过来一个人，叫工人让我们出去。工人满肚子气，毕竟还是照办了。乱子一下子平息，好像有什么仙法似的。

这是物极必反的一个典型。两个开汽车的人扮演的角色，是

政权对面的公民。工人则扮演了行政衙门的角色。管理员扮演政府。遥控,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一造反,遥控就完蛋。

不听你那一套

无论什么社会里,都有人抗议,都有人不听你那一套。可是,在咱们的社会里,却没有树立起这么一个风气,让抗议的人和不买账的人行使他们的发言权。仿佛山水横流,一冲一条新道。非泛滥成灾不可。权力是神圣的。要不买它的账,就得蔑圣叛经。在多中心的民主制度下,地方权力机关转移着群众的要求和怨气,由自己来应付。同时,公民们随时可以引用合法手续提出异议,撤换当权派*。

在单中心的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合法手续几乎是不存在的**。既然“点路灯的工人也是君主的代表”,那就没法提意见,埋怨路灯不亮。要末就去跟君主本人打交道。公民们平时受了各色各种的气,要出出气,只好拿着选票等选举,所以不买起账来,必然用非法手段,用过火的爆炸性的手段。

这是因为公民和政权之间,并没有订立真正的契约。事实是,法国人的脾气就是要权力使用不当,以便立刻成为不合法的东西。人们不是由于权力是合法的才去服从它;只有大家服从的权力才算合法。

这下子,要么全部,要么全不。很像过去的小学校里,要么连一只苍蝇也不飞,要末就是墨水瓶子横飞。

* 比方说在美国,国会和司法机关在报纸的支持下,用很快的手续,就能够制裁当权派滥用职权。小则撤换民警长,大则停总统的职。

** 在法国,除了选举以外,办法只有一个,只有在议会里提弹劾案。至于行政法院,有是有的,不过行政部门买不买它的账呢?我们在上文已经谈过。

薄弱环节

领导和部下，老师和学生等等，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像驯狮人跟狮子的关系。只有软弱的权力，逐渐衰弱的权力，才会受到威胁。木腐而后虫生。造反也是一样。所以，造反不过是为政权扫除积秽。

闹独立性并不削弱权力，只表现出权力落空，或是拙劣愚蠢。学生只闹那些最没威权的教师。上断头台的，只是最最举棋不定的君主。投石党没法鼓动巴黎市民起来反对红衣主教黎塞留。它只能反对幼主路易十四。查理十世之所以失位蒙尘，不是因为他下了四道谕旨，加强镇压，而是因为他没有采取任何警察手段，管束提抗议的人。波里涅克郡王不是向他下了保证么？圣母会来把一切都管好^①。

造反派不会扛起石臼撞那开着的门。君臣跟师生一样，彼此不停地较量。通常情况下，权力起禁锢作用，不出乱子。但有时候，主子有点不必要地让人感觉到他的威力，他有点陶醉于自己的权威。别人感到了屈辱，就想报复。可是受报复的人却不是他，而是爱哗众取宠的后任。

这就是为什么从上边来减轻权力引起的紧张局面会是那么样困难。在以权力为生命的制度下，老是开明派代铁腕派受过。狂欢过后，权力依旧巍然不动，而且经过了患难，越发厉害。把巴士底大监狱削平以后，普通的监牢里发生人满之患。牢固的环节代替了薄弱环节。枷锁依然能枷人锁人。

反对僧侣，崩断链子

居然有一次坚固的环节崩了。崩掉的虽然只有一个，却是了不起的一个，整条权力的链子因而受到削弱。法国人灵魂之所以

基本上脱离了教会,正就是因为崩掉了这个环节。

自从十八世纪以来,宗教到处都在衰退。然而,除了严格的天主教国家以外,到处的宗教只是一点一点地衰退。奉新教的国度里,宗教影响仍然很强。甚至国家也带宗教色彩。法国有多少看电视的人能观看这些场面而不觉得奇怪呢?美国的宇宙飞行员在舱里礼拜上帝;美国总统在圣经上宣誓;美国国会集体祈祷。

法国跟其他拉丁国家一样,反对僧侣十分激烈。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想发泄发泄的心情。这对法兰西病的加重,起了很大的作用。无政府主义者倒是前后一贯的。他们叫嚷:“不要上帝,也不要主子。”主子依然在位,并且坐得稳稳当当。也许他觉得,那种反对权力的压力,已经向教会转移了过去。可是,这种盘算是危险的。宗教权力总是显得神圣不可侵犯。一旦要想反对起宗教来,自己的权力便不容易显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反对僧侣并没有使权力的类型发生任何改变,只使等级制受到更大的压力。服从与不服从之间的平衡,显得越发靠不住了。

边缘世界

权力像一层皮,很牢固,法国人在这层皮底下形成一个世界。闹独立性的人在那里蠢蠢欲动。这些人是在学校里出生的。他们在那儿学会了怎样骑在分界线上过日子。界线的一边是合法的,另一边则是违禁的。所有孩子们的性格里沸腾的东西,异想天开的东西,任性的东西,情操激昂的东西,都会在同学之间试图在边缘上组织起来。孩子们的小团体,并不纳入学校里的大团体。大团体的活动,花样非常之多,有体育,有娱乐,甚至提倡纪律。所以,小团体只好算结“帮”。哪怕什么坏事都不做,也会对地下活动养成某些兴趣。也许是想抵消一些对官方社会的憎恶罢。

当然啰,许多国家的新市区里,青少年的造反团体,造大人的

反，闹起来会打个落花流水。可是，在等级社会里，却是成年人自己的团体，会变成犯罪的集团。

农民、渔民、葡萄园主、小商人、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都搞暴动来声援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有一些带犯罪色彩的壮举。芒德兰，布纳才尔，还有许许多多百夫长，雇佣兵，各有各的派头，都像一般法国人那样，喜爱搞些不正规的近似豪侠之举。

联合反对

我们是多疑的。我们似乎只会聚集起来反对另一些人，就是不会联合起来成就一些事业。哥儿们结帮，有组织地规避有秩序的社会，就是不愿意从事建设性的事业。

造反精神系统起来了。正如权力思想，经过好些个世纪形成了体系。我们在这儿看出了马克思主义对拉丁国家的吸引力。投票选举共产党的人，往往觉得自己在国内受到贬斥，投共产党的票是表示抗议。但也是表示同情的票。作为理论家，他们在专断的集体主义方面，找到了意识形态的论据。天主教可以提供这种论据，而在政教分离的国家里却是找不到的。共产主义的教条，跟天主教的教条一样，什么都能解释，什么都能作出交代，什么都管。

今天，在我们这儿行的是造反制。人家行的是安定制。也许今后在这儿，也会建立安定制。拉丁人摆脱了神权天授的秩序，一直还没有恢复神志。他们该多么向往罗马人那样去寻找一个新罗马啊！

第四十章 赖皮叫化

我们把自己的幸福，交给国家去经管，又抱怨国家把我们搞得不够幸福。我们向它乞讨^①我们自己放弃的东西。我们还要去骂它，怪它给我们的东西既不够多，也不够快。莫利斯·德吕翁有一次描绘这种态度，用了一句警句，很引起了注意：“一手拿讨饭钵，一手拿莫洛托夫燃烧弹。”

既然人们的主动积极性受到了压抑，既然“政权”垄断了集体生活，那末，法国人怎能不去期待政权给他们解决问题、给他们消愁解忧呢？向国家伸手乞讨的态度，不过是一种抵偿。抵偿什么呢？抵偿中间势力的缺乏或不够，抵偿地方民主和公民积极性的缺乏或不够，抵偿公民参加管理国务的缺乏或不够。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参加吗？

“参加”这个词儿惹出了多少俏皮话呀！词是新词儿。特别是意思新。要同意这个词儿，先得要有新的作风。新作风又能从哪儿来呢？同时，这个词儿的范畴不一样。有时候不过是指管理企业，有时候却涉及社会和国家的哲学。那末样模棱两可的含义，很容易引起人家嘲笑。

对戴高乐将军哪怕是最理解、最怀好感的人，也不免有所怀疑。1963年的一个早晨，我们几个人，就像每天早晨那样，聚在乔治·蓬皮杜的办公室里，谈论当天早上的报纸，拟定就此而需要发表的解释说明。总理对他的亲信* 有点儿挖苦地评论阿尔班·夏

* 奥里维埃·纪夏尔奉命治理国土。弗朗索瓦·奥托里和米歇尔·若贝尔是办公厅主任和副主任。还有部际情报局局长贾克·勒普雷德。

朗东的文章。文章登在《世界报》上。赞扬的是“参加”。雷蒙·阿隆则在《费加罗报》上批驳路易·瓦隆的观点。路易·瓦隆这时候已经由戴高乐任命为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起草“参加”管理的方案*。

乔治·蓬皮杜笑吟吟地抛出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知道什么叫参加吗？谁也没给我做过讲解。”

他每天早晨都要在这样一次气氛松和的集会上，练练他那种老好人式的批判精神。对象是他的所谓“时尚怪癖”，不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我竟然冒昧陈词：

“我以为可以猜得出来。所谓参加，并不仅仅限于分企业的收益。这不过是一种报酬的手段。现在讲的参加，意味着改变社会的结构。也可以叫做集中的分散。

蓬皮杜说：“早就该说啦！我真是头一次听见这么讲法。”

纪夏尔用手指卷一根纸烟。若贝尔和奥托里微微一笑。我这一堂小课上得不怎么样。

我迟疑一下又说：“咱们的国家，着重由最高领导来做决定。这是中央集权制。集权制到哪儿，哪儿就没法参加。反过来也是一样。假如你想在基层，公民在街坊，工人在车间，参预公共生活、社会生活或者职业生活，那就一定要把责任尽量分散。”

这样来说明问题，不见得太高明。此后，我不止一次听见蓬皮杜问人：“你知道什么叫做参加吗？从来也没有人给我做过解释。”他那种深刻的见解，早就感觉到我们的脾性是多么倔犟。“分散制”是一个很熟悉的概念，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现实，而这个现实正是我们思想深处所不欢迎的。同时，“参加”这个词是一个古怪的概念。我们可以借口词义不明，不承认这件事情是新鲜的。

* 主要让参议院与经社理事会合并，成立新机构。

各人自管自，国家管大家

选民们到常设办事处来看我，往往向我提出一些非常亲切的问题。“我的儿子跟我越来越疏远，怎么才能重新把他拉回来呢？”“我的丈夫有外欢，我该怎么办？”这么样贴己的问题，公民们竟会向一个代议士提出来，可以想像，对于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那就更不言而喻了。代议士只好去请教国家。自己不会解决的问题，让国家代替自己解决。如果自己是地方议员，便去找省长。自己是国会议员，便去找部长。他又怎么办呢？由他去想办法。

绝大多数的地方代议士，深深染上了这种集体气质，做起事来简直跟最没办法的公民一模一样。只要国家一伸进一个小指头，市长便把手抽走。几十年来，大家都在谈论扩大市区的权力。而恰恰就是市区本身，大吵大闹要求补助。补助一拿到手，就会限制住自己采取决定的自由。工程交给了国家，自己就不必再操心。中学“国立”，中学归国家管理，自己就不必再管。

这种把责任推卸给国家的趋势，倒很受国家欢迎，正好迎合国家追求权力的心愿。乡绅和行政机构相处得很好，真如水乳交融。不管表面上怎么样，反正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他们是客观上的盟友。行政部门渴望权力，乡绅渴望当知名人士。和好相处的基础是现成的。在许多代议士看起来，最理想的是充当工会的头头，向政权提要求。他们当辩护士，比当管理员更为得心应手。因为中央集权制削弱了主动积极性，而加强了伸手索取的思想。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不顾群众的心理，钻个无聊的空子，想把小市镇跟大市镇合并。一个市镇，不管它多么小，总不太愿意到旁的市镇里去当三家店。在互相疑忌的气氛中，人人都希望有自己信得过的辩护士。

从国家那儿真的再没油水可捞了吗？

是公民都觉得国家欠了他们的账。好些人一点也不放松去收账，不管那账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们在这上面消耗大量精力，远远超过去为重大的进步事业谋求办法。

“让国家给钱，乃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们老害怕自己没能从国家那儿挖出几个法郎而吃了亏。雅克·沙斯德内有一天提议，把国家这个词，都改为纳税人。“纳税人保证农业贷款有利可图”，等等，等等。他认为这样有好处，因为，虽然谁都不曾意识到，“国家就是咱们自己”，可是人人却懂得“纳税人就是自己”。我对这样的结果却信心不大。法国人很知道，国家是靠他们出的钱过日子的。可是，知道了又怎样呢？只是越发促使他们去把国家搞走的钱弄回来。可不要什么抽象的好处，什么安全呀，独立呀，自由呀等等。要的是响当当的，现做现吃的个人油水。人人都想领津贴。每一个人都乐意别人把钱给我。

只是一些懦弱无能的人成为国家的寄生虫吗？不对。恰恰是一些最棒实的公民。

1968年5月，每一部汽车只能给几公升汽油。一位车库掌柜，瞧见一个“揩油大王”，驾驶一辆跑车，先到邻近的一家加油站，灌上了油，再到车库来上油。车库掌柜大加责难，并且一发现这人是五月革命^②三领袖之一，他马上抡起一根铁棍子，狠敲车皮，嘴里嚷道：“你敲别人的车，别人也敲你的车。”大头头开足马力，飞驰而去。新闻记者一拥而来，进行采访。因为这是头一个把“革命”撵走的人。

1973年，这一位英勇出众的人受了灾。一阵龙卷风把他的车库刮塌了。汽车都埋在沙砾堆里。他来找我帮忙。我向同业公会说项，答应给他条件优厚的贷款。重建起来的车库，比原来的更

加漂亮。这笔贷款，加上保险公司给的钱，在我心目中是可以结案了。他却问我说：“那末国家呢？”我跟他解释说，国家要紧急救济灾区的贫苦难民。他摇摇头，表示不信。过后，他又来找我几次，问我说：“从国家那儿真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吗？”

对待违反公民道德的小窍门，十分严格，对受到威胁的国家，爱护备至，然而这位刚强的汉子却根本不考虑，国家要是不帮他，他怎样去恢复残破。

越扶越瘫

一旦给公民和代议士灌输了等待救济的思想，那就不用再大惊小怪，为什么这些人拿不到救济便什么也不肯干。

在十八世纪，这种差别已经感觉得出来：法国人依靠国家，而英国人却只依靠自己。我们引阿瑟·扬的话来作证。他在安茹见到了安日尔农会的常务书记。“他很夸奖我历次访问的用意。不过他觉得十分奇怪，怎么政府、科学院、农学院都不管我的旅费。这纯粹是法国人的想法。他们简直没法想像，私人会放下自己的事情去搞公益事，而国家竟然不出钱。这位常务书记没法听懂我的话。我跟他说，在英国什么事都办得不错，只有国家出钱津贴的事办不好^③。”几年来，英国人变多了*。三个世纪以来，英国人那么强烈的首创精神和责任心，在国家保佑这棵大树底下乘乘凉，大大消磨了壮志。这是英国在二次大战以后的经验教训。

我认识一位公路汽车司机，只要天气好，很爱他的职业。但是他觉得，大冬天在公路上驾卡车，又冷，又有雾，路面又冻冰，滑得要命，实在不是味。他一到10月份便去登记失业，放六个月假，一直放到复活节。然后，他再开半年车。

* 见第十六章“例外证实规律，英国的昏迷”。

这个情况当然不是规律，可也不是例外。这儿划出了一条界线：集体照顾个人，做过了头就会出这样的毛病。国家没法支出超过收入。如果个人只为自己卖力，而对公家便不肯卖那末些气力，国家的收入可不就少了吗？

大家经常谈论犹太人离开苏联前往以色列，引诱他们的是自由，祖先的故乡，以及血缘关系等等。可是不太谈论某些犹太人灰心失望，重新返回苏联。确实有这种不寻常的情况：先逃出一个国家，后来又冒着受打击报复的危险，重新回去。这算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自觉自愿地选择自由的反面呢？

我在以色列向几位准备回国的移民请教。他们回答我的话真蹊跷：采取主动，每天早晨看小广告，找工作，找住房，老是形影相吊，实在叫人心慌。在这么一个制度之下，生活过五十来年，这个制度什么都管，它包围你，领导你，从摇篮到坟墓一直赡养你，忽然离了网栏去搞高空作业，怎么习惯得了呢？既然变成了一节车厢，怎么能离开轨道和车头呢？

结社的弱点

历史家托格维尔曾经指出，法国的私人协会是多么软弱无力。他和英、美做一番比较，认为英美的私人结社活动广泛，生气勃勃，成效显著。英、美私人协会主办的事，绝大多数都办得很好。而在法国呢，这些事都由公家经办，往往办得不怎么样。

直到托格维尔亡故以后半个世纪，法国才颁布 1901 年的法律，给自愿结社以一定的便利。由于国家一直对于任何公民的组合都怀有成见，而现在却要克服这种成见，很吃力。可是，行政制度对我们思想的影响太深，一条法律是不足以改变旧样子的。要说建设性的协会，在我国只有一个典型，就是佩堂克球协会。国家的阴影是那么的浓密，只有像佩堂克球协会那样的紫罗兰，才能

在浓荫下生长*。

建设性的事业,如果目的不在赚钱,比方说,慈善事业,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现在都没有什么发展,而在凋零没落。国家的包办从根子上毁掉了人们自愿服务的热情。鼓励的却是自私。这种消极萎靡的影响,感染了我国人民的整个精神。

脆弱的灵魂

在这儿,我们又从思想结构里碰到了我们在社会结构里曾经发现的东西就是那脆弱性。无论在哪儿,只要等级制不承认个人可以无需依靠等级制,那末,只要等级制一出现弱点,一切就马上垮台。一个社会削弱了自己的生命力,去依靠一个天高皇帝远的权力体系,这个社会必然解体。

显然不用到什么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地方去找原因,为什么有那么些中央集权的帝国,旦夕之间土崩瓦解**?为首的就是罗马帝国。每当一切意志都归最高权力,那末一箭中的就足够了。蛮族就是射出了这一箭。

由于泛滥成灾的政权,抄了别人的家,抄走了人人的能动性,一出乱子便不可收拾。在中央集权以前,法国人也屡遭大祸,但从未殃及国家的核心。善人约翰二世和弗朗索瓦一世,都曾被俘蒙尘,而法国人却筹款把国王赎了回来。查理七世被他亲生的母亲伊萨博宣布为私生子。可是贞德却动员全国勤王救驾。路易七世和圣路易率领十字军东征,打得一败涂地,老百姓只说了一句“活该”。当时的政权,为什么永居不败之地呢?难道不是因为它还没

* 与此相反,我们在第三十九章“闹独立性”这一章里说过,自卫性的协会,换言之,提抗议的协会,却如雨后春笋。

** 雅克·苏斯戴尔论阿兹德克印第安王国。拿当·瓦歇戴尔论印第安的英卡王国,都符合这个假设。

有把个人完全毁掉所以才有个人的力量可以依靠吗？法国人的性格，火烧火辣，像开了锅那样沸腾，多种多样，这样的民族是不大容易丧失斗志的。一堵墙倒下去，咱们还能在瓦砾堆里战斗。

中央集权以后，一次民变，一次战败，国家就会像一座纸牌搭的宫堡那样散掉，尽管在物质上，这时候的国家比以前强大得多。

只要一天一切凭仗国家，那末法国的社会终究是经不住大风大浪的。

第四十一章 废弃不同

国民教育的大总管，从荷包里取出怀表，得意地对拿破仑三世说：“皇上，就在这同一时候，全法国国立中学五年级的学生，都在做同一篇拉丁文翻译。”这位大臣所得意的，正是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所引为得意的东西。也就是法国人得意之处。

1962年的一天，戴高乐对我说道：“咱们的造化，就是有个一元化的国家。人人都遵守同样的规章制度。分散主义和不平等现象都没法存身。联邦制的国家极不容易管理自己。瞧瞧美国和德国。各邦各州，自行其是。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前，戴高乐已经改变了看法，而且并不加掩饰。这很需要勇气，因为统一的理想深入咱们罗马性格。罗马凭仗自己的军团，曾想统一世界。教皇给“罗马和全世界”赐福。这完全是一码子事。1793年和1917年，都有革命的救世主义，都梦寐以求国际主义。1793年叫的是：“人民群众，团结起来！”1917年叫的是“全世界无产者……”现实还在作梗吗？叫人人都遵守同一些原则，还办不到吗？至少在一个国家里，一切不同是抹杀了！

齐整划一的威望

然而，一切人类文明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进化全凭各别，千篇一律便是死亡。更新有如暗泉一般，从对比中涓涓流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来将我们的军，我们的智慧就会瞌睡沉沉。进取心，事业心，都会随之泯灭。一心只想整齐划一，会把人搞得贫乏虚弱；

人人本来能够为共同的事业提供别开生面、独出心裁的东西，都会连根拔掉。

统一这个东西，是不是因而更加可靠一些呢？得瞧瞧再说。对于统一的真正感情，不正是从合法的多样化里面产生出来的吗？也就是说，从忍让里头产生出来的吗？这是伊拉兹马斯的想法。可惜没有成为法国人的想法。

我们从天主教的思想里特别记住了世界性和天主教性。这才是纯正的学说。后来，大革命又鼓励我们去把法国框在几条总概念里，就是说框在几条无所不包的概念里*。跨越国界的，不再是法兰西的旗帜，而是人权和公民权。法兰西是理想的发源地，它能把任何人纳入它的公民集体之中。

法国的世界主义虽然让我们吃过亏，却也出过奇迹。作证的人那么多，而加司东·莫内维尔仍然出来提醒我们，我们又怎能不兴奋呢？他说：“在小学里，我听说欧洲有一个国家，离我们那个穷乡僻壤几千公里，据说，任何自由人想起这个国家，都怀着感激的心情①。”

法国的殖民活动是富有同化力的。军队，地方行政机关，以及相当一部分居民之所以幻想把阿尔及利亚人跟法国人溶为一体，那是因为这个幻想符合于统一思想。从敦刻尔克到达芒拉赛都是如此。

完全相反，基督教的分散主义思想，有时候发的是相反的疯，发那种族隔离的疯。丹麦人对格陵兰的爱斯基摩人；布尔人对非洲的班图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都心安理得地说：“这种人跟我们不一样。跟他们打交道是害他们。还是由他们在保留地里呆着好。对他们也好，对我们也好。”

* 法文的优越性，不足以满足我们。非得要宣扬它的世界性。从杜贝莱到利瓦罗尔，很快就跨过去了。

从迷恋统一到迷恋平等

在法国人的心情里，最恼火的莫过于撞上个人的特点。因此，咱们便竭尽所能加以排除，什么都可以用环境不同来解释。这个青年杀了人，说是由于他苦难的童年。可是忘记了他的兄弟度过一样的童年，却并没有杀人。

就这样，迷信原封不动。人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环境。“过错全归运气坏”，这是命定论；“过错全归社会”，这是革命派的说法。

如果强调智力因人而异，就会猛烈地触犯我们思想深处的人类统一感。如果说人是“讲道理的动物”，那末“起码的理性”就应该是人世最普遍的东西。宗教能把人当做是平等的，因为人在上帝的眷念中是平等的。离开宗教来谈平等，那就只好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空想就是打这儿来的。托洛茨基说过：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异化，“中等的人都能达到亚里斯多德，哥德，马克思的水平^②”。

迷恋统一，结果一定迷恋平等。二者都同样毫无作为。人若不想超越，便不会进步。谁愿意的话，也可以这样说：人若不想赶上别人，便不会进步。如果以赶上别人为目的，那就显然有不平等，有起创造作用的不平等。

平等统一论者，排斥赶超的本能，而这却是历史最大的动力。若说在起步时让大伙排齐，那还罢了，可总不能取消赛跑吧，不能把赛跑的人用一根链子绑在一起吧！

统一主义害统一，平等主义害平等

中央集权国家的神话，自然会加剧对统一的迷恋。不承认差别，也是一样。人们要求国家当一台压路机，把什么都压平。穷人

让富人偷了抢了，这是国家的过错。反过来，国家经常利用统一主义和平等主义为自己病态的干涉主义，作最有效的辩解。

统一的国家发展了自己的力量，而统一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地方和地方的不平等，地区和地区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尽管国家一直不断地在过问一切。国家能起堵塞的作用，却起不了统一的作用。平等主义的国家，过问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不能把平等建立起来。

为了保证更多的平等，维希政府于1940年决计制定“区域差额”：公职人员的薪金和住房津贴，家庭补助，都是城市高于农村，大城市高于小城市。生活开销贵贱不平均嘛。过了二十八年，办法没有变，而条件却完全变了。行政部门照旧不动声色。一直等到达成了戏剧性的格雷内尔协议，才在几分钟内采取了决定。这是二十年来工会和议员们经过无数次交涉要求而没能办到的。

中央集权制的基础是这么一个原则：“以统一来取得平等”。可是，万一中央集权制既害统一又害平等，那怎么办呢？怎么能害统一呢？因为不尊重多样化，便没有真的统一。请看布列塔尼和科西嘉岛，尽管经过好些世纪，从行政上加以铺平摊齐，但是至今仍然受到强烈的引诱，一心要闹独立。怎么能害平等呢？因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原则上应该过问事情，起着纠偏的作用，其实反而阻碍了自动调整的作用。你说怪不怪？在工业国家中，法国是最集权的，可是不平等的幅度，无论在财产方面，或是在收入方面，都比别国来得大^③。瑞士和荷兰，中央集权最差，可是不平等的幅度最小。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与此同时，倒是法国人最恨这种差距。就这样，中央集权制在我国，爱出馊主意，维持了不平等。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厉害。而人们痛恨不平等，也比在任何其他国家来得厉害。因为，大家以为，中央集权本来为的就是废除不平等。

尽管平等和统一都有进展,但是起作用的完全不靠中央集权,而是全靠技术的进步。二十世纪最可观的现象是什么呢?在一切先进的国家里,生活方式和社会条件,都越来越相类似。中间阶层膨胀起来,一方面啃掉无产阶级,而另一方面则啃掉最富有阶层。在一个越来越稀薄的社会里,凝结在一起的大块块,一个接一个地消逝了。物资和劳务的价格,相对地降低。视听工具传播日广,起统一作用十分迅速,远非往日的国家力所能及。

按逻辑来说,这些进步总该减轻一些争取平等的激情了罢?可是,恰恰相反,激情反而更加受到了刺激,比二十来年前更加活跃,更加普遍。跟十九世纪比起来,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十九世纪,总的来说,不平等是彰明较著的,甚至是足以自豪的。问题是,“最好的逻辑”同人的感情和行动,关系并不那末大。托克维尔曾经指出,不公平的事情,在完整的时候可以容忍,到了垂亡的时候反而没法容忍了。

外国观察家往往指出,法国人天性嫉妒而且喜欢打官司。不过,在过去,这些健讼迷尽打些地界、遗产等等的官司。现代化的生活里,一切都“群众化”了。打官司的范围扩大为阶级斗争,更加激发了一向无法容忍的不平等感。

今天,跟“全盛时代”和二次大战中间比较起来,不平等确是少多了。但是却更加起眼,因此也就更加刺激人。电视和杂志,到处传播奢华的生活,使梦想的东西,远方度假,日常深入人心。财富越来越多,人们的消费欲没法再加限制。以前有了一双木屐就满意了,今天有了三双皮鞋,只要邻居有五双,那就会大不满意。人们不再能够容忍任何差别。收入的扇面尽管越缩越小,毕竟仍然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一撮一撮。不平等是后退了,社会上眼红吃醋之风却有了发展。

对于不平等的传统看法

古怪的很，正是这种缠扰人心的嫉妒，证明了人与人的平等正在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嫉妒心又从集体的心情里抹煞了这种进步。我们闭上眼不肯去看这种进步。

传统看法的词典里有这么一条：在法国，最低和最高工资的差别，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大。然而，法国的工资差别，尽管跟权力分散的先进国家比起来，略为大一些，但跟中央集权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比起来，差别却小得多。

比方去看一看公共部门的工资，人们就会发现，徒手工人领到的最低工资，跟部长的最高工资比较起来，在法国是一与十二之比。这是说在没有纳税以前。在苏联是一与三十之比。如果把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得到的物质好处，诸如别墅，官邸，内部商店等等，都算进去的话，那个差别就大得没法衡量了*。

要求平等的激情，在收入的对比方面，表现得最为猛烈。其他任何方面都赶它不上。关于不平等的统计数字是很不好运用的，可是往往有人昧着良心乱加运用。比方说把人按收入等级加成总和，而不管年龄的等级：把十八岁年轻徒工的工资，和快退休的工程师比。这样统计的结果却能耸人听闻，但是是骗人的。假使把同年龄的工资彼此相比，那就会发现青工开始工作时的工资，差别很小，不过一与三之比。最沉重的负担是成家立业和培养子女。今天法国的青年去应付这些事情，已经不像从前。从前的那种不平等，可以说是惨无人道。

* 在中国，世界闻名最平等的国家，差别是一比十六。公社壮劳力二十元，外科大夫或舞剧名星三百二十元。

机会均等

直到不太久以前，我们那种平等主义的被虐狂，居然饶过了一个部门，因为全体法国人都从儒勒·费利开始，认为学校是一个晋升的工具。1964年，有两位青年社会学家说服了知识界，说学校那个东西不仅不给每一个人以晋升的机会，反而成了社会的保守因素，把“世家子弟”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抄袭原封不动的社会。

这个论点真是一鸣惊人^④。从这里面可以衡量出来的，不是日渐衰微的不平等，而是成比例滋长的平等主义激情。像那末样富有批判精神的法国人民，尤其是知识界，怎么会落进这么个圈套？两位社会学家根据1961—1962年的统计，提出了他们的论点。他们认为，法国的有劳动力人口里面，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六，而在高等教育里面，工人子弟只占百分之六，这是骇人听闻的。但是，1945年只占百分之一。1958年只占百分之二点七。而他们那种定局思想，很难预见到1975年将占百分之十三。在三十年里，按比例增长了百分之一千三百，按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六千。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工人子弟进大学的人数增加了六十倍。这难道不是近今给人提供最有力的理由让人们乐观乐观吗？同时，眼睛可以作证的东西，何必要靠统计来确定呢？问题只在于肯不肯把眼睛睁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里，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如果不戴硬领，不戴卷边黑礼帽，不带绸裹的黑雨伞，那就会觉得失了身份。要求的不是一般资产阶级的装束，而是大资产阶级的打扮。今天，大家都穿卷领毛衣，蓝布工作裤，怎么样分辨得出总统的儿子和看守栅栏的儿子呢？也许是赶时髦，不过赶的是平等的时髦，而不是不平等的时髦呀。

正当我们那两位社会学家引起大家谈论以一年为准的统计数字时，教育制度起了大变化。法国实行了普遍和强迫的中等教育。

民众的学校和资产阶级的中学校混合起来，将会在财务上和学识上破坏这两位社会学家的论点^⑤。当然，这是从长远来说。

他们二位说，学校“为统治阶级服务”，造成收入不平等^⑥。这又是一个错误。因为，学校起的晋升作用，尽管比较缓慢，但问题不在财务而在文化。这恰恰跟咱们积重难返的思想习惯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这种缘故，让“法兰西病”缠绵不愈^⑦。这事关系到语言和精神环境，与银行存款和社会地位无关^⑧。小学教师的儿子，比卖“好黄油”发财的子弟，考起文凭来却地位优越得多^⑨。

这个论点，比马居斯的论点更加容易触动人的思想。引马居斯论点的人很多，而读他书的人却不那么多。奇怪的是他的论点反应那么大，而批驳这个论点引起的反应却那末小^⑩。这是因为我们不肯要那些不合我们成见的东西*。

绝望的学校

绝大多数人的想法，都觉得不平等和差别，都是钱的问题。这是第一种简单化。第二种简单化是把“钱”当做一成不变的宝藏，简直没有办法不这么去想。问题只在于如何去分这笔钱。有人多了，就有人少了。我们永远只会像过去的农民那样去对待财富，邻居占了这块田地，我就没得了。

既然谁都不肯轻易放弃他那一份儿，那就再也想不出旁的办法来克服收入的不平等。唯一的办法只有搞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没有深入人心。人们还不习惯去想，收入少的人要增加收入，不必去分收入多的人的东西，而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边边上增

* 你说怪不怪？这两位社会学家，还有别人，都没有根据精神结合，来做区分。比方说，基督徒学生的人数，比按人口比例该有的人数超过十倍，比奉犹太教的学生超过二十倍。这种不平等体现什么呢？难道不体现思想效率较高，文化环境比较适合吗？但是，这样就触犯了教条。教条说的是：人生而平等，不过由于收入不平等而受到干扰。

加自己的收入。至于那些收入多的人，也能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宣扬公平的人到处去说，“社会越富，差别越深”。这完全是与真相不符的。但是很吃得开。其所以吃香，正因为迎合了那种抽风式的故步自封。

无论在收入问题上，或是在机会问题上，反正那种平等主义的思潮最终只能从根本上破坏这么一种想法，即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教育能够把社会调动起来。

在我们那些绝对平等主义者看起来，决不能让任何人怀有这样的希望：听凭要求改造的力量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不知不觉地起强大的作用。他们主张改造来自外界，而且要首先来到。除了通过革命，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外，决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妙药。

这样的理论制造出的革命家，就能让一百个读者灰心丧气。这样炮制出来的平等主义，能扼杀赶超的本能，不让任何人去赶上比自己强的人，一把揪住了人不让动弹。

任何向平等迈进的社会，都面临一种危险：刚迈到门槛上，就发生一种动机瘫痪症。1957年，我访问乌普萨拉大学。米歇尔·福戈给我当向导。当时我很觉得古怪，因为我听说：困难在于让瑞典的大学生懂得为什么一个人应该工作。既然各人的收入都由税收压平，既然社会主义把社会威望用刨刨光，既然上街卖香肠和在大学里教数学、既然给人洗汽车和当考古学家挣的钱一样多，那末何苦去下功夫学那些深奥的科学呢？既然报酬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而责任加重了却毫无报偿，那末又何必在企业里卖气力呢？

这样一天是会来到的，比方说在英国吧，人们追求平等，把繁荣的源泉都搞枯竭了。可是如果没有繁荣，又哪来平等呢？在法国，扼杀能动性的平等主义祸害还没有窥伺我们的经济，可是，眼红吃醋的平等主义祸患，却一直在窥伺着我们的社会。

第四十二章 崇尚空谈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特别爱干的事情，那肯定就是说话。阿密艾尔曾经说过：“在法国，人们总以为，说了就算做了。”其实这话可以适用于任何拉丁人民。诸如达尔大兰，努马·鲁美斯当，都是拉丁式穷嘴的典型。“我不讲话便不思考。”还可以补充一句：“但是我讲话就是行动。”我们讲起话来象皇帝：出口便能定善恶，辨真伪，扭转事物的趋向，仿佛行动只是一场梦，要什么有什么，怕什么就失败。

我们真佩服那种人，在说话的艺术上显得那样充满自信，那样妙绪泉涌。我们并不期望他们动手真干，只要他们话说得漂亮。

在十八世纪已经是这样。格利姆介绍一本小册子，又是一本“谈粮食买卖”的小册子，他写道：“所有赞成或反对这本小册子的，如果有一个人在发表见解以前能够勉强回答五十来个必须澄清的问题，我宁可输掉脑袋。管理一个国家，开辟富源，光靠漫无边际地摆龙门阵是不行的^①。”

成就是次要的

在法国，有理就象打网球轮到发球。轮到你便暂时用一用，用过就丢开，反正思想不过是游戏。英国和美国人说：“你是对的。”等于说走的路对头。真理不是玩艺儿，不是谁有谁没有的问题，不能随便调换，或者看时兴不时兴。真理是态度问题，看你是否全部接受。

有一本书叫做“高中毕业考试哲学论说题”。其中一个题目很

有代表性：“有人说，重要的不在结果，而在用意。试分析这一判断，并证明其价值。”好一个价值！官方的学说，并不在于隐讳自己的看法。我们所受的教育里面，从不让我们习惯于把现实当作试金石，把成就当作考验。相反，我们都倾向于把现实当作不纯洁的东西，把成就当作次要的东西。每逢挫折，过错尽在客观因素。

这种专讲用心的知识阶层，高谈阔论起来，滔滔不绝，不爱把议论变成行动，即便行动起来也比较拙笨。这是拉丁国家的特色。知识分子最欣赏的是“提问题”。提了出来就搁在那儿。英美人的做法一般相反，他们不太爱费工夫去提出他们不想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祖国高在思想的天上。我们不想下来。现实是俗不可耐的。行动能把人搞脏。讲效率是耻辱。今天的知识分子跟往日的贵族一样，都不肯失身份。

很少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撒下的种子有象咱们那么多，可是收获多的却是别人。咱们经常让别人用计巧把咱们天才的果实拿走*。理论研究相当高明，而实际应用却多么差劲！谁都没能象法国人那样，给人权和民权宣言写出那末样出色的警句。对一些宪法和法典也是这样。然而，法国人就是不容易遵守自己的宪法，或者在各色各样宣扬自由的甘霖下，让真自由的花朵开放。

在现实的推动下，有些东西毕竟在变。有些新的领导接触到了实际，受到了启发。有那么一种反知识阶层在法国生长起来，他们是从生活里产生的，现在已经逐渐逐渐地使我们的经济活跃起来。这个反知识界很活跃，并且很自觉。可惜跟知识界没有多大联系。而知识界则看不起这批“青年干部”，同时又夹杂一些害怕的心理。其实，这两种人，很可以取长补短，相互丰富起来。

* 蒸汽机原本是法国人发明的。汽车，轮船，飞机，原子能，无线电，电视，激光，集成电路，本来也都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付诸实用，分享收益的，却是英、美、德、日几个国家的人。

不现实的现实效果

可是，老不理睬现实，也会改变现实。从十八世纪以来，法国历史是在探讨理论的影响下，向前迈进的。突然之间，现实在思想的压力下破碎了。大革命完全可以叫做法·兰·西大革命。这是知识分子的杰作。他们已经下了半个世纪的功夫，可是，革命一爆发，他们却毫无准备。列宁在瑞士隐居的时候，很清醒地拟订了夺取政权的剧本。而咱们的“哲学家”怎么样呢？一听见抽象的概念，诸如自由，正义，所有制，马上激昂慷慨，可是对于权力的具体结构，却不加考虑，根本不去预先筹划怎样进行改造。

这种不现实的作风，很触动了我们那位没法代替的、头脑实际的见证人。1787年，阿瑟·杨格路过里摩日的时候，受到“农业协会”的招待。“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发表一些狗屁不通的议论。这没有什么关系。农民根本不识字，决不会去读这些文献。但是，他们可以看得见，如果创办一个农庄，使用良好的耕作法，值得人家模仿，这才有教育意义^②。”阿瑟·杨格到了里昂，访问一位博学之士，他是“农学词典”的作者。那人对我说：“如果你想得到一些有实用价值、日常可用的材料，你就该去请教普通的庄稼汉。你会发现，他那种口气和表情，都认为这些东西是不配称之为科学的^③。”

词句和事物

不现实的头脑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就以归类的办法来应战，把事物限于分类，分等。现实越搞不清楚，咱们便越想把它写成一篇文章设法把它说通，从而好加以处理。这种作文的狂热也总结了我们文化的特色。我们酷嗜抽象、法律和乌托邦。我们喜爱形式甚于喜爱本质；喜欢发书面命令甚于跟人去直接接触。在发命令以

前,从不做心理上的准备工作;发出命令以后,又不去检查执行命令的情况。

为了应付国际竞争,私人企业不得不引用英美的技术,采取进口的词汇,诸如工程和租借,管理和交际,推销艺术和商品设计,都用英美术语。英·式·法·语泛滥成灾,光靠筑堤防堵是没用的。这不过是一种现象,显示出人们的思想虚弱。我们跟别人打交道,跟现实打交道,老显得不带劲儿,有点笨手笨脚。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系统地组织过这种学习。英美人从小就学着过现实的生活。只要人们老用公式来教机械的理论,老不会装一个活塞,拆卸一个碳化器,那么法国人则永远在抽象中思考问题。

是审判官都知道,打官司打得最起劲的,往往是案情最轻的。大理院举行联席会议,解决一个公司合同的特性问题。问题在于到底该不该缴登记费。登记费多少呢?一个法郎又二分半^④。肯定一项受到藐视的权利,就值得大费气力,尽管费了那么多气力,实际上毫无作用。法国人可以去跟西拉诺一道背诵这句名言,其实不过是从唐·吉诃德那儿搬过来的:“不、不、最高尚的是没用的东西。”

对地理历史的无知

“法国人不懂地理”,这在外国已经人人皆知。其实呀,比不懂更糟的是满不在乎。在法国人心目中,法国以外什么也没有。阿瑟·杨格在贝齐埃小作逗留,跟一位“衣冠楚楚”的商人聊天。“他问了我三四次,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问:这地方有多远哪?我说:八百公里。他说:八百公里!好家伙!真远哪!”杨格还举了好些例子,并且把“这种难以令人置信的无知,跟英国如此普遍的知识^⑤”做了一番比较。今天,法国人出远门的多了起来,但这只是最近的事。但思想上还是无知。我们最不知道的现实,

正是我们自己的现实，几百年来，躲在我们思想的城墙背后，夜郎自大。我们自我崇拜，闭关自守，深闭固拒，按自己的习惯，随自己的方便，去解释我们的盛和衰。我们的人民正在慢慢地成熟起来，一定要能够经得住现实的考验。只有等到自信心够了，能够正视自己历史了，那就不用不着自欺欺人了。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我们又在这儿看出了我们的脆弱性。我们对待自己很不现实，因而时而振奋，时而沮丧。正因为我们对外国缺乏牢靠的认识来作判断的根据，所以一会儿天花乱坠，一会儿索然气短。我们没有那种本领，去做恰如其分的自我批评，既不落入自我陶醉，又不落入自我鄙薄。自己点起香炉恭维自己，自己挥起荆条自怨自艾，各走极端，结果都是为了规避行动，免出气力。不是觉得好得用不着费气力，就是觉得坏得再使劲也没用。

我们不甘心承认进步，尽管众目睽睽。我们照千篇一律的老样子过日子，从不考虑这些东西是否过了时。比方说：“法国人不看书。”大家一直引用老的统计数字，甚至引用袖珍版书册以前的数字*。1974年，我请人重新做了统计^⑥，从中可以看出法国人开始看书了**。这是小小的一次革命。可这一次调查统计，差不多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法国人没有文化”是应该作为定论的。

我们仿佛是水银珠，一滚就从傻乎乎地陶醉于自己的集体天才，滚到最最黯淡的心虚气短。自从大战以还，心虚气短占着上风，而恰好是萎靡不振的客观原因大量消失的时候。

这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种倾向，把实在重要的事情当做不重要，而把不重要的事情当做重要。这种摇摆曾经引起过悲惨的后

* 四个法国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每年看四本书。

** 从1964年到1974年，比例变了。三个法国人里有两个一年看四本书。

果。法国因为失掉了冷静，向人宣战而又吃了败仗。过分想入非非，不现实，于是以美梦开始，而以恶梦告终。1870年，一赌气跟德国闹对立，一直对立了七十五年。假定皇帝带点儿皮里阳秋，议会沉得住气，人民比较现实，那就不会因为一封电报让自尊心闹个晕头转向。在今天看起来，这封电报里简直找不出什么无礼的词句：“陛下拒绝再接见大使，并派值班副官通知他说，陛下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告诉大使的了。”

法国人的想像力是容易波动的。两百年前，拉·哈尔普曾经说过：“在法国，今天很时髦，明天就挨讥诮。”

缺乏持续性

如果因为经常担当责任，而能磨练出什么感觉来的话，那肯定是对时间的感觉。一位市长肯定知道，从他当选的日子算起，拟订计划，进行必要的调研，需要一年。把相应的经费搞到手，至少需要两年。在最顺利的情况下，总要到他任期的第四年，他的市政才开始显出成就。

初次负责的新手，恨不得马上见效，就象阿努伊尔剧本里的安底高纳那样，边跺脚边叫嚷：“马上就要，不然，我就不要了。”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想叫我们耐心一点呢？他们答应照办，只要求给一个期限，他们提出的期限便没人接受。只要他们一提中期，别人就冷笑：“明天吗？明天刮胡子就不用给钱啦。”

人民管得太紧，就没有机会去学会知道现实也是专制的，并不是你想多快它就多快。

管得太紧的国家，缺乏长时间的耐性，不象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的人民那样有耐性。法国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在现实中考虑问题，就象在梦境里考虑问题。他们要那种什么都能解决的思想，能够压平现实的思想，要那种理想的综合，能把现实生活里的矛盾和

古怪的东西,统统调和起来。可是,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比认真的综合更加困难呢?

就象做梦,揉合在一起就算综合。我们的政治天地里,这种半真半假、甚至乱搞一通的东西是很不少见的。逻辑精神把地盘让给魔术精神。有时候,政治思想的专家们,考虑问题跟巴雅尔一样。在巴雅尔看起来,宝剑是光荣,火枪是耻辱。这样揉合一起,结果害了他的性命,让火枪打死。光荣是保住了,但不免叫人怀疑他的现实感。“你抓住粉刷子,我抽掉梯子。”这就是一部法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多少次,以为抓住了粉刷子,就能够挂在天花板上不摔下来。在许多抓住了就能让人不摔跤的粉刷子里,最通常见到的是这么一把:我们的好心肠和坏思想,发明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杂拌,叫做平等的集体主义。多么理想的制度啊!大家都得接受严格的公平分配,既消灭了利润,又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后保证了公民的全部自由。公民实行自治,既摆脱了国家的权力,也摆脱了资本家的权力。

法国人的慷慨宽宏有点梦意。他们梦想把1848年的或者是巴黎公社式的革命理想,跟今天工业社会要求的高效率,调和起来。

心理的传染病

法国的动乱,与其说出于问题多,不如说出于误解多。比方说,怎么能讨论资本主义而不起误会呢?因为,在这个吓唬人的名词后面,人们追逐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掠夺制度,而是工业社会的现实,而人们既要求这种社会的福利,又拒绝接受这种社会的约束。

在一个可以忍受的国家,和一个深恶痛绝的国家之间;在一个神化了的国家,和一个非神化的国家之间,法国人随波逐流,一阵风刮过来,便一齐惊慌失措,集体发疯。

这种“心理传染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大概是由于不直接负责，由于没有在政权的现实里扎根，由于每一个人深切地感到无能为力。偶尔发生的事件，哪怕微不足道，也集中了这种隐忧，这种对制度的不信任，这种事情搞得不对头的印象。只有国家能够起点作用，但是谁也影响不了国家。一旦国家给人一种失去了控制的感觉，那么大家就会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这时候，法国人会觉得自己跟那些谴责政权的人心连心。没有人再去靠拢国家，国家周围变成了真空地带。每逢矿工、邮政工人、农民起来造国家的反，舆论总跟他们一条心。然而，什么也代替不了国家。过了几个星期，屋里太冷啦，信件寄不到啦，公路堵塞叫人够受啦。木偶戏里的二流子吉涅尔固然打了警察潘道尔，那是木偶戏的小戏台上呀！孩子们也梦想来这么一手。可是走出院子，警察仍然在那儿招呼孩子们过街。

第四十三章 我们的宗教战争

我们彼此并不相爱。我们要求思想一致，而却挣扎在争吵不休的恶梦之中。要是只想看见一个脑袋，就得砍掉好多脑袋。梦想的统一导致了现实的分裂。

在一部电影片里^①，宪兵司令想连根治好国家害的病症，就象葡萄园主根治葡萄虫那样。那些病症都叫什么什么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往往跟这位宪兵司令一样，尽管各有各的葡萄虫。

全 白 全 黑

我们的政治生活受了善恶论的毒害，“不是全白，便是全黑”。政治生活的实行家有时候看到了这种现象。有人去成立一个俱乐部，反对“把一切辩论都极端化的倾向^②”；另外一个人则去谴责学校就一切题目打“内战”，诸如“拉丁文问题，文凭对等问题，教学方向问题，师资考试问题，论文问题，多学派问题^③”。问题的单子随着时事而异。因为这种无聊的内战，生老病死，来得突然，去得飘忽，就象雷阵雨。怎样才能改变气候呢？

我们简直没法懂得，真正的统一乃是从多样化里面兴旺起来的。西格弗利德怀着大教育家的耐性，讲解瑞士政治制度恰好跟法国相反。不错，瑞士是统一的，就因为各州都有自己的主权，就因为从来^不费劲去统一四种语言，四种宗教；也因为格利崇州的人治理自己的州，跟瓦莱州人治理自己的州不一样，日内瓦人治理自己的州，跟佛州的人不一样。是的，瑞士是统一的，因为它愿意自

已是各种差别聚集起来的一束。在瑞士，几个世纪的地方民主，根除了那种咄咄逼人的狠劲儿。这是社会的莠草*。

我们的民主还是未开垦的荒地。咄咄逼人的狠劲儿象野草蔓生……咱们来采草做标本吧。

好战的人民打内战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里，就数法国跟别国打仗打得最多。打仗的年代和不打仗的年代比起来，打仗的年代多得多。

卡东在罗马时代已经指出，高卢人有两种激情主宰一切：“打仗勇敢，能言善道。”^⑤而斯特拉蓬也说过：“高卢族是打仗迷，暴烈善怒，勇敢好斗^⑥。”中央集权国家是从战争中产生的，回过来又培养我们好战的本能。尽管欧洲各国自相残杀是一种慢性病，但是谁也没有法国那样干得起劲。

我们那股子骠悍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爱打内战。孟德斯鸠早已指出，法国历史中“有很多内战并没有引起革命”。假如他活到了今天，他一定会把“没有”改成“有”字。

早在1789年以前，民变是咱们的民族体育活动。从十字军征讨法国南部阿尔比地区，一直到“面粉”战争，中间经过“天主教联盟”的战争，圣巴尔戴列密大屠杀，围困拉·罗歇尔的新教徒，“投石党”，路易十四派出的“龙骧军”，讨伐新教徒卡米萨尔，农民起义，以及巴黎和外省无数次暴动，都证明了一部法国史只不过是一部长期的内战史。谋害凶杀，警察冲锋，毫无理性的事情，充满着这部历史。

蒙戴涅把这种动乱叫做“政治病”。毫无疑问，四个世纪以来，

* 很奇怪，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爱提瑞典，而不提瑞士。可是瑞士的政治组织，按人口的生产额，社会治安，都在世界各国里领先。瑞士的优点是出人意料的，它居然克服了语文对立和宗教对立这一弱点。最近的论战^④不能抹杀这个事实。

法国吃这个病症的苦头，比任何其他先进国家都来得厉害。法国道路管理局为街垒支出的费用是无可比拟的；唯一可以比拟的，只有它还在为纪念街垒支出的费用。

我们历次内战中，最惨的是宗教战争。至今创伤还在。这是一次激昂慷慨的残杀。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法国选择阵营、举棋不定的时间最长。先是国家分裂，继之以武装分裂，为祸几乎达一百年之久。尽管出了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国家分裂依然，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旧制度崩溃。大革命又给了这种分裂以新的形式：即教会与国家的冲突。

要理解我们今天的心灵里所留下的过去这一时代的痕迹，必需回忆当年人民曾经舍命自相残杀。1535年天主节，京城里一片狂欢。弗朗索瓦一世带着圣歌队上街游行，仿佛摆祭坛似的，沿街搭起二十五堆干柴，焚烧二十五位新教徒。玛利亚纳是一位狂热的耶稣会信徒，当然毋庸置疑他会有什么所谓的温情主义，他是这样描绘圣巴尔戴列密惨剧的：“有些人是奉了王命杀戮的。大多数是百姓宰掉的。有的杀死，有的杀伤未死，绝大多数是些毫不相干的人死于非命。每逢百姓造起反来，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⑦。”

亨利四世不得不施加压力，让巴黎议会的法官登记在南德城发下的谕旨。然而，法官们很能体会群众的心情，所以竭力反对南德的上谕。亨利四世当时发言，形同孤家寡人，空谷足音。他说：“再也不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视同胡越了。一定要胡越一家，都当善良的法国人……决不可能强迫新教徒改奉天主教。我决不让我的羔羊血流成河。我要象一个爱民如子的贤君，把四海苍生团结起来，决不象暴君那样使用暴力⑧。”

结果呢，这位君主仍象暴君那样遭人刺杀。过了一个世纪，这个南德谕旨被追废了。全国舆论差不多一致拥护。在法国，偏狭成性。后来以千百种形式发展起来。

这种宗教的善恶论，一直持续到1960年。在多菲内省，盖拉斯，或是赛费纳的山谷里，有一些天主教和新教的农民集体，被历史遗忘在那里，零零落落地居住在一起。他们从不并列在一张候选的名单上。他们彼此称呼“白派”，“红派”，“右派”，“左派”。这一派不到那一派的铺子去买东西。路上，人行道上，迎面不打招呼。不在一起打弹子，不在一起谈恋爱。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上帝，自己的圣堂。经常这里烧掉一座天主教堂，或是那里烧掉一座耶稣教礼拜堂。不是报复什么暴行，便是报复什么污辱。这些法国人并不是生番，不过比别人保守得长久一些罢了。

日常的咄咄逼人

除了打内战和打外战的纪录以外，法国还保持另外一个纪录，那就是平时那种凶悍气。这种凶悍之气，郁结在心头，成了内在的东西。正是在法国，车祸按人口的比例最高。其真正的原因，好象是心理方面的。权力的欲望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一心想肯定自主自决权，而实际上又办不到，那就闹一些不合乎公民道德的事，拚命想出人头地，高人一等，不愿意别人比自己优先，开车要开过划好的白线。总之，处处表现一种凶悍之气。

这种凶悍之气借酒来维持，这又是一项新纪录。又是一项新的禁区*。

法国人需要发泄发泄，便猛开汽车，猛上酒馆。假如象别国那样，有那种有组织发泄、消遣的地方，法国人还会来这一套吗？

罗马属下的国家有面具游行狂欢节。拉丁国家，无论在欧洲

* 法国产酒，居世界第一位；而进口酒类也居世界第一位。男女四百万人嗜酒成癖。车祸百分之八十五都死人。劳动事故的百分之十五，犯罪行为百分之十七，都由于酗酒。医院病床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病号是因酒精致病的。平均每年，社会保险机关要为此支出一百亿新法郎⑨。

或是在美洲，都有斗牛会。弗兰芒人有狂欢节。天主教德国也有狂欢节。平时制度太严密，把社会压制得太厉害，岂不需要发发集体的疯，来弥补弥补？罗马的皇帝都觉得过节是统治国家必不可少的东西。多米先大帝把纵情狂欢的神农节，延长为七天。在七天里，奴隶和奴隶主平起平坐。

只有发扬个人自由的国家，才不搞那些传统的节庆。政权控制越严，便越需要大搞节庆。法国不大搞节庆，也许是一些崇尚清苦的教派遗传下来的。可是，本不想搞的事，会不由自主地搞起来。“求仙不成，反落魔道。”既然公家不组织狂欢节，公民们便自己寻求发泄凶悍之气：脱离现实，逃避现实，搞革命，搞罢工，出车祸，血漫星期天，驾汽车打架，酗酒闹事。

咱们的个人主义，老是气鼓鼓的。动不动就争吵。法国曾经有一个长时期，盛行决斗之风。今天虽然不大动手，但仍然一冒火就大吵大闹，说些激昂的威胁话。在文雅一些的阶层里，用的是舌剑唇枪。看来轻描淡写，其实更为有效。这方面本领高强的人，到处受人看重，甚于理性和学问。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出于难医心病。

“最有风趣的民族”现在往往显得不那么有趣，反而有点讨嫌。仿佛我们一心要证实柯克多的那句话：“法国人是脾气不好的意大利人。”

个人也罢，团体也罢，反正我们就是酷爱互相折磨。这种嗜好，奥地贝尔底把它叫做“自作”。这样的彼此残酷相待，看见别人吃苦，自己就得意，这种心情是从哪里来的呢？还是统治制度的起因呢，还是后果呢？也许既是起因，又是后果。就这样，古时的宗教联盟，近代的地下游击，从古至今的喧哗捣乱，老能够延年益寿，永葆青春。

以斗争为对话

法国人那股子狠劲，又在经济生活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在法国存在一种劳资纠纷的特殊方式，兼有许多性质相反的特点。一些特点属于专制体制，另一些则属于民主自由体制。在专制的国家里，罢工是禁止的。但一爆发便猛烈异常^⑩。在民主自由的国家里，罢工是合法的，不会引起暴力行为。

在法国有如在意大利，罢工是间发症，就象在禁止罢工的国家，但是又时常发生，而比任何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来得多，起码不相上下。罢工尽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丝毫不减轻它的暴烈性。通常是通过罢工，社会上不同的阶层，才有机会进行对话，很象荷马史诗里英雄们的对话那样。因为，在承袭罗马传统的国家里，社会的进步，比方说民主吧，都是在暴力中产生的，老是从保守的秩序中，经过流血的斗争，争取到手的。工人们总是得不到真正的谈判对手的待遇，便老想用暴力来夺取自己理应得到的东西。他们自以为，不搞阶级斗争，不用暴烈手段，便没法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想知道，工人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诸如瑞士，西德，荷兰，瑞典，罢工这个武器已经在工会的武库中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而“阶级斗争”也从工人的意识形态里消失了。

各人把自己封锁在这么一个荒谬的逻辑里面：资本家有理由提防工会，工会有理由提防资本家。这就是为什么双方老是格格不入的原因。

工人隔离区

要衡量这个裂痕到底有多么深，一定不能忘记法国工人的斗争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也不能忘记，在工人的下意识里，这种斗争的象征性是多么牢不可破。

无产阶级崛起于十九世纪，是崭新的事物，不同凡俗。无产阶级生活之悲惨，触目惊心，可是，一般人几乎瞧不见他们。对此巴尔扎克是不屑他的笔墨的，可是当时，狄更斯却已用笔入木三分，加以描绘了*。

可是，在一些富有朝气的国家，相当快就形成某种大工业劳资之间的协作方式。只有农民，讲传统，向往保护关税，显得象边缘人物。但是到底越来越少了。

相反，在停滞不前的国家，倒是工人被推向边缘。小企业、手工业和农民结合起来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尽情歌颂法国的道德标准。什么法国呢？一个拒绝系统工业化的法国。

后果怎么样呢？在法国比在别处更加触目惊心：工业无产阶级“就在城门口宿营”。工人生活的天地是，荒场，烂墙，单调的郊区，遥远的路程；活儿累只好认命，经常担惊害怕，厂房里的烟气，少年儿童犯罪。在这样的地方，人人怀着一种心情，仿佛自己生活在一个被遗弃的世界**。

仇视的原因尽管已经消失，仇视却往往留在心头，何况仇视的原因还并没有完全消失。阶级斗争的概念，仍然深深地刻在许多

* 《奥里佛·吐威斯》于1838年问世。在法国等候了四十年，才有左拉的《断肠酒》(1877年)和《芽月》(1885年)。

** 阿利斯蒂德·勃吕昂^①写的丝织工人歌，很表达出这种愤慨。

赞美在天之父，
就得穿上金线的祭衣。
教士啊！我们给你织出这件祭衣，
可是我们啊，穷得穿不上一件衬衣。
就是我们这些丝织工人，
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
做大官的，
穿的是外套，佩上织金的胸绶。
大人先生们，我们给你们织出了这些，
可是我们呀，可怜死了也没有一块布来装殓。

就是我们这些丝织工人，
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
但是我们的天下快要来到，
你们的天下就要终了。
那时啊，我们将织出
旧世界的葬服，
因为起义的雷声已经响彻云霄，
我们丝织工人，
再也不赤身露体了。

工业工人的心坎里。他们没法相信，“掌权阶级”——国家和资本家本来是一码事——会老老实实做点让步。强大的总是要叫弱小的上当吃亏。这种思想意识，并不限于工人的隔离区里，许多职员也有这种想法。三个法国人里面，至少有一个深信另外两个人的幸福造成了自己的不幸。自己若要走运，非得让别人吃亏。“你们的天下就要完结……”

社会吵闹

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理论送给了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呢，把自己吃的亏，受的苦，把自己的鲜血，交给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便从思想上统治了拉丁民族的左翼。可是，在先进的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一传说。而在我国，社会吵闹依然是一个信条。

这种思想意识来自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发展进度十分缓慢，甚至觉察不出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条件，也没有因此而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在那样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实际上禁锢在本阶级的细胞里面，就好比各归各的种族似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结束了这个时代。社会吵闹不可能再是二十世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十九世纪的条件反射，依然浸透了人们的思想作风。

原子弹使人们意识到，一场侵略战争到底能得多少好处，要冒多大的危险，权衡之下，十分明显，因而也就没有人再肯加以容忍。这样的觉悟，为什么偏偏在社会的对手之间，就看不见呢？在十九世纪，阶级斗争不过意味简陋的经济，使用简陋的手段。对已经进化了的经济来说，其精确程度好比钟表，对它使用简陋的手段，只能起坏作用。法国人已经成了国际和平主义者，为什么便不能成为社会和平主义者呢？

两个法国

好象两根线贯穿了两千年长的一匹布。

一条是红线。高卢人进入历史，以桀骜不驯，骁勇好斗见称。达西德在当时就说：“高卢人不起内讧，那就没人能战胜他们。”这是罗马人的看法。他们那种坚决的、个人的、富有进取性的气质，也许会孕育出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来……

一条是白线。高卢人被罗马打败了，制服了，并且对罗马着了迷，他们便渐渐丢掉了自己享受自由的能力。他们热爱自由的心情，只遗留下一股子傲劲。

谢天谢地，这两股线是绞在一起的。罗马精神没能排除掉高卢精神，批判精神，开玩笑的作用，对号令的抵制，反正是另一个法国的一切特点。从罗斯兰*到童谣和寓言诗，从让·德·门格到拉博莱，到蒙戴涅，接着便是莫里哀，拉方丹，伏尔泰和狄德罗，一脉相承，各具本色，巍然屹立。这一流人物，把强加于人的一些真理，视为非道，把个人的判断对付那些金科玉律的论据。“只要我不同意，先哲圣贤的看法尽管一致，与我无干。”这话是阿培拉尔说的，说得既谦虚又大胆，开了宗教改革的先河。

一条红线是：热爱自由，热爱个人主义，卡尔文式的傲劲，笛卡尔式的傲劲，让赛纽斯苦行教派不买教廷的账，高卢教派不卖罗马的账，“浪荡”派不服官方强制的礼教，“哲学”派不买天授王权的账。1789年大革命的各项原则，法国大革命也予引用，其他一切革命也都引用。后来形成左派和运动。

一条白线是：君主和教会的凯撒主义；罗马体制为生存而加强镇压；正统思想，不管是出于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出于雅各宾主

* 十一世纪初，原籍贡比涅的一位神学家，名叫罗斯兰，他提倡名学，跟一切教会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最后为名学取得了合法地位。

义,出于波拿巴主义,或者出于波旁王朝的正统派。

这两个法国,只要国内一出乱子,便马上对立起来。比方说1814年,王室的部队,跟在路易十八的马车后面,列队走过郊区的时候,周围一片满怀敌意的寂静。一到市区便又欢声雷动。郭兰古尔写道:“简直是两个国家,两种人民。”

这一双重性,既能搞垮我们,也能够拯救我们。能把我们搞垮,只要双方自相残杀,把我们搞成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民族。也能拯救我们,如果双方结合起来开花结果。到这时候,我们的相克性,倒成了我们的财富。

德法战争

四十年代,是德法战争最惨酷的年代。我们传统的善恶论,让我们追溯已往并做出结论,似乎正派的法国人都站在一面;坏的,少数迷失路途的都在另外一边。现实却没那末简单。

从1940到1942年,绝大多数法国人都跟贝当走。要找证据却不那么方便,因为当时三分之二的国土在德军占领之下。哪怕是南方的未占领区,也毫无言论自由。所以只有人证,缺少物证。便是人证,也比较喜欢躲开一些。时间已经那么久了,忠诚老实的人,不该表现得既不怀恨,又没顾虑吗? 1941年3月,在蒙彼里埃,我跟很多人一样,亲眼瞧见群众对贝当的那种热烈心情*。我那时候还是中学生,叫去当标兵。先向阵亡将士碑致敬,再检阅军队和参战军人,发表演说,访问大学校。教授们都穿上了长袍,人群象发了狂一样,简直拦都拦不住。人们竭力叫喊:“贝当万岁!”妇女们非常激动,只会说:“我瞧见他啦!”这却并不妨碍他们到了晚上,不顾电波干扰,又去听戴高乐在伦敦讲话。

* 他来会见佛朗哥。佛朗哥则会见了墨索里尼回国。贝当趁机在城里作一次正式的访问。

1942年7月14日，蒙彼里埃军区司令到中学来主持发奖仪式。我们高唱：“元帅啊，我们来啦。”司令员做了漂亮的演说，号召人们跟着元帅走。他激起人们长时间的欢呼，他说：“这个人，功勋显著，威名远震，只有在他的周围，法国人才能在国难中团结起来。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就是贝当元帅，就是法国人心目中实现希望的保证^⑩。”我上台从军区司令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他拥抱了我，并且用闪亮的眼睛注视着我的眼睛说：“别忘了我的话。一定要忠于元帅。”这位军区司令就是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

戴高乐将军和米歇尔·德勃雷，一道走过刚解放的芒斯街，一位妇女高呼“元帅万岁！”戴高乐平静地对德勃雷说：“怎么能叫他们搞得清楚呢？”我们这些人里面，曾经有过多少人仿佛为了要消除一些忧虑，免得那么样担心国运中断，因而从头到尾认为贝当和戴高乐是干爸干儿子而“串通一气”的呢？

该不该“时而伤感，时而怜悯”呢？当时，法国人不是一直都在不自觉地、激动地要寻找自己的统一吗？

牢不可破的二重性，靠不住的第三路线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给法国提供了再一次分裂的因素**。简直可以说，“左”“右”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了。有时候，一条鸿沟隔绝了两种行业。比方说，军队算是右的，知识界算是左的***。有

* 过了几个星期，1942年11月11日，为了挽救部队的荣誉，他率领少数部队抵抗向南扩大占领区的德国军队。被俘后越狱，一直把第一军带领到胜利^⑪。

** 在新教徒对抗天主教徒以后，人们主要看到了耶稣会对抗让赛纽斯教派，古典派对抗现代派，山外派（罗马教廷派）对抗高卢派，山岳派对抗吉隆丹派，波拿巴派对抗保王派，保守派对抗自由派，正统派对抗奥尔良派，巴黎公社派对抗凡尔赛派，保王派对抗共和派，布朗热派对抗反布朗热派，保特雷富斯派对抗反特雷富斯派，僧侣派对抗反僧侣派，教会整体派对抗教会革新派，社会主义者对抗“爱国”主义者，合作派对抗抗敌派，马克思主义者对抗“资本主义者”，法国阿尔及利亚派对抗非殖民派。1974年的总统选举，使“两个法国”的对立，精确到数学那样的程度。

*** 科学家，工程师也算是左的。我们在谈原子能委员会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时候，一条鸿沟隔绝了同一区域的两块地方。这种特点会稀奇古怪地持续几百年。这条鸿沟的线条，完全按照选举社会学划在地图上，精确得就象地图上凸起的山脊。

冲突的起因没有一定。有一条是无疑的，即不同的秉性气质交锋比试。不是权力针对自由，便是秩序针对运动。电子计算机告诉我们，左派的法语和右派的法语，连所用的词汇都各有千秋^⑭。两种对抗的势力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彼此声讨用的口气是同样的凶狠，同样的简单。

因此，法国一出乱子就难收拾。一个次要问题就足以引起分裂对立；一份关于补助民办学校的文件，一项有关参战复员军人的财政措施，一项租佃章程的修正案，都能让两派剑拔弩张。

然而，谁都明白，所谓的右派，不过想保持一些道德标准。没有这些标准，任何社会也活不下去。这就是：爱好秩序和传统，敬重合法的权力，留恋过去的遗产和各种建制，对卖气力和省俭积蓄有感受。而“左派”呢，又是那末样的众望所归！因为它体现了进步和自由，探索着怎样才能进一步实现机会均等和更加公平的公平合理。左派是慷慨的化身。

可惜，双方激烈的对抗，弄得各走极端。两个排外集团，永远互不相容，各自高唱自己的信念，起了瘫痪的作用。法国人在伏尔泰以后，世代代叨念着“消灭奸邪”。

戴高乐将军爱讲第三条路线。他的说法富有挑衅性，因为他讲话的地方正受着二重性的折磨。

他既不肯把法国的政策和华盛顿连在一起，而右派势力却把他往这个方面推。他又不肯和莫斯科连在一起，这正是左派最强大的政党所衷心追求的。他既不肯象右派那样，受了“彩礼”嫁人，又不肯象左派那样向集体主义低头。他把右派的准则里面合情合理的东西，以及左派准则里面慷慨无私的东西，拿来据为己有，而

后指斥他们的对立为发疯。

这个政策跟法国的性格太格格不入了。“左派”不愿意在戴高乐身上发现自己的东西，反而给他造成右派的名声。右派则拚了命反对他，觉得他“比左派还危险”。他居然拉过来一大部分法国人，摆脱了善恶论的魔道。不过，他辟邪降魔的法术逐渐失灵了。在他以后，政治界又要接过宗教战争遗传下来的情绪，逐渐沉湎下去。

就这样，法国这个综合体，又一次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一部分法国人想把自己的意志，甚至自己的真理，强加于另一部分人。可是，对手从来也没有被人消灭掉，所以，这样的解决办法，仍然带有祸起萧墙的根苗。因为，这样的解决办法煽动教条之风，不能容忍任何相反的意见，不是去把不同的意见变成对话的材料，而是变成冲突的火种，甚至腐蚀到人们对民族本性的感觉。没有这种感受，一个患病的社会便无从找到全国一致的拥护。

第五部分写完了。两种体系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楚一点了。这种关系在暗中联系着思想病的体系和社会病的体系。这大概是因为远距离操纵引起的种种约束，养成了我们不负责的习惯。“我们已经不把自己当做成年人”。由恭顺一变而为造反，中间没有过渡。我们这个民族，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老在折腾。

骑术“这门本领，在于维持马的平衡，而不需要费气力^⑮”。驾驭人民出于同一原则。但是对于咱们法国人来说，在长期调教的过程中，靠用气力靠得太多，弄得咱们这匹马，多疑善惊，肢体麻木，僵硬倔犟。

能否有这么一天，咱们自己跟自己调和调和，动作柔和了，迎着晨风向前奔驰呢？

第六部

挫折的教训

在法国，最美的教堂总只有一座塔，最壮丽的宫堡总只有一排侧殿，这很能说明我们的民族性：能始而不能终，破坏能卖气力，建设却不能坚持。

德·克雷基侯爵夫人^①

天哪，赐给我平静的心情，接受我没法改变的东西；
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东西；赐给我胸襟见识，去
辨别什么能变，什么不能变。

马尔克·奥雷尔^②

第四十四章 不虞作用

不虞国是一个古怪的国家*。在那个国家里,什么事都倒个个儿。霍雷斯·瓦尔坡在他写的《不虞国三王记》^①里就是那么说的。你本来不找什么,偏偏就会碰上。你想找什么,偏偏就是找不到。你办错了一件事,偏偏因祸得福。你要害一个人,结果却让那人大走红运。经验多了,你索性反过来做。结果更加出乎你意料之外。

瓦尔坡把这种现象叫做不虞国现象。我们把它叫做“不虞作用^②”。这种作用一向在历史里占着重要地位。哥伦布想找中国,却找到个美洲。在政治上,我们往往当哥伦布,虽然我们很少发现新大陆。

求助于暴力,必然加甚不虞作用。所以,这种作用十分频繁地发生在国际纠纷里面。封锁古巴和猪湾事件,使卡斯特罗不由自主地变为共产党人。反正是他自己对我说的。后来呢,封锁不得不解除,而卡斯特罗却依然当着共产党。暴力是赌博,不翻本便输光,而且还会以输为赢。

不管用不用暴力,我总觉得法国很象不虞国,意外的事情层出不穷。领导人好比在一张坑坑洼洼的球台上打台球,一下子出去,球怎么碰球,简直谁也莫明其妙。你算得越精,越打不中。随便打打,倒失望少些。

* 不虞国位于锡兰岛上。在那时期,日本还叫做锡潘,中国还叫做契丹。不虞国在哲学寓言里,扮演乌托邦的角色。正如海外轩渠录里的小人国,天真汉里的艾尔多拉多国。

别国的大政治家，曾经卓著功勋：皮特，迪斯雷利，丘吉尔，华盛顿，罗斯福，俾斯麦，卡富尔，列宁，毛泽东。这些伟人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他们成了功。在法国呢，毋宁说是适得其反。

到了今天，我们最憧憬的历史英雄人物，又是些谁呢？维森吉多里克斯锁在凯撒的战车上；圣路易率领十字军败死；贞德宣誓把英国人逐出法国，反而当了英国人的俘虏；拥戴国王重登宝座，结果为国王所遗弃；要响应上帝的号召，结果被宗教法庭判了焚身极刑；路易十四要使法国繁华富庶，结果驾崩在民穷财尽的国度里；拿破仑要饿死英国人，结果是英国人把他流放在一个荒岛上。咱们共和国的英雄们，就更不用提了。几乎没有一个不失败。其实，也许我们爱他们就是爱他们的失败，而不爱他们的成功。在咱们这儿，最得人心的运动员正是那从来没有取胜过的自行车选手。

不虞作用在咱们历史里随时可见。法国历来的各种政权，都受这种作用的影响，凡有作为，必然适得其反。

神权天授的君主制吗？断头台永远结束了君主的神圣性。革命吗？无政府状态引起了专政。拿破仑吗？他想继承大革命，结果好大喜功，反而恢复了王朝。路易·菲利普吗？他想调和王朝和三色旗，结果正统派的白旗，共和派的蓝旗，社会主义的红旗，结成联盟把他推翻。184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吗？请来了护法党掌握政权，最后成立了独断专行的第二帝国。

拿破仑第三的外交政策，真是不虞作用的杰作：为了帮新国家诞生，不仅帮德国，而且帮意大利，结果都是打了法国，才完成他们国家的统一。

1870年9月4日，共和派引起了帝制的反击。1871年，君主派建立了共和国。他们以为是权宜之计，结果，一直到现在，共和国依然在位。

共和国打算用1789年大革命的一些原则，来消灭君主制。哪

些原则呢？自由吗？共和国加强了官僚势力，要讲自由权的实际行使，还远不如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等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平等的原则吗？经济不繁荣，平等就没法发展。博爱的原则吗？巴黎公社实行镇压，党派纷争，“布朗热派”，“无政府派”，德雷弗斯事件，僧侣之争，派性在人民中间造成深堑鸿沟。

维希政府曾怀有两种可取的动机：一是保护法国人，少受占领军的蹂躏；二是从事一次“民族革命”。结果又是适得其反。对付占领军吗？法国的例子堪称独一无二。战胜国统治战败国，变成了一种国家的合作，就是说，变成日常的讹诈。原因是维希政府手里还留下几张王牌，结果在日常的讹诈之下，一张一张都输掉了。殖民帝国，未被占领的自由区，停战后保持的军队，最要紧的是舰队。结果呢？整个舰队自己炸沉了。这是有象征性的。“民族革命吗”？维希政权企图推行几条合乎情理的政策，结果引起法国人民的深恶痛绝。维希政府镇压一些信誉扫地的党派，反而为它们恢复了名誉，从而为历史唾弃了的体制重新找到了出路。

第四共和国从诞生到死亡，始终贯穿着一条不虞作用。1946年缔造第四共和国的人，本来想要跟第三共和国完全两样，结果却搞得一模一样。1958年5月13日，极右派拿起武器反对解放阿尔及利亚，因此去请了一位人物出山，而此人恰恰就是唯一能把阿尔及利亚解放事业搞好的人。

第五共和国也照样逃不过这个不虞作用。为了实现大团结而建立起来的第五共和国，却把“两极分化”变成了制度，孕育着“两个法国”，使其随时可以死灰复燃，重蹈宗教战争的覆辙。第五共和国为了恢复国家的权力，结果助长了官僚主义，从内部拆国家的台。

车子打滑,失去控制

为什么法国会是一个不虞国呢?为什么执政的人会老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呢?仿佛他们在冰上开快车,稍一拐弯,稍动一下驾驶盘,煞一下车,就会出事故,而这种事故恰恰是他们想尽力避免的。

这个比喻正足以说明出事故的可能原因。车子开得再快,只要操纵不突然,哪怕地滑,比方说雪地,沙石地,只要地面平坦,车子是不会打滑的。只有突然车轮有的贴地,有的悬空,这才会发生打滑,弄得驾驶的人没法控制。

多中心的社会以它的灵活性来适应一切。专制的社会尽管靠压制,但本身还是一致的。在专制制度下,推力传出去,不变方向,指挥部为推力划定着路线;在多中心的社会里,各式各样的个人和集体,各自为政,各式各样的自发势力,起着作用,互相补充,结果形成一套顺理成章的东西。在前一种情况下,国家能够叫人服从,从而排除了不虞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尽量避免强制服从,而只为自己保留这么一种任务:通过有限度的干涉,使各种独立自主的行动彼此协调。这样,不虞作用便会自己消失。

法国社会的性质比较特殊。既不是真正的专制,又不是真正的自由。它的结构是单中心的,制度是专制的,但又没有能力令行禁止。它尊重一些自由制的规则,却又没有多中心的结构。半专制而没有秩序,半自由而没有能动力。发号施令的人,不怎么样有人服从。人们不好好的服从,只满足于等候指示,也不振作精神,把事业搞好,因为并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事业。

照逻辑来说,专制和自由属于两种互不相容的体制,混在一起就会引起预料不到的波动。并不是法国人没法治理,而是法国的权力体制不容许治理法国人。因为这种体制,一方面触及普遍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又触及指挥部的过敏症。

国际关系波动极大的世界，乃是不虞作用的理想世界。人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意志。人人都碰上相反的意志，而自己的意志也就只好改变方向。

极少领导人能摆脱不虞作用

正就是这样，法国社会很象国际社会，为形形色色的集团所组成。而这些集团往往是彼此敌对的。国家在这里面玩弄外交手腕。它跟一些互相妒忌的势力打交道。这些势力叫做：政党，工会，行业公会，行政机关，新闻事业。这种把戏，在其他民主国家也是有的，不过在法国却产生特殊的结果。因为，协商和折衷不能被人接受。法国人缺乏那种契约精神。他们那种傲劲，把折衷变成冲突。不想自己成功，只想挫败对方。最后失败的比例那么样高，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这样的民族性会使人感觉靠不住。行政部门管得越紧，越会加甚这些特点：晕头转向地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爱好抽象，立场僵化；错误的观念加剧着狂热的行动。一个国家的人民，反应那么不可捉摸，当然最容易受不虞作用的影响。沙多布利安曾对此下过断语：“法国人的思想变化无常，谁能预料到它那些稀奇古怪的动荡与转变？谁能理解他们那种毫无明确理由的变化？爱好变成厌恶，祝福变成诅咒③？”

法国历史里的暴乱潮流，比任何一国的历史都多，而每一次都引起毫无理性的巨大冲击。只要既定的规矩一不受人遵守，那就谁也无法预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圣许看破了世情，曾经说过：“自然势力推动我们，得出想不到的结果。”暴力好比霹雳，谁都不知道它往哪儿打。

乱世的大领袖，往往以失败告终，尽管留下了彗星般的光辉。成功的却是另外一些领袖人物：机巧油滑，尽量不让人抓辫子，钻

空子，既坚韧不拔而又谨慎小心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这种人能够转败为胜，因为他们比失败还要来得不可捉摸，如路易十一世，亨利四世，马扎林，塔烈兰。在他们看起来，政治艺术就是要掌握局势，而不受局势支配。他们的天才，在于理解到自己的活动余地很小。他们既不象一些人在局势上面漂浮，也不象另外一些人逆流而动。他们富有窥伺的耐心，善于观察，等待时机，最后使局势改变趋向。他们不象唐·吉诃德那样提起长矛去刺风磨。他们并不宣扬什么人间乐园。他们善于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机，用大拇指头推那么几下。只有他们最会摆脱不虞作用。

意外的来客

1974年4月16日，总统选举刚刚进行第一轮投票，苏联大使契尔佛伦柯，提出紧急要求，要我接见他，说他要通知我一件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奇怪，答应第二天在文化部接见他。我那时候刚刚把达芬奇的名画摩娜·丽萨送到东京，以为他来交涉在归途把画留在莫斯科展出。能为了一幅画吗？

大使说：“我奉命通知您，我们希望你们的候选人获胜。”

他还补充说，他之所以找我，因为我不久以前，还是保卫共和国联盟的总书记，并不因为我是文化部长。的确，如果他去找我的后任总书记亚历山大·桑吉内蒂，那是不方便的，因为他不是政府成员。如果“我的”候选人沙邦在第一轮便输给德斯坦，那末苏联方面就希望德斯坦获胜。他们最怕的是“我的”对手密特朗当选总统。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为什么敌视密特朗的理由，逐渐清楚起来。他们这种敌意，本来十分奇怪，人们一般都以为苏联会倾向于这位总统候选人的。理由到底在哪儿呢？戴高乐将军执行的政策是独立和合作。政策是坚定的，明朗的。如果密特朗当选执政，从

他本人开始，谁能说得出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人们喜欢一条靠得住的、大家拥护的路线，不喜欢轻率冒险。

其实，我很理解苏联大使。他怕的正就是打滑无法控制。他敏锐地感觉到，法国的社会和国家十分脆弱。法国共产党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如果选举得胜，那就大有可能会面临一个谁都控制不住的局面。自己控制不住，盟友控制不住，谁也控制不住。连锁反应可能谁也没法预测。其中包括这么一种“反应”，即把法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欧洲的均势和世界均势可能完全因此而搞乱。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取得胜利，给人的希望，结果适得其反。

跟那种危险比较起来，有那么一个人，能够保证法国政策的一贯性，当选了总统，岂不是保证了苏联摆脱不虞作用的可怕影响吗？

多么高明的实用主义！多么英明！万一街道上闹起事来，万一暴力露出头来，那就只好听凭不虞作用横行无忌了。

为了消灾免祸，必需灵活地克服这个猜忌的社会。使用粗暴的手段决不能把猜忌的社会变成信任的社会。必须让局势自己演变，不能猛打猛冲，一定要在暗中耐心地进行活动。试验要选择得当，起榜样作用，起毛细管作用，进行说服。要公开讨论，摆脱那种陈辞滥调。要当学徒。要创立适应局势的建制。要有幽默感。要进行缓慢的地下活动。成千上万只地老鼠挖呀挖呀……

⑰

第四十五章 三百年没有 改变的尝试

我们长时期的调查研究，走遍了社会，穿过人们的思想气质。我们经常不断地发现，全国各地在分担责任上作得不够。但是，为什么没有早一些采取办法，加以纠正呢？

我们在这里又碰上了不虞作用。三个世纪以来，许许多多革新家，怀着可贵的动机，曾经开出了药方，并且开始服用。而效果却适得其反。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等级集中制，很快就被一座条件反射筑成的城墙围护了起来。等级集中制变成了内在的因素。国家受到人们的崇拜，越有人反对它，它就越发强大。

历史不断地重复，单调得叫人腻味。但是重新叙述一下这种历史的重复，倒不见得没有用处。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没有一场思想革命，我们是摆脱不了这座地牢的。

佛邦适得其反的改革

十七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敏锐的观察家，如费纳隆，巴吉贝尔，博维里埃，都揭发王国的权力，过度地集中在一些大臣手里，集中在大臣们的部属官吏、管理人员手里。在1700年以前，曾有一次改革运动，企图根治这一病症。在当时看起来，已经是一种法兰西病症。方子有两种。一种从“财政”着手，一种从组织着手。

巴吉贝尔和佛邦，都提出一种税制的“技术”改革，既为国王提供经常富足的财源，又能减轻全国生产者的负担。一般来说，行政

部门主要是以税收问题为中心。触动这一个，必然牵涉另一个。而当时，官僚体系已经把政权包围起来，并且显示了自己的威力，把改革计划掐死在胎胞里。

1705年，巴吉贝尔在沙尔特尔用他的那一套办法作了试验。但是，财务司的沙密雅坚决反对。出了一点“毛病”，马上就全部停止试验。前后一共只搞了四个月。至于佛邦呢，他想说服国王，可是未能说服得了。1706年秋天，他病了，决计把他的计划自费付印。书印了出来便受到“御前会议”的谴责。他的元帅尊号，他的耿耿忠诚，路易十四对他的尊重，都保他不住。无论在边缘，或是在中心，国家已经知道怎样来保卫自己了。

更糟糕的是，“值百抽五”税的想法算是被采用了，但不是用来代替那些繁琐的旧税，也不是一视同仁地对大家都施行，而是加重压在只有他们才纳税的一些穷苦人身上。圣西门曾经因此而凄怆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一定要提防那些最仁慈、最有益的用心。谁会告诉佛邦元帅，说他旨在救济法国人民的一切努力，结果却凭空添出了一项新税收，跟其他一切税收比较起来，更加苛刻，更加频繁，更加沉重。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任何善良的建议都靠不住了。”当时的新生官僚体制，已经显示出它反噬的本领，而不虞作用也已经显示出它的能耐。

布尔高尼公爵的宾客

上面谈了财政疗法。组织疗法怎么样呢？结果也钻进了死胡同。皇孙布尔高尼公爵，左右有一班太子宾客，诸如：费纳隆，歇佛刘斯，博维列，圣西门等人。他们很想削弱大臣和官僚衙门的过分膨胀的权力，由一些专业会议比较公开地进行讨论。可是不幸这位嗣君出了疹子，先于他年迈的祖父逝世。等到他祖父路易十四崩驾，改革派只好去依靠那位悲观疏慵的摄政王，撤掉了一些大

臣，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但是各省的财务司依然存在。中央集权照旧控制全国，改革运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大臣们绝对的个人权力不久又重新恢复了。在整个十八世纪，官僚体制日益巩固。

路易十五在位时，确曾有过一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如达尔尚松。他曾说：“要把国家管得好一些，必需管得少一些。”他又说：“有关百姓利益和繁荣的措施，谁能比百姓自己推选出来的人搞得更好？”可惜，他只满足于想像一些方案，并没能来得及付诸实施。

1764年，拉维尔迪总监颁布了一项市政改革，恢复了市政选举。但是到了1771年仍被废除，再一次恢复了财务司的监护制。人民的希望持续了七年，结果还是坚持不下去。

路易十六和改革的失败

旧制度的灭亡，就灭亡在权力分散的问题上。路易十六当政，用的都是改革派。杜尔戈(1774—1776)，内克(1776—1781)，卡隆(1781—1787)，布利安纳(1787—1788)，内克(1788—1789)等，再度出山。这些人都主张行政体系现代化：简化税制，废止税收特权，经商自由，权力分散，创立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和各省、各教区的议会。这些设想，在任何方面，一个都没有实现。这些宰辅重臣，一个个高瞻远瞩，珠联璧合，结果只使国事日乱，直至不可收拾。他们不断地高举改革的旗号，却又没有本事做到底。他们都怀着这么一种信念，仿佛一切都靠国家，同时又由他们自己提供了证据，证明国家束手无策。那末，除了把国家毁掉，还有什么呢？

只有少数几个法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制度的毛病，超出封建的流毒，而在于一个人们还认识不清的东西：即官僚体制。1789年雅克·波歇描写官僚体制时，笔法象一位社会学家。他说：“公民什么也轮不上，而是官吏在统治……我不相信还有什么国家官

僚体系的影响能象在法国那样厉害,那样荒唐,那样普遍。你想进行有益的改革为公众谋福利吗?你就得先开衙门,建科室,把改革运动的心脏搞个一团糟^①。”官僚专制激起彻底革命。命是革了,官僚专制依然长生不老。

长矛尖上的首级

长矛尖上第一个首级是一位财务司的官员。这位巴黎的财务司官员名叫贝尔蒂埃·德·索维尼。1789年7月22日在乱中梟首。革命选择自己牺牲品,也就选择了自己的象征。

初期的革命者是第三等级里头的资产阶级。他们知道,“封建”和“专制”是通过国土的管辖一道实行统治的。必需同时排除这两个祸害。制宪会议很快就设想出崭新的行政体制。

为了领导新制的省,各省的县(相当于现今的专区),还有新制的市,制宪会议的议员创建了集体领导的行政机关,由选举产生。

这并不是一般的代议机构,而是真正的行政机关。

当时的局势不够稳定,这是最轻的说法,所以新的制度没法通过实验发挥成就。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分上中下三层,显得太多。到处实行集体领导,而公共利益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这有点好高骛远,人们的思想跟不上。

8月10日以后,革命越出了合法的范畴。山岳派和吉隆德派,在断头台的台阶上争夺政权。群众性的俱乐部和协会,成为双重的行政机关。外敌入侵激起群众举义。精密的体制分崩离析。各省的执政府发动“联邦”起义。国民公会为了镇压这种分裂活动,重新采取了“专制”手段,派遣专使,中央特派员和国民代表,重新复活财务司,并且为后来的省长、市长开路。这些钦差大臣把地方上的行政机关宣布为“反革命”,然后取而代之。中央集权就这样压服了地方权力。

这种行政建制，受到无理的抨击，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太习惯于看到两种势力的对峙。一方面是国家不能罢免的行政体系，另一方面则是选举产生的代议士。后者是人民的合法代表，但是作决定的权力却十分有限。我们没法设想，地方民主制就是自己负责行政管理。

因为制宪会议议员倒有此设想，并且曾予推行，所以就值得为他们恢复名誉。但是法国的时运依然不济，人们要想实现这一改革，除了那么一条办法以外，简直想不出其他办法。这条办法便是搞出一套谁也掌握不住的东西，开动起来就会把改革的事业全部毁掉。剩下一点没有毁掉的东西，再由拿破仑来消灭干净。

拿破仑阴魂不散

王朝复辟以后，自由派和极右派只有在一点上看法一致，那便是一致痛恨拿破仑。可是省长、市长就是拿破仑遗留下来的。既然两派都一致痛恨，岂不是给分权提供了机会吗？可惜这个机会没有抓住。王国政府的自信心委实不够，不敢不依靠省长，他们不时流露出一些遗憾的心情。比方说鲁瓦耶·高拉尔，一位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十分拥护自由主义，他谴责漫无限制的行政权力，曾说：“从前的社会有很多官员是百姓推举的，现在却一个也没有了。百姓推举的官员管理的事情，都由政府管理，最最琐细的事也逃不过。扫街清道夫也是代表中央的官吏。”

话是这么说，但是一想到补救的办法，他又忘记掉自己所做的分析，一心只去盘算国王和议会彼此之间微妙的均势。只有在玛尔蒂涅克执政时期，做过一次认真的尝试。他想让富有的选民选举市议会和省议会议员。以往这些议员都是由省长指定的。这个方案，对左派来说是不够，对右派来说是过火。这么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连个头都没有开成，查理十世便撤回了计划。

一直到1830年,才重新提了一提这个方案。可是七月革命光辉的三天*,筑起了街垒,并不是为了选举行政人员来管理省市。革命过后,改革也就淡忘了。

1848年的革命如出一辙。过了几个星期,奥迪隆·巴罗,拉木乃,和许多有识之士参加制宪委员会,以实行分权为己任。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便再也没有下文了。

拿破仑第三发明“分权制”

上面谈的一些办法,都嫌暧昧不明,自相矛盾。拿破仑第三倒采取了比较坦率的态度,值得赞扬。他在1852年1月发表宣言,鼓吹“法国的行政交给省长,县长,市长管理”优点很多。所谓市长,当然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指定的。

可是过不多久,他就发现:地方案件请示巴黎的十分拥挤,中央行政机关干的是省长的事,因而不得不再图正本清源。“自从帝国覆没,过火的行为改变了我们中央行政权力集中的性质,败坏了地方权力的直捷行动,助长了中央行政烦琐缓慢的程序手续。治国可以遥控,而行政管理则非就近不可^②。”

于是他下令:邮递员,捕狼人员,灯塔看守,一律不再由部长任命,而改由省长任命。这种虚假的中央分权,我们把它叫做分散集中。其实不过是把一些京官的权力移交给了地方官。这种做法,无论在帝国时代,或是在今天,都没有价值。又过了十年,拿破仑第三觉得这条政策所起的作用,恰恰跟自己的初愿相反。他说:“我们的中央集权制,毛病很大,引起了条条专政。比方说,市镇的次要问题,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对,却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来解决,原因在于有十一个不同的行政部门非插手不可^③……”

* 1830年7月27,28,29日三天的街垒战,叫做“光辉的三天”。——译注

流产的委员会

1869年前后，拿破仑第三在失望之余，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并且开始探索走“自由帝国”的道路。他不仅想把政府与议会的关系自由化，而且还要使地方行政自由化。他在1870年初，成立一个庞大的“中央分权”委员会，聘请了当时最有学识的人士如：马克沁·杜刚，弗雷德利克·勒·布莱，普雷佛·巴拉多尔，巴朗德，德鲁恩·德·吕伊，弗雷西奈，瓦丁顿。委员会主席则为奥迪隆·巴罗。他一向主张中央权力分散。他们设计了一套改革措施，相当巧妙地兼顾了老成持重和雄心壮志。

这个历史性的妥协，即调和中央权力和地方自由，却不是第三共和国的胆略所及，因为第三共和国经历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尤其因为它经历了巴黎公社，于是它把一切都裹上了糖衣。1871年制定的省议会法，1884年制定的市镇法，都是多么的谨小慎微啊，而这些法律一直到现在还在生效。市长由选举产生，然后“置于上级监督之下”。至于省委员会，本来可以成为真正的省政府，但结果只不过是一个委员会。中央政权和法国人民，一想到多中心论和地方自治，便都毛骨悚然地抱成一团。

京官衙门的权力，始终不渝地抵制住任何分散中央的权力。第三共和国在强大的分散中央权力的思潮推动下，搞出来的方案计划堆积如山，可是结果，雷声大雨点小，过不多久便在官僚体制下销声匿迹了。

下文是大家知道的。尽管政治家在共和国的各个阶段，都建议这项改革，如戈白莱在1882年提过，密勒朗在1921年提过，巴尔都在1935年提过。甚至到了1946年，新宪法还规定，省长不再是省议会的执行者，而将由选举产生。但是，谋事在政治家，成事却在人的思想气质。而三百年来，无所作为的秉性原封未动。

第四十六章 戴高乐惨遭灭顶

这么一长串的失败，连戴高乐也没法阻止。他治好了法国明显的病，可是国家害的是从头烂起的病。他把这个病治好以后，感觉到非得去整治社会结构了，特别是社会结构的骨架、行政体系的病。他这种努力是咱们大家都看到的。

他先后进行了两次努力。第一次从1963年开始，他试图分散国家行政体系，即把一向由京官办的案子移交给地方官去办。第二次在1968至1969年，他试图做一件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也许在旧制度末年有过一番尝试——那就是实行分散中央的权力，把国家的职权大批移交给由选举产生的机构。

第一个尝试失败，第二个尝试也不可能成功，结果是戴高乐自己下台。

动完了手术进行再教育

戴高乐在1963年，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再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建成了第五共和国的体制。此后，他就考虑怎样去改善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问题。

他的做法跟往常不一样，采取了和风细雨的手段。他把事情基本上交给总理蓬皮杜去办，因为蓬皮杜不是个张牙舞爪的人。戴高乐觉得，现在虽然几起国家大事有着戏剧性的演变，一直振奋着舆论，但是人们对于改革体制问题不感兴趣。所以他觉得不进行大吹大擂为好，经过了那么多次急风暴雨的战斗，温和办法很值得试一试。

他既没有去找对手,也没有向对手挑衅,可是他仍然遇到了敌手,而且是一个最不好对付的敌手:深藏的思想习惯,小小的习俗,下意识的抵制。过不多久便来了灭顶之灾。

戴高乐比谁都清楚,法国行的是中央集权制,而且行得太厉害;他也明白,这不是新东西。他本人便在很大程度上赞成中央集权,并且认为是我们历史所必要的东西。纠正了过火部分,不就够了吗?所以戴高乐要的,不是取消国家的一些职能,而是舍远就近,把某些职能从京官手里抽出来,交给地方官。

他的做法则是下诏书颁皇命的办法。选举制在这里面毫无地位。应该说,经过了1962年的较量,他亲眼看到议会和地方上的乡绅们起来反对自己。所以他对于那些中间团体,以及那些不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以内的权力机关,并不心慈手软。

问题在于把省长变成行政的真正主宰,既掌握政府的权力,又代表国家,但是要经常接触那些由选举产生的市、镇、乡长等人。如果要让行政衙门带点人情味儿,可不是最好让省长起带头作用吗?一个省长可以判断情况,估计人和事的分量,让行政措施从密封的世界里解脱出来。

1964年,路易·约克斯创建了一个新制度。地方机关不再直属中央机关,而直属省长。当然罗,省长也没法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决定。他得把自己的权力大大地分给各机关的负责人去行使。不过,到底分多少权出去,归根结蒂,还得由他自己判断。他保留了查问一切事务的权力,因而他的影响仍是很大的。

同时,每一个中央机关,都得把大批事务的决定权下放到地方上。每一个技术领导,农业,装备,卫生,社会等等部门的领导,在本省都成了部长。省长则好比一个省的总理,他能够防止权力的交错,消除隔阂,并取得省议会的信任。他能够防止机关团体之间由于竞争而引起混乱,由于隔阂而引起差错。他领导省政府,团

结一致得跟中央政府一样。省政府在当地的形象,毕肖中央政府,但又忠实地反映了当地的现实。省长的职责在于协调各市长的行动。首都巴黎不那末拥挤了。

这篇道理似乎谁也驳不倒,可惜只是纸上谈兵。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过了差不多十年*,我有机会去考察这番措施的成效。当时,我担任行政改革部长。我认为在着手其他改革以前,有必要就地查看一番上述改革的情况。调查是同时在三个省进行的**。这三个省叫做艾罗、阿里埃和索木。

调查结果使我十分失望。不仅权力分散的改革目标没有达到,而且还向事情的反面转化。首都巴黎已经收回了分出去的权力。

就在那中央分权的时刻,各中央机关却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某人当那末一任部长,想露一手新思想,可不是顶自然的吗?这些东西到了地方上,就变成了“试点”,“合同”,“样板”。每搞这么一次,巴黎控制得有多么严,就说明这项设想受到的重视有多么大。

技术也跟着政治来帮助行政部门保持权力。比方说,为了实现“一天一校”,建筑工程“工业化”了。这一下子,建筑工业便实现了国有化,市场成了全国性的市场。本来应该下放到省的业务,反而向上爬到巴黎去了。

难道还有必要去拐弯抹角吗?等级制的本身就包含着应有尽

* 也就是 1970 年的法令公布后三年。这项法令进一步展开了权力分散的运动。

** 第一项调查研究由国家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克罗捷和多尼格两人领导进行。内容为地方机关之间的关系。第二项由科学组织总会热里涅领导进行,分析行政组织合理运转。第三项由艾黎·苏丹负责行政措施当事人的民意测验①。

有取消分权制的手段。如果一位省长想对他手下的局长、处长行使自己手里的最大权力，他就会引起有关同业部门等级制的自卫反应。一位省级局长接受了省长的指示，已经准备照办，马上有人悄悄地警告他说：“别忘了，省长决定不了你的升迁和前程，这是由中央机关决定的。省长会换人，同行是不换的。”

中央机关能用什么更妙的办法保护自己派到地方上去的本部门官员呢？这个办法就是把号称权力分散的措施，封锁在越来越细密的规章里。

其实，省长自己也知道，他决计跳不出中央权力的掌心。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完全负起责任来。何妨请示请示，汇报汇报，揣摩揣摩部长大人的意图，把责任套在部长身上，部长不是就没法批驳我了吗？

谁都不相信那权力分散会成定局。省长深知自己作出的决定，一有问题便会上达巴黎。国会议员写信过问，报上一篇文章报道地方上的抗议，都会送到中央机关的科室里去，那么干吗不事先商得中央机关的同意呢？权力分散非但没有取消，反而刺激了那种传统的保护伞思想。

支离破碎的决定

这一笔烂账，算到头来乃是权力分散加深了无人出面负责的现象，并且瓦解了权力。中央行政机关自己退出圈子，那是提都甭提的。它只能够把圈子拉长，跟省级、市级的机关搭了伙干。这样，决定权就越发支离破碎。在“权力分散”以前，中央采取决定要牵涉到七个机关，七个都在巴黎。可是“权力分散后”决定却要牵涉到十四个机关，分散在好几个城里。演员多了一倍，来回就是四倍^②。因此，兴建一座平凡的学校，要通过十四个部门，二十四道行政关卡^③。若要兴建一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那就得通过

五十个机关，一百次往返周折，用十载光阴来下完一盘雁鹅棋*④。

总之，本来要的是简化，而结果呢，参加决定的部门添了一倍。一往一来就是四倍。所以不是简化，而是更加叠床架屋。然而，最严重的还不在此呢。

做决定的人越多，结果便没有人做决定。一项盲目的行政措施搞了十年，比方说，那个拉·维莱德的屠宰场，最后，谁也不知道哪一个_·是负责人，连责任这个概念都没有了。每一个经手的部门，只不过在一个匿名的过程中起了一些特定的专业作用。在那做出决定的一马平川上，看不出任何山峰。这里是一种新势力的天下，是反决定的象征，但又是整套线路一丝不苟的卫士。这便是总财务司。他严格地监视着最大的浪费：浪费国家权力，浪费人才，浪费国币。而总财务司则小心翼翼地保证这种伟大的浪费，能够“按照规章制度”去进行。

所以，由于不虞作用，权力分散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国家的行动不是加快了，而是更慢了；决定权不是接近了公民，而是更加离得远了。因为比已往更加难以指出到底该归谁做决定。行政体系依然如故，只不过变得更加复杂罢了。不管是发动或者制止某项计划的实施，或者另外提出方案，决议永远来自顶峰。俗话说：想给不给，不如不给。正反都要是办不到的。

这是一条死胡同。怎样才走得出去呢？只有国家自己收敛一些，并且为日常要做出的千千万万个决定，找到另外一个神圣的本源，那就是普选。

* 看骰子走格子，每九格画一只雁鹅，格子且走不到头。——译注

第四十七章 一曲未终

1968年5月18日，星期六，戴高乐将军从罗马尼亚回来。有几位部长到奥尔里机场迎接。他拉他们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对他们说：“怎么样？罢工还在扩大吗？公共企业被占领了吗？闹剧越来越热闹吗？”他的口气里充满了责备。说他才走开了五天，而他的政府却把法国搞成了什么模样**！他一扭脖子说道：

“这事由我们来解决，正象过去什么大事情都是我们解决的。我们再去求助于人民的直接信任。”

话说得很明白：再来一次公民表决。顾夫·德姆维尔告诉我们，在罗马尼亚接到巴黎的消息，这个念头就逐渐形成，不过当时还不太清楚，这个信任问题到底怎么样提出来，但决计提出是已经定了。

真话听起来好象不真

这条路一走上去，走了十一个月，便让戴高乐将军走回到老家戈龙贝。这条路上矛盾百出。在一般情况下，戴高乐宸衷独断，运思很久，直到时机成熟才宣布出来，继之以雷厉风行。唯独这一次，他仓促决策，立时公开，到了执行的时候，反倒犹豫起来。他拖延一个时期，重新把这个想法端出来，对实施部分做了修改。同

* 戴高乐老用闹剧这个词。这一次在第二天便传开了。词儿走了运，也引起了反感。大家都叫：“要改革，不要闹剧！”

** 戴高乐将军于5月14日动身去罗马尼亚。乔治·蓬皮杜刚访问完伊朗和阿富汗，回到法国。在戴高乐动身以前，坚持要他批准开放巴黎大学。刚一开放便由学生们占据了。

时,他本来总是要求法国人做出明确的抉择,可是这一次他却失掉了法国人的信任,因为他提出了一份复杂的文献,用行政的语言解释“参加”这一神秘的概念。是不是运气不济呢?在这件事情里面,其所以叫人到处感觉莫明其妙,那是因为这还是头一次叫法国人去正视事物的实质,而我们是不喜欢这样干的。

全部计划已经着手进行。1968年5月24日,戴高乐向法国人阐述了他的分析,并宣布他的计划,说明了“当前局势的意义,高等教育和社会方面的意义”。他揭示“种种迹象,说明我国社会有必要实行转化,并且一切都表明,这一转化必需有人民更加广泛的参加:每一个人都参加直接有关本人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进行并共享其成果。”该不该这么办,由公民表决。

好几万大学生,挤在里昂车站周围,耳朵贴着半导体,听着他的演说,按着节拍冷笑。最后,一个学生挥动手绢,几十几百个学生都跟着,嘴里有节奏地高喊:“永别啦,戴高乐,永别啦,戴高乐,永别啦……”这一夜,交易所起火,暴烈行动极其厉害。示威群众自己觉得长了翅膀,因为将军的翅膀已经折断。戴高乐对雅克·佛迦尔说:“我失算啦。”

实际上,出问题的是国家和政权,而戴高乐却讲什么“社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而且做法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所以大家认为他一反常态。这天晚上,演员扮演的角色仿佛倒了个儿。“最狂热的”分子,针对的已经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政权问题。而戴高乐却扔下了政权问题,去跟人家谈社会弊病。政权问题是他的拿手,弃而不谈,而去谈别人不想要谈的社会问题。

就这样,戴高乐大谈社会的毛病,而且从来也没有谈得这么深。而他的演说引起的反应竟如此之坏,大概也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一项号召的成败所在,论据的正确与否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是否适应民众的期望。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引让德军战

车和飞机的优势，其实盟军在这方面跟德军恰恰势均力敌。1968年5月30日，他谴责法共蓄意颠覆，其实法共从月初便千方百计地消除颠覆。可是，这都没有什么关系：1940年6月18日和1968年5月30日的两次分析都是错的，而听起来却象真的；1968年5月24日，他分析是对的，可是听起来却象错的。

最后，蓬皮杜体会了大家的情绪，就在5月30日决定把公民投票改为议会选举。在戴高乐看来，这不过是缓期执行。议会选举把政权还给了他，但是得由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个政权到底该起什么作用*。

改造法兰西

1969年1月9日，戴高乐将军对我谈起这一次征询民意的公民表决，仿佛事情已经在掌握之中。在他看来，赞成票占压倒优势，决不成问题。这时候，对法国社会进行结构上的改革，跟5月中旬比起来，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简直有过之无不及。还有什么规划更符合法国人内心的愿望呢？谁不想让公民们多多参加管理呢？

我问道：“您不担心那些自治派吗？”

“自治派之所以危险，只因为国家不肯分散权力。地方化会把分裂分子脚底下的草割掉，叫做釜底抽薪。”

他好象凝神一会，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枯树枝，然后慢吞吞地一字一字说道：

“当务之急，是改造法兰西。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所以我们必

* 当年夏天，戴高乐决定从公民表决的问题里，抽掉大学问题，交给埃加·富尔去草拟一份方向性的法律。然后又把企业问题抽出来，交给莫利斯·舒曼，另外草拟一项法律。相反，地方自治问题，却在5月24日几乎提都没提。而改革参议院的问题，以往根本没有提出，反倒成了讨论的中心。公民表决还是公民表决，就是内容变了。

须马上着手，不能等待。”

可是，到了1969年3月，不安的心情已经冒头。雷蒙·马瑟兰去见过了他。罗热·弗雷还有好些人去见过了他，我也去见他，想劝他不要坚持冒险。即使已经来不及撤退，难道不可以把问题分分开吗？为什么不可以满足于让人民群众采取一些明确的原则？而这些原则的重要性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且议会也不能不受这些原则的约束。然后再经过不同意见的交锋，制成法律，付诸实施。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办呢？

戴高乐将军回答我说：“这未免太美啦。假如就照你说的那末去办，议员就会装小脚，参议员会对他们施加压力。结果大家起来抵制。事情便会在沼泽地里惨遭灭顶。”

“您手里掌握的议会多数，是成立共和国以来从未见过的。多数派会投票通过您的条文。而老百姓却不一定投赞成票。他们觉得条文太复杂，而由他们选出来的议员本来应该管这样的事。”

戴高乐斩钉截铁地说：“问题在于改造思想习惯。由凌霄宝殿下道玉旨，进行改革，那是不够的。只有广大的民众潮流，才能让这次改革成为现实。得让每一个法国人当一天议员。”

当一天议员？我从来没见过，对人民的明智，抱这么大的信心。可不是吗？人民能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决定吗？习惯势力和思想情绪还那么样的牢不可破，觉悟程度还那么样低，你说能行吗？

自杀性的公民表决

我心里一面盘算这些事，一面却跟安德烈·马尔罗在他的博物馆里漫步。“这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是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在维利埃尔陈列他的收藏品。其中有马里的“多贡”面具，有铁铸的墨西哥公牛，有俄国的镀金铜猫。

我对他说：“那末，你当真认为戴将军会搞一局轮盘赌，而心里

却意识到炮弹已经上了膛*。”

“我说，没有任何东西逼着他非搞公民投票不可。为了地方自治和参议院去吃败仗，实在没有意思。直到现在，不搞这个改革也没什么过不去嘛。再过一年不搞，也没什么。可是，戴将军不肯再呆一年。他之所以异想天开要搞地方自治，要改革参议院，不过是要叫法国人显得忘恩负义。”

“但是，一年前，他就决定要举行公民投票。难道他在1968年5月就想下台了吗？我觉得，他当时还打算用公民表决来平息暴风雨哩。”

“1968年5月，他是想赖此得救的。可是到了1969年4月却不行了。在危机期间，公民投票是一条生路。不管表决什么问题都行。危机过后，不用再找什么生路了。剩下的只是挑衅。你是知道的。他那个想法在1968年以前已经有了。参议院吗？他一向就想把它撇开。可是，他并不缺乏现实感，一定知道这是应该忌讳的。可是到了1969年，他居然敢于犯这个忌。”马尔罗一面给我倒一杯冰镇茶，一面说：“他就是在这件事上自杀的。谁要求他搞这些改革呢？特别在那个时候。选民送给他一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议会，当然不可能再送给他一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公民表决。”

“一直到甘贝尔宣言发表，他始终觉得胜利在握。你还记得吗？他周围的人也都充满信心。”

1969年3月初，乔治·蓬皮杜公开打赌，赞成票至少占总票数百分之六十。一直要到最后几个星期，才有人发觉乡绅们居然鼓动省造专区的反，中小城市造专区首府的反；有人要谋杀勒·布伊和奥利亚克，来成全克莱尔蒙；掐死瓦朗斯和普利瓦斯，来捧里昂；搞垮博城和蒙·德·马尔桑，来振兴波尔多。这却是谁都没有

* 1972年8月，安德烈·马尔罗对《纽约时报》发表意见，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种解释一直很流行。马尔罗不过是这种看法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料想到的。于是，到了最后一刻，戴高乐开始犹豫起来。他考虑打退堂鼓。这就证明他不想自杀。不过他公开表了态，临阵脱逃对他的威望影响太坏。

“所以他意识到自己在自杀，安德烈·马尔罗总结说，这是由不自觉到自觉。戴高乐追求的是让别人请他下台。也许他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完全是自取其咎的做法：闭着眼睛去闯祸，而谁也没有逼着他去干。”

雨珠哗哗地打在窗玻璃上，院子里的草坪淹没在朦胧的灰色之中。他那一篇道理没有把我说服。我们不理解，戴高乐为什么不去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败，所以，我们就说他是有意自找失败。可是不知道，他找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正如已往，他每一次找的都是成功。不过，他已往向人民提出的问题是紧急的，明确的，而这一次，他提议解决的问题，乃是几百年的悬案。问题特别难办，而且就存在于人民顽强的习惯之中。

也许法国人在思想深处不愿意来这么一套，自以为能够起死人而肉白骨。哪怕是一个国家，也能够让它起死回生。他们宁愿保存中央集权制，而请主张分权的人下野。好些人在事后才感到懊悔：“我们当初并没有存这个心呀。”如果有那么一种不自觉的失败情绪，最好还是到选民方面去调查调查。

病 根

人们的思想，在一对惊人的矛盾上碰了壁。1940年，法国一蹶不振。戴高乐打赌要重振山河，并且让败军之将，亡国大夫，去跟战胜国同桌议事。这能说不渺茫吗？结果他的赌却打赢了。后来他又要用合法手段，几乎在群情欢腾的气氛中改革国体*。他的

* 指1958年戴高乐上台，把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译注

赌又打赢了。接着,他又要把非殖民化这场悲剧,变成法国手中一张新王牌*。他又赢了。然而,在微不足道的地方自治和参议院改革问题上,却栽了筋斗,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平凡的东西后面,存在着根本性的东西。这个根本性的东西,就是一场大转化的开始。可是法国人只瞧见平凡的一面,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根本的一面。为什么不肯看根本的一面呢?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改造自己。文件里的东西,实际上是要他们不由自主地同意改造。

戴高乐的神通是符合于挽救国家于垂亡的伟大传统的。1969年,国家并不垂亡,只不过害着三百年来的老病。能不能利用一时的变故来改变一国人民的气质呢?戴高乐用了治疗急性病的方法,治疗慢性病。而且还只能用法家的语言来付诸实行。这就让法国人的气质把他套进了他自己设下的圈套。

戴高乐大概从来也没有从事这么样彻底的改革。这项改革触及到了病根,而他却一直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要建立一个制度,让公民参加管理国家、行政、企业和大学。这不能单靠法律,而更加要靠习惯势力。二者之间的差距,大到叫人吃惊的程度。一方面是法律,显得明确而又狭隘;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已经感到的强大而又模糊的要求。他希望人民更加善于自主一些,在相互之间树立博爱的关系。然后让无人出面负责的等级制,让位给个人和团体的责任制。他这种伟大的想像,仅仅体现在政府公报几张天书似的纸片上。等到化想像为现实的时候,他便陷入思想习惯的一团乱麻之中。

戴高乐想要跟几百年的传统一刀两断,甚至要跟自已政府之作风一刀两断。他要求国家自动实施这么一个原则:让每一个公

* 指阿尔及利亚解放。——译注

民都参加管理。同时，国家要自动放弃自己掌握的一部分权力。他把全部法国历史的前景倒一个个儿。他完全意识得到，如果怎样修正一条公路的路线不归政府而归地方政权去作决定，国家的威权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可是这个主张显得那样的新奇，以至于惹起了广泛的反对。

拔苗助长

戴高乐也有可能因为他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就这个改革进行深思熟虑，而他的性格也罢，修养也罢，都跟这项改革不无抵触。他的本能，他的教养，本来是天主教的，军人的，雅各宾党人的，自然向往中央集权。最后仅仅出于实用主义，他才起来反对中央集权*。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成熟过程，而他却没有来得及等待。

在1940年，他是失掉联络的士兵。他从小就跟法国合二而一。等到形势演变到需要他出来挽救危亡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适应了形势。但是，到了1945年年底，作为临时政府首脑，他却栽了筋斗，因为他还没有真正想清楚国家的体制问题，尤其没有真正考虑好怎样去对付政界人物。他这个人曾经操纵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可是碰到一帮毫无威望的政客，却好象古里威受困小人国，让侏儒们绳捆索绑，动弹不得。

他在老家戈龙贝隐居十二年，到了1958年，再次一举成功，运用自如，有天衣无缝之巧，对共和国进行了改造。当时的条件却比

* 然而，在这一次公民表决的三十五年以前，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权力分散的根本意义。在他1934年写的《职业军队的趋势》一书中，他已经用十分现代化的词句确定了以下的观点：“通过确定目标参加领导”。这种出奇的现代化词句，几乎让人以为出自屈鲁克或者热里涅之口。作者又补充说：“规定必须达到的目标，激发竞赛精神，然后判断其成效，这就是上级权力对每一个单位所应当坚持的。至于怎样去做？让人们各显神通去嘛！这乃是激发事业心的唯一道路，也就是分权制。”不过，他想用于军队的，实际上，不是分权制，而是分散制。

1945年困难得多。在1945年,他的威望正高,而共和国也正待兴建。那末他为什么这一次倒能够举重若轻呢?原因是这条蛰龙已经在岩穴中准备好了出任国家元首。

假如他在1968年以后,能有十年时光来让他“改造法兰西”的想法逐渐成熟,他就一定能叫人民跟着他走。现在要法国人在丧失了他的情况下,自己去探索一条仅有戴高乐其名的道路。

最高的遗志

作为一位重建国家的人物,戴高乐将军历史形象的隐没,对于法国的前途来说,实在是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为什么呢?因为恰恰是他决计对国家权力过大进行斗争;就是因为他要解放外省的活力,不再受巴黎的压制;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民族团结的最大危险在于官僚称霸;就是因为他他在1968年5月亲身体会到,一个根基不深,没有接班的国家,是多么脆弱;就是因为他自从亨利四世以来,乃是第一位国家元首,居然认为一个国家若要强大,非得要减少自己的职能,加强地方的权力。

这么样的一个人,除了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以外,谁也不象他那样成为国家的化身,这个人居然能有那样的预感,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戴高乐将军最后的劝告是: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改造法国,解放人民的力量。只有在内部本身重新找到了新的平衡,法国才谈得上伟大,在历史面前伟大,在外国面前伟大。

当时有几个法国人领会了这个嘱咐的重要性呢?公民表决的时候,投赞成票的人不过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信仰,并不是真正相信他的看法。自从他归隐戈龙贝以后,绝大多数“戴高乐派”迫不及待地忘掉这一点。他们唯恐在遗产里保存下中央分权和人民参加政治管理,唯恐去承认这两条最难办到的事情。因为旁的东西只需要维持,唯独这两条任务却非独创不可。

有哪一位接他的班主持国政的人愿意承认，今后的任务必须从戴高乐不得不中断的地方重新作起？承认只有把戴高乐未能做成的事做成功，才能让法国人民跟法兰西比翼双飞？

第四十八章

“我的第二个七年任期”

1973年3月，议会选举刚刚揭晓，乔治·蓬皮杜就派人告诉我，要让我当司法部长。我对法国社会的组织问题，已经考虑很久，很想要一个旁的差使当当。我便向总统建议，跟他一道准备大大改革我国的行政体制和地方民主。我说：“在法国，如果不先改革整套的指挥系统，什么也改革不了。为什么您不就此设置一个改革部呢？”

蓬皮杜好久一言不发，结果答道：

“我不说不行（他从来不愿意讲：行）。关于国家的建制，中央部会和地方行政的关系，以及公职问题，都需要有一套学说。法国自从大革命和帝制以来，就是缺乏这么一套学说。在这以前，到底有过没有，也靠不住。我在这个问题上很不清楚，比戴将军强不了多少。他在其他种种方面显得何其精明，唯独在这个问题上眼珠不亮。说得准确一些，我认为什么‘地区权力’等等不负责任的谈话，都是不应当搞的。不过，什么才是该搞的呢？村、乡、区、省，要是就像当前那个模样，确实都是已经僵化了的结构，用旧了的建制，需要有东西来取而代之。可我又不知道到底要什么东西好。”

他歇了歇，接着说：“我很愿意把地方建制着手改革的计划和任务，交给你去办。但是千万不要叫做改革部！这种漂亮的称呼是滑稽的。也许可以叫做行政改革部。从前已经有过这么一个称呼，如今让它起死回生好了。”

我们俩就这么成了交。关于省、区和市，总统让我全权提出改

革方案，只要我认为好的。至于专区呢，他要我仅限于实施1972年7月5日的法律。照他看起来，这条法律已经走过了头。

他对我说：“你想治治巴黎官僚主义的癌症，可别让它扩散到专区首府去……”

如果法国人要专区……

我早就知道蓬皮杜反对专区。而且他亲口告诉我*，为什么他批驳了专区自治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1970年拟订出来，消弥公民表决失败的不良影响的。计划高度保密，打算在香槟——阿尔丹和罗尼——阿尔卑斯两个专区，设置由普选直接产生的议会，另外设置一个向专区议会负责的专区执行机构。产生议会和产生执行机构的方式，在两个试点区，应该有所区别，要两个不同的样板。其他专区可以随后参考试点的结果，各自引用这个或那个样板。

他对我说：“这是个危险的措施。我们国家恢复统一，为时不久，我不愿意冒这个险。只要在两个专区一搞试点，别的地方就都要马上照办。首先是布列塔尼，科西嘉和阿尔萨斯。他们觉得试点没有在他们那儿搞，自己受了侮辱。几百个自治派，血往上冲，就会拖着整个地区火辣辣地搞起来。这对法国来说，十分危险。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风险呢？”

“咱们到底要什么？要的是改善环境，维护生活质量。加强了专区的重要性，首府必然膨胀。大城市越大，中等城市便凋零衰落。瞧瞧里昂、马赛、波尔多、里尔，都将近有百万市民，有的即将超过。这已经是过了头。该鼓励的是中小城市，生活比较舒适。所以应该帮助的是省，而不是专区。”

我觉得这样选择是现实的。一个省那么大小，比较容易管理。

* 1970年10月23日。

既不太大，又不太小。可是我偏想打一场输官司。拿旧东西来办新事情，到底困难不困难？坏习惯已经形成两百年了，在处女地上革新，岂不更切实际？正因为这些，所以戴高乐才让专区吸引住了。

他冷冷地回答我说：“专区吗？只有三四个真卖气力，其余等于没有。这都完完全全是人为的。省的自治已经有它一段历史。人们已经习惯于一个省的生活。专区自治乃是巴黎专家治国论者想出来的东西，除了这些人自己，谁也不真正想搞这一套。除非还有那么几个同党，想在省会里为自己捞一个专区级的差使。你还是听听我的话吧。法国人如果对专区有兴趣，那末大家就会知道，专区也早就实现了。”

“可是，中央分权总不能不办罢！法国人厌恶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厉害啦。”

“我可没法来个百废俱兴呀。我的首要考虑，最根本的想法是工业化。工业化并不需要专区化。工业化的结构问题应该根据我们的历史和地理。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事，今天完就行了。”

蓬皮杜就这样不得已而求其次，搞一个规模小得多的改革，但是想要一下子就在全国实施。专区不再像戴高乐原来想的那样，只是国家的一级建制，仅仅作为经费有限的一级建制。专区议会的决策权不会很大，半数议员由国会议员兼任。这些人当然都是中央集权的传送带。执行权则由专区首长独揽……

这个法案就要由我来草拟，而这项任务也就是我各项任务中唯一的正式任务。至于我的基本工作则是试图把原来的省，原来的市，变成担负新职责的现代机构。

过犹不及

成立新的专区议会，使我从中看到好些长处：由选举产生的人

员将习惯于在一起工作,并且摆脱那种小山头作风。但是,我也从中看得出一些危险。由于国会议员从中发挥影响,专区议会免不了会分政治派别。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本来只在全国范围内剧烈进行,这样一来便将波及专区。专区议会权力的薄弱,财力的有限,都将引起一种吃亏的感觉,令人产生一种“可耻的乞讨”感。同时也就会产生一种不负责任的心理。不错,办法大概只算一个过渡步骤,正如专区发展委员会那样昙花一现。

我系统地访问各个专区,会见一下那些由选举产生的人员,经济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新的专区建制里,一定将有很多这等人物。我有必要理解他们的期望和他们的顾虑,然后再去拟定建立新制度必不可少的许多法令规章。

在我逐地视察期间,我既会见了最高要求派,也会见了最低要求派。最高要求派把这一次改革叫做小改革*。就是他们这些人搞垮了1969年4月举行的公民投票的,而那一次表决的改革却比这一次的目标高得多。他们揭发政府的虚伪手段。说政府假装咨询民意,根本不想让出丝毫权力。我能说他们不对吗?他们对我振振有词所讲的,不都是我老讲的东西吗?安德烈·尚德尔纳戈尔1973年10月9日在里摩日对我讲的话,确实触动了我。他说:

“我现在才深信,尽管中央集权是打倒封建的必要工具,然后再用来把共和国建成民族的国家,但是时至今日,它那种万恶的单调一律,把咱们今天的社会搞成了不毛之地。现在非得开倒车不可了。”

谁能够在这句话里换掉一个字眼呢?不过也可以感觉得出,这些代议人员长期摸不着中央权力,难免让他们的判断染上一些

* 例如:里尔市的皮埃尔·莫鲁瓦,布瓦蒂埃市的马尔西拉西,马赛市的加司东·德费尔,雷纳市的乔治·隆巴尔,里昂市的普拉戴尔和杜勃都,土鲁士的艾呼德,蒙贝里埃的贝纳。

牢骚的色彩。对他们来说，国家简直就是“别人”。而他们在外省却搞了一些牢靠的地盘。这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与此相反，最低要求派觉得改革有危险性，会影响国家民族的统一，会让专区首府享受特权，损害周围的省市。这种改革在行政体系里插进一道屏障，使周转更加复杂。雷纳市的参议员兼市长亨利·弗雷维尔，恳请我提防我手里摆弄的炸药包。他对我说：

“我是个史学家。布列塔尼的历史我研究得太多啦，不能不担心分裂主义重新抬头。甚至没法不担心布列塔尼要离开法国搞独立。法国之所以形成，在于克服了地方各自为政。我恳求你不要把沉睡的猛兽叫醒。”

尼斯市长雅克·梅德三根本不肯到马赛去开会。他对我说：

“尼斯已经成了法国第四个大城市。我们跟巴黎打交道比马赛方便得多。两千五百年来，我们跟马赛一直在竞争。我决不让佛赛人*吞併我们。”

艾弗娄市的省议会议长埃翁参议员，不肯归属鲁昂市。比亚利茨市的参议员兼市长吉·勃蒂，不肯归属波尔多市。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议会议长皮埃尔·德·歇维涅，向我表示反对改革，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改革会影响到省市制的生存，而省市制乃是共和国立国之本。贝比尼昂和拿尔波纳的人，宁愿听巴黎，不愿意听蒙贝里埃的命令。

赞成我们改革的人不多。布列塔尼省操古佛奈克口音的人，赞成我们。他们说：“我们可以搞一搞，希望巴黎不要一手拿出来，一手又收回去。”他们又半认真半开玩笑说：“正因为有了这么个希望，我们才没去参加布列塔尼共和国部队。如果我们再一次失败的话，那么事情也不过是搁一搁再办罢了。”

* 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佛赛城。佛赛人随后到高卢建立了马赛城。——译注

到了波尔多，雅克·沙邦—戴尔马说了一句归总的话：“过犹不及。”

反复的可能性

在这一次十一个月的期间，我屡次把我的工作和想法告诉乔治·蓬皮杜。他很感兴趣。他那时候病情已经越来越重，而毅力却越发坚韧。不过他得把精力集中处理几件他认为最要紧的事情。首先是对外政策。至于法国呢，他最担心让那种控制不住的力量挣脱出来。只要他让国家的历史性平衡发生问题，这种危机便会来临。

他对我说：“瞧瞧意大利搞的地方化吧。只要这个国家满足于有一个中央政府，意共不管多么强大，终归捞不到中央政权。因为一到全国的水平，谁想什么都要，必然什么也要不着。如果把问题分散，答复便随之而分散。就这样，意大利有几个地区已经搞了，或者就将要搞各自的共产党执行机构。你完全可以肯定，意共掌握了一个地区，绝对不会再放手。等到人们在细节上跟他们打惯了交道，他们就会想大试一试。意共还没有控制的地区，真是搞得一团糟。因为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管事情：罗马呢？还是地区呢？共产党向来是从乱中得胜的。只要中央政权还在管事，人们多多少少总还听它指挥，只要把权力一交给地方，那就马上一风吹。

他又对我说：“第三第四共和国的后遗症还没有痊愈，旧病很有可能起反复。你不觉得法国非常需要巩固吗？你看不出戴高乐将军搞的地区化和人民参政为时过早，而且准备不充分吗？人民不同意他，并不是偶然的呀！再过五年十年就可以走远一点了。慢慢来嘛……我不会像那种自称左派的人以为搞个天下大乱，就能引起进步。教皇让第二十三世就是典型的鬼迷心窍，请神容

易退神难嘛。他大开闸门，让大水淹了龙王庙。我呀，我决不会给我的后任留下一个一塌糊涂的法兰西……”

戴高乐跟蓬皮杜一样，都觉得法国是脆弱的。但是，在戴高乐看起来，只有前进才能避免摔交，而在蓬皮杜看起来，一走便怕摔交。

路线已经指明，我一定遵循办理*。

其实，我在全国各地听到的话，也都肯定了我的想法。专区如果它能形成一种交换意见的场所，在那儿，各省通过自己的代议人员，学会摆脱那种山头之争，那就是必要的。要想各省都肯那么样去做，一定要目标不高，权力有限。一个专区能够不引起人们的顾虑，才能够悄悄地提倡一些新的习惯，使各省的利益都得到照顾。

地方权力方案

在这个基础上，一开头碰到的那种成见和对立情绪，逐渐消失。人们不再务虚，而想踏踏实实地解决具体问题。

就这样，我们迈着小步子前进，尽管当时的梅斯梅尔政府已经日薄西山，容光惨淡。其实我心里想的是下文。1964年改革以后进行的权力分散已归失败。1969年，起步起错，影响了专区分权。我们不得不那末样小心翼翼，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显然没法在专区实现。

要搞嘛，非得另外找一块适当的土壤。说真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地方自由需要翻一翻地，下点肥料，重新壮一壮地力吗？开头就得着手进行双重的改革。一是城乡改革，一是省市改革。我已

* 比方说，我不得不马上取消里木参专区议会的一次讨论会，因为他们打算建立专区的公职。不用多久，便会在一片混乱中看到专区议会的议长们，擅自把执行权抢在手里。我要搞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上边的指示一定要我这么做。我的谨慎小心也启示我去那么做。

经打算把我逐渐形成的信念，告诉乔治·蓬皮杜*。

在省长和政府官员面前，那有名的三万七千个城镇，实在太零碎了，当不上有效的“谈判对手”。合并罢，不合时宜，因为法国人还留恋着他们村镇的独立性。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这些传统的村镇保持各自的议事会；不让市长、村长保持他们的红披带，保持村警和“零花钱”。他们是基层社会集体一个地点、一个街坊、选举产生的代议士。这些市长、村长行使必要的职权是完全正当的：保证公共的安宁，主持婚礼，办理身份登记，保证执法，养护街道和便道，维护公共建筑、公墓、环境的清洁和美观，到上级机关去保卫自己主管的一切利益。特别是在当地采取日常的决策——任何集体生活需要采取的日常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村镇难道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么？任何具有特点的市区街坊，尤其是那些新建的大楼群，都该有自己的组织。经过正规方式选举出来的市议会，应当负责代替街道协会。这不会有什么坏处。而街道协会，一怒之下便像猪尿泡似的鼓起来，鼓得快，也瘪得快。

但是，市长们可以摆脱企业主的工作，市长和企业主的工作，本来就不相称。后者仿佛是假鼻子，别人可以躲在后面搞官僚主义。相反，如果要把一些村镇集结起来，最好集结成一个乡区，有几个区那么大小，包括十个到三十个小村镇。也可以集结成市区，包括一个居民点的全部村镇。这样的乡区或市区可以担任一些管理工作，首先是一些设备工程。这是零星分散的村长、镇长从来做不到的，至少是很难做到的。税收可以这样来分摊：已经有了

* 1974年2月17日，那时候，我领导一个非正式的工作组①。上面讲的那些想法，在工作组里酝酿了一年多。工作组的成员都是一向研究行政管理的老手。我打算在第二个阶段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的一些设想，到底怎样在一个主要由代议人员组成的委员会里进行工作。我们思考的结果以及我从中得出的结论，都已经在1975年公布了②。

设备的村镇，少摊一些，还没有的多摊一些。过了十年二十年，村镇的税收可以归区使用。村镇将成为单纯的公共建制，而区则代替村镇成为一级国家建制。这样一来，地方管理单位将由三万七千个减少到三千来个。区的大小就会跟别国的村镇不相上下，比方说西德、英国、瑞典等国。

在这样的区建成以后，由它取代了无能为力的村镇和虚有其表的乡，省议会就可以从事革新了。区主席或称区董，都是省议会的当然成员。省议会议员，按人口比例，由选举产生，代表本省*。

为了工作协调起见，市选举和省选举可以在同一天举行。现在分三次举行的选举，（区议员三年改选一半，村镇议员六年改选），将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直接普选不必再分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这样一简化，可以教育选民和当选人，在三个不同层次的舞台上当主角。第一层是民族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大抉择，第二层是政府和议会的日常问题。第三是地方政权。

省 政 府

这样的省议会和原来的不一样。原来的省议会已经过时，因为已经没有地方的代表性。原来的乡区失掉了全部职能。也不能再代表居民。因为有些乡区比其他乡区的人口，悬殊一百倍**。今后，省议会既代表地方，也代表居民。代表地方的是直接负责行政管理的人员，密切结合现实。代表居民的代议人员，人数应符合人口动态。省议会任命省政府，或者叫做省务府。今天，省长、省政

* 另一个办法是，各区主席代表各地区，都作为省议会的当然成员。另外一批成员作为居民代表当选。其选举方式可以是照选区名单，按比例制选举。席数多少按居民人口多寡而定。

** 比方说，在上加罗纳，三十五位省议会议员代表居民二十万人。而另外四位议员却代表居民五十万人。市区往往不再符合社会现实。因而选举缺席越来越多。省议会的议员，有的兼市长，有的不兼。因此，有些小镇村选出来的代表反而比大村镇多。

府、各局长手里的权力,全部移交给新的州政府。这个执行机关由选举产生,受省议会监督。就像现今的村镇管理处一样,受社务会议监督。省治的技术单位听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支配,很像城市里的技术单位听市长支配。

当然,这样的大变动应当进行大规模的试验。我主张搞地区试验,而这却是咱们法国人不喜欢的。法国人要么全部,要么全不。开头必需把这些改革在几个不同的省里推行,等到试验显出了新制度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预料不到的困难,才能修正推广。

专区将成为一种公会,参加公会的是已具独立性的省市,而代表省市的则是合法的执行机关和革新了的议会。专区理事会里将不再包括国会议员和市长,只包括各省议会的代表。执行机关采取常设会议的形式,由各省的执行机关参加*。主席轮流担任,以免专区首府患庞大症,而边缘省市则“沙漠化”。专区公共建制,有如计划办事处,责在协调经济发展,配合各种方案,担任必要的仲裁。但是决议须由各省执行,省务府负责,省议会监督。

公职人员听代议人员支配

省长将成为共和国特派员,在省政府代表中央政府,监督遗留在各省的少数中央政府办事机构。

改革的要点是:大部分国家官员将听省、区支配。他们保持原来的级别,保证原俸,但在合同期间由省、区开支。有如国家行政法院的推事,听公共企业的支配。此后,不再是地方代议人员受辖于政府官员,而是大部分政府官员受地方代议人员的管辖。任何

* 会议有时由各省主席参加,有时开各省务府全体会议,有时开职守相同的各省务府成员工作会议。各省主席轮流主持会议。比方说,照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政府级会议那样六个月轮流一次。会议最好在轮任主席的省府举行,免得显示“专区首府”突出。

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办的。因此，法国的体制将起深刻的变化。

下一任总统七年任期的建树

乔治·蓬皮杜一直听我讲下去，差不多没有打断我的话。至多偶尔提一两个问题，叫我补充。等到我讲完，他提出一些反对意见，指出一两个地方有问题，想把细节都搞清楚。然后他把大拇指摸摸左眼皮，好像要驱散一个缠绕着他的念头，一面又对我说：

“你想搞的事情太大。哪怕你做得十分小心，逐步循序渐进，也难免把公共权力的结构打乱。我得要好好想一想。”

我很理解他那种犹豫不决的心情。这是他的性格和他的职务决定的。中央分权和地方民主问题，已经争吵了三百年，若要得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解决办法，那就非得要国家元首能够达成一项全国性的谅解。这样一桩事业，不能对一位固执的部长勉强说一声“姑且试试”，就能解决。必须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也就得把国家元首动员起来。所以，我只好耐心等待。

过了几天，我跟他最亲信的顾问谈了话，不免引起了我的担心。

他说：“你已经把专区搞起来了。并没有出什么乱子。今后我们可以恢复正常。所谓正常，就是专区归内政部管辖。省市和村镇也是一样。今后，你会清闲一些。你那个部本来是个临时使命部。你的使命现在已经结束。”

我说：“改革国家结构的工作怎么办呢？我有那末一种偏见，以为国家改革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具有根本意义。把计划搞好，需要长时期的准备。”

“专区已经建立起来”，他接着说，“如果再去搞国家改革，那得再等几年。你就这样，也该玩个够啦！”

他难道觉得，改造法国社会不过是一场儿戏吗？他讲的到底是他自己的想法呢，还是总统的意思呢？

就在那一天的第二天*，内阁会议刚结束，总理梅斯梅尔向目瞪口呆的部长们宣布内阁辞职。接着便告诉我取消改革部**，叫我主管文化和环境部。我告诉他说，我很失望。关于国家的改革，已经着手准备，现在不得不放弃。他说：总统希望我用私人身份继续研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下一次内阁会议上，蓬皮杜绕桌子几乎转了一个圈子，过来对我说：

“你知道吗？你那个改革，等我再度当选的七年任期里再搞罢。”

乔治·蓬皮杜从来也没有显得那末样疲乏，脸部那样浮肿。我一闪念，觉得他也许在开一个损人的玩笑。我好像受了刺伤。大概神气里有点看得出来。他又走过来对我说：“别难过。再思考思考吧。事情很大，要用长时期去搞。在七年任期終了的时候，是没法搞成的。”

他老爱讲，搞一项改革，可以造福，也可以成灾，就看搞的时机对不对头。他最善于辨别时机是否适宜。戴高乐将军一向很重视他这个才能。如果他在1976年当真重新当选总统，一定会在1983年以前实现我梦寐以求的大改革。原先，他时常对我讲起当第二任总统，特别在1973年议会选举以后。他再度竞选乃是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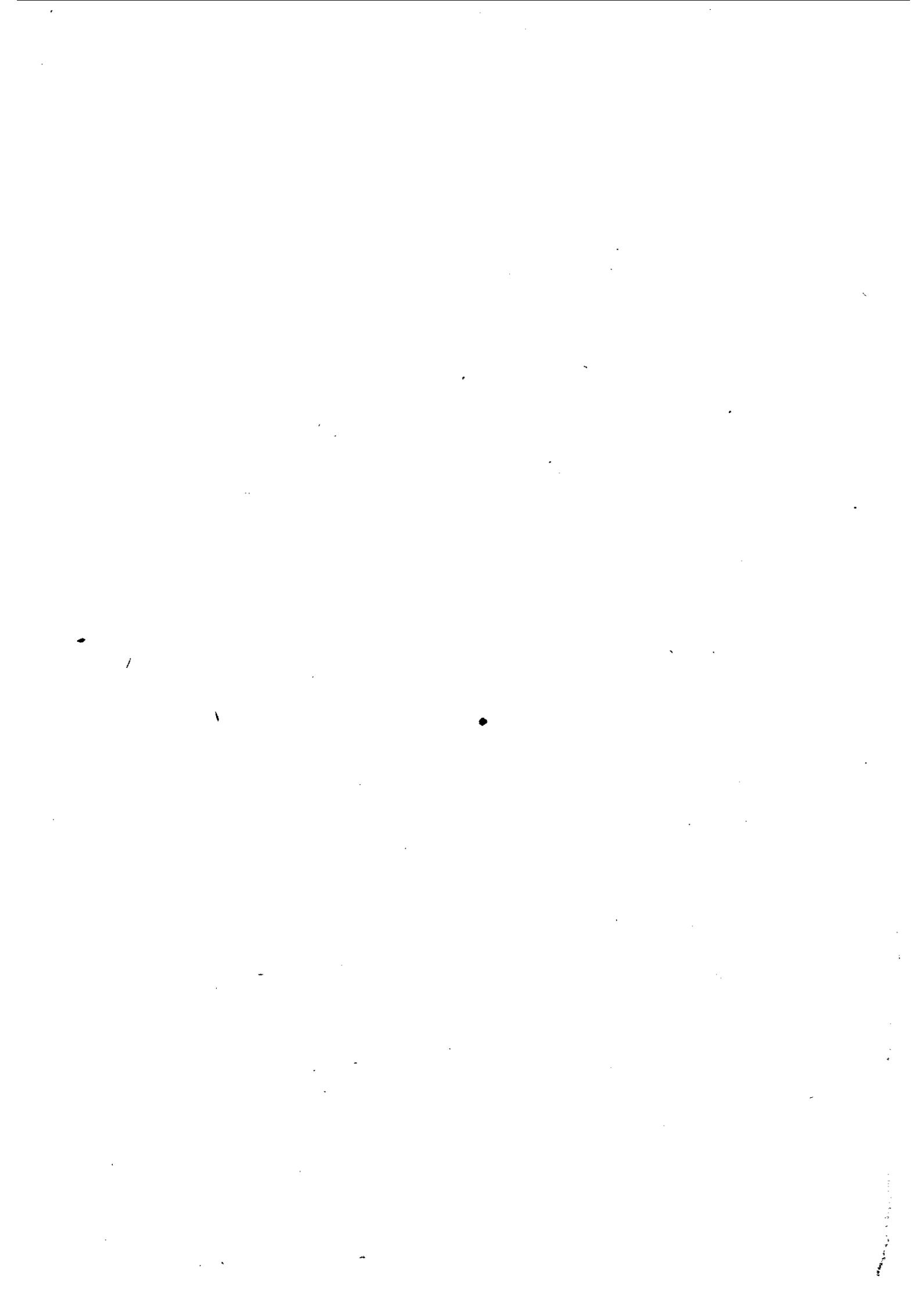
* 1974年2月28日

** 改革部遗留的工作，由内政部和负责公务的国务秘书瓜分。计划总局则直属总理。

*** 我这个差使，还得发一张特任状给我，才完手续。特任状在1974年3月28日发出。收到的那一天，正是蓬皮杜逝世之日③。然而，我们的工作还正式进行了三个月，非正式的期间还更长。直到综合报告由“法国资料”加以公布为止。“发展地方责任委员会”，在奥里维埃·吉夏尔主持下，拟出一份报告，跟我们的设想一脉相承，并且完成了我们设想的一部分。这一次总算没让西齐弗搬上山去的岩石，重新掉进深沟。

容辞的。因为只有他能操胜算。他心里真那么想吗？还是摆的迷魂阵？会不会是为了稳住部下越来越大的野心？我相信他，首先是意识到了事情的艰巨性。三百年来，历次尝试终归失败，给他印象太深，几乎是命里注定要流产。他想吸取失败的教训。

如果他想再次当选总统，并不仅仅出于对死亡的斗争，那末，他到底会干些什么呢？会给中央分权以应有的位置吗？我相信会的。在戴高乐去世以后，蓬皮杜也同样地对法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他也明白，要巩固法国，就得加以改造。



结 论

治 疗 药 方

第四十九章 论方式

法兰西病是不是不可救药了？如果说不是，这就意味着要着手起草治疗方案。不要怕显得太不自量力。病人就是咱们自己，想治好自已的病能叫做不自量力吗？但是，我们并没打算在这里详详细细地开一个药方，只不过是考虑一下方法，并且列举例证，找出某些线索，使我们可以顺着往前走。这本书并不指望拟定一个“纲领”或是一篇“宣言”，而只是为了思索，并引起读者思索；目的就在于借此引起一次思想上的论战，抛砖引玉，为充实他人将要制定的纲领和宣言，贡献一份力量。

1. 认识病源

要想治病，首要的难道不就是深谙病情吗？难道不是要求助于具有积极意义的自知之明吗？承认疾病，在我们自己身上围剿疾病，摆脱病魔，战胜命运。这就是治疗的关键。

法兰西病的治疗，确实得靠集体的精神治疗法，而一切精神治疗法的首要条件，就是承认真情实况。想治好一个精神病患者，大约总是需要认清病的真正起因，而这种认识往往就足以把病治好，无需在我们身体之外寻找致病的原因。

不要指望惩罚一只替罪羊，就能驱逐病魔。这种病的起因并不是只有一个，只产生于一种意识形态，只危害一个阶级，一个社

会阶层；再说，替罪羊在法国社会里自卫能力也很强。而且归根结蒂，它们也有道理：要不就是人人有罪，要不就是个个无辜。这样做并不能减轻我们的任务。

医生诊断，即便是很恰当的，即便是综合性的，却因为恰当而被抛置一边，那么这一任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即使是最明智的分析*，也会得不到别人理解，这看起来是太令人吃惊了。

其中的一些分析，有个弱点，就是从国家那儿来的。这又使我们遇到了一道障碍。在法国，国家并不是一名公认的教育家，人们不信任国家，国家在这种不信任中生活。人们怀疑非人格化的国家遵循的是它那冷酷的恶魔式的逻辑，而不是遵循人民群众的逻辑；同时怀疑人格化的国家为政客们的野心效劳。它是那样强大，公民们的确有理由担心，一旦国家动作起来，就会打乱平衡。而每个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平衡，如果说不能赖以全面发展，至少能赖以苟且度日。法国社会似乎是一个磁器店，人们生怕国家这头大象突然闯进来，想建立新秩序，或搞什么新花样。

哪儿能找到有说服力的话呢？谁能对法国人说真话而不至于使他们马上蜷缩起来？如果不是知识分子、教授、记者，又是谁呢？还有一些实干家，已经对实干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自己觉得只对真理负有责任。我们的人民对这等人总是格外信任。大概因为心里都很清楚：这种人不作便罢，要作就一人作事一人当。

然而，法国思想界要在词汇、主题、定义方面费多大的气力才能摆脱过去的重负啊！什么时候它才能不再开口十九世纪，闭口

* 这种情况三百年来比比皆是。仅以第五共和国而言，从吕埃夫——阿芒的报告到沙邦·戴尔马论新社会的演说，中间还有1968年5月24日戴高乐将军的致词，都是空谷足音。

十九世纪，不再在已完结的世纪的海市蜃楼中过生活呢？仿佛是一个老战士，唠唠叨叨地回忆过去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教条主义和知识界的恐怖主义呢？

实际上，尽管词还在，意思却都走样了。这些词今天还保留些什么内容呢？诸如左派、右派、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没有一个是得到公认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迫使我们把这类词从日常词汇表中划掉，首先要把它们从喜欢推敲文字的人的词汇表中划掉。这些人应该说就是知识分子。蒙泰尼说：“大多数动乱都是由于语法问题造成的。”孔夫子比他早二十二个世纪，他曾说过这样的话：要避免战争，“必也正名乎”。有些人的职业就是在现实世界里进行活动，他们往往感到与人们所谈论的世界不再发生任何联系。难道不应该由知识分子来重建联系，发明创造我们时代的词汇，或者不如说，恢复那种在任何时候都行得通的简单字眼吗？

这需要退几步来看问题，但又恐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处在今天，谁能抵挡住那种冲昏头脑的贪快草率呢？“一切服从目前吗？”行啊，让愿意服从的人去服从好了！

如果我们的社会希望某一天重建道德标准，而且以相应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摆脱当前的混乱，恢复长远观念，使他们的思想不受环境限制。

法国的精神治疗应从知识分子中的精华身上开始，假如他们放弃治疗，又如何指望法国人能有一天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把病治好呢？

不要梦想

要想使思想与精神改革成功，就是雷南在1870—1871年战争之后提到的那种办法，知识分子必须离开他们依依不舍的老路，

离开乌托邦与一切讲究体系的老路。这些陈旧的激情使他们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从而,有时也成为暴力与专制的帮凶。

1849年,在法庭上,妥斯陀也夫斯基一面称颂:“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制度,这一和谐的机构如何吸引着人们的灵魂,迷住人们的心窍,而且不带任何仇恨。”然而,就象晴天霹雳一样,一面又得出这样的结论:“无庸置辨,这个制度是有害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制度。”

现实是检验我们思想的标准,现实是伟大的教育家,而法国的现实是不是使人倾向于绝望呢?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现实主义能够使我们化弱点为力量。我们并不能靠借用外来的或是自己炮制出来的秘诀,从中汲取力量来克服弱点。只要以清醒的目光看待过去,我们就可以不做守旧主义者;只要认识到长时期以来宗派主义在我们中间占的地位,我们就会气量大起来;只有发现我们关节的僵化,我们才能重新学会灵活一些。

2. 新的良机

法兰西是能够重新攀登历史高坡的。实际上,它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自从黎塞留以后,法国只享受过两次交流的自由,那还是在路易十六统治末期和拿破仑第三当政时期,时间都相当短促,很快就在一幕悲剧中告终了。不过法兰西那种坐井观天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正如著名的瑞士历史学家赫贝尔·吕蒂在1955年他那本名著中所描绘的那样。^①那时候,法国敌视革新,因为这会引起麻烦;不信任外国的贡献,而暗中认定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无比优越,从而沉湎于自我陶醉。然而,法国所处的时刻变了,它发现了外面吹来了生机勃勃的劲风,发现了不同的经济彼比较量,发现了行动的愿望。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的挑战是关键。

并着双脚，大概还闭着眼睛*，法国就这样跳进了这个陌生世界。在那里，它与邻国之间的经济界限逐渐模糊，最后几乎已经消逝。这是信念的表示，也是第二帝国以来，法国国民精神从来没有接受过的信念。

就这样，法国迫使自己奋起直追。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十五年来，成效证实了这一点。从1868年到1968年，日本在一个世纪中弥补了五个世纪造成的落后。而法国，顶多也就是弥补一个世纪；一代人的努力按理说就足够了。国家的席次，尽管变更得很慢，却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二十世纪初，瑞典不过是一个贫瘠的农业国，可后来，它的生活水平不次于任何其它国家。大不列颠，在1914年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目前居然让西班牙和希腊赶上了。至于法国，1954年以来一直以一种令人满意的速度迈进，尤其在1960年到1974年期间，大放异彩。**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固然不足以形成一个生活的目标，但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落后的王牌

以前的落后，可以变为王牌。

人员：尽管从长远来看，法国人手不足。然而农业剩余人口对发展工业还大有潜力可挖。只要不听任这个问题凑凑合合地自然发展，不要让年轻农民流向生产效率很低的工作岗位：小商人和办公室职员。

* 当然，孟戴斯·弗朗斯曾于1957年7月声称：法国的经济没有能力在一年半以后加入共同市场。他这句话显然没有讲错。法国如果不能在事前振兴自己的经济，那么承担任何国际义务都是纸上谈兵。然而，历史的反复无常却否定了他那句话，而且肯定了社会党人阿兰·萨伐利的判断。萨伐利当时担任罗马条约的报告员，他批驳了关税保护制，歌颂广阔的市场和国际分工。

** 赫尔曼·凯恩说得有理：如果这十五年的飞跃持续下去，那么法国在1985年之前就能赶上和超过西德，西德完全就是这样赶上和超过大不列颠的。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条件得成熟。

地盘：法国在这方面还是富裕的。只要会干，就能描绘出一个工业乐园，使现代化和强大的工业力量与我们特有的美感及和谐感彼此配合。

速度：落后于他人使我们能跳过整整一代工艺。我们能够马上掌握一些方法，并掌握那些最精心设计的设备。在其它地方却是靠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美国彩色电视的机件太庞杂了，因此在法国和德国电视技术出现以后，根本无法改变，美国不得不继续使用平庸的工艺。我们懂得从先驱的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再也不至于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脸红了。

比别人晚动身，可以免于重复他人的错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仅仅是追随者，而不是批判家。我们本来可以不去模仿摩天大楼拥挤不堪的城市，集中引起的污染；我们本来可以不至于播下数不胜数的美式的暴力种子。然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再利用这张王牌，还不算太迟。

连我们的错误也不是不可以因祸得福。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改变了地点、职业、住宅、工作时间、社会环境，而这些往往多数是在毫无准备又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干的。然而工地和坑洼地那种可悲的日子不久就过去了。在这些个人悲剧之外，却看到了集体良机在逐渐形成。我们已经看到，从十七世纪的荷兰到十九世纪的美国，那些移民是怎样打破陈规而推动进步的。法国在二十年中出现了大量国内移民，也有可能促进改革。

这样，经济复兴之后，就会创造新条件，造就新人。差一点，自信心泛滥成灾；也只差一点，猜忌就占了上风。在今天的法国，上升的能量与下坠的能量几乎势均力敌。

持久的王牌

建制可以造成区别。法国人如今有着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能

选择方向和时机。这个国家是比较巩固的，因而可以从民主中汲取力量，而不至于陷入民主无法自拔。这个国家又比较持久，因而能够克服惰性；这种惰性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无法克服的，而且逐步地引起无法避免的变化。如今这个国家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因而能重新给公民带来尊严，给公民的意识以新的机会。这个国家应能消除法国人的分歧，以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仲裁员的身份，超然高居于分歧之上。这个国家能够驯服时间，为自己服务。

时间，这是和平交给我们的另一张王牌，既然如此之多的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的毛病，那么就需要几十年的和平年代来消除这些痕迹。经历了二十五年持续不断的战争，自1962年以来，法兰西无论是在哪块大陆还是在哪片海洋，都不曾介入任何争端，这种状况能维持这么久，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在同盟国内部，法兰西自主的国防政策，也带来了新的和平远景，这也是空前的良机。

友谊的王牌

法国的赌局是全球性的。外界给我们的形象，向我们发出的呼吁，对我们的自我估价，对我们的雄心壮志，颇起作用。六十年代以来，世界的发展趋势，不仅远远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机会。

允许殖民地独立，这是我们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尘。这一政策给法兰西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人们并不像畏惧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似的，害怕法国的霸权。法国能有办法重新发挥超于本身物质力量的影响。

这一片友好的星云，不管是明的或是暗的，在法语集团里面，确有它火热的核心。即使法语已经不再是全世界外交界和司法界的通用语言，但依然是人类精萃人物所使用的第二种语言。在联

联合国，讲法语的国家共有三十多个，虽然仅次于英语国家，却超过了共产主义集团的总和。在纽约的玻璃大厦中，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的演说家都讲法语。法语在世界上的地位既是牢固的，又是脆弱的。它是牢固的，因为它超出了政治制度的范围；又是脆弱的，因为法国本身落后，削弱了法语的地位。

在那些法国还能起作用的地区，欧洲还是很重要的。然而，欧洲之所以诞生，乃是因为它象征着大家自愿接受的竞赛，因此它应该保持这种面貌。欧洲应该顶得住这种诱惑：就象栗子羹中的栗子一样，混为一体。欧洲的国家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无视这些国家的特点，欧洲就有灭亡的危险。要想丰富自己，只有尊重各自的差异。欧洲无论如何不要去缓和竞争，也不要去硬搞一个力量纯一的地带。不要在这里忘记我们自己的问题，抛弃我们的志趣，不要受这种诱惑。欧洲，只要有组织，就能把竞争安排好。这样的欧洲也是友谊和团结的发祥地。然而，各国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完成这一事业的动力。欧洲保护了我们，使我们避免了闭关自守主义，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向世界敞开大门。这就是它的无法代替的优点。

历史上接踵而来的冲击

恰似当今世界的地理分布，世界的前进步伐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良机。历史的缓慢进程，突然间被突飞猛进的紧张进程所代替了。1800年，我们那些农民祖祖辈辈使用的工具与中世纪老祖宗们使用的，区别甚微；而拿破仑的大炮，跟克雷西战役时代的一模一样，炮弹从炮口填进；医学呢，也只限于天然药品。

1900年，飞行时速还不曾超过一百公里，而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一架运输机三小时就能跃过大西洋。自从有科学研究以来，十分之九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至今依然健在。1909年时，走过布来

利奥，从加莱到都佛，跨越了三十公里的海峡，就被看作了了不起的奇迹。而六十年后的今天，人类却能够直接看到两个人在月亮上欣然起舞。

节奏的变化使国家机构、社会关系、精神状况、生活态度和风俗习惯，都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我们的父辈无法设想今天我们在如何生活。我们也根本不可能预见十年后我们的处境。未来派之所以风行一时，恰恰是因为未来笼罩在浓雾里面。我们明知道未来将使我们吃惊，却希望减少一些惊奇的程度。历史的冲击把这部分留给梦想：在那儿能找到的，是留恋逝去的光阴，以及憧憬那总是要即将来临的幸福。

这动荡的时代，对懦夫来说是寒心的源泉，对于勇于接受新思想的人，却是一种召唤。

一致努力的草图

法国人应该对他们的时机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应该懂得，在他们的民族宝库中，有某些成果，很值得下一番功夫加以保护。

这种演进是不知不觉地实现的。社会主义者似乎逐步摆脱了大西洋、超国界或是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党人确认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以便接受多元政治；他们开始拥护核威慑力量，不再打算彻底改变国家体制。大家可以开始想像，有朝一日他们将与社会民主党人无所区别。不少人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然而，即便这种改变仅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毕竟也是史无前例的。甚至一切教条尽归灭亡的这种思想，也已经开始为一般人所接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而信奉现实的条件，似乎逐步成熟，类似于1959年的情况，德国社会党人，当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改变了信仰。他们在那儿决定放弃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而接受自由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

大概在法国大革命后，这是第一次吧！法国人逐步向造成一致努力的局面所需要的基本因素靠拢。或者是有所顾忌，或者小心翼翼，怕毁掉这种全国一致的前景。法国人不愿意提起这事。甚至，仿佛为了补偿，他们使那种政治的两重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紧张气氛日益加剧。个人之间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然而，生活水平，消费能力，生活方式，社会阶级却日益接近。法国人个人与个人之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象同代人了。奇怪的是，戴高乐生前是分裂的象征，现在人们却越来越多地提到他，仿佛他死后，倒成了民族团结的化身。

在我国面临的种种良机中，全国一致的局面初步显示出来。尽管是那样小心翼翼，四面受敌，却是最令人惊讶，最可宝贵，也是人们最不理解的良好时机。同时，这一良机也利用得最少。

历史处处清楚地说明，法国社会过去、现在、未来是怎样才得以避免宗教战争的。是通过一条理智而中庸的道路；是通过没有动乱的改革，不间断的进步；是通过耐心地缩小冲突；是通过让全国各地分担责任；是通过向一切基本因素开放，使新的经济社会的基本因素，各自觉得有了充分的代表性；是通过排除精神上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对我们来说却很自然。通过实行那句被遗忘的名言：“在圣父家中，也有几座房子。”

简而言之，就是让猜忌在信任的暖流中溶化。这种猜忌已经不知不觉在民族意识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3. 阿基米德杠杆

怎样才能利用我们新的良机并取胜呢？我们面临燃眉之急，容易犯种种错误。有朝一日，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行政、社会、经济制度分崩离析。在这一制度尚未把我们埋进废墟之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有必要改变它。但是只要轻轻一碰，它就摇摇欲坠，又该如

何是好呢？

必须有一个目标

“起因心理学”可能重新发现一个古老的真理：要想使生活有意义，必须使生活有目标。就是每人要为自己制定一个目标。一个心有“神火”的人，顶得上十个对自己做的事漠不关心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生活才有价值。

这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了寻找方向，国家也不得不找到一个“极”。共同的目标造成协调，超越社会上那种一盘散沙的状况。一个不能团结一致的民族能有什么作为呢？根据一个共同的标准，集体的性格超脱并打消分裂，而这种分裂是我们这个复杂社会的天然产物。共同的目标产生持续性，摆脱时间上的零散性。通过这一共同目标，人们将能经受得住挫折，并在失败中吸取教训。一切成就足以证明事情做对了，精力也会更加充沛。

看看以色列，看看中国吧，他们意识到要完成某种事业，因而接受了多么大的牺牲啊！而且的确，他们又完成了什么样的事业啊！在这里，一个国家诞生了；而在那儿，是整整一个民族的复兴！哪怕只看看咱们的邻居德国，只是通过下决心向自己证明能够成为繁荣与和平民主的典范，结果发挥了自己始料不及的才华，最后使别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法国，我们既不需要创业，也不需要辩解。而且三个世纪以来，因为总是以典范自居，我们对自己都有点厌烦了。特别是一个既中央集权又单一化的制度会扼杀主动精神。社会本来应该开步走，现在却被一套指标束缚住了。

所以，我们的任务比别人都更加困难。不过，我们还远远没有陷入绝境。只有在找不到鼓动人的主题时，我们才会感到困惑。

试着刻划几个主题吧！这也总是围绕着同一思想，就是人人

负责的思想。正是这一思想，使一些主题紧凑连贯，扣人心弦。

成为楷模

又一次，法国能够重新共同负起责任来，完成它那古怪的天职：成为楷模。愿意把从自己身上取得的成果分给他人，这是法国的特点之一。它这种救世主义往往以一种猛烈的态度表现出来。不管人家乐意与否，硬要为他人谋求幸福，那是不行的。然而这种救世主义还是有他伟大之处的，这就是当它向人类作证的时候：“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的伟大就在于努力在别人心目中显得伟大。这就是十字军远征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②一个新人文主义的时代来临了，法国有可能重新起开路先锋的作用。

世界在期待着。如果法兰西要发言，它的召唤决不含糊。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进步程度大相悬殊的国家艰难地共处在一个缩小了的世界里面。由于渴望保持尊严，不平等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电子革命使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同时生活在同一秒钟里。然而，就在最近，人类还是如此闭塞，相差几千年的人，竟可以同时生活而不自觉。援助别人，而不至于被人猜疑有什么统治的野心，法兰西是办得到的。世界期待着法国的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医生、教员、行政人员、商人、企业家，而法国年青一代却在担心失业。

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

使国家获得独立，从而赢得世界和平。今天，大概只有法国才能宣传这样一种圣战。不管是美国也好，苏联也好，还是几十个俯首帖耳、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的国家也好，都不能起来发这个信号。中国也不行，因为它太公开地与北方邻国为敌。

也许可以称这种理论为民族团结论。要想持久地维持国际秩

序，只有使任何国家都不做另一国的卫星国；只有每个国家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开辟自己的道路；只有确认每个国家都有绝对的权利，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文化，能够确保独立自主，能够把责任负起来。

某种超民族的迷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传播开来，与上面这种主张相抗衡。然而历史却表明：“整体化”是一种古代帝国经过巧妙地改头换面的新形式，而并不具备人家认为它有的那些长处。看吧，除去美国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度而外，在发展经济的竞赛中，遥遥领先的都是些小国和小共同体。因为在那儿发生了问题可以就地解决，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寻找力量以保持平衡。

确认并宣布这条道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畅通无阻的，这是法国努力的目标。

全面计划

不过，法国人得重新树立起自信心。作为公民，作为生产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来承担义务吧！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消除那种多如牛毛的条条和顾虑。因为就是这些东西束缚了法国人旺盛的精力，阻碍他们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看到怎样才有可能制定一个“人人负责的计划”，包括三方面：国家建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

重要的是，应该如何讲究方式方法来带动这一变化。定出目标来，并坚持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职责。

意识到病源，估量我们的时机，改造我们的思想武库，这对我们精神的康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法国处于目前这种状况，所以还得由政权来动员这种重新振奋起来的力量，领导这一变化。

这儿也是一样，使用什么方法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做一

个全面计划。啊！不要再搞缝缝补补了！放弃散兵作战的方式吧！摆脱东拼西凑的政策吧！

这是一种客观需要：既然全部机构都有毛病，那就应该从头到脚地医治。我们的社会既然如此衰老，如此弱不禁风，当然就得一下子加强所有的部位。否则，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人们忽视了的地方。好比一个旧轮胎，压下去了一个气瘤，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又会鼓起另一个来。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改革必须做到使人民感兴趣，并给予支持。不然的话，改革就会在千头万绪的专家治国论的文献中迷失方向，而这些文献只有专家懂得。

关于法兰西的变革，得做出一个全面计划，其中每个特殊的改革都被看作是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各个改革相辅相成。任何办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协调配合的结果，都有其重要性了。当部队感觉到就连小小的前哨战都列入了战斗计划之中，战士们就会更加勇猛地冲锋陷阵。

安排好过渡时期

如果这一计划是前后一贯的，它就能够考虑到持续性，使时间成为自己的盟友。每一阶段只往前略走一点儿，因而不致过于惊动那些死守住过去的人。然而尽管如此，已经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未来。这样就能够维持住人们的能动性。

心理学也有其需要。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正面攻击那些“酒贩子”，于是这些人给议会施加了很大压力，固然不是他们有能力倒阁，但至少是他们加速了内阁的垮台。米歇尔·德勃雷显然比较油滑，六年后，他攻击特权而不是攻击特权享有者。这些特权享有者终生死守着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既得权利”——然而特权将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他不是要取消权利，只是使它不能

永久化。因此碰到的反对就不那么强烈。以前这一主题总引起激烈的争论，从此却在公众集会上销声匿迹了。炸弹失去了导火线，如果想教育人，那就只能和风细雨。

蒙提索里的雨伞

怎样才能进行改革，而又不至于激怒大家。马利雅·蒙提索里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孩子没完没了地啼哭，平常哄他的种种办法都失灵了。以前有一把雨伞放在孩子视野之内，这天却换了地方。这把伞一放回原处，孩子马上不哭了。哪怕他爹娘把整个屋子拆掉，再重新盖起来，孩子也会无动于衷的，只要能在同一角落里看得到他的雨伞就行。全国人民都是如此，能接受巨大的变化，只要不至于在感情上引起太大的震动就行，但是愤愤地拒绝微小的变化，因为这触动了他们的某种深情。困难的是如何在人们还没有发怒的时候，就知道哪些是我们的雨伞。

革新的经验

考虑这一计划，把时间盘算进去，尊重现状，能把这三点结合起来的，就是实验论的方式。计划应该是全面的，而改革只能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一方面要有整体观念，一方面又得逐步实行，通过一些修整式的革新，而且还要非常慎重地进行，为今后普遍推行铺平道路。先搞几个样板，然后以点带面。这种普及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试验取得成功，大家都想模仿。当嫁接的一个枝子生长出来，其它枝子也就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

实验能培养出经过考验的革新队伍，安德烈·纪德老爱这样讲：“几个人就可拯救世界。”1949年以来，在中国完成的业绩，不过出于几百人之手，是“陕西苏维埃共和国”在“延安精神”的鼓舞下，考验和造就了这批人。

斯派达尔将军说过：“国防军之所以一开头效率就那么高，就是因为凡尔赛条约只允许德国有十万人的职业军队。因此，我们就有了一支干部队伍，运用起来就象钟表一样精确。我们能一面按比例加以扩充，一面仍然使这支军队不至失去原来的纪律和特色。假使我们的军队是征募来的，恐怕早已变成乌合之众了。”谁会注意到畸形膨胀造成的悲剧。谁会注意到小规模试验的好处。谁会注意到训练有素的队伍的作用呢？这种队伍不至因为人数过多而瘫痪，相反，能够相信他们的使命，并能掌握这一使命。应该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那些仍旧处于半古老状态的地方，逐步织出一个责任网。困难就在于怎样织成并加强这个责任网，而不至于使传统的网眼消失。所谓传统的网眼名叫家庭，教会，行政机构，法律机关和军队。如果为了推动社会前进，就把斧头砍向这些机构，那就有可能眼看着目前疑虑不安的危机，转化成为全面解体，而永远没法挽回。

阿基米德夸口用杠杆和支点，就能掀起整个世界。提出几条强力思想来唤起人们的想像力，而又不勉强别人接受这些思想；给人一种国家有奔头的感觉，又不操之过急；应时而动，又不浪费光阴，始终不失去目标；既要有魄力又要有自知之明，让革新像油渍一样蔓延开来；让自由之网逐步形成，又不至毁掉权威之网；这大概就是能够掀起法兰西的杠杆。这样，法国就会全面发挥，甚至超过自己的力量。

第五十章 某些线索

假如读者真正理解了这本书，就不会指望它会在结束语中介绍什么奇迹性的改革，使我们的进步与民主事业统统稳定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性格，尤其在于群众的下意识。仅仅采取一些措施，制定一些法律，并不能改变事物的进程。三个世纪中，适得其反的作用一直作弄着立志改革的良好愿望。然而法国历史太狡诈了，根本没有天真容身之处。

因此，我在这里只想让书里的观点能够引起读者们深思，听任每个读者去下点功夫，根据自己的地位，无论是最上层，还是最下层，同时根据自己的利害处境，想出应该如何把这些观点付诸实践。然而，举几个例子，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也许并非毫无益处。请不要期待在这里能发现一座大厦，仅仅是一些建筑材料而已。

让我们首先考虑基石的问题吧！

1. 分担公共责任

是政权机构掌握着一个社会的命运。怎样去医治看得见的，也就是国家的病症呢，看来必须联系法国的行政体系是怎样管辖法国人的，这就是隐患所在之处。

国家首要的任务——无论从急迫性还是从重要性来讲——就是要从底层改革公共体制。混乱，这个词一语道破了主要毛病，这在本书里前前后后所谈的，我们已经认出了这些毛病。总统、政府、议会、行政机构，这些国家主角们所起的作用混乱不堪：代议士和公职人员分不清楚；层次混乱，国家与地方乱糟糟地混成一团；

行政任务和议会职权也是混乱不堪。

从权力分工到层次分工

为了避免这种全面的混乱，应该重新考虑权力分工，说得更精确一些，就是使宪法条文规定垂直的权力分工，变得更加有效，并加强分层横向的权力分工。而宪法条文对这种分工甚至一字未提。因为行政机关越来越多，所以仅仅把它们孤立起来是不够的。必须在执行体系本身辨明并分清层次，否则，权力分工也只是一纸空文。

让我们先制定原则，然后按照这些原则设计一种体制，保证各种建制的平衡。另外并不需要撇开一切理想再来建立这种体制。只要清理一下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大厦就行了。

维护团结的总统

因此，总统应该维护自己仲裁与受理申诉的职责，他越少介入政府事务，就越能当好总统。

只要他警惕，不要以政府首脑或是多数派领袖的面貌出现，就可以保证团结。只要他不陷入日常的政治活动中去，就能从长远的角度上讲话。他保证条约的实施，领导外交，指挥军队，注视经济和货币方面的大平衡，为各种公共权力的行使当仲裁人。最后他还得负责指定一位能赢得国民议会信任的政府首脑。因此，他也得主持政治方向的调整，以及轮流执政的问题。他只有不越俎代庖地代替政府，才能做到这点。

人们被召到总统选举箱前，并不是为了推选一个政府多数派，而是为了推选一位最有利于团结的人；他应该有能力克服我们的分歧，超越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我们就是面对面地拿这类东西来互相指责的，而他应能用一个更崇高的真理使我们联合在一起。

1962年以来，人民获得了选择最高当局的权利，这是一种极为卓有成效的动力，而问题在于弄清楚这一动力应该朝哪一方向发挥作用。它可以推动团结，这就能缓和并且逐渐治好法兰西的分裂病；但它也可以使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土崩瓦解。总统是否愿意与选举他的多数混为一体呢？并把这一多数作为总统的多数呢？这是一种致命的想法，这个多数命中注定早晚会在民意测验中或是选举中变成总统少数的！唯有议会多数的概念还符合宪法。总统不该当多数派的领袖，他的天职是成为全体法国人的总统。

政府职能应限于最主要的任务

政府越少陷于行政事务中去，就越能治理国家。不管怎么说，它不应该成为无所不管的独一无二的行政管理者。国家已经担负着足够沉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应该避免越出职守。

国家应该掌握对外关系、国防、国内国外的安全、经济政策、预算、税收、立法、司法、主要的全国性设备、无线电联络、治理国土的规划、大型公共企业、科研的优先项目……。

而其它的一切，就是说全部设备和公用事业，应该由一些被选举出来的领导负责。而今天呢？情况恰恰相反。

国民议会应起监督作用

议会不应该和执行机构混为一谈。过去有一种倾向，就是使执行机构成为议会的影子，而目前的倾向却是使议会成为执行机构的影子。前一种倾向毁掉执行机构，使之常常处于瘫痪状态；后一种倾向毁掉议会，使之长久地处于瘫痪状态。正确的道路，既不是议会的政府，也不是政府的议会，而是这两个机构应保持一定的距离。

人们可以有效地制定两条有关议会职能的规定，使议会恢复

它的全民性质，加强它的作用，却又不至于使国家失去平衡。第一条规定就是宣布议员在任期内不得同时行使任何地方行政权。凡是地方上的当选人可以兼任国民议会议员，那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分权。只要这一灾祸还在法国泛滥，就没有权力分散可言。

第二条规定就是充分重视议会起监督作用的观点。我们早把这一点丢到九霄云外了。因为议会的主要职能并不是投票“赞成”或“反对”政府，而是监督政府的活动，监督部长们负责的行政活动。

监督意味着既有权了解，又有义务打报告。有权调查行政机构，有义务向全国汇报，有发起公共辩论的优先权。

我们就是行政管理

想使行政管理民主化，仅仅监督还是不够的。第五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关键在于改变了管理机构，目前这种变化应该消除三个世纪以来的谬误。我们病态心理的根源，就在于管理人和事的行政体系的等级和中央集权观念。要想恢复元气，就必须树立权力分散与民主的思想。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口号已经被人接了过去。接班人便是那奉天承运的庞大官僚体系。而明天，法国人应该能够回答：“我们就是行政。”

就是在这儿，现实主义的想像力可以大有作为。体制革新将打乱无数习惯。因此，假如不肯从社会心理状态中，从历史中，从最近的事态发展中汲取教训，那末，改革国家结构就会流于失败。某些颇为简单的想法能使这一改革明朗化，而且这些思想并不改变 1974 年我向乔治·蓬皮杜提出的草案。

目前，已经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地方体制网，问题只在如何才能使它扎扎实实地负起责任来，如何精简这一体制网。无数管理层次不应该同时存在：乡村一级、城市一级、社区工会、乡、区、省、地

区、国家，现在再加上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的机构。这种状况错综复杂、混乱不堪。冲突也趋于激化。这么多的管理层次，实在太过分了。

除却国家而外，总共两层就足够了：一层是省，一层是县，包括乡和市在内。

正确认识现实

应该承认村镇一级仍然存在，而且大多数还是生机勃勃的集体。何必要取消它们呢？何必要它们合并呢？这不是等于把一个村或镇变成另一个村或镇里的三家村吗？然而，为什么要这些精神上的共同体担当管理的责任呢？其实，这类集体大多数并不宜于负责管理，而且它们通常是本能地厌恶这类责任。

应该承认村镇间的合作。但是，具有特殊使命或多种使命的工会、县、市——这一切都分别表明有必要找到一个比村镇更优越的管理层次，而这一层次仍应以村镇为基础。只要普遍推行这种改组，一种新的超村镇建制——县就将会出现。

正确认识省，并使它成为权力分散后行政体系的中心。这就需要使行政领导机构重新焕发朝气。目前的省议会既不真正代表居民，又不代表地方，又不代表基层的行政区。我们应该用一个具有双重代表性的机构来取而代之，这一机构既代表居民又代表地方。

尤其应使省成为一个选举出来的执行机构，对新生的代表机构负责：省政府或是“执政府”，这是真正的地方上的部，准备并且实行自己的决议。

简而言之，应遵循这么一条原则：省负责管理而国家则进行监督。国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亲自干预。然而，目前却恰恰相反，国家包办代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留点什么事让别人干。

至于地区，应该继续作为这样的范畴而存在：在这个范畴里，

制定地区性计划,进行必要的配合,以及兴办共同的事业。必须避免某一省比别的省占有突出的地位。地区如果想获得平衡并具有生命力,就只能让各省重新振作起来,与自己保持平衡。让我们尽可能搞好地区与省的合作,而不要使这两者之间产生对立。

“非官僚化”而不是“非行政管理化”

怎么会看不出这是一场和平革命呢?

首先,要进行一场公共职务的革命。因为既然要把国家的职能授予由选举产生的省、县领导人,就得使他们具备行使这一职能的手段,这不仅在财政上应该如此,在人员方面也应该如此。否则,就等于使这些当权者有职无权。

这也就是说整个行政部门都得改变作风。那些铁板一块的、独立王国式的、固步自封的“大衙门”,将被新涌现出来的、比较有朝气的行政机构所代替。这一机构会更富有生命力,因为,从这一个省到那一个省,方式方法可以适当地多种多样;一种卓有成效的多样化就会有有用武之地。这一机构会更加和谐,因为,在一个省的范围内,现有的种种隔阂将会消除。各个单位之间的交流会更加畅通无阻,也会更频繁。这一机构会更加开放,因为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就在当地,服务就会更加热心。公民们的需要和愿望对这一机构施加的压力,也会更加有效。

由于职员人数比较合理,因而在提议与决定之间,问题与答案之间,错误与处分之间,功绩与提升之间,可以少费些周折。人与人之间十分熟悉;领导平易近人,兼之受到选民们的监督,又要经受下届选举的考验,即竞争的考验。官员们从属于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人,而且很接近他们,就能克服当小领导的欲望。任何中央机关的官员或者国家的大业务机构的官员,都必须在升级以前,在外省照章工作一段时间。到底是不够呢还是过分了呢?反正目的在

于保证行政部门的“人情味”和“精简”，这是数不胜数说教式的演说所要求的或者答应要办到的。然而，说教的礼拜天一过，在这全国规模铁板一块的行政体系里，在这毫无人情味和混乱不堪的框框里，这些诺言却从未见诸行动。

由于没有打破框框，行政改革顶多做到把一张十五页的表格压缩成十二页，把胸挂铜链的执达吏换成身穿淡蓝制服的女招待。这已经好了一点，但是还不够，陈规陋习很快还会占上风的。因为，这仍然是治标而不治本。

不过请注意，打破框框并不意味着砸碎行政机构。中央集权的悲剧已经使行政体系成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弊病。实际上它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好东西。问题不在于提出什么制度把所有的官都取消，而是提出一种制度使官吏们不再自己闷死，而且不再以他们那庞大的队伍闷死我们。

应付危机的权力

就这样把公共权力下放，把大部分地方行政权交给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与负责人，让议会严格地监督中央行政机构和公共机关，使政府恢复政治职能，这样就能最终使国家元首重新起他该起的作用，即在世界面前，在法国人面前，在历史面前，把法兰西的使命担负起来，就是说监督“公共权力”，使之能够顺利行使。这里指的公共权力已经有了新的含义，并且经过比较合理的重新分配。

我要补充一句：（国家元首）应随时准备行使应付危机的权力。应付危机的权力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应该是两码事，尽管这一区别对我们来讲还是颇为陌生的。不言而喻，我们一整套臃肿庞大的行政机构，一整套等级集中制，都来源于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非常情况，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这种状况被无意识地却又非常顽固地保持下来。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需要集中

统一，畅通无阻，如臂使指。而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指挥方式毫无必要，只能起副作用。国家似乎一贯把日常工作当做一种比较松动的紧急工作。

应该澄清这种混乱，而不是把问题倒过来，就是说，在肯定平常时期权力的时候，不能否认非常时期的权力；恰恰相反，必须承认，行政精简以后，必须保持一个应付危机的行政骨干，随时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应付非常事态。

通过全民表决，通过解散议会的权力，尤其是通过宪法第十六条，国家的“应变权”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还得给地方某些应变权，不要因此而抱怨。总的说来，不过是赋予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在短时期中可以行使的一种权力，而实际上，目前国家在各个方面，时时刻刻都在行使这一权力。

“温和的体制”既能放开手脚，又不至于肢解车裂

卢梭写道：如果罗马的开国王罗木吕斯仅仅召集了一伙盗匪，一遇挫折，便作鸟兽散，那么他那未竟之功就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然而，嗣主努玛却把这帮人团结为牢不可破的一体，使江山有了磐石之固，千秋之基，通过温和的体制，把他们改造成为公民。这一体制使他们互为唇齿，人人以乡土为怀。

法兰西的制度，只有过严峻专制，或软弱无力，却从来不曾出现过温和的体制。现在使它具备这种体制，难道还不是时候吗？

从严峻向温和转化，时候已到。分配角色，这就意味着使每个演员都各司职守，各尽所能，而不是导致那种混乱状态，让人们只听见一个人的话，或者谁的话也听不见。

2. 被接受的经济制度

戴高乐激起我们向往“第三道路”，并没有把我们的想像力引

进死胡同。然而，他对我们想像力的要求，未免太过火了。

在十六世纪早期，思想紊乱，莫衷一是。统一的道路在伊拉兹马斯的践踏下，四分五裂。今天，在二十世纪末期，我们能否重新找到统一的道路呢？西方的历史已经各奔前程。包括我们法兰西祖先在内的一些人，加强了、阻隔了、堡垒化了古老的罗马大道，即农业与军事社会的道路，并禁止脱离这条轨道。而另一些人却开拓了、巩固了、铺平了曲折的自由之路，发挥了个人与集体首创精神的道路、工业探险的道路。十九世纪以来，这条小路开始蜿蜒在我们的国土上，与我们僵直的大路彼此交叉。从此，我们略带些盲目性地往前走，时而走小路，时而走大路，在哪一条路上都感到怪别扭。在每个十字路口，我们都争论不休，说穿了就是有点迷失方向。在最近十年中，这些路越来越拧到一块儿去了。小路无处不出现，改变了整个前景。工业社会、自由社会的准则渗入进来。反之，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经济上的故步自封，集体安全的优先地位，都变了质。在工业富有生机的压力下，脱胎为“社会主义”了。

第三道路无须到别处去寻觅，它就在这块地盘上。也用不着白手起家。这条路不过是在人类进程中又重新找到的统一之路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在第三道路上行进了。因为法国的现实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它尚未达到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保护主义、闭关自守、行会组织、协商办法、官僚干涉等等，资本主义的规律不断遭到歪曲。法国的现实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因为不具备社会主义毫无伸缩余地的合理性。

然而这第三道路却与正确的路背道而驰。它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毛病。应该找到这样一条路：集两者长处之大成。

社会人道主义同企业经济与市场经济很难相容，除非两者绝对地互相尊重。结合，就是结合两者的不同点。企业经济和市场

经济的原则是最合理、最富有生机的经济原则。而社会自我监督的原则又是社会生活最协调的原则。只要心中装有这两个原则，就可以奔向前程。目前，我们只能满足于树立几个里程碑。

共同参加企业管理，使企业变得可以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吧。企业的声誉不佳，是万恶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它隐藏着神秘的威势，不断被控为“剥削劳动者”；管理的方式，既专制又不公开。在这里，人们一天又一天不可避免地过着听人支配的生活。总之，企业具备一切不讨人喜欢的特性。

然而，一旦企业受到威胁，每个人都将恍然大悟，发觉自己非得起来加以保卫不可。“可不能倒闭呀！”仿佛在凡尔登决不许德军打过来……。每逢老板玩不转了，或是金融家不敢贷款，人们就对工人自治的呼吁让步。工人自治只有一种好处，就是起一种衔接作用，以等待新领导和新投资的到来。

我相信这些本能的反映是真实的，比折磨企业的意识形态更加真实。不过，与其我们先竭尽全力去搞死我们的企业，然后再表现得痛不欲生，还不如乘它们还活着的时候去爱护它们，这恐怕比较健康一些吧！

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本来应该有助于解决问题。然而从这儿却看到体制改革的局限性，和暧昧不明的地方。

如果没有责任心，如何谈得到自治呢？或者叫作共同管理罢。如果条件反射是斗争和冲突，那末共同管理又将从何谈起呢？只要人们不真心去实行，那末，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永远是一纸空文。一旦人们真想实行了，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就不再像摧毁企业的战车了，不再像焚烧工会的火球了，才会树立自己的建制。因为，真的职工参加企业管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并不只限于按企业经营最后给职工分红，尽管这种分红的办法受过许多冤屈；也不只

限于让职工了解内情,尽管迄今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当然,夸夸其谈的空谈家和冒险家有可能利用这一制度。然而它有一种既实在又简单的意义:参加企业管理,既不是把企业一把抓到手中,也不是来一个瓜分,而是共同管理,在企业中起作用。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办法,通过试验,取得成功,以点带面,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使人们接受企业,这一目标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对另一目标起着支配作用,而后一目标也同样地意义重大。要使法国人懂得,一个现代国家的繁荣进步相对地取决于一个经济部门,一个独一无二的部门,即工业部门。因而在组织经济时,必须根据工业部门的优先地位来进行考虑。

法兰西具备如此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具备如此高超的文化知识水平,具备这样广阔的空间,难道就不能有至少相当于德国的工业体系吗?

不过,还得让国家与法国人所持的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科尔伯特以来,我们就深信不疑,应该对工业进行行政监督,并负起行政责任来。然而工业在市场经济里,却只有通过首创精神、革新、竞争,才能繁荣昌盛起来。

保 护 竞 争

只有通过生机勃勃的竞争,才能使工业具有生命力。想要享受市场经济的一切积极成果,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的行政机构不大相信市场经济会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就不善于管理市场。它情愿规定价格,定百分比,定规划,而不愿意承担责任,去保障严格竞争的作用。结果是:丧失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换来了国家干涉主义的低效率。国家听任自由主义每况愈下,听任垄断和集团不断形成。因为国家以为在一个简化了

的经济世界中，更便于自己保持本来面目。其实一些简单的管理措施就能纠正这些毛病。人们最后是把些毛病和资本主义拴到一块儿了。实际上，这些毛病不过是畸形的市场经济造成的。

工业规模要合情理

想要和三个世纪以来的衙门经济背道而驰，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不过，只要我们知道怎样利用一次有利的机会，并从中得到好处，事情就会容易一些。这就是一种深切的愿望与现代技术能力互相结合。这种结合有利于工业规模合乎情理。

应该能使农村人口在离传统居民点不远的工厂中找到工作，因此要把工厂建在全国各地，建在劳动力来源附近。迄今为止，农村还是工业劳动力的来源。

这似乎是乌托邦，实际上并不然。由于交通工具的普及，双方都能省去一半路程、向对方靠拢，工厂可以迁离大城市，设在小中心区。工人也可以来这儿工作。工业网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受燃料运输的限制。集中的办法现在已经不再是技术上所必需的了。

均匀分布的工业系统将打破荒谬的社会现象。这一种现象来自工业与城市的高度集中。那些身经“农村人口外流”的人，被迫在三个方面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他们脱离原来的职业：祖祖辈辈以耕种土地、干手工业为生，现在却不得不变成工人和雇员，湮没在不具名的大公司里，埋头于零零星星的工作。第二方面，脱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住惯了农舍，现在却被抛进高楼大厦，既没有菜园也没有家禽，没有任何空地。第三方面，他们离乡背井，被迫离别青年时代的家乡景色，过着移民生活，仿佛生活在外国。分散工业化可以缓和剧烈变动，而这种变动是在脱离原来的职业时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来其它两种变动也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法兰西具备种种条件，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生机勃勃

的、而且是规模合乎情理的经济体系。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承认这样一点：想达到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玷污自己的心灵。

3. 人人负责的社会

体制要温和，为的是见成效。经济体系要合乎情理，这样才能深扎根。我们同样也需要轻松平稳的社会，为的是发扬进取心。

而我们法国社会却紧张得可怕。不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紧张气氛是人为的。能否消除这种人为的因素呢？举几个例子吧，看看能否说明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

日常生活的管理权

1945年以来，反反复复的民意测验使我们了解到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向往独门独户的小房子，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法国人向往集体住宅，而长时期以来，修建的集体住宅却占百分之八十，小楼只占百分之二十。人们也同样知道，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希望在本乡本土找到职业，可是非得把他们赶到高度集中的城市去，因而使他们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失望之感。人们把这种吃大锅饭和庞大臃肿的作风强加给他们，可是他们期望的却是一种熟悉的环境，小小的居民点、小小的队伍、小小的工厂。那些发起这类大搬家的专家治国论者，并不是出于疏忽才这么干的。他们信心十足，觉得这是在搞“现代化”。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使现代化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显然，应该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政策。事情过了二十五年，这一政策终于初露头角。这已经满不错了。如果把城市管理权从行政部门那儿收回来，交给那些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当然就会更好些。

后一代与共同的信心

法兰西快点改变态度，从此多照顾点咱们的后代吧！我们看到，这是关系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三个世纪的相对没落，都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相巧合。而在二十年左右的经济恢复与飞速进步的时期，出生率却在这同时大大增长。

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人口猛减这个问题在折磨着法国，仿佛用文火一点一点把它烤死。长时期以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泛滥成灾，开始只在生理方面，后来逐步转化成人为了。这两种现象使我们不能对面临的严重挑战掉以轻心。1964年起，白色人种出生率急剧下降，给我们以很大压力。如果象德国、荷兰、比利时（或者瑞士，在可居住的土地上）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三百人，那就可以原地踏步了。如果在欧洲最繁荣昌盛、最多样化、最富足的土地上，人口密度尚未达到每平方公里一百人，就想原地踏步，那可不行。比起那些对人口发展“持宽容态度的社会”，它的邻国和竞争对手法兰西，显然脆弱得多，它自己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提人口问题，就会触犯当今的潮流，就会冒不得人心的危险。

然而这却是不容置疑的。经济不发展，社会公道就不能够取得进步；而人口不增长，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没有足够的人口密度，年轻人的比例就不够。而法国的人口密度实在太差，需要增加两倍才行。大自然一向忌讳空白。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里，人口增长率高高低低悬殊，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在动荡时期，法国就会遭受武力侵略，这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了。在和平时期，就是招致大量的移民。目前这种和平入侵已经开始了。尽管我们偶尔反对一下种族歧视，然而迟早移民们会带来一些无法解决的同化问题。

这样的日子就会来临，非把许多小学校改成养老院不可。世界上在社会进步方面首屈一指的瑞典，已经迫于出生率下降，不得不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七十岁。今天在法国降低退休年龄，几年以后，就必然会由于缺少儿童而重新提高退休年龄。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那么社会平衡就会猛烈失调，退休金额就会悲剧性地减少，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就会失去国内市场，因而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简而言之，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不可避免地潦倒下去，就会在世界上失去自己的地位。

现在实行一种政策，大力鼓励生育，这样做只能说是太迟了。这需要进行长时期同心协力的努力，而且任何经济上的变化都不能对这未来的召唤形成障碍。仅举几个有效的措施吧。人们往往对于这样一些措施不敢问津：家庭补助、房租补助、按人口商数交付的家庭税收、母亲退休金；毫无例外地给做母亲的三年带工资的产假，至少从第三胎算起。这一切毫无疑问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在捷克，出生率下降已经露出危险趋势，采取这种措施一年之后，即从1974年，在出生率曲线图上就出现了洋洋大观的上升。

法国给每个失业者一年假期，而且保证提供一笔数目可观的工资，如果谁想缩短这段休息时间，岂不是有福不会享？当然，谈不上撤消这样的社会福利，况且，这一措施毕竟十分幸运地减轻了工人生活中朝不保夕的忧心。然而却应该看到，对于国民经济来说，这项措施却带来了值得怀疑的后果。而给母亲三年产假，这是国家无疑应付的代价，为的是赢来新的经济发展。

赫胥黎曾经说过：“给我较好的母亲，我将会给你们一个较好的世界。”女人比男人的天性更接近于自然，而她的天性就是给人间带来新生命。想撇开自然自作主张，自然一定饶不了你。没有妇女参加，不依靠妇女，人信任人的社会便没法形成。

教育切合实际

在我们的社会里，知识比面包更为重要……教育应该有助于克服对环境的不适应，这种状况是由于生活不断更新而造成的。然而，我们却居然把教学搞成一套庞大的机器，既无用处，又极靡费。与其说是一个工具，还不如说是一个包袱。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依靠经常的培养工作，总之，培养人才不得不注重实际。今天，人们挥霍大笔款子去赶时髦，然而，国民教育巨大的能量却丝毫没有施展的余地。只有学校学习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经常的培养工作发生爆炸性的发展。这种结合将是强制性的，既将震动学校学习，也将震动工作实践。正因为如此，所以新娘子仍然在圣坛脚下徘徊。

在学校的这一变迁中，应当使教育从头就在现实中深深扎下根，可是今天却使人滋长了一种不现实的心理状态。需要邀请青年学子和老师们的去体现一种地地道道的知识上、思想上和道义上的新作风。

清规戒律土崩瓦解，宗教越来越失去地盘，家长和老师放松管束，成年人过分宽容，如此等等，使年青人心中产生一种永久的彷徨之感。起因是过分的放任。“什么都可以干。”伊万·卡拉马佐夫绝望地说。年轻人，也包括老师们，大家期待着人们能帮助他们正视经济和社会现实。几乎所有人对此都一无所知。是时候了，应该在压制教育法与放任教育法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即建立在信任感和责任心基础上的教育方式。这一方式并不排除恰到好处的压力，要求学生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学生也肯接受这一要求。“幸福学校”并不意味着满足孩子们的眼前快乐；再说，人们一动不动就能自由发展吗？恰恰相反，要使个性从萌芽时期就茁壮成长，还有赖于个性的本身：使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爱好奋

斗。既然我们缺少足够的年青人，至少让我们现有的年青一代乐于并且能够管理当今的世界。

“人人负责的计划”

怎样才能使社会有人情味，消除对当今世界的恐惧呢？怎样才能赋予心理和精神上的能力，去克服这种恐惧呢？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仅仅要医治对现代生活的反感。从这本书中，自始至终到处都可以看出社会分裂的痕迹，把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阶级倒不多，更多的是集团、意识形态、封建王国。我们的社会疑心重重，焦虑不安，彼此作对，咄咄逼人，苛刻求全，也就是说，在制造分裂。这也是必须医治的社会病症。

演员数不胜数：这可以成为多中心社会的定义，而法国人就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的社会。

官僚行政，庞大的城市，垄断资本，“大工会”，如此等等，好像在法国组织这一切的目的就在于使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只能由少数几个巨头来讨论。巨头强大到这种程度，结果是互相牵制，力量彼此抵消，生命趋于僵化。

在公共事业管理机构中，要大量增加在公民监督下行动的领导人；在经济机构中，要大量增加“事业家”、富有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大量增加能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路来的人和组织。这难道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人人负责的计划”的三个支柱吗？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计划中，法国人才能够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但是，法国人不改造自己，就办不到。

4. 心理革命

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信任气氛，总是感到别别扭扭，挺不舒

服,因此就梦想彻底改变面貌,甚至来个脱胎换骨式的化学反应。因为我们的社会对社会化学并不入门,所以就以为一次化学反应会引起奇迹般的变化。期待着它的浮士德把下等金属点为纯金。

就是这种不现实的希望,这种与一个病态机构格格不入的幻想,再一次给革命造成新的机会。在法国,人们把革命称为一种长时间的集体抽搐,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改造、丰富了人民的语汇和想像力,然而归根结蒂却使国家处境更加紧张、更加集中、更加分裂,对自己越发不满。

唯一数得上的革命,只有精神革命;法国人正是需要这种心理革命,这本书想要建议的,也正是这种革命,也希望为这次革命做些准备工作。一次这样的革命能使我们避免无数次动荡。

而且心理革命可以和缓地进行,不至于造成震波,荡开去,又反冲回来。至于从哪个角度,以多大强度反冲回来,任何人都永远无法预料。只有依靠每个人的自觉,改变精神面貌,心理革命才会逐步前进。这一革命不知不觉地,几乎是不声不响地往前迈步。并不像外部革命那样以希望为其支柱,而是作为希望的支柱,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心中完成这场革命。

我们所提出的革命并不违背现代社会的现实。它只触及到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保留下来老古董的心理。现实意味着竞争,而我们的心理却留恋不舍安于现状的思想。现实意味着变更、革新,而我们的思想却习惯于一成不变。现实是相对的,在一定情况下妥协,而我们却仍旧坚持绝对化和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现实导致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既不存在密不透风的门户宗派,也不存在强加于人的一刀切。而我们的心理呢,却继续把划分阶级的想法和无阶级社会的幻想结合在一起。现实意味着权力和责任的自由互相结合,而我们的心理呢,不是想望大权独揽,就是想望无拘无束的自由。

只有打败这两种加剧分裂的体系，才能打败非善即恶的极端主义。

前一种方式，把我们政治民主生活禁锢在打内战的思想里面。唯其如此，所以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法国人永远投共产党的票。反过来，又产生一种纠缠不休的反共思潮。特别是，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党，颇有市场，尽管经过层层牢固的传送带加以削弱，但是仍能阻碍一个井井有条、和平轮换的制度，使之无法建立。

然而一个机会，一个非常微小的机会毕竟出现了。自从共产党与社会党建立了同盟，堡垒就开始现出了裂缝。似乎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这就迫使正统观念不得不变得灵活一些。法共尽管充斥着罗马教会式的正统观念，却开始改换面貌、适应新形势了，而不至于在内部解体。然而，意外的变故却依然在所难免。无疑，一场赛跑已经开始：如果左派能很快取得政权，而法共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改变，那么就会经历一场新的革命，“法兰西病”将导致一次新的危机。如果政权到不了手，法共就很有可能分化。元老们把自己禁锢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中，其余的人将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相结合。

还将有第二个微小的机会，以配合第一个机会，这就是指社会主义从这双重的纠缠里摆脱出来之后，也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那样的话，就得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经济进步将在法国为社会进步做好准备，而不是在经济一片混乱之中幻想社会进步。

限制工会唱高调，比赛加码

法共的衰落或者说变得温和，消除了政治生活过激的最厉害的因素。剩下的一种使社会生活过激的因素，那便是工会唱高调，比赛加码。

我明确地说，是唱高调，比赛加码，而不说政治化。因为政治化不过是唱高调比赛加码造成的后果。说什么政治化不能令人接受，这等于放空炮。解决劳动组织的竞争问题，解决工会代表们的分裂问题，解决本来是分裂分子，却又垄断着工会的代表权的问题，这才是抓住了现实问题。

谁讲民主，谁就是讲多元化。我必然会听到别人这样来批评我。统一的工会，就是极权主义，不是斯大林，就是墨索里尼。不错，不过也可以说，不是瑞典，就是西德。

应该把眼光放远些，不要只看到这些自相矛盾的例子，应该开创这样的制度，给我们多元化的传统以必要的重视，同时避免让工会老唱高调，比赛加码。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为什么还不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劳动者的制度呢？在这种制度下，目前的工会，恰恰与各党派在代表公民的制度中起同样的作用。工会“参加体现民意的表决”，正如宪法所指出的那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取而代之。政府并不与各党派协商，而是直接找议会。在一个城市里，只存在着一个市议会，哪怕这个议会是从几个不同的名单选举出来的。与此相似，必须在每个企业内部，进行有关工资与劳动条件的协商，并达成协议；不是与工会本身去协商，而是与工人们选举出来的代表去协商。大不了，不同的工会会各自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真正的竞选中，各自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改革会使工会成长起来，结束封建时代，跨入民主时代。不同倾向可能依然存在。然而因为不得不“代表整体”，不得不形成“代表大多数”，这种分歧是会缓和下来的。社会运动随着责任进一步扩大，也会真正强大起来。但是最令人望而却步的，恰恰就是责任……

社会公正，进步之本

我并不自诩，只要进行这类改革，团结精神就会在我们这个社

会占统治地位，就会消除这个社会内的猜忌气氛。这种改革只能打开两把大锁。想使我们社会变为相互赞许的社会，还需要社会本身起深刻变化，以主持公正为己任。

还需要什么“了不起的规划”吗？我谈这个问题，不过是为了引起双重警惕。一是引起这类人的警惕，他们把进步的作用与社会公正的作用混为一谈，认为发展经济是必要的，却肯定不足以加强这种认识，即法兰西是一个共同体，在那里博爱与平等的法则日益发展。1968年5月风暴中曾经有这么一个口号：“人们不会为经济增长率害相思病的。”如果要揭示这一口号的错误，就应该使经济增长不再以角逐权势为目标，而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

二是唤起另一类人的警惕。这些人非常愿意把“社会的”这个形容词，贴在“公正”这个名词上面。因为公正或者不公正是一种个人感情，而不是什么集体感情。不见得整个社会都拉平了，人们就承认这个社会更公平了。每个人都有权有自己的公正，即承认各人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奖励各人所付出的努力。

连根拔除不平等，就会担风险，有可能使社会成为不毛之地。然而相反，减轻残留的贫困，压制泛滥成灾的特权，倒是一个摸得清底细、可以仔细掂量的目标，并且足以消除个人的不公正处境。

只有通过人人负责，奖励劳动，奖励个人的、家庭的和集体的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公正”。

公正的社会就是人人负责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主角们都是自由的，而且大家都是主角。

结 合 现 实

全书表明，精神塑造现实。在十六世纪，人的思想里充满教条主义和专制的大道理。这种精神居然使现实变得畸形了。而在十九世纪，从国外吹回来的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风气，重新为我们

从思想上摆正了现实。

第三次战斗的号角又吹响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一个开明的、生机勃勃的、充满首创精神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正成为现实，并在法国逐步发展。

尽管我们的传统心理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今天却可以感觉到，这种心理正在分崩离析，节节败退，凋零萎谢。

可怕的是，这种传统心理的消逝，会起一种反作用，把什么都一扫而光。社会将衰落下去，因为今天的现实瓦解了自古以来权威的基石。到底谁能先占上风呢？是这样一种充满幻想的意识形态吗？为了不触及我们的传统心理而使生活窒息呢？还是一次精神上的转化，使生活生机勃勃，使我们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中生活呢？

“用不着为了烤猪而点燃一座房子。”英国有这样的一句谚语。在我看来，为了改变生活，我在本书中所划出的改革之路，远比推翻一个制度和推翻整个社会，来得有效得多。

为什么定要遵从古老的遗风，非打内战不可呢？长时间以来，两个法兰西就这样完全人为地处于对立状态。时机已经到了，应该克服这种敌对情绪了。盖拉司的经历证明，这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在上阿尔卑斯山偏僻的山谷中，人们看到，从十六世纪以来，基督教和天主教一直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光景。可是，他们却完成了心理革命。1960年前后，瓦尔司的天主教士和新教牧师都怀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摆脱这种地狱般的桎梏。结果机会来了，因为要修建一个新的礼拜堂。如果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势不两立，那么谁也没有力量去修建一座天主教堂，再修建一座基督教的礼拜堂。于是乎他们就联合起来，修建了一座共同建筑。在那儿，你们甚至可以看到一座古老的木雕镀金圣母像。这是新教牧师要求天主教教士搬运到那儿的。

今天,在两个教派之间,人们一起聊天,年轻人也可以通婚。

本书试图探索,心理状态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在很长时间中,法国的社会僵化麻木了。而今天呢,成了受到威胁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肯大家一道相信与我们时代相适应的是非准则,如果我们不对目前发生的事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能够避免这些悬在我们头上的危险吗?

要想发展就必须树立信心。对什么有信心呢?本书自始至终提供了我自己的答案。这就是对自己树立信心。相信我们能够自力更生,承担责任,能值得别人信赖。

如果我们自己不首先恢复信心,我们有什么权力,有什么心情要求国家信任我们呢?信心的交流,三个世纪以来,已经中断,如果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又能在哪儿重新建立起信心呢?

人们大概会感到纳闷,一页一页书中,我所描绘的法兰西和法兰西人,形象都是阴暗的,然而在这儿却做出了充满希望的结论。不过,不管猜忌的制度使我们怎样地习惯成了自然,信任的制度总能解开疙瘩,使我们与目前那些最优秀的人显得不相上下:既灵活、又敏锐、又顽强。只要法国人面对挑战,准备应战,并让他们对这场挑战负起责任来,那么他们就能解决问题,解决得同任何人一样好,甚至有时候谁也比不上他们高明。

我们应该从今天起对信任永远树立起信心,并使信任成为组织社会的原则。

魔 笛 师

在莱茵河畔的古老城镇巴扎拉赤,鼠祸泛滥成灾。魔笛师汉斯把耗子从那儿的每个地窖、每个谷仓、每个臭气熏人的窟窿里引出来。神奇的曲子把这帮乱糟糟的小动物带到河边,马上就被河水吞没了。

回到城里，汉斯看到城市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昨天，他和吓得魂飞魄散的市长、副市长们商定了一笔价钱。而今天呢，城市得救了，他们就不肯清付遭灾时欠下的债了。

汉斯一声不吭，重新拿起魔笛，吹起一曲古怪的小调。于是乎城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刚会走路的到已经会跳舞的，再加上姐姐们抱在怀里的婴儿，都离开了街道、住房和学校，跟着这个曲子跑。跨过原野，穿过森林，汉斯把他们带进深山老林里，从此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这个莱茵河古老的传说，散发着远古时期人民的智慧，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在这里看到法兰西的象征，描绘法兰西的象征。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古时候。上千年来，在所有教堂的拱顶下，人们接连不断地乞祷：“上帝啊！把我们从鼠疫、饥饿和战争中解救出来吧！”多少世纪中，贫困和死亡蹂躏着我们的人民，就象蹂躏全人类一样。在独一无二的祥光瑞气笼罩下，我们累死累活仅仅只是为了活下去。

后来，命运之手解救了我们。来自他方的魔法使我们摆脱了过去的苦难，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呢。这并不靠什么魔笛的曲子，而是多亏了一曲震耳欲聋的交响乐。组成这支雄壮的曲子的是：蒸汽机呼哧呼哧、马达轰隆轰隆，电报嘀嘀嗒嗒，卷筒机叽里哇啦，计算机低吟细语，以至遥远的原子弹爆炸声——这是和平的可怕保障。这并不是按照我们设计、希望实行的计划而进行，而是根据人类能力无法预见、无法捉摸的支配力量。当我们停止闭关自守，这一支配力量就以全力在我们之中蓬勃发展起来。强大的历史长河吞没了穷困，旧势力，僵化，多方面的落后，无数不合理的作法，或者不合时宜的机构，以至战争的幽灵。这一切曾经占据了我們日常生活的画面。然而，这条河并不发源于我们。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没能理解自己获得解放的意义所在。我

们从来就没学会把民主与稳定结合起来，而是从极权制度走向摇摇欲坠的制度。我们对康复是这样的毫无信心，以至于那种自暴自弃的民族精神越来越占上风了。于是有一个人以最难以预料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既有民主又有稳定的制度，而且还为我们带来了独立。从此，我们就无需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显得咄咄逼人了。然而这一切好处并不真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落在我们头上，是出于偶然，靠一个人与特殊环境的结合。这些恩赐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与我们传统和民族心理状况相矛盾的，我们是不是能把它们保留下来呢？

·我们能不能保住我们的儿女呢？看啊，绝望、厌世、空虚的情绪在向他们频频招手，而且已经吞噬着他们的心灵。再蜷缩起来把他们交给命运摆布，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面临着死神的威胁，而一个儿童的死亡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

在漫长的历史中，法国大概从未象现在那样有理由希望和有理由担心。有理由希望，因为空前的良机汇集于我们身上：稳定而持久的政权，不仅有能力安排未来，而且能把长远计划摆在短期计划之上；充满希望的生产能力，较高的文化水平，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前景与自主自决的权力。有理由担忧，因为危机日益明显，紧张气氛加剧，社会冲突，外省反抗，青年人遗弃我们为他们安排的世界，远走高飞，马尔萨斯人口论复活，出生率下降，人口衰落。过去显而易见的病症消失了，然而隐疾却出现了，而且远未痊愈。

今天，历史的精灵在询问我们，恰似当初汉斯询问巴扎拉赤的市民们一般：“你们是不是准备付出代价？”就象他们一样，我们也想回答说：“既然事情的进展已经使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了，又何必再去还那笔倒霉债呢？”

这些市民们不明白，付出代价就意味着抓住时机，让它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自觉的小小牺牲扎下深根，从而避免一场难以避免的

大牺牲。我们是否比古人明智一些呢？我们具备掌握时机的能力吗？或者是不是就听任种种威胁劈头盖脸地压下来，并且失去我们的年青一代呢？

付出什么代价才行呢？全书做了回答：责任心和自制的代价。不是听之任之，而是有决心接受挑战。也不是懒散，而是努力。要尊重个人与集体的法则，要顽强地寻求新的平衡，要下决心消除过去的争执，乌托邦式的呓语和仇恨；要为新问题设想新的解决方案。这对我们来讲是十分艰巨的代价。因为我们的传统使我们习惯于苟安，苟安则乱；习惯于自私，自私则争。而我们却没有自觉遵守纪律、享受自由的传统。

历史可以把我们从外部的贫困、经济停滞、制度弊病之中解救出来，这是已经完成的事业。但是却不能使我们摆脱内部疾病，这就轮到我们自己动手了。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

还能来得及吗？我们已经拒绝过还帐，而且我们的后代已经开始不知不觉的从我们指缝中溜走，仿佛是那些巴扎拉赤城的孩子们。

我们已经吃过苦头，如果我们交了好运，居然受之无愧，那么好运就会化为灾难。当然，这并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只不过是老人膝下无儿，感到厌倦与伤感。但是，这也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当集体组织无法再赢得人们的信任，还能逃脱崩溃的命运吗？

很有可能，汉斯是个残忍的魔术师，历史大概也捉弄了我们。为了使我们学会奋斗，不该一开始就让我们品尝果实，而这些果实是在他人培植下成熟的。只有危险才能使我们振奋：抗敌运动和它那姗姗来迟的蓓蕾——六十年代的复兴，难道不正是从我们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中诞生的吗？如果说我一再强调了危险正徘徊在我们身旁——不是解体就是崩溃——这并不是出于杞人忧天，而是企图引起警惕，唤起求生的本能。

今天,只有想像一下灾难才能唤醒我们。如果在许多人眼里,我所描绘的法兰西面貌,看起来更象来源于一个残酷的神话,而不是什么现实,那么我希望这个神话深深地触动大家,使他们学会在自己心里根除这个传说复活的一切可能。

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巴扎拉赤的市民们了,不再听历史摆布,不再自我毁灭。他们已经变成了成熟的人,知道从自己身上汲取力量,既懂得战胜灾难,又懂得给年青的一代以生活的乐趣,使他们不再逃走。

附 录

I “繁荣指数^①”

按人口平均国民总产值，取 1973 及 1975 两年。1973 年是世界经济危机最后一年。1975 年则是写书时能得到最新材料的一年。产值以美元计算。表列二十五个国家，是 1975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人口超过二百五十万*。为首二十个国家里，十七国是“社会学上的犹太—耶稣教”国家(参考本书 339 页)。三个是天主教国家：比利时，法国，奥地利。

国 名 (次序照 1975)	1973 年			1975 年		
	人 口 (以百万为 单位)	国民总产值 (人口平均)	次 序 (按产值)	人 口 (以百万为 单位)	国民总产值 (人口平均)	次 序 (按产值)
瑞 士	6,430	7,060	1	6,400	8,050	1
瑞 典	8,140	6,360	2	8,200	7,880	2
美 国	210,400	6,230	3	213,610	7,060	3
丹 麦	5,020	5,870	4	5,060	6,920	4
加拿大	22,130	5,580	6	22,830	6,650	5
联邦德国	61,970	5,690	5	61,830	6,610	6
挪 威	3,960	5,190	7	4,010	6,540	7
南 非**	4,376	4,940	9	4,585	6,160	8
比利时	9,740	4,990	8	9,800	6,070	9

* 按照这样列表的标准，卢森堡便没有列进去。不然，按人口平均 6,050 美元，该列第十位，冰岛按人口平均 5,620 美元，该列第十三位。另外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利比亚，都没有列进表里，因为那里的石油资源掩盖了生产不发达。

** 南非的有关数字，只适用于白种人，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白种居民平均收入，是根据黑人区和白人区收入的分配情况估计的。

续表

国 名 (次序照 1975)	1973 年			1975 年		
	人 口 (以百万为 单位)	国民总产值 (人口平均)	次 序 (按产值)	人 口 (以百万为 单位)	国民总产值 (人口平均)	次 序 (按产值)
法 国	52,130	4,810	10	52,910	5,760	10
澳大利亚	13,130	4,650	12	13,500	5,640	11
荷 兰	13,440	4,670	11	13,650	5,590	12
芬 兰	4,670	4,120	13	4,710	5,100	13
奥地利	7,530	3,900	15	7,520	4,720	14
新西兰	2,960	3,980	14	3,090	4,680	15
日 本	108,350	3,800	16	110,950	4,460	16
东 德	16,980	3,210	18	16,850	4,230	17
英 国	55,930	3,270	17	55,960	3,840	18
捷 克	14,572	2,980	20	14,820	3,710	19
以色列	3,251	3,080	19	3,469	3,580	20
沙特阿拉伯*	7,745	2,070	25	8,296	3,010	21
意大利	54,910	2,520	21	55,810	2,940	22
波 兰	33,360	2,160	23	34,020	2,910	23
西班牙	34,740	2,170	22	35,358	2,700	24
苏 联	249,750	2,110	24	254,380	2,620	25

II 诺贝尔奖金指数表^②

	国 名	诺贝尔科学奖 获奖人数	人 口 1901—1960	诺贝尔指数。百万 居民中获奖人数
1	瑞 士	11	4.2	2.62
2	丹 麦	5	3.5	1.43
3	奥 地 利	8	6.7	1.19
4	荷 兰	9	7.8	1.19
5	瑞 典	7	6.2	1.13
6	英 国	41	44.7	0.91

* 其他阿拉伯国家情况相似。

续表

	国 名	诺贝尔科学奖 获奖人数	人 口 1901—1960	诺贝尔指数。百万 居民中获奖人数
7	德 国	45	63.8	0.71
8	美 国	52	125.4	0.41
9	法 国	17	42.6	0.40
10	芬 兰	1	3.5	0.29
11	比 利 时	2	7.8	0.26
12	匈 牙 利	2	8.6	0.23
13	葡 萄 牙	1	17.1	0.14
14	意 大 利	4	40.8	0.10
15	阿 根 廷	1	133.4	0.08
16	捷 克	1	14.7	0.07
17	西 班 牙	1	24.1	0.04
18	俄 国	7	156.1	0.03
19	日 本	1	69.2	0.01
20	印 度	1	350.0	0.002

列这张表的办法是：只列实验科学奖，如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文学、数学、和平奖不在其内。然后把获奖人数与以百万为单位的的人口相比较。人口的数字则为1901年到1960年的平均数字。

从1961年到1976年，诺贝尔奖金的颁发情况，和本表所列大致未变。为首的十二个国家里面，九国是“社会学”上的“犹太—耶稣教”国家。只有三个是天主教国家。而直到1933年，奥地利指数之高，是因为那里的犹太科学家比重很大。

III 煤 灰 子

普罗文的作家安德烈·苏瓦尔奈在1932年写了一部地方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小说，名叫《大骗局》。他在书里描绘了当时煤灰子的情況，使得我们可以看出，1932年的情况，跟本书第二十四章

所谈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让·勒努瓦尔在1939年曾经打算用这本小说拍一部影片。计划由于战争来临而没能实现。下面摘录两段，很说明问题^⑧。第一段是书中两位主要人物到达矿区：

“罗曼和克里蒙梭重新找到那辆臭熏熏的破车，钻进那黑洞洞的老矿。克里蒙梭说：‘真是一门鬼行业。煤矿工人还受到法律的保护，咱们呢，一个屁！理由是除了咱们这儿，煤灰子都在露天操作，因此就算不上矿工。’罗曼那种油腻腻的咳嗽声音，还在地底下呼啦呼啦的响。下面深达三十公尺，闷得没法呼吸。”

第二段是：这两个矿工压死在一口废弃的矿井里。

“一股子呛死人的热气，钻进罗曼的嗓子眼。腐烂的矿木发散着毒气。罗曼在黑洞里闻出了尸臭般的土气。

他想逃走。他边滚，边摔交，浑身淌着泥浆。惊慌使他失掉理智，只知道一面打着哆嗦，一面快逃……他腰酸背痛，上气不接下气，到处抽筋，再也无法动弹，只好在泥浆里蹲下来，甘心等死。

灰炭矿里出过的惨剧，像电影似的在他脑子里掠过。慢慢的闷死；煤气爆炸；水淹没顶；给柱子倒下来压死；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死；一吨重的滑车脱了缰，猛撞过来。克里蒙梭则在水里作垂死的挣扎。最后是罗曼他自己，在黑洞里扭着矿壁慢慢地，慢慢地压下来。

大块大块的矿壁，慢慢移动，眼看把他埋葬起来。一声声矿木的崩裂声，在他火烫的脑袋里敲起一声声的丧钟。身子周围的水逐渐逐渐让他的心房停止跳动。那就完了，完了。

‘……泥炭……泥炭矿……吃这行饭的不是人……不杀了老子、娘，不会来吃这行饭……’

罗曼浑身哆嗦。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IV 地 下 水

摘录 1969 年 11 月维贝尔工程师提出的报告。维贝尔工程师是巴黎市供水局名誉局长。他在报告里写道：“不同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受到审查。必要的比较对证也没有做。而这一项工程设计却是值得深思熟虑的，因为工程庞大，造价高昂，牵涉到的利害关系又那末样的众多和复杂，和地方经济的关系互为因果，甚至如国民经济也起相互影响。

巴黎和郊区，有的是水，市民喝用有余。治理有关的供水系统，应该考虑这一地段或那一地段供水可能发生的困难，以及补救的办法。过去好多年已经筹备好一些小型工程，足使供水越发充裕。这些小工程一一实现，花费不多，却能起可观的补充作用。某些双套工程可以花钱不多而大大提高供水量。

最后，蒙德罗的引水工程，看来是没有经过认真研究的，没有经过原则性的根本讨论。而这却是采取坚定立场以前，必不可少的。引水到底引什么样的水？地下水呢？还是地面水？由于这种情况，问题的经济方面便没有澄清。而经济方面却是问题的基本。人们受到了传统诱惑。这种传统曾经盛极一时，但是，从客观来讲，现在已经过时。过去有那末一个时期，城市爱建渡槽引水。有时渡槽造得很长。这种工程往往包含庞大的建筑，如加尔大桥。离咱们这儿不远，就有好些巴黎市的大渡槽……但这已是历史陈迹。现在再兴建渡槽，只有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才行，比方说，为洛杉矶和圣地亚哥供水的‘大渡槽’。在其他情况下，好比那蒙德罗的工程，问题在于到离用水城市很远的地方去引水，引的水又是地下水，不过与河流并行，而且这条河一直流过用水的城市，那末干吗不用河流的水，偏要用管道去引地下水呢？正确的结论怎样下呢？自从各种学科和各种技术大大迈进，处理地面水使之

可供饮用的办法有了改进，提供的水在质量上便可以完全合格。不管从什么观点上，或者从什么立场上去看，都可以在非常优越的条件下，保证居民用水足够安全。

……有人表示反对，说是蒙德罗引来的水是天然纯净的，仿佛有什么两种不同的纯净似的。经过缓慢的自然过滤，净化了的水，一般还难免有些漏洞。这和便于控制、快速过滤的净化水，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不一样呢？

怀念过去某种‘甜蜜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毕竟不能够只要气球，而不要超音速的巨型远航机嘛。这不过是个比喻。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技艺嘛。

人类能够得出自然演变所得不出来的成果。比方说化学罢，自然界提供原始的，或者混合的产品，人类从而提取其精华，经过化学配方，制成药剂，人们并不在它的纯洁性上进行争辩，病人服药也很有信心。为什么把地面水这个原材料，经过净化处理生产出来的饮水便不一样呢？现在，这种净化处理成效显著，并为群众所喜爱（如在舒瓦齐·勒鲁瓦，在梅利·徐尔·瓦士，在奥尔利等地）。

饮水的纯度需要符合于某些不同的准则：有机的，物理化学的，细菌的，病毒的。这都是公共卫生法规，埃尔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了的。在此以外，不过是一些苛求讲究，益处可疑。而且锦上添花，徒增花费。传统往往会深闭固拒，引起僵化，这是一码事。进步却另是一码事。

……天然净水是‘脆弱’的，需要保护。运往消费中心的时候，需要保护。分配到户的时候，也需要保护。比方说，需要用氯化剂消毒。这样一来，尽管开头算是纯净的水，经过保护也就失却了‘童贞’。我国，甚至世界各地，由引水工程提供的水，尤其是给巴黎提供的水，都贴不上‘天然’纯净这条标签。不仅在运输过程中

要采取保护措施，尤其要经过真正的消毒处理。这种消毒剂的分量，同现代过滤站用的根本不相上下。”

* * *

节录 1970 年 5 月关于蒙德罗计划影响农业经济报告书。报告人为国立农学院教授、农业工程局总工程师卡尔列，和农业工程局工程师比努瓦。

“植物吸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吸取泥土颗粒缝中的毛细泉线，一种是泥土颗粒缝中的水蒸气。吸水量恰够植物的生存，而不至于枯萎。泥土颗粒之间的毛细管作用，相当粗糙，植物吸水一般只能深达一米半。白杨树，尤其是杨树苗，需要离地面较浅的水。

……现有的井和钻井工程，为孤立的居民点抽水，供水，如果要继续供水，势必需要加深。

……杨树林带离河流较远，容易失水而补救困难。地下水深度不到一米五的地方，引水工程会破坏农作物的供水。必须兴建灌溉系统，以资补救。

……人们担心规划中的引水工程，会降低地下水位，同时降低旧赛纳河某些闸段里的流量，影响养鱼和流域的治理……计划中的工程会多多少少影响当地社会经济平衡各种必要的因素。蒙德罗引水工程计划，必然会搞乱当地的农业经济。”

* * *

节录 1971 年 3 月的调查报告。报告人为科技大学水文学教授阿尔努尔。

“净水可供食用，但非蒸馏水。其正式定义十分明确，就是‘无菌的’水：没有大肠杆菌，链锁状球菌，硫酸沉淀。这是公共卫生部 1962 年 3 月 15 日通令所明文规定。适用于饮水和食用水。（见 1962 年 3 月 27 日公报第一部，第一章、第三条。）

为居民提供的水，不仅需要无菌，而且是饮水。上文所提到的

通令，正式规定了饮水的物理特点：温度低于摄氏十五度；没有任何气味和怪味道；一公升水里面，化学成分不得超过两克；不含细菌（上文已经指出）。

根据上面一些不容争辩的正式定义，所谓‘天然净水’，就是经过自然灭菌程序，不管这种程序是在地下进行的，或是在地面进行的。可见‘天然净水’的定义，不一定符合于饮水的定义。至于说地下水一定就是净水，或‘天然净水’，那是不行的。反过来说净水或‘天然净水’，一定就是地下水，那同样也是不行的。许多地下水是热的，或者矿质太多，或者有咸味。那就不能算食用水。……

计划只作一般的肯定，不作经济上的估计。然而，这却是讨论要点，因为，假若地下水的成本并不高于地面水，那当然该用地下水。可是，蒙德罗的水比地面水贵出五到十倍。”

* * *

节录大陆水文和水学教授赛尔·沙尔杰于1977年3月4日提出的研究报告。

“赛纳河流域的水，不管是地面的，或是地下的，都非得在到达的地点，多少加以处理不可。那怕沙壤已经不在开采，也非得加以处理。因为处理是必要的，而且处理的方法日新月异，而引用天然的地面水，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省掉昂贵而无谓的管道运输，看来是合理的。

当前的经济倾向，要求利用最近的资源。尤其因为水的管理，意味着同时管理水的数量和质量，以适应其用途。我认为，从科学来讲，为了给巴黎地区供水而到远处去引水，实在是经济上不合时宜和荒谬的行为。”



资料和参考注解

书名页

- ① 见“诗、民谣、哀歌、短曲集”。路易·密索出版,1909年,68—69页。

题词页

① 从十三到十六世纪,人们在意大利把拥护教皇的人叫做盖尔夫,把拥护皇帝的人叫做吉布林。双方斗争,不共戴天。在同一个城市里,前者拥护民主,后者拥护贵族统治。这种斗争里面,还夹杂着地方性的争执。比萨拥护吉布林派,只因为佛罗伦萨拥护盖尔夫。前有伊拉兹马斯,后有蒙代涅,他俩都采用了这样一句格言:为了追求高超的真理而反对唯善恶论的宗派主义,难免腹背受敌。他俩并不讳言这种危险性。

副页

① 四行诗,杂诗集,十三,出版局,加尔涅,1970,152页。原文里“我是弗朗索瓦,这叫我恼火”。弗朗索瓦可能是维隆的名字。但是看看上下文,维隆“自称生来便是法兰西人。法兰西指法兰西岛”,就是巴黎的所在地。(大维·孔,维隆诗意,1967,第十三页。)
“这叫我恼火”是一句俗话。

② 亨利四世在巴黎议会演说词。旨在强使议会通过南特谕旨。

③ “老鼠和象”寓言,八,十五。

④ 1859年原文,1868重载人《当代问题集》。

⑤ 《居权力之乡》,1913。首句书于1913年5月18日(82页)。次句书于5月24日(115页)。

⑥ 《自由,有什么用?》

⑦ 1954年6月26日,巴黎伯爵政治志,题为“法兰西病”。

⑧ 1966年9月10日告本书作者。见第六章,第163页。

序言

① 《览当世》,1945,39页。

② 见沙尔多奈,《工业地理》,1962。

③ 这种现象在开支后,工场上屡见不鲜。

④ 德国人类学家库尔特·恩克尔,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尼蒙达珠。这是巴西中部一个叫做遮的部落土人名字。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对于文明的相对性做了启发分析,书名《人种和历史》。他在书里引用了这个例子。参考“悲惨的回归线”284和485页。

⑤ 《智虑七柱》433页。

⑥ 克罗齐埃,佛姆斯和格雷米翁的著作,突出了这些作用。

第一部 引言

① 1976年8月23日《快报》社论。

② 欧洲一台,1976年8月25日,关于上述社论,雅克·德劳尔答伊方·勒费问。

第二章

① 《居权力之乡》,1913,82页。

② 1940年6月18日演说词。

③ 同上。

④ 保尔·斯代林将军证词,1964,268页。

⑤ 《军人到最后一天》,1956。

⑥ 《德国将军追述:回忆录》。主要参考556,557页。《第二次世界战史》,1973。

⑦ “1940年5、6月以前法国飞机生产”,重要文章,载于《第二次世界战史杂志》,1969年,73期特刊。

⑧ 主要见《法兰西战役》(福克斯上校,多尔那诺航空队长:“阿尔登纳突破记”,77到119页;勒·戈斯代尔中校著《空军作战》,135到149页;佛基埃少校著《装甲部队作战——法军战车的使用》,1953,150至162页。

《法军歼击机1918—1940》,作者居尼和达奈尔(主要参考179页,190—192页)。

《空军杂志》119期,1956年10月。艾迪·波尔著《论1940年5、6月空战》,696—700页。1963年12月198号,约翰·麦克·海特著《谈判由美国提供飞机》。

“法国购买美国飞机”,约翰·麦克·海特《第二次世界战史杂志》,1965年4月号,第一页开始。“法兰西战役中英国空军的活动”,作者卡米叶·勃罗,《法国空军杂志》,1954年12月号953页。

⑨ “古怪的挫败”,1940年7、8、9三月记,1945年发表。

⑩ “失败日记”,1976。让我们指出,维勒吕姆在他的灾难纪事中,攻击戴高乐,攻击他的思想和人身,发泄仇恨。

⑪ 谢里和阿利亚的证词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参阅马克思·吉莱将军的文章:“从

上面看阿尔登的突破”，见《伊卡尔》第 57 期，1971。亨利·阿利亚上校文章“三十三师二团目睹德国人突破穆斯河”(同上)。雷纳·桑布将军著作《空军史》。

⑫ 参阅《法国空军杂志》第 57 期。《法兰西战役》第 3 卷：“轰炸”，“侦察”第 75 页。

⑬ “法兰西恶运”或“红与白”，罗恩，1952。

⑭ 参阅克罗泽的《封闭的社会》，引言。

第四章

① “苏维埃计划化”，1945。

② 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1956 年 10 月 20 日，“法兰西文献”。

③ 乔治·塞盖伊声明，根据波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论坛》，1970 年 9 月 27 日。

④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弗朗斯齐克·施拉西克声明，参阅乔·蒙德“波兰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见《东方杂志》(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三期(1974)，第 19—44 页。S. 基西辽斯基，《明镜》周刊，1976 年 3 月 8 日，118—119 页。F. 施拉西克的话从 1976 年修改宪法中得到证实，当时教会和四万名波兰人提出了书面抗议。

⑤ 波兰诗人阿当·瓦齐克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希望是无用的，这是 1955 年 7 月，他所写的“为成年人而作的诗”很快就出了名(《新时代》，1957 年 2—3 月号，第 1069—1081 页)

第五章

① “被锁住的鸭子”，1953 年 5 月 27 日。

②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54 年 8 月 31 日，第 4486 页。

③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57 年 10 月 28 日，第 4607 页。

④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快报》，1957 年 7 月 5 日。

⑤ 柯齐奥·马拉帕特，“巴黎一个外国人的日记”，1967 年，第 93 页。这些话是 1948 年 11 月写的。

第六章

① 1962 年 6 月 8 日广播演说。

第七章

① 这个概念同美国精神病学家和人种学家艾布拉姆·卡迪纳所描写的概念相同，见他的著作《个人及其社会》(纽约，1939 年)；《社会的心理界限》(纽约，1945 年)；《性与道德》(伦敦，1958 年)。

第九章

① 当时考虑,如果在1968年以前找到热核溶化的原理,就在十年以后,即1976年制造氢弹,这个条件,远没有实现。

② 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成吨的水散发开来扩大了辐射云。当装置在足够高的地方爆炸时,火球到达不了海面,迅速上升,云的辐射就要弱得多,可以较容易散开。

③ 1966年在气球下进行的最强烈的发射,就污染问题而论,收到的效果要比最乐观的理论模型可以希望获得的效果更好。丹姆在罗伯特以及在现场的维亚德有力的推动下,完全掌握了有计划使用气球所引起的新的困难问题。

④ 1966—1967年,我们拥有电子计算机,其力量接近美国人在最初进行热核试验时所使用的电子计算机。

⑤ 总行政负责人罗伯特·赫什,高级专员弗朗西斯·佩林,军用部门主任雅克·罗伯特和他们的直接合作者。

⑥ 这是由于有了皮埃尔拉特的铀,加上后来的氘。

⑦ 马蒂雍与军队。爱丽舍宫作出相反的反应。

⑧ 这种发展是严重的,特别是因为除了威信方面的考虑以外,我们的原子武器可能遭受严重的威胁:未来的敌人有可能利用“中子作用”使普通的原子弹失效。我们的威慑力量就不能威慑。这样就展开了一场主要的斗争:要么我们进入热核庇护所;要么我们为之作出巨大牺牲的武器,势将成为一个受潮的炮竹。

⑨ 让-吕克·布鲁诺和爱德华·帕克。

⑩ 爆炸学,中子学,量子物理,核子物理,高温物理,物质物理等等。

⑪ 罗伯特·多特雷在沙克莱民用中心工作的同时,受到伊冯教授的邀请(在任高级专员之前,伊冯教授是丹姆的科学顾问,然后任高级专员代表,他定期检查研究工作的进展),伊冯教授请他注意热核溶化问题。但是多特雷对现有的班子毫无权力,甚至不能参与所有的研究工作,只有对“氢”班子取得领导权的时候,他才能够监督和配合各项工作,在各种可能的道路之间进行选择 and 找出解决的办法。

⑫ 如果多特雷当初不把三名高水平的科学家比洛,卡拉尤尔和达詹1966—1967年已经实现的十分深入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他肯定是不能那么迅速地进行综合的。

⑬ 在雅克·罗伯特领导下,研究主任维亚德的杰出的组织才能使多特雷及其合作者能够实现这样的壮举,在一年的时间里,在完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打算在1968年内进行的发射计划。

⑭ 钷证明同富铀一样可以使用。但是不应为皮埃尔拉特惋惜。从1967年开始,它的产品,在给核潜艇的第一个发动机提供燃料上是有用的。富铀也使得设计武器有更大的灵活性。除此以外,建立皮埃尔拉特使得欧洲钢铁联盟和联营企业掌握了许多

它们过去完全不懂的技术,对工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欧罗迪夫瓦斯输送工厂。

⑮ 其威力大大超出百万吨,证实了多特雷的假设。其中之一是使用铀的,另一个是使用富铀的。

第十章

① S. 霍夫曼等人著《寻找法国》,1963。

② 雅克·沙邦-戴尔马著《热情》第368页。

第二部

第十一章

① 参看例如 H. 卢西所著《新教银行》第1卷,第15及以后各页。

② 朱尔·米歇勒著《我们的法国,地理和历史》(写于1833年前后,1886年由米歇勒夫人发表),巴黎,1932年,第289—292页。各省的衰弱现象并不是普遍的,象马赛,波尔多,卢昂兰港口及其连接地区是繁荣的。

③ 1661年9月2日。书信集,III,第379页至385页。

④ 费纳隆致路易十四信,1825年由雷努亚发表(雷努亚所注日期为1694年)。事实是,这封信是在一个农业特大灾年写的。重点我们加上的。

⑤ “1710年回忆录”,1825年由雷努亚发表(这一次,这个回忆录也是在一次大饥荒,即1709年冬大饥荒后写的)。

⑥ 这是从人口,军事力量,外交影响,文化及艺术辉煌而言。但是贫困已经很严重。参阅 Y. M. 贝西著《老乡的历史》,日内瓦,1974,2卷。

⑦ 参看例如亨利·豪泽所著《黎塞留大主教的经济思想与行动》。在他的论文“路易十五时代的御前会议”(日内瓦,1970年)中,米歇尔·安东尼揭示科尔伯特主义的绝育作用,如何愈来愈严重;路易十四式的衙门君主制如何在1789年大革命中达到最高峰。

⑧ 但是,不应夸大“操纵金钱的人”的丑行:参看丹尼斯·奥扎南著《圣詹姆的克罗德·博达》。

⑨ 皮埃尔·古伯特著《从1600年到1730年的博维与博维西》,1960年。

⑩ 荷兰东印度公司所付红利从1633年到1642年相当于或超过25%,从1623年到1712年平均为20%。参阅查里斯·沃尔西·科尔著《科尔伯特》,哥伦比亚,1939年。

⑪ E. 波雍引述,见《法兰西人民的历史》,第297页。

⑫ 人们只是在调查科尔伯特所培养出来的人——诸如弗雷蒙、波克林、普索特,

达利埃斯·德拉图等；但是，人们已经知道，某些人在监狱里了结一生，如贝林扎尼。参阅 P. 古伯特所著《旧制度下的商贾家族：博维的丹斯族和莫特族》第 117—118 页。

⑬ P. 戴昂著《唯利是图》1963 年，第 79—80 页。古伯特自己（见“路易十四与二千万法国人”）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科尔伯特主义更多地是后果而不是原因。

⑭ J. 马克佐斯基写“从 1789 到 1913 年法国经济的物质产品（同英国比较）。”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手册，1965 年 7 月，第 78 页。

⑮ 1806 年，英国生产的铸铁 97% 是用焦炭炼制的，法国只有 20%。参阅莫尼克·平逊著“法国的钢铁工业”，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手册，1956 年二月第 58 期，第 15—16 页。

⑯ J. 马克佐斯基，见以上著作，第 XIV 页。

⑰ J. 马克佐斯基，“法国曾经有过‘起飞’吗？”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手册，1961 年。安格斯·麦迪逊著《西方的经济增长》，伦敦，1964 年，第 225 页。

⑱ 法国的指标在 1922 年与 1930 年之间是相对地好的；这是法郎贬值的人为结果。这种作法的代价是从 1931 年到 1938 年发生严重的衰退。

⑲ 参看哈里·D·怀特所著《法国的国际收支，1881—1913 年》，剑桥，美国，1933；龙多·E·卡梅伦著《法国与欧洲的经济的发展，1800—1914 年》，普林斯顿，1961 年；杰西·R·皮茨著《布尔乔亚家庭与法国的经济落后》新颖的论点，哈佛大学，1937 年；Ch. P. 金德尔伯格著《寻找法国》，剑桥，美国，1963 年；马林沃著《法国的生长》1974 年，避免过分地推倒既定的思想。

第十二章

① 首先归功于在阿尔弗雷德·索维的推动下国家人口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特别是安德烈·阿门果和马塞尔·莱因哈德以及“埃赫斯”历史人口学实验室主任雅克·杜帕基埃等所作的研究工作。

② 参阅古伯特所著《人口学基础》，见《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史》，第 II 卷，第 11 页；巴黎，1970 年。

③ 例如，研究南方—比利牛斯的戈德肖院长及其班子，研究兰格多克的伊曼纽尔·勒罗瓦·拉杜里，研究下普罗文斯的雷纳·贝彻雷尔，研究下奥维尼的艾贝·波瓦特里，研究博维西的皮埃尔·古伯特，研究阿米恩和皮卡迪的皮埃尔·戴昂。

④ 让·穆弗雷著“旧制度下法国的衣食危机与人口”，见《人口》1946 年，第 642 页。《人口》刊载的国家人口研究所的调研材料，1975 年 10 月专刊。

⑤ 路易·亨利，在：格拉斯和埃弗利领导下的集体创作，1965 年。

⑥ J. 博杰·加尼埃著《法国人口》，1969 年。

⑦ 安东尼·德蒙克里斯琴，剧作家（“苏格兰女人”卢昂，1601 年）和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1615年。参阅维纳(A)《蒙克里琴与经济社会主义》，巴黎，1923年。

⑧ 参阅马克佐斯基著作。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手册(A E类,第四期)。数字经A.里格利改动,见《社会与人口》,1969年,第78页。

⑨ 同上。

⑩ A.索布尔著“革命前夕的法国”,《经济与社会》,1966年,卷I,第88页。

⑪ 弗利歇和马丁著《教会历史》,卷XXI,1952年,第114—118页。

⑫ F.布拉尔著《法国宗教界的兴衰》巴黎,1950年。

⑬ J.贝兰热,伊夫·杜兰,让·梅耶著《北美洲的拓荒者与殖民》,1974年。

⑭ 雅克·亨里宾写“十八世纪初加拿大人口”,国家人口研究所手册,第22期,第96至101页。

⑮ 蒙蒂昂(笔名为莫霍)著《法国人口研究及考察》,巴黎,1778年。

⑯ 参阅让·穆弗雷著作。

⑰ 根据皮埃尔·古伯特的说法。他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确定这些可怕的事实。参阅皮埃尔·古伯特所著《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人口变化》,见《经济和社会史》,卷II(1660—1789年)。

⑱ 费纳隆致路易十四信,1825年由雷努亚发表(雷努亚所注日期为1694年)。

⑲ 费纳隆写“1710年法国的悲惨局面呈文”。

⑳ 巴黎,而特别是波尔多,卢昂,里昂,马赛,南特。参阅让·梅耶和保罗·布特尔的著作。

㉑ 1778年。

㉒ 让·加尼亚热写“十八世纪伊勒-德-法兰西的三个村庄”。国家人口研究所手册,第40期。

㉓ 哈罗德-多马尔模式(建立于增加节约上的复利)显示出由于人口加速增长而造成经济增长减慢的这种现象。

㉔ 法国舆论调查所1967年10月20日的调查(因此是在1968年5月社会危机之前,这就排除了有时提出的说法,即所谓害怕增长是这个危机引起的)。对1970和1976年之间提出来的相同问题,答复所提供的数字是相近的。

㉕ 参阅皮埃尔·肖纽著《厌世》,1976年。

第十三章

① Ph.多林格和P.让宁指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这些城市在中世纪末期曾一度繁荣,以后就衰落了。

② 蒙德斯鸠著《法意》,第二册,第XXI章。

③ 罗兰·穆斯尼埃著《十六世纪》,1967年,第371页。

④ E.J. 汉密尔顿著《美洲财富与西班牙价格革命（1501—1690年）》，剑桥（麻省），1934年。

⑤ 参阅肖纽著《塞维尔》，12卷巨著。

⑥ 同上

⑦ 塞默著《西班牙君主制》，卷II，第50页。

⑧ 吉西阿迪尼著作，W. 桑伯引用，见《布尔乔亚》，第132页。

⑨ 塞默著《西班牙君主制》，卷II，第50页。

⑩ 沃默·桑伯著《布尔乔亚》，第132—133页。

⑪ E.J. 汉密尔顿，见以上著作。

⑫ 莱奥·穆林著《欧洲的冒险》，第127页。

⑬ 百科全书，1975年版，“西班牙”条。

⑭ R. 德鲁弗著《梅迪西斯银行的兴起与衰落（1394—1494年）》，剑桥（麻省），1969年。

⑮ 伦纳多·达·芬奇的信，德吕莫引用，见《复兴时期的文明》，第176页。

⑯ 皮蒂林·A·索罗金著《社会，文化与个性》，纽约，1947年，第540及以后各页。

⑰ 关于教皇统治的国家，德吕莫完满地显示了宏观和微观中央集权制之间的平行。

⑱ 《剑桥的波兰史》，2卷，剑桥，1950—1951年。

⑲ S. 基尼维克兹著《波兰史》，1971年。

⑳ 刘易斯·卡罗尔有这样一个口号：“这里，你要尽力奔跑，以便留在原来的地方。”

第十四章

① 参阅让·夏多纳著《大国》，第239页。

② 参阅J.-A. 勒苏德和C. 杰勒德所著《十九和二十世纪经济史》，1963年，卷II，第390—391页。

③ 安德烈·菲利普著《经济和社会史实》，第44页。

④ A.J. 杨逊著《经济进步的可能性》，1959年，第140页。

⑤ 同上，第145页。

第十五章

① 马丁·奥芬巴赫著《教派与社会阶层：关于巴登州天主教与新教经济状况的研究》，弗里堡，1900年。

- ② 保罗·塞佩尔著《评两个法国》，1906，第28页。
- ③ 同上。
- ④ W.C.斯科维尔著《对胡格诺派教徒的迫害与法国的经济发展，1630—172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1960年。
- ⑤ H.卢西，见以上著作。
- ⑥ G.帕尔马德著《十九世纪法国资本主义与资本家》，1961年，第49页。新教徒不是法国仅有的资本家。但是，他们的份额大大高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
- ⑦ G.帕尔马德，第108页。
- ⑧ 奥西巴尔著《路易十四与新教徒》。另一方面，这一移民禁令在贝兰热，Y.杜兰，J.梅耶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见《北美洲的拓荒者与移民》，第234和260页。
- ⑨ 让-马利·多默纳克写“魁北克的紧急”，《精神》杂志，1969年7—8月号。
- ⑩ 西格蒙德·戴蒙德：“十七世纪的法属加拿大，一个预制的社会，”年鉴，1961年3—4月，第317—354页。
- ⑪ 11月2日科尔伯特致弗隆特纳克信。
- ⑫ 魁北克人让·马克·莱热是最熟悉当地现今情况的人之一，他在魁北克杂志《规模》中分析了这一崩溃的心理背景，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忧伤的魁北克人的犹豫”，1969年3月。

第十六章

- ① 安德鲁·肖恩菲尔德著《今天的资本主义》，1966年，第89—90页。
- ② “国际市场及舆论研究”进行的民意测验，发表于1976年9月30日《泰晤士报》。
- ③ “英国工业的对立及其根源”，根据“冲突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整理出来的，见《现代世界》1974年3月，第17页。
- ④ 《泰晤士报》，1975年6月4日。
- ⑤ 《科学进步》，1974年3—4月，第169期，第114页。让我们指出，“英才外流”的现象在七十年代缓和下来（无疑是因为美国经济危机发展之故）。
- ⑥ 参阅皮埃尔·梅耶所著《破裂的世界》，1976年，第88至90页。

第十七章

- ① M.米塞纳德著《寻人》，1954年，第198—211页。
- ② 参看：《种族主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集体著作。
- ③ 例如：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著《英国性格》，伦敦，1851年。
- ④ 卡·马克思著《资本论》，普莱雅德版，例如第613及以后各页，第1177及以

后各页。

⑤ 弗·恩格斯著《农民战争》，译本，巴黎，1952年，例如第203及以后各页，第213及以后各页。

⑥ 例如奥斯卡·A·马蒂著《英国改革的经济原因》，伦敦，1929年。科尔·巴巴加洛著《现代国家》，都灵，1958年。

斯米林著《闵策尔人名改革运动》，柏林，1956年。

⑦ 参阅例如R.德鲁弗著《梅迪西斯银行》，纽约，1943年；Y.雷努亚著《中世纪的意大利商人》，1949年。

A.萨波里著《中世纪的意大利商人》，1952年。

让·德吕莫著《改革的诞生与巩固》，1965年，第259—278页。除记错或遗漏外，这是德吕莫第一个彻底驳斥了马克思关于新教的资本主义根源的论点。

⑧ M.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年。

⑨ J.夏维翻译为法文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巴黎，普伦，1964年。

⑩ 关于韦伯争论的最佳书目提要，整理人有艾森斯塔，伯纳德·比勒，卢西，特里弗-罗珀，贝斯纳德。

⑪ 意大利应除外：见阿明托尔·范范尼著《天主教、新教与资本主义形成史》，米兰，1934年。在法国，只有一些文章提到了或参加了争论，最后有菲利普·贝斯纳德编得很好的小文集，出版于1970年。

⑫ M.韦伯，见以上著作，第241页，95号。

⑬ 同上，第242页。

⑭ 同上，第234页。

⑮ “强制的艰苦的节约”，同上，第237页。

⑯ E.德吉拉德著《到十六世纪末的社会经济史》，巴黎，1900年，第48页。

⑰ 伊拉兹马斯和赫顿表示犹豫。参看P.梅斯纳德著《十六世纪政治哲学的高涨》，巴黎，1939年。

⑱ E.菲肖夫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研究，卷II，1944年，第54至77页。

⑲ H.R.特雷弗-罗珀著《宗教改革与社会变化》，伦敦，1967年。

⑳ 卢西著《新教银行》。

㉑ 参看H.卢西：“卡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见《证明》，1964年7月，第5页。

第十八章

① J.-M.安德烈著《罗马精神与文化生活中的‘空间’》，1966年。

② 圣马蒂厄，第25章。

③ 圣保罗著《致特萨洛尼亚人的信》，II，第3章。

④ Y.雷努亚著《中世纪的意大利商人》，1968年，第124至131页。

⑤ M.巴塔雍著《伊拉兹马斯与西班牙》，巴黎，1937年。

M.雷诺德著《伊拉兹马斯与意大利》，日内瓦，1954年。

玛格丽特和曼著《伊拉兹马斯与法国改革的开始》，巴黎，1934年。

J-C.马戈林著《伊拉兹马斯自述》，1965年。

⑥ P-J.勒克莱著《改革时代的宽容史》，巴黎，1955年。

⑦ 参阅H.R.特雷弗-罗珀著《从改革到启蒙》，法译本，1972年，第23页。

⑧ 我请求我的老师阿方斯·杜普隆宽恕，尽管我对他的著作十分钦佩，但我不赞同他对“天主教改革”的分析，而仍然同意亨利·豪泽的分析。

参阅H.豪泽著《西班牙的支配地位》(1559—1660年)；H.西伊和A.雷比伦著《十六世纪》第218—219页，第24—25页。

⑨ M.巴塔雍著《伊拉兹马斯与西班牙》，第493页。

⑩ 确实，布鲁诺在胆智方面超过了哥白尼：他的“唯物主义”，他的“在扩展中的宇宙”，他对未完的无限的设想，发出了出奇地现代的音响。

⑪ H.R.特雷弗-罗珀著《加利勒与罗马天主教会：一场还在打的官司》，见经济合作署年史，1960年11月—12月。

⑫ R.夏蒂埃，M.康佩尔，D.朱利娅著《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法国的教育》，巴黎，1976年。

⑬ 商人买地和买官位的倾向从中世纪起就存在，中央集权的倾向也是这样，但十六世纪末，这一倾向在意大利加剧了，正象布罗戴尔所指出那样。

⑭ H.拉佩尔著《十六世纪的欧洲君主国》，国际关系，1967年，第158页。

⑮ A.-A.布丹著《葡萄牙史》1970年，第85—86页。

⑯ J.德吕莫著《从博蒂塞利到波那帕特的意大利》，1974年，第201到203页。

⑰ H.R.特雷弗-罗珀著《从改革到启蒙》，第50—67页。

⑱ V.巴伯著《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主义》，巴蒂摩尔，1950年。

⑲ 让·德威特“回忆录”，在作者逝世后好久，于1709年在海牙出版；大概写于1660年，第259,267页。

⑳ 乔西·艾森伯格著《犹太人民史》，1974年，第367至378页。

㉑ V.巴伯，见以上著作。

㉒ H.W.埃尔森著《美国史》，1930年，第90至92页。

J.卡纽著《美国民族史》，1947年，第21至24页。

㉓ D.帕斯克著《美国人民的政治与社会史》，卷I，第60至63页。

第十九章

- ① 勒克,卷 II,1—3页。
- ② J.德拉斯泰尔著《法国政治自由史》。
- ③ 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革命》。
- ④ 《评法国政府》,作者阿詹森侯爵,第146页。
- ⑤ 参阅罗兰·穆斯尼埃著《国家与专员》,对设置省财务司的研究,柏林,1958年。
- ⑥ P.古伯特著《路易十四与二千万法国人》,第160及以后各页。
- ⑦ 参阅格雷米昂和沃姆斯的著作。
- ⑧ R.穆斯尼埃著《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法国,被统治者参与统治者的活动》,瑞士对通史的研究,卷20,1962—1963年,伯尔尼。
- ⑨ 反国家的叛乱在米雷蒙侯爵的宣言(1689年)中,和在斯康伯格公爵的宣言(1692年)中得到反映。参阅贝塞以上著作,丹尼斯·里歇以上著作。
- ⑩ 皮埃尔-爱德华·勒蒙泰著《论路易十四君主制的建立》,1818年,第399页。
- ⑪ 同上
- ⑫ 阿詹森侯爵“日记”,1753年12月,第240页。
- ⑬ 马尔塞布著《以赋税法院的名义向国王上言》,1772年

第二十章

- ① 巴尔扎克著《德基诺拉》,第一章、第一节。
- ② 参阅雅克·奥特吕伊著《发展的丑闻》,巴黎,1965年。
- ③ D.C.麦克·克莱兰著《促进思想建树》,1966年11—12月。
- ④ D.C.麦克·克莱兰,J.W.阿特金森,R.A.克拉克,E.L.洛厄尔著《成就是动力》,纽约,1953年。D.C.麦克·克莱兰著《促进的社会》,普林斯顿,1961年。
- ⑤ F.佩鲁克斯著《约瑟夫·沈彼得的经济思想》,日内瓦,1965年,第93页。
- ⑥ 加斯顿·巴舍拉德说:“从早晨起,在堆在我桌子上的书前面,我对书神,做我狼吞虎咽的读书祷告……”
- ⑦ B.C.罗森和R.C.丹达拉德著《成就动机的心理根源,社会尺度学》,1959年,第185—215页。
- ⑧ L.莫林,见以上著作,第146页。
- ⑨ N.M.布雷德伯恩著《在土耳其的管理作用》,哈佛大学,1960年。
- ⑩ 璜·B·科泰著《十三和十四世纪间西班牙经济中的成就动力》,见“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61年,第144至163页。

⑪ 爱德华·F·丹尼森著《美国经济增长的泉源和美国面前的选择》，纽约，1962年。

⑫ 在折中的一系列企业中发了财的法国工业家：汽车、飞机运输，商业无线电广播，跑车，彩色电视，块菰等等。

⑬ 爱德华·F·丹尼森在“剩余因素”的名称下，研究了这些倾向：“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规模”，见《剩余因素与经济进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5年，第13到59页。

⑭ N.M.布雷德伯恩，D.E.伯卢著《成功的需要与英国工业的增长》，见“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61年10月。

⑮ 拉辛著《罗亚尔港》。

⑯ 狄德罗：《百科全书》，“革新者”条。

⑰ 参阅R.穆斯尼埃著《十八世纪的科学与技术进步》，巴黎，1958年，在那里，提供了许多可以比较的例子。

⑱ 见上，第442页。

⑲ 也参阅索罗金著，《社会，文化与个性》，纽约，1947年，第540以及以后各页。

⑳ 利奥·莫林著“1901年至1960年科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籍”，见《社会学国际手册》，1961年XXXL，第145至163页。

㉑ 1447年，终于比尔弗利埃。

㉒ 荷兰文为Kaken，故有encaquer(堆放)一字。参阅利奥·莫林著作，见上文，第121页。

第二十一章

① P.弗朗索瓦-泽维尔·德查尔沃瓦（1682—1761年）《写于北美洲的旅行日记》，巴黎，1744年，卷V，第117—118页。

② 让·德维的“回忆录”，第46—47页，第十章：“荷兰特许的职业行会和团体是十分有害的”。

③ 罗伯特·吉兰1968年出版的一本重要的书的书名。

④ 安德烈·菲利普著《日本工业化分析》第188页。

⑤ 莫里斯·克鲁塞著《二十世纪》，第47页。

⑥ 《世界报》，1972年6月15日，尼古拉·维克尼著《日本，从技术到科学》。

⑦ F.布卢希著《十八世纪贵族的日常生活》，巴黎，1973年，第22页。

⑧ 同上，A.索布尔，见“革命前夕的法国”，巴黎，1966年，第63页，索布尔认为有350,000人，即70,000家。

⑨ 1756年，教区神甫科耶写了一份辩护词支持从事商业的贵族：“商业难道不成

了政治利益和权力平衡的灵魂(……)难道不成了国王伟大和人民幸福的基础吗?”

- ⑩ H. 卢西著《法国新教银行》，巴黎，1959年，卷 I，第 13—14 页。
- ⑪ F. 布鲁希，见以上著作，第 23 页。
- ⑫ 利维，见以上著作。
- ⑬ 弗雷维尔，见以上著作。
- ⑭ 1738 年国务会议(即部长会议)的决定。原文献(作者的档案)。
- ⑮ 弗吉尔著《埃尼伊德》，卷 III，第 57 页。
- ⑯ A. 比勒著《卡尔文的经济及社会思想》，日内瓦，1961 年

第二十二章

- ① 圣吕克编福音，10，39—42。
- ② 英国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于 1960 年与 1976 年间提供了极为使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十七世纪英国和联合省比天主教国家有更高的文化水平。

第三部：第二十三章

- ①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 G. 德·博蒙通信，1838 年 7 月 8 日；《托克维尔全集》，梅耶版，卷 VIII，第一册，第 311 页。
- ② 同上，1853 年 12 月 28 日，第三册，第 177 页。
- ③ 维里廉·罗著《法国的长城：马奇诺防线的胜利》，伦敦，1959 年。
- ④ 即每年平均开支 8 亿法郎。保罗-埃米尔·图努将军著：“马奇诺防线的始源”，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杂志》，1959 年。
- ⑤ 这五年中的每一年。参阅艾尔弗雷德·索维著《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经济史》，卷 I，从停战到英镑贬值，1965 年，第 370—371 页；及卷 II，从皮埃尔·拉伐尔到保罗·雷诺，巴黎，1967 年，第 579 页。
- ⑥ “政府公报”，国民议会，辩论，1928 年 12 月 28 日第二次会议。
- ⑦ 同上。
- ⑧ 从 1919 年起，陆军部就要求总参谋部发表它对保卫国土的看法。1920 年 5 月，高级国防会议，然后 1922 年，保卫国土委员会再次进行了研究。研究工作由一个保卫国境委员会完成。高级国防会议讨论了好几次。历届政府总是毫无异议地接受这些机构的结论。图努将军，同上。
- ⑨ “政府公报”，国民议会，1933 年。

第二十四章

- ① 普罗文和维尔诺克斯-拉-格朗德矿区耐火土开采雇主联合会 1965 年 3 月 9

日致吉尔伯特·格朗瓦尔信。

② 保罗·巴贡, 吉尔伯特·格朗瓦尔, 让·马塞尔·让内, 莫里斯·舒曼, 罗伯特·布林。

③ 让-马塞尔·让内, 米歇尔·博卡诺夫斯基, 莱蒙·马塞林, 奥利维埃·吉夏, 弗朗索瓦·奥托利。

④ 格朗瓦尔 1965 年 8 月 23 日信。

⑤ 劳动部长吉尔伯特·格朗瓦尔 1964 年 9 月 9 日信。

⑥ 社会保险法第 L.332 条。

⑦ 社会保险法第 L.334 条。

⑧ 吉尔伯特·格朗瓦尔 1965 年 8 月 23 日信。

⑨ 同上。

⑩ 1947 年 12 月 12 日议案。

⑪ 1948 年 4 月 5 日矿务高级会议就共产党议会党团提交的议案表示反对意见。

⑫ 1966 年 12 月 1 日普罗文矿区粘土工工会秘书梅蒂尔·亨尼伯特信。

⑬ 1966 年 11 月传单。

⑭ 耐火材料及陶土地下开采矿工老年保险法案, 第 4 期, 第 128 号。

⑮ 这次会考是根据政府一个决定安排进行的, 但行政法院以手续不全为由 (没有征求一个谘询机构的意见), 予以取消。按照立法手续, 要使会考生效, 就必须由政府向议会请求确认。一条规定, 如行政法院认为违背法律, 就只有议会有权力使它生效。要是得不到议会确认, 各项考试都必须重新举行, 因为原先安排考试所根据的规定已经不再成立。

⑯ 1971 年 1 月 9 日。

⑰ 罗克, 夏洛特尔-拉-珀蒂特, 里舍堡矿场, 德年—安津材料公司矿工工长。

⑱ 同上。

⑲ 1971 年 12 月 7 日。

⑳ 1972 年 1 月 19 日第 72—53 号法令, 规定关于执行 1970 年财政修改法第 25 条的实施条件。

㉑ 关于执行 1972 年 1 月 19 日第 72—53 号法令的决定。政府公报 1972 年 6 月 16 日。

㉒ 退休特别基金管理委员会 1972 年 4 月 18 日举行会议, 认为应该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粘土工实施该法律。

㉓ 预算办公厅驳回该委员会主席 1972 年 6 月 26 日第 72—6301/13162CG/LC 号信。

㉔ 1972 年 12 月 15 日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团, 是我带领去见他的。

- ②5 1973年2月12日。
- ②6 1946年11月27日法令第200条。
- ②7 经济财政部及预算办公厅的信,1972年6月5日。
- ②8 工业及科学发展部1972年8月1日信,CAB/第9779号C.P.。
- ②9 公共卫生部信,盖有社会保险局长的印记,1972年6月20日。
- ③0 圣-路-德-诺工会代表罗杰·肖皮内的信,无日期(1973年初)。
- ③1 总工会粘土矿工工会1973年2月传单。

第二十五章

① 自来水总公司,里昂自来水公司,法兰西企业研究及管理股份公司。

② 该局是根据1964年自来水法设立的。自从1975年(1974年12月27日法,修改1964年自来水法第14条),议会对各局进行事后监督:“各区局须报告在该计划范围内所进行的收支活动以及有什么更改,这报告附于每年的财政法案内。”但是这个监督,只不过是收到交来的一份报告,至多讨论几分钟,所以是纯粹理论上的……至于收费,无论是水费还是污染费,是根据消费多少食水而定的,所以说得更确切些,其实是当局对供应食水的公用事业用户征收的费用。

③ 设备部长1965年6月17日对“待建区”的解释。

④ 这个表达法是米歇尔·克罗齐埃经常用的,例如在《官僚主义现象》一书中。在我看来,这似乎比较适用于衙门的下层,他们受到摆架子的锻炼少一些,对于负责的官员,就不那么适用。

⑤ 在巴黎附近,有二十来个是多少相似的:莫桑-塞-赛纳,奥尔利,维里-夏蒂戎,维若-塞-赛纳,安内-塞-马尔纳,圣莫尔,伊维里,纽伊-塞-马尔纳,莫·科贝尔,梅里-塞-奥瓦兹,徐雷纳,奥贝仁维尔,维尔-纽弗-拉-加雷纳,克罗瓦斯-拉-夏佩尔,路弗西恩。

⑥ 净化采用三种处理办法:澄清和中和(用氯化铁凝结,用碳酸钠中和,通过机械搅动,使其絮凝,进行水平沉淀,沙子过滤);消毒(用二氧化氯事先对生水进行处理,用臭氧处理经过过滤的水);精炼(使用二氧化氯,活性炭对于提高水味质量有很好效果,臭氧清除微细的污染物)。

⑦ 钠,过氧化钠,臭氧。

⑧ 凡在政府通令中提到的杆菌均清除。参阅附录阿努尔报告。

⑨ 参阅附录维伯特报告。

⑩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拉菲特教授,该计划的官方地质学家,曾强调指出这现象,以前也曾多次为地质学家们所证实(地质与矿藏研究局维伯特教授和阿努尔教授的报告)。

1970年10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可能从丘陵附近收集的水主要是来自地下水,即使在赛纳河和伊沃纳河附近引来的水20%来自丘陵,80%来自河流。但是,只有紧急时期,也就是枯水时期,最引人注目,地下水的比例会大大下降,这时,河水便代替地下水。

⑪ 1976年,用水最多的一天,配水量只有四百万立方米。但是,到“蒙特罗计划”第二期工程投产时,预计每天配水量为六百万立方米。

⑫ 法国统计研究局1963年进行了一次调查,《她》周刊1966年也发动了一次调查,表明巴黎居民区有80%的人饮用矿泉水。1974年11月,在生活质量部要求下,进行了一次测验,证实以上两次调查仍然适用。测验表明,饮用矿泉水的人的比例,在全国范围内是75%,在巴黎居民区,则达到90%,他们饮用瓶装的矿泉水,并且愿意只是把自来水煮成热饮料或同别的饮料搀在一起才喝。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特别是使用电冰箱,饮矿泉水的人的比例在增加。从全法国来说,瓶装水销售量的增长从1950年以来,一直是自来水销售量增长的三倍。巴黎居民区的居民的消费量是外省居民消费量的两倍。奇怪的是,自来水的质量同销售瓶数之间,并没有任何相互关系,“天然净水”供应得最好的区域,同主要供应河水的区域,矿泉水消费得一样多。

⑬ 而意外的污染呢?衙门给我们举述这么一个事故,是1963年,在莱茵河科伦上游发生的:一艘驳船把装载的化学品扔到河里,结果所有的鱼,一直到海口,都死光了。

仔细看看,这个那么厉害的论据也是站不住的,并不比其他的论据强。赛纳河水要是污染了,地下水也就会马上受到污染,因为地下水正象我们所看到过那样,不过主要是通过冲积层抽上来的河水。

除此以外,河是流动的,可以自己排除污染。地下水是不流动的,只要受到污染,就需要很长时间天然的沙粒过滤才能净化。这样,就得中断引水。所谓意外污染的论据使那些挥舞这种论据的人,自打嘴巴。

⑭ 1958年,每逢消费100公升就损失54公升,到1962年,每100公升就损失75公升。

⑮ 由1963年的三亿三千六百万立方米到1966和1967年的二亿二千万立方米。配水量降至1951年水平。

⑯ 有两家公司可能承建这项工程和管理那些设施,其中一家提出,光是工程本身(不算赔偿损失),计划的下游这半部分,就要耗资十亿法郎,以1970年币值算,这一部分工程是花钱最少的,因为最靠近巴黎。上游那半部分耗资不会少于十五亿法郎。

一个有三百张病床的博姆式医院耗资四千万法郎。

⑰ 是在我们的要求下,由农村工程总工程师卡利埃进行的。

⑱ 我们只是提醒大家注意采沙场以后不能再使用了,因为计划规定禁止开采。

要用沙石就得一直到莫尔文和布列塔尼，用两倍的价钱去采购。根据阿努尔教授的计算，这额外的费用不会低于一百亿法郎。

⑲ 在巴黎周围，赛纳河上，马尔尼河上，奥瓦兹河上，奥尔杰河上有二十几个工厂，大部分都可以增加生产能力一倍，没有什么困难。莫桑-塞-赛纳的生产可以从每天十五万立方米增加到一百万立方米；安内-塞-马尔尼的生产由二万五千立方米提高到六十万立方米；舒瓦齐-勒-罗瓦和纽伊-塞-马尔尼由八十万和六十万提高到一百二十万立方米，即各自比蒙特罗计划高一倍。

另外，可以改善净化的技术。我们访问了各工厂，看到其中有几家，如莫桑工厂，利用颗粒活性炭的技术，使水味适口。而在另一些工厂，主要使用传统的办法，用钠或臭氧，水就带有很浓的化学味道。负责这种技术的人，即使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也应请他们放弃这办法，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⑳ 该区的局由于减轻赛纳河的污染，已经作出巨大的贡献，它应该利用它的财政威力和法定权力，更有力地对污染者进行斗争。可以更多地津贴灌区的所有市镇和工业，只要它们建立净化站，同时可以处分其他的。这是它的主要任务。它有这样的办法，应该使用这些方法。

㉑ 为了工业上的需要，巴黎区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在“天然纯净”的地下水层，每年直接抽取一亿四千万立方米，即每天三十五万立方米。单单减少这一浪费，就可以得到用之不竭的泉水资源，以供当地饮用水消费之需。

㉒ 这些瓶的标签应载有药用的说明，也应注明禁忌。

㉓ 现在是，加工价值税 17.8% 和生产特别税。这些瓶装水的价格有一半以上就是这些税项，长途运输费和名牌的广告费。除去这些费用，瓶装的泉水，就在当地消费，不加税，每公升约合 0.30 法郎，即按最低工资计算的劳动一百秒钟。

第四部——第二十七章

① 这个表达法是杰利尼埃所使用的，见《企业伦理学与国运》，1964 年。

② 阿瑟·扬著《法国之行》，第 169—170 页。

第二十八章

① 阿詹逊侯爵的“回忆录”，1733 年

② 罗伯特·舒曼：“政策的需要”，《方舟》月刊 1953 年 3 月。

③ 亨利第四在巴黎最高法院的讲话，让最高法院记载南特上谕（1599 年）。

④ 皮埃尔·梅斯梅尔另一个助手在一篇博士论文中，用了一章来论述这个问题，这是阿密恩学院院长雷蒙·普里厄。见《政治决定》第一卷，第 350—373 页。该论

文没有发表,巴黎,1975年。作者采取严厉态度,但似乎并不了解事情的底细。

⑤ 帕金森举述了类似的规律。

⑥ 德勃雷-孟戴斯·弗朗斯:“大辩论”,《欧洲》杂志,第一号 1966年,第 161—162页。

⑦ 《世界报》,1973年 9月 29日。

⑧ 出于尊重内阁会议讨论和报告的秘密,我目前不愿提供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参加 1954年 12月 26日会议的两个人已经发表了他们的证词。这是两个主要负责人的权威性的和材料充实的叙述。他们是贝特朗·戈德史密斯,原子能委员会对外联络局局长(“原子竞争”[1939—1966]巴黎,1967,第 206—207页),和埃尔雷将军(“国防杂志”1968年,第 1903页)。我只限于指出,我完全证实这两位负责人的证词。

⑨ 国民议会“官方公报”1962年 7月 16日。

⑩ 事实上,所援引的居伊·摩勒就职声明是完全确实的(1956年 1月 30日“政府公报”)。

⑪ 参看贝特朗·戈德史密斯上述著作,第 222页,以及埃尔雷特将军上述著作,第 1903页。

⑫ 第 60,857号法令,见 1960年 8月 6日“政府公报”。

⑬ 1968年 5月 8日和 14日国民议会“官方公报”。

⑭ 弗雷德里克·勒·普莱著《法国的社会改革》,1864年。

⑮ 贝拉-盖林“每日公报”的统计数字,1976年 8月 31日。

第二十九章

① 格里姆男爵同德国的一个邦君从 1753年到 1769年的文艺、哲学和评论通信集,巴黎,1813年第 146页。

② 一如弗雷德里克·勒·普莱所述。

③ 企业总联合会财团主席安布罗瓦齐·鲁克斯。

④ 阿詹逊侯爵的“回忆录”。

⑤ 国立高级图书管理学校,1968年。还是那个财政督察员视察了国民教育部以及其他几个部所属的全部机关单位。

⑥ 议会只能对军费进行表决。从 1940年 6月起,一部分议员自称当时并不同意通过单纯表决军费的办法批准宣战。

第三十章

① 格里姆上述著作,第 146页,1764年 7月。

- ② 《法意》，第11册，第2章。
- ③ 阿詹逊侯爵著《对法国政府的考虑》，第22—23页。

第三十一章

- ① 奥诺瓦伯爵夫人著《西班牙游记》，1690年。
- ② 当时是财政督察调整级别的会考，在国家行政学院毕业会考后一年举行。
- ③ 加斯东·鲁普纳尔著《历史与命运》巴黎，1943年。
- ④ 利奥泰：“东京（越南北部——译注）通信”，1885年。
- ⑤ 皮埃尔·古伯特著《博维的丹塞家族与莫特家族》。例如，丹塞家族1600年是富裕农民，经过五代人，发展起来，到让-克罗德·丹塞（1696—1751年）任博维市长，御前秘书，克罗德第三·丹塞任货币法院顾问。
- ⑥ “白色革命”，克里斯琴，珀拉文的论文，1975年，未发表。
- ⑦ 皮埃尔·布迪厄和让-克罗德·珀塞龙著《再生产》，巴黎，1973年。

第三十二章

- ① 路易·布朗，“十九世纪字典”“中央集权”条。
- ② 阿詹逊侯爵的“回忆录”，贾纳版，第140页。
- ③ 报告“明天的巴黎及巴黎区”：1974年22%，根据赫德森研究所，1974年10月。
- ④ 西格弗里德著《巴黎的滑稽地理》，1957年。
- ⑤ 布瓦吉伯特著《法国的细节》第325页。
- ⑥ 参看赫德森研究所报告“明天的巴黎及巴黎区”，1974年10月，第5页。
- ⑦ 维维恩，“十九世纪字典”，“中央集权”条。
- ⑧ 拉默内，1848年在制宪委员会上的讲话。
- ⑨ 吉佐的“回忆录”第3卷，第136页。
- ⑩ “克雷齐河求救”，《巴黎日报》，1975年6月23日。

第三十三章

- ① 《普鲁东全集》，第21册，“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马塞尔·里维埃尔，巴黎，1924年。
- ② 图戈“市政奏章”，1775年。是我加的重点。
- ③ 在费尔特-塞-阿曼斯，默特-埃-莫泽尔—《费加罗》报，1970年7月31日。
- ④ 埃德蒙·梅尔和德国总工会主席之间的辩论，1975年5月。
- ⑤ 德尼丝·邦巴迪埃著《法国之声》第73页。

- ⑥ 帕默斯顿勋爵的话,见《十九世纪大字典》,第724页。
- ⑦ 朱尔·西蒙,《十九世纪字典》,第725页。
- ⑧ 有二百万领工资的人担任公职,有五十万国营企业职工,有一百五十万退休的人。
- ⑨ 戴高乐将军是在1968年6月14日对我发表这个声明的。首先,他向我询问了选民的情绪,当时正在进行立法竞选,他让我觉得怎样就怎样讲。

第三十四章

- ① 参看乔治·韦德尔的论述,例如1975年5月12日《观点》周刊上的文章。
- ② 1966年9月10日在太平洋上。
- ③ 戴高乐研究所安布瓦齐讨论会的报告(1974年)。
- ④ 米歇尔·若贝尔著《未来回忆录》,巴黎,1974年,第174页。
- ⑤ 查里·比戎,国民议会副议长,见《世界报》1975年11月4日。
- ⑥ 阿林·波埃,参议院议长,1975年6月30日。
- ⑦ 埃加·富尔,国民议会议长,1975年12月20日。

第五部——题词

- ① 1859年文章,重刊于《现代问题》,巴黎,1868年。
- ② 头四句诗是摘自《神圣无邪的人的神秘》(诗集,第716页),后两句是摘自《第二道德的神秘大门》,(诗集,第635页)

第三十五章

- ① 罗伯特·德斯诺:“花篇,诗篇”,这一寓言曾由布迪厄和珀塞龙引述,见《再生产》,巴黎,1973年,第9页。
- ② 如果说,博德莱尔猜到了这些“通信”的话,那么,这是法国的象征派,紧跟着德国的浪漫派,把这变做经常的题材。
- ③ 米歇尔·富科尔著《监视与惩罚》,巴黎,1975年。
- ④ 这是在怀奥明州,妇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取得了选举权。
- ⑤ 参看夏蒂埃,康佩尔和朱利亚著《从十六到十八世纪法国的教育》,1976年。
- ⑥ 这是泰恩的话,但是拿破仑在某一届行政法院上阐述了这个理论(1806年2月10日至3月20日)。
- ⑦ 阿道夫·蒂埃1849年在法路克斯法案委员会上的讲话,见拉戈尔斯援引他的话。《第二共和国史》,第280页。
- ⑧ 威廉·肖恩菲尔德:“法国中学研究”,博士论文,未发表,普林斯顿,1970年。

⑨ 伦理及政治科学学院 1970 年对于延长义务教育所引起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进行了调查和发表了报告。暴力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证实了这一发现。

⑩ 弗里德烈殊·西伯格著作的法译名。原著 1929 年于柏林出版。

⑪ 杰斯·皮茨：“资产阶级家庭与法国的经济落后”，1937 年在哈佛大学进行答辩的新论文，受到法国历史学家的抨击。但是我认为大体来说，这论文是对的，即使某些资料需要修改。

⑫ 大卫·兰德著“对法国的观察：经济，社会和政治”，《世界政治》，1957 年 4 月。

第三十六章

① 参看约翰·内夫著《工业文明的诞生》。

② 这种恶性循环，有些社会学家特别加以揭露，例如罗伯特·默顿，阿尔文·古尔纳，见“工业官僚体系的典型”，格伦柯，1969 年；又如米歇尔·克罗齐埃，见“官僚主义现象”。

③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著《旧社会与大革命》，第 208 页。

④ 阿詹逊侯爵“日记”，1756 年 6 月 1 日。

⑤ 西伯格著《上帝是法国人吗？》第 244 页。

⑥ 埃德加·皮扎尼。

第三十七章

① 十三世纪流行谚语，参看皮埃尔·勒詹德尔著《检察官的爱》，巴黎，1974 年，第 69 页。

② 弗利殊著《格里改革与基督教回潮》，巴黎，1950 年。

③ 根据“宫廷荣誉”，阿利埃诺·德·波瓦蒂埃 1485 年前后所著论文，发表于“古代骑侠风度回忆”，作者是拉库尔尼·德·圣帕莱，巴黎，1759 年。

④ 拉姆尼著“论宗教”第 360 页。

第三十八章

① 《女皇或怀疑》，1971 年，第 95 页。

② 参看米歇尔·富科尔著《监视与惩罚》。

③ 贝尔：“历史与批判字典”，“保罗教徒”条，注尾。

④ 拉姆内，见《论宗教》，第 170 页。

⑤ 利奥泰：“东京通信”。

⑥ 马拉帕特“日记”，1947 年。

第三十九章

- ① 参看博瓦尼伯爵夫人“回忆录”。

第四十章

- ① 米歇莱把法国人说成是“赖皮叫化”。
② 阿兰·盖斯马。
③ 阿瑟·扬,见上述著作,“与拉利沃尼埃会见”。

第四十一章

- ① 加斯东·蒙纳维尔著《证词》,巴黎,1975年。
② 托洛茨基,见于各著作。
③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报告,巴黎,1976年8月。对这报告,应有一定的保留,因为它对不平等的标准任意夸大。

④ 皮埃尔·布迪厄和让-克罗德·珀塞龙著《继承人》,巴黎,1964年,以及《再生产》,巴黎,1970年。国民教育部的统计数字并不总是一致的。最严肃的看来是收集于1969年3月31日的“文献资料和研究”上(“法国大学生”)以及1976年4月30日教育部的“情报资料”。产业工人的儿女所占数字大概如下:1945年:1%。1950年:1.7%。1958年:2.7%。1968年:11.1%。1975年:12.8%。

⑤ 通过更严格地把数学办法应用于社会研究上,雷蒙·布东推翻了布迪厄和珀塞龙二人的论点(“机会不均等”,巴黎1974年)。

⑥ 布迪厄和珀塞龙自己也不是那么天真,但是,他们的论点,大家一般是这样简单化地去理解的,而他们也似乎从未反对过这种解释法。

⑦ “划地为牢”一章,正象《再生产》所提供的-一个颇好的例证,表明了那种行话怎样延续下来,并且愈来愈严重,对于社会僵化所起的作用,要比收入所起的作用还要大。

⑧ 布东的书有斟酌地作了必要的修改。

⑨ 儿女的成功并不那么取决于家庭所从事的行业,甚至也并不那么取决于本人的智力,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父母能否“支援”他们。科莱特·希兰在《十岁的孩子》(1971年)一书中,强调指出,家里的谈话对于小孩子的头几年是多么重要。

⑩ 有谁没有听到过援引布迪厄和珀塞龙的论点?而又有谁知道布东的论点?

第四十二章

- ① 格里姆:“文艺通信”第8卷,第254页。

- ② 阿瑟·扬著《法国游记》，第40页。
- ③ 同上，第224页。
- ④ “马尼戈镇农村储蓄所”事件，大理院纪律检查会撤销原案，1914年3月11日（达洛齐定期文摘，1914年，卷I，第257页）。
- ⑤ 阿瑟·扬的“游记”，1787年7月31日，第139页。
- ⑥ 文化事务及环境部1974年4月发表的调查报告。以上描写的那种嗜好布迪厄和珀塞龙论述学校不平等的论点中也可以见到，正好为这种倾向提供另一个例证。

第四十三章

- ① 科斯塔·加弗拉斯的影片。
- ② 约瑟夫·丰塔内于1975年。
- ③ 吉夏，见参议院“官方公报”，1969年12月2日，第1116页。
- ④ 让·齐格莱著《无可怀疑的瑞士》，1976年。
- ⑤ 见路易·舍瓦利埃的杰作《法国人颠倒的历史》援引的话，巴黎，1975年，第70页。
- ⑥ 同上，第71页。
- ⑦ 贝尔塞计算从1590年至1715年间，光是在阿基泰纳就发生450至500起暴动。
- ⑧ 国王亨利在巴黎最高法院的演讲，1599年。
- ⑨ 卫生部长西蒙妮·威尔所作的说明，1975年5月7日记者招待会。
- ⑩ 参看塞戈维公爵夫人所著《胡尔加》。
- ⑪ 阿里斯蒂德·布吕安著《在路上》，巴黎，1897年。
- ⑫ 这演讲列于“蒙佩利埃男子中学光荣榜”的首位。“1942年7月14日发奖大会，第十六师司令员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发表的演讲。”蒙佩利埃，1942年，第12页。
- ⑬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法兰西第一军军史》，1949年，第49页。
- ⑭ 安东尼·普罗斯：“1881,1885,1889年竞选宣言的词汇”，巴黎，1974年。左派用得更多的是名词和形容词；右派用得更多的是动词和副词。
- ⑮ 保罗·莫朗在“贵夫人”多处所下的定义。

第六部——题词

- ① “论文集”第四卷，第100页。
- ② “思想”（格诺蒂）。

第四十四章

① 霍拉斯·瓦尔波尔“致曼的信”，1754年1月28日，根据这一故事，创造这个词“不虞作用——即意外发现你根本没有去追求的结果”。

②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格兰柯，美国，1957年)把“不虞作用”的概念应用于科学研究上，来显示意外的、谬误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③ 夏托布里安著《墓外回忆录》1899年。

第四十五章

① 雅克·帕歇“论警察与市政，系统百科全书”，1789年7月。关于帕歇，参阅“法国人1789年怎样看待衙门：雅克·帕歇与官僚体制”，《行政》杂志，1962年，第378—383页。

② 拿破仑致主持行政法院的部长信，见《帝国政治》，第397页。

③ 吉斯卡·德斯坦的祖父，雅克·巴尔杜1935年主持一个技术委员会，改革国家。他成为普伊-德-多姆的议员，1947年提出一个议案，主张建立专区。

第四十六章

① 这三个调查报告是1976年发表于《法兰西文献》上的。题目是：“分散责任，怎样分散？为什么要分散？”

② 奥克塔夫·杰利尼埃曾经加以论证，很有分量，见以上提到的著作，第39至96页。

③ 行政总督察员亨利·克里格关于在阿尔萨斯建立二十多所中学一事写过一份出色的报告(1974年，未发表)，报告对一个具体的事例，说明分散权力会导致控制失灵。

④ 吕先·斯费齐在“决定的批判”(巴黎，1975年)中，研究了在阿密恩建立“大学医疗中心”的问题，这是庞大无比的衙门手续的结晶，前后用了足足十年时间。

第四十八章

① 参加者包括有雅克·奥伯特(行政法院委员)；米歇尔·奥里拉克(当时是皮卡迪省省长，以后任内政部长办公厅主任)；弗朗西斯·德·巴厄克(行政法院委员)；让·布雷纳(当时是萨特省省长，以后任伊弗连纳省省长)；米歇尔·克罗齐尔(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雅克·德洛(巴黎大学第IX分校教授)；让·弗朗索瓦-庞塞(当时是外交部参事，企业领导人，以后任爱丽舍宫秘书长)；奥克塔夫·杰利尼埃(塞戈斯公司总经理)；雷诺·德拉·杰尼埃尔(当时任预算局长，以后任法兰西银行副

总裁); 菲利普·雨埃(财政总督察员); 让-马克西姆·莱维克(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理事长); 迪厄多内·曼德尔克恩(内阁总秘书处办公厅主任); 米歇尔·马塞内(公务办公厅主任); 雅克·佩利西埃(当时任罗纳-阿尔卑斯省省长, 以后任总理办公厅主任, 后又任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理事长); 奥利维埃·菲利普(布列塔尼省省长); 皮埃尔·拉辛(当时任国家行政学院院长); 米歇尔·鲁塞洛(当时任计划局局长, 以后任马尔尼-拉-瓦莱公共机关办公厅主任); 米歇尔·特尼埃(预算抉择合理化局局长); 安东尼·威尔(财政督察员, 企业领导人); 皮埃尔·维奥(审计院协审官, 国家电影中心负责人)。

② 我在 1975 年 11 月 22 至 26 日《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为了一个可怜的外省人”。这些文章的内容发展为“分散责任, 为什么要分散? 怎样分散”的引言, 巴黎, 法兰西文献, 1976 年。

③ 这封委任状列入上述著作, d.XX。

结论——第四十九章

① 赫伯特·吕蒂著《他的钟楼时间》(论法国), 巴黎, 1955 年。

② 安德列·马尔罗, 1965 年 12 月 15 日在体育宫, 转载于《希望》第 2 期。

附 录

① 来源: 莱奥·穆林: “1901 年至 1960 年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奖者的国籍”, 社会学分析论文, 见《社会学国际手册》, 1961, 第 XXXI 卷, 第 145—163 页。

② 来源: 1973 年, 世界银行官方统计数字; 世界银行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根据所得到的初步材料作出的估计。

③ 《大骗局》, 巴黎, 1933 年, 第 163 页。

书目提要*

- Alphandery (C.) 等,《争取国家国有化,一群工人的想法》,1968.
- Aries (P.),《法国人民的历史》,1971;《旧制度下的儿童及家庭生活》,1973.
- Arland (M.),法国书信,1951.
- Aron (Raymond),《历史哲学导论》,1948;《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不变与变》,1959;《工业社会与战争》,1959;《工业社会十八课》,1962;《找不到的革命》,1968.
- Auriol (V.),《我的七年》,1947—1954.《P. Nora 和 J. Ozouf 札记》,1970.
- Baechler (J.),《资本主义始源》,1971.
- Bairoch (P.),《工业革命与不发达》,1963.
- Balandier (G.),《技术发展的社会牵连》,1959;《经济发展的社会牵连》,1962;《政治人类学》,1969.
- Benda (J.),《圣职人员的背叛》,1927;《法兰西人历史概论》,1932.
- Bennasser (B.),《西班牙人》,1975.
- Bercé (Y.-M),《老乡的历史》,《论十七世纪西南部人民起义》,1974.
- Berger (S.),《农民反对政治》,哈佛,1972.
- Bernard (P. J.),《单数的法国》,1968.
- Besnard (P),《新教与资本主义》,1970.
- Bieler (A.),《卡尔文的经济和社会思想》,日内瓦,1959.
- Billy (J.),《技术人员与权力》,1963.
- Bloch (M.),《法兰西农村历史的特点》,奥斯陆,1931;《奇怪的失败》,1945.
- Blum (L.),《政府改革》,1936;《从人的高度看》,1945.
- Bordes (M.),《法国十八世纪省市行政》,1972.
- Bourdieu (P.), Passeron (J.-C.),《继承人》,1964;《繁殖》,1970.
- Braudel (F.),《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1967;《历史著作》,1969.

* 所有未注明出版地点的著作均在巴黎出版。附注中引用过的著作不再在这里重复。

- Brion (M.), Michel-Ange, 1939; 伦纳德·德文斯, 1954.
- Caillois (R.), 《神话与凡人》, 1938; 《凡人与神圣》, 1939; 《马克思主义论述》, 1950.
- Carré (A.M.), 《世俗人的神职》, 1960.
- Carré (J.-J.), Dubois (P.), Malinvaud (E.), 《法兰西的发展》, 1972.
- Castries (R. 公爵), 《君主制度约法》, 1958; 《国王的末日》, 五册, 1972—73.
- Catherine (R.), Thuillier (G.), 《行政哲学导论》, 1969.
- Chaban-Delmas (J.), 《热情》, 1975.
- Chamson (A.), 《我们日子的数字》, 1954; 《我们的祖先高卢人》, 1958; 《康斯坦斯塔》, 1970.
- Chartcer (R.), Compere (M.), Julia (D.), 《法国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教育》, 1976.
- Chardonnet (J.), 《法兰西钢铁工业, 进步还是没落》, 1954; 《工业地理》, 1962.
- Chastenet (J.), 《英国议会》, 1946; 《维多利亚世纪》, 1947; 《第三共和国历史》, 七册, (1952—1963).
- Chaunu (P.), 《塞维尔与大西洋 (1504—1650)》, 12 册, 1955—1960; 《古典欧洲文明》; 《启蒙时代欧洲文明》, 1971; 《历史, 社会科学》, 1974; 《改革时代》, 1975; 《从历史到未来》, 1975; 《永恒的回忆》, 1975; 《厌世》, 1975; 同 G. Suffert 合著《白色鼠疫》, 1976.
- Chevalier (L.), 《法兰西人落后的历史》, 1974.
- Choffel (J.), 《法国的自我批评》, 1965.
- Clavel (M.), 《帕兰特教区区民》, 1974; 《我信什么》, 1975.
- Clemenceau (G.), 《权力范围》, 1913; 《论民主》, 1930.
- Club Jean-Moulin, 《国家与公民》, 1961; 《公民执政》, 1968; 《什么改革? 什么地区?》, 1969.
- Congar (Y.), 《教会的真假改革》, 1950.
- Couve de Murville (Maurice), 《一种对外政策》, 1971.
- Crozier (M.), 《小公务员在工作》, 1955; 《官僚主义现象》, 1963; 《权力与社会》, 1965; 《封闭社会》, 1970; 《法兰西行政往何处》, 1974.
- Curtius (E.R.), 《试论法国》, 法译本 1941.
- Debbasch (C.), 《行政制度》, 1966; 《行政当局执政》, 1969.

- Debré (M.), 《共和国家的死亡》,1947;《共和国及其权力》,1950;《统治我们的大公们》,1957;《为国家民族效劳》,1963;《对法国的某种想法》,1972.
- Delors (J.), 《改变》,1975.
- Delumeau (J.), 《改革的诞生与巩固》,1965;《路德与伏尔泰之间的天主教》,1971.
- Denison (Edw. F.), 《为什么发展不同,西方九国的战后经验》,华盛顿,1967.
- Deroche (H.), 《行政神话》,1966.
- Drucker (P. F.), 《间断的时代》,1969.
- Druon (M.), 《扑朔迷离的前途》,1968;《言与权》,1974.
- Duby (G.), Mandrou (R.), 《法兰西文明史》,2册,1968.
- Dupâquier (J.), 《历史人口学导论》,1974.
- Dupront (A.), 《十字军东征神话》,1956(打字本,巴黎大学);《集体心理学历史的问题与方法》,1961.
- Duverger (M.), 《宪法与政治文献》,1957;《共和君主制》,1974.
- Eisenstadt (S. N.), 《新教伦理学与现代性》,纽约—伦敦,1968.
- Ellul (J.), 《政治幻想》,1965;《革命的解剖》,1969.
- Emmanuel (P.), 《平行的革命》,1975.
- Esprit, 《法兰西人的法国》,1957年12月特刊;《行政》,1970年1月专刊.
- Fabius (L.), 《不平等的法国》,1975.
- Faure (E.), 《战斗的灵魂》,1970.
- Fauvet (J.), 《分裂的法国》,1957;《第四共和国》,1959.
- Foucault (M.), 《字与物》,1966;《监视与惩罚》.
- Fourastie (J.), 《人的漫长历程》,1976.
- Fox (E.W.), 《另一个法国》,纽约,1971,法译本1973.
- France (A.), 《拉丁文特点》,1913.
- Francois (M.) 等,《法国和法兰西人》,1972.
- François-Poncet (A.), 《驻柏林使馆回忆》,1946;《从凡尔赛到波茨坦》,1947.
- Friedmann (G.), 《机器与人道主义》,2卷,1936—1946;《人的劳动何处去?》第三版,1963;《支离破碎的劳动》,1964.
- Furet (F.), Richet (D.), 《法兰西革命》,2卷,1965—1966.

- Galbraith (J. K.), 《经济发展现况》, 1962.
- Garaudy (R.), 《争取一个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1968.
- Gaulle (C. de), 《战争回忆录》, 3卷, 1954—1959; 《演说及书信》, 5卷, 1970; 《希望回忆录》, 1970.
- Gaxotte (P.), 《法兰西人历史》, 1957; 《法国革命》, 新版, 1975; 《路易十五时代》, 新版, 1975; 《十八世纪的巴黎》, 1968.
- Gelinier (O.), 《总方针的职能与任务》, 1963; 《企业道德与国家命运》, 1965; 《竞争结构的秘密》, 1966; 《按目标分别参加领导》, 1968; 《创造性企业》, 1972; 《个人及家庭企业的前途》, 1974; 《企业的社会战略》, 1976.
- Genevoix (M.), 《十四年的人们》, 5卷, 1916—1923.
- George (P.), 《法国》, 1967.
- Girard (A.), 《社会成就》, 1967.
- Giscard d'Estaing (V.), 《法兰西民主》, 1976.
- Goguel (F.), 《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政党》, 1946; 《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态度》, 1969; 《第三, 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选举地理》, 1970.
- Goguel (F.), Grosser (A.), 《法国政治》, 1964.
- Goubert (P.), 《路易十四和两千万法国人》, 1966; 《旧制度》, 2卷, 1969.
- Gramont (S. de), 《法语, 一个民族的形象》, 纽约, 1969.
- Gravier (J. F.), 《巴黎和法兰西沙漠》, 1958 (新版, 1972); 《领土整顿与法国各地区的前途》, 1964.
- Gremion (P.), 《地方政权、中央政权》, 打字稿论文, 4卷, 1975.
- Gremion (P.), Worms (J. P.), 《区域体制与地方社会》, 1969.
- Gremion (P.), D'Arcy (F.), 《经济财政部对外机构在省一级决策中的作用》, 1969.
- Grosser (A.), 《以什么的名义?》1969, 参看 Goguel 著作。
- Guéhenno (J.), 《法兰克的青年》, 1936; 《革命日记》, 1939; 《法国的份额》, 1949.
- Guichard (O.), 《整顿法国》, 1965; 《安静的道路》, 1975.
- Guitton (J.), 《对主教会议的观察》, 1965; 《同保罗六世的对话》, 1967; 《历史与命运》, 1970.
- Guyard (J.), 《法兰西奇迹》, 1965.
- Hamon (L.), Delcros (X.), 《总统共和国?》, 1975.

- Harris (A.), Sedouy (A. de), 《共产党内旅行》, 1974.
- Hartz (L.), 《发现新社会》, 纽约, 1964.
- Hoffmann (S.), 《论法国》, 1974.
- Hoffmann (S.) Leontieff (W.) Tajfel (H.), Pollak (M.), 《法国的社会科学政策,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1975.
- Hoffmann (S.), Kindleberger (C.-P.), Wylie (L.), Pitts (J.-R.), Duroselle (J.-B.), Goguel (F.), 《寻找法国》, 剑桥 (Mass.) 1963; 《寻找法国》, 1963.
- Huyghe (R.), 《艺术与灵魂》, 1960; 《艺术与现代世界》, 1970.
- IFOP, 《法国人与戴高乐》, 由 J. Charlot 介绍和解说, 1971; 《法国人的本来面目》, 介绍 P. Miler, P. Mahé, R. Cannava 的调查, 1975.
- Jobert (M.), 《未来回忆录》, 1974; 《另一眼光》, 1976.
- Jouvenel (B. de), 《权力》, 1972.
- Jouvenel (R. de), 《同志共和国》, 1941.
- Kende (P.), 《中央集权经济逻辑》, 1964.
- Kesselman (M.), 《暧昧的团结一致: 对法国地方政府的研究》, 纽约, 1967.
- Kindleberger (C. P.), 《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1851—1950), 剑桥 (Mass.), 1964.
- Labasse (J.), 《资本与地区》, 1955; 《空间的组织》, 1965.
- Lafont (R.), 《区域主义革命》, 1967; 《论法国》, 1968; 《法国的非殖民化》, 1971; 《致讲奥克方言的法国人的公开信》, 1973.
- Landes (D. S.),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伦敦, 1969.
- Lannurien (P. S.), 《落后一百年》, 1968.
- Lauré (M.), 《革命, 法国的最后机会》, 1954.
- Le Bon (G.), 《法国革命与革命的心理》.
- Legendre (P.), 《监察官的爱》, 1974.
- Le Goff (J.), Nora (P.) 等, 《创造历史》, 1974.
- Leites (N.), 《法国的政治动荡》, 1958.
- Leprince-Ringuet (L.), 《著名的发明家》, 1953; 《二十世纪的伟大发现》; 《当代科学》, 1964—1965.
- Le Roy Ladurie (E.), 《历史学家的领土》, 1973.
- Levis Mirepoix (A. 公爵), 《宗教战争》, 1950; 《一个法国家庭历险记》,

- 1955;《法兰西个人主义的伟大与悲惨》,3卷,1957.
- Levi-Strauss (C.),《血统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种族与历史》,1952;《悲惨的热带》,1955;《人类结构学》,1958;《未开化的思想》,1962;《生与熟》,1964;《从蜜糖到灰烬》,1967;《人类结构学之二》,1973.
- Lüthy (H.),《自己钟楼的时间》,1955;《法国的新教银行》,2卷,1959;《现在的过去》,《摩纳哥》,1965.
- Madaule (J.),《阿尔比悲剧与法兰西的统一》,1973.
- Mantoux (P.),《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1959.
- March (J.-G.), Simon (H.-A.),《组织》,纽约,1958.
- Marczewski (J.),《人民民主国家的计划化与经济增长》,1956;《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危机》,1974.
- Martin (M.-M.),《法国道德的形成》,1949.
- Massigli (R.),《论国家的某些病症》,1958.
- Maulnier (T.),《危机就在人本身内》,1932;《暴力与良心》,1945;《致美国人的信》,1968.
- Mayer (R.),《封建还是民主》,1968.
- McArthur (J.-H.), Scott (B.-R.),《法国的工业,计划》,哈佛,1969.
- McClelland (C.-C.),《完成的社会》,普林斯顿,1961.
- Malaparte (C.),《巴黎一个外国人的日记》,译本,1967.
- Mandrou (R.),《现代法国导论》,1500—1640,1961;《论十七、十八世纪人民文化》,1964.
- Massenet (M.),《新公共管理》,1975.
- Mendel (G.),《对父亲的反叛》,1968;《各代人的危机》,1969.
- Mendes France (P.),《现代共和国》,1962.
- Mendras (H.),《法兰西乡村社会学》,1959;《农民的末路》,1967.
- Merton (R.-K.),《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格伦科,美国,1957.
- Mistler (J.) 等,《通俗画与大众画》,1961;《拿破仑与帝国》,2卷,1968.
- Mitterrand (F.),《我的一部分真理》,1969;《可能的社会主义》,1971;《杆子与谷粒》,1975.
- Morin (E.),《法国的市镇》,1967.
- Moulin (L.),《经济发展的一般社会经济条件》,布鲁塞尔,1960;《欧洲的冒险》,布鲁热,1972.

- Mousnier (R.), 《十八世纪的科学与技术进步》, 1958.
- Nef (J. U.), 《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 译本, 1964.
- Noël (L.), 《理解戴高乐》, 1972; 《戴高乐主义的前途, 第五共和国政体的命运》, 1973; 《戴高乐与第五共和国的讨论》, 1976.
- Offenbacher (M.), 《教派与社会阶层》, 经济论文集, 4(5), 1900.
- Palmade (G. P.), 《十九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与资本家》, 1961.
- Paxton (R. O.), 《维希, 老卫士与新秩序, 1940—1944》, 1972.
- Peretti (A. de), 《行政, 人类现象》, 1968.
- Perroux (Fr.), 《二十世纪经济》, 1961; 《工业与集体创作》, 2卷, 1964—1970; 《J. 辛彼得的经济思想》, 日内瓦, 1965.
- Pognon (E.), 《戴高乐与法国历史》, 1970.
- Poniatowski (M.), 《指导改变》, 1975.
- Prieur (R.), 《政治决定》, 打字稿论文, 2卷, 1975.
- Priouret (R.), 《议员共和国》, 1959; 《法国与管理》, 1968.
- Rangel (C.), 《从好野人到好革命家》, 1976.
- Remond (R.), 《天主教徒, 共产主义和危机》, 1960; 《1945年以来法国的宗教力量与政治态度》, 1965; 《法国的右派》, 2卷, 1968; 《法国的政治生活》, 2卷, 1965—1969; 《我们时代的历史导论》, 3卷, 1974.
- Renan (E.), 《当代问题》, 1868; 《精神与道德改革》, 1871; 《哲学对话与片断》, 1876; 《演说与报告》, 1887.
- Revel (J.-F.), 《为了意大利》, 1958; 《在法国》, 1965.
- Richardot (J.P.), 《支离破碎的法国》, 1976.
- Richet (D.), 《现代法国: 体制精神》, 1973.
- Rostow (W. W.), 《经济增长的各阶段》, 剑桥 (Mass), 1960, 法译本, 1963.
- Rueff (J.), 《致经济统制主义者》, 1949; 《货币罪孽》, 1971; 《维护财政秩序的战斗》, 1972.
- Sauvy (A.), 《人口的一般理论》, 2卷, 1952, 第三版, 1963; 《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经济史》, 3卷, 1965.
- Schumann (M.), 《左派知识分子的真正苦恼》, 1957.
- Schumpeter (J.),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 伦敦, 1946.
- Servan-Schreiber (J.-J.), 《地区政权》, 1971.
- Shonfield (A.), 《现代资本主义》, 纽约, 1965.



- Sieburg (F.), 《上帝是不是法国的?》, 译本 1930.
- Siegfried (A.), 《加拿大: 两个种族》, 1960; 《瑞士, 民主见证》, 1948; 《各民族的灵魂》, 1950; 《巴黎幽默地理》, 1957.
- Siwek-Pouydesseau (J.), 《各部的主管人员》, 1969.
- Soboul (A.), 《法国革命史》, 1962.
- Sombart (W.), 《现代资本主义》, 莱比锡, 卷 I, 卷 II: 1902, 卷 III: 1927; 《犹太人与经济生活》, 莱比锡, 1911, 法译本, 1923; 《布尔乔亚》, 莱比锡, 1913.
- Suleiman (E. N.), 《法国的政治、政权与官僚主义》, 普林斯顿, 1974.
- Suffert (G.), 参看: Chaunu.
- Taine (H.), 《现代法国的始源》, 12 卷, 1876—1896.
- Tardieu (A.), 《有待重新进行的革命》, 1932.
- Tawney (R. H.),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伦敦, 1926.
- Tocqueville (A. de), 全集, J.-P. Mayer 主编, 1953 及以后.
- Touraine (A.), 《工人的觉悟》, 1966; 《工业后社会》, 1969; 《社会生产》, 1973.
- Trevor-Roper (H. R.), 《宗教, 改革以及社会责任》, 伦敦, 1956.
- Valery (P.), 《放眼现今世界》, 1945.
- Vedel (G.), 《非政治化: 神话或现实》, 1962.
- Viansson-Ponte (P.), 《戴高乐共和国史》, 1970.
- Villélume (P. de), 《失败日记》, 1976.
- Watzlawick (P.), Weakland (J.), Fisch (R.), 《改变、自相矛盾与心理治疗》, 法译本, 1975.
- Weber (M.),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档案), 1904, 法译本, 1964.
- Whyte Jr (W. H.), 《组织的人》, 纽约, 1956.
- Wolff (E.), 《标语牌》, 1975.
- Wylie (L.), 《沃克吕斯的村庄》, 纽约, 1957, 法译本, 1968; 《香佐, 安朱的一个村庄》, 哈佛, 1966, 法译本, 1970.